



**南斯拉夫
共产主义者联盟历史**

〔南〕斯·斯托扬诺维奇主编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历史

〔南〕斯·斯托扬诺维奇主编

杨元恪 曹荣飞 邵云环

巢蓉芬 王 森 谢锡勤

李嘉恩校

人 民 出 版 社

编辑委员会成员

塔希尔·阿布杜利博士、杜尚·比兰吉奇博士、伊利亚斯·哈季贝戈维奇博士、达尼洛·凯齐奇博士、佩罗·莫拉查、布兰科·帕维切维奇博士、米罗斯拉夫·斯蒂普洛夫舍克博士、斯坦尼斯拉夫·斯托扬诺维奇博士(主席)、奈迪姆·沙拉茨博士、博什科·什列戈维奇、法比扬·特尔戈、丹乔·卓格拉夫斯基博士、乔治·莫姆契洛维奇、泽连·斯坦尼什奇(秘书)。

最后编辑加工

佩罗·莫拉查、斯坦尼斯拉夫·斯托扬诺维奇博士。

作者

扬科·普莱特尔斯基博士、达尼洛·凯齐奇博士、米罗留布·瓦西奇博士、佩罗·达米扬诺维奇博士、法比扬·特尔戈、佩罗·莫拉查、布兰科·佩特拉诺维奇博士、杜尚·比兰吉奇博士、斯坦尼斯拉夫·斯托亚诺维奇博士。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第 一 编

统一革命政党建立前 南斯拉夫各国的工人运动

| | |
|---|----|
| 1.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南斯拉夫各国的状况和 工人阶级的诞生 | 3 |
| 2. 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和第一批工人组织..... | 13 |
| 3. 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的建立..... | 26 |
| 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各国的工人运动..... | 53 |
| 5. 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作用和历史意义..... | 72 |

第 二 编

在革命准备时期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 (1919~1941年)

| | |
|---|-----|
| 第一章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成立和迅速发展 (1919~1921年) | 79 |
| 1.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的成立..... | 79 |
| 2. 革命工人运动的壮大和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 | 95 |
| 3. 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取缔..... | 108 |
| 第二章 寻求革命的新战略(1921~1928年) | 114 |
| 1. 党的秘密组织及其在公开政治生活中的活动..... | 114 |
| 2. 为党的新纲领性方针和党的团结而斗争..... | 131 |

| | |
|---|-----|
| 第三章 反对君主独裁的斗争（1929~1934年）····· | 153 |
| 1. 君主独裁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革命口号····· | 153 |
| 2. 共产党的恢复····· | 166 |
| 第四章 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1935~1941年）····· | 180 |
| 1. 人民阵线的纲领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参与国内的政治 生活····· | 180 |
| 2. 铁托担任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1937~1939年）····· | 207 |
| 3. 国内革命危机的深化（1939~1940年）····· | 223 |
| 4. 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和在法西斯 侵略南斯拉夫的前夕革命民主运动的壮大····· | 235 |

第三编

人民解放战争和以革命的方式更替政权

| | |
|--|-----|
| 第一章 人民解放战争的准备和发动（1941年）····· | 251 |
| 1. 国家被占领和准备武装斗争····· | 251 |
| 2. 人民解放斗争的开始和发展····· | 262 |
| 3. 人民解放运动的政治基础····· | 276 |
| 第二章 为巩固和扩大人民解放运动而斗争 （1942年）····· | 301 |
| 1. 南共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 301 |
| 2. 人民解放战争最艰难的一年····· | 312 |
| 3. 人民解放军的建立和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 330 |
| 第三章 革命的转折性胜利（1943年）····· | 343 |
| 1. 南斯拉夫战场上的转折点····· | 343 |
| 2. 人民解放运动发展为南斯拉夫决定性的社会政治 力量····· | 359 |
| 3.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 权力的革命更迭····· | 385 |

| | |
|------------------------------------|-----|
| 第四章 战争结束阶段的新南斯拉夫（1944~1945年） | 395 |
| 1. 全国解放 | 395 |
| 2. 为争取新南斯拉夫得到国际承认而斗争 | 406 |
| 3. 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发展 | 419 |

第四编

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践中

（1945~1980年）

| | |
|---|-----|
| 第一章 革命民主制度及其矛盾（1945~1948年） | 439 |
| 1. 世界的变化,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和南共的外交 方针 | 439 |
| 2. 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人民政权广泛的政治基础 | 449 |
| 3. 巩固人民政权和镇压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反抗 | 462 |
| 4. 经济恢复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 | 469 |
| 5. 工业化政策和行政集中管理的官僚主义后果 | 478 |
| 第二章 维护独立和抗击霸权主义（1948~1952年） | 485 |
| 1. 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攻击 | 485 |
| 2. 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对情报局的坚决抵制 | 497 |
| 3. 政治压力和经济封锁 | 502 |
| 第三章 工人自治和党的新作用（1950~1952年） | 512 |
| 1. 自治的社会发展道路 | 512 |
| 2.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文化教育政策及其思想基础 | 519 |
| 3. 南共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党的新作用 | 524 |
| 第四章 社会自治的发展和为平等的国际关系而斗争 （1953~1964年） | 535 |
| 1. 自治发展的最初步骤 | 535 |
| 2. 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和南斯拉夫的非集团 政策 | 552 |
| 3. 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南共联盟纲领（1958年） | 561 |
| 4. 工人决定剩余劳动的初步尝试 | 571 |
| 5. 南共联盟国际合作的扩大和为不结盟政策奠定基础 | 580 |

| | |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自治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1964~1980年) | 588 |
| 1. 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 | 588 |
| 2. 关于联邦制的宪法改革和南共联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 统一..... | 606 |
| 3. 差别中的统一和不结盟代替磐石般的团结和集团..... | 631 |
| 4. 自治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行中的问题和 前景..... | 644 |

前 言

本书的编纂工作是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南共联盟中央历史委员会的倡导下开始的。决定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是由于感到有必要填补我国史学的这一领域中的空白。因为自出版第一部完整的《南共联盟简史》(1963年)以来已经20多年了。在此期间,南斯拉夫的史学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我国各大学的历史系培养出了一代科学干部——历史学家;建立了一批现代史科学研究所;进行了许多历史研究工作并发表了大量专著、论文、史评;在充实和整理史料以及公布有关档案材料方面成果显著。因此,尽管仍有一些课题尚未充分研究,编纂多卷本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史》的工作也未完成,但是,现在把迄今十分零散的、彼此无联系的历史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不仅在科学上是十分必要的,而且社会上也是普遍需要的。为广大读者而写的这本书也是在这方面作出的一个尝试。

鉴于本书的性质与意图,且篇幅有限,故未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亦即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生活和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史学上重新进行编排,而是把历史内容的阐述归结为实质关系和过程,这种关系和过程是相互制约的。作者努力揭示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有关的重要历史潮流、倾向和过程,以及揭示体现或说明这些过程的重要历史事件,同时也尽力阐明其实质和背景。

为实现上述要求所作出的努力,不仅受到本书作者汲取全部现有历史研究成果的主观可能性的限制,而且也受到客观困难的限制,首先受到我国史学的整个发展水平的限制。除了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近代史乃至工人运动史中对一些事件和现象的专题研

究尚未完成之外,汇集工作主要还受到史学研究中地区性意图的影响。这些史学研究提供的是过于空泛的局部资料,缺乏在更长的历史年代和在南斯拉夫全国范围内撰写的更系统的专著和论文。同时,首先是由于查阅不到档案资料,因此在对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研究中,尤其是对南斯拉夫工人运动所属的国际工人运动组织发展的研究中,历史学取得的成就不大。

鉴于迄今对战后时期几乎尚未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过研究,而且许多历史进程又尚未结束,因此试图对南共联盟战后时期的历史从历史学角度进行整理的工作遇到了特殊的困难。作者之所以有意识地决定只提供处于南共联盟的思想政治活动中心的基本社会政治进程的准确资料,而不奢望进行更深入的历史研究,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此,尤其是涉及到近二十年的历史进程时就更是如此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读者有可能至少对实现社会主义自治战略的目标、困难和矛盾有一个总的了解。根据这一战略,南共联盟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采取如下方针,即请我国所有学术中心的广大科学工作者参加编写本书各个时期的工作,围绕这一科研项目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南斯拉夫科学工作者集体。除编辑委员会外,在开始这项工作时成立了按时期划分的科学小组(1919年以前时期,1919~1941年时期,1941~1945年时期,1945~1980年时期)。在决定编写这部南共联盟历史之后,在草拟和制订写作计划阶段中,曾有更多的科学工作者在多次科学讨论会上探讨了历史汇总工作的某些方法论问题和其他问题,尤其是探讨了南共联盟历史中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党史与社会史的关系、南斯拉夫工人运动发展史分期的大体标准,以及迄今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南斯拉夫经济史的研究成果。

这样,从南斯拉夫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关键时期出发,确定了本书的一般历史分期、性质和范围。编写计划通过之后,在准备工作阶段,各科学小组的多数人员都参与了各种参考材

料的加工整理工作。除了现有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外,这些参考材料成了编写南共联盟历史一些章节初稿的依据。尤其应该指出的是,鉴于南斯拉夫诸国1919年以前的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独特性,第一科学小组人员编写的参考材料便成了扬科·普莱特尔斯基博士(在第一阶段同斯托扬·凯西奇博士合作)综合编写本书第一编内容的实际依据。在最后定稿阶段,各科学小组和编委会成员一起讨论了本书一些章节的文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提示和建议,其中有些人(塞尔吉耶·迪米特里耶维奇博士、奈迪姆·沙拉茨博士、佐里察·斯蒂佩蒂奇博士、戈尔达娜·弗拉伊契奇博士、斯拉沃留布·茨韦特科维奇博士、米莉察·卡青-沃欣茨博士、戈伊科·斯塔尼奇博士)还提出单独的补充材料,或从编辑的角度对正文作了补充,从而使本书的内容编写得更加充实,更加恰如其分。

编辑委员会仔细地审阅了收到的稿子,对一些内容的要点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对书稿的最后修改提出了意见,对向作者提出的意见作出了解释。还有一些编委会成员则参加了一些篇章的校订工作。

作者和编委会在最后定稿过程中得到了全国广大科学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著名革命家(约250人)的巨大帮助。他们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他们还应各共和国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和自治省共产主义者联盟委员会所属历史委员会的邀请,参加了本书的一些篇章文稿的讨论。

南共联盟历史委员会同各共和国共盟中央委员会和自治省共盟委员会所属委员会以及南斯拉夫人民军共盟组织委员会一道给予全体作者和编辑委员会的全面支持,是顺利完成本书编写工作的重要前提之一。这种支持为我们的这项工作得以不受阻碍地进行保证了条件,促使本书最终达到一部科学著作的要求,从而使编写本书的科学工作者能对本书(也像对其他一切科学著作一样)担负起全部责任。

编辑委员会

撰稿人

第一部分: 马里扬·布里托舍克博士、卡尔曼·切哈克博士、塞尔吉耶·迪米特里耶维奇博士、伊利亚斯·哈吉贝戈维奇博士、斯托扬·凯西奇博士、马萨尔·科德拉博士、桑多尔·梅萨罗什博士、托米察·尼克契维奇博士、弗拉多·奥什特里奇博士、丹乔·佐戈拉夫斯基博士;

第二部分: 约万·博约维奇博士、斯拉沃留布·茨维特科维奇博士、斯米连娜·久罗维奇博士、斯拉夫卡·菲达诺娃、弗兰采·菲利皮奇、米卢丁·福利奇博士、奥尔戴·伊瓦诺斯基博士、弗拉多·伊瓦诺夫斯基博士、博西利卡·亚尼亚托维奇博士、伊布拉希姆·卡拉贝戈维奇博士、德拉吉察·拉扎雷维奇博士、米伦科·巴利奇博士、佐里察·斯蒂佩蒂奇博士、米·斯蒂普洛夫舍克博士、戈·夫拉伊契奇博士、米利察·卡辛—沃欣兹博士;

第三部分: 兹德拉夫科·安托尼奇博士、维利米尔·布泽佐斯基博士、托奈·菲伦茨博士、文·格利什奇博士、伊万·耶利奇博士、佩塔尔·卡查文达博士、兹德拉夫科·克拉尼什切克、拉·巴约维奇博士、雷利亚·拉伊切维奇博士、霍·西罗特科维奇博士、约万·武约什维奇硕士、米兰·日瓦尔特博士、杜尚·日夫科维奇博士;

第四部分: 塔希尔·阿布杜利博士、德拉戈·博罗夫查宁博士、兹拉特科·切波博士、亚历山大·赫里斯托夫博士、门苏尔·伊布拉希姆巴什奇博士、兰科·康查尔硕士、伊万·佩里奇博士、菲赫米·普什科利博士、拉多万·拉多尼奇博士、戈伊科·斯塔尼奇博士、耶拉·沃杜什克—斯塔里奇硕士、切多米尔·什特尔巴茨博士。

特约撰稿人 布兰卡·科伦季亚硕士

文字编辑 米罗斯拉夫·维托罗维奇

第一编

统一革命政党建立前 南斯拉夫各国的工人运动

1.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南斯拉夫各国的状况 和工人阶级的诞生

当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上出现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传播的时候,组成今天南斯拉夫的各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欧发达国家。南斯拉夫各国在社会和经济上不发达的基本原因在于一些国家长期依附于土耳其,而另一些国家则依附于奥匈帝国。同时,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在广大地区里资本主义只是刚刚开始发展,但也有一些城市和地区资本主义关系已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各国完全屈从于奥地利和匈牙利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那里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封建关系。只有个别经济部门(运输、冶金、采矿)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塞尔维亚和黑山的经济发展也很缓慢。在马其顿地区,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发展,但它以及科索沃,是摆脱土耳其统治和封建关系最晚的地区。南斯拉夫各国中工人阶级的诞生正是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不平衡状况和特殊性的制约。在许多地区,工人阶级主要是由手工业者、农业工人和雇工组成的,而随着铁路的修筑、矿山的开采和工厂的兴建,铁路工人、产业工人和矿工日益增多起来。

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自主的斗争是使南斯拉夫各国经济和社会得以加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条件。19世纪南斯拉夫诸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所达到的程度,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

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德国和意大利民族运动的影响,都促进了南斯拉夫各国人民的觉醒,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并促使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出现。民族意识的发展比经济发展快得多,但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由国内年轻的资产阶级领导的。这些年轻的资产阶级认识到,赢得民族自由和废除封建关系是经济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前提。

1804年和1815年第一次和第二次塞尔维亚起义,是巴尔干各国人民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最初的和意义最大的突破。塞尔维亚农民群众的这一革命运动包含着强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素。争取废除封建关系(于1833年实现)和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是这次革命运动的阶级内容。然而,在反封建和民族解放革命斗争的愿望和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建立的塞尔维亚国家,到1878年才在国际上被承认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并把疆域扩展到莫拉瓦河流域南部。塞尔维亚的整个发展经历了许多内部危机、朝代更迭、尖锐的政治冲突(1883年蒂莫克暴动)和战争。这些事件是由在普遍落后的情况下社会力量的具体对比引起的。这种力量对比表现为受到残酷剥削的农民同以君主为首的残暴的官僚统治机器之间的尖锐矛盾。同时,塞尔维亚处于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围绕瓜分“波斯普鲁斯病夫”(土耳其)遗产产生的帝国主义利益和计谋的尖锐冲突的强大压力之下。1888年通过的宪法实行了议会民主,但它只是民主力量暂时的政治上的胜利,因为1893年亚历山大·奥布雷诺维奇发动政变后,这部宪法即被废除。这位新国王的独裁政权一直延续到1903年5月发生政变时他被谋杀和奥布雷诺维奇王朝被推翻为止。这时,塞尔维亚根据宪法制度成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但并没有实行普选权,城市和乡村的贫苦阶层被剥夺了选举权。

1866年塞尔维亚公国有人口121.6万人,唯一的大城市贝尔格莱德有人口24957人。这显然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国。20世纪初,只有8.9%的居民以手工业、商业、工业、矿业、交通运输业和旅馆饮食业为生。商品货币关系进入农村以后,自然经济的

生产受到破坏，父权制家庭公社瓦解，阶级分化更明显了；1873年颁布的农田法虽然阻止了出售最后6尤特罗^①土地，但仍然未能制止贫苦农民的破产。1863年购进了第一部蒸汽机，而1870年最大的一家工业企业——克拉古耶瓦茨兵工厂约有600名工人。农产品的出口，首先是牲畜出口，加工工业的兴起，尤其是1884年铁路竣工和投入使用，都促使新的工业基地和出口基地出现。在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之间展开关税战期间(1906~1910年)开始了一个工业迅速发展时期。

1900年塞尔维亚有人口2492882人，雇佣工人总数约10万人；其中产业工人约5000人(1910年底为16095人)，矿工2190人，手工业工人和旅馆饮食业工人约3万人，其余则为雇工、仆役和农业工人。稍后手工业工人仍占城市雇佣工人的大多数：1910年雇佣工人总数的56.7%在手工业部门工作，13.2%在工业部门工作，11%在矿业部门工作，7.6%在商业部门工作。手工业工人中人数最多的是泥水匠、鞋匠和烤面包工人；许多人是雇工(半年领取一次报酬，其中部分为领取实物)。

18世纪末和19世纪里，黑山在进行了多次解放斗争后成为独立国家：1852年宣布为公国，而从1878年起版图扩大，并受到国际法承认为独立国家。1905年颁布的宪法使尼古拉大公的专制政权部分地受到限制，政治发展进程加速了。经济上明显不发达是其特征。为数不多的城市成了商业中心，在那里手工业得到了发展。为了取得出海口，着手在巴尔和乌尔齐尼修建港口。20世纪初建立了几个金融机构和商会。一部分工人参加了修筑道路。

19世纪里，土耳其这个衰落国家的采邑—领主制迅速变为私有大庄园制(契特卢克制)的过程给处于土耳其统治下的南斯拉夫诸国和省(马其顿、科索沃以及1878年前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莫拉瓦河流域南部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打下了烙印。大庄

^① 南斯拉夫旧的土地单位，等于5754平方米，大致相当于1/2公顷。——译者

园制使农民群众的社会地位更加恶化了。19世纪中叶,才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这主要是外国投资带来的结果。轻工业加工企业逐渐发展起来,建立了蒸汽磨房、机器纺织厂、啤酒厂。这些工厂大都座落在省会和铁路沿线的城市中。金融信贷机构开办起来了。19世纪后半期,修筑了道路,扩大了邮电服务网,以萨洛尼卡为起点的铁路建设起来(通往斯科普里、米特罗维察、比托利)。受压迫人民争取民族政治解放和文化解放的愿望加强了。被压迫、被剥削居民的不满发展为群众性的反抗和推翻外来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制度的起义。在一系列的暴动和起义中,就其广泛性和影响来说要算1875~1878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起义的规模最大。这次起义更加深了严重的“东方危机”。马其顿人民展开了争取使用本民族语言权和恢复昔日独立的奥赫里德主教区的斗争,并且大力反对保加利亚教会组织压迫马其顿教会学校和将保加利亚民族意识强加于人的企图。在争取推翻外来压迫、实现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爆发了拉兹洛格起义(1876年)和马其顿—克雷斯嫩起义(1878年)。1878年,阿尔巴尼亚人的代表建立了普里兹伦联盟,并提出了实现阿尔巴尼亚人民自治的要求;在一些主要由阿尔巴尼亚人居住的地区,到1881年他们部分地夺取了政权,但却同一些巴尔干邻国发生了冲突,这表现在1900年后,尤其是1912年后阿尔巴尼亚人举行的几次反土耳其的起义中。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中,随着1893年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建立,马其顿人民的解放斗争成长为有组织的民族运动。这一运动的基本目的和马其顿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在伊利亚节起义和1903年的克鲁舍沃共和国宣言中得到了体现。起义的失败和骇人听闻的镇压被列强用来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这加速了1908年7月的青年土耳其革命的爆发,结果使当时的专制制度受到限制,宪法制度得以建立起来。从1912年起,科索沃领土处在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国界之内,而马其顿则被分裂为瓦尔达尔马其顿(隶属塞尔维亚王国)、爱琴马其顿(包括萨洛尼卡,隶属希腊)、皮林马其顿和斯特鲁米察(包

括郊区,隶属保加利亚)。

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相互渗透的,在客观上是互为补充的。但主要由于相互之间的领土要求,结果相互发生了冲突。土耳其政权、奥匈帝国政权以及其他扩张主义势力加剧了这种冲突,并力图使其服从于自己的利益。大国对巴尔干各国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干涉,尤其是1878年后这些干涉同毗邻的各巴尔干小国的竞争欲望交织在一起,这些小国都强调自己负有把土耳其统治下的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解放出来的历史使命。

巴尔干各国的资产阶级、王朝和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野心以及扩张主义的民族政策,在巴尔干地区导致了有害于打着这种招牌的民族本身的严重冲突(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尤为致命的大克罗地亚思想和大塞尔维亚思想之间的冲突,1885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1913年瓜分马其顿、色雷斯和多布罗加的巴尔干战争)。在与大阿尔巴尼亚思想发生冲突的地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这些思想也造成了严重的冲突局面。1912年建立了阿尔巴尼亚国家及其边界得到国际承认之后,这种局面仍延续下去。在欧洲其他地区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也出现过冲突,但任何地方都不象巴尔干地区那样提出如此明显的和不可避免的历史要求:工人阶级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为了实现斯韦托扎尔·马尔科维奇所说的“一切民族的自由”,必须通过自己的政治斗争找到革命的解决办法。

19世纪里,斯洛文尼亚人民、克罗地亚人民和相当大一部分塞尔维亚人民都处于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1848~1849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这些人民的政治运动的性质以及后来对这个帝国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由于没有能够把中产阶层、农民群众和各民族的工人联合起来,这次革命半途而废。奥地利资产阶级同旧制度的势力勾结起来,拒绝了其他民族首先是斯拉夫民族对民族平等的要求。克罗地亚不够发达的

资产阶级曾枉费心机地企图实现民族运动的纲领(将克罗地亚各部分联合起来,并使其拥有更大的独立性)。由于在对待匈牙利境内非匈牙利族人的问题上同匈牙利革命的贵族资产阶级首领们所追求的相反的目标发生冲突,克罗地亚的资产阶级便同遇到同样问题的伏伊伏丁那境内的塞尔维亚运动联合起来,但最后却屈从于奥地利的反革命势力。对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南斯拉夫诸国来说,1848年发生的最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是废除封建关系,但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特拉除外,因为那里的农奴制关系仍未触动。在国家—政治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1867年实行了二元制(宪法规定划分为两个内部国家区域——奥地利和匈牙利),从而斯洛文尼亚被分割,克罗地亚被肢解,巴纳特、巴奇卡和巴拉尼亚直接并入匈牙利。

克罗地亚被国界和省界分割为地位不同的六部分:在匈牙利范围内,拥有部分自治权和国家因素的克罗地亚省(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包括斯雷姆在内);梅久穆列和巴拉尼亚;里耶卡拥有特殊地位;而伊斯特拉(克罗地亚部分和斯洛文尼亚部分)和达尔马提亚(包括博卡科托尔斯卡在内)则是奥地利的省份。克罗地亚属于奥匈帝国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但也有相对发达的区域。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农民(占70~90%),绝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克罗地亚的一些地区农业人口很稠密,而荒僻的喀斯特地带经济很不发达。绝大部分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移民和侨居国外十分盛行。贫困化和无产阶级化过程是普遍现象。过去大部分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外国人拥有的封建领地被卷入了资本主义经济。

在铁路、海运和河运沿线地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特别发达,而在其余广大地区,资本主义经济则发展得比较缓慢。小型资本主义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资本家大部分是外籍人,都市化过程不平衡,大城市中的居民具有多种民族成分。第一代工人阶级集中在城市和城市以外的经济中心,诸如大农场、林场、煤矿和

其他矿山、木材加工厂和食品加工厂。不过，例如在克罗地亚省，1890年以务农为生的人口占84.63%，而只有8.39%的人口以矿业、工业和手工业为生。就企业的数量和就业工人的数量来说，木材工业占主导地位。当时在木材工业中就业的有5930名工人，而在所有其他部门中工作的只有3962名工人。工人数量最多的是在里耶卡、普拉、萨格勒布、奥西耶克（到1890年，这些城市中的工人人数约占居民的1/3）、斯普利特及周围地区的中小型工业部门中，以及个别大企业中。在工业部门以及矿业部门中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占大多数。在交通部门中的工人绝大多数是铁路工人，而且主要集中在铁路枢纽地区；海员主要是在造船厂所在地的里雅斯特和里耶卡，在大农场就业的农业工人主要是在斯拉沃尼亚，而林业工人则在林区及斯拉沃尼亚和戈爾斯基科塔尔的木材加工厂。

除1866年隶属意大利的斯洛文尼亚的贝内什卡（威尼斯辖区）外，斯洛文尼亚人民居住的整个地区直到1918年一直隶属奥匈帝国。19世纪中叶，斯洛文尼亚人在其民族居住的地区几乎占居民的9/10；奥地利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占1/10，但他们绝大多数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都属于统治阶级并掌握着国家机器。在克罗地亚的伊斯特拉和里耶卡，“高贵”的社会阶级也按民族划分。由于这种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社会矛盾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民族统治，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这种统治的民族反抗。但地理上统一的斯洛文尼亚人的民族区域多次被奥地利的封建省界所分割，因此这些区域的某些部分（除克拉尼地区外）同奥地利或意大利的统治中心相连。1867年实行二元制以后，几乎整个斯洛文尼亚地区都归属奥地利，而普雷科穆列归属匈牙利。奥地利的国家政策力图使斯洛文尼亚完全脱离其他南斯拉夫人民。在1848～1849年的革命中，斯洛文尼亚人制定了“统一的斯洛文尼亚”纲领，纲领援引了要求打破奥地利“历史形成的国家结构”的“自然权利”；提出这一要求的人中有革命民主主义者安东·费斯特尔。后

来他完全转向维也纳的革命运动,接着他作为在英国的政治流亡者同卡尔·马克思建立了联系。

19世纪前半期,同其他奥地利省份和捷克省份相比,斯洛文尼亚地区并不发达。直到19世纪中叶,这一地区仍未出现较大的城市(卢布尔雅那约有2万人口,马里博尔约有8000人口)。不过,这里仍然发展了同家庭劳动和农村贸易相联系的工场手工业。早期占首位的是由许多小熔炉和水力锻锤构成的冶炼业,木炭生产也与此有关;开办了煤矿(最大的莱舍煤矿1835年约有600名矿工)、伊德里亚国营水银矿和硃砂厂、科鲁什卡铅矿和炼铅厂。陆运和河运,向维也纳和意大利—克罗地亚运送农产品和“殖民”产品的转口贸易也发展起来。从维也纳途经卢布尔雅那到的里雅斯特的第一条铁路也建成了(1857年)。的里雅斯特成为奥匈帝国的主要港口和巨大的商业和工业中心,它对斯洛文尼亚的直接后方也是重要的。工业革命的进程导致了以非农业活动为生的人数增长,在科鲁什卡这类人甚至占居民的1/4以上。

股份公司是工业化的杠杆:如克拉尼工业股份公司和特尔博夫列煤炭股份公司。这是由外国资本经营的两大公司。无论在商业中还是在信贷业务中,外国资本都占统治地位。特别是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日益控制了斯洛文尼亚地区。尤其是从马里博尔、特尔博夫列、扎戈列、经过卢布尔雅那到的里雅斯特这条主要经济通道上,产业无产阶级以十分集中的方式壮大起来。早在19世纪末,斯洛文尼亚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就已超过10万人,而1910年达到12.8万人(占居民人口的7.2%),其中约有9.5万人操斯洛文尼亚语。工业和手工业中的工人有1/4以上是妇女。整个奥地利地区实行冶金业现代化,使斯洛文尼亚的大多数小钢铁厂倒闭。靠烧木炭挣钱的可能性没有了,因而大批工人失业,他们被迫迁回或返回农业中。另一方面,铁路使过去靠运输和转口贸易挣钱的可能性减少了。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渗入农村,引起了持续很久的农业危机,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过程。斯洛文尼亚工人

的技术熟练程度低,阶级觉悟不高,尤其是来自农村无产者群众中的那些没有组织起来的新工人的觉悟很低。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十分糟糕,因为他们不仅遭受阶级剥削而且没有民族权利,往往还受到露骨的歧视。

伏伊伏丁那的大部分地区(巴奇卡和巴纳特)都并入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匈牙利,小部分地区(斯雷姆)归入克罗地亚省,同时各区和某些城市享有一定的自治权。由于匈牙利政府实行匈牙利化,这里的民族问题也很尖锐,居民的民族结构十分复杂,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占绝对多数。巴纳特、巴奇卡和巴拉尼亚在1910年约有152.5万人,其中塞尔维亚人占32.65%,匈牙利人占26.94%,德意志人占21.25%,克罗地亚人占8.7%,罗马尼亚人占4.47%,斯洛伐克人占3.53%。土地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1848年革命后,封建主的大领地仍未被触动,60%以上的农村人口没有土地或只有小块土地,他们在大庄园里当仆役或打短工。1910年有20多万农业工人和仆役。几乎80%的人口从事农业。到了19世纪最后十年因修筑铁路和发展轮船运输而打入欧洲市场,才为在加工农产品、制陶和加工木材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工业和手工业创造了条件,而纺织工业则是通过开办制麻厂和缫丝厂发展起来的。而这里的手工业和工业规模也是很小的:1910年有20名以上工人的企业只有177家(共12553人),而其余7.5万名工人则在小企业和手工业中就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前一直隶属于土耳其,1878年根据柏林会议的决定归奥匈帝国占领,后来(1908年)被单方面吞并。这次吞并引起了国际政治危机(吞并危机),几乎导致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的战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军权和行政权从未完全分离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奥匈帝国中保持了特殊的国家法律地位。根据奥皇签署的全国宪章(宪法),于1910年成立了议会,但异族的专制政权未受限制。议会是按宗教原则和等级原则组成的,有22%的议员是任命的,议会只有十分有限的立法

权,所以无法对管理事务施加影响。异族政权的殖民政策巧妙地利用重重矛盾和特点,首先利用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封建主义的强大残余交织在一起。它尤其利用了居民的民族和宗教的复杂情况(1910年,190万居民中塞尔维亚人占43.5%,穆斯林占32%,克罗地亚人占21%,犹太人和其他族人占3.5%)。资本主义关系是在国家的大力干预和外国资本的大量渗入(占经济部门投资的90%)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重点是开发自然资源,首先是矿山和森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原料出口占全部出口的83%。1910年农民占居民总数的88%,封建土地关系没有废除。拥有农奴和没有农奴的地主、自由农民、农奴和部分自由的农奴以及大批无地农民同时存在。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渗入,除穆斯林地主以外,又形成了一个由塞尔维亚地主、克罗地亚地主和其他地主构成的力量单薄的阶层。与此同时,农村的贫困化也加剧了,这对移民运动产生了影响。随着工业的兴起和交通的发展,城市(大部分是传统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其中部分居民也靠农业为生)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经济、社会及民族的状况。资产阶级、官吏、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在城市中形成了新的阶层,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从奥匈帝国的其他省份迁移来的。为修筑铁路、开发森林而把外国的技术工人请到工业企业中来,这对正在形成的工人阶级的结构产生了很大影响。多数雇佣工人,主要是非熟练工人都来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贫苦农民队伍。1907年在国营企业以及私人企业和私人作坊中就业的有10多万人,占人口的5.74%。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固定工和临时工有8~10万人,其中只有一半人是产业工人、矿工、冶金工人。工人阶级中不同的信仰结构和民族结构以及大量的外籍工人构成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特征。

2. 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和 第一批工人组织

第一批工人组织的诞生有赖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雇佣工人阶级的出现。然而,某些个人和小组作为社会主义思想代表的出现并不总是直接取决于每个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的政治形势,取决于传播和促进社会主义思想的外部影响。

因此,社会主义思想在南斯拉夫各国中出现的时间很不相同,不取决于它们的经济程度。在独立的国家中,诸如在塞尔维亚,社会主义思想还在工人组织出现之前就产生了,因为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看到,在研究塞尔维亚人民以及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流域其他各国人民的民族问题时,还必须分析塞尔维亚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问题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问题。在经济上比较发达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伏伊伏丁那,尽管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已经激发了一些人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趣,但社会主义运动是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后才开始的。19世纪后半期,工人运动参加者在思想上依靠的是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则是晚些时候才逐渐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运动是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条件下出现的,当时还没有形成工人阶级运动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思想是从俄国、德国和法国思想家们那里接受过来的。这些思想是

各种观点的混合物：革命民主主义观点、空想主义观点、民粹派观点、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无政府主义观点。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在1867~1869年日沃因·茹约维奇的文章中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是同斯韦托扎尔·马尔科维奇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马尔科维奇在1870年6月同一批青年社会主义拥护者在贝尔格莱德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核心小组。由于宣传马克思的观点，很快也在其他地方——克拉古耶瓦茨、斯梅德雷沃、波扎雷瓦茨、瓦列沃和沙巴茨建立起社会主义核心小组。

除极少数情况外，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批代表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是在青年学生和学徒中间以及工匠和小手艺人中间开展活动。斯·马尔科维奇同第一国际有联系，是第一国际俄国支部的通讯员。他的小组出版《工人报》(1871~1872年)，这是南部斯拉夫人和巴尔干半岛上的第一家社会主义报纸。马尔科维奇在这家报纸上宣传巴黎公社的思想及其革命实践。在这家报纸的试刊(1871年6月1日)上发表了南斯拉夫各国中第一个社会主义纲领。1871年在潘切沃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对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特殊意义。斯·马尔科维奇于1872年在诺维萨德发表的最重要的著作《东方的塞尔维亚》一书中尖锐地抨击了塞尔维亚的官僚统治制度，以及塞尔维亚的社会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中的许多现象和关系；他主张建立一个在合作社所有制和人民自治基础上的国家。他反对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官僚阶级和王朝的扩张主义，主张通过革命途径使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摆脱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的统治，主张“推翻今天阻挠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联合成自由的人民和平等的劳动者的所有国家机器”，谋求建立自由平等的巴尔干人民的联邦。

斯·马尔科维奇通过自己的思想和活动对进步的社会力量，首先是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也对塞尔维亚的整个政治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组织工人和手工业者，创办报纸，撰写了大量文章，发表政治论文，团结青年，用社会主义思想

和自由思想激励他们。他的思想和他进行的政治斗争还大大推动了塞尔维亚的农民群众。他对官僚暴政的批评以及他关于人民应享有主权的思想,关于自治和在塞尔维亚实行自治制度的思想,尤其容易为农民群众所接受。因此,要求自治成了塞尔维亚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民主运动的核心。

在1875年11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中,克拉古耶瓦茨、斯梅德雷沃、沙巴茨及其他城市和乡村中,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获得了胜利。1876年2月15日(新历27日)在克拉古耶瓦茨举行的一次集会上爆发了塞尔维亚第一次有组织的名为“红旗”的社会主义工人示威游行。当时在区的大楼上竖起了一面巨大的书有“自治”字样的红旗。

在斯·马尔科维奇的影响下,70年代在黑山也出现了早期社会主义思想。1871年下半年采蒂涅市教育局长瓦萨·佩拉吉奇的活动也对此作出了贡献。佩拉吉奇是《黑山人报》的撰稿人,在这家报纸上发表了关于巴黎公社的评论,并转载了《工人报》的一些文章。80年代里,社会主义著作开始在黑山传播开来;1879年在采蒂涅开办了一家书店,采蒂涅阅览室也重新开放,这个阅览室有50多种南斯拉夫报纸和外国报纸。在黑山,最有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家是教师杜尚·布尔卡诺维奇。

斯·马尔科维奇过早地逝世(1875年)之后,一些追随者(尼古拉·帕希奇、佩拉·托多罗维奇等人)放弃了社会主义理想,创立了激进党(1881年)。激进党很快就被改造成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然而,这个党中进步的一翼,首先是农民派,仍然忠于斯·马尔科维奇的民主和革命思想。1883年蒂莫克起义遭到血腥镇压,农民代言人、人民议员阿达姆·博戈萨夫列维奇、留巴·迪迪奇等人被杀害,都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转入地下,于1878年在贝尔格莱德和亚戈迪纳(斯韦托扎雷沃)成立了秘密的社会主义俱乐部。米塔·采尼奇和久拉·廖契奇领导的小组反对激进党人,抨击占统治地位的

社会制度，并在贝尔格莱德创立了第一家社会主义日报《工人报》（1881年）。不久，又发表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译本以及其他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1875年在贝尔格莱德创立了塞尔维亚第一批手工业行业工人组织——缝纫工人基金会和印刷工人协会。从1879年到1895年，主要在米塔·采尼奇小组的倡导下建立了许多手工业工人协会、合作社和互助基金会。然而在这些组织中小手工业者占优势，因此使它们变成了救济性的协会。1889~1891年期间建立了第一批带有明显社会主义因素的文化教育性质的工人共同组织，而1892年创立了塞尔维亚手工业工人同盟。1893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塞尔维亚第一次庆祝五一节的活动。社会主义者在塞尔维亚手工业工人同盟内及其报纸《手工业者同盟报》（1892~1895年）上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接受新成立的第二国际（1889年）的主张；他们曾两次倡议建立社会民主党。成立了地下的运动领导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木器工人安德拉·班科维奇和五金工人米洛什·奥布拉多维奇起了突出的作用。瓦萨·佩拉吉奇在塞尔维亚居住期间也起了重要影响。班科维奇领导的小组同团结在它周围的知识分子一起出版了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报》（1895~1896年）。

1881年，贝尔格莱德的社会主义者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了在伦敦和库尔（瑞士）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会议。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参加了在苏黎世（1893年）和伦敦（1896年）举行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

塞尔维亚最早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往往是一些熟悉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的“帮工”。罢工斗争的出现和增加（1882年修筑贝尔格莱德—尼什铁路时举行的罢工，1889年在尼什机车修配厂、1891年在帕拉钦毛纺厂以及1891年在贝尔格莱德军服厂举行的罢工）反映了工人阶级的觉醒。1893~1897年间罢工次数激增。团结在《社会民主主义者报》周围的社会主义者小组在建立工人工会组织方

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贝尔格莱德制鞋工人协会(1896年成立)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关于筹建工人基金会的方案就是在塞尔维亚建立跨行业的工人中心的尝试。当《社会民主主义者报》停刊时,随即建立了一些地区性的普通工人阶级组织,如奈戈廷工人协会(1896年)。贝尔格莱德工人协会并不具有同样的性质:在约万·斯凯尔利奇小组的影响下,这个协会把各种各样公民都吸收为成员,并把自己的作用归结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当时还出版了《工人报》(1897年)。塞尔维亚当局阻挠工人组织开展工作,阻止建立工人党;在伊凡节谋刺前国王米兰·奥布雷诺维奇的事件(1899年)发生后,在加强恐怖的时期里,已建立起来的工人组织都被解散了。

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伏伊伏丁那,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工人组织的萌芽是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工人运动的范围内发展起来的。

1848年革命失败后,封建统治集团恢复了专制主义,特别是加强了反对革命民主主义者和阻止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影响扩散的措施。到了60年代,才逐渐开始恢复宪法秩序和政治生活,从而也就为组织工人运动创造了初步的条件。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成立(1867年)后,在奥匈帝国的其他城市建立了类似的协会,而在帝国范围内的南斯拉夫各国也建立了许多工人协会。在这些协会中,关于工人阶级为争取承认工人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利益而开展政治斗争的思想很快便取代了把工人组织起来是为了减少贫困的自救思想。

1871年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在欧洲普遍实行反动统治和1873年发生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已经具有半合法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形式的工人运动,由于遭到迫害分裂成了相互十分对立的两派或者说三派(“温和派”、“激进派”、“无政府主义派”)。80年代中期,在当局的恐怖统治下,工人运动几乎完全销声匿迹。直至1888年末,才又形成了关于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社

会民主主义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各对立的政治思想派别又重新联合起来,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原则上从事公开活动(停止秘密俱乐部的活动),并且从基层组织到领导的执行委员会都依据民主和阶级原则建立牢固的党组织。在海因费尔德举行的代表大会(1888~1889年)上建立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和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代表大会(1890年)上建立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这对奥匈帝国范围内的南斯拉夫各国工人运动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虽然工人运动还处于襁褓之中,但在它的压力下,早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奥匈帝国已经实行了社会保险制度,规定了星期日调整工作,对劳动中的纠纷进行调解。社会主义者批评了这个制度的局限性和缺点,但都参加了社会保险组织和劳动纠纷调解机关。

在斯洛文尼亚,从1855年起就已经出现了帮工协会和其他形式的工人经济自助团体。第一批工人组织是1868年出现的,当时在马里博尔成立了工人教育协会,而在卢布尔雅那成立了印刷工人组织。建立马里博尔协会的发起人是手工业帮工,但约有1500名固定工人的南方铁路企业的工人很快便成了这个协会的主要支柱。马里博尔教育协会的工人们同设在日内瓦的第一国际德国支部保持联系。在什塔耶尔斯卡地区的采列、普图伊和斯洛文尼亚比斯特里察也有工人教育协会。卢布尔雅那第一个工人教育协会是1869年成立的,在这个协会中社会主义观点很快就占主导地位。在的里雅斯特(1868年)、普雷瓦列、古什塔涅(拉夫内)也成立了协会。所有这些协会中民族成分是混杂的,除卢布尔雅那以外,这些协会中主要使用德语(在的里雅斯特使用意大利语)。当时发生了首批罢工,最初是在手工业工人中间(1870年发生了木器工人罢工,后来马里博尔的面包房工人罢工,1871年卢布尔雅那的缝纫工人罢工),还建立了手工业工人同业协会。裁缝帮工马蒂亚·孔茨是斯洛文尼亚最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之一。1872年他代表斯洛文尼亚工人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奥地利工人教育协会第一次会议。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中发生的冲突,在斯洛文尼亚各省也有反响,

那里首先是“激进派”加强了。80年代初,在卢布尔雅那的工人教育协会中成立了弗兰茨·热莱兹尼卡尔领导的手工业者民主小组,热莱兹尼卡尔是一个裁缝师傅,还在巴黎公社时期在法国逗留的年代里他就是一个共和党人。1883年,这个小组散发了第一次用斯洛文尼亚文书写的传单,号召人们举行起义,进行社会革命。由于从事这种政治活动,热莱兹尼卡尔及其同志们于1884年4月在法庭上被指控为无政府主义者(“杀人犯”);热莱兹尼卡尔坐了9年牢,他一直忠于社会主义,而卢布尔雅那工人协会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活动。

1890年初,在的里雅斯特的工人同盟内,除意大利分会和德国分会外,还成立了斯洛文尼亚分会。这个同盟在市内和市郊斯洛文尼亚族居民区开展活动,甚至在克罗地亚的伊斯特拉也开展活动。同盟内有来自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的克罗地亚族工人,而在90年代,尤其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成立以后,同其他南斯拉夫民族工人的接触也加强了。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也是斯洛文尼亚工人阶级的政党,因为党组织分布在当时历史形成的各省份内,而不管其民族构成如何。只有克拉尼省的党组织是由斯洛文尼亚人组成的,而在其他省份只有几个地方组织才是这种情况。党组织参加并领导了工人阶级的一些行动,特别是参加并领导了1889年、1890年和1892年的矿工大罢工和其他工人罢工。党组织了1890年庆祝五一节的示威游行,后来出版了第一批斯洛文尼亚文的社会主义报纸(1889年出版的《新时代》和1890~1891年出版的《劳动报》)。

斯洛文尼亚的手工业工人以及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多半能读德文的社会主义报刊和马克思主义文章。但是,随着来自农村的新工人群众流入城市,出版斯洛文尼亚文的社会主义报纸的问题日益突出起来,因此在海因费尔德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出版斯洛文尼亚文报纸的行动把斯洛文尼亚地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联合起来。从创办《劳动者》报开始(1893年)不断取得成绩,到

了1897年才不得不主要在维也纳印刷,因为地方印刷厂的资本家老板对这份报纸进行了抵制,最后在的里雅斯特以新的名称《红旗》长期出版。

将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职能结合起来的的地方工人协会的旧形式很快被放弃了。建立了可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活动的总工会(1890年在什塔耶尔斯卡省成立,下设马里博尔分会、特尔博夫列分会、扎布科维察分会、韦莱涅分会、利博亚分会和采列分会;1892年在克拉尼省成立,下设扎戈列分会、伊德里亚分会和科切维耶分会;1893年在科鲁什卡省成立,下设普雷瓦列分会和普里莫列分会)。另一方面开始组织政治性的工人协会,其中卢布尔雅那工人协会“未来”(1893年)很快变为后来的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的核心。在的里雅斯特成立了主要由意大利人组成的社会民主同盟,它也包括斯洛文尼亚工人,并对克罗地亚的伊斯特拉也有影响。

克罗地亚工人运动开始时同斯洛文尼亚的情况相似。在克罗地亚,工人阶级产生和发展也是很早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在早期的工人协会中出现的。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是手工业工人和印刷工人,首先是萨格勒布(1869~1874年印刷工人德拉古廷·卡莱在这里很有名气)和奥西耶克手工业工人和印刷工人。他们建立了工人协会,秘密地组织起来。1869年带有第一国际思想倾向的工人小组在萨格勒布开展活动,1874年他们为了创办第一家社会主义报纸《工人之友报》(1874~1875年)而成立了俱乐部,1867年在奥西耶克建立了工人教育协会,1868年在萨格勒布建立了印刷工人协会,1869年成立了手工业工人协会。萨格勒布的社会主义者同伏伊伏丁那许多城市里的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联系,注视斯·马尔科维奇及其追随者的活动以及塞尔维亚工人组织起来的最初尝试。1875年在德国举行哥达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前夕,在萨格勒布曾试图建立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工人党。同时,1871年前后萨格勒布一些大学生曾开展活动,而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起义时

接近瓦萨·佩拉吉奇和赞成社会主义观点的一批大学生聚集在边境地区并开展活动。

1875年以后,克罗地亚的工人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工人之友报》被查禁。奥西耶克社会主义者小组在1880~1882年遭到镇压时被破坏,而萨格勒布“激进”社会主义者俱乐部1884年受到法庭审讯。《印刷报》(1884~1886年)在本行业内部反映了南斯拉夫联合的观点;《工人信使报》(1887~1889年和1890年)报道了第二国际的成立,并主张建立克罗地亚手工业工人协会同盟。1889~1890年期间,过去时起时伏的经济斗争又活跃起来了,而第二国际的成立起了新的推动作用。1890年,萨格勒布、里耶卡和瓦拉日丁为数众多的工人举行了庆祝五一节的活动。《工人信使报》又暂时复刊。然而,已经在克罗地亚各地建立起来的互助与教育协会不再是工人运动的基本组织了。工人阶级政党、阶级工会和社会主义文化协会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伏伊伏丁那,社会主义思想和其他进步思想的最初影响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可觉察到。1867年以后,在伏伊伏丁那的一些城市中也成立了第一国际拥护者小组。斯·马尔科维奇及其追随者在塞尔维亚青年联合会和塞尔维亚手工业者当中开展活动。伏伊伏丁那第一批工人协会团结了德意志族工人和少数匈牙利族工人。在诺维萨德、苏博蒂察、贝拉茨尔克瓦、弗尔沙茨的早期工人阶级组织接受了1868年在布达佩斯成立的工人协会总会的纲领。同时,塞尔维亚的社会主义者斯·马尔科维奇、布兰科·米哈伊洛维奇、乔卡·米亚托维奇、安卡·宁科维奇和米莉察·宁科维奇在诺维萨德和潘切沃进行了非常积极的活动。他们通过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潘切沃人》和社会主义报纸《平等报》的试刊在塞尔维亚人中间传播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当斯·马尔科维奇、瓦萨·佩拉吉奇和其他社会主义者被驱逐出匈牙利之后,1875年曾出版过社会主义报纸《博爱》的尼古拉·马尔科维奇和拉扎尔·南契奇率领许多塞尔维亚工人投入工人运动。从1873年起,尤其是

通过在布达佩斯以及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出版工人报纸,开始在伏伊伏丁那加强了社会主义宣传。用塞尔维亚文出版的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杂志(泽蒙的《新学派》和诺维萨德的《哨兵》)出现了。从1874年起,在许多城市中建立了工人病友和残疾人总基金会分会。他们的活动比法律所允许的要广泛得多,其中包括文化教育活动和政治活动。有些工人协会在7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普遍、平等和秘密投票的选举权问题以及八小时工作制问题(弗尔沙茨)。伏伊伏丁那工人代表参加了匈牙利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代表大会(1878年)。这次代表大会的倡导者是过去巴黎公社的劳动委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者列奥·弗兰克尔。

直到19世纪90年代,工人运动基本上只包括在城市手工业和工业中就业的熟练工人。工人阶级的多民族成分也影响了他们的政治觉悟的形成。匈牙利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力图通过暴力手段镇压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而反对党,无论是塞尔维亚反对党还是匈牙利反对党以及后来的德国反对党、斯洛伐克反对党和罗马尼亚反对党,都企图扩大自己对本民族工人的影响,时而也提出某些社会问题。1887年在伏伊伏丁那成立的塞尔维亚激进党就是这样。

1880年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成立对伏伊伏丁那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它在自己的纲领中规定要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劳动资料社会化,同时还提出了工人的许多直接要求。在伏伊伏丁那工人们举行的许多会议上,曾对这个纲领进行了讨论。此外还成立了一些新的、主要是教育性质的工人组织,这些组织力求团结一切工人,而不管他们的民族成分如何。然而,他们却忽视了通过塞尔维亚文、罗马尼亚文和斯洛文尼亚文的社会主义报纸进行宣传。弗尔沙茨出版的《塞尔维亚民族报》(1882~1885年)只是在很短时间里进行了宣传,因为这家报纸很快变成了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报纸。此外,当局对工人运动及其组织者施加了强大压力。尽管遭到破坏和迫害,工人运动仍然逐渐活跃起来。1882年

诺维萨德印刷工人罢工是对伏伊伏丁那工人团结的首次考验。1887年诺维萨德磨坊工人争得了星期日休息但照领工资的权利。1890年大贝奇凯雷克的缝纫工人以及基金达和潘切沃的建筑工人成功地组织了罢工。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早期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土耳其统治垮台前几年出现的,是通过瓦萨·佩拉吉奇及其追随者的文章和活动传播进来的。奥匈帝国占领后,从南斯拉夫诸国和其他国家来的工人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其中一部分工人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籍人。90年代里,尽管占领当局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采取了严厉措施,但社会主义思想仍广为传播。奥地利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对此产生了影响,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对此也产生了影响。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对雇佣工人的剥削是非常残酷的。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得不到劳工立法的保护,因而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进行有组织的斗争。1890年在马格拉伊附近发生首次大罢工,而1894年瓦雷什钢铁厂的工人要求有庆祝五一节的自由。虽然占领当局竭力阻止工人们在阶级的基础上进行联合,但铁路工人(于1898年)和印刷工人(于1903年)仍然成功地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创立了第一批这样的组织。在90年代的早期罢工中工人们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和改善劳动条件。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工人运动也是以奥地利和德国工人运动为榜样发展起来的,不过它还受到南斯拉夫各国工人运动的重大影响。尤其是20世纪最初年代,从这些国家来了一些杰出人物,传来了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工人报刊、书籍和小册子。尽管国界妨碍了同塞尔维亚工人运动的联系,但仍然进行了个人接触,并通过秘密渠道从塞尔维亚运来了社会主义的书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工人领导人利用他们从奥匈帝国或塞尔维亚某次工人运动中取得的初步知识和社会主义经验,促进并指导本地的经济—社会斗争的开展,并为统一的工会运动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最后十年,社会主义思想和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也通过在欧洲各国留学的马其顿大学生和中学生以及马其顿的季节工、工人和侨民开始渗透到马其顿。青年小组“马其顿之友”的成员(达米扬·格鲁耶夫、尼古拉·纳乌莫夫等)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大学生小组的成员。其中一些人后来在马其顿民族解放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1890年,戈采·代尔切夫曾在萨洛尼卡中学领导过一个秘密革命小组。萨洛尼卡中学的学生受到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学说和巴黎公社思想的鼓舞。1893年,来自韦莱斯的木匠瓦西尔·格拉维诺夫建立了马其顿工人小组,并试图在索非亚建立一个单独的马其顿社会主义组织,尽管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加以阻挠,但它还是变成了在马其顿和在侨居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人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1894年,瓦西尔·格拉维诺夫在韦莱斯建立了马其顿第一个工人教育协会,但很快被土耳其当局解散。1895年下半年,在他的领导下,马其顿社会主义者在索非亚创办了《革命》周报,宣传在“革命社会主义的原则”鼓舞下为建立“独立的马其顿共和国”而斗争,并认为斗争的前途在于同其他被压迫民族结成同盟。1898年,马其顿工人小组还制定了自己的纲领,纲领强调了关于建立马其顿作为平等一员参加的巴尔干联邦或邦联的思想。

早期的马其顿社会主义者十分尖锐地谴责了一些巴尔干国家统治集团,尤其是保加利亚统治集团侵占马其顿的野心,并坚决反对欧洲强国对小国人民及其解放运动所奉行的政策。1900年6月3日在克鲁舍沃举行的马其顿社会主义者首届代表会议上,他们决定加入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该组织同意他们可以在该组织的队伍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可以向其州委员会和市组织派出自己的代表。

马其顿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尤其在伊利亚节起义中表现了出来。1903年8月在克鲁舍沃成立了以尼古拉·卡雷夫为首的“公社委员会”,在克利苏拉和奈韦斯卡也成立了类似机构(“临时政

府”），作为革命政权机构和自己国家组织的萌芽。这些行动是同马其顿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紧密相连的。首先由于克鲁舍沃地区伊利亚节起义的领导人（尼古拉·卡雷夫、韦拉·马尔科夫、尼古拉·鲁辛斯基等）的组织作用和思想影响，被解放的克鲁舍沃为时短暂的政府——著名的克鲁舍沃共和国，无论就其性质来说，还是就其发展趋势来说，都超出了“民族革命要求的范围”，并表现出它是一个“带有相当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的政权。在公社委员会的成员中还有阿尔巴尼亚族人。

伊利亚节起义被镇压后，马其顿社会主义者于1904年冬在索非亚成立了马其顿—埃迪尔内社会民主革命小组。在经济恶化的情况下，马其顿工人在各种社会主义者小组活动的影响下，开始举行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罢工斗争。然而，工人们经济行动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行动往往处于自发状态，而且罢工工人的组织又是临时性的和半合法的。不过，通过罢工和要求提高工资的行动赢得了把工作时间缩短为8小时至11.5小时的胜利。

3. 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的建立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几乎在所有南斯拉夫国家都建立了工人党。这首先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所达到的程度和工人阶级壮大的结果。诚然,工人阶级人数仍然不多,而且年轻和缺乏经验,但发达国家工人运动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大大促进和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能力。

随着第二国际的成立和活动的开展(1889~1914年),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变得更加强有力了。第二国际不仅使各种运动和派别联合起来,而且也使已经建立的工人党联合起来。第二国际关于把5月1日作为国际劳动节来庆祝的决定(1890年)在南斯拉夫各国也被接受并得到实施:1890年,卢布尔雅那、苏博蒂察、大贝奇凯雷克、潘切沃、弗尔沙茨、贝拉茨尔克瓦、贝切伊、萨格勒布、瓦拉日丁和里耶卡的工人就已经组织了庆祝五一的活动。此后,南斯拉夫其他城市的工人也开始庆祝劳动节,贝尔格莱德从1893年开始庆祝。各地普遍建立起以德国和奥地利为榜样的社会民主党类型的政党。南斯拉夫各国的工人运动也采取了同样态度,并且对这些党的纲领——爱尔福特纲领和海因费尔德纲领作了适当修改。

第二国际发展的初期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在这一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排除了其他思潮,尤其是无政府主义思潮。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工人运动的壮大和普及。19世纪末,工业发达国家中工人的人数大大增加,他们的组织性也大为加强,而当时

卓有成效地进行的争取政治统治制度民主化的斗争，使社会党的政治意义增大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在选举中的胜利以及后来英国工党在选举中的胜利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欧洲几个最大的议会中，工人代表获得了相当多的席位，而他们对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批评则成了一些国家中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

从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帝国主义的出现，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和一些党的内部，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斗争不断发展，并且日益尖锐起来。改良主义的依据是从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但是，一些反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出现的变化所具有的意义。在这一基础上，开始假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比较完整地形成所谓中派的机会主义观点。他们在不同修正主义调和的同时，也激烈反对左派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并力图把工人运动的行动局限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范围内。与此相反，革命左派则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中出现的新现象，并把无产阶级和工人党的迫切革命任务与此联系起来，同时要求工人阶级动员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而斗争。

南斯拉夫各国社会民主党建立的时间很不相同。这不仅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而且也是由整个国家状况和政治状况造成的，尤其是由是否实行以政党活动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立宪政治制度所造成的。因此，建立工人政党，有的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塞尔维亚），有的则是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国家更广大的范围内实现的（尤其是在初期）。

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者参与了1888~1889年在海因费尔德建立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的活动。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在斯洛文尼亚工人集中的地区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还建立了以维也纳为中心的全奥地利统一工会组织，尽管在工会内部逐渐建立了省一级

的、而后再建立了全国性的各行业书记处。1890年在布达佩斯成立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就在斯拉沃尼亚和伏伊伏丁那的工人中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即工人教育和互助协会、手工业青年组织。斯拉沃尼亚和伏伊伏丁那工人代表也参加了该党的成立大会。为了在非匈牙利族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中更有效地扩大政治影响,1901年该党创办了塞尔维亚文的《人民之声报》,后来又创办了罗马尼亚文和斯洛伐克文的类似报纸,并建立了塞尔维亚族、德意志族、斯洛伐克族和罗马尼亚族鼓动委员会。由于塞尔维亚族居民和布涅族^①居民中工人运动的壮大,塞尔维亚族鼓动委员会于1911年发展成为塞尔维亚族—布涅族鼓动委员会(其刊物是《自由报》和《前进报》)。后来又创立了专门的匈牙利本土(包括巴奇卡和巴纳特地区)和克罗地亚省的工会组织。

1894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之后,克罗地亚省的社会主义者于1894年9月8~9日成立了单独的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社会民主党——国内的第一个工人党。该党的领导人是伊万·安采尔,1901年后为维利姆·布克舍格和维托米尔·科拉奇。克罗地亚省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伊·安采尔参加了1893年和1896年在苏黎世和伦敦举行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90年代,克罗地亚的工人运动在较大的城市萨格勒布和里耶卡已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较强的积极分子。由于总督库恩·赫代尔瓦里政权不允许建立政治和文化协会,甚至不允许建立工会,因此萨格勒布的跨行业理事会把在克罗地亚省建立的地下工会组织都联合了起来。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工会属奥地利工会联合会,伊斯特拉工会在地域上同的里雅斯特工会相联系,而里耶卡工会则同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省的相应工会相联系。1907年工会合法化之后,工会在组织上对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社会民主党是独立的,但仍同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里耶卡和达尔马提亚,政治组织和工会组

^① 布涅族为巴奇卡和利卡北部、达尔马提亚西北部的克罗地亚居民的名称。——

织在实际活动中并没有在组织上分开。在伊斯特拉,意大利的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政治组织以及政治—文化组织单独开展活动,而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则共同开展活动。在产业工会中最重要的是矿业工人工会、铁路工人工会和海员工会。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总工会中包括工业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中的非熟练工人。1907年,约有7000名农业工人参加的农民工会在斯雷姆和斯拉沃尼亚开展活动。同工会和政党一起活动的还有许多文化组织,有些地方还有妇女组织、青年组织和体育组织。1906年,克罗地亚省参加这些组织的约有13000名工人,占工人总数的20%左右。

工人运动的刊物最初是《自由报》(1892~1902年)。克罗地亚社会主义者的主要报纸是《自由言论报》(1902~1914年)。此外还出版了一系列其他报纸、《阶级斗争》杂志(1907年)、各种行业报纸、用基里尔字母出版的《人民权利报》(1908~1912年在希德和萨格勒布)和德文报纸《人民权利报》(1908~1912年在萨格勒布和奥西耶克)。在伊斯特拉、里耶卡和达尔马提亚出版了许多意大利文和克罗地亚文的报纸。《红色日历》、《五月报》以及国内外作家的各种著作专辑都起了鼓动和推广文化的作用。克罗地亚的社会主义者经常阅读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者的刊物。

1892~1897年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由于工人的民族成分不同而分成了好几个相互联系不密切的党派。这样,斯洛文尼亚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也于1896年8月15~16日在卢布尔雅那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以埃特宾·克里斯坦为首的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以全权代表资格参加了在卢布尔雅那举行的成立大会。首先提出了在南部斯拉夫所有君主制国家里建立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这一思想产生于维也纳的南部斯拉夫工人当中。关于该党以南斯拉夫命名的建议也是他们提出的。克罗地亚代表伊万·安采尔坚持,“所有南斯拉夫穷人都必须进行共同斗争”。他提出,“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

的博爱和兄弟情谊”应成为南斯拉夫无产阶级的原则，并以此去反对南斯拉夫各省中克罗地亚资产阶级和塞尔维亚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然而，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上局限在奥地利君主制所属的领土上，即斯洛文尼亚地区、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在1902年建立单独的达尔马提亚社会民主党之前，社会民主党的分支组织同意大利的亚得里亚小组在达尔马提亚地区同时开展活动。1907年在伊斯特拉成立了设在普拉的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省组织，而里耶卡的多民族积极分子小组从1908年起作为里耶卡社会民主党开展了活动。

除克拉尼地区以外，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力图把所有斯洛文尼亚工人都吸收进来，这一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在这方面以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和伊斯特拉地区，特别是的里雅斯特及戈里察这些城市所作的努力最为成功。同时，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中，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统一行动，而这种统一行动的重要条件就是对民族问题采取阶级立场，特别是共同摒弃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主义。的里雅斯特成了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最大据点，曾两次成为该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所在地。然而，北部省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科鲁什卡整个地区都留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范围内，在什塔耶尔斯卡只在极个别地区（采列、萨瓦河沿岸的矿山）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里的斯洛文尼亚族工人是积极的。而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德意志化问题比较明显的北部地区（马里博尔及其所在州）仍同德国上层保持联系。

在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中，如下一种观点很快就被抛弃，即鉴于工会同国内中央的行业机构保持联系，党用不着特别关心工会的发展。1901年在卢布尔雅那曾举行过一次代表会议，打算促进斯洛文尼亚地区的行业工会运动。共同的工会团体没有建立起来，而各行业的工人协会逐渐建立起来了，特别是斯洛文尼亚工人中人数最多的、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成了斯洛文尼亚工会运动核心的铁路工人协会、矿工协会和冶金工人协会，都一一建立起来

了。维也纳中央领导机构达成了关于在的里雅斯特(1905年)建立南斯拉夫行业书记处的一致意见,书记处的任务是把的里雅斯特、伊斯特拉、戈里察、克拉尼和南什塔耶尔斯卡地区(科鲁什卡除外)的斯洛文尼亚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一年之内,加入工会的斯洛文尼亚工人人数从4100人增至7603人。1910年又建立了一个克拉尼地区斯洛文尼亚中心——卢布尔雅那工人协会联合会。还曾存在过一个设在特尔博夫列的南方省份矿工书记处。的里雅斯特的铁路工人、冶金工人和建筑工人也有过类似情况。不过,这些工会会员人数没有超过15000人。除了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外,在19世纪末还出现了基督教—社会党工会的萌芽,后来又出现了斯洛文尼亚自由党工会(1913年,基督教—社会党工会约有4800名会员,其中有许多仆役和农村贫民,而斯洛文尼亚自由党工会会员人数则少些)。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从奥匈帝国其他地区迁来的外籍工人、从奥匈帝国范围内其他南斯拉夫国家和从塞尔维亚来的工人以及本国的进步工人,对组织工人运动产生了影响。为签订集体合同而同业主进行谈判的工人委员会成了工会运动的组织者。1905年,在米哈伊洛·米恰·索科洛维奇的领导下举行了总工会成立大会。翌年举行了五月罢工后,争取总工会合法化的斗争顺利结束。但当局仍继续禁止工人组织开展政治活动。由于发生了吞并危机(1908~1909年),当局和业主的压力加强了。1912年,总工会联合了17个行业工会的6086名会员,其中克罗地亚族会员2030人,塞尔维亚族会员1619人,穆斯林会员737人,捷克族会员305人,斯洛文尼亚族会员300人,德意志族会员287人,匈牙利族会员282人,犹太人会员168人以及其他族会员。此外还有教育工人协会、文艺工人协会、体育工人协会和其他工人协会。当时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其以外的地区,工人运动领导集团所开展的工会活动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在直接筹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时候,曾出现过这样一种倾向:使该组织成为奥匈帝国境

内南部斯拉夫诸国中已经存在的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发生吞并以及1909年4月创办《自由之声报》之后,1909年6月建立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巴尔干战争前,该党约有2500名党员,而且几乎全部是工人,半数以上的党员来自萨拉热窝,如果再加上图兹拉、巴尼亚卢卡和莫斯塔尔的党员,就占到党员总数的4/5。尽管该党人数不多,而且不断受到当局、教会组织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压力,但它还是成功地发展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最有组织的一个政党,它在政治生活中不断地对当时社会提出社会主义的批评。

奥匈帝国中的各社会民主党是在某些资产阶级政党已经开展了几十年政治活动的情况下出现的。在君主制统治下的各个地区,工人运动发展和活动的条件各不相同:在斯洛文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允许建立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因此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党员人数较多,工会组织和其他组织也很发达。在克罗地亚省,工会组织是作为地下组织建立起来的(1907年以前),1897年曾禁止各政党建立地方组织,而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因从事所谓反国家活动而被判刑。因此,那几年里该党几乎完全没有领导人。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和教会竭力离间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它们建立了民族主义的工人组织和基督教社会党运动。在拉拢工人方面,基督教社会党人在斯洛文尼亚往往收到了成效,因为在那里,教权主义为了使自己的行动博得人们好感而宣扬民主主义、争取社会改革、反对似乎是由自由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带来的社会非正义和不公道现象。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组织工人运动的工作正好碰上了在民族和宗教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政党的诞生。这就给工人运动造成了严重困难。

在塞尔维亚,为建立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而作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是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间进行的。从斯韦托扎尔·马尔科维奇起曾几度试图建立社会党。1900年以后拉多万·德拉戈

维奇对组织社会主义运动的过程起了重大的影响。第一个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是1901年3月建立的贝尔格莱德工人协会。1902年起,该工人协会的书记是迪米特里耶·图佐维奇。当时曾组织了多次罢工,建立了许多工会组织,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主要刊物《工人报》复刊了(1902~1915年),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的斗争也开始了。1903年,该运动的地下政治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在贝尔格莱德组织了有5000多名工人和大学生参加的反对亚历山大·奥布雷诺维奇国王独裁的“三月游行”。1903年5月成立的工人联合会作为各工人组织的中央领导机构,于1904年成为全国性跨行业的工会中央。塞尔维亚王国的独裁制度被推翻后按宪法有了建党的可能性,因此1903年8月2日举行了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在党内拉多万·德拉戈维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有决定性影响,而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则要求同资产阶级反对派势力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后来,由米洛拉德·波波维奇领导的反对派小组“新时代”曾试图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工会活动,而迪米特里耶·图佐维奇在批评工会中立论的同时,强调工会斗争同政治斗争的密切联系。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4年)确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路线,到1904年底实际上已经扫除了把工会同党对立起来的小资产阶级和工联主义反对派。1905年底,设有83个分会的19个工会联合会已有5000多名会员,而社会民主党则有26个地方组织和1000多名党员。在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1908年),迪米特里耶·图佐维奇当选为党的第一书记,杜尚·波波维奇担任《工人报》实际上的编辑,而从1910年起成了正式编辑。1908~1912年,在贝尔格莱德开办了党校,据称在其他地方也举办过党校。1909年党开始把活动扩大到农村。由于消除了巨大的党内思想分歧(在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工会的作用、对待农民的态度等问题上),同时对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以及军人和宫廷集团的军国主义野心展开了尖锐的政治斗争,塞尔维亚—

社会民主党已发展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工人阶级政党。它利用议会选举和区的选举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并于1903年克拉古耶瓦茨获得一个议员席位。在1912年的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在许多城市和州参加了竞选，获得了24787张选票和两个席位（德拉吉沙·拉普切维奇在德里纳河流域州和特里沙·卡茨莱罗维奇在波扎雷瓦茨州）。从1906年起党就参加了一些城市和区的竞选活动，1914年1月党曾在16个小城镇和15个农村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并在一个市区丘卡里察和14个农村获胜（但后来丘卡里察的选举结果被宣布为无效）。迪米特里耶·图佐维奇在思想斗争中表现突出，不愧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作家、思想家和党的领袖。到1911年5月该党加大时已建立起43个城市党组织和74个农村党组织，党员人数已增加到5178人。在城市党组织的党员中78%是雇佣工人。从工人的工会组织和党统一的观点出发，1911年建立了共同的领导机构——中央领导机关。这就保证了党和整个工人运动能迅速适应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需要。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对统治阶级和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尤其是对资产阶级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斗争，批评税收政策、预算、关税和垄断。1910~1914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战斗》杂志，1907年创办了《社会主义图书》杂志。《工人报》于1911年改为日报，1914年春该报发行量达到7000份；而克拉古耶瓦茨出版的《工人》和杂志《战斗》的发行量均为1200份。1910年9月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妇女书记处，出版《平等报》。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力图在科索沃地区建立自己的组织，认为有必要为团结该地区的工人（不分信仰和民族）创造条件。1904年在格尼拉奈建立了首批组织当中的第一个组织，次年在米特罗维察（现名铁托米特罗维察）又建立了一个组织。由于安杰尔科·阿伊蒂奇的努力，普里兹伦的工人于1907年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组织，1909年又在武契特尔诺建立了一个组织。据1909年塞尔维亚工人的报纸报道，在米特罗维察、普里兹伦、普里

什蒂纳、格尼拉奈和其他地区都有一些工人组织在开展活动。

在马其顿，青年土耳其革命^①胜利后于1908年根据塞尔维亚总工会的指示在斯科普里建立的制鞋工人工会是马其顿工人阶级建立的首批合法组织之一。1909年在其他城市(萨洛尼卡、塞雷兹、库库什、杰夫杰利亚、库马诺沃和什蒂普)也建立了工会组织，其中有些组织同相应的塞尔维亚工会组织在行动上保持着联系。1909年1月7日在斯科普里建立了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接着在韦莱斯也建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组织。1909年初，瓦西尔·格拉维诺夫创办了《工人火星》报，而《社会主义曙光》作为斯科普里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刊物于1910年开始出版。在马其顿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组织工会的工作中，萨洛尼卡的社会主义国际联合会起了重要作用。该联合会于1909年开办了工人图书馆，用四种文字出版了机关刊物，后来又出版了周报。该联合会的代表在土耳其议会中主张建立国际议会联盟，以普及关于在巴尔干建立联邦国家共同体的思想。迪米塔尔·弗拉霍夫在该议会中维护劳动群众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主张更公正地解决土地问题。来自马其顿的瓦西尔·格拉维诺夫、杜尚·采基奇、米哈伊尔·佐科夫和斯托扬·迪夫莱夫参加了于1910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一次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1910年12月在萨洛尼卡举行的马其顿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和伊斯坦布尔社会民主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曾试图成立马其顿社会民主党。巴尔干战争结束后，瓦尔达尔马其顿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并入了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马上于1914年2月在斯科普里设立了贝尔格莱德工人协会分会。该分会所采取的立场和开展的活动对马其顿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黑山是不允许建立社会主义组织的，而且那里的工人阶级人数非常少。黑山的第一批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小组是20世纪头

^①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进行的一次反封建革命，革命胜利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译者

十年进行宪法斗争和政治斗争时期建立的。1903年在巴尔建立了工人联合会,共约240名成员。其创建人约万·哈伊杜科维奇还曾在采蒂涅、波德戈里察(现名铁托格勒)和尼克希奇组织过工人协会。克尔斯托·波波维奇曾以黑山社会主义者的名义参加过1910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并于1911年在贝尔格莱德创办了《前进报》,该报把一些黑山社会主义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从纲领性方针来看,南斯拉夫各社会民主党属于第二国际的思想政治范畴。它们接受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海因费尔德纲领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只作了不大的修改。这两个纲领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规定了工人运动的革命目标,但是却期待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正在消失。工人政党的作用被归结为争取实现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要求,并使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作好准备,以便在将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切经济和社会条件都成熟之后,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然而,这并未排除例如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同统治阶级及其政策发生尖锐冲突的可能性。

工人阶级必须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而斗争,广大社会阶层没有政治权利或政治权利受到很大限制——这些情况决定了奥匈帝国境内南斯拉夫各国社会民主党政治纲领的内容。这些纲领除了关心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外,在政治上主要关心的是争取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特别是争取平等的普选权,以及结社、出版、集会和言论自由。在奥匈帝国境内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里都出现了类似的思想派别——从改良主义和公开修正主义派别(卡尔·伦纳)到那些坚信在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归根到底站在“中派”立场上的人(奥托·鲍威尔等)。尤其是有人拒不承认民族自主权,竭力想保持哈布斯堡王朝国界内庞大的经济共同体的完整性,这种理论观点后来被称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独特的改良形式,它实际上支持当时的

奥匈帝国并维护其帝国主义政策。在这个帝国中，被压迫人民的民族权利日益被局限于文化问题，以致当初为奥地利制订的区域自治纲领(1899年)实际上已被抛弃。一个例外是在二元制帝国危机时期(1903~1905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主张匈牙利从奥地利分离出去的立场，这一立场使得奥地利本身作为小国无法执行帝国主义政策。

缺乏具体的革命政治方针成了奥匈帝国以及欧洲一切发达国家中社会民主党的一贯特征(最初这种情况看来似乎是同对“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不成熟的革命性进行正当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相吻合的)。在奥匈帝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既没有对待奥匈帝国中不平等民族运动的深刻的主张，也没有把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因此，在奥匈帝国境内的南斯拉夫各国中，虽然绝大多数居民是农民，但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多半对农民采取保留态度。他们力求保持无产阶级斗争的“阶级纯洁性”，担心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如果从劳动农民中寻找同盟军就会使工人阶级淹没在“农民自发性”之中。他们并不认为农民是社会上能够开展反对封建残余或反对债务盘剥的某种强大社会运动的积极力量。这种观点来自第二国际的纲领，第二国际对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没有比较明确的方针，这就使农民国家的社会主义看不到前途。不过，在南斯拉夫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中开始感到需要用另一种方式对待农民问题，以便在工人阶级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某些党的成立大会上甚至在其纲领中(例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农民问题。1896年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成立时曾表述过这样一种思想：“只有当农民队伍参加到我们的行列中来时，我们才能取得胜利”。不过该党未能制订出一个解决农民问题的纲领。斯洛文尼亚农村发生了急剧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从1900年到1910年，农业人口的比重从75%降到67%，这是

奥地利境内各族居民中相对指数下降最多的),而斯洛文尼亚的教权主义在农民中很有影响。有时,社会民主党试图在农村做工作,有些地方还取得了成功(戈里察附近),但占上风的观点仍然是“我们是工人党”。

在大多数农民还没有选举权而且在政治上还不积极的情况下,除了1904年成立的克罗地亚平民农民党(安东·拉迪奇和斯捷潘·拉迪奇)以外,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社会民主党是克罗地亚省中唯一将农民视为有前途的政治力量的党。1903年开展了把政治上毫无权利的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和使其登上政治舞台的“人民运动”之后,该社会民主党恢复了贫苦农民的组织,而且在斯雷姆地区和克罗地亚的扎戈列地区数目最多。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特拉地区的农奴制是一个特殊问题。然而,工业和手工业工人却没有同农业无产者的运动建立紧密的联系。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中,斯雷滕·亚克希奇是最有影响的人物。该党大多数领导人反对接纳农民入党,而且以保留态度看着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米塔尔·特里富诺维奇)在农民中主动进行政治宣传活动。因此,该党没有给予1910年波斯尼亚克拉伊纳骚动的农民以更大的支持。这些农民学着工人斗争的样子,把自己的行动称为罢工。社会民主党强调迫切需要废除所有封建残余(农奴制),认为这种过去的遗产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和障碍。当局和多数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中的代表主张让农奴自己逐渐赎身。社会民主党与这种主张不同,它直到战争结束始终在自己的行动纲领中坚决要求为所有的农奴义务赎身,即用国家的资金赎买他们的土地以解决土地问题。

虽然各社会民主党是在巴尔干半岛各民族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而首先是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在一些地区这也意味着争取摆脱异族剥削者的社会解放的斗争)显得十分迫切的时候创立的,但它们却并没有看到工人阶级同遭受民

族压迫的农民阶层和其他非无产者劳动阶层结成阶级同盟的必要性。工人党同领导民族运动的年轻的民族资产阶级发生了尖锐的阶级冲突。当时社会民主党认为,对工人阶级来说民族问题就像民主和人类平等问题一样,仅仅具有间接意义。认为从政治意义上说这个问题对资产阶级具有直接利益,因此主要由它来发挥主动性,同时对它的非民主的民族主义和阶级自私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不过,有迹象表明,南斯拉夫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正是由于它们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而突破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框框。克罗地亚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民族问题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领土问题),而不仅仅是文化问题。他们关于建立奥匈联邦的设想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二元君主制结构的观点是不同的。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提出的关于联合所有南斯拉夫人的思想的特点,是拒绝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纲领,以及以国家法论点和大国主义论点为基础的纲领,特别是反对使工人卷入在此基础上发生的民族冲突。以“民族的自然权利”为基础的联合纲领和克罗地亚独立自主的纲领也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而南斯拉夫民族统一思想则被认为是扩大社会主义和克服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争端及消除分割南斯拉夫领土的边界的手段之一。

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人在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上接受了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关于承认和支持民族自决权的立场,而1897年又表示确信:对不发达的小国人民来说,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同时也是社会斗争。一部分最著名的文化工作者加入了该工人党,他们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小国人民的自由问题。在1899年奥地利全国代表大会上,该党提出了由埃特宾·克里斯坦起草的民族问题纲领草案。该草案从滨海地区、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特拉地区的民族问题出发,希望很快就取消国家并建立“自由社会”。在这个草案中,民族的概念同领土和地域政治共同

体区分开来：民族自治应该基于各民族成员联合之上（文化自治基于个人原则之上）。这仅仅在形式上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后来宣传的主张相似。克里斯坦以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身分在1903年举行的全奥代表大会上反对德国—奥地利党的领导人主张把匈牙利和奥地利完全分成两个国家的政策，他提出了奥匈帝国每一个民族自由选择 and 自由联合的前景，并特别强调南斯拉夫人是一个自然共同体。1909年在卢布尔雅那举行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他倡议通过一个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者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共同纲领。这一纲领的基础是南斯拉夫人民族统一的思想 and 通过建立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自由人民邦联来解决南斯拉夫问题的思想。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参加了1910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伊万·仓卡尔提出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政治性质以及斯洛文尼亚人和其他南斯拉夫人民都是单独民族的主张，以及他提出的在奥地利以外建立各平等民族的自由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思想，虽然没有能成为该党的方针，但在1913年却得到了巨大的反响。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没有更深入地研究本地区的民族问题，也没有在这方面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他们拥护民族平等和国际主义原则。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居民多民族成分的条件下，他们主张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相互接近，主张多民族的工人阶级团结。社会民主党反对宗教冲突和民族冲突（这些冲突也反映在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中），主张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民族团结，并本着这种团结精神主张“穆斯林民族觉醒”（1911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吞并之后南斯拉夫思想受到了新的各种方式激励的情况下，该党同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一道在卢布尔雅那组织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1909年），并参加了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一次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1910年）。党最初强调要

通过民族自治的形式从国家—法律的角度和民族的角度重新改组奥匈帝国,在此范围内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同其他南斯拉夫人联合成作为一个民族的南斯拉夫民族自治体。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及战后,该党越来越支持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关于建立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思想。在资产阶级政党围绕文字和语言名称开展的激烈辩论中,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主张承认两种文字(基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在学校和社会生活中完全平等,并主张在国家机关、办公室和公共企业中使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它尖锐地抨击了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生的宗教冲突和民族冲突。

克罗地亚、伏伊伏丁那、斯洛文尼亚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一些爱好自由的青年小组,对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领导人的机会主义感到不满,他们日益放弃了过去几代青年关于民族自由可以通过教育和经济领域的“细微工作”来实现的信念。他们要求从对现状的激烈变革中寻找解决办法,并成为具有战斗力的青年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该运动中具有南斯拉夫倾向的成员相互间保持秘密联系,并转向密谋活动和使用个人恐怖手段(暗杀),这就使他们脱离了工人运动。后来这些青年小组的一部分成员加入了革命的工人运动(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有穆斯塔法·戈卢比奇,在克罗地亚有久罗·茨维伊奇,在斯洛文尼亚有洛夫雷·克莱门契奇等)。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也接受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但其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在塞尔维亚工人阶级艰苦的斗争条件下没有忽略阶级利益和革命前途。坚决反对执政的资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和政策,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大国在巴尔干的活动——这种态度加强了该党鲜明的阶级斗争的方针。

该党最初也是只依靠工人阶级,然而后来开始向农村发展。在1910~1912年期间建立了99个农村党组织。德拉吉沙·拉普切维奇坚决认为党应只限于发展农村无产阶级,而迪米特里耶·图佐

维奇则与他相反，也接纳“主要群众是农民——小农和中农私有者”的组织。他认为，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并且如果农村党组织同城市党组织联合起来，而且这些组织中的农民依靠城市无产阶级，他们是能够对社会民主党的胜利作出贡献的。

在1912年以前，民族问题在塞尔维亚只是作为一个对外政策问题提出来的，即作为牵涉到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统治下的邻近地区存在部分塞尔维亚民族的问题以及牵涉到邻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问题而提出来的。塞尔维亚执政的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单纯把塞尔维亚国家扩展到这些地区的办法来实现塞尔维亚民族的统一。与此相反，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提出了所有被压迫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巴尔干人民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的纲领。为纪念伊利亚节起义而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社会主义者群众大会上通过了“与巴尔干国家邦联相联系的旧塞尔维亚和马其顿自治”的要求。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谴责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支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但同时它反对塞尔维亚政府为实现资产阶级政策而可能进行的战争。吞并之后，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第七次代表大会（1909年）毅然起来“反对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奉行的任何殖民政策”，并提出“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来与它相对抗。迪米特里耶·图佐维奇把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塞尔维亚沙文主义”的斗争提到首位，同时制定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和彻底符合阶级利益的巴尔干社会主义政策。他认为，“巴尔干国家和人民联合和同舟共济是导致经济、民族和政治解放的唯一道路”，因此无产阶级政党有责任“帮助巴尔干的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事业，同时也最有力地帮助了自己的解放事业”。在第一次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巴尔干社会主义政策，对民族问题就是采取了这种态度。会议支持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同时也赞成自由的和独立的巴尔干人民将来联合成一个民主联邦。在这次会议上，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接受了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

及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关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是一个民族的主张。从这一政策中产生了关于巴尔干联邦是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斗争和社会民主党的行动才能实现的历史目标的政治口号。

迪米特里耶·图佐维奇代表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中公开批评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因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向世界舆论错误地宣布了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态度，而且没有反对吞并。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1910年8月28日～9月3日）上，图佐维奇曾经提醒：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无视民族自决权。他要求强调“资本主义大国的社会主义者和人民有责任为了最有力地制止殖民主义的侵略政策，去接触受这种政策损害的被压迫的小国人民的社会民主党，以便帮助他们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斗争”。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把自己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同反对塞尔维亚政府的战争政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巴尔干战争期间涉及到政府对待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政策时更是如此。当时图佐维奇曾强调指出，存在着两个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塞尔维亚和无产阶级的塞尔维亚。

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年）的前夜，迪米特里耶·图佐维奇曾警告说，资产阶级企图用取消他国人民的自由来换取本国人民的自由，而“我们则要求在不取消他国人民自由的情况下赢得本国人民的自由”。他强调指出，“这只有通过巴尔干建立一个所有人民都平等的政治整体才能达到”。因此，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一直坚持建立巴尔干自由人民联邦，并深信这就是解决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民族问题的办法。

与邻国统治集团企图兼并和瓜分马其顿的阴谋相反，马其顿社会主义者主张通过进步的社会改革和把巴尔干人民联合成一个更广泛的联邦整体来解决马其顿问题。在这个联邦整体中，应保证马其顿享有真正的自治和平等。团结在《马其顿之声》杂志周围的以迪米特里耶·丘波夫斯基为首的流亡在彼得格勒的马其顿

侨民于1913年要求马其顿成为一个“在其种族、地理和文化—历史范围内的独立国家,并有一个对决定国家制度形式的人民议会负责政府”。

巴尔干各国强行瓜分马其顿之后,在塞尔维亚王国统治地区建立了军事—警察制度,并设立军事法庭和特种部队以“维持秩序与和平”。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者最尖锐地抨击了这种政策。1910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迪·图佐维奇支持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和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发表的关于谴责青年土耳其运动奉行的反动的民族压迫政策的联合宣言。巴尔干战争后,图佐维奇在其所著《塞尔维亚与阿尔巴尼亚》(1913年)一书中严厉批评了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侵略政策,主张“在充分民主和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不排除阿尔巴尼亚的巴尔干各国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共同体”。

根据这一纲领性方针,各社会民主党及其组织的活动一方面集中于争取改善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则集中于争取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

在克罗地亚省,只有不到2%的居民有选举权(匈牙利6%多一点,奥地利、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20~25%),工人阶级没有选举权。因此,只有一次由于得到农民的选票,社会主义者维托米尔·科拉奇被选入议会(1908年在希德)。这样,社会主义者长期处于政治反对派的地位。他们特别激烈地反对库恩·赫代尔瓦里总督的统治(1883~1903年)以及违反宪法的楚瓦伊总督的统治(1912~1913年)。他们在原则上也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由于坚决反对军国主义和教权主义,他们还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发生冲突,不过在策略上支持具有新的进步的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政治集团——1897年及以后年代的进步青年组织。他们参加了1903年反对匈牙利霸权主义的“人民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第一次同资产阶级政党站在一起,并从主张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和睦转为争取南斯拉夫民族团结,从此这就成了他们的基本口号和民族纲领),支持成立克罗

地亚—塞尔维亚联盟,以及支持约瑟普·斯莫德拉卡、弗拉诺·苏皮洛和南斯拉夫民族革命青年运动的某些观点。在帝国议会大选中,在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得到几千张选票,但是他们同科鲁什卡和什塔耶尔斯卡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一样,在社会主义者的选票能决定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候选人得胜时,在这方面就出现了抉择的问题。这妨碍了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民族合作,并使一部分克罗地亚工人和斯洛文尼亚工人脱离他们,但这也促使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建立普拉工人教育协会和在伊斯特拉地区建立自己的省组织。

议会斗争使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乃至广大阶层群众的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斗争中从组织上和政治上大大加强,1911年其机关刊物《曙光》变为日报。从1907年起,他们在的里雅斯特同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一起成了最强大的政党。在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地区,1907年几乎得到了1.5万张选票,而1911年得到了近1.7万张选票(分别占选票总数的8%和9%以上)。但由于选举制度的性质,他们在议会中仍然没有代表。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也为民主的宪法和议会以及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的选举权而斗争。他们提醒人们,不民主的选举制度在大选中使大地主所占的份额比工人和农民大144倍。他们号召所有社会力量和政党在争取民主化的斗争中进行合作。但是,资产阶级政党(其中有4个塞尔维亚政党、3个穆斯林政党和2个克罗地亚政党)拒绝任何合作。在1910年的议会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仅有的两个候选人都没有当选。该党继续抨击专制统治、封建残余、具有侵略性的教权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

在塞尔维亚王国,虽然选举权是相当广泛的,但许多工人仍没有选举权。因此,1908年在竞选活动中,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把普选权的口号放到第一位。1910年底,约有1.2万名工人在国民议会前举行示威游行,支持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要求普选权的备忘录。

1911年10月为同样目的递交了约有2.2万名工人签名的请愿书。

在上世纪发生大规模的矿工罢工之后,在奥匈帝国范围内的南斯拉夫国家中最剧烈的阶级冲突是自发发生的,而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后来才参加了进去,并取得领导权(例如1902年在的里雅斯特举行的多半为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参加的轮船司炉工罢工,后来变成这个城市持续多天的国际大罢工。在罢工过程中军队杀害了16名工人)。有时在掌握组织方面别人抢在了前面,例如1904年耶塞尼采冶金工人大罢工中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就抢在了前面。在另外一些场合(1906年特尔博夫列和赫拉斯特尼克矿工罢工),罢工组织者同党的领导人发生了冲突。最常见的是经济罢工,也发生过带有政治目的的罢工。尽管1895年5月1日当局实行残酷迫害(约有500人被捕,许多农民被判刑),但农民社会主义运动仍然扩大了,特别是武科瓦尔、文科夫齐和希德周围地区。这就成为1897年在整个克罗地亚省迫害社会主义者的借口(针对斯雷姆地区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社会民主党总委员会成员的第二次米特罗维察审判案)。10年之后,在下列城市爆发了多次产业工人罢工:里耶卡、萨格勒布(1907年,约有3万人参加)、奥西耶克、斯拉沃尼亚布罗德、斯普利特(1909年约有1万名工人和农民参加)和普拉。在伏伊伏丁那许多城市中裁缝工人、制鞋工人、木工和其他工人的一些新的地方组织开始在经济领域开展阶级斗争。由于直到1899年政府不允许各行业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联系,因此它们的活动由中央机构进行协调。由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没有制定土地纲领,因此建立了独立的农业工人和贫农的运动(在伊什特万·瓦尔科尼领导下的独立的社会党)。该运动要求没收世俗的和教会的大地产并将土地租给无地农民。这一运动在其他民族,特别是塞尔维亚族的贫苦农民中引起了反响,1897年它的刊物(《农民》)的塞尔维亚文版开始出版。社会主义思想在斯洛伐克族、鲁辛族和罗马尼亚族农业工人中也有了影响。19世纪末,尽管1898年2月通过的所谓《奴役法》对罢工者规

定了严厉的法律制裁,但在巴奇卡和巴纳特的许多地区逐年都发生大规模的收割工人罢工。在1906年里,年初成立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组织了几百次收割工人罢工,在基金达成功地举行了约有6000名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参加的总罢工,同时大批无地农民和贫苦农民由于找不到工作而出走他国。1897年在森塔和埃莱米尔,1898年在博卡和托巴以及1902年在森塔都同宪兵队发生过冲突。在1904年匈牙利铁路工人的总罢工中,南斯拉夫各国的铁路工人也参加了。1904年,斯雷姆地区的人数不多的产业工人在斯雷姆米特罗维察组织了总罢工。1907年,斯雷姆米特罗维察的工厂工人和弗尔德尼克的矿工也组织了罢工。在诺维萨德、苏博蒂察、索姆博尔、大贝奇凯雷克(兹雷尼亚宁)、潘切沃和弗尔沙茨,都举行过工人罢工。巴奇卡和巴纳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完全支持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于1907年宣布的总政治罢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年期间,同匈牙利一样,在伏伊伏丁那成立了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组织形式的所谓自由组织。它们半合法地进行了宪法不允许工会组织进行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在巴奇卡和巴纳特出现了第一批妇女社会主义者组织(诺维萨德、苏博蒂察、旧莫拉维察)。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共约发生过140次罢工,有几万名工人参加。1906年5月,萨拉热窝烟草厂工人开始罢工,罢工很快波及全国所有工业区,并且变成了反对奥匈帝国当局的大规模运动,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惨案:在萨拉热窝同警察发生冲突中6人死亡,在泽尼察4名工人死亡,同时还有许多人受伤和被捕。在瓦雷什实行军事法庭审判。克雷卡矿工罢工(1907年、1912年)、萨拉热窝建筑工人罢工(1907年、1910年)、姆利尼什塔铁路工人总工(1910年)和林业工人总工(1911年)以及萨拉热窝印刷工人总工(1912年),都显示了力量 and 意义。由于工会的活动,罢工和要求提高工资的行动有2/3获得圆满成功或同业主达成了妥协。由于多数劳动力是来自农村的农民,所以许多罢

工具有农民反抗的特点。通过罢工斗争,劳动时向缩短了,大部分雇佣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并且通过了工人劳动保护方面的一系列法律措施和规定。尽管工人的工资还赶不上食品价格的上涨,但工人的名义工资提高了。然而,在巴尔干战争期间,1913年5月实行紧急状态,所有社会主义工人组织都被解散。

塞尔维亚在20世纪初也已经感到工人群情激愤:1901年在贝尔格莱德爆发了印刷工人罢工,接着又发生了许多次其他罢工。工会组织建立起来,行业工人协会得到恢复。1905年共发生37次罢工,有2242人参加,其中一半罢工取得了胜利。1906年,在塞尔维亚举行了第一次全面的五一劳动节罢工。工厂主开始采取联合行动并拒绝执行提高工资的协议,当局越来越多地进行有利于工厂主的干预活动。警察阻挠工人组织的正常工作,1906年4月13日在贝尔格莱德发生了非正规部队对工人集会的有组织的袭击。还出现了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直接派”,他们通过各种挑衅行动对有组织的斗争产生了消极影响。1907年在丘卡里察由工厂主的挑衅活动引起的糖厂工人罢工中使用了国家军队,有380名工人流血,这促使资产阶级在整个塞尔维亚进行反攻。然而,从1908年到1911年,罢工次数从18次增至75次,其中大多数都取得了胜利。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人数从1907年底的2881人增至8337人。

直到1910年,塞尔维亚手工业工人和产业工人的地位在法律上没有规定。仅仅为矿工规定了必须设立矿工互助基金,并制定了劳资关系条例。1905年秋,贝尔格莱德工人阶级通过游行示威对反动的作坊法草案给予了坚决回击,约有1万名工人参加了游行。1909年底和1910年春,工人联合会又组织了请愿和约有6000名工人参加的游行示威。1908年,图佐维奇就此事发表了一部著作,题为《作坊法与社会民主党》。1910年6月通过的作坊法规定实行10小时工作制,禁止招收14岁以下的童工,禁止在星期日和节日工作,承认结社权和罢工权,规定对工人实行强制保险,建立经济检查机构。1910年7月,根据这一法律成立了工人联合会作为塞

尔维亚工人阶级代表机构,1912年夏,在所有城市中心都选出了“公正人法庭”,作为工人和工厂主冲突的仲裁人。巴尔干战争大大恶化了工人阶级的状况。在塞尔维亚,工会组织的活动实际上停止。工厂主废除了以前达成的关于提高工资的全部协议。作坊法的条款已停止适用,在一些行业中平均工作时间又大大延长。因此,又发生了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的新的罢工。塞尔维亚最大的和最重要的一次罢工是1914年莱斯科瓦茨约有800名纺织工人参加的罢工。

所有南斯拉夫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都要求相互联合和接近。斯韦托扎尔·马尔科维奇的思想已传播到塞尔维亚以外。社会主义者的报纸编辑部同邻国的工人运动建立了联系,吸收了南斯拉夫各地的记者。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省的工人运动帮助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和马其顿的工人运动,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伏伊伏丁那造就出的社会主义鼓动员和积极分子把自己的经验传播到那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工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塞尔维亚工人运动的榜样发展起来的。在组织上与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有联系的达尔马提亚工人运动,也同克罗地亚省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工人运动保持了紧密关系。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通过自己的名称表达了所有南斯拉夫工人联合的思想,并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社会民主党相互交换情报和理论评论。南斯拉夫各国的一些工会组织、工会联合会以及行业工会中心之间开展了各种合作。在交换与传播报刊和书籍方面达到了很高的合作水平。尽管存在着国界和严格的检查,但工人报刊很快就从一个国家传送到另一个国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可以收到克罗地亚省、塞尔维亚和伏伊伏丁那的社会主义报纸,达尔马提亚可以收到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社会主义报纸,马其顿可以收到塞尔维亚的社会主义报纸,伏伊伏丁那可以收到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社会主义报纸。甚至还谈判过把全部书刊出版活动集中到一个统一

机构的建议。还讨论过把迪·图佐维奇编辑的理论杂志《战斗》变为几个社会民主党的共同刊物的问题。

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社会民主党同教权主义进行斗争的经验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达尔马提亚的工人运动是十分宝贵的。著名的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者同教权主义者进行政治斗争正是通过《自由言论》的版面进行的。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工人运动于1909年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之前，这类帮助对他们特别有益的。

在卢布尔雅那举行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1909年)和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一次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1910年1月7~9日)意味着南斯拉夫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在相互接近和更好地了解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迪米特里耶·图佐维奇在卢布尔雅那代表会议上是一位活跃的来宾，而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参加了贝尔格莱德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对马其顿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在塞尔维亚的黑山社会主义流亡者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流亡者的代表有机会向最著名的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人详细阐述了自己国内的问题和局势。在第一次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之前，特别是之后，在各党的代表大会上以及其他适当的会议和庆祝活动中互派了许多代表团。当时决定筹备召开第二次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和成立巴尔干社会主义者执行局作为协调机构。这一决定更加促进了这些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来往。

设在外国的南斯拉夫工人协会在促使南斯拉夫各国工人相互接近和更好地了解方面也起到了巨大作用。在维也纳的这种协会提出了关于建立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作为在奥匈帝国中所有南斯拉夫工人的党的倡议。在试图建立把国外的南斯拉夫工人协会团结在一起的联合会的过程中，这种相互依存的思想表现得特别强烈。后来这种联合会果真在美国建立(南斯拉夫工人联合会)。

南斯拉夫各国的工会组织和社会民主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同

国际工会组织和第二国际有密切的联系,同时继续保持着很早以前就建立起来的同国际工人运动的联系(斯韦托扎尔·马尔科维奇当年建立的联系)。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从建党之时起就加入了第二国际,并参加了巴尔干战争以前第二国际举行的所有代表大会。塞尔维亚工人联合会在1904年就已经加入了国际工会联合会,行业工会联合会则加入了国际行业联合会并同外国类似的全国联合会建立了协议关系。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社会民主党于1908年被接纳为第二国际的成员,取得了匈牙利—克罗地亚分部中的支部地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总工会同国际工会书记处建立了直接合作关系并参加了1911~1913年举行的各次国际工会代表会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于1911年成为第二国际的成员并参加了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912年11月)。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没有直接参加国际,因为斯洛文尼亚在国家法上不享有单独的地位。

由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影响,在191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在南斯拉夫各国得到了传播和发展。在奥匈帝国范围内的南斯拉夫各国中,绝大部分是通过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刊物进行传播的,而在斯洛文尼亚,虽然也出版自己的关于社会问题的杂志《我们的笔记》(1902~1914年),但主要是通过意大利和捷克社会民主党的刊物进行传播的。此外,特别是在奥匈帝国以外的南斯拉夫国家里,都受到法国和德国的影响,而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后,到处都受到俄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也通过本国的译者和理论研究得到了发展。译本往往是在语言统一和政治上独立的塞尔维亚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资本论》某些章节的译本从1871年开始就出现了,比许多发达的欧洲国家还早。而在19世纪末以前,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译本也出现了。20世纪初,当各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事活动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更加有力地传播开来。马克思主义著作新译本出版了。受过阶

级和政治锻炼的年轻一代社会民主党人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派别(拉萨尔主义,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思想论战都被转载过来。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出版的《社会主义图书》(1907~1914年)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文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考茨基、奥古斯特·倍倍尔、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和斐迪南·拉萨尔的著作。这些著作在其他南斯拉夫国家也得到广泛的阅读。

20世纪头十年的中期,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有了自己的报纸,有些还有杂志,从而也就有更多的可能翻译和翻印某些著作。有些运动还有强大的出版中心:围绕布达佩斯出版中心聚集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的力量”在萨格勒布从事活动,此外还有希德的“人民权利”,贝尔格莱德的“社会主义书店”,瓦西尔·格拉维诺夫在萨洛尼卡办的“国际社会主义书店”,卢布尔雅那的“劳动出版社”和萨拉热窝的“前进”出版社。

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各国的工人运动

南斯拉夫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接受了第二国际关于反对战争和战争危险的原则立场。它们认为,战争是相互争夺领土、市场和原料的各国王朝和执政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政策的产物。从1891年起,反对军国主义和挑起战争危险的问题就已经列入第二国际的日程并且成为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07年)和哥本哈根代表大会(1910年)的主要议题。然而,尽管有坚决反战的革命方针,当时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支持“保卫”本国的倾向已在增长。反对战争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来说意味着有可能在阶级斗争的新阶段上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工人党会得到比在和平时期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要广泛得多的群众支持。因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而于1912年11月24~25日在巴塞尔举行的第二国际非常代表大会特别肯定了无产阶级团结反战的共同想法,反对大国干涉,特别是奥匈帝国干涉,呼吁巴尔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用巴尔干人民兄弟情谊的思想去反对巴尔干各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政策,并为民主的巴尔干联邦而斗争。从这一立场出发,所有社会民主党在巴尔干战争中都主要看到巴尔干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它们在巴尔干争夺霸权的斗争,并因此而谴责了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但同时却没有看到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进步因素和特点。然而,由于各国的历史条件不同,对反战方针的运用也不尽相同。

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者的反战方针是1908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是自己对战争本质和国际关系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结果。迪·图佐维奇把反战斗争同无产阶级“反对阶级统治和执政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斗争联系起来。在巴尔干战争准备和开始阶段，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表示反对战争，投票反对战争借款，提出建立巴尔干人民“永久同盟”来对抗四个巴尔干国家的战争合作。它反对把战争看作是推翻反动的土耳其统治的方法，认为应通过民主革命推翻这一制度。它警告说，资产阶级把巴尔干分割成各个小国，同时正好以此在巴尔干各族人民和各个国家之间制造新的动乱根源。虽然土耳其在战争中可能遭到的失败会导致废除封建压迫制度和一部分受奴役人民（例如科索沃、梅托希亚和桑贾克的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解放，但战争对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战争的结局同时也会部分地或完全地导致对其他人民的新的民族奴役和社会奴役（如对马其顿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的奴役）。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者和保加利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尤其坚决反对瓜分马其顿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年秋，塞尔维亚军队对阿尔巴尼亚的征讨受到了他们最尖锐的谴责。迪·图佐维奇还为此写过一部著作《塞尔维亚与阿尔巴尼亚》。1913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工人群众集会上曾抗议“资产阶级的侵略野心，资产阶级为了获得出海口，把国家引向一场带来无穷无尽灾难的血腥冒险”。1914年前半年，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继续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马其顿社会主义者认为，战争不能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利益与要求，而和平只有通过土耳其民主化以及将来建立巴尔干各国联邦才能维护。他们注意到，巴尔干各君主国反对土耳其的战争同盟的背后也蕴藏着分裂和瓜分马其顿的危险。

克罗地亚的社会主义者在吞并危机过程中批判了奥匈帝国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对南斯拉夫各国的政策，认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奥匈帝国中南斯拉夫问题的一部分。他们特别反对支持奥

匈帝国政策的克罗地亚政治集团(弗兰克分子^①)。他们认为,由于国内外政策的危机,奥匈帝国无法通过内部调整而维持下去;他们见到南斯拉夫各国人民面前出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他们反对巴尔干战争和人民遭受的战争苦难,抨击大国的政策,虽然他们也认为巴尔干各国人民应当摆脱土耳其的统治。

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者也反对奥匈帝国的对外政策,在发生吞并危机、巴尔干战争和萨拉热窝行刺事件时态度最为激烈。他们仍然深信,中欧工人运动的力量将保证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的社会主义未来。因此他们接受了现状,并不感到有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直接斗争。他们的这种立场与在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威胁的小国中从事活动的巴尔干各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是不同的。在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者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思想:必须首先依靠南斯拉夫工人运动的力量,社会主义者对于在抵制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解决南斯拉夫问题特别感兴趣。但这些思想还没有被党所接受。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尖锐地批评了奥匈帝国的侵略政策和殖民政策。在1911~1913年战争危机时期,党进行了反战宣传,这种宣传同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是一致的。党甚至一度曾设想过把劳动群众武装起来同现存社会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党一直强调,通过对土耳其的战争是解决不了民族问题的,因为在“新解放”的地区还有许多其他民族。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伏伊伏丁那有组织的工人也加入了反战行动。在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范围内原则上谴责了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同时也表述了关于马其顿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享有自决权的主张。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进攻标志着重新瓜分

^① 又称弗兰克派,是极端民族主义派别,由其创始人约瑟普·弗兰克(1844~1911)而得名。二次大战前和大战中许多弗兰克分子成为与德意法西斯相勾结的乌斯塔什头目,——译者

世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开始。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最尖锐的表现形式。这次战争波及世界范围,有几千万人参加,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破坏,而且持续时间之长出人意料,它使许多国家的人民处于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工人阶级的党必须具体地确定对本国所进行的战争采取什么态度。大多数工人党支持了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社会爱国主义),这也是造成国际工人运动大分裂和第二国际瓦解的原因之一。从1915年在齐美尔瓦尔得举行有列宁参加的国际主义者代表会议开始提出了在战争中重建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的问题(齐美尔瓦尔得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过去的政治关系、经济局势和生活方式,最严重地损害了基本人民群众。居民中生产效率最高的那部分人被动员去服役,使得各经济领域的劳动状况恶化了。国家通过行政手段调节生产、交通和分配,在历史上第一次广泛地干预了经济,力图首先保障作战的物质基础,而这就造成了劳动条件的恶化和缩小了工人保护自己利益的可能性,因为资产阶级政府在战争一开始就取消了许多关于劳动保护的条款。许多雇有大量工人的企业过去一直是社会斗争的最活跃的中心,现在则实行军事化,禁止任何形式的工人运动;工人本身处于最沉重的压力和最严厉的监督之下。作战地区的居民遭到的损失最为严重。从战争开始到1915年底,这些地区包括:整个塞尔维亚和黑山,有时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一部分,紧靠索查河战线的斯洛文尼亚地区,1915年的马其顿地区及以后靠近萨洛尼卡战线的地区。这些地区都遭到巨大的破坏,造成了巨大的人力损失和大批居民流离失所。战争造成了经济生活巨大的失调,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集中营和从事强制劳动。而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兵役动员所涉及到的居民人数之多同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平均数简直无法相比。饥荒和物资普遍匮乏促使反战情绪日益扩散以及对政治组织的兴趣日益增长。这种战争灾难在被占领的塞尔维亚和黑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这两个国家中,占领者实行了报复、

恐怖和最野蛮的掠夺。各种残忍的暴力形式(公开绞死、监禁、审讯),首先是针对塞尔维亚族居民的各种暴行,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也蔓延开来。在广大地区传染病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数有时比战场上牺牲的人数还大。1914年冬和1915年春在可怕的伤寒病流行中,塞尔维亚有50多万人染病,约死亡13.5万人。前线的士兵受到了巨大的苦难,然而他们是为了他国政府的利益和在他国政府的指挥下遭受了最严重的牺牲。

由于历史的原因,南斯拉夫各国人民处在两个交战国家集团中——协约国(英国、法国、俄国以及后来的意大利、美国和一系列其他国家)和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以及后来的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然而,南斯拉夫各国工人运动的命运却是相同的:由于对工人阶级和工人党领导人实行战争动员以及其他措施,工人运动的活动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或完全取消。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是在最不利的时刻坚持反战立场的,当时在遭到进攻的塞尔维亚激起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狂热,但同时也表现出人民的爱国主义。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者十分清楚,塞尔维亚处于自卫的地位,是在为本国的生存和独立而战,即使在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之前它的生存和独立也一直受到奥匈帝国的不断威胁。因此,如果说某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党人有权赞成战争的话,那么在塞尔维亚首先就该投票支持战争。但是,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认为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冲突是整个帝国主义战争的组成部分,因此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观念出发,从真正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出发,确定了自己对世界大战这种性质的态度。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反战斗争是同争取建立巴尔干联邦的斗争和具有明显的反帝性质的政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宣布反对战争和投票反对战争借款的第一个和唯一的完整统一的党。在战争动员的日子里选出了以杜尚·波波维奇为首的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1914年11月20日迪·图佐维奇已经在前线牺牲。《工人报》被封

之后,1915年年中创办了《未来报》,并一直发行到1915年10月塞尔维亚被占领为止。1915年6月,巴尔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签署了联合反战宣言,而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赞成1915年7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二次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巴尔干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会。在奥匈帝国、德国和保加利亚占领塞尔维亚期间,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停止,其他地区工人组织的工作也停止了。

在奥匈帝国的南斯拉夫各国中,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社会民主党以及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反战立场表现在反对准备进攻塞尔维亚的斗争中(斯洛文尼亚的《曙光》因此停刊)。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对奥地利—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的领导人所采取的战争爱国主义立场既不直接谴责,也不表示支持,尽管党的领导机构中有个别人(伊万·雷根特)反对争取社会主义的“德国方式”。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宣传法国社会党人让·饶勒斯的反战演说,预见到将建立新的国际,于是间接地表露了自己的和平主义,这种和平主义似乎就足以同的里雅斯特的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人保持政治团结了。该党的工会报纸号召会员们保护好组织,以便战后立即就能继续开展活动。1915年暂时复刊的《曙光》宣传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反战立场,发表了杜尚·波波维奇的反战文章。但战争动员缩小了运动的社会基础。在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包括斯雷姆在内),工人运动的所有组织都立即被解散,工人报刊被封闭。里耶卡的情况也相同。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社会民主党50%以上的党员被动员入伍。在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战时当局没有正式禁止社会主义运动,在斯洛文尼亚地区也是如此,但奥地利政府制裁任何政治活动。随着意大利参战以及由于在索查开辟新战场和海上作战而不得不从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特拉撤出一部分居民,许多社会主义者被军事当局作为政治嫌疑犯而监禁和流放。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工人组织也未因爆发战争而被正式禁止,但由于实行

非常措施和战争动员，多数有组织的工人和领导人都无法从事政治活动，尤其是无法开展公开的反战活动。其余少数党和工会领导成员仅限于做些人道主义的工作以及看守工会机关和财产。《自由之声报》停止出版。1914年6月，设在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族—布涅族鼓动委员会的活动被禁止，《自由报》停刊。

在这种情况下，侨居美国的南斯拉夫各国社会主义者——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活动颇具特色，意义重大。1914年底他们就采取了反战立场，要求建立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埃特宾·克里斯坦)。他们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本着这种精神于1916年向美国国会以及在海牙举行的中立国社会党代表会议递交了备忘录。次年他们又联名发表了所谓芝加哥宣言，即建立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纲领，以对抗塞尔维亚王国政府和南斯拉夫委员会的政策。

1916年底和1917年初，奥匈帝国在群众反战情绪的压力下和俄国二月革命以及美国参战的影响下，恢复了国内的政治生活和奥地利议会(帝国议会)的活动，这时出现了工人运动重新恢复和活跃起来的新机会。士兵、海员、俘虏、从俄国俘虏营归来者、饱受饥荒和其他战争灾难之苦的大城市居民和贫困地区居民、逃兵等的艰难处境，促使人们采取更激烈的斗争形式来寻求出路。1916年在克罗地亚就已经发生罢工。而1915年4月和5月，在斯洛文尼亚发生了第一批妇女反饥饿游行示威(卢布尔雅那、科帕尔、伊佐拉)。1916年底，在的里雅斯特举行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会议。尽管会议仍没有对维也纳领导人的“爱国主义”政策明确表态，但当时在战争期间第一次制订了一个强调社会主义是人民的运动和坚持国际主义的政治纲领。为执行独立的阶级政策，会议拒绝同斯洛文尼亚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政党进行任何合作。1917年3月，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对俄国二月革命表示欢迎，并期待各国工人党采取革命行动，从而取得和平。1917年在萨拉热窝举行的五一大会的出席者对“赋予全世界自由思想以

新的力量”的“伟大的俄国革命”表示完全支持。本着这种精神，1917年在斯洛文尼亚、伏伊伏丁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组织了五一庆祝会。伏伊伏丁那社会民主党组织参加了争取普选权的反军国主义政治组织“联盟”。1917年年底和1918年初，匈牙利工人阶级行动的目的是要签订不割地和不付战争赔款的和约。在战争年代里，克罗地亚的许多知识分子(博日达尔·阿季亚、久罗·茨维伊奇、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都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而1917年军事当局的让步也为恢复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提供了机会。围绕着是在战争期间还是等到战争结束后再恢复运动的问题，社会主义者之间开始出现分歧。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由于筹备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以及在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问题上，又出现了新的分歧。革命派代表韦科斯拉夫·科科利、弗拉尼奥·留什蒂纳等人为1918年3月左派接管的党报《真理报》撰稿，而1918年底两派成员都为《新社会》杂志撰稿。

为表达渴望和平和支持俄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愿望，1917年在斯洛文尼亚举行了大规模五一庆祝活动，这成了要求提高工资浪潮的前奏。7月，在马里博尔爆发了第一次罢工。工会活跃起来，会员急剧增加。1917年7月初，创办了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新的机关刊物《前进报》，由阿洛伊集亚·什特比担任主编(在此之前从春季开始在斯洛文尼亚也阅读萨拉热窝出版的《自由之声报》)。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继续拖延着不同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声明划清界线，部分原因是它坐等革命的到来，而主要原因是它的改良主义。1917年5月，维也纳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国际讨论会上拒绝在奥地利实行民族自决权，并要求在保持奥地利完整甚至不进行内部改革的情况下实现和平。这种态度在民族问题上同斯洛文尼亚资产阶级政党十分强烈的政治要求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同时也同当时在斯洛文尼亚开始发展的要求自决的群众运动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也是在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青年”

行列中出现反对派的原因之一。

从1917年春季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工人运动开始逐渐恢复起来。《自由之声报》重新发行。在战争的最后几年，该报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外也起了革命作用。在日益增长的政治动荡的影响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于1917年底开始接近欧洲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立场。1918年2月初，在萨拉热窝举行了重新恢复的工人组织全国代表会议（这些组织有会员4000多人）。为了“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1918年在许多城市举行了五一庆祝活动。到1918年秋，工会会员和社会民主党党员人数发展到战前的两倍。第一批穆斯林妇女参加了运动。十月革命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得派重建革命国际的运动。党批驳了资产阶级报刊对十月革命的攻击，把反战活动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既反对战争，同时也反对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党的政治纲领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塞尔维亚被占领的情况下，在住在法国的社会爱国派多数和塞尔维亚政府活动的影响下，流亡在外的和在萨洛尼卡前线的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者中，开始对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反战政策作“社会爱国主义”的修正。他们不同意特里沙·卡茨莱罗维奇参加1916年在昆塔尔举行的反战的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强调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中的南斯拉夫地区负有解放使命。俄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塞尔维亚政府需要利用“社会爱国派”的影响，以取得新的俄国临时政府对其战争目的的支持。因此，1917年7月在巴黎建立了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社会爱国派”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以及在萨洛尼卡建立的它的分会中，阶级路线派和“社会爱国派”之间发生了冲突。在巴黎还建立了塞尔维亚工人总工会以及塞尔维亚工人协会。塞尔维亚工人总工会在法国各地有730名会员和5个分会。在侨居瑞士的伊利亚·米尔基奇的解释中，反战立场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下具有了新的革命的方针：争取由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掌握国家政权来实现和平。

1917年后半年,在被占领的塞尔维亚散发了萨拉热窝的《自由之声报》和鼓动革命的传单。1917年10月,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杜·波波维奇和特·卡茨莱罗维奇)在给斯德哥尔摩国际社会主义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备忘录里表示赞成在民族自决权、不割地和不赔款的基础上的和平,同时要求塞尔维亚民族各个分离部分联合起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也对和平的条件表明了同样的立场,而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则主张实行“完整统一的联合”或至少实行自治。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者将这一要求同俄国革命胜利的前途联系起来,因为他们认为,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问题和欧洲的民族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协约国胜利的结果。他们原则上赞成建立巴尔干联邦,而不分裂的马其顿则作为它的单独的单位。但为了阻止通过保加利亚“广泛派”社会主义者把整个马其顿并入保加利亚的要求,并强调塞尔维亚通过瓦尔达尔河谷获得出海口的切身利益,作为暂时解决办法他们接受了分裂马其顿的现状,同时并入保加利亚的地区可延伸到瓦尔达尔。在其他欧洲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下,使马其顿继续处于分裂状态的观点为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宣言所接受。欧洲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消除巴尔干国家之间冲突根源的方式。马其顿的分裂状态被认为是通往巴尔干联邦道路上的暂时的、阶段性的解决办法,而在巴尔干联邦中,不分裂的马其顿具有平等的自治单位的地位。

1918年上半年,流亡国外的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扩大了。当时,“社会爱国派”在巴黎创办了《未来报》,他们在该报发表文章反对单独媾和,并加入了被压迫民族委员会之类的国际“社会爱国派”组织。正因为如此,杜·波波维奇在1918年4月开始公开反对“社会爱国派”。巴黎委员会委员科斯塔·诺瓦科维奇转到国际主义派一边在这种分歧中具有决定性意义。《未来报》停刊,“社会爱国派”集团也为巴黎工人协会所唾弃。这一切都对萨洛尼卡前线的和侨居瑞士的社会主义者产生了影响。杜·波波维奇

以及特·卡茨莱罗维奇都表示要保卫苏维埃俄国，反对外国军事干涉。他主张建立新的国际。在此期间，在法国的塞尔维亚青年革命运动得到了发展。在西欧国家、奥匈帝国俘虏营、俄国和美国的黑山人中也出现了政治分歧，其中一部分人声援了十月革命。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南斯拉夫各国的反战运动更加壮大。1917年11月，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组织了多次群众集会，支持苏维埃政府的和平建议，反对奥地利的战争政策。1917年底和1918年初，在亚得里亚海沿岸一带以及从的里雅斯特、普拉和里耶卡直到博卡科托尔斯卡的多民族大工业中心和军事中心，危险的政治动荡在不断扩大。1918年1月中旬，奥匈帝国内出现了革命形势，直到1918年11月最初几天，列宁一直期待工人、士兵和农民在那里夺取政权，建立各民族的自由联盟，并齐心协力战胜资本家。一月的大罢工运动约有50万工人参加，普拉和的里雅斯特的工人也参加了（普拉约有1万工人参加）。在的里雅斯特，按照苏维埃的榜样，建立了工人委员会，还出版了斯洛文尼亚文版的专门报纸。从卢布尔雅那到苏博蒂察的其他工业中心，工人们在群众集会上也表达了反战情绪。但是，斯洛文尼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导人和工会领导人却把工人们从斗争行动中引开，结果在斯洛文尼亚工人阶级运动中开始出现分歧。2月初，在博卡科托尔斯卡40条军舰上的水兵举行起义（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占奥匈帝国舰队人员的1/3以上），在博卡被监禁的黑山人和博卡居民也对起义者给予支持。尽管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但水兵中的反战行动和小规模兵变在普拉一直持续到1918年秋天。复刊的社会主义报纸在这方面起了巨大作用。这些报纸在军舰上和卫戍部队中都广为传阅。1918年春，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南斯拉夫各国出现了新的大规模反战行动。4月在卢布尔雅那，7月在普拉举行了持续多天的示威游行。1918年6月在伏伊伏丁那的大贝奇凯雷克、索姆博尔和苏博蒂察，工人们加入了反战罢工。1918年5月部队兵变中，反战情绪达到了最高峰：在奥地利后方的最大一次兵变

是在穆拉乌、尤登堡和拉德戈纳有斯洛文尼亚人参加的部队中发生的暴动。驻扎在佩丘伊的诺维萨德步兵团约有2000名士兵也举行了暴动。在这些兵变中，从苏维埃俄国回来的被俘人员起了重要作用。

反战情绪也表现为奥匈军队中出现大量逃兵(“绿色部队”^①)。1918年春，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南斯拉夫各国中共约有205逃兵，单是在克罗地亚就约有5万逃兵，伏伊伏丁那约有2万逃兵。随着大量奥匈军队俘虏兵从苏维埃俄国回来，“绿色部队”的人数也不断增加。人数不多的一伙伙逃兵常常袭击地方政权机构，清算发战争财的富翁。在弗鲁什卡山，逃兵人数多达数千。被派去讨伐的军队本身也由于逃兵太多而溃散了。战争结束前夕，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南斯拉夫许多地区，反战运动也表现为农民暴动，特别是在伏伊伏丁那。1918年10月底布达佩斯发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吸引了巴奇卡和巴纳特地区有组织的匈牙利工人阶级，同时也部分地吸引了那里有组织的德籍工人。根据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指示，他们参加了佩斯民主新政府作为自己的政权机构在那里成立的地方委员会。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由于土地问题未得到解决，社会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以致农民自己试图通过焚烧地主的房屋和财产、少交“三分之一”地租和占地来寻求解决办法。在克罗地亚也出现了农民骚动，有些地方城市居民也参加了(里耶卡)。在斯洛文尼亚，社会骚动汇入了蓬勃发展的争取自决的群众运动，而且这一运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变得激烈起来。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萨洛尼卡前线的塞尔维亚军队中也发生动乱，其中也有马其顿士兵参加。被强行征入保加利亚军队的马其顿人在1917年底大量逃跑和投诚，而其他人则参加了暴动和起义。被暴动和起义所震慑的保加利亚军队不得不撤退并遭到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从奥匈帝国军队中携带武器逃回家乡的士兵，他们在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和伏伊伏丁那的森林和山中活动。——译

失败。

奥匈帝国军队中的许多南斯拉夫人在战争前期多半就已经逃跑或在奥地利——俄国前线大量被俘，因为他们不愿意同俄国人作战，他们从俄国的俘虏营中报名参加参加了塞尔维亚志愿军团，同奥匈帝国作战。在这个军团中塞尔维亚人最多(78%)，然后是克罗地亚人(14%)，斯洛文尼亚人(6%)。在他们的要求下，这个军团改名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志愿军团”。在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军团内的民族问题尖锐起来。由于塞尔维亚王国所指定的军团领导人执行民族主义政策，约有2.4万人退出了军团，其中包括30名克罗地亚族和斯洛文尼亚族军官。这些军官发表宣言，要求把“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联合成一个建立在民主和所有三个民族完全平等的原则之上的完全自由和独立的南斯拉夫国家”，要求建立“联邦制的南斯拉夫”。1917年年中，在彼得格勒成立了马其顿革命委员会(迪米特里耶·丘波夫斯基)。该委员会主张建立一个包括马其顿、阿尔巴尼亚、黑山、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斯洛文尼亚和色雷斯在内的巴尔干民主联邦共和国。在俄国的政治组织(南斯拉夫革命同盟)、军事革命部队和南斯拉夫委员会中出现了一股亲布尔什维克潮流。约有3.5万名南斯拉夫人参加了革命事件——加入了赤卫队或成立了类似的部队，并站在红军方面参加了战斗。1917年底已经成立了塞尔维亚—苏维埃革命大队，1918年4月成立了塞尔维亚红军大队，而在1918年8月在察里津成立了第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团。在苏维埃俄国部队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中有许多南斯拉夫人，如阿莱克萨·敦迪奇、达尼洛·斯尔迪奇、古斯塔夫·巴拉巴什、埃米尔·乔普、马克西姆·查纳克、尼古拉·格鲁洛维奇、武卡申·马尔科维奇、博里沃伊·阿加塔诺维奇。

1918年5月在莫斯科建立了南部斯拉夫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南斯拉夫革命运动在苏维埃俄国的政治领导机构，出版了《革命报》

和《世界革命报》。该小组最后于1918年6月16日成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南斯拉夫小组。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联邦制和民族权利的方针。1918年11月5日该小组改组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并选出了自己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有:伊万·马图佐维奇、弗拉尼奥·德罗布尼、弗拉迪米尔·乔皮奇、拉扎尔·武基切维奇、留博米尔·莫因、尼古拉·科瓦切维奇和德拉戈廷·戈迪纳。到1918年12月中旬,该共产主义小组向国内陆续派遣了114名积极分子,他们的任务是在所有南斯拉夫国家建立地下共产主义组织。这些人到国内后,立即投入了在新成立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联合无产阶级的行动在建立革命的工人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17年美国参战后已经可以预料到协约国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这就展示了奥匈帝国瓦解的前景,并使南斯拉夫各国资产阶级(无论是塞尔维亚资产阶级还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资产阶级)关于建立共同国家的政治倡议能够成为现实。这一倡议成了资产阶级手中迫使南斯拉夫人民民族运动的利益服从其阶级利益的重要政治工具,特别是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在奥匈帝国领土上刚刚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出现以革命的、反资产阶级的方式结束这场既无胜利者又无失败者的战争的具体前景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所有民族的资产阶级都按下列方针联合起来:南斯拉夫问题不应通过民族的革命自决权和本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加以解决。他们指望,建立南斯拉夫国家是战争的结果。他们把自己的行动集中于阻止社会革命和确保自己在国家中的权力,而这个国家则应建立在相互就瓜分权力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塞尔维亚王国政府早在1914年12月就已经将建立南斯拉夫国家一事列入自己的战争计划(《尼什宣言》)。为此目的,塞尔维亚王国政府提出并支持在国外建立南斯拉夫委员会作为奥匈帝国领土上南斯拉夫人民的政治代表机构,以表达他们要求建立一个共同的南斯拉夫国家的愿望。除了共同的阶级利益以外,各方都有自己的

特殊利益。塞尔维亚特别希望除了南斯拉夫国家联合之外保证把黑山直接并入塞尔维亚,并统治瓦尔达尔马其顿。南斯拉夫委员会中的(和在国内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代表特别关心的是意大利帝国主义,因为这个国家在战争中站在协约国一边,并且参战的目的包括把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大片领土(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北部及许多岛屿)并入意大利。南斯拉夫委员会把黑山问题和马其顿问题交给塞尔维亚王国政府解决,而塞尔维亚政府则支持该委员会在外交上对意大利帝国主义的抵制。但是,在联合的条件和方式上存在着分歧:塞尔维亚王国政府竭力保证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在共同国家中占统治地位,强调塞尔维亚负有解放使命;而南斯拉夫委员会则力求使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资产阶级在南斯拉夫市场上占有优势,同时在国家政权中占有平等的份额,强调民族自决权原则。1917年春奥地利议会生活得到恢复之后,所有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议员在维也纳组成了南斯拉夫俱乐部,要求立即在联邦制的哈布斯堡君主政体中建立一个南斯拉夫国家单位(《五月宣言》)。这对奥匈帝国统治集团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但却促使这个国家中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特别是在斯洛文尼亚、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开展群众运动,而且使克罗地亚省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政党也逐渐参加进来,并以国家完全分离出去作为最终要求。这导致了1918年10月在萨格勒布建立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国民议会,包括建立斯洛文尼亚和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民议会。在此期间,塞尔维亚王国政府和南斯拉夫委员会于1917年7月在国外发表共同的南斯拉夫纲领(《科孚宣言》)。规定基于民族自决原则之上的未来国家将实行卡拉乔尔杰维奇王朝君主立宪民主议会制,但宪法一定要以特定多数票通过,而不是以某一民族的多数票压倒对方。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还在1915年就表示赞成奥匈帝国境内的

南斯拉夫民族同塞尔维亚联合起来,以对抗意大利帝国主义。它强调,要求联合并不能当作塞尔维亚的某种战争目的,而是生活在奥匈帝国境内的南部斯拉夫人自己的要求。流亡在国外的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者,在反对塞尔维亚王国政府及其盟国的战争政策和拒绝“社会爱国派”观点的同时,也拒绝把解决南斯拉夫问题同战争的最后胜利联系起来。他们强调为各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但这种解放应该由人民自己去争取,以“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去争取。他们抗议战争结束时意大利占领南斯拉夫部分领土。

战争问题、革命问题和南斯拉夫统一问题对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左派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不可分割的,是同期待奥匈帝国中心地区及其外围爆发革命具体地联系在一起的。既然革命没有到来,克罗地亚的社会主义者抱着更大的信心支持南斯拉夫国家从奥匈帝国分离出来并建立一个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临时国家,而且它将来还有可能同塞尔维亚和黑山联合起来。他们表示赞成居住着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加入南斯拉夫国家,虽然里耶卡社会主义者在战争刚结束时曾要求里耶卡保持独立,而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特拉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则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建立一个由的里雅斯特、戈里什卡和格拉迪什卡的一部分以及伊斯特拉的一部分组成的独立的国家单位,另一派则赞成把这些地区划归意大利。1918年11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部分地区被意大利占领,这就使得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者脱离了南斯拉夫发生的各种事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认识到,奥匈帝国瓦解时期的局势要求党的政策完全面向阶级斗争,而对导致南斯拉夫国家联合体成立的种种事件则采取独立的旁观者的批评立场。不过,党强调了各族人民自决原则以及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民建立独立国家的“自然权利”。党唾弃了关于文化自治的主张(菲利普·菲利波维奇在《自由之声报》发表的文章)。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反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谴责资产阶级分裂主义的民族愿

望和宗教愿望,同时也拒绝资产阶级关于南斯拉夫联合的一切纲领,并批评要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行自治的穆斯林领导人的立场。党主张奥匈帝国境内南斯拉夫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相互联系并一致行动。

哈布斯堡君主政体下南斯拉夫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些国家脱离奥匈帝国和联合成南斯拉夫国家的问题上没有分歧。分歧在于对待本国资产阶级的态度和对待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态度。克罗地亚的右派社会主义者认为,同本国资产阶级进行合作能使社会主义者在国内成为比战前更加强大的社会政治因素,并能实现一大部分最低纲领。然而,左派社会主义者认为,不应该追随“本国”的资产阶级,而是在新的南斯拉夫国家中也应该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在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内主张阶级合作的倾向也占了上风,尤其是在意大利占领之后的里雅斯特左派组织失去影响时就更是如此。伊万·仓卡尔关于工人阶级的党是革命的民族运动的领导力量的思想,1918年4月甚至在左派中也未被接受。在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争取自决和南斯拉夫联合的群众运动在斯洛文尼亚发展起来。在反对派“社会主义青年”的压力下,多数社会主义者参加了民族运动,并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围绕在运动内的地位问题同资产阶级政党讨价还价。“社会主义青年”要求把南斯拉夫建成一个联邦共和国。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社会主义者1918年10月6日就已经在萨格勒布举行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会了面。然而,在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全体代表(只有亨里克·图马和伊万·雷根塔除外)以及多数克罗地亚社会主义者都赞成参加国民议会,因此他们很快就进入了新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构和管理机构(安东·克里斯坦、维利姆·布克舍格、维托米尔·科拉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反对这样做,他们发表特别宣言,拒绝同资产阶级合作。

战争结束后就完成了建立第一个南斯拉夫国家的工作。塞尔维亚和黑山解放后,1918年11月25日在诺维萨德举行的大国民议会宣布伏伊伏丁那同塞尔维亚联合,而塞尔维亚和黑山的联合是根据1918年11月26日在波德戈里察举行的塞尔维亚大国民议会关于黑山的决定进行的。南斯拉夫委员会没有参加,在战争期间同它达成的协议也未执行,因为这不仅是塞尔维亚王国政府的政策,而且也是在萨格勒布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国民议会中多数人的政策。在意大利已经占领斯洛文尼亚西部和克罗地亚某些地区的时候,而首先在克罗地亚北部的社会动乱带有越来越明显的革命性质的时候,在萨格勒布国民议会、达尔马提亚政府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民议会中一部分政治家(塞尔维亚的以及克罗地亚的和斯洛文尼亚的)构压力下,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国民议会代表团于1918年12月1日请摄政王亚历山大·卡拉乔尔杰维奇执掌新国家的政权。在此基础上,摄政王宣布“塞尔维亚同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独立国中的各地区联合成统一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直到1919年上半年才承认这个新国家,但这个新国家参加凡尔赛和会具有得到国际集体承认的意义。在签订国际条约确定其边界时(1919年9月同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1919年11月同保加利亚的奈伊条约、1920年6月同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和1920年11月同意大利的拉巴洛条约),大国起了决定性作用。没有划归它的领土有:意大利境内的尤利省(戈里什卡、伊斯特拉、的里雅斯特和诺特兰斯科的一部分)、扎达尔、茨雷斯、洛希尼、拉斯托沃、帕拉格鲁扎和里耶卡,共计有50多万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奥地利境内的科鲁什卡南部地区。这意味着对斯洛文尼亚人民而部分地也是对克罗地亚人民的国际瓜分,而马其顿人民在此之前就已经被邻国重新瓜分,而且这些邻国中任何一个都不承认马其顿民族的独立存在。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中存在许多少数民族,

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德意志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匈牙利人。

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生活中，建立共同的国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国家的成立是他们通过联合为实现民族解放的历史愿望而努力的结果，这也就使他们摆脱了屈服和依附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地位，扩大了维护和保卫民族自由和独立的可能性，并保证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统一国家的成立也就有可能实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工人运动的联合和建立工人阶级统一的革命先锋队，为进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

然而，建立共同国家的方式及其内部制度的性质辜负了人民的希望。宣布建立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十二月一日文告》，不符合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要求进步和民主的愿望，它是以卡拉乔尔杰维奇王朝为首的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和过去奥匈帝国统治的南斯拉夫各国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产物。同时，塞尔维亚资产阶级依仗战胜国的力量和本国的军队取得了霸权地位，并把反人民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强加于人，而无视新建立的国家中各族人民的民族愿望和社会愿望。

5. 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作用和历史意义

欧洲以及南斯拉夫各国工人运动的组织方式和领导方式采取社会民主党观点的时代,是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时期,是这些国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1917年以前,作出社会决定的主要政治进程确实一直牢牢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但是工人运动所达到的组织程度和阶级觉悟水平已使工人阶级成了政治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因素。从历史发展的前景来看,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是几乎在所有南斯拉夫国家的社会中都建立了独立的或自治的社会民主党(各个国家、民族或地区),因为这是工人阶级成为新的历史主体、准备在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和争取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重要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民主党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这些运动成了唤醒阶级觉悟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作用的观点的主要因素。它的功劳是,这个运动组织并领导了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反对执政的资产阶级国家政策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理论认为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天然一致的,与此相反,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人中间宣传关于阶级利益对立和冲突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展示了社会主义的前景。

社会民主党的启蒙、教育和宣传活动是要通过党校、工会学校、培训班、工人图书馆和文艺协会,特别是通过社会主义报纸来提高工人和其他贫苦社会阶层的一般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这

样，工人运动在当时便成了在社会上普及文化的因素。社会主义在当时鼓舞了许多文艺工作者，并将他们吸引到工人运动中来。

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旨在改善工人和社会其他劳动阶层的经济状况，保护他们的利益和扩大公民权利，为工人阶级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和斗争创造更好的条件。社会民主党人以各种方式力求成为争取民主权利——普选权、男女平等、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协议自由——的斗争的代表者，并努力使最广大的群众政治化和使他们参与决定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各社会民主工党独立地奉行自己的政策并在原则上对本国统治阶级势力持批评态度，这一事实本身就为所有对现状不满和对资产阶级政治主张不满的人们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在探索以先进的办法解决南斯拉夫人民面临的社会问题时能够同工人运动及其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社会民主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按照它们的党员和追随者的人数比例所能估计到的影响。

在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上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有其局限性。在战争即将结束和刚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当出现了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清算的问题时，这种局限性充分地表现了出来。第二国际及其中多数党的基本弱点首先来自他们的政治观点的狭隘性。由于它们几乎只关心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问题和争取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的问题，以致将解决基本居民群众（受民族压迫的群众和农民）的切身问题的责任让给了资产阶级。其中某些党内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以及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机会主义观点占了上风。它们对改良和普选权，亦即对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寄予过大的期望，在许多问题上不反对“本”国的政策，不反对统治阶级及其国家的好战政策、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看不到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和进行革命的社会改造的可能性。社会民主党人坚持工人党的阶级“纯洁性”。他们不赞成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但是认为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可能会使工人离开阶级斗争的

道路。这就帮助了资产阶级利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问题来实现自己的阶级目的。尽管社会民主党被迫反对封建残余,或者组织农业工人,但在各个南斯拉夫国家中它们在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是不彻底的和不尽相同的,它们未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引路人。不过,在这些党内也出现了或独立地取得了在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上的科学认识和政治认识。这对后来制定革命政策是很重要的。

在奥匈帝国境内各南斯拉夫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的塞尔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之间尽管有基本上相同的纲领,但仍然存在重大的思想分歧。这是这些党从事活动的历史条件的特点以及改良主义观点对某些党的领导人的影响程度所决定的。在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中阶级斗争观点和革命观点占了上风。它否定了关于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国家超阶级性的观点,坚决揭露了资产阶级政策的阶级性,没有对通过改良亦即通过执政资产阶级小小的让步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抱有幻想。因此它探索革命的可能和革命的道路,并利用参加大选的机会来宣传自己的阶级政策和把自己的活动扩大到农村。它利用这种方针反对塞尔维亚王国政府进行领土扩张和奴役他国人民的战争政策,它宣布反对战争并投票反对战争借款,它看到了受土耳其和奥匈帝国奴役的各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意义,认为他们应该通过社会革命而不是战争去获得解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即将结束时期总的发展趋势证明,在南斯拉夫各国中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工人运动,部分地还有工人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结构、斗争性和直接愿望。在各南斯拉夫国家中,工人运动已远远超出了现有的工人党和工人组织的思想政治范围和组织范围。而这些党和组织的领导人在战争初期却竭力想保持这些范围,以供战后时期开展活动之用。工人运动的直接影响远远超出过去的社会范围和组织范围的前景已经展现了。新的群众,主要是在鲜血淋漓的前线、

在战俘营、在志愿部队中、在苏维埃俄国的革命队伍中、以及在“绿色部队”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给工人运动定下了基调。这是一代失去童年的青年，来自工厂和饥饿的城市的青年，逃难的青年，以及来自被抢劫一空和破坏殆尽的农村的青年。工人运动成了这些群众的自然庇护所，他们满心希望和追求一个没有战争和剥削、没有民族压迫和帝国主义的新世界。在俄国发生革命变革和欧洲出现革命动荡之后，建立这种新世界的可能性已经变得可以觉察到了。在此基础上，各社会民主党及其组织的内部，根据种种原因开始了思想上和政治上分化的过程：分成了赞成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的人（“社会爱国派”，“内阁主义派”）和主张阶级斗争的人。

已经参加工人阶级组织的工人，成了贯彻新的鲜明的革命方针的骨干，这种方针代表了工人阶级运动的新质。这种新质的产生和在政治上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战前社会民主党工人组织的延续，甚至是整个党（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或个别党组织的延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南斯拉夫国家范围内工人党的基本历史任务是联合工人运动和制定其革命方针。

第二编

在革命准备时期的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

(1919~1941年)

第一章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成立和迅速发展

(1919~1921年)

1.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 (共产主义者)的成立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社会政治形势。工人运动中新的思想政治组合。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的联合代表大会和纲领性方针。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出现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资本主义制度陷入深刻的危机;阶级关系激化,社会动荡加剧,在某些国家,首先是在沙皇俄国爆发了革命;欧洲政治地图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殖民地人民掀起了民族解放斗争。哈布斯堡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垮台以后,法国和英国在欧洲取得了优势,建立了国际关系的“凡尔赛体系”。年轻的苏维埃俄国在遭受巨大损失的国内战争和外国军事干涉结束以后,陷入了“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与欧洲和世界政治隔绝,它的国际影响局限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方面。一些新的单民族或多民族独立国家建立起来:波兰、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

亚人王国。

在多数欧洲国家,除了那里的人民经受四年战争灾祸以外,帝国主义战争造成了严重的物质毁灭和大量的人员伤亡。1917年俄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掀起的革命浪潮扩大到欧洲西部,当时联合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徒劳地企图通过军事干涉扼杀俄国革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战争破坏、某些国家和军队崩溃、阶级关系尖锐、农民和士兵群众的不满情绪增长的情况下,1918年底和1919年上半年在某些其他国家(德国、匈牙利、巴伐利亚、斯洛伐克),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尽管时间不长)。这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前景,这是对资本主义的巨大挑战,然而也是工人运动内部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原先在战前和战时发生的种种冲突发展到了极限;工人阶级组织在国际范围和国内范围发生了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完全分裂。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改良派竭力恢复第二国际并企图平息革命浪潮。与此相反,1919年3月初在列宁的倡议下建立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它是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期待着的世界革命的国际司令部。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中的组织(“一个全世界统一的共产党”,而不是党的联邦),各个国家的共产党是它的“支部”;它有权批准“支部”的选举结果,委派“支部”的领导,解散某些“支部”。在它的方针和指示中,确定了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阶级斗争的总战略和策略。共产国际加快了在党的组织工作、意识形态和政策方面消除社会民主党(改良派)影响的步伐,为许多国家刚产生的共产党巩固组织和制定革命纲领作出了贡献。后来又建立了负责革命斗争某一方面的国际组织,如: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革命者援救协会和农民国际。

由于建立了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共同国家,出现了开展阶级斗争的新的历史形势,而南斯拉夫各地的工人运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根据1921年1月21日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塞尔维亚人、克罗地

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领土面积为247542平方公里,有居民11984991人,即每平方公里48.4人。这次人口普查是在同邻国的边界没有最终划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新成立的国家分为7个省,省内设州、县和区。绝大多数居民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穆斯林;还有少数民族近200万人——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鲁辛人、斯洛伐克人、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享受社会保险的共有2292855人。约有950万居民生活在农村,250多万居民生活在城市,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7.5%。绝大多数城市的人口在1万人以下。按职业划分,就主要行业的就业人数而言:农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的就业人数为1741092人(占就业总人数的75.9%);工业和手工业就业人数为225104人(占就业总人数的9.8%);商业和银行就业人数为72562人(占3.2%);交通运输部门就业人数为44526人(占2%);公职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为79928人(占3.5%);军队为10718人(占0.5%);食利者和领取养老金者为53669人(占2.3%)。不发达的工业部门中共有1831家企业;加工工业有工人152811人,矿业和冶炼业有工人38782人,约占人口总数的1.3%^①。除国家西北部、塞尔维亚北部和莫拉瓦河流域外,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历史不长,缺乏专业经验,基本上与农村保持着联系。成年人半数以上(51.5%)为文盲。在马其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文盲占80%以上;由于宗法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原因,妇女中文盲特别多。

南斯拉夫各民族经历了若干世纪特殊的和不同的历史发展以后,于1918年组成了统一的国家,他们把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成果也带进新的国家。这些成果丰富了、然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他们的共同生活。在新的国家中,在它发展成统一的经济区域的初期,错综复杂地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生产关系——从自然经济、封建关系和宗法村社的残余,直到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

^① 原文如此,据计算应为1.6%。——译者

关系。统一的经济制度的发展还受到了五个不同的铁路系统，多种立法和几种货币的阻碍。

南斯拉夫各国和省进入新的国家共同体时，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社会经济结构也不同。在社会经济结构中还有资本主义以前的关系遗留下的因素：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农奴制关系，马其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佃农制，达尔马提亚的农奴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和伏伊伏丁那的带有半封建残余的大庄园制。其中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地主多半只是地租的享用者，他们很少积累；而在伏伊伏丁那和斯拉沃尼亚则出现了同资本主义企业因素混杂在一起的封建关系，农业贵族主要是外籍人。在新建立的国家的北部和西部南斯拉夫诸国中，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同封建主的身分联系在一起。这些封建主同时也是工厂和银行的所有者，或者是同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企业主和银行家作买卖的粮商，他们还通过这些人与国际资本、特别是同法国和英国资本作交易。但是，在塞尔维亚，农业的生产率低，自然经济的残余强大，再加上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农业给市场提供的剩余产品很少，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法国、比利时和英国资本的利益。这些外国资本在塞尔维亚的矿山和工业中拥有特许权，并在银行和国营企业中拥有股份。

总起来看，南斯拉夫各国开始工业革命几乎比西欧和中欧发达国家整整晚一个世纪。就绝大多数工业品的生产而言，新国家在欧洲居于最后几位。比较发达的是轻工业，当时最大的也是最老的工业企业有马里博尔、萨拉热窝、尼什和萨格勒布的铁路工厂。绝大多数工业企业和产业工人分布在斯洛文尼亚、伏伊伏丁那和克罗地亚。尽管塞尔维亚在19世纪上半期就废除了封建主义，但塞尔维亚比上述地区都落后。其次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最不发达的是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马其顿、黑山。诚然，组成新国家的诸国是在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之下实现联合的，然而塞尔维亚却没有可以同比较发达的“北方地区”竞争的工业。因此，塞

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建立也意味着为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地区的工业提供了扩大市场、扩大积累和扩张的可能性。这一情况再加上害怕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在战后最初几年里使得南斯拉夫诸国资本家的利益统一起来。

经济上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联系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经济，很快便依附于外国资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国际地位，对它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统治集团首先依靠的是法国，它拒绝承认苏维埃俄国，拒绝同它建立外交、经济、文化和其他关系。另外，在对俄国的外国军事干涉和俄国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给大量白卫军提供庇护所，从而成了国际反苏活动的中心之一。

恢复国家的经济生活是艰难的，由于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新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稳更为加剧了。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都可以感受到战争的后果。在这些地区死亡的人最多，经济受到的破坏最严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前线和后方，塞尔维亚约400万人口中死了100多万人，留下了11.4万个残废军人和50万个孤儿。战争刚一结束，立即感到了伤寒、白喉和西班牙疟疾大流行的后果。大片土地荒芜，牲畜减少了70%，机器毁坏了57%以上。据向盟国赔偿委员会提出的材料，南斯拉夫上述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全部物质损失达170亿法国法郎。南斯拉夫其他地区也遭受巨大的人员牺牲、破坏和物质损失。据估计，南斯拉夫所有地区的物质损失总共超过230亿法国法郎。德国军队和奥匈军队在撤退时系统地破坏了铁路和矿山，尤其是破坏了煤矿，破坏了交通运输和工业，煤产量减少了30%，基本食品的价格比1914年上涨了好几倍。政府作出的关于实行“自由贸易”的决定，助长了食品投机活动，促使物价不断地和越来越严重地上涨。食品、燃料、工业品和农产品普遍短缺；战后最初几个冬天里某些地区受到饥饿的威胁。

特别严重的社会经济形势,以及实现联合的方式和国家制度的形式所造成的政治关系,使得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革命化。大量失业,就业者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恶化(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都给工人阶级造成了最严重的损害。工人的不满情绪和革命热情增长了,并表现在罢工(尤其是矿工和铁路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的行动、抗议集会和游行示威中。

农民要求在原来属于奥匈帝国的南斯拉夫各国废除封建关系和分配土地的运动,动摇了新国家的基础。这一农民运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具有革命的特点。1918年底和1919年初,无地农民的暴动和自行分配地主土地的现象层出不穷。随着从异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农民负债累累、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又没有土地的新国家中,从一开始就尖锐地出现了农民问题。由于实行以第纳尔作为国家统一货币的政策,在过去使用其他货币的地区,农民的物质状况变得更糟了,因为其他货币尤其是克朗兑换第纳尔的比价定得很不恰当,以致这些货币失掉了很大一部分价值。

由于农民骚乱,暴动,哄抢地主的财产、粮食和其他产品,某些地区实行了紧急状态,塞尔维亚军队和盟国军队的行动限制了农民的自发运动。为了缓和农村紧张的关系和防止爆发“土地革命”,同时为了消除封建残余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政府开始了土地改革。1919年2月底通过了在全国实行土地改革的“初步规定”。这项法令规定,有偿地征用各种地主的大块土地(500公顷以上,200公顷以上,某些地区57公顷以上),把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而且首先分给残废军人、军人遗孀、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志愿兵和军人。1919年,在农民土地运动最强大的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土地改革,从而满足了一部分无地农民的要求,暂时平息了自发的农民土地革命运动。1919~1920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废除了农奴制关系,在马其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也废除了佃农制,在达尔马提亚废除了农奴制,在克罗地亚和伏伊伏丁那消除了封建社会关系的残余。

但是，政府力求通过同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地主进行妥协来寻求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它只是局部地满足了无地农民和贫苦农民的要求。除居住在国外的地主以外，国内所有的地主都保住了土地。小块土地(平均每块2公顷)出租给农民，以4年为期，但少数民族(匈牙利人、德意志人、阿尔巴尼亚人、罗马尼亚人等)被排除在外。农民的强烈要求和同农民的阶级冲突只是局部地和暂时地缓和下来。1919年春，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伏伊伏丁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农民暴动和骚乱重新频繁发生。

对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及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志愿兵实行移民，把伏伊伏丁那、斯洛文尼亚、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马其顿边界地区的土地无偿地分给他们，每人3~5公顷。1920年的移民是按照土地改革部的命令和关于在南部地区定居的法令进行的。严重的土地投机买卖，经常使当地人失去土地，导致许多冲突。在南部移民地区的某些地方，尤其是在马其顿，实行移民带有同化的目的，致使民族矛盾尖锐化。

战争造成的严重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物资普遍缺乏、投机、涨价、失业)，在以前属于奥匈帝国统治的地区不彻底地和不民主地解决土地问题，当局对不满的群众不断施加压力，特别是塞尔维亚军队在新解放地区的驻扎和表现——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对新国家的不满蔓延开来。悬而未决的民族问题尤其加深了国内政局的不稳。在新成立的多民族国家中建立了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政治霸权。塞尔维亚资产阶级依靠的是战胜国的武力，而它自己也拥有军队。霸权政策引起了国内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强烈反抗，尤其是引起了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反抗。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希望瓜分政治权力并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新国家从一成立起就挑起了民族间的政治冲突。

塞尔维亚最有影响的政党(人民激进党和民主党，这两个党在国内某些其他地区也有影响)，主张建立君主政体和一元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它们的出发点是：实现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斯洛

文尼亚人的“民族统一”，深信中央集权国家能够消除各地区之间的历史差别和保证迅速地把三个“部族”合成一个民族。实行中央集权制还为了保障新国家生存的利益，因为新国家仍然受到未被克服的分裂主义倾向的威胁，受到意大利帝国主义野心以及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复仇主义要求的威胁。这两个党的领袖认为，联邦制会导致分裂、无政府状态和削弱国家的国际地位。人民激进党的领袖认为，联邦制是实现不了的，因为无法划分各个联邦单位。与此相反，其他的资产阶级政党，首先是克罗地亚的共和农民党、权利党和斯洛文尼亚的平民党，都希望保持“部族特性”和区域独立性，主张建立共和政体的复合国（自治区、联邦或者邦联），与此观点相接近的还有新成立的南斯拉夫穆斯林组织。这种观点没有否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民族统一”，而是以南斯拉夫各地区世代分离的历史发展造成的差别作为出发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各自的国家法律传统作为出发点。反对一元制中央集权国家体制最坚决的是以斯捷潘·拉迪奇为首的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该党立即拒绝在这样的基础上的联合，主张建立以邦联方式组织起来的农民共和国。在截然相反的主张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开始了起草宪法的工作，而这也将成为宪法通过以后政治生活的根本特点。只要存在南斯拉夫王国，就不可能解决民族问题。政治上反对建立南斯拉夫国家的人（亲奥地利的集团和个人、部分天主教神职人员、有分裂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政客）利用民族之间的冲突，挑起民族仇恨，煽动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情绪。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建立，还为南斯拉夫各国工人运动的联合创造了条件。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以及在战后国内深刻的社会动荡、工人罢工和贫苦农民不断暴动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国家的北部和西部地区的工人罢工和贫苦农民不断暴动的影响下，工人阶级的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恢复、加强和扩大过程加快了。恢复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及其

组织,在寻找因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而动荡不定的新国家中工人阶级面临的问题的答案方面,思想分歧扩大了。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社会民主党及组织的领导人采取的方针是: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参加国民议会,参加国家一级和省一级的资产阶级政府及议会(内阁主义)。这种方针没有得到党员的赞同,结果造成了这些党的分裂。在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中占主导地位的方针是,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在此基础上在新国家的范围内实现工人运动的政治联合和工会联合。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拒绝参加1919年2月在伯尔尼举行的旨在恢复第二国际的国际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革命的浪潮也席卷了各阶层的青年。在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青年运动,其斗争性同多数恢复起来的或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大相径庭。在1918年和1919年初,大学生社会主义俱乐部就已经有了共产主义性质。在列宁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的影响下,根据社会民主党内某些党员和曾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回国人员的倡议,于1919年初在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许多地区建立了地下共产主义小组。尤其是菲利普·菲利波维奇以及许多其他人士,在传播革命思想、建立主张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主义小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11月初,在莫斯科成立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共产党(布)。该党党员于1919年3月9日在斯特拉日洛沃成立了地下的南斯拉夫佩拉吉奇派共产主义革命联盟(佩拉吉奇派联盟)。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3月21日~8月2日)的影响下,该组织在伏伊伏丁那、斯拉沃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塞尔维亚部分地区采取了从组织上、军事上和政治上为扩大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的行动。在匈牙利,为了同一目的,以伊万·马图佐维奇和拉扎尔·武基切维奇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派也进行了活动,他们在匈牙利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几千名南斯拉夫人中间散发社会主义宣

言、传单、小册子和自己的《红旗报》。《红旗报》于1919年4月至7月在布达佩斯用拉丁字母和基利尔字母交替出版，发行8000至25000份。

在资产阶级疯狂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声中，革命的工人运动陆续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斯普利特的《工人报》后改名为《解放报》）、萨拉热窝的《自由之声》、贝尔格莱德非常有影响的《工人报》、波热加的《人民意志报》、武科瓦尔的《工人卫士报》。1919年1月1日在萨格勒布创办的涉及“各种文化问题”的杂志《火焰》半月刊上，年轻的文学家奥古斯特·采萨雷茨和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自豪地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局限性。他们认为，社会革命将带来新的和人道的文明。他们把革命解释为道义上和文化上的绝对要求，并在伦理和文化范畴内宣传了革命。鉴于资产阶级反共运动的性质，这样做是极其必要的。他们更多地是启示性的革命宣传者，而不是对现实的直接革命前景的分析家。克尔莱扎——特别是注重思想分析的采萨雷茨揭露了资产阶级的神话、自我欺骗及其阶级利益的局限性，通过对南斯拉夫社会现实的批判真正说明了发生革命的原因。该杂志反对资产阶级的各种价值观，反对重新评价旧传统，指出了民族的真正价值。尽管该杂志客观上受到了各种限制，但是通过它的媒介作用在文化领域有力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1919年1月，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提出了在阶级斗争纲领的基础上把工人运动(党和工会)联合起来的倡议。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总部接受了召集“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成立代表大会的委托，并于1919年2月初宣布，只有主张阶级斗争和准备放弃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的组织和个人才能出席代表大会。南斯拉夫佩拉吉奇派共产主义革命联盟从一成立起就参加了这一行动。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社会民主党左派表示赞成在阶级斗争纲领基础上实行联合。该左派的行动委员会于1919年3月接过了该党萨格勒布组织的领导权；接着达尔马提亚的

社会主义者在3月底举行的省代表会议上表示支持联合；被意大利占领的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4月初表示支持联合；黑山和马其顿在此之前建立起来或恢复起来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也支持联合；巴纳特、巴奇卡和巴拉尼亚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于3月24日在苏博蒂察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表示支持联合；塞尔维亚族和布涅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塞尔维亚族和布涅族鼓动委员会4月13日在诺维萨德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表示支持联合。在法国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也表示赞成建立统一的革命的工人党。3月底，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以及佩拉吉奇派联盟的代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事先协商。

在为实现领导工人阶级运动的党的统一作准备的同时，也为工会的联合和建立与党紧密相联的统一的工会组织进行了准备。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伏伊伏丁那、达尔马提亚的工会以及黑山和马其顿的工会组织都表示支持联合。各方商定，统一工会的代表大会与党的代表大会同时举行，代表主要由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兼任。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总工会联合会以及斯洛文尼亚行业委员会的领导人，不同意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主张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保持工会运动广泛的地区特点。但是，克罗地亚独立的行业联合会为此于1919年1月16日成立了一个新的跨行业的组织——行业联合会联盟。这个组织成了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社会民主党中反对该党领导人所实行的内阁主义政策的力量的据点。

1919年4月20~23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联合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432人，他们代表了除斯洛文尼亚以外的全国各地工人阶级运动约13万名有组织的成员。尽管斯洛文尼亚的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内部有人对内阁主义提出过批评，但该党领导人还是阻止了斯洛文尼亚代表出席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代表中也有工人运动中事先曾声明反对内阁主义的改良派代表。

代表大会进行过程中围绕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观点发表了截然

相反的主张,展开了论战和讨论。大会通过了《联合的基础》。这个文件采纳了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总则部分,而这个部分又来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文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进入最后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在导致伟大的社会革命,正在为即将建立“共产主义经济”创造条件。这个文件强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摧毁旧的政权机构和建立纯粹工人阶级的政权”,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新成立的党的名称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党的政治战略以阶级斗争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为基础。在这场革命中,工人阶级天然的阶级盟友是无地农民和贫苦农民。文件指出了国内反动政策的阶级实质,号召人们进行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谴责了内阁主义。文件批判了实现国家联合的方式和形式及其提出者,还批判了南斯拉夫资产阶级在巴尔干、欧洲和世界反革命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联合的基础》指出,第二国际的发展不能适应历史形势的要求。因此,新成立的党决定参加共产国际。

党确定了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战略方针以后,没有制定出相应的具体革命纲领。在《实际行动纲领》中,要求实行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政治平等和法律平等,20岁以上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谈到了税收政策,社会政策和文化政策。总起来说,《实际行动纲领》的意图是要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长期的阶级斗争,却没有向工人阶级提出直接的革命要求,也没有看到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农业国家中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认为,从国家法意义上讲,1918年解决了民族问题,党主张建立一个设有省、州和区地方自治机构的统一的共和政体的国家。党认为,这种国家体制是消除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历史上产生的分歧,把三个“部族”融合为一个民族以及成功地进行阶级斗争的最

适宜的形式。党认为国家的联邦制具有分裂工人阶级本身和分裂工人运动的危险，这种制度在出现无产阶级革命前景的情况下尤其不能接受。党认为南斯拉夫人民的民族统一是成功地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同时还认为，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而且南斯拉夫国内的革命是与巴尔干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来，在这个因深刻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革命斗争而动荡不定的国家里，民族运动依然处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革命战略之外。《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主要局限于要求把封建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和要求取消封建关系。确定了建立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的阶级阵线的方针，而不是建立广泛的工农联盟的方针。可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在成立代表大会上就民族问题、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采取的方针，在当时国内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下是没有出路的，这种方针更多地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遗产和十月革命的经验的混合物，是改良主义思潮和革命思潮妥协的反映。

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抗议取消公民自由和限制国内的革命工人运动，抗议南斯拉夫资产阶级对俄国和匈牙利的苏维埃共和国充当反革命角色，抗议它准备参加针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外国军事干涉。要求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地承认俄罗斯、匈牙利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并与它们建立友好的关系。

根据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是统一的党，而不是各党的联盟。最高领导机关是代表大会和党中央委员会，所有其他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地区执行委员会、议会党组、党的出版机关)都从属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规定在贝尔格莱德建立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地区执行委员会，在诺维萨德建立巴纳特、巴奇卡和巴拉尼亚地区执行委员会，在萨格勒布建立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地区执行委员会，在卢布尔雅那建立

斯洛文尼亚地区执行委员会，在萨拉热窝建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黑山地区执行委员会，在斯普利特建立达尔马提亚地区执行委员会。地方党组织的地区性结构仍保留下来。党和工会保持密切的联系，这表现在它们的领导人可以互相参加对方的代表大会，互相派代表参加中央和地方的领导机构。除此之外，党章还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同工会中央理事会管理机关的联席会议是可以就无产阶级的所有总的阶级行动、经济行动和政治行动作出决定的中央机关。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了由31名委员组成的党中央委员会，由9名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菲利普·菲利波维奇和日夫科·托帕洛维奇当选为书记，弗拉迪米尔·乔皮奇当选为组织书记。

在党代表大会期间，几乎还是这些代表于1919年4月20日和23日举行了工会联合代表大会。工会代表大会主张根据不妥协地进行阶级斗争和党与工会相互联系的纲领，实现工人工会运动的统一。建立了南斯拉夫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作为国内联合起来的阶级工会运动的中央机关，决定在3个月内把各地区的行业联合会联合成统一的工会联合会。接受党代表大会关于党和工会机关的组织联系的决定和关于建立党和工会共同的地方委员会的决定。没有参加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有：斯洛文尼亚行业委员会，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工人总联合会和一些比较小的地区行业组织，以及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垮台以前曾属于匈牙利全国工会联合会的巴纳特、巴奇卡和巴拉尼亚的革命工会。

4月20日，在联合代表大会第一天的工作结束时，举行了妇女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代表会议。会上把各地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联合成统一的妇女运动，选出了中央书记处，通过了章程。章程规定建立省和地方书记处，并决定创办妇女社会主义者机关刊物《平等报》。

在联合代表大会上没有讨论关于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倡议，而这种组织已经陆续在国内外出现。在十月革命和国

际工人运动浪潮的影响下,1918年11月中旬,南斯拉夫留法学生中的社会主义者在巴黎成立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主张进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1919年2月,在萨格勒布大学建立了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协会,它在促使青年学生关心政治方面产生了影响。1919年3月初在萨格勒布成立了学生中央联合会。从南斯拉夫四面八方到贝尔格莱德参加党的联合代表大会的大学生社会主义者召开会议,决定自1919年4月18日起,大学生社会主义俱乐部改名为共产主义俱乐部,并把俱乐部活动扩展到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中去。此外,联合代表大会也决定,委托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妇女部主管少年工人的教育和组织工作。妇女部为此组织了“未来”儿童团,并从1920年2月起发行了同名的儿童报。

1919年夏,南斯拉夫留法学生归国后,大多参加了贝尔格莱德大学和萨格勒布大学的大学生共产主义俱乐部的活动。1919年初秋,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中央执行委员会某些委员的支持下,大学生共产主义者着手筹备把在萨格勒布举行的南斯拉夫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变为创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大会。由于代表大会推迟召开,在1919年10月10日举行了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组织,它通过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的各级委员会中的代表,与党进行联系。会议选出了临时中央委员会,设在萨格勒布。不久,在卢布尔雅那、贝尔格莱德和萨拉热窝都成立了南斯拉夫共青团的省级领导机构。11月底,南斯拉夫共青团派代表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同年12月1日,创办了南斯拉夫共青团机关报《红旗》。

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领导中的反对派(“钟声派”)和斯洛文尼亚的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都不赞成工人运动联合的倡议。他们反对建立统一的工人党,认为工人运动组织中的联邦制最符合各地

区的“部族”特点。他们反对把各地的行业联合会统一为按工业部门组织的统一工会，并利用自己的影响阻止当地工会组织参加工会中央理事会。尽管如此，1919年9月底，在萨格勒布的代表大会上还是建立了南斯拉夫交通运输职工联合会。斯洛文尼亚的铁路工人也加入该工会，从而使它的会员达3.1万名。巴纳特、巴奇卡和巴拉尼亚工会于1919年底和1920年初，斯洛文尼亚行业工会委员会于1920年3月相继加入了工会中央理事会。

1920年4月，克罗地亚的内阁主义派和伏伊伏丁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持类似观点的代表人物（“钟声派”）建立了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和斯洛文尼亚的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领导一样，执行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政策，在工人中没有多大政治影响。相反，这些党同资产阶级政党以及政权机关合作，致使它们越来越失去工人阶级的信任。

置身于南斯拉夫统一的革命工人运动之外的还有一部分马其顿社会主义者和尤利地区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社会民主主义者。尤利地区（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特拉）在1921年1月并入意大利之前受意大利占领当局统治。1919年4月6日，这些人在地区代表会议上建立了独立社会党，表示支持十月革命的原则和策略，后来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的规定，于1919年9月参加了意大利社会党（意大利社会党从1919年3月起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但同时强调指出，这并不妨碍实行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尤利地区的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也这么做了。

1920年在意大利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和在反抗意大利占领当局的过程中，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一运动也波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农民。1920年2月，在的里雅斯特出版了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报纸《劳动报》，该报从1921年起作为共产党的报纸合法发行到1926年。尤利地区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群众主要属于社会上受威胁的阶层，同时又属于面临被同化的威胁的少数

民族,这一事实对他们的革命运动高涨具有决定性影响。1920年9月组织的总罢工是意大利占领工厂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反对法西斯白色恐怖,拉宾的矿工举行罢工,并占领了矿井(1921年3月2日~4月8日的“拉宾共和国”)。爆发了普罗什蒂纳(普拉附近)和马雷集格(科帕尔附近)的农民起义。这是在南部斯拉夫民族地区同法西斯主义的首次冲突。1921年1月21日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后,尤利地区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者,除极个别外,都参加了意大利共产党。

2. 革命工人运动的壮大和 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

革命工人运动的高涨。与改良主义者的思想冲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共产主义方针的胜利。同“中派”决裂。立宪议会选举。

1919年,在欧洲各地发生革命动荡的气氛下,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经常发生农民同地主以及政权机关的冲突,接连掀起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工人罢工运动不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资产阶级被迫作出暂时让步:增加工资,通过八小时工作日的法令,并同意在招工时必须经工会介绍。

许多地方举行抗议集会,群众纷纷参加集会,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和匈牙利,反对迫害工人运动和加重本国工人阶级的困难处境。

1919年7月20~21日,为了响应欧洲无产阶级关于制止外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号召,同欧洲许多国家所采取的行动一样,在南斯拉夫也成功地组织了表示无产阶级声援行动的抗议集会和总罢工。尽管当局采取警告和逮捕措施,查封大量工人之家,禁止集会和游行,但各种工人运动

组织的工人，包括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工人，仍然大批地参加罢工。主要由于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这次群众性行动，同时也由于同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的东、西边界形势日趋严重，政府才没有派整装待发的部队参与反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总罢工之后，紧接着于7月22~24日，驻在马里博尔、瓦拉日丁和比托利的军队发生哗变，但被暴力镇压下去。在奥西耶克也准备举行旨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起义行动，但因暴露而未果。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扼杀之后，国际主义的声援行动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很多匈牙利革命者跑到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革命工人那里避难。

政府看到工人阶级运动的壮大，特别是工人革命党的建立，便在1919年五一节庆祝活动前加强了对工人革命运动的压制，禁止在公共场所集会和游行。许多地方当局解散了工人组织，封闭了工人之家。4月30日，党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针对禁止五一节庆祝活动组织了抗议性总罢工，结果当局逮捕了包括大部分党和工会省级领导人在内的约2000名工人，解散了所有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封闭了这些组织的房屋和工人之家，没收了它们的财产和档案，禁止党报《自由之声》出版。这种情况使得党和工会一部分领导人在1919年年中党和工会组织恢复之后产生动摇，倒向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中派”。其他地方也同样发生了逮捕、搜查和封闭工人之家的事件。5月在斯洛文尼亚还设立军事法庭。5月底和6月初，贝尔格莱德、诺维萨特、萨格勒布、奥西耶克等地很多省级领导人遭逮捕。7月，当局禁止在伏伊伏丁那和黑山创办党的报纸。7月和8月初，马里博尔和瓦拉日丁的兵变遭镇压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扼杀之后，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伏伊伏丁那和塞尔维亚的革命工人运动不断受到迫害。宪兵人数由1万增至2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的书记弗拉迪米尔·乔皮奇和菲利普·菲利波维奇在贝尔格莱德被捕，并被押送到萨格勒布。菲利波维奇被监禁5个月。许多工会组织被解散，《真理报》、《火焰

报》和其他一些工人报刊被查封，200多名党的领导人被捕，其中大部分未经审讯即被投入监狱，直至1919年底才获释。有5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革命联盟(佩拉吉奇派)的领导成员被指控准备革命而遭逮捕，并于11月被判处6年苦役，该地下组织因此中断活动。

党认识到选举前活动的政治意义，根据党组织内普遍讨论的意见，决定参加1920年3月在克罗地亚和黑山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根据党的最高革命纲领，在区议会选举指导原则的宣言中，就参加选举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强调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党在各区的全部工作应当是使劳动人民相信，只有掌握了国家政权，才能把地方公社变成自己的机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在许多城市和农村(萨格勒布、斯拉沃尼亚布罗德、杜加雷萨、纳希采、维罗维蒂察、奥西耶克、武科瓦尔、克里热夫齐、卡尔洛瓦茨、斯普利特、希德、泽蒙、波德戈里察和海滨的佩特洛瓦茨)获得绝对多数或相对多数的选举席位，仅萨格勒布就获7000多张选票，克罗地亚有490名共产党人当选为议员。这些成绩使资产阶级大吃一惊，他们无法容忍共产党的选举胜利。先是萨格勒布政府，然后是整个克罗地亚的省政府停止了市长和共产党议员的职务，有些地方甚至逮捕共产党议员或宣布选举无效。这样，共产党人只在一些地方掌握了区议会的管理机构。

区议会选举后不久，1920年4月15日夜间和16日凌晨，铁路工人在党和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下，举行了总罢工。这是对政府企图取消交通运输部门职工过去已经取得的权利的回答。运输业和造船业工人也加入了铁路工人罢工的行列。这是1920年南斯拉夫工人阶级采取的最大和最激烈的经济和政治行动，共有5万多工人参加，全国交通完全陷入瘫痪状态。政府为了镇压罢工动用了宪兵和军队，4月18日宣布实行铁路军管，对全体铁路员工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军训。一些地方还成立了军事法庭。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禁止一切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集会，约3500名铁路员工被解雇。然而，党和工会的领导在反对当局粗暴

镇压罢工者方面缺乏统一和坚决的行动。工会中央理事会领导拒绝了邮电工人参加铁路工人罢工的要求,并结束了造船业和烟草业工人的罢工。为声援铁路工人,预定举行两天抗议总罢工,但结果仅在几个地方举行,影响有限。工人在特尔博夫列还夺取了地方政权,当局对罢工动用武力,军队占领了特尔博夫列矿区。1920年4月24日,宪兵在卢布尔雅那的扎洛什卡大街向罢工者开枪,打死工人13名,打伤40名。这样,铁路工人的罢工被镇压下去,4月29日停止罢工。

在镇压了铁路工人总罢工和未遭重大反抗就停止了共产党获胜的许多区管理机构的活动之后,当局更壮了胆,下令禁止五一节庆祝活动,并作为预防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伏伊伏丁那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会运动参加者。在达尔马提亚逮捕了党和工会领导人,查封所有的工人之家,禁止各种革命工人组织的活动,禁止出版党报《解放报》,无理指控共产党员为意大利的代理人。

截止1920年年中,全国共举行600多次罢工,参加人数超过25万,除手工业工人以外,越来越多的工矿产业工人和运输工人参加罢工。在一些城市中组织了工人总罢工。为反对当局禁止出版工人报刊和禁止集会,反对逮捕共产党员以及其他镇压和迫害措施,工人阶级组织了抗议集会、罢工和游行来对抗。为抗议镇压几千名铁路工人的罢工和在塞尔维亚东部逮捕工人领袖,1920年2月5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总罢工。1920年4月中旬,诺维萨特的工人也以同样方式抗议查封工人之家。

尽管大规模逮捕使一些地方党的有组织的活动暂时有所削弱或中断,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在这些阶级冲突中得到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加强。1919年这一年内,在马其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成立了许多党组织。1920年1月7~8日在斯科普里举行的省党代表会议上,选出了马其顿和旧塞尔维亚的省书记处作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省执行委员

会的机构。会议还决定重新出版《社会主义曙光报》。该报于1920年2月1日开始用塞尔维亚文和土耳其文发行。1920年1月7~8日在诺维萨特召开党和工会代表大会,有27个地方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派出的98名代表出席,大会选出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伏伊伏丁那省执行委员会和工会理事会省执行委员会,并决定在大贝奇凯雷克(兹雷尼亚宁)发行匈牙利文的党报《众愿》,在诺维萨特出版《工人报》。

当时,党完全是按地域原则组织起来的,而阶级斗争主要在一些企业和经济部门中开展,为适应斗争的需要,党采取了某些组织调整措施。一些地方党组织开始在企业 and 工厂中建立党的基层单位。1920年上半年建立了许多农村党组织,尤其在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共有268个组织,约5000名党员)。在其他省,党在农村的影响也扩大了。巴尼亚卢卡出版了向农村发行的党的周刊《人民之声》。然而,党与农民的联系因当时没有提出土地纲领而受到影响。

党支持建立青年组织,使当时在组织上分散的青年工人和知识青年联合起来。1920年4月初,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共有3000名团员。1920年5月中旬,根据南斯拉夫共青团的倡议,在维也纳秘密召开东南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1920年6月10~14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南斯拉夫共青团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团的纲领指出,共青团忠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的目标和政策。当时,南斯拉夫共青团共有28个组织,约5500名团员。

随着党的队伍的扩大,党加强了对党员和整个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党和工会的报刊、许多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和时事政治书籍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贝尔格莱德出版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的中央机关报《工人报》,月发行量45万份;在萨拉热窝出版《自由之声报》,月发行量15万份。此外,还恢复或出版许多新的党报和杂志。1920年年中,共出版18种

共产党报刊，月发行量达74万份，到1920年底，共出版38种党和共青团报纸，14种工会报纸，出版时间各有长短。在30多个地方办了党校和训练班。

在革命运动震荡着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情况下，党同内阁主义划清了界限，并主张使南斯拉夫工人运动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纲领下完全联合起来，这反映了党在思想上成熟的过程。在激烈的阶级冲突时刻，内阁主义者主张同政府当局合作，这就很快使自己在工人阶级中陷于孤立。在斯洛文尼亚的工人运动中，主张阶级合作的人也不得不收敛起来。1919年3月初，革命力量建立了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工人党，开始出版《联合报》。1920年3月，卢布尔雅那大学的学生建立了学生共产主义者协会。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工人党（当时约有1.2万名党员）在1920年4月11日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参加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与此同时，在马里博尔举行的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决定退出第二国际，并参加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但后来并没有这样做。从1920年5月中旬起出版了《红旗报》，作为斯洛文尼亚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的机关报，以取代原先的《联合报》。

尽管与内阁主义派的冲突很快顺利结束，党已成为广泛的和战斗的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但党的发展仍然落后于工人运动的发展。1920年春当发生声势浩大的阶级冲突时，在社会其他劳动阶层也参加了工人的革命运动，在党对工人阶级有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下，党的领导却在反对资产阶级方面表现不坚决，也没有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方针同农民运动和民族运动等敏感的革命问题联系起来。部分领导人是改良主义者（“中派”），他们原则上赞成阶级斗争，但是随着阶级冲突的加剧，他们对估计国内外社会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对确定阶级斗争的直接目标和长期目标，对评价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意义，特别是十月革命经验的意义，越来越

多地采取机会主义立场。

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思想分歧,特别是“中派”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思想分歧,对加深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内的思想分歧也产生了影响。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受阻后,社会民主派和“中派”以此证明他们关于不可能走武装革命道路的旧观点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共产国际鼓励其成员像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那样,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加强思想和组织建设,并在同一原则基础上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思想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本着这种精神,共产国际为下届代表大会起草了自己的纲领和章程,并要求同其他思想流派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明确划清界线。1920年1月中旬,在索非亚举行的第三次巴尔干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建立了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3月,共产国际在《告巴尔干各国共产党书》中指出,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对这些党制定反对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政治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1920年春,正当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发生重大阶级搏斗的时候,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内的思想分歧变成了共产党人和“中派”之间尖锐的思想冲突和政治冲突。为准备党的代表大会,在党的报刊上就党的基本纲领和组织问题展开了全党讨论,并对争论的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党的领导公布的代表大会文件草案,要求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能够在共产国际纲领的基础上和范围内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持共产主义观点的人中最突出的是日夫科·约万诺维奇、菲利普·菲利波维奇、西马·马尔科维奇、久罗·茨维伊奇、拉伊科·约万诺维奇、莫沙·皮雅杰。他们证明,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存在着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社会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因此需要有一个在思想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需要把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最紧密地结合起来。

与此相反,“中派”在思想上以奥地利、德国和法国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理论家为榜样,强调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

尼亚人王国是一个工业不发达国家，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因此只有资本主义社会逐步发展才能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此外，革命的成败将取决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因此，他们主张缓和阶级斗争，在工人队伍中散布动摇、沮丧和失败主义情绪，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中派”的主要思想家是日夫科·托帕洛维奇，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塞尔维亚的米洛拉德·贝利奇和卢卡·帕维切维奇，克罗地亚的米约·拉多舍维奇、弗拉迪米尔·博尔奈米萨、盖伊扎·布鲁德尼亚克和约瑟普·奥弗查里切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斯雷滕·亚克希奇和约沃·亚克希奇。改良主义者占优势的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省工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张割断党和工会的联系，最坚决地反对党和工会的代表大会同时召开。

1920年6月20~24日，在武科瓦尔召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共产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之间划清界线的气氛中举行的。两者在表面统一的党内，各自对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持不同的态度。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74名代表，代表800多个组织和代表机构的6.5万名党员。当时统一工会有20.8万名会员。

这次代表大会否决了“中派”提出的反建议，通过了共产主义者提出的党纲和党章草案以及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并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党。

党纲的基础是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党纲认为，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根据这个纲领，南斯拉夫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将为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即为建立南斯拉夫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这个共和国将加入巴尔干—多瑙河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纲领提出，将建立“人民军队和红军”，实行剥夺剥夺者并使生产和商业社会化，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债务。纲领宣布，共产党为实现自己的纲领目标，将根据情况和需要使用所

掌握的一切手段；但同时又强调，“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大多数以明确而坚定的意志和有力的支持来表明拥护共产党人的纲领、目标和斗争手段以前”，不会夺取政权。在通过革命的纲领和决定采取革命的阶级斗争手段的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也同意参加资产阶级的代表机构，但仅仅是为了宣传党的纲领，揭露阶级矛盾和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教育。

根据这一纲领性方针，《关于政治形势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认为，资产阶级反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冲突是南斯拉夫形势也是世界形势的特点；决议中强调指出，党的基本任务是：宣传革命，在国内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联盟，建立巴尔干—多瑙河国家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保卫苏维埃俄国，宣传无产阶级民主以及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新形式。但是，这次代表大会没有采纳共产国际的忠告：南斯拉夫国家具有多民族的特点，在这样的国家里民族问题应在共产党的政策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相反，南斯拉夫共产党继续主张捍卫民族统一的思想，认为通过建立南斯拉夫国家，民族问题就解决了。在党的组织结构方面，也只是暂时考虑历史的民族省的特点（当时已存在省政府）。党要求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平等，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捍卫和扩大工人阶级的权利和成果，使整个流通国有化，保护残疾者和战争孤儿，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办法是没收所有的大地产，并无偿分给由真正耕种土地的农民组成的农民协会。

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实行完全集中化，撤销省的执行委员会，成立州委员会和书记处（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委派，作为执行党的政策和沟通党的领导同地方党组织联系的机构）。党章还规定，党中央委员会有31名委员，由每年举行的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的一切机关都服从中央委员会。对接受新党员规定了更严格的标准：只有参加统一工会的雇佣工人经申请就能入党，其他人入党规定有特殊的条件。党和工会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保持密切联系。

“中派”要求把党纲推迟到下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并提出纲领性宣言(提案人是德拉吉沙·拉普切维奇)同共产主义者的纲领相对抗。宣言的重点是开展工会教育活动和进行社会改革。“中派”也不同意对形势的估计和党规定的任务,强调在经济落后的南斯拉夫,革命力量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提出直接夺取政权的任务。他们反对党组织的集中化和党同工会存在组织上的联系(尤其反对把地方委员会作为地方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共同管理机构)。

在选举党中央委员会时,赞成共产主义者候选人的有242票,63票反对,69票弃权;塞尔维亚的德拉吉沙·拉普切维奇的支持者和萨格勒布党组织的几名代表在表决前就离开了会场。大部分斯洛文尼亚代表在表决党的纲领性文件时弃权,表示需要在全体党员中就此征求意见,后来也照此办了。这样,在武科瓦尔党代表大会上当选的均为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帕夫莱·帕夫洛维奇和亚科夫·拉斯特里奇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西马·马尔科维奇和菲利普·菲利波维奇当选为书记。

以米约·拉多舍维奇为首的克罗地亚“中派”不接受党代表大会的任何决定,主张按联邦制建立党组织,并继续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的名称进行活动,把《新真理报》作为机关报。于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克罗地亚开始出版新的党报《新世界》。1920年8月中旬在工会联合会管理机构代表会议上通过工会运动集中化的决议,选举了新的省工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并由它出版新的《工人报》。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中派”仍留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力求在党组织内部排除共产主义者的影响。1920年7月上半月,比较顺利地结束了过去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省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唯有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中派”的省党委员会和省工会理事会直至8月底才被撤销。

与此同时,在工会中就工会运动完全统一的问题同改良主义者的冲突也接近尾声。6月初,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省工会理事

会表示反对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党代表大会同时在武科瓦尔召开,理由是工会代表大会只有在全国现有的工会完全统一之后才能召开。因此,工会代表大会推迟举行。1920年6月27~28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工会代表会议,讨论工会组织和工会联合会统一中的争论问题,并通过了《统一的解决办法》,其中规定工会运动按行业在集中制的基础上统一,并于1920年10月底完成。新的工会联合会从1921年初开始工作。工会中央理事会接纳了斯洛文尼亚的工会运动,并于1920年12月开除了改良主义的行业委员会,另外成立了斯洛文尼亚省工会理事会。在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工会的力量超过了改良主义者工会。

1920年下半年,激烈的阶级斗争继续发展。针对接连不断的违反集体合同和迫害革命工人运动的行为(这些行为在达尔马提亚和伏伊伏丁那表现得尤为严重),在斯普利特和大贝契凯雷克举行了抗议性全面罢工。党和工会的中央领导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抗议集会,反对企业主降低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

1920年8月共产党在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区议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尽管“中派”拒绝了贝尔格莱德和其他一些地方共产主义者关于联合行动的建议。“中派”强调,“只要不公开和正式改变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只要“在党的各级机构中”不放弃“一致性原则”,就不愿进行合作。共产党人在城乡37个区中控制了区管理机关(贝尔格莱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沙巴茨、瓦列沃、莱斯科瓦茨、乌日策、皮罗特、斯科普里、韦莱斯、库马诺沃、卡瓦达尔齐和贾科维察等地)。在许多城市和农村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区管理机关,并存在了数月之久。在贝尔格莱德以菲利普·菲利波维奇为首的共产党候选人名单获得了多数选票,但内务大臣作出特别决定撤销了共产党领导的区管理机关。

1920年7~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党内改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多数派的分裂加深了。在共产国际的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章程和工人阶级政党加入共产国际组织的

“二十一项条件”。共产国际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有着为扩大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的战略，其革命前景是建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代表大会规定了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义务，规定共产国际有权发布指示，监督各支部的活动，修改或撤销各支部党代表大会和领导机构的决议。1920年9月底，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中派”要求党中央公布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特别是“二十一条”，并就此在党内展开讨论。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正准备参加立宪议会选举。这次选举是在国家统一两年以后国内形势和国家的国际地位有所稳定的情况下宣布的。1920年10月底，“中派”不同意因准备立宪议会选举而推迟党内讨论，便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我们的争论问题——南斯拉夫共产党反对派的宣言》。他们对武科瓦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异议，攻击党的领导机构，指责共产国际在工人运动中制造分裂，否定布尔什维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他们把十月革命称为不明智的行动，把世界革命的命运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变革联系在一起。他们还把议会斗争方法绝对化，反对采取革命行动和经常罢工，认为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恰恰应当通过教育活动、社会改革和参加议会生活为群众参加革命作准备。他们要求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来讨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德拉吉沙·拉普切维奇退了党。1920年11月底，“中派”又发表了一本小册子：《我们争论的问题述评》。由于“中派”进行上述活动，1920年12月决定把他们开除出共产党。南斯拉夫工人运动中思想分化和政治分化过程的第一阶段就结束了。“中派”最初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义进行活动，1921年12月和社会民主党人合并成执行反共的机会主义政策的南斯拉夫社会党。这样，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冲突和互不相容就成为他们彼此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并对工人运动的状况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斯拉夫共产党根据1920年春、夏在区议会选举中的经验，为了准备参加立宪议会选举，于10月1日发表纲领性竞选宣言，并根

据武科瓦尔党代表大会决议和共产国际的建议,提出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和最高纲领,组织了近千次集会和公众政治讨论会,有50余万人参加。在许多城市和农村,尽管当局逮捕组织者和报告员,临时禁止或推迟预定的集会,党仍然分批召开了若干次竞选集会。共产党人在会上解释阶级斗争的性质和必然性,严厉批评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抨击当局和资产阶级政党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切身问题所持的态度以及它们对革命工人运动的态度。《工人报》出版了《共产主义农村》副刊。通过选举前的政治活动,共产党人不仅在工人中,而且在农民中以及在少数民族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在马其顿和黑山更是如此。党建立了约100个新的组织和代表机构,加强了妇女组织、南斯拉夫共青团和工会运动。党员人数超过7万,而工会中央理事会拥有25万名会员(包括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

针对共产党的竞选活动,资产阶级政权机关对共产党采取了镇压措施。警察和宪兵被授予特别权力,共产党组织的竞选集会经常被禁止或驱散,遭逮捕和受迫害的不仅有报告员,而且有共产党提出的议员候选人。党的书记菲利普·菲利波维奇也被关押了一段时间。

在马其顿、黑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南共马其顿和旧塞尔维亚地区书记处书记泽夫·留什·马尔库在贾科维察被捕,并于12月初在狱中被害。当局还从马其顿和伏伊伏丁那驱逐了很多共产党员。

1920年11月28日进行了立宪议会选举,参加投票的仅有1607265人,占登记选民总数2480623人的64.95%^①。根据选举法,只有年满21岁的男子才有选举权。除了军官和士官外,有权选择民族国籍的少数民族(匈牙利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都没有选举权。共有22个政党参加选举,选举结果共产党占第

^① 原文如计,据计算应为64.79%。——译者

三位,得了198736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2.36%,在总共419个议席中获得了59个(被确认的有58个)。获得选票和席位较多的有民主党(319448张选票,92个席位)和人民激进党(284575张选票,91个席位)。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在选举中得选票230590张,席位50个;社会民主党得选票46792张,席位10个(包括同共产党和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左派联合提名的候选人获得的一个席位在内)。共产党最杰出的领导人被选为国民议员。1920年12月成立了共产党国民议员俱乐部。

3. 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取缔

1919~1920年间革命工人运动的加强和扩大,成千次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罢工和政治行动,特别是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出乎意料的胜利,都使资产阶级及其政权机关深感不安。1920年12月15日摄政王亚历山大和大臣会议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在发生骚乱、罢工和暴动的情况下对铁路实行军管。12月17日,斯洛文尼亚1万名矿工开始罢工。21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约7000名矿工在工会和共产党领导下发起罢工。12月24日摄政王和大臣会议又通过对矿井实行军管的法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罢工是政府违反它本身所签订的提高工资的协议而引起的,但政府却宣布罢工是颠覆活动。当局把布雷扎、克雷卡、图兹拉和泽尼察的矿工家属从国家宿舍迁出,征召波斯尼亚矿工入伍,用武力镇压罢工。克雷卡300多名外地来的矿工(主要是斯洛文尼亚人)和罢工委员会一起撤到图兹拉附近的胡辛诺和别的农村。矿工对军队、宪兵和“人民卫队”企图赶走“外来工”和强迫当地工人复工的行为进行反抗(胡辛诺暴动),但在1920年12月17日遭到血腥镇压,打死7人,几十名矿工和农民受伤,约350名罢工者被关进集中营,还逮捕了约400名罢工支持者。警察和宪兵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矿工的残酷镇压激起全国各地——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诺维萨

特、弗尔德尼克、阿莱克西纳茨、塞尼等地——工人的普遍愤慨和抗议行动。12月28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工人抗议集会，两天后部分地区举行了总罢工。

由于政治形势异常尖锐，又害怕工人采取新的抗议行为会导致被压迫者和无权者的公开暴动，大臣会议于12月29日夜间，以共产党准备政变为借口颁布“通令”，在新宪法通过之前禁止一切共产党宣传，解散共产党组织，禁止出版共产党报刊和文章，查封工人之家和共产党的机关，没收其档案和财产，规定对共产主义的口头或书面宣传活动将处以徒刑。“通令”责成一切政权机关对共产党领导人采取严厉措施，把一切“参与和扩大动乱”的外籍人驱逐出境，从国家机关中解雇那些“继续进行布尔什维主义宣传”的人员，对共产党大学生不再给予资助。

共产党报纸《工人运动》刚出第一期，即在1921年1月2日被取缔。1921年1月20日印发了共产党国民议员俱乐部公报。当局劫走了党和工会的全部档案，没收了党和革命工会的财产。凡参加共产党的官员和职员均被开除出国家机关，私营企业职工中的共产党员也被解雇。许多教育工作者因参加共产党而被免职，或者被怀疑同情共产党而调动工作。一些地方当局没收了农民党员在土地改革中分得的土地。凡是1920年曾是共产党员、选举中投共产党候选人的票、或保存共产党选举投票箱的农民，都被当局从农业受益者的名单中勾销。有些地方参加共产党的手工业者被吊销营业执照。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和许多党员都受到警察监视。在党组织比较强的许多城市和农村实行宵禁，有些地方还戒严。

这些措施是在世界革命风暴逐渐平息和南斯拉夫的国际处境相对稳定的背景下，资产阶级对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壮大的一种回答。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已成为欧洲人数最多的共产党之一。作为南斯拉夫革命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共产党已经构成资产阶级政权稳定和资本主义大肆剥削的严重障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武科瓦尔纲领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

国的宪法草案——正如内务大臣米洛拉德·德拉什科维奇后来在立宪议会上所强调的——是彼此水火不相容的。

共产党领导对“通令”的颁布感到突然,但又认为这是临时性的过渡措施。党的领导受议会选举胜利的影响,没有估计到当局会对党采取如此规模的暴力措施,因为党不仅在工人阶级中,而且在一部分农民、城市贫民和中等阶层中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在同阶级敌人的这场搏斗中,党的领导仍想继续采取议会合法斗争的手段,其实阶级敌人在清算共产党时自己早已放弃了这一手段。共产党的领导没有考虑以革命的压力措施反对“通令”,而是要求政府向立宪议会作出解释。党的领导徒劳地力图证明:关于准备政变的指控是捏造的,党并没有越出合法的范围。然而,要求取消“通令”、向共产党和工会赔偿损失和政府出庭受审的提案均被否决,尽管社会民主党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的议员也抨击了“通令”。

在共产主义运动被取缔时,党没有能力采取革命行动,也没有建立起采取革命行动的秘密机构,虽然党早先已多次遭受迫害,工作受到了影响。

正因为如此,反抗“通令”的行动是零星的。唯独1920年12月31日在萨格勒布举行了有近万名工人参加的总罢工,罢工者同军队和宪兵发生冲突,一百多名工人受伤,几百名工人被捕。武科瓦尔工人为了保卫工人之家同警察发生冲突,一位党的领导人斯捷潘·苏潘茨被杀害。当局在未遇到多大反抗的情况下就一手破坏了党和工会组织,因为这些组织没有准备采取群众性的行动来反抗暴力。只有个别组织仍在秘密地或改头换面地坚持工作。立宪议会中共产党国民议员俱乐部和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区议会管理机构是党保存下来的仅有的合法据点。

斯洛文尼亚的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和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都谴责了“通令”,但他们却把颁布“通令”的责任归咎于共产党人。赞同这种意见的还有1921年3月成立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

(它包括了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中派”，以及巴纳特德意志人的某些社会主义组织)。当局把共产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档案、资金、工人之家和印刷厂都移交给了这些党。

取缔统一工会的活动使工人阶级本来就很难的物质状况急剧恶化。到1921年4月中旬，100多个工业企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33%。1000多个作坊(根据社会政策大臣命令的规定，这是指人数不超过5人的企业)的劳动时间由8小时延长到10小时。226个企业取消了集体合同，数千名工人被赶回老家，失去工作。但工人阶级仍继续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斯洛文尼亚的矿工不顾“通令”，继续12月份发起的罢工，并于翌年1月中旬胜利结束。共产主义运动虽然由于警察的迫害遭受严重挫折，但并没有被消灭。1921年初，再次举行区议会选举时，南斯拉夫共产党虽未公开竞选，但仍然在克拉古耶瓦茨、斯科普里、普里莱普、瓦列沃、乌日策取得一定的成绩。在贝尔格莱德获得23.7%选票和10个席位。在推迟到1921年4月才举行的斯洛文尼亚区议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12500票，在40个区管理机构里获16个主席席位和320名区代表席位。1921年4月底，共产党议员参加了由政府提出的宪法草案的原则讨论，但在1921年6月28日通过宪法时，则拒绝参加投票。

党在更现实地估计形势和在政治上、组织上适应新的条件方面采取了初步行动。1921年4月初在贝尔格莱德共产党国民议员俱乐部所在地举行了党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和在新的条件下党进行组织建设的指示，指出需要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力求保证工会合法化。接着，于1921年6月初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决议，确定了在实施“通令”的情况下党的行动纲领；指示要加速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和开展活动；决定成立党中央委员会代理执行委员会，一旦执行委员会委员被捕，就由它担负起领导党的工作。当选为代理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有：特里沙·卡茨莱罗维奇、莫沙·皮雅杰、科斯塔·诺瓦科维奇、米洛拉德·巴拉耶维奇、德拉加·斯特法诺维奇、洛夫雷·克莱门契奇和斯拉夫

科·卡乌里寄。

1921年6~7月,由西马·马尔科维奇率领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7月,由沃伊斯拉夫·武约维奇率领的南斯拉夫共青团代表团参加了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出席了红色工会国际成立代表大会。1921年3~6月,中央党报《共产主义者》第一次秘密出版,同时还秘密出版了《共青团信使报》。

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中派”企图控制工会的行动,也给恢复革命工会组织的工作和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内争取工会合法化的斗争带来了困难。5月23日当局在工会组织保证政治上中立的条件下准许工会开展活动,于是统一工会联合会开始恢复。1921年6月,合法的工会报纸《工会报》,作为工会运动的中央机关报在贝尔格莱德开始发行。萨格勒布的《工人报》和卢布尔雅那的《劳动报》作为省工会组织的机关报也开始发行。

但是,建立共产党地下组织和恢复工会的工作又很快中断。一部分持激进观点的青年共产党员采用红色恐怖来反对白色恐怖。他们对党领导的态度感到不满和失望,开始采取个人谋杀手段反对执政的资产阶级,虽然共产主义运动是明确不赞同这一斗争方式的。青年工人斯帕索耶·斯特伊奇对党不战而败感到十分难过,于6月29日在贝尔格莱德向摄政王亚历山大投掷一枚炸弹,而“红色真理”组织的阿利亚·阿利亚吉奇于1921年7月21日在代尔尼采枪杀了在发布“通令”时任内务大臣的米洛德拉·德拉什科维奇。“红色真理”组织是1921年2月建立的,罗多留布·乔拉科维奇当时也参加了该组织。为了彻底镇压工人革命运动,政府指控这些谋杀是共产党干的,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干的。以菲利普·菲利波维奇为首的3名共产党议员被押上法庭。接着,警察大搜捕,封闭共产党领导的区管理机构,逮捕共产党议员。反革命民族主义集团在很多地方捣毁工人之家。7月底共产党的最后一个合法据

点——共产党议员俱乐部也被查封。所有和工会中央理事会有联系的工会组织的活动一律被取缔。谋杀事件成了1921年8月2日通过《保卫国家公共安全和秩序法》(《保卫国家法》)的借口；该法律取缔一切共产党活动，取消共产党员的议员资格，并逮捕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法律规定了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厉惩罚。一些共产党议员发表声明，指出这一法律不符合宪法，并抗议把共产党同恐怖组织相提并论，但这些都无济于事。已削弱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但它不甘失败，转入地下活动，直到1941年。

第二章

寻求革命的新战略

(1921~1928年)

1. 党的秘密组织及其在公开 政治生活中的活动

国内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开始建立地下共产党及其早期政治行动。南共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

战后头几年,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活跃起来。通过为恢复工业发展而进行的国家干预和在劳动关系领域的某些让步,西欧资产阶级逐渐缓和了劳资冲突。资产阶级一方面满足工人的某些要求并依靠重新恢复的社会民主党和新成立的社会党以及工会的领导机构,另一方面促使工人阶级内部逐步发生社会分化和政治分化,以削弱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在某些国家里,革命的工人运动被暴力所镇压,共产党的活动遭到禁止(如1920~1921年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1923年在保加利亚);在意大利,在革命的工人运动被镇压之后,法西斯分子于1922年掌握了政权。被抑制在苏维埃俄国范围内的革命,为保卫其成果进行战斗。由于工业生产的恢复,发达的西欧国家对农业国的农产品开放了边界,这有助于平息具有强烈社会要求的自发的农民运

动,同时逐步地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工人阶级的运动。连一些新建立的欧洲国家,其中也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均进入了劳资关系相对平静发展的阶段,直到二十年代中期,当时廉价的美国家粮食打入欧洲市场带来了新的混乱,为经济大危机时期普遍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打下了基础。

西欧特别是1921年3月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国际对革命斗争的全球政治策略作了大修改。在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接受了列宁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这个思想在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阐述。这个新的政治策略的前提是各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实现更加牢固的统一,它意味着扩大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这就要求共产党人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而斗争,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工会组织(不论它们的思想方针的差别如何)的合作而斗争,同时更广泛地为建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被压迫民族大众的统一战线”而斗争。

特别是在1924~1928年期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出现的暂时的经济繁荣,使得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派拥护者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加强。他们认为稳定的经济发展时期已经来临,此时正适合于进行议会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以便逐步地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因此他们反对同共产党人合作。然而,经济大危机最初的迹象证实了共产党人的观点:资本主义的稳定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新的危机、阶级冲突和战争行将到来。后来这场于1929年剧烈爆发的经济大危机,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导致很多国家中最反动的政治势力影响的加强和工人阶级的民主成果的丧失。

两派如此对立的观点,决定了它们对立的纲领性方针,加深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社会民主党力图在国际范围内恢复统一(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拒绝同共产党进行

任何合作；而共产党人把社会民主党统统视为反革命政党，并把自己的宣传锋芒指向在群众中揭露”它们。这一冲突在1927年底和1928年期间更加激化，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的最初迹象已经表现出来，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也有所加强。由于错误地估计这将重新开创世界无产阶级武装革命的前景，共产国际在自己的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7月17日～9月1日）上通过的纲领中宣布了“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策略，以代替统一战线的策略。针对社会民主党强烈的反共主义，共产国际的答复是，社会民主党具有“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因此，国际无产阶级只有在“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中”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此外还要求建立独立的革命工会，而这将导致很多国家工会运动的分裂。国际工人运动中分裂的加深，致使一些国家中最反动的法西斯运动轻易地得到突破和加强。这样的冲突，特别是共产国际强烈的宗派主义方针，也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和活动产生了消极影响。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作为农业落后和工业不发达的十足的农业国，十分缓慢地改变着自己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土地改革进行得缓慢、不彻底和不全面。尽管土地法规定要消灭大地产，但很多大庄园被保留下来；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实现。教会和银行所拥有的土地超过了规定的57～288公顷的最高限额；在一些地方还没有消除各种形式的封建关系。100公顷土地以上的大庄园保留最多的地区要数克罗地亚（1931年有589个）和伏伊伏丁那（有511个）。在127.7万公顷大庄园土地中，只有55万公顷分给了对土地感兴趣的人，而大部分贫苦农民仍然没有土地。在1921年农户总数中，67.8%的农户只有5公顷以下的土地，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8%；29.3%的农户拥有5～20公顷土地，占土地面积的49.3%；而2.9%的农户有20公顷以上的土地，它们占有全部土地面积的22.7%。由于大部分是小块土地，而且土地在继续划小，再加上技术装备差和捐税高，整个农业

的生产能力仍然很低,而农业产值占国民收入的60%左右。在播种面积结构中,粮食占绝对优势(占82%),而经济作物遭到忽视(占2~3%)。在小块分散的土地上,很多地方仍使用木犁和牛套(1925年每1000家农户有182付木犁和438付铁犁),因此不可能发展集约化农业生产。农村人口过剩的现象加剧,而不发达的工业又不能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从1921年到1931年期间,在工业和手工业中找到工作的人数约为人口平均增长数的1/10。这十年里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的人口比重仅减少2%强(从78.87%减少到76.58%),而从事工业和手工业的人口比重从9.9%增加到约11%,当然各地的情况很不相同(在斯洛文尼亚约占22%,在拥有较发达的为农业服务的工业的伏伊伏丁那约占16%)。10年间(到1931年),识字的人数仅增加5.9%。购买力极低的农民由于贫穷而不断负债。为了谋生,从1921年到1929年几乎有15万人,其中主要是农民,迁往欧洲国家或漂洋过海。

共产党被禁止和阶级工会运动遭到破坏之后,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也急剧恶化。尽管在1921年底和1922年初,根据国际公约通过了几个劳工保护法(如劳动检查法、工人保护法和工人保险法),调整了工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劳动时间,规定限制夜间工作,禁用童工,建立工人代表机构和劳工协会。然而,工厂主毫不困难地玩弄法律条文,推翻集体合同,延长劳动时间,降低工资,雇佣未成年人和儿童等。失业人数越来越多,而向外移民的人数也在增加。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工业,特别在1920年至1923年期间有了一定的发展;首先发展的有食品工业、农产品加工工业、木材加工工业和电力工业。国内各地区之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发展不平衡和巨大差别,在建立统一经济区之后仍造成它们工业发展的不同速度。当时国内最发达的北部和西北地区发展较快。斯洛文尼亚成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主要工业区,那里工业发展速度平均比其他地区快

1.2倍。克罗地亚的工业发展也比较快,就金融资本集中程度而言,萨格勒布成为王国的经济实力中心。尽管战争期间遭到破坏的塞尔维亚经济的恢复工作持续了整整10年,但塞尔维亚资产阶级还是借助其政治影响、同外国资本的联系和廉价剩余劳动力而得以发展。塞尔维亚资产阶级依靠垄断政权而加强了经济地位,这就激起了与它竞争的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特别是财力雄厚并与国内大地主关系密切的克罗地亚资产阶级打算限制它的政治实力并瓜分权力的愿望。这种状况是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的经济基础,也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

由于主要是发展轻工业和原料工业,国家在经济上仍然依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外国资本在国内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增长也加强了这一依赖性。外国资本在1918年以前在南斯拉夫诸国的经济中具有重大的作用。被丰富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所吸引,外国资本仅仅用了10年就在南斯拉夫矿业、工业和银行业中取得了统治地位。20年代末,主要是法国、比利时和英国资本控制了65%左右的矿山和51%左右的工业;外国资本通过一些大银行控制了国家的信贷政策,并通过一些政党首脑影响国家内外政策。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还表现于国家的债务不断增加,在1928年已达到约300亿第纳尔。

维德节宪法^①的制定,巩固了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和君主制度的政权。尽管有强大的共产党、共和派和联邦派持反对意见(如南共、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斯洛文尼亚平民党和共和党),但是宪法从法律上确认了具有君主制政体的“同一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为了争取对这一宪法的支持,“民族统一”和国家中央集权制的主要鼓吹者——国民激进党和民主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从施加压力、进行贿赂到收买个别人和集团的选票等。这样,它们不仅得到

^① 南斯拉夫在1921年6月28日举行摄政王向宪法宣誓的仪式,这一天恰逢圣维德节,故这部宪法被称为维德节宪法。——译者

了农民联盟一部分人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南斯拉夫穆斯林组织的支持,还得到了杰米耶特(阿尔巴尼亚地主党)的支持,它们许诺将向大庄园主“公正地补偿”被剥夺的土地。在表决维德节宪法时,419名议员中只有258名参加了投票,其中224名议员投赞成票。

维德节宪法规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实行立宪、代议、世袭君主制。根据宪法,由国王和国民议会行使立法权,但是国王在宪法制度中具有特殊地位,他是不可侵犯的和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因此他具有高于议会的权力。宪法没有规定国王必须从国民议会成员中任命大臣,也没有规定国王必须尊重议会多数的政治立场。全国分成33个州(于1924年实行),这些州的成立并不根据民族界线或历史界线,州的下面分为地区、县和区,同时成立了权力有限的地方自治机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语被宣布为官方语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年龄限制;同以往一样,现役军人被排除在选举机构之外;妇女被剥夺了选举权,根据宪法这将由一个特别法律来加以解决,但这个法律始终没有制定出来。私有制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而得到保障;封建关系在摆脱异族统治时即宣布从法律上被废除。同当时其他的资产阶级宪法一样,这个宪法还包含很多社会经济条款,旨在平息革命动乱,抵制十月革命的影响及缓和劳资之间的冲突。

根据维德节宪法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治制度的阶级本性,在宪法制定之后很快就暴露出来:合法选举产生的共产党议员被逐出国民议会。这样做并没有引起较大的震动,并得到了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赞同,其中包括一些不赞成国家中央集权制和君主制的政党。参加反对苏维埃俄国的“防疫线”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内外政策也具有反共的特征。

宪法的通过,以及为反对工人阶级运动所采取的违宪措施,并没有解决动摇着新国家基础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维德节宪法所宣布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治制度,同尚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关

系、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普遍贫穷等情况有很大的差距。议会制在政治生活中是新事物，因为南斯拉夫各国在统一之前，除某些短暂时期外，几乎还没有过任何民主传统。众多的政党（1925年选举时不同政党和政治集团竟提出了44份选举名单）反映了统一的国家成立以前不发达的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民族构成和宗教构成的多样性、经济实力和 cultural 发展水平的差别、以及政治经验的不同。从1923年开始，少数民族也获得了选举权，随后又获得了建立政治组织的权利，于是它们便成立了自己的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是按民族和宗教划分的，因此不断增长的社会不满和民族不满为政党之间特别尖锐和不可调和的政治斗争定下了基调。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都没有能够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全国范围，也没有能够消除民族、地区和宗教信仰的烙印。只有在反对革命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才对自己的阶级利益有了统一的观点。

在缺乏较发达的物质基础、社会基础、民族平等和民主制度的情况下，以及在没有稳定的政党制度、民主传统和发达的政治文明的情况下，国民议会成了党派争夺和政治吵闹的讲坛。议会从不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早在1925年就出现征兆的农业危机，使得社会经济矛盾进一步激化，但这些社会经济矛盾却基本上被议会会议上无休止地进行的党派政治斗争所忽略。借助于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它使懈怠懒散、贪污受贿和任人唯亲的风气滋长），执政党滥用权力，特别是在选举时，它们还采取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强制手段。政党冲突所引起的社会和政治普遍不稳定还表现在频繁发生的议会危机和内阁危机中。1928年以前选出的任何一届议会都没有任满4年任期（议会在1923、1925和1927年举行了选举）。在由于社会冲突和民族冲突而动荡不安的不发达的社会环境中，不肯善罢甘休的宪法斗争和政治斗争使得权力轻易地集中到国王手中，并处于宪法之外。依靠军队（它主要发挥保卫国内制度的作用），国王越来越多地插手政党生活和议会生活。国家的中央集权体制（国王和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政党在国家管理中占主导地位），

较发达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资产阶级想取得经济优势的愿望，教会的活动、特别是担心东正教占上风的天主教会的活动，都对民族间冲突的激化产生了影响。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是“民族统一”和国家中央集权制的主要捍卫者，它竭力在联合政府中同非塞尔维亚政党，特别同斯洛文尼亚平民党和南斯拉夫穆斯林组织结成联盟，从而制造其统治具有全南斯拉夫性质的假象，然而军队和政权机关的最高职位都保留给本党的代表。

但是，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民族政策不仅意味着民族不平等，而且意味着企图同化一些民族。他们把瓦尔达尔马其顿正式称为“南塞尔维亚”，于是在那里，这种意图就同邻国资产阶级同样的野心发生了冲突。民族合一和国家中央集权，同克罗地亚和黑山人民真正的民族传统和国家传统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围绕国内制度问题的冲突，在宪法通过后变得更加尖锐，从而更加缩小了议会制度的政治基础。尤其在围绕政体和国家制度方面彼此不断的冲突中，资产阶级政党经常变换政治策略方针，结成临时的政治联盟和政党“集团”。对待维德节宪法的态度成了政党间组合和冲突的基础，也促使最有影响的塞尔维亚政党领导机构内部发生分化（如早在1921年人民激进党最著名的领袖之一斯托扬·普罗蒂奇就离开了党，而在1924年拥戴斯韦托扎尔·普里比切维奇的一个集团脱离了民主党，成立了独立民主党）。

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对君主制政体和国家中央集权制进行了最坚决的抵制，它把悬而未决的民族问题看作社会万恶之源，并为修改维德节宪法而斗争（在1923年选举时，该党得到了约47.4万张选票和70个议员席位，但是该党议员拒绝向国王宣誓，而这是参与议会工作的条件）。这个党的领导把国家改组的问题置于议会之外，并拒绝参加议会的工作。为了寻求国外的支持，这个党的领导于1924年7月1日参加了农民国际（1923年10月在莫斯科成立）。为此，该党在1924年12月被禁止，其领袖斯捷潘·拉迪奇被捕，这引起了克罗地亚农民极大的不满。在1925年议会选举中，克罗地亚

共和农民党得到了545466张选票和67个议员席位(两年后获得368320张选票和61个席位),它的领导决定承认维德节宪法和放弃其共和制的要求(并改名为克罗地亚农民党),参加国民议会的工作和参加激进党的联合政府。然而,这一合作是暂时的,克罗地亚农民党于1927年退出了政府。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激化,并预告着无根基的议会制即将告终。由于基本的社会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同时又顽固地坚持民族合一、国家中央集权制以及种种议会外交易,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人民当中失去了任何威望。

在通过《保卫国家法》之后,南共的处境极其困难。在共产党国民议员俱乐部被解散时,剩下的8名共产党议员马上遭到逮捕;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被关进监狱。很多省和州党的领导成员和工会领导成员也被逮捕。由于所谓的参与谋刺摄政王亚历山大而逮捕了180人。恐怖和搜捕席卷全国;至1921年底约有7万名共产党员和工会会员被捕,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和被流放,而一部分党的领导成员移居国外以逃避搜捕。在资产阶级的恐怖下,过去共产国际内人数最多的支部之一——南共的成员大批脱离其队伍。根据中央委员会1921年6月的决议开始建立南共地下组织的工作也被迫停顿了。1922年初,法院对33名党的领导成员进行审讯(“维德节审判案”),他们多数是原国民议会议员和党的核心领导成员。当时企图以这些审讯案来为暴力镇压革命工人运动辩护。由于侦查结果没能证实共产党同暗杀案有任何联系,国家公诉人把南共在武科瓦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的内容当作主要的物证来支持对暗杀、叛国和阴谋的起诉。

在政治上不统一的工人阶级渐渐倾向于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或资产阶级政党。1921年12月,在埃特宾·克里斯坦、维利姆·布克舍格和日夫科·托帕洛维奇的领导下,成立了由“中派分子”和社会民主党分子组成的南斯拉夫社会党。但是,该党在1928年实际瓦解之前并没有能够成为政治生活中比较有影响的因素,因

为它的改良主义纲领不符合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由于该党在保险机关、劳工协会和职业介绍所占有垄断地位，由于它掌握了某些工会组织，以及首先由于它同资产阶级和国家机器一道进行了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因此它还能起一定的影响。

代理执行委员会在接过领导遭到禁止的党的工作之后，开始着手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同时致力于保证能够开展合法的政治活动，首先是争取恢复阶级工会。但是，建立秘密组织的工作只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果，如成立了几个党的据点，同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并恢复了某些省的领导机构等。代理执行委员会主要从事了恢复阶级工会运动的工作，同资产阶级的恐怖进行了斗争，并为被指控谋杀亚历山大摄政王的共产党人组织了援助和辩护工作。尽管遭到新闻检查和屡被禁止，一些合法的和秘密的报纸揭露了对革命工人运动的恐怖行径，驳斥了有关南共应对谋刺原大臣德拉什科维奇和摄政王亚历山大的事件负责的指责。代理执行委员会于1921年11月在贝尔格莱德创办了《自由言论周报》；并于前一个月在卢布尔雅那创办了《劳动报》，以及于1922年2月在萨格勒布开始出版《战斗报》，作为南共机关报。

在无指望恢复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情况下，代理执行委员会利用了政府的一项有关决定：在对党派保持中立的条件下允许成立工人工会组织，于是提议建立在法律面前无政治倾向的工会。1921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12个行业联合会的代表会议上成立了南斯拉夫工会联合委员会（当时以独立工会的名称更为人们所知）。很快在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和萨拉热窝创办了这些工会的报纸，并在1922年里成立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斯洛文尼亚等省的工会联合委员会。

尽管遭到警察的迫害，但仍组织了一系列要求改善待遇的行动和罢工，如维护8小时工作的权利、要求增加工资和及时发放工

资等。据劳动检查署不完全的统计,1921年在747家企业中发生了159起要求增加工资的行动,有29091名工人参加,同时发生了有17947人参加的75起罢工;在1922年发生了有40447人参加的163起罢工,以及发生了包括942家企业和有47914名工人参加的276起要求增加工资的行动。

恢复阶级工会的工作遇到了当局和改良主义的工人组织的反对。政府极力阻挠独立工会组织的联合和巩固,而省和地方当局则把它们看作是被禁止的共产党组织,并阻挠它们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改良主义者拒绝同共产党人一起进行要求增加工资的行动和罢工,或则是极力破坏这些活动。1923年初,约有3万名工人参加了独立工会,连同一些为数不多的改良主义工会一起,这个数字同“通令”发布以前的工会会员总数相比是不多的。这些年里,独立工会开展了多起要求增加工资的行动、罢工及反对涨价和政治迫害的示威活动。除此之外,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举行了有1万名矿工参加的长达59天的罢工,并举行了有3000名沿海船队水手参加的长达63天的总罢工。

1921年底和1922年初,南共参加了援助苏维埃俄国饥民的行动。通过工人和农民委员会,南共在全国组织了募集物资的活动,并利用这一活动宣传了第一个工农国家。尽管处于非法状态和受到迫害,南共还组织了其他的国际工人声援行动,特别是帮助了1923年9月起义失败后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向逃离保加利亚的格·季米特洛夫和其他共产党人提供隐蔽所、住宿、物资和其他帮助。

建立南斯拉夫共青团秘密组织的进程发展较快,没有遇到很多困难。在南共中央委员会代理执行委员会的帮助下,于1921年12月在贝尔格莱德成立了南斯拉夫共青团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开始在全省建立秘密组织。至1922年8月,南共青团卢布尔雅那、萨格勒布、萨拉热窝和贝尔格莱德地区书记处及一批地方组织得到了恢复。在1922年上半年,在一些省还成立了合法的青年组织: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青年工人联盟”、斯洛文尼亚的“火星”青年教育协会等。大学的共青团通过学生马克思主义俱乐部继续开展工作。在1922年8月20~22日在卢布尔雅那召开的南共青团全国代表会议上，研究制定了在合法组织内开展工作的组织措施和指示，指出必须有组织地反对一些民族主义组织对工人人身所施加的暴力。会上还通过了南共青团新章程，它规定要成立各省书记处。在南共青团的秘密组织中，特别注意对那些受到主张个人恐怖手段的思潮强烈影响的团员进行思想工作，同时放弃了先锋队的观念，要求更广泛地团结青年工人。1922年8月底，南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在贝尔格莱德成立了南斯拉夫青年工人联盟，作为青年的合法组织，它很快地团结了3347名成员和众多的同情分子。它的组织往往作为青年文化教育协会和体育协会开展工作，并创办了一些合法报纸：《无产者青年报》、《青工报》、《青年战斗报》和《青年近卫军报》。

在建立秘密党组织和利用合法的政治斗争形式方面，南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随着欧洲革命浪潮的低落，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革命工人运动被暴力镇压，工人的战斗热情也逐渐低落；政府采取一切暴力手段阻止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任何企图，而共产党仍然没有重视国家的多民族构成，提出了一个过分狭隘的政治纲领，因此自外于日益增长的反对民族不平等的斗争。新的历史形势要求阶级斗争采取新形式和新手段。在充满革命动乱的时代里，在同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进行激烈斗争中创建的南共，在政治活动中采取了把革命当作一项当前紧迫任务的方针，并深信这一方针的正确性。而另一方面，党又表现出唯我革命的情绪，不能容忍那些与它不完全一致的人。党在阶级斗争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工人阶级统一方面缺乏政治上的宽广胸怀；贬低了争取阶级同盟军的必要性，对不发达国家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可能争取的同盟者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当民族间的问题在王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时

候，共产党却被排除在公开的政治生活之外，同工人阶级、特别是同农民群众和民族运动没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在遭禁止之后，党失去了开展重大的政治行动的坚强支柱。

在寻求符合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社会实际情况的新的革命战略的过程中，共产党人之间在估计政治形势和判断采取革命行动的可能性、途径和形式等问题上出现了巨大的困难和分歧。在代理执行委员会和一些省的领导机构之间，以及在一些省党的机构和工会机构成员之间出现了分歧和冲突。同代理执行委员会的方针相对立，来自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委员（斯拉夫科·卡乌里奇和洛夫雷·克莱门契奇）认为，在恐怖的条件下应该更加重视恢复合法的党和工会，而不是建立地下党；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人也第一次指出了南斯拉夫的多民族结构。与此同时又成立了一个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在维也纳于1921年9月成立了流亡执行委员会，由西马·马尔科维奇担任领导（他本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国际执行委员会）。两个领导机构的不同方针带来了混乱，并给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的工作和开展合法政治活动造成了困难。

在代理执行委员会和流亡执行委员会协商的基础上，1922年7月3～17日在维也纳召开了它们的扩大会议（有22人参加）。以后这次会议被称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承认它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机构。这次代表会议是在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围绕修改维德节宪法的要求进行政治斗争的高潮中召开的。代表会议的进程和结论表明，领导层内对地下革命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问题以及党的政策问题开始形成两种对立的认识。在谈到代表会议有没有权力讨论，即应不应该讨论党遭到失败的原因时，以及在选举新领导时，发生了冲突。在估计国内政治形势和由此产生的纲领性方针中都出现了分歧。科斯塔·诺瓦科维奇、帕夫莱·帕夫洛维奇和另外几位代表要求代表会议调查党遭到破坏的原因，认为党只有在弄清失败原

因和改变政策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恢复；他们还要求党的领导机构应该设在国内。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估计出发，科斯塔·诺瓦科维奇认为欧洲资本主义正经受着普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可能很快爆发革命，因此南斯拉夫共产党必须利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中的一切民族和宗教不满情绪，争取在反对当局的革命斗争中建立“统一战线”。与此相反，西马·马尔科维奇认为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它并没有在阶级敌人的打击下遭到破坏，而是“有秩序地撤退”。他认为不能期望南斯拉夫当局会很快发生变化，并认为革命将暂时地推迟，所以党的口号和要求应该——根据其实现的政治可能性——局限在对宪法的修改上，通过修改宪法消除政治制度中最反动的标志（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霸权主义和国家中央集权制），以便加速国内划清阶级界线的过程和为阶级斗争的蓬勃发展创造条件。

西马·马尔科维奇的估计和观点在通过决议和选举新的领导机构时获得了代表会议多数参加者的支持。被选入党中央委员会的有：西马·马尔科维奇、留巴·拉多瓦诺维奇、拉扎尔·斯特法诺维奇、米哈伊洛·托多罗维奇、久罗·贾科维奇、洛夫雷·克莱门契奇、斯拉夫科·卡乌里奇、米洛拉德·巴拉耶维奇和德拉古廷·布克维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肯定了代表会议的决定，并对党的领导机构的组成作了一些改动（任命特里沙·卡茨莱罗维奇进入领导机构，以取代反对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的克莱门契奇和卡乌里奇）。但是，在有关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中也表现出来。根据党的领导机构内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报告以及南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1922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对这些思想分歧进行了讨论，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有关《南斯拉夫问题》的专门决议。关于南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主要争论问题（关于党失败的原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认为，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南共遭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毕竟应归咎于其“内部缺点”，代

表大会认为这些缺点在于党“在外部的壮大”与其内部组织的薄弱不相称,党的领导机构犯了严重错误和存在失策(如消极,即由于“没有充分坚定的共产主义方针”和没有克服夸大选举胜利意义的“社会民主党偏见”而缺乏革命主动性;缺乏党的秘密组织,没有能力抵御白色恐怖)。共产国际认为,在代表会议上“领导同志的分裂情况”完全是由于个人的原因所引起的。在对待代表会议文件的态度中,尚未发现党内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有实质性分歧,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没有理由把南斯拉夫的党割裂成为所谓多数派和少数派”,并要求今后应该继续维护这种统一。

党的领导机构和对这一机构持反对态度的党的积极分子之间在认识中的差别和不和,拖延了党组织的恢复,并削弱了党组织的行动能力。由于缺乏地下工作的经验,以及内部对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和手段存在思想分歧,南共新的领导机构也没有在自己的活动中取得具体的成绩。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及其同群众联系的工作进展十分缓慢。在存在分歧、动摇和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还着手建立合法的党,这遇到了资产阶级报刊的激烈反对(它们解释为共产党人又在新的名称下组织起来了),并遭到了社会党人的抵制,他们强调除了1921年12月成立的南斯拉夫社会党以外,工人阶级并不需要再有一个党。根据党中央委员会1922年12月的决议,在1923年1月13日和14日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成立了合法的南斯拉夫独立工人党。在1923年4月,斯洛文尼亚的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党也并入了该党。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党是在1922年秋天区选举时,在争取“无产者统一战线”的斗争纲领基础上开展的政治活动中产生的。独立工人党是按照与过去合法的共产党相同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它的中央委员会于1923年7月建立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地区临时书记处;1923年底,该党已拥有95个组织和约3500名党员,同时在党的工作范围内还于1923年8月恢复了妇女运动。独立工人党成立的时候,南共的秘密组织尚未建立,只建立起一个被思想冲突所分裂的“南共机构的骨架”。

独立工人党在1923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在18个选区和两个城市里提出了候选人名单,但它仅得了约1%的选票,没有得到任何议席;在1923年8月的区选举中也没有获得重大的成绩,当时仅在13个区获得35个议席。但是,它在议会选举中所遭到的失败和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选举中所获得的巨大成绩,促使共产党人重新考虑自己对民族问题的立场和对农民的态度。

党的领导内的分歧在独立工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进一步加深了。南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在同党紧密合作的情况下,工会活动的重点应转向大的工业企业,工会组织首先应该包括产业工人阶级。但是,1923年1月底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独立工会代表会议上(当时这个工会的领导机构名为南斯拉夫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应该把工会活动主要限在手工业工人中,因为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大量参加工会将激化阶级斗争,并将引起警察局对工人运动采取新措施;独立工会领导机构还反对在工会组织中建立共产党的党团(积极分子小组)。

党的领导内的思想和政治分歧还影响了南共青团的工作,尽管在共青团的领导内并不存在冲突;关于设立党和共青团联合代表机构的决定并没有贯彻执行,但出现了使青年组织卷入党内冲突的企图。1923年6月24~26日在斯洛文尼亚召开的南共青团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党的领导中的冲突严重地影响了青年运动的发展,并决定南共青团不参与这种冲突,而是“走正确的道路,反对派别”。大会提议建立青年工人联盟的农村支部,在非法和合法的组织中更加重视青年的教育工作,建立工人体育协会。选人南共青团领导机构的有:扬科·米希奇、兹拉特科·什纳伊代尔、斯捷潘·茨维伊奇和弗兰采·克洛普契奇。

南共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23年5月9~12日在维也纳举行。会议是在对党的领导机构内多数派和少数派冲突的原因进行激烈争论的气氛中进行的。多数派以西马·马尔科维奇为首,而

少数派则认为领导机构的机会主义是从组织上加强党和党的活动内容革命化的主要障碍。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估计,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以往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南共的思想问题以及南共战略和策略内容的重大问题。

会议肯定了应该建立地下党的方针,地下党将能够联系工人阶级和成为群众党。会议决定,在南共及其他所有工人组织的内部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应该建立由受过教育的干部组成的强有力的党的机构,并采用新的工作方法。会议还决定南共领导机构必须设在国内。

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中民族冲突的原因是国家中央集权制、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霸权主义、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内的争夺战及所有社会阶级对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满情绪。尽管有人认为“各部族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已超出其阶级界线,并正在建立一个反对霸权主义和中央集权制的广泛的民族阵线,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在抵制霸权主义和民族压迫中起着领导作用,因此,民族问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归结为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在涉及国家制度和“民族统一”的问题方面仍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如同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样,作为党的政策的基础,提出了要同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霸权主义和国家中央集权制进行斗争,但是仅仅确定了一般的原则(在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实现民族自决直到分离的权利)和最终的解决办法(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巴尔干联邦)。代表会议否认了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最终解决民族问题的可能性,因此没有研究这一方面的行动纲领,只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阶级的解放斗争相结合以及关于“工农和被压迫民族群众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精神,提出了共产党应该在被奴役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的要求。会议决定在党内对“民族和部族问

题”开展扎实的讨论,以便为下一次代表会议准备有关民族问题的决议。

代表会议认为农村工作(“党的工作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被忽略,决定草拟党的土地纲领和共产党人开展农村工作的指示,其出发点是要求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以利于无地农民。

代表会议指出,工会中的老工会会员(1920年的)还不超过1/10。会议决定贯彻执行南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在工会中建立共产党党团(积极分子小组)的决定;成立工人阶级文化和体育协会;扩大在所有工人组织中的影响,并建立保护工人的小分队以对付法西斯(民族主义)组织。

在南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选入执行委员会的有特里沙·卡茨莱罗维奇、瓦索·斯尔曾蒂奇、久罗·贾科维奇、久罗·茨维伊奇、亚科布·若尔加、西莫·米留什和约热夫·海尔马尔。

2. 为党的新纲领性方针和党的团结而斗争

思想冲突和南共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共产国际的干预和南共民族纲领的变化。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派别斗争。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南共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对党的政策的关键问题,如组织、民族、农民和工会等问题的不同看法有了更明显的表现。分歧进一步深化,已达到党内两派——“左派”和“右派”——之间明确地形成界线的程度。

早在1923年5月底,就开始通过独立工人党的报刊,以及在《战斗》理论杂志和其他党报上开展了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在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中对待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的态度的讨论。讨论的出发点是:民族问题在国际政治形势中已占主导地位;无产阶级必须确

定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应该摒弃那种认为民族问题的解决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任务的看法；无产阶级也有参与解决民族问题的特殊理由，因为悬而未决的民族问题助长“民族主义的和部族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借助这种意识形态来“掩盖最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欺骗劳动人民群众”。在这场讨论中解决了一个难题：究竟是“民族统一”还是南斯拉夫国家存在多民族的结构。结果放弃了“民族统一”的思想，接受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是三个单独的民族，而南斯拉夫是多民族国家的观点（西马·马尔科维奇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民族问题》的小册子中最全面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立场也对这场讨论产生了影响。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6月对巴尔干各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方面的政策和实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要求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共产党人，把在争取巴尔干国家的联邦，即在争取巴尔干—多瑙河下游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斗争中建立被压迫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列入自己的政治战略和策略。而1923年底召开的巴尔干共产党联盟代表会议的立场也是符合这种精神的。

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分歧产生于：对政治形势估计的差别，对在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解决民族问题可能性的看法的差别，对民族问题同争取社会革命变革的阶级斗争的联系看法的差别，对解决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形式和方式的看法的差别，特别是对民族运动的社会性质的看法的差别（是资产阶级之间的争夺战还是群众运动）。从民族自决权出发，“左派”（包括特里沙·卡茨莱罗维奇、科斯塔·诺瓦科维奇、帕夫莱·帕夫洛维奇、拉伊科·约万诺维奇、久罗·茨维伊奇、奥古斯特·采萨雷茨、德拉戈廷·古斯廷契奇等人）要求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第三和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工人、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群众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左派”否定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解决民族问题的可能性，认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是不可分的，

并把民族问题的解决同革命的政治变革——工农夺取政权(建立“工农政府”)——联系起来,以及同建立南斯拉夫联邦,进而建立巴尔干联邦即巴尔干—多瑙河下游工农共和国联邦联系起来。因此它要求南共力争在农民群众和被压迫民族群众中起领导作用。它认为工农革命是过渡阶段,在这期间共产党应该同时进行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与此相反,“右派”——其最主要的代表是西马·马尔科维奇——则认为国内政治形势并不是革命的形势,不存在即将发生巴尔干革命的前景。尽管马尔科维奇同其他人一样,相信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并相信建立“工农政府”联盟是南斯拉夫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唯一可能性,但他认为,在不是革命的形势下,把民族问题的解决同建立“工农政府”联系起来只会推迟民族问题的解决,这么做不利于工人阶级,因为当工人阶级不得不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时,“生活在民主国家里还是生活在暴君统治的国家里,这对它来说绝不是无所谓”;因此无产阶级应该从现在开始就要参与解决民族问题,应该制定适应资产阶级的南斯拉夫条件的民族纲领;而这个纲领的基础应该是努力使民族运动的革命力量不是用来夺取政权(因为他认为还不具备条件),而是用来争取资产阶级社会的民主化以及消除民族冲突和互不相容的状况。同其他人一样,他接受民族自决权的一般原则,但认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目前还不愿意同共同的国家分离。因此他断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民族问题是国家内部制度问题,并归结为“实质上是宪法问题”,他还强调只有在“最完全的民主制度”中才能解决民族问题,而这意味着取消君主制、霸权主义和民族压迫,以及实现政治生活民主化。民族问题的局部解决,将为阶级斗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加速每个民族范围内的阶级分化和使工农群众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摆脱民族主义和教权主义),从而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和其他人一样,

马尔科维奇接受了联邦共和国作为将来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国家的国家结构形式,但是他摒弃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联邦主义,害怕它会造工人阶级的分化和加深民族间的差别。因此他主张自治,以此来缓和民族互不相容的状况,同时可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统一,阻止各民族间隔阂的加深,并保证它们将来“在历史上进步的”融合。

1924年1月1~4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南共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有35名代表参加。当时南共约有1000名党员。代表会议研究了党的战略和策略及其组织建设的所有基本问题,并在各个专项决议中确定了对这些问题的方针。

代表会议通过的民族问题决议认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联合成为共同的国家是符合历史进步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的”,尽管这个国家的产生是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一。决议认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联合意味着“为三个同类民族形成一个民族的过程创造了客观条件”,但是这个过程由于整个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君主制度的压迫而在一开始就被阻止了。由于实现联合时所处的具体历史形势(在这之前没有经过一个要求联合的民族意识的发展过程,即没有经过一场民族革命和“自下而上的自决”)和由于实现联合的方式(“在协约国帝国主义政策和塞尔维亚统治阶级的专制下”),民族矛盾并没有随着共同国家的建立而缓和,反而愈益激化。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在“塞尔维亚资产阶级一边”,它对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人民及其经济上较发达的资产阶级实行民族霸权主义,“取消黑山的自治”,“把马其顿同化为塞尔维亚”和欺压少数民族,这一切都导致“克罗地亚人民、斯洛文尼亚人民和少数民族结成防御性的联合”,出现了争取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自治和争取马其顿独立的运动。因此,民族不团结的过程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再也不能被认为是“联合几个少数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民族(塞尔维亚族)

的统治阶级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

在这样的条件下，“历史进步的利益和劳动人民解放斗争的利益”要求推翻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霸权主义，把农民群众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同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目的是“在南斯拉夫、以及在巴尔干和多瑙河下游建立一个联邦的（联盟的）工农共和国”，作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因此，共产党应该领导国内强大的民族运动，并在这些运动中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把它们争取民族平等的斗争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根据共产国际民族政策原则的精神（民族自决直到分离的权利、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联邦制结构），承认每个民族的自决权，但是强调“必须在每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从进步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利益着眼来独立地”衡量分离的合理性，因此并不排除南共会根据这一点甚至宣传反对分离（同时注意到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民族混杂的状况”，“地理和经济联系，大的经济区域对经济发展的优越性”）。决议认为修改维德节宪法只能使民族矛盾得到局部的缓和，而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协议将重新建立资产阶级的阶级统一战线，因此决议主张废除这一宪法，制定“意味着各民族完全平等的共和国联邦的宪法”。同时还通过了关于“马其顿和色雷斯问题”的专门决议，它的出发点是：马其顿的居民是民族混居的；马其顿境内的所有民族在邻国也存在，“但它们当中任何一个民族还没有达到占绝对多数的程度”，因此，任何一个巴尔干国家对马其顿的统治，都意味着对大多数马其顿居民的民族奴役。因此，马其顿问题的解决在于在巴尔干联邦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和自治的马其顿共和国，作为被肢解的马其顿各部分工农争取建立工农政府的斗争结果。决议还要求实现各少数民族完全的政治平等和公民平等，要求保证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不受限制的权利和必须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学校教育。

这样，在确定作为南共革命纲领组成部分的民族政策方面迈

出了重要的一步。代表会议指出有必要建立“工农联盟”来反对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并表示愿意同各农民党和农民组织一致行动，支持农民中任何反对派的革命倾向和潮流，主张建立贫农委员会。代表会议要求消除封建主义残余和改善农民的处境（没收大庄园，把土地无偿地分给无地者和贫农，没收教堂寺院的土地，赦免所有因土地纠纷被判刑的囚犯）。

在代表会议的决议中还反映了党的“左派”提出的使党布尔什维克化的要求。组织问题被认为是对党的行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问题。代表会议决定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成立企业支部来建立秘密干部党的组织，而这首先要依靠产业工人，并应特别重视有系统地培养党的干部。

代表会议主张无产阶级在工会和党共同进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统一行动，主张运用“首先是从下而上通过群众”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策略，既反对工会中立的政策，同时也赞同工会对政党的独立自主。代表会议强调工会中的党员必须在执行工会政策时严守纪律，代表党的观点。代表会议摒弃了维持行会组织的愿望，要求它们改组为产业联合会。代表会议特别强调应该有组织地反对民族主义法西斯组织对工人采取的暴力行动。

大部分“左派”成员被选进党的新领导：特里沙·卡茨莱罗维奇、菲利普·菲利波维奇、西莫·米留什、科斯塔·诺瓦科维奇、弗拉迪米尔·乔皮奇、拉扎尔·斯特法诺维奇和亚科布·若尔加。

南共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绝大多数党员在全党表决时支持这些决议。全党表决是根据代表会议的决定在会议结束之后不久进行的。南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也支持这些文件。

1924年期间，共产党开始同农民，特别是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农民建立联系。党在1924年底已增加到约2500名党员。通过在全省选举领导班子和建立地区组织，南斯拉夫独立工人党在组织上得到了整顿，到1924年

上半年,它已拥有196个地方组织和3840名党员。它还建立了工人卫队,以抵御那些效仿意大利法西斯运动建立起来的亲法西斯组织(如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者组织、塞尔维亚民族青年组织、克罗地亚民族青年组织、人民防卫组织等)对斯普利特、萨格勒布、潘切沃、尼什、斯科普里、卢布尔雅那和特尔博夫列等地工人、工人之家和工人住宅区施加暴力。就工人卫队同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者组织成员发生冲突的事件(最激烈的一次发生在6月1日的特尔博夫列),共产党通过独立工人党和独立工会组织了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在萨格勒布还于1924年6月10日成功地举行了总罢工。政府因此于1924年7月11日禁止了独立工人党、独立工会和南斯拉夫工人青年联合会的工作;在公告中指出,独立工人党实际上是换了新名称的被禁止的共产党,它已开始了“建立新的民族”的宣传并同穷苦农民建立了联系。除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外,很快又准许独立工会继续工作。

为了能进入政治生活,南共仍然很重视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报刊杂志来开展思想斗争。它发行传单、小册子、书籍、合法的党报和工会报纸。在莫沙·皮雅杰的领导下,于1925年1月1日开始出版南共地下报纸《共产主义者》,但是在出版第三号之后,印刷所被发现,莫·皮雅杰被判长期徒刑。1925年9月出版了南共青团地下机关报《青年布尔什维克》,1926年3月在维也纳出版了《镰刀和锤子》(后来南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它作为党报);1926年4月出版了《南共中央通报》;1926年12月在维也纳出版了理论杂志《阶级斗争》;1926年在萨拉热窝出版了党的合法报纸《真理报》。在独立工人党被禁止以后,《战斗报》以《工人战斗报》和《工农战斗报》的名称继续出版;在《锁链下的工人报》遭禁以后,又有很多报纸出版和被禁止(在1921~1928年期间曾出版了96种报纸)。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里也有了极其重大的突破,表现最突出的是1923~1927年在萨格勒布由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编辑出版的《文学论坛》杂志。克尔莱扎得到了奥古斯特·采萨雷茨的合作,他本人

也是撰稿最多的作者，并成为在社会上有重要影响的最富创造精神的文学家之一。他在杂志中发表了选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现代思想家的著作，同时也发表了对南斯拉夫社会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性分析。在文学领域里还出现了其他一些作家（如在斯洛文尼亚围绕《青年报》有一批人），他们在社会主义思想和伦理的鼓舞下，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败落情景。

然而，党的领导层内的思想分歧和冲突在南共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仍在继续，它们几乎使党的中心和工会中心的工作瘫痪。在代表会议讨论过程中已经暴露出的观点分歧，在“左派”（现在实际上由南共领导人员组成）和“右派”（党内少数派）之间的激烈派别冲突中又表现出来。在全党表决时，贝尔格莱德党组织对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所有决议都投了反对票，形成了“党内反对派”。“右派”以独立工会为据点，不承认代表会议的文件及其选出的党的领导，尽管所有这一切已经得到全党表决的确认，而全党表决实际上正是由“右派”代表在代表会议上要求进行的。“右派”违反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党的领导的要求开展了活动。分歧的加深还牵涉到独立工会（党的“右派”成员在其领导层拥有主要影响）和改良主义的工人总联合会的合并行动。“右派”成员接受了工会在改良主义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思想基础上进行合并的主张，而这违反了南共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在阶级斗争纲领基础上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方针，并违反了党的领导提出的尊重这一方针的要求。这种情况导致了独立工会领导层内部的分裂，一部分成员同工人总联合会一道于1925年10月10日成立了南斯拉夫统一工会联合会，但是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和克罗地亚的大多数独立工会基层组织，以及印刷工人联合会，银行、商业和工业职员工会都拒绝加入新成立的工会。斯洛文尼亚被禁止的独立工会的成员加入了统一工会联合会的地区组织，因此共产党人在很多小组里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在某些小组中有着主导的影响。

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南共民族纲领在1924年6月17

日~7月18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肯定,但作了一项实质性修改。关于建立南斯拉夫国家是历史进步现象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评价,引起了争论。与此相反,共产国际认为,在“一些新成立的(小的)帝国主义国家里”,如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希腊,每个民族的自决权必须表现在“被压迫的民族分离为独立国家”的口号中;并认为在这方面一些党存在着“背离现象”,它表现为在帝国主义战争建立的国家结构的基础上确定对待本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方针。共产国际的结论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有关自决权的总口号“必须表现为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脱离南斯拉夫和建立独立的共和国”。根据同一精神还决定,意大利共产党在对待被意大利并吞地区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居民方面,应该同南斯拉夫共产党协商进行相应的宣传鼓动工作;在1926年1月召开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自决和建立加入巴尔干联邦的独立工农共和国的要求;并计划同南共一起成立联合局来协调活动,然而后来没有实现。

共产国际的这一要求在南共领导层引起了混乱和激化了冲突,从而在1924年秋又重新恢复了对一些有争议问题的讨论。“左派”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观点,重新估计了资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作用,以及在以革命行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同资产阶级反对党(特别是已加入农民国际的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合作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但是,“右派”认为没有在巴尔干马上爆发革命的希望,指出不应该被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农民运动和民族运动的革命性所迷惑,并提醒说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同样有害于阶级斗争。因此,它反对试探同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和斯洛文尼亚平民党领袖的合作;认为党的基本政治路线不应该是工农联盟和工农政府的口号,而应该是在争取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化的同时,强调这一口号只是宣传性的,而不是行动性的(政治形势发生相应的激化除外)。党内反对派坚持

自己的关于在巴尔干没有希望马上进行革命的估计，拒绝了在革命变革的第一阶段使南斯拉夫国家解体的要求，并拒绝了在南斯拉夫国家以外解决马其顿问题和拒绝支持马其顿民族运动。

在1924年11月25日通过的关于解决党内争端和澄清争议问题的决议中，南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方针。尽管决议继续认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解决民族问题，认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只有通过推翻资本主义，通过劳动群众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公开斗争，只有通过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农政权的斗争”才能解决，但是决议得出结论说，被压迫民族的分离权不能拖延到无产阶级战胜资本主义之时，党在资产阶级统治时就必须为实现这一权利而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决议强调不能把民族问题看作是宪法问题，“因为这样将保持帝国主义国家的完整”；“南斯拉夫是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产物；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民族成了压迫其他民族的统治民族”。同时，决议认为，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一方面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希望通过革命的途径来粉碎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希望把整个冲突局限在议会和宪法范围内，并希望通过资产阶级之间达成一种损害各民族劳动群众的社会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妥协来结束冲突”。为此，无产阶级也必须积极地参与修改宪法的斗争，以便推翻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残暴统治，为被奴役民族的劳动群众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同时必须在建立工农政权的斗争中团结这些群众。正因为“这一切，党应该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组织一道为争取分离权而共同进行公开的斗争，也就是说应该帮助被压迫民族的运动，以建立诸如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和黑山等独立的国家，以及解放阿尔巴尼亚人”。决议指责反对派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不明确，因为反对派忽略了在反对在被压迫民族内散布仇恨和沙文主义的同时，还应该“更加坚决地反对统治阶级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争取所有被压迫民族的自决直到分离的权利”。

党内反对派在重新讨论“党内争议问题”中遭到失败之后(88个党组织中只有1个组织赞成反对派的观点,而79个组织支持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脱离了南共。另一方面,党的书记特里沙·卡茨莱罗维奇、西莫·米留什和政治局委员帕夫莱·帕夫洛维奇因为这些冲突而感到沮丧,放弃了党的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个专门小组讨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层的冲突问题,斯大林也参加了这个小组的工作。1925年4月共产国际的领导谴责西马·马尔科维奇的观点是“社会民主党的和机会主义的观点”(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也主张所有南斯拉夫民族共同生活在现有国家中是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需要,并以此为借口而反对被压迫民族的一切独立的愿望),尽管在马尔科维奇的影响下,共产国际的领导并没有坚持要南斯拉夫共产党为南斯拉夫国家的解体而斗争。共产国际决定召开南共代表大会来讨论争议问题,并决定成立临时中央委员会(由特里沙·卡茨莱罗维奇、西莫·米留什、拉扎尔·斯特法诺维奇、久罗·茨维伊奇等人组成)来筹备代表大会。

同时,为了帮助澄清南共内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于1925年6月发表了斯大林的一篇论战性文章。文中斯大林批驳了西马·马尔科维奇的观点,并把“民族自决问题”同“根本改变南斯拉夫的国界”等同起来,同时他解释了自己的关于不发达国家的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的观点,强调了“自决问题即改变南斯拉夫的国界”的迫切性,并着重指出,“现在的问题……在于不要把因战争和暴力而形成的现在南斯拉夫的国界变成解决民族问题的出发点和法律根据”。^①

在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几次党代表会议上对党内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警告说,领导层内的派别冲突已使党忽略了国内的事件,并使党的活动陷于瘫痪。由于对这种状况不满,在南共青团领导内开始有人认为南共青团是国内唯一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87页。——译者

应该由它来承担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

南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6年5月17~22日在维也纳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36名有表决权,12名有发言权。共产国际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会上通过了共产国际对“南共1921年失败”原因的看法,并认为,尽管在第三次代表会议筹备期间出现了一些原则性的策略和政策“分歧”,但是这次代表会议“粉碎了”党内“合法主义的倾向”,并“为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布尔什维克化”打下了基础。代表大会肯定了这样的估计,即南斯拉夫是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副产品,它的危机的实质是尚未解决的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而摆脱危机的出路既不能是实行专制制度,也不能是资产阶级之间的协议,只能是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通过共同的革命斗争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巴尔干工农共和国联邦。代表大会认为,中央委员会在执行这条路线的过程中是动摇的,并犯了错误,它不善于在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中具体贯彻这条路线;它没有制定工会政策,致使南共由于内部分歧而失去了把工会联合起来的主动权;同时企图首先以行政措施来制止党内反对派的反抗,从而导致党内关系进一步激化。围绕党的路线所进行的斗争使党在群众中的活动瘫痪,尽管党布尔什维克化的基本条件是党成为“群众党”。代表大会认为,党的领导层内的危机是“宗派主义和派别斗争”引起的,其基本原因是“党的产业无产阶级的基础极其狭隘,党内手工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比例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过程意味着首先吸收产业工人的基本核心入党,由于“党内产业无产阶级这一阶层非常薄弱”,而大多数党员仍按地域原则组织起来,因此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过程就愈发迫切。为此,争取南共布尔什维克化的基本任务是:吸收产业工人入党,在工业中心和所有重要的工业企业里建立新组织。代表大会强调,鉴于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党组织结构的基础必须是企业中的支部,以区别于按地区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为建立党的“技术机构”及党的工

作的保密性采取了措施；同时指出，党应使自己的成员利用审判过程为“南共和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策略进行公开的鼓动和宣传，因此要经常指示自己的党员在法庭上如何行动”。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代表大会决定结束纷争的局面，克服“派别倾向和宗派主义”，确定南斯拉夫每个省的具体任务（如建立产业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确定对待资产阶级民族政党的策略并在这些党中通过自己的党团加强左派，在农村工作方面的任务，在被压迫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革命组织”中任务）。代表大会还决定，为此党内要对以往的观点分歧作出解释，但要阻止任何利用这些分歧制造派别的企图。

代表大会的决定实质上确认了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方针，但作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要求的一些修改。代表大会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在巴尔干和南斯拉夫，由于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解决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所以并没有丧失革命的前景。根据这种估计，党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准备革命，而民族问题的“完全解决”则继续同建立巴尔干工农共和国联邦联系在一起。代表大会不再要求南共支持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因为其中最强大的反对党（克罗地亚农民党）已同激进党人一起参加了联合政府并放弃了自己的共和标志，这表明了它们向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让步的倾向；代表大会要求支持和帮助随着“民族运动中阶级路线的形成”而壮大的“民族革命派”。代表大会指出，为了使人民群众摆脱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党应该揭露资产阶级的“‘协商’政策的背叛性质”，“为争取不受限制的自决直到同现在的国家的分离权而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同时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这些权利的抽象宣传，而是要最积极地参加反对日常的具体的民族压迫现象的斗争，并坚持在这场斗争中把被压迫民族的要求“扩大、深化和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整个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代表大会决定，“通过最广大群众在具体问题上的共同行动”，应该在阶级斗争、党派独立（而不是政治独立）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基础

上,继续为争取工会运动的完全普遍统一而斗争;应该在所有工会中建立“工人反对派”,其任务是吸引无产阶级群众参加反对资本的阶级斗争,并为工会运动的真正统一而斗争。

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党的名称加上了“共产国际支部”的字样,而党员的条件是:承认共产国际和南共的纲领和章程,执行它们的决议,参加一个基层组织的工作和缴纳党费。在以支部(工厂、作坊、街道、商店和机关中的支部)为基础的党的组织结构中,除了中央委员会(其中政治局设委员5~9名)、州(省)委员会和地方(区)委员会以外,还规定成立地区委员会及各级党委下属的委员会,并在最主要的党组织中成立党校和学习班。规定在至少有两名党员的所有非党的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中成立“共产党党团”。对所有有争议的问题要进行充分自由的讨论,但一旦形成决议,就要求实行最严格的党的纪律,“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最重大的义务”是迅速而准确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党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和各上级机关的决议。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一些共产主义大学里,特别是在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和列宁国际学院里,组织培训西方少数民族成员党的干部的工作。南共在这些学校里有自己的支部和教员,有很多南共干部,特别是在1926~1936年期间受到培训。这些干部在学习结束后回国参加了党的工作。

在“左派”和“右派”进行自我批评的气氛下,本着要求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统一的精神,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当选的有:西马·马尔科维奇、科斯塔·诺瓦科维奇、拉扎尔·斯特法诺维奇、拉多米尔·武约维奇、拉伊科·约万诺维奇、戈伊科·武科维奇、维茨科·耶拉斯卡、亚诺什·多马尼、伊万·克尔恩代利、久罗·茨维伊奇、久罗·萨拉伊、德拉戈廷·古斯廷契奇、马尔采尔·若尔加(后来被增选的亚科布·若尔加所取代)、尼古拉·科瓦切维奇和菲利普·菲利波维奇。西马·马尔科维奇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1926年6月底在古什塔涅召开了南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外，来自各地的32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认为，南共青团没有能够对南斯拉夫青年施加有力的影响，而合法的青年组织也没有能够在组织上得到巩固和扩大。大会决定着手在组织上巩固南共青团，并在工人、农民和学生青年的合法组织中开展活动。选人南共青团领导机构的有：兹拉特科·什纳伊代尔、米约·奥雷什基、维利姆·霍尔瓦伊、格尔古尔·武约维奇。

1927年6月召开的独立工会代表大会指出，按产业组织的独立工会，由于它在国内一些地方遭到禁止，再加上部分会员加入了统一工人联合会，所以会员人数从1923年的约3万名减少到1927年的约2.1万名；绝大多数产业工人还在工会组织之外；要求增加工资的行动和罢工行动的次数也在减少。尽管“右派”成员进行抵制，但是仍然批准了关于在企业中按产业联合会和小组的原则组织工会的决定和关于把工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主要工业部门的大企业里去的决定。

尽管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显示了团结，但是党的领导层内的派别冲突不仅没有终止，而且开始转移到某些党组织中，有造成党分裂的危险。“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政治分歧看起来越来越少，在中央全会上决议也能一致通过，所有的人都答应保证终止冲突，但是这些冲突仍然愈益加深，使党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威胁。争取党的共产主义路线的思想斗争日益变成在党中央机关中争取多数人的斗争；党的领导机构成了“喋喋不休的讨论俱乐部”，整日忙于无休无止的理论探讨，而不是着手从事具体的政治工作。

由于派别冲突的影响，党员人数不多，同样也由于政治纲领中某些不现实的要求，共产党没有能够克服政治分裂的现象，没有能够把内部组织集中起来，也没有能够在全国组织和开展统一的行动，因此它处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政局发展的主流之外。一些党组织对党中央领导层内的政治冲突表示不满和进行了抵制；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马其顿、伏伊伏丁那等地区党的领导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南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这种反抗，特别是来自产业工人队伍的党的干部的反抗越来越强烈，并开始同派别活动展开了更加坚决的斗争（如布拉戈耶·帕罗维奇、久罗·贾科维奇、久罗·萨拉伊、约瑟普·布罗兹、米洛什·马尔科维奇和约瑟普·克拉什）。在1927~1928年期间，当时国内最强大的组织之一萨格勒布党组织成了反派别斗争的最有力的据点。久罗·贾科维奇在1928年1月写给共产国际的有关南共内部争论原因的报告中，对南共的派别冲突进行了分析，既批评了“右派”，也批评了“左派”，并要求全体党员在政治生活的具体问题上积极行动起来。在筹备萨格勒布党组织第八次代表会议过程中（“左派”极力想把这一组织变成其活动中心），地方委员会因其多数成员的声明而导致分裂。这些成员是“左派”的追随者，他们反对不仅要谴责“右派”，也要谴责“左派”，反对以批判的态度重新审议两派的政治错误。为此，在1928年2月25日夜间到26日凌晨举行的代表会议上，在各支部29名代表出席和中央及共产国际代表列席的情况下，提出了两个报告；地方委员会组织书记约瑟普·布罗兹代表委员会中反对派别斗争的少数派作了专门报告。他反映了独立工会地方组织和地区组织中普遍反对派别斗争的情绪。他对全党工作中的“派别活动、宗派主义和结帮营私”以及对萨格勒布地方委员会中“左派”多数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同时认为制止派别活动和振兴党的唯一可能是党“在群众中开展实际工作”，同产业工人建立联系和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代表会议通过了约瑟普·布罗兹的报告，他当选为新地方委员会的政治书记；代表会议的决议认为他的报告是在整顿这一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和党中央委员会现状的斗争中迈出了必不可少的一步。根据这一精神，代表会议的代表们还通过了发给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即将召开的讨论南共领导机构状况会议的代表特别指示，这一指示的内容与南共中央在1927年底通过的指示是截然不同的。这次代表会议认为，无

论是“右派”还是“左派”的活动,在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前者是企图把“民族斗争转移到工会运动中去”,并力图在自己的工作“尽可能地凌驾于党之上”,而后者也没有能够使党积极活动起来和组织任何统一的行动,甚至在大选期间也是如此,同时也没有能够“利用自己的正确路线,使党及时地对重大政治事件作出反应”,而是局限于在领导层内开展斗争,没有将这条路线贯彻到群众和党员中去。代表会议建议从组织上加强党,而措施之一是建立“一个有能力的和无派别之争的中央领导机构”。萨格勒布党组织第八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党反对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新政策和新工作方法的萌芽。

1928年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的同南共代表的讨论会上,“两派的无原则性”及其“机会主义的错误”遭到了谴责。会上通过了《致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的公开信》,号召他们起来结束派别斗争和建立能够防止分裂的党的工人领导,“因为党内迄今的知识分子领袖已告破产”。南共中央委员会被撤销,成立了临时领导机构,其任务是本着这种精神筹备党的代表大会。除贝尔格莱德外,《公开信》得到了南共和南共青团的所有组织的支持。

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全面政治危机的气氛中开始进行的。这场危机威胁到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和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霸权主义的生存。准备批准同法西斯意大利签订的内图诺协定的工作激起了全国不满的浪潮。农民民主联盟在国民议会内外强烈地反对这么做。在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和其他城市里发生了持续几天的反帝反法西斯的示威游行,并同警察和宪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南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省委散发了传单,抗议意大利法西斯和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在1928年6月20日克罗地亚农民党议员在国民议会中遭到枪杀之后,在萨格勒布爆发了自发的示威游行,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市民要求建立共和国。克罗地亚农民党的领导号召游行退却,与此相反,南共萨格勒布地方委员会则号

召继续进行示威游行。重新开始的示威游行期间，在同警察和宪兵的冲突中有5名工人丧生，约50人受伤和100来人被捕。萨格勒布警察局禁止独立工会活动，查封了《组织工人报》和《战斗报》，从而导致萨格勒布工人的全面罢工。由于这些行动，约瑟普·布罗兹也于1928年8月4日被捕，并在1928年11月以“炸弹案”被判处5年徒刑。在审讯中，他承认自己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并在工人中间宣传了共产主义思想，但是他在资产阶级法庭面前并不感到有罪，因为他只承认自己党的法庭。1928年秋天，塞尔维亚忿忿不平的农民举行了非党派的群众集会。9月初贝尔格莱德的青年工人发起了示威游行。斯洛文尼亚工人也举行了抗议集会。1928年12月4日萨格勒布大学生的群众性抗议集会和总罢课，以示威游行和同宪兵发生流血冲突而告终。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最广泛阶层人民的深刻的不满情绪。但是，实行独裁制度的最后准备工作也正在进行。阶级工会组织遭到禁止，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的反对者在全国，尤其在克罗地亚和马其顿遭到大规模的逮捕。

在召开了各地区州和省的代表会议之后，南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11月5~16日在德累斯顿召开。参加大会的有26名代表，以及共产国际的代表（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和德·扎·曼努伊尔斯基）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约瑟普·契任斯基）。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有2122名党员，组成365个支部、83个地方委员会和25个地区委员会。

在代表大会上，党内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右派”的“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遭到了谴责，而“左派”在组织工作中的错误和所采取的党内行政措施也遭到了谴责，尽管根据代表大会的评价，“左派”是主张正确的政治路线的。代表大会特别尖锐地批评了西马·马尔科维奇的派别活动，要求他无条件地服从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以此作为他留在党内的条件。西马·马尔科维奇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并本着这种精神发表了致贝尔格莱德党组织成员的《呼吁信》。该组织受他的影响在代表大会

前夕脱离了党。代表大会决定“实行党的最严格的集中,最坚决地阻止一些地区之间的政治分裂现象”;应该让党员了解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形式和方法。代表大会要求在党内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并为“正常地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创造条件,但这一斗争不能导致建立新的派别”。授权党中央在出现违反党的纪律或重现派别斗争时可以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包括开除出党。代表大会决定,党的领导机构必须主要来自产业工人队伍的党的干部组成,必须照顾民族成分、各地区的代表比例、以及年龄结构。大会选举了16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入南共中央政治局的有:久罗·贾科维奇、久罗·萨拉伊、日沃拉德·佩察尔斯基(他们三人组成政治局书记处)、拉扎尔·斯特法诺维奇和约万·马利希奇。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要求共产国际同意让约瑟普·契任斯基(米兰·戈尔基奇)也进入南共中央政治局。

南共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和党的任务是根据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8月下半月举行)的判断、方针和决议而确定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认为,帝国主义的危机在加深,新的革命斗争阶段即将来临,在这种情况下,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属于这样一类国家,它们的革命将分两个阶段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工农革命、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帝国主义分子正在策划进攻苏联,而社会民主党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因此必须同它进行更加坚决的斗争,包括在改良主义的工会内部建立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组织。本着这种精神,南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分析国内政治形势时认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正经受着深刻的农业、工业、财政和国家危机,这一危机“越来越促使劳动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和开辟革命的前景”;“南斯拉夫近年来整个内外政治形势是在备战的标志下发展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是帝国主义列强进攻苏联的基地之一,也是世界上威胁邻国的“最军国主义化的国家之一”。代表大会采取了反对战争的原则立场,并对工人阶级提出任务,要

它们在发生战争时宣传失败主义，组织总罢工和举行起义，“特别是在发生反对苏联的战争时”更应如此。遵照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估计，代表大会提请人们注意国内正在为实行独裁作准备，并认为这是统治集团准备反苏战争的组成部分。根据共产国际总的估计，代表大会认为南共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它表现为政治上的消极和分裂现象，企图使工会独立于党，“在地下组织中实行合法主义和消极等待”，贬低工人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和农民运动中的作用，夸大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的作用。代表大会要求把党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投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和反对干涉苏联的斗争中去，投入推翻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消灭帝国主义的产物南斯拉夫国家”的斗争中去；同时代表大会强调，“在获得政权和从剥削者手中夺回生产资料之前，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把苏联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堡垒和自己唯一的祖国”。

共产国际认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即将到来的革命将分两个阶段发展。代表大会从这一观点出发分析了国内形势，认为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准备在南斯拉夫实行“公开的独裁”，这一情况导致了“国家统一和整个统治制度的公开危机”；国家正进入各族人民“公开提出争取民族独立和争取分离的问题”的时期，即提供了巴尔干国家所特有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同农民群众运动和被压迫民族运动相结合”的可能性。因此，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和建立“工人阶级、农民和被压迫民族运动的革命联盟”是南共的一项基本任务。“为了组织武装起义来反对压迫的资产阶级”，南共不仅应当自己作好准备，而且要使被压迫民族群众作好准备。代表大会认为，克罗地亚农民运动和其他被压迫民族运动反对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的斗争，就其客观内容而言，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是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阶段；然而，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不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推动力，革命的承担者必须是工人阶级和

农民阶级。共产党的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代表大会决定着手建立“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这就意味着要“毫不留情地揭露社会民主党的叛卖政策”（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也就是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一个部分”的斗争，反对统治制度的斗争）；共产党人尤其不应该加入改良主义的工会，甚至在独立工会组织遭禁止的地方也应如此（如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取农民的斗争应理解为“当今最重要的问题”；代表大会要求党坚决拒绝同资产阶级政党领导机构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特别要拒绝同农民民主联盟领导机构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尽管它对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霸权主义进行了最强烈的反抗。南共争取在被压迫民族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的斗争战略仍然同建立巴尔干工农共和国联邦的前景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一战略现在依据这样一种估计：“人民群众”希望分离和建立独立的国家，希望实现“分离权和进行武装起义反对民族压迫的权利”。代表大会决定党将“无任何条件地和毫无保留地”为克罗地亚的独立、为建立独立的黑山、为支持马其顿国内革命组织（统一派）建立独立和统一的马其顿、为建立独立的斯洛文尼亚而斗争。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前景下，代表大会声援“以科索沃委员会为代表的阿尔巴尼亚民族革命运动”，并号召工人阶级帮助阿尔巴尼亚人民争取独立和统一的阿尔巴尼亚的斗争。代表大会承认伏伊伏丁那北部匈牙利少数民族也有分离权，理由是匈牙利族的工人和农民不能期望自己从英帝国主义分子和霍尔蒂政权下解放出来，他们只能同南斯拉夫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工农一道斗争才能得到解放。

南共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国际起着日常具体领导作用的时候举行的。共产国际制定政策，任免各支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南共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首先要以这个国际组织的政治判断和指示为依据。这个国际组织认为“右倾危险”是共产党发展的主要障碍，并认为对苏战争的危险是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而

反对战争和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各支部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判断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政治形势和决定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中，反映出了党的领导的政治成熟程度和能力，也反映出了他们对阶级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现实对比情况不了解，对革命变革的可能性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们一方面把革命变革同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巴尔干邻国的革命发展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却不顾这一切，向南斯拉夫共产党提出了组织本国被压迫民族起义的任务，以此来克服资产阶级的民族政策和口号。在代表大会上恢复了革命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统一，但是与此相反，代表大会关于党的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的决议却充满了宗派主义，并导致冒险主义。

第三章

反对君主独裁的斗争

(1929~1934年)

1. 君主独裁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革命口号

国王的政变。南共的武装起义的方针。党的组织解体。经济危机的后果。

在建国后约10年,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社会、经济、民族和政治矛盾的激化,使得根据1921年维德节宪法建立的国家制度陷入了更深刻的危机,其结果是无根基的和不发达的议会制度被废除。资产阶级政党没有能够巩固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由于王国赖以建立的方式及其1921年实行的国家制度的性质,党派之间围绕瓜分权力而持续不断的斗争成了资产阶级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这些争夺首先表现为对国家制度问题的长期争论和冲突。政治生活的不稳定还表现在政府的频繁更换上,而这些变动往往是国王一手操纵的(1929年以前的23次内阁危机中仅有两次是国民议会引起的)。

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争夺和互不信任,特别是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资产阶级及其主要政党之间的争夺,给当时的政治事件打下了烙印,同时由于它们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中起

主导作用，也对国内整个局势和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之间的相互指责、诋毁和威胁成了公开争论和议会辩论的主要特征，最终在1928年6月20日导致斗殴和流血。当时在国民议会中发生了枪击克罗地亚农民党的斯捷潘·拉迪奇和其他领袖的事件。从此国家陷入了更加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克罗地亚，特别是在萨格萨布出现了骚乱和同当局的冲突。农民民主联盟决定抵制国民议会的工作；8月初又重新提出了彻底修改维德节宪法的问题，并提出了“争取单独的民族政治实体间的一切历史和国家关系”完全平等的要求。这个反对派集团不再同其他政党进行任何谈判，它只把亚历山大国王当作寻求解决危机办法的伙伴。

另一方面，在一些主要的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政党里，如在国民激进党和民主党里（它们之间同时也在为扩大政治影响而不断进行着公开的和秘密的竞争），也在王室的挑唆下出现了内部分化的过程。在这些政党的领导机构中出现了各种派别和集团，其中有“王室派”，它们主张为了捍卫建立在民族合一和国家中央集权原则基础之上的制度可以使用极端的非议会的手段，同时它们同部分大塞尔维亚政治派别、其他政治派别及军界人士勾结在一起，这些人主张为了更有效地同反对中央集权的势力和其他所有的反对派势力进行斗争和防止社会混乱，应该完全抛弃议会制度，实行“铁腕”统治。他们宣传君主独裁的思想，认为这是摆脱党派磨擦和毫无成果的议会制的唯一出路。当时形成这样一种气氛，即在党派互不谅解和唯我独尊的全面政治混乱的情况下，只有君主制（即亚历山大国王）才是能够超脱这种局面和找到摆脱现存政治危机的出路的唯一体制。

没有能够有效地解决损害绝大多数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利益的日益激化的社会问题，经常成为国民议会讨论对象的政党领袖的营私舞弊，政党领导层的不和和争吵，以及政党之间互不相容——这些情况都破坏了人民对政党和整个议会制度的信任，要求撇开政党及其领导来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首先是农民债务过重

问题的倾向加强了(如举行了大规模的非党派的集会)。因此,准备和实行君主独裁制度的工作没有遇到较大的困难和反抗。

对外政策的因素也对实行独裁制度产生了影响。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这块土地上,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也使其领土完整产生了问题。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特别是法西斯意大利都怀有领土野心,而国内的政治不和和混乱现象更是促使那些心怀敌意的邻国跃跃欲试。此外,在很多国家里已经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独裁制度,如匈牙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之后,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和保加利亚稍后为阻止可能发生的社会变革都实行了独裁制度;几乎所有主要是农业社会结构的、小庄园主占优势的和农村人口过剩的欧洲国家,均经历了类似的议会民主制的危机,并以建立资产阶级独裁制度而告终。为了采取非常措施,亚历山大国王事先得到了盟国,首先是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支持。

亚历山大国王以1928年12月底的政府危机作为借口,于1929年1月6日实行政变,他废除了1921年的宪法,并解散了国民议会,理由是议会制和政党制的经验是消极的,它们的冲突威胁着国家本身。同时,国王也利用了广大社会阶层对政党领导的不满情绪,利用了他们以为通过实行独裁能改善国内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期望。根据当时通过的《国王权力和最高国家管理法》,国王成了“国内一切权力”的体现者,理由是他负有“用一切手段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使命;当时组成了以彼得·日夫科维奇将军为首的政府。与此同时,原先仅针对共产党的《保卫国家法》经过增补,也扩大到其他所有政党,它们在1月底也被禁止。很多政党的报纸和其他报纸被查封。以前在区和州里具有一定自治因素的机构被削权或被撤销,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则受到很大的限制或被取消。为了加强国家的中央集权制,为了确立统一南斯拉夫的正统意识,1929年10月通过了一项法律,把国家的名称定为南斯拉夫王国,并且不管民族特点和历史特点把国土划分为9个总督辖区和贝

尔格莱德市政管理区。实行君主独裁,同时也意味着要消灭左翼运动和派别,特别是要消灭共产党组织。南斯拉夫独立工会被彻底取缔;要求增加工资的行动和罢工行动被禁止;工人代表的选举被无限期地推迟;各劳工协会的管理机构中都派驻特派员;着手修改1922年的劳工保护法;警察机构得到指示并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来阻止和惩处工人的“不良行动”。成立了保卫国家的特种法庭,负责审理政治案件,有权作出不得上诉的判决。

新制度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首先依靠军队和警察机器,并得到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分资产阶级政界上层人物的支持,以及得到克罗地亚一些大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代表的支持。然而,实行独裁并没有在国内,也没有在国外引起很大的震惊,没有遇到广泛的愤怒和反抗。不仅如此,政变最初还在部分有南斯拉夫倾向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中间获得了某些支持,而部分小农、中农和其他劳动阶层接受政变是期望它能解决紧迫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改善他们的社会处境。但随之而来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却使这些希望迅速破灭。强迫民族划一的官方政策和否认民族特性,使人们的失望情绪变成深深的不满和愤慨。

一些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也在没有公开抗议的情况下接受了实行独裁,尽管绝大多数政党领袖不同意取消议会政党制,但他们相信这是临时的和短期的措施,以后政党议会生活是会得到恢复的。大部分主要的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他们本身就主张维护和巩固民族合一和国家统一,而这正是实行独裁的理由——唯一不赞成的是实现这一政策的方法。另一方面,民族合一和国家统一的最大反对者,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弗拉迪米尔(弗拉特科)·马切克最初是积极地赞赏取消立宪议会制,希望这是改革国家制度的第一步,而以后则基本上主张进行消极的抵制。

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机构直到1931年才开始放弃这种等待观望的策略,因为那时君主独裁已开始显露出削弱和危机的苗头。

此外,随着政变的发生,一些政党领导机构内部的分化过程也加速了。激进党、民主党和斯洛文尼亚平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也参加了彼得·日夫科维奇将军新组成的政府,不久后独立民主党、克罗地亚农民党、南斯拉夫穆斯林组织和其他政党的一些领袖也表示拥护新制度。

马上对独裁提出谴责和表示要同它进行最坚决斗争的唯一政治组织是非法的共产党。党的领导把亚历山大国王的独裁看作是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化身,并把反对它的行动看作是党还在1923年就已开始的反法西斯活动的继续。南共中央委员会根据南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号召举行武装起义来回答实行独裁制度。但是,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所依据的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激化和“革命即将来临”的形势估计,而不是对国内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现实分析。南共领导机构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建议,要求推翻“军事法西斯独裁”和建立各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国王宣布实行独裁后,南共领导马上向全体党员发出了指示信,并于1929年2月发表了声明,号召工人阶级和农民开展武装革命斗争,“推翻专制制度和建立工农政权”。指示信中强调武装斗争是劳动人民的唯一出路,并告诫党员说,“共产党还没有争取到多数工人这一事实也绝对不能成为消极的理由”。南共和南共青团的很多下级领导机构也发表了号召武装起义的宣言。在没有可能爆发革命的社会和政治形势下(因为无论是广大的社会阶层,还是资产阶级政党都没有准备去反对独裁),以及在非法的共产党本身没有能力开展这项工作的情况下(因为党员的人数仍然很少,同时没有同工人阶级和农民建立牢固的联系),这些都是极端宗派主义的和冒险主义的口号。

武装起义的号召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事实表明对条件的估计是不现实的,而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政策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产党人拒捕时才导致武装冲突。大部分党组织,以及南共和南共青团的省和地方领导机构的活动局限于印发传单和非法的

党的刊物,书写标语,以此来揭露“君主法西斯的独裁”;有些地方还组织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集会、抗议、示威活动和罢工。

起义的号召和一些共产党人在拒捕时进行的武装抵抗,被当局用来在国内外舆论面前为其无情镇压共产党人作辩护。警察局和宪兵队着手搜索、追捕和杀害共产党人,企图彻底破坏南共和南共青团的秘密组织;被捕的共产党领导人往往不提交法院而在警察局的拘留所里被杀害。在侦讯被捕者时动用了酷刑,贝尔格莱德警察总局的拘留所在这方面尤其出名。1929~1931年期间在拒捕时同警察的冲突中,在牢里,以及在组织越境中被杀害的有:南共中央组织书记久罗·贾科维奇,南斯拉夫红色救援会书记尼古拉·海契莫维奇,南共中央委员马尔科·马沙诺维奇、里斯托·萨马尔季奇、博若·维达斯、布拉仓·布拉仓诺维奇,南共青团中央书记帕亚·马尔加诺维奇、米约·奥雷什基、扬科·米希奇、佩罗·波波维奇·阿加、约瑟普·科卢姆博、约瑟普·戴贝利亚克、兹拉特科·什纳伊代尔(死于酷刑)。警察局早在1929年1月就开始在贝尔格莱德,尔后在其他很多地方破坏南共和南共青团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并大规模地进行逮捕。到1932年9月,仅“保卫国家”的特种法庭就审理了83起共产党人案件;1929年里有220名共产党人,而到1933年有几百名共产党人被交付法院审判。被判处15年以下徒刑的人中有:约瑟普·克拉什、米哈利·塞尔沃、久罗·普察尔、特拉伊科·斯塔门科维奇、马尔科·奥雷什科维奇、伊万·米卢蒂诺维奇、奥格年·普里察、奥托卡尔·凯尔绍瓦尼、爱德华·卡德尔、约万·韦塞利诺夫、戈伊科·武科维奇、穆斯塔法·帕希奇、帕夫莱·格雷戈里奇、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博里斯·基德里奇、萨洛蒙·莱维、伊布拉希姆·巴博维奇、巴奈·安德雷耶夫等。1934年年中,斯雷姆米特罗维察的22名被判刑的共产党人因提出抗议,又被加刑2~3年。

独裁制度对共产党人的恐怖行径遭到了共产国际、巴尔干共产党联盟、很多国家的共产党、民主组织和进步人士,以及移居世

界各地的部分南斯拉夫经济界人士和世界进步新闻界的谴责。“自由巴尔干”联盟——它是由一些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通过国际援助革命战士组织和红色援救会国外分会，并在革命者(主要是很多欧洲国家杰出的社会人士和艺术家们)的合作和帮助下建立的——于1929年12月在柏林举办了有关南斯拉夫国内暴行的展览。并多次组织了公开的抗议集会，在1930年8月还以《南斯拉夫国内的独裁》的书名发表了有关逮捕、审讯和杀害共产党人的文件和证据集。

大规模的逮捕，使当局得以成功地破坏了党和团的领导机构和组织；斯洛文尼亚的党和团组织维持的时间最长，一直到1930年4月。尽管在1930~1931年期间为恢复党和团组织作出了努力，并在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和斯洛文尼亚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南共和南共青团在1931年没有能够作为组织整体而发挥作用。南共中央委员会还在1929年就已经不再作为统一的领导机构而进行活动了。一部分中央委员于1929年10月在维也纳成立了“南共中央国外局”，而在国内的中央委员则成立了政治局，最初设在萨格勒布，后来移到卢布尔雅那，最后于1930年4月也迁往国外。从1930年年中到1932年年中，南共领导机构只是偶尔同国内党组织取得联系。尽管1929年5月已经不再把武装起义的口号作为行动口号，但是当时仍然认为“革命形势愈益激化”，并要求党继续作好武装斗争的准备，以推翻“军事法西斯独裁”和建立工农政府，以及解散南斯拉夫和建立巴尔干工农共和国联邦；要求成立秘密的工会组织；排除同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进行合作的任何可能性。当时的南共领导同国内的运动相脱离和依赖于共产国际，在它的内部又恢复了冲突和派别斗争。1930年夏，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更换了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以后又成立了新的领导机构，称为中央领导机关，安顿·马夫拉克任组织书记，菲利普·菲利波维奇任主席。然而，这一领导机关也在1931年11月被撤销，并成立了以菲利普·菲利波维奇为首的临时领导机构。

但是，企图克服领导层内部冲突的努力没有收到较大的效果。1932年6月底，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又成立了以约瑟普·契任斯基（米兰·戈尔基奇）为首的南共临时领导机构。

逮捕和牺牲并没有使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涣散斗志：一些组织、小组和个人深深地转入地下，它们互不联系，继续独立地开展政治斗争。南共中央委员会于1929年3月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无产者报》，同时继续出版理论杂志《阶级斗争》，而南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于1929年4月在萨格勒布重新出版了《青年布尔什维克报》。在监狱里，被当作刑事犯对待的共产党人为争取政治犯的待遇而进行了艰苦而长期的斗争。这场斗争在1935年9月取得了重大成绩，当时根据《政治犯地位和权利条例》，争取到了一些较好的待遇；共产党人把监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校。很多革命者在那里，通过日常斗争和接受有组织的普通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得到了锻炼，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成了南共和南共青团的核心。1930年上半年在斯雷姆米特罗维察监狱和莱波格拉瓦监狱，以及1931年6月在马里博尔监狱，成立了以委员会为首的南共秘密组织。早在1927~1929年就在斯雷姆米特罗维察监狱里开办了第一所党校，而1931年夏末在马里博尔监狱里也成立了党校，坐牢的共产党人把它称为“久罗·贾科维奇”共产主义大学；从1930年夏至1931年春，在莱波格拉瓦监狱也开办了党校。共产党人在党校中学习南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史和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教员是莫沙·皮雅杰、约瑟普·布罗兹、拉多米尔·武约维奇、兹拉特科·什纳伊代尔、奥托卡尔·凯尔绍瓦尼、奥格年·普里察、罗多留布·乔拉科维奇。共产党人在狱中还开始创办自己的第一批地下报纸：1930年在波扎雷瓦茨监狱出版了《青年共产党人报》，1931~1932年在斯雷姆米特罗维察监狱出版了《共产主义者报》和《无产者报》（匈牙利文），等。

从同独裁制度进行的不成功的遭到惨重牺牲的冲突中所取得的教训，是南共踏上逐步克服革命中的公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漫

长道路的起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党人开始更加直接地把政治活动同工农在争取民主权利和解决一些生活问题的日常斗争中的要求联系起来

独裁制度只能在短时间里压制住曾震撼王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矛盾。但是，公民在政治上无权的状况，压制和暴力，增税和服劳役，强行贯彻民族划一的政策等，都导致了不满情绪的全面高涨，民族问题愈益激化和分裂情绪的加强，从而也滋长了极端的民族主义势力的活动，特别是弗兰克分子、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以安特·帕韦利奇为中心的法西斯分裂主义集团、以及总部设在索非亚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伊万（万查）·米哈伊洛夫的追随者的活动。这种情况使逃到国外的政治流亡分子大大增加，他们在邻国抱有反南情绪的统治集团的庇护下找到了进行反南宣传和恐怖活动的据点和支持。

世界经济大危机也对缩小独裁制度的政治基础产生了影响。在南斯拉夫王国，这次大危机对中农和小农的冲击最早和最大。192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导致世界上生产急剧下降和失业人数激增（1932年约有3000万失业者），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激化和大动乱，并导致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变化。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传统机制遭到破坏，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倾向在增强。在经济生活全面紊乱和由此而产生严重社会问题的条件下，一些国家里极右派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在夺取政权时既使用蛊惑人心的宣传，又使用暴力。工人运动不统一和分为互相冲突的社会民主党一派和共产党一派，致使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很容易地取得了突破。1933年1月在德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工人党（纳粹党）上台，并很快实行反共的极权制度，同时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和扩大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还在1933年底，德国就继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掌权的日本之后，退出了国际联盟。国际关系中出现了深刻的危机。

在南斯拉夫王国，由于它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经济危机的

后果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和长期性。根据1931年的普查,南斯拉夫王国共有13934034人,比1921年多近200万。其中以农业、林业和渔业为生的人口占76.58%,以工业和手工业为生的人口占11%,以商业、银行业和交通业为生的人口占4.9%,其他部门的人口占7.6%。本来就已经很小的土地的分割,使农村的财产结构进一步恶化;小农户的收入基本上已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穷苦农民——除无地农民、雇农和短工外,还包括拥有少量田地的农民——人数日益增加,而农业人口过剩也越来越明显。从1923年到1932年,农业人口增加了110万人,而农业以外的全部就业人数增加了约20万人。

农业受经济危机的损害最大,它从20年代中期就已衰退。1930~1931年期间农产品价格出现前所未有的下跌,从而更加扩大了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并大大降低了农民的购买力;同1926年的价格相比(指数为100),1933年农产品价格下降42.8%,畜产品价格下降42.9%,而工业品价格仅下降29.2%。由于美国的粮食大量流入欧洲,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价格猛跌,1930年南斯拉夫的主要出口产品——粮食的出口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同时国内市场上也出现了很大的混乱。1931年6月底,国家对小麦、黑麦和面粉的贸易实行了垄断,这是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更广泛地进行干预的开端。据不完全统计,农民的债务翻了一番多,即从1927年的约30亿第纳尔增加到1932年初的近70亿第纳尔。当时35%的农户欠债;农民借的高利贷的利率高达40—50%,所以欠债的农民几乎把自己3/4的现金收入用来缴税和支付利息。农民的债务问题并没有因1932年4月通过的保护农民法而得到彻底的解决。该法宣布农民暂缓还债,降低利率,并禁止因还债而强制拍卖动产和不动产。拥有少量土地的穷苦农民越来越难以靠来自土地的收入维持生活;长期的贫困使这些农户处在饥饿的边缘,这种情况不仅在土地贫瘠的地方,而且在盛产粮食的伏伊伏丁那和斯拉沃尼亚也是如此。由于世界经济形势困难,南斯拉夫向外的经济移民受到了

很大的限制。受债务、苛捐杂税所迫，广大的农民阶层的生活极其贫困。赤贫的农民和失业的雇工，首先是农村青年，徒劳地流向城市，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工作谋生。

在1929~1930年期间，南斯拉夫的工业产值确实还有所上升，这首先是因为法国和英国加快了对南斯拉夫工矿企业投资的速度。但是从1931年开始，随着居民购买力的降低和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在所有的经济部门中出现了大混乱。同1930年相比，1931年底的铜矿石产量下降33%，铝矾土产量下降38%，铁矿石产量下降74%，出口的数量减少50%，出口的价值减少60%。木材业是最主要的出口工业，其产量也有下降。1931年的国民收入几乎比1927年减少一半。从1930年至1932年，工业企业的总数减少了14.4%，其中部分企业是因为破产，部分企业是因为资本集中和在一些工业部门中建立了垄断组织。大批手工业者也遭破产。一些私人银行也出现了大混乱，1932年宣告破产的有11家银行和117家工业企业。这种状况促使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通过建立混合工业企业和信贷机构而联合起来，并加强了国家在经济中的干预。当时希望通过国家的干预来改善大资本的地位；国家还接受了无力清偿的农民债务，向资本家和大地主支付了巨额赔偿，并帮助私人银行业恢复元气。随着生产下降、价格下跌和出口减少，国家的财政状况恶化，投机倒把和贪污受贿现象愈益猖獗，国家的债务也在增加。由于国内经济、财政和政治局势的恶化，当局已失去了盟国以往的支持，政府在获得国际贷款方面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随着经济活动的衰退，已经不能自由组织工会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也日益恶化。失业率大大上升，在职工人的工资不断减少。1932年有25.7万名失业者向职业介绍所登记求业，而根据某些材料，1934年约有50万完全失业或部分失业的雇佣工人；除农业外的失业工人总数在1933年和1934年增加到30万左右，即占工人总数的30~40%。而对失业工人及其家庭的社会救济几乎没有。通过公共职业介绍所提供的救济是象征性的，如1933年，失业

工人人均每年只有30.5第纳尔,而且这笔钱也是从工人所得税的附加额中提取的。由于一些企业的倒闭和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劳动后备大军在不断扩大,这种状况使雇主能够把工资降到最低生活线以下,并提高劳动强度,雇用廉价的女工和童工。经济危机给青年人带来了特别严重的损害。青年工人做夜班,为了微薄的工资实际上是没有工时限制地劳动着。学徒的境况尤其困难,学手艺变成了无偿地或半无偿地榨取孩子的制度。这些孩子主要来自农村,他们廉价地提供自己的劳动。尽管南斯拉夫按文盲人数在欧洲名列前茅,但学生和学校的数量在减少。南斯拉夫学校数量从1928年的11524所减少到1930年的9372所。大学的物质状况也在恶化,如原来最受优待的贝尔格莱德大学的经费从1924年到1931年减少了50%多。1931年南斯拉夫有14693名大学生,其中只有2.02%的学生来自工人家庭和13%的学生来自农民家庭,尽管农民和工人占总人口的4/5。

南斯拉夫的资本主义制度还在经济危机之前,而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持续破坏期间,非常缓慢地发展着生产力。君主独裁制度激化了阶级关系,并加深了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对国内政局的不满情绪,而经济危机又使人们越来越怀疑社会制度的活力。

在国内政治和经济困难及盟国(首先是法国)要求取消专制制度的压力下,亚历山大国王于1931年9月3日将一部准备实行两院制(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宪法“赐”给了人民。但是,国王的专制仅仅被表面的立宪制度所掩盖。根据这部宪法,最高的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仍掌握在国王手中,国王任命政府,而政府的工作仅对国王负责,而不是对代议机关负责。宪法确认了现有的国家名称(南斯拉夫王国),并批准了根据民族合一和国家中央集权的原则分成9个总督辖区的行政区划。根据新的选举法,只有在各选区都提出候选人的全国性候选人名单才能参加国民议会的选举,并规定要公开投票。这样一来,实际上只允许官方名单参加1931年11月8日举行的选举。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不接受强加于

人的宪法和选举法,号召选民不参加选举。选举是在约有1/3选民不参加,动用暴力和篡改选举结果的情况下进行的。

1931年底,当选的国民议会议员成立了全南斯拉夫的执政党——南斯拉夫激进农民民主党(1933年起改名为南斯拉夫国民党)。该党纲领的基础是“人民和国家统一”的思想,即强加于人的宪法的中央集权和民族合一的基本原则。因此该党在广大阶层的人民中没有威望和影响。

尽管这些变化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范围受到种种限制,但是上述状况也意味着独裁制度崩溃的最初迹象。还在议会选举时就已经出现了第一批公开反对独裁的群众性行动:卢布尔雅那大学发生抗议活动之后,1931年11月5日在贝尔格莱德爆发了大学生反对选举和反对独裁政府的示威游行。而在12月7日新当选的议会开幕的当天,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的大学生也加入了贝尔格莱德大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大学生的示威游行,首先是贝尔格莱德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对削弱当局的统治具有重大的影响。这些示威游行是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力量在实行君主独裁之后举行的第一批公开的政治行动;当时还开始成立进步大学生的广泛阵线,这一状况也促进了民主力量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中的合作。

由于城乡广大社会阶层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日趋恶化,在1932年上半年很多地方人们公开表示不满,某些地方还同政权机关发生了冲突。在一些地区,主要是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斯洛文尼亚、黑山的一些地区,爆发了当地穷苦农民的公开抗议和骚乱。工人的罢工运动和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也逐步活跃起来(1931~1932年期间发生196起这样的行动,有3.8万人参加)。1932年4月在马里博尔边防军兵营里,有些军官企图组织暴动,但遭到当局残酷镇压;在比哈奇和莫斯塔尔,以及1934年年中在海军的某些部队里,一些军人被捕。

1932年初,一些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放弃了对独裁当局的消

极态度,强调要重建议会民主,同时也开始采取一些反对独裁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政治行动。1932年底和1933年初,一些较大的资产阶级反对党的领导集团通过了决议(如《萨格勒布提案》等),谴责了独裁政体,批判了强加于人的宪法所建立的制度,并要求恢复议会民主制;农民民主联盟强调要把整顿国家的要求放在第一位。但是,资产阶级反对党领袖的政治活动只限于使统治集团难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尽管他们本人也被捕和被拘留(如弗拉特科·马切克、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安东·科罗舍茨、哈利德·赫拉斯尼察等),但他们并不准备在提出自己的要求时依靠人民的积极支持,并在同当局发生任何一次较尖锐的冲突时就退缩不前。

法院审讯政治反对者的案件数在增加(仅在1933年就有127起这样的案件,而从1929年到1932年才159起),这表明了反对派的政治活动愈益活跃,削弱了君主独裁制度。这个制度因亚历山大国王于1934年10月在马赛遇刺而失去了自己的主要支柱。同这个君主个人联系在一起暴力统治制度终结了,遗留下来的仅仅是更为突出的阶级矛盾和政治矛盾及更加深刻的社会危机。

2. 共产党的恢复

君主独裁制度的危机。南共策略的变化和党的恢复。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

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同独裁制度的冲突中遭到破坏,它的领导机构流亡国外,无论从组织上还是从纲领上说,都是同国内的生活条件和政治行动相脱离的。南共在1930~1931年期间才开始逐步恢复了一些组织,并同一些党支部和领导机构建立了联系。鉴于自身沉痛的经验,南共和南共青团的一些失去联系的组织和领导机构,甚至往往是单个的党员和团员,尽管不断遭到新的迫害,

但是逐步地使自己的活动适应工人阶级和社会其他劳动阶层的生活条件。新一代党的干部成长起来了，他们恢复或建立了新的党组织。这个进程自1932年年中起发展加快；除了一些党支部以外，还恢复或成立了新的地方、地区、州和省的领导机构。党员人数显著增加：从1932年初的约300~500名增加到1933年的约1400名，1934年底则达到2828名。到1932年秋，斯洛文尼亚党组织得到了恢复，约有450名党员、5个地区委员会和1个省委员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党组织约有120名党员（4月份召开了省的工作会议，而在10月份召开了省党代表会议）；达尔马提亚党组织在20个地方约有160名党员，因此在1932年春建立了州委员会；黑山1932年底在25个地方有26个党组织，约有185名党员，并有5个地区委员会和黑山、博卡、桑贾克、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省委员会，还有13个共青团组织和55名团员。马其顿的党组织在组织上还没有建立联系；克罗地亚党组织的恢复过程是在1932年底根据刑满释放回来的一些共产党人的倡议才开始的；塞尔维亚的党组织在很多地方已经恢复，部分组织还建立了联系。但是西马·马尔科维奇仍在贝尔格莱德开展活动，并以党的名义出版地下刊物《共产党通报》，尽管他由于派别活动已于1929年10月被开除出党。

在1933~1934年期间，南共领导机构（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它已于1934年初被称为中央委员会）成功地同国内组织建立了比较正常的联系，并通过自己的代表帮助这些组织的恢复。1933年年中，在马其顿成立了州委员会，恢复了斯科普里、库马诺沃、韦莱斯、普里莱普和比托利的地方委员会，并同特托沃、什蒂普和斯特鲁米察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在1933年春，米哈·马林科作为中央委员会指导员被派往斯洛文尼亚。1934年初，政治局委员布拉戈耶·帕罗维奇以中央委员会指导员的身分建立了南共贝尔格莱德地方委员会，尔后建立了南共塞尔维亚临时州委员会，并同莱斯科瓦茨、克拉古耶瓦茨、克拉列沃、查查克、乌日策、瓦列沃、奥布雷诺瓦茨和拉扎雷瓦茨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不久后又同沙巴茨、乌

博和弗尔沙茨等地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1934年1月作出了中央委员会迁回国内的决定,但是由于警察局的破坏和逮捕,这一决定的执行推迟了。1934年年中决定成立设在萨格勒布的南共中央国内局,但是这项决定到第二年才得到实现。《无产者报》的出版更加经常了。1934年8月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出狱后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党组织的恢复进程遇到了很多困难。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和逮捕并没有停止;又出现了类似1932年10月底在达尔马提亚或12月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大逮捕,当时在萨拉热窝、图兹拉、莫斯塔尔和布尔奇科,以及不久后在比哈奇共逮捕了250多名南共党员和“同情者”。1933年12月和1934年4月在萨格勒布,1934年1月和6月在斯洛文尼亚,1934年底和1935年初在伏伊伏丁那,1933年12月在马其顿等地,党组织遭到了警察局更大的破坏。但是,这种状况只是短期地阻止或延缓了党组织恢复的进程。1933年10月恢复了达尔马提亚省委员会,约有200名党员。1933年底恢复了克罗地亚省委员会,当时已有很多党组织在萨格勒布、武科瓦尔、卡尔洛瓦茨和苏沙克等地活动,并有约400名党员。尽管屡遭破坏,斯洛文尼亚的党组织在1933~1934年已统一地开展了活动,1934年年中它已有7个地区委员会和约300名党员。黑山党员人数到1934年秋增加到420名。1934年年中塞尔维亚党组织已有356名党员;在马其顿有172名党员,成立了临时省委员会。

一些党报和杂志重新得以出版。1932年2月在斯洛文尼亚,省党的领导机构重新出版了非法报纸《红旗报》,并在1933年建立了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卢布尔雅那“新书”出版社。从1933年1月开始出版了斯洛文尼亚文的《无产者报》。除了1931~1932年在尼克希奇出版的非法报纸《革命者》外,在黑山还出版了几期合法杂志,如《顶峰》、《滚筒》和《花岗石》等。1932年在萨拉热窝秘密出版了南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组织的机关报《共产主义者报》,而南共图兹拉地区委员会出版了《工厂和田野报》。1933年初在巴

纳特南部出版了地区委员会的非法报纸《列宁主义者报》。从1930年到1935年还出版了意大利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合办的报纸《劳动报》。斯洛文尼亚省委员会出版了《处女地》(从1933年6月开始),克罗地亚出版了《镰刀和锤子》和《农民战斗报》(从1934年秋开始),马其顿州委员会出版了《火星报》(1933年),而后省委员会出版了《共产党通报》(从1934年年中开始)。贝尔格莱德党组织在1933年出版了《突击手报》,并于1934年1月出版了党的机关报《共产主义者》。1934年下半年在巴奇卡北部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和匈牙利文出版了《工农革命阵线报》。在南共的影响下,在很多国家还出版了供南斯拉夫移民阅读的报纸。1933~1935年,伊万·克尔恩代利在瑞士主编了一份《克罗地亚之路》月刊,作为克罗地亚民族革命运动的喉舌,主要秘密地向克罗地亚的农民散发。

关押在斯雷姆米特罗维察监狱中的共产党人的组织约有240名党员。1933年11月,在经过长期斗争和10月份的绝食之后,他们胜利地得到了共同的牢房,这样他们就便于开展紧张而系统的思想政治活动,并且能够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莫沙·皮雅杰和罗多留布·乔拉科维奇在狱中翻译了《资本论》第1卷,经奥古斯特·采萨雷茨编辑,于1933年在贝尔格莱德出版,随后又译出了第2卷和第3卷;《资本论》第2卷经韦塞林·马斯莱沙编辑,于1934年在贝尔格莱德由“宇宙”出版社出版。在牢中还首次翻译或重新翻译并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其他一些最重要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33年期间,在苏联出版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的《列宁选集》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南共青团的组织也得到了恢复。1933年底成立了南共青团临时领导机构,而在1934年期间全国各地成立了省级领导机构。这个青年共产主义者的骨干组织约有950名团员。在1934年出版:

《青年布尔什维克》和《青年列宁主义者》(南共青团中央机关报)、《红色信号报》(卢布尔雅那共产党大学生报)、《战斗的大学生报》(国内外革命大学生机关报)、《共产党通报》(萨格勒布共产主义大学生组织机关报)、《青年突击手报》(南共青团斯洛文尼亚省委员会机关报)和《青年共产党人报》(南共青团塞尔维亚省委员会机关报)。南共青团在青年大学生中的活动最为活跃,它动员并带领大学生为争取大学自治和反对当局的各种反动措施而斗争。南共青团员开始参加工会、文化、教育和体育组织。

从1932年开始,共产党人发动或组织了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和罢工运动,参加了农民反对独裁当局的抗议活动,并在贝尔格莱德、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领导了大学生的示威游行和其他反对当局的行动。这有助于党组织的恢复,有助于扩大和巩固那些在改良主义工会、文化和体育协会中逐步建立据点的党组织。尽管这些组织还没有能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跟上世界变化和国内发展的步伐,但是它们在1932~1934年期间已经在阶级斗争和政治生活中占有了位置。共产党人在和其他劳动者一起为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和物质条件而斗争时,以及在努力把工会活动同工人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时,大大地扩大了在地方工会组织中的影响,以及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马其顿和黑山工会联合会管理机构中的影响,而在一些地区掌握了工会的管理机构(如在达尔马提亚,特别是在斯普利特,掌握了总工会的几乎所有的组织)。在1933年秋劳工协会的选举中,共产党人促进了统一工人工会联合会名单的获胜,并争取到更加经常地进行工人代表的选举工作。工会中心和劳工协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领袖没有接受共产党人关于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建议,阻挠遭禁止的独立工会原先的会员参加工会(在1934年底的南统一工会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更是如此),并解散或帮助解散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工会组织(如在萨格勒布、苏博蒂察和斯普利特)。

据记载,1933年发生了约40起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罢工,参

加者有13344人，而1934年罢工次数增加到75起，约有30500人参加。他们为争取同厂主签订有关改善劳动条件和增加工资的集体合同而进行了斗争。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参加了罢工，而不像以往那样主要是手工业工人参加罢工。就罢工的激烈程度而言，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萨瓦河北岸地区矿工的绝食，塞尼矿和拉夫纳雷卡矿的罢工，斯普利特、索林和卡什特利水泥厂的罢工，奥罗斯拉夫利纺织厂的罢工，拉扎雷瓦茨和查查克皮革工人的罢工和斯洛文尼亚冶金工人的罢工等。在罢工期间越来越经常地发生示威游行，连失业工人和贫苦农民也打着“要面包，要工作”的标语参加了这些示威游行。

在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当中，特别是在农民当中，政治动乱和反对情绪也在增长。这种状况为共产党人加强在农村的影响开辟了道路。成立了一些政治组织，建立了一些农村小组或委员会，它们的任务是组织农村群众、特别是穷苦农民反对强迫还债和缴纳各种苛捐杂税的斗争。同时还在《共产党人为农村做好事》的小册子里发表了共产党的农村工作纲领；并鼓励教师及其组织通过各种合法形式参加工人阶级的运动。伏伊伏丁那、黑山和达尔马提亚等地在扩大农村影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被当局视为共产党组织的南斯拉夫红色援救会的活动也活跃起来。它秘密地开展活动，筹集物资救济反动统治的受害者，关心照料被捕的和被判刑的革命者的家属，为受审的共产党人组织法律辩护，设法要求承认他们的政治犯权利，并把南斯拉夫王国中的恐怖行径告诉公众。

由于德国国内纳粹主义猖獗及其采取侵略和反共的方针，共产国际的政策出现了变化。随着这些变化，反法西斯的斗争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治和宣传活动中占据了愈益重要的位置，尽管当时还没有放弃革命形势即将来临的估计，也没有放弃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是直接任务的方针。当时还开展了一些反法西斯主义行动，特别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生因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和1933年底

迫害保加利亚革命者季米特洛夫的“莱比锡审判案”而采取的反法西斯主义行动。根据共产党的倡议,1934年在南斯拉夫成立了好多个反法西斯和反战委员会。在反法西斯的基础上,还同邻国的一些共产党建立了合作,为了解决民族问题还同意大利共产党(早在2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和奥地利共产党建立了合作。在南共的倡议下,奥地利共产党在1930年第一次就奥地利境内斯洛文尼亚族人的自决权和分离权表明了态度。南共和意共通过“统一的和独立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口号使这一原则具体化了。1933年2月,南斯拉夫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通过了为反对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统治集团煽动战争的政策而一致行动的宣言:支持两国被压迫民族和少数民族在各自国家里争取民族解放、自决和统一的斗争,并承担义务:共产党人要努力使统治民族的工人阶级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结成联盟。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赞同下,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奥地利共产党在1934年4月签署的三党宣言中强调了斯洛文尼亚民族的自决权,指出这意味着要为该民族的统一而斗争。南共代表参加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代表大会——世界青年反对战争和反法西斯代表大会(1933年9月)和世界妇女反对战争和反法西斯代表大会(1934年7月)。

南共在团结进步作家、政论家和艺术家方面,并在通过大量合法的和半合法的报刊及发表马克思主义著作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由于实行了君主独裁和禁止任何反对派的政治活动,文化领域成了唯一还能比较自由地表达思想的地方;为了缓和政治上宛如一片荒漠的景象,专制当局在某种程度上容忍了一些文化活动,因为它注意到这些活动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而在文化创作者中也只有极个别人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然而在20年代末,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开始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社会危机和议会制危机预兆的出现,在上升的资产阶级和为其制定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之间开始产生最初比较明显的分歧迹象。文化界的政治化进程在加快,最初大部分是对当

局镇压的自发反映，而在一两年以后，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就其对知识分子、文化机构和文化论坛的影响所及，利用文化活动来间接地实现思想政治意图。这样，通过文化也强烈地反映出了南斯拉夫现实中的对立趋势——从主张民族合一的霸权主义、教权主义、分裂主义、维护受到威胁的民族统一而同时又回避其阶级内容，直到尖锐的社会批评。尽管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仍然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的物质条件优裕，生活相对地有保障，他们在政治上有分歧和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但是他们的思想创造活动同他们的力量不相适应，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找到摆脱危机的整套解决办法。知识分子中最咄咄逼人的一部分是各种各样的右派，他们在德国纳粹主义取胜之前还没有一个较固定的方针。与此相反，在30年代初出现了年轻的和富有战斗力的一代知识分子。这代人在南斯拉夫社会危机中成熟起来。他们尽管由各种不同的集团组成，经常缺乏资金、受到书报检查和遭到逮捕，但是他们多多少少倾向于革命的工人运动，并在社会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虽然早在20年代初期，一些具有左翼思想的南斯拉夫文学家（特别是在继承了仓卡尔传统的斯洛文尼亚）曾企图批判地描述社会上被压迫的阶层困难的生活问题，然而只有到经济危机和君主独裁时期，社会批评才成为进步的南斯拉夫知识分子的基本动机。他们通过文学、政论、评论、出版、绘画和戏剧表达自己的想法，创造了“社会艺术”——当时文化界思想最积极的倾向。这样，在共产党组织刚刚开始恢复的时期，“社会艺术”表达了主张社会变革的客观要求，加深了对社会危机性质的认识，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

在南斯拉夫各界的广泛合作下，“社会艺术”代表者的第一批有组织的活动在南斯拉夫的几个中心同时开展：斯特万·加洛加扎于1928年5月在萨格勒布创办了《评论》杂志，1929年1月被禁；约万·波波维奇和诺瓦克·西米奇在大基金达编辑了当年南斯拉夫最年轻的社会抒情诗人作品集《同伴的书》，这本书在1929年1月刚出版即被警察局禁止；1928年12月，帕夫莱·比哈利和奥托·比哈

利兄弟创办了《新文学》杂志,有一批著名的外国和南斯拉夫进步作家参加了编辑部工作,这份杂志在1930年1月被禁止,但是比哈利的“诺利特”出版社一直成功地坚持到1941年战前,成为进步出版事业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社会文学”的很多著作也被翻译和出版。30年代在卢布尔雅那、尼克希奇、萨拉热窝和其他城市也创办了类似的杂志,如布拉特科·克雷夫特主编的卢布尔雅那杂志《文学》(1932~1935年)曾团结了一批共产党人,其中有爱德华·卡德尔、博里斯·集海尔和博里斯·基德里奇。在卢布尔雅那出版了《小丛书文集》,而在斯科普里出版了第一本工人作家的带有社会问题的诗集,题为《1932年》。1929年2月在萨格勒布成立的、而于1935年被禁的“大地”美术团体(创始人是克尔斯托·海盖杜希奇)进行了极其成功的创作活动;在卢布尔雅那也成立了类似的美术团体(“乡土”)。尽管“社会艺术”、特别是“社会文学”为了思想性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美学的特性,但是南斯拉夫社会的整个形势使得它们能够激起社会义愤,成为斗争的号召和解放的理想,同时能够贯穿于南共在工人中,而以后越来越多地在农村中进行广泛的文化教育活动之中。有些地方在工人、农民当中也成功地进行了文化创作活动(如所谓的“稚拙派”画家和作家)。

“社会艺术”是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唯一的全南斯拉夫的文化运动,它保持了民族特色,但它也建设了南斯拉夫共同体,指出了被压迫人民的平等地位及其共同的解放目标和人道主义目标。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社会艺术”最为强大,它对国内其他地方的文化创作活动也产生了影响;在“社会文学”和革命运动的哺育下产生了马其顿第一位现代文学家科斯塔·索莱夫(科查·拉青)的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同时也产生了现代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文学的核心。

由于“社会艺术”和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作家的活动,非法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伦理价值和理想境界得以灌输给公众,并在资产阶级民主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一定的反响。1932年有150名最杰

出的知识分子反对知识界右派对“诺利特”出版社宣传马克思主义即“异端思想”的攻击,从那时起,共产党知识分子成功地吸收了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争取民主自由的各种公开的签名运动和示威游行。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民主知识分子的广泛团结;在这个意义上,《今日》杂志发挥了很重大的作用。该杂志于1934年1~4月在贝尔格莱德出版,由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和米兰·博格达诺维奇主编。

贝尔格莱德的一群超现实主义者也表示了要批判地对待资产阶级的价值,并主张人的彻底自由,但是他们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首先在涉及对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政策的态度上,他们内部就逐步出现分化。

在进步的大学生运动中也可以觉察到这些不断深化的民主思潮的影响。大学生运动不仅在大学中心,而且在许多已经存在或刚刚成立大学生联合会的其他地方也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大学生联合会经常在中学青年、工厂青年中,有时也在农村青年中开展活动。共产党人起着突出作用的进步大学生团体,组织了反对统治当局的示威游行,并同亲政府的大学生组织发生了冲突;领导了反对限制大学自治的抗议行动,并在萨格勒布和国内其他大学中心的教学讲台上发表演讲。

这样,南共在1933~1934年期间基本上消除了独裁制度恐怖统治的后果,并且越来越多地参与日益活跃的阶级斗争及整个政治生活。党内还能感觉到以往的很多不足之处,但也能感觉到要求消除宗派主义的日益强烈的愿望。党员和党组织研究了南斯拉夫社会的经济、民族、文化和其他具体问题,逐步为新的政治纲领和斗争策略打下了基础。根据这方面的经验广泛地认识到:要成功地展开政治行动,就必须有一个组织良好的干部党,同时它要有能力联系工人阶级、其他劳动阶层及更广泛的阶层,为实现他们的经济、民族、民主和其他要求而斗争。

尽管在1934年南共中央仍然坚持共产国际对形势的估计:即

南斯拉夫属于“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方”，那里有可能爆发革命，那里的独裁制度正在开始崩溃，尽管南共中央同各地的联系仍然很差，而且对党的政治活动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但是它毕竟已经开始（在国内党组织活动的影响下）摆脱宗派主义的方针，强调有必要在非法的党的周围建立各种组织和各种运动，有必要利用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机会来开展党的政治活动。党还改变了以往对待改良主义工会的宗派主义态度，并要求共产党员加入这些工会，争取在所有的工人组织中扩大影响，并运用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是，这一切仅仅是对以往党的政策作了一些有限的修改，而在实质性问题仍然受到宗派主义的影响（如对工人阶级的统一，争取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解决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等的认识）。同时，关于即将来临的革命分两个阶段的思想依然有效，并继续坚持关于建立“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和“各民族革命者团体”，解散南斯拉夫王国和建立“各独立民族国家”的立场。在加强南共的影响以及实现被剥削和被压迫群众团结的斗争中的宗派主义表现，就是南共中央在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过去在评价资产阶级右派民族分裂主义集团的某些恐怖行动的政治意义上犯了错误的情况下，还坚持建立非法的“民族革命者团体”的方针。老实说，资产阶级政党对共产党人抱有极端的保留态度，这实际上阻挠了南共努力寻找接近这些政党所联系的群众的正确道路，从而也成为南共拒绝同这些政党领袖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4年6月决定在年底召开南共代表会议。会上将对党在君主独裁时期的政策进行分析，并将在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活动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政治路线。为了进行筹备工作，也要召开各省的党代表会议，并把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拉戈耶·帕罗维奇和约瑟普·布罗兹派回国内。从1934年9~11月举行了南共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黑山和达尔马提亚的省代表会议，同时也举行了某些地方和地区代表会议。

1934年12月24~25日在卢布尔雅那举行了南共第四次全国代

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黑山党组织的8名代表和南共中央的3名代表。会议讨论了国内生活的所有基本问题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党的政治活动。会议认为这是党的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会议对1929~1931年期间党的活动、重大政治错误和宗派主义偏向、以及南共临时领导机构和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和缺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分析，因为正是这些错误和缺点使党的领导层内的“派别倾向”得到加强；此外，会议指出了一些指示不正确或不清楚的地方，指出了党的刊物和党的专业技术机构的不足之处，并指出了领导机构脱离国内的党组织和政治生活的消极后果。会议通过了有关工会工作、农村工作、被压迫民族的群众工作、青年工作、党的书刊工作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

会议认为独裁制度的危机日趋深化，而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则产生了把依靠法西斯国家，即把国家同某些帝国主义列强联结在一起当作摆脱危机出路的想法，因此会议要求党更加坚决地开展反法西斯的活动。同时尽管不是很明确，但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阵线的任务。当然，这一阵线实质上应理解为“工人、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群众的统一战线”。会议强调指出，被压迫人民不能象分裂主义派别所鼓吹的那样依靠法西斯列强来实现自身的解放；解决民族问题的斗争是实现南斯拉夫社会革命改革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会议仍然坚持以往关于革命两个阶段的思想，并把解决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同通过革命斗争建立独立民族国家联系起来，尽管会议没有再提巴尔干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设想。会议认为党应该在军队中开展组织工作，并更加强烈地要求党参加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群众”的日常斗争，把工人的经济要求同反对当局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会议还指出党忽视了在农村和青年中的工作，不理解恢复南共青团和扩大它在一切合法组织中的工作的意义。

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南共的组织结构中应更多地考虑“民族因

素”的建议，代表会议作出决定，在南共的范围内建立克罗地亚共产党和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并在不久的将来建立马其顿共产党”。会议在解释这一决定时指出，这么做有利于加强反对民族主义影响的斗争，有利于“加强党对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吸引力”，有利于“对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进行国际主义教育”。会议认为这不会削弱南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而是会促进革命运动的壮大。尽管有人坚持在党的组织结构中也要反映出民族的特性，但是这个决定毕竟不是关于在党的内部组织中协调阶级“因素”和民族“因素”的完整思想的产物。由此产生了在贯彻“民族因素”方面的不彻底性，其表现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建立马其顿共产党的工作被推迟了，关于建立塞尔维亚共产党的要求和讨论建立黑山共产党问题的建议遭到拒绝，却作出了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部分领土划入克罗地亚共产党活动领域的决定。

在代表会议上选出了由12名委员和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入政治局的有：米兰·戈尔基奇（政治书记）、布拉戈耶·帕罗维奇、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卡米洛·霍尔瓦廷和阿道夫·穆克。

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意味着南共的组织恢复过程接近尾声，在多年的反独裁斗争中党内一批新干部成长起来了。尽管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仍然存在，但非法的党在国内召开代表会议本身表明，南共已经基本上从过去所遭受的暴力镇压的严重后果中恢复过来了。在会议决议中还表现出南共今后新的政治纲领的某些因素（这个政治纲领是在反对独裁制度的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首先表达了把政治行动同工农日常生活问题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实现社会劳动阶层的团结的愿望。但是，南共新的政治纲领还没有形成。当时确定的建立反法西斯阵线的思想仍然是狭隘的和不彻底的；仍然有人坚持建立“革命工会反对派团体”和“民族革命者团体”；并保留了民族问题的解决同解散南斯拉夫和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相联系的立场。尽管已经看到党的领导机构同革命

斗争的现实相脱离的许多不良后果,但代表会议并没有坚决主张把党的领导机构迁回国内。

然而,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毕竟为党在争取民主权利、实现经济要求和社会需求及争取民族平等的斗争中团结人民群众的活动开辟了道路,并有助于制定一个摆脱宗派主义的更加完整的政治纲领。

第四章

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1935~1941年)

1. 人民阵线的纲领和南斯拉夫共产党 参与国内的政治生活

30年代中期的国内外形势。人民自由阵线的纲领和党的政治活动。南共的组织发展。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党的政策的调整。

30年代中期,国际关系中的矛盾日益加深,出现了新的政治组合,它们导致了愈益尖锐的冲突。从根本上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1929~1933年)之后,国际关系的特点是法西斯势力在增长和积聚力量,它们越来越露骨地表现出是侵略和战争的策源地,是反革命和加紧镇压一切进步力量、特别是镇压革命的工人运动及其组织的实施者。日本在远东继续进行侵略活动。中国人民在那里坚持革命斗争,特别是从1937年以来成功地抵御了日本的侵略。法西斯意大利于1935年进攻埃塞俄比亚,从而开始了在非洲和地中海的侵略活动。纳粹第三帝国公开要求修改欧洲的国界,旨在为德意志民族扩大“生存空间”;1935年及1936年,纳粹吞并了萨尔区和莱茵区,然后是德、意在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

战中站在叛乱分子一边进行了武装干涉,致使战场扩及欧洲。各国的法西斯专政由于其反动本性和对外侵略政策臭味相投,便互相勾结起来,建立了思想、经济、军事和政治联盟:1936年,德国和日本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公约,次年意大利也加入了该公约;1936年,建立了罗马—柏林轴心,1940年东京也成为其一员。其他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法国,它们遵循的方针是维护本国在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地盘和坚持反共主义,却在咄咄逼人的法西斯国家面前一再退让,并指望这些国家将侵略的矛头对准苏联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为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谓的凡尔赛体系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和体制陷入了深刻的危机。由于日本和德国在1933年宣布退出国际联盟,紧接着意大利也退出,又由于西欧列强对侵略者采取绥靖政策,本来就软弱无能的国际联盟已陷于瘫痪。

苏联在国际上发挥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这成了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苏联以其相当迅速的经济的发展,表明了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破坏作用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成就。这些经济成就为世界上受剥削和受压迫的人民开辟了前景,但同时也使世界进步公众长期看不清苏联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某些消极状况(如强制实行农村集体化,所谓的大清洗和冤假错案,以及其他非社会主义的现象,这一切后来都以斯大林主义的特征而闻名)。面对法西斯势力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侵略政策和露骨的反共政策,苏联政府于1934年加入了国际联盟,从而摆脱了以往强加于它的特殊的国际孤立状态,提出了集体抵御法西斯侵略的倡议。苏联政策中的这些变化也反映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上。面对法西斯侵略、战争和黑暗统治的危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思想。在1933年末和1934年期间欧洲一些国家(西班牙、奥地利、法国等)发生的社会政治事件也促使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必须作出这些变化。在这些国

家中，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进步力量同企图建立法西斯专政或诸如此类专政的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

进步的知识分子为唤醒民主舆论认清人类正受到法西斯的威胁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些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和其他文化人士，以及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享有名望的人士都提出警告，认为全人类的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抵御法西斯的进攻和保卫遭到威胁的人类文明成果。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针的变化，在1935年7月25日～8月21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采取的立场和通过的决议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在制定共产国际新政策方面，其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季米特洛夫以其在莱比锡审讯中的英勇表现对法西斯的非民主和恐怖的本性作了揭露。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认为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最反动和最具有侵略性的分子的恐怖专政，是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产物。而工人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不统一也使得这种以社会煽动和民族煽动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得以猖狂发展。法西斯主义是工人运动的主要的和最大的危险，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为维护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恐怖统治效劳，而且也是因为它威胁着要毁灭民主和人类进步的成果，阻挠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恢复中世纪的统治方法。法西斯主义表明，它不仅是反共主义的势力，而且也是反人民的势力。因此，与法西斯主义相对抗，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并开始组织新的社会运动——反法西斯运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表明，共产主义运动要放弃以往的宗派主义的方针，主张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也就是主张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政党和所有其他的工人政党和组织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同时还主张所有进步的和民主的政治力量在反对侵略的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进行合作。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思想，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政治纲领。代表大会放弃了关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是争取社会进步斗争的唯一主体的观点，同时也放弃了共产主

义运动应当只关心工人阶级本身利益的观点。代表大会号召国际工人运动的所有组织及所有的进步力量和民主力量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同共产党人合作。

世界经济大危机和政策的巨大变化也对南斯拉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南斯拉夫的统治集团一面怀着好感关注着纳粹分子镇压德国工人运动,但同时又害怕德国的复仇主义,因为它唆使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对南斯拉夫提出扩张要求。因此,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摇摆不定。另一方面,事实证明,君主独裁制度无力解决人民生活的迫切问题,更不能解决千百万受剥削的、穷苦的和被压迫民族的群众的社会问题。这些都迫使统治集团在1935年初决定进行国民议会选举,它们声称要实行一定的自由化,并号召所有“建设性的力量”团结起来。

在实行独裁以后遭禁止的政党也参加了选举运动,尽管当局并没有正式准许。同政府的选举名单相对抗,由农民民主联盟、民主党、农民党和南斯拉夫穆斯林组织(在初期)组成了联合反对派联盟。克罗地亚农民党的领袖弗拉特科·马切克被放在联合反对派选举名单的首位。尽管选举制度、恐怖手段和篡改选举结果保证了政府的选举名单得到多数票,但是1935年5月5日的选举表明,统治阶级上层已经基本上不能依靠执政的南斯拉夫国民党来维持君主独裁制度了。在竞选运动中和在选举之后,人民强烈地要求进行民主改革。工人阶级的越来越激烈的和规模越来越大的罢工和要求提高工资的行动,劳动农民队伍中的不满情绪的蔓延,青年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都标志着席卷全国各地的革命民主运动出现了新高潮。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人民群情激愤,黑山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克罗地亚人民的民族运动的加强,都促使多民族结构的南斯拉夫社会的政治局势日益动荡不安。

因此,还在1935年6月底就更更换了政府。以米兰·斯托亚迪诺维奇为首的新联合政府具有较广泛的政治基础,它是在青年激进

派(即人民激进党的成员)、斯洛文尼亚平民党和南斯拉夫穆斯林组织达成协议的基础上组成的。这些党派的领袖组成了执政的政治集团——南斯拉夫激进联盟。为了平息人民的不满情绪,政府表示要放宽政策和进行民主改革。

共产党是在组织上得到了恢复,并对自身政治活动的能力和方法有了更广泛的认识的情况下,进入国内政治蓬勃发展的新阶段的。党中央力图利用议会选举来扩大党在人民中的影响,决定提出工人阶级反对派阵线的名单来对抗当局的名单和资产阶级反对派联盟的名单。工人阶级反对派阵线应当团结工人运动中的一切派别,以及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但是,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派别的领袖拒绝同共产党合作,他们最后决定投联合反对派候选人的票。共产党人在竞选运动中开展了政治活动,传播了有关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及被压迫民族群众联合起来的思想。公开地提出解决经济问题、其他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要求,使得党能够更加顺利地离开地下状态和进入国内的政治生活。

共产国际的政策在它筹备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就已经出现变化。这些变化也促使南共要更加广泛地开展活动和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共产国际领导讨论了南共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文件,认为南共必须更加强调反法西斯的方针,必须更加坚决地抛弃对待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反对党的宗派主义立场。按照这条路线,南共中央于1935年3月底对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进行了修改。这个更加坚决地贯彻人民阵线政策的方针体现在竞选运动中。党在国内的所有力量都参加了这场竞选。

在筹备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南共中央委员会于1935年6月9~10日在斯普利特召开的全体会议上也研究了党的政治纲领问题。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领导对南共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讨论的政治局委员布拉戈耶·帕罗维奇作了报告,对反法西斯纲领作了解释。他主张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和特殊形式的人民阵线——人民自由阵线。与此同时，他强调指出，“法西斯主义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而且也是所有民主阶层的主要敌人”，世界反动派的中心已转移到法西斯国家。在分析南斯拉夫的社会政治关系时，帕罗维奇肯定了南共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确定的对当前革命性质的判断；他强调不应该把人民的概念同工人阶级的概念对立起来，因为“当今全体人民都反对统治当局和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所以“我们当前的革命就其民族性质而言是人民革命”。这样的立场就要求党更加广泛地开展政治行动，并指导党员在现有的政治、文化、体育和其他组织及社会各阶层中建立自己的据点和开展活动。

在提出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方针的同时，这次南共中央全会对解决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可能性和途径的看法也有了一些变化。南共中央一方面强调不改变关于民族自决直到分离的权利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也提醒，不能把重点放在分离上，而应该放在每个民族自己决定命运的权利上，这将成为南共制定民族问题新政策的基础。

南斯拉夫共产党斯普利特中央全会以自己制定的方针，连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新政策奠定了基础。

根据斯普利特会议结论的精神，中央委员会在1935年7月初就已经为建立合法的统一工人党开展了活动。在筹建这个党的工作中，1935年7月7日斯洛文尼亚工人文化团体“自由”协会在采列举行的集会有重要意义。来自斯洛文尼亚各地的1万多名工人和来自萨格勒布及其他地方的工人代表参加了集会。同企图利用集会为其狭隘的党派私利服务的社会党领袖的愿望相反，集会的参加者支持了共产党人主张工人团结的要求。斯洛文尼亚统一工会（斯洛文尼亚产业委员会）主席、共产党人弗兰茨·莱斯科舍克在会上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讲话。根据南共中央委员会的设想，统一工人党将表达工人运动团结的愿望，同时能成为工人运动中其他政

治集团的伙伴，能成为赞成建立反法西斯人民自由阵线的资产阶级反对党内民主派的伙伴。这个合法的工人党的政纲，在萨格勒布发起委员会的会议上，以及后来在同年9月8日党的成立会议上得到了通过。

1935年夏天和秋天，在全国各地频繁举行的政治集会上，除了在集会上最积极的和在很大程度上为集会定调子的农民党左翼代表外，联合反对派其他政党的领袖也发表了演说。共产党人在加强对人民进行政治工作的同时，到处努力把反对党的集会变成人民自由阵线的集会。他们以统一工人党的名义或作为左翼人士参加集会，并同农民党左翼代表进行合作。南共在农民党左翼领导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反映人民反抗情绪的最重大的政治活动中，突出的有：联合反对派的领袖在班尼亚卢卡、斯科普里和克鲁舍瓦茨举行的集会，以及在萨格勒布为庆祝弗·马切克的生日而举行的两天群众集会。1935年8月25日在克拉古耶瓦茨举行的集会是一次最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的最重要的集会。参加者超过4.5万人，他们不仅来自舒马迪亚，而且来自国内其他地方。集会是由民主党和农民党的领导组织的。它们想以此使自己的党获得合法地位，突出自己的纲领的民主性，并希望得到王室的信任，期望被王室邀请去掌权。政府没有能力用暴力来压制人民运动的力量，同时又害怕这种集会的结局，认为在集会上可能会使反对派运动得到更充分的承认和实现团结，特别是其中塞尔维亚部分和克罗地亚部分得到更充分的承认和实现团结。然而，这次集会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它的真正组织者，即农民党左翼和共产党人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集会上阐明了人民自由阵线的纲领原则。这些原则不久前在萨格勒布建立统一工人党的发起委员会的“政纲”中就已提出。资产阶级反对党的领袖尽管在口头上主张自由和民主，但是退出了集会，从而表明了他们在宣布的原则和实际政策之间的差距。联合反对派各党的领袖害怕不断增长的人民运动的力量，以后就避免采

取这种斗争形式,而是局限于召开较小的会议和代表会议。这种情况使南共进一步认识到,在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政纲基础上同资产阶级反对党开展合作的条件还不具备。这就促使共产党人开展能够自下而上地建立人民阵线的行动。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促使南共制定了政治纲领和开展政治活动的方法。南共中央委员会最高负责人米兰·戈尔基奇和约瑟普·布罗兹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们还在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就开始起草《南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任务的决定》。同年秋天,该决定连同对它的说明一道被发往国内。在这个决定中,党的行动中心是要争取消灭独裁制度,废除过去的反动立法,争取民主权利和自由,实行自由的议会选举。人民自由阵线的纲领中扩充了以下要求:更加坚决地开展行动来反对统治阶级上层把危机的负担转嫁给工人阶级的政策;支持工人在争取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改善劳动条件和实行失业保险的斗争中所开展的要求增加工资的行动和罢工行动。纲领还要求改善劳动农民的处境,措施是:推迟偿还债务,取消劳役和免付所得土地的赎金,实行无息贷款和累进税,同时免除贫苦农民的纳税义务。纲领还提出了保护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要求,以及对投机倒把和贪污受贿者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的要求。

鉴于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及其多民族的结构,鉴于资产阶级政党为了巩固自己在独裁时期摇摇欲坠的地位而极力维持在民族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南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还全面地研究了民族问题。决定坚持了下列原则立场:只有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最终解决民族问题并保证受压迫的民族获得充分的自由;同时制定了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开展政治活动的方针。决定强调指出,“共产党人主张塞尔维亚人民应该支持其他民族争取平等的要求和斗争”,并向受压迫民族的人民解释,民族问题“不能依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来解决,只有通过民族解放斗争才能解决。因此,

共产党人坚决反对妄想借助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来解决克罗地亚民族和其他民族命运的任何企图”。决定特别要求不能把反对沙文主义的斗争“局限于泛泛空谈”，因为这样做恰恰“有助于法西斯分子耍弄手腕来指责共产党人是反民族的分子”。因此，“必须用活生生的例子来揭露任何一种沙文主义的表现，指出它实际上不可能导致民族的胜利，而只能导致民族的灾难”。作为真正平等的重要前提，决定要求废除一切“束缚非塞尔维亚民族自由发展”的法律，要求取消人为地把国家划分为总督辖区(省)的制度，“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族所有的文化、教育及其他民族团体和机构自由地活动”，取消对“克罗地亚和其他民族的旗帜、标记和招牌”的禁令，取消在纳税和分配贷款中的不平等待遇，要求在“所有公共机构和国家机构里使用本族语言”。决议还要求“南斯拉夫各民族自由地选举各自的人民议会，首先是克罗地亚议会，其次是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黑山、波斯尼亚和伏伊伏丁那人民议会”。

尽管存在某些不彻底性和宗派主义观点的残余，但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方针，为彻底改变共产党在南斯拉夫社会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由于继续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特别是为废除君主独裁的反动立法而斗争(在这方面共产党人已经享有巨大的道义上的威望，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独裁制度)，而尤其是由于对民族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并有了建立联邦共同体的越来越明确的方针，共产党就为更加顺利地冲破非法状态的束缚、更快地进入国家政治生活、团结广大阶层的人民和同其他民主力量进行合作奠定了基础。共产党强调自己的反法西斯的方针，就为团结民主知识分子创造了更加广泛的可能性。这些知识分子由于受到法西斯的威胁而奋起抵抗法西斯的暴力、毁灭文化和极权主义。毁灭性的威胁要求进行全面的、战斗的和规模更大的反法西斯的动员，这同捍卫受到威胁的人的基本自由和民主成果是一致的。这就是反法西斯运动能够吸引各阶层民主知

识分子的力量所在，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有着不同的倾向。这种情况使得非法的南共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公开的政治生活，同时南共也使知识分子能够跨越民族资产阶级保守的思想框框，并能够参加世界反法西斯运动和奔向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开创的美妙前景。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特别是南共中央政治局从南斯拉夫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人民阵线纲领，对活跃南共的政治活动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南共越来越成功地利用了各种形式的合法活动，同时以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别，以及某些资产阶级反对党和团体。这样做的结果是建立了人民阵线的第一批联合形式，而南共在工会、政治组织和其他合法组织中扩大影响的工作也取得了初步显著的成绩。由于各地条件不同，这种活动在各省和各地区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收到不同的效果。

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1935年夏天举行的集会和其他群众性示威活动具有了人民阵线的性质。在这之后，1935年11月在斯洛文尼亚，以所谓的“斯洛文尼亚国家”和“战斗队员”社团（在它们的后面是民主团体）为一方和以农工运动集团（在它们的后面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机关报《人权报》为另一方，达成了协议。稍后在1936年7、8月里，在农工运动与克罗地亚农民党在斯洛文尼亚的拥护者之间，然后又与马里博尔独立民主党追随者和斯洛文尼亚社会党人之间建立了人民阵线联盟。与此同时，一些农村男女青年团体也参加了斯洛文尼亚人民阵线的政治活动。斯洛文尼亚人民阵线参加了1936年10月区的选举。但是克罗地亚农民党的拥护者很快就离开了这个联盟，接着斯洛文尼亚社会党人也脱离了这个联盟。从此以后，共产党就加强“自下而上地”建立人民阵线的工作，同时组织了集会、游行和游览活动。

南共争取在人民阵线纲领的基础上同克罗地亚农民党进行合作的努力，在克罗地亚也未见成效。这个党的领袖仗着在人民中

占有主导的影响,不接受共产党的建议,理由是克罗地亚的人民阵线已经以该党领导的克罗地亚民族运动的形式建立了。1935年秋天,克罗地亚农民党恢复了克罗地亚工人联盟的工作,其目的是不让建立统一的工会运动和阻止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扩大影响。在这个党里,得到法西斯列强支持的弗兰克分子(乌斯塔什分子)、一部分反动的天主教僧侣、特别是“天主教行动”组织的活动越来越活跃。因此共产党在主张解决农民的迫切问题的同时,更加明确要加强自己在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广大成员及其组织中的影响,特别要加强近几年里在克罗地亚农村内外迅速发展起来的“自耕农协会”和“农民协会”组织中的影响。共产党同独立民主党的成员开展了较多的合作。这个党的大部分领袖是支持合作的。在克罗地亚,以后又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些地区人民阵线活动的范围内,还开展了扫盲运动(称之为“ABC”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一些独立民主党和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合作。在达尔马提亚以及克罗地亚的某些其他地方(如斯普利特、赫瓦尔、马卡尔斯卡、锡尼、克罗地亚科斯塔伊尼察、别洛瓦尔),多次成功地举行了人民阵线的集会。共产党人还成功地把克罗地亚农民党的一些集会变成了人民阵线的集会。

在伏伊伏丁那,1935年秋天在鲁马、基金达、彼得罗夫格勒(兹雷尼亚宁)和许多村庄里多次召开了群众集会。在这以后,1936年10月共产党人同社会党左翼,后来又同所谓的伏伊伏丁那阵线在人民阵线纲领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当时独立民主党的拥护者和克罗地亚农民党的某些领袖在伏伊伏丁那阵线中具有主导的影响。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反对党的代表还就1936年各区选举中提出共同的候选人名单取得了一致意见。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1936年底和1937年期间,青年文化经济运动通过自己的报纸《我们的生活》和刊物《我们的小册子》也开展了政治活动。

黑山人民的反抗情绪在1935年夏天在尼克希奇、维尔帕扎尔、巴尔、科托尔、波德戈里察和采蒂涅举行的政治集会上得到了强烈

的反映。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这些集会具有了人民阵线的性质,并建立了人民自由阵线委员会。参加这种委员会的有共产党人、左翼民主党人、农民党人和联邦派人士。尽管当局在1936年逮捕了约300名共产党员,给了黑山党组织沉重的打击,但是党成功地组织了大规模的政治示威,要求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停止恐怖行动和保证黑山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平等。1936年6月26日在贝尔贝代尔(离采蒂涅不远)举行集会时,同警察发生了冲突,死了6人,伤了30人左右,并逮捕了约100名示威者。

在马其顿,在当局奉行抹煞民族特性政策的条件下,为争取确认马其顿人民的民族地位和平等而进行的斗争,是南共的人民阵线活动的基本内容。在一些地方成立了人民阵线委员会,它们利用了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特别是农民党的集会。1935年秋发表了告马其顿人民书,提出的基本口号是:“在自由的和不可分割的南斯拉夫中的自由的马其顿”。这在人民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反响。马其顿大学生协会“瓦尔达尔”在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大学中成立及其主张建立马其顿人民运动的纲领,促进了人民阵线活动的扩大。马其顿人民运动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成了马其顿政治生活中的积极因素。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产党的人民阵线活动的开端是同农民党和其他反对党的集会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党人在这些集会上发表了讲话。其中最成功的是在比耶利纳、巴尼亚卢卡、萨拉热窝郊区的集会,然后是在莫斯塔尔和波斯尼亚科斯塔伊尼察的集会。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更广泛的地区里,一家合法报纸《人民真理报》在传播人民阵线的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家报纸是巴尼亚卢卡共产党人于1935年7~9月创办和出版的。而从事这方面思想工作的还有一家《犁沟》文学杂志。在1935~1936年期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的青年和妇女反战协会接受了人民阵线的方针,而一些文教团体和其他团体、大学生联合会和中学生组织的纲领和行动也都贯穿了人民阵线的方针。

塞尔维亚共产党人的人民阵线活动也采取类似的形式，如1936年春天在亚戈迪纳(斯韦托扎雷沃)和克鲁舍瓦茨举行了盛大集会。除此之外，党还力图通过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领袖谈判来建立人民阵线。根据党的倡议，在1936年6~11月期间召开了多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一些政党和团体的代表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亚沙·普罗达诺维奇、弗拉迪米尔·西米奇、日夫科·托帕洛维奇、伊万·里巴尔、基里洛·萨维奇)，代表共产党参加会议的除韦塞林·马斯莱沙(他当时是南共中央负责在建立人民阵线方面开展合法活动的全权代表)外，还有帕夫莱·帕夫洛维奇、奥通·克尔斯塔诺维奇、尼古拉·格鲁洛维奇、博日达尔·阿季亚、姆拉登·伊韦科维奇、帕瓦奥·马尔科瓦茨。尽管这些行动没有能建立起联合人民阵线，因为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想同南共达成协议，但是召开合法会议、代表会议和举行集会，以及在塞尔维亚一些县和地方建立人民阵线委员会，都有助于传播共产党人所主张的在反法西斯和民主纲领基础上团结最广泛阶层人民的思想，同时也加强了共产党人在人民中的影响。

共产党在人民阵线纲领基础上扩大政治活动的方针促进了青年运动的发展。30年代中期党的政策的变化和青年群众对政治的广泛兴趣，也要求改变南斯拉夫共青团工作的方法和内容，以及它的组织方式。长期以来，共青团是一个脱离广大青年的人数稀少、活动范围狭隘和严重封闭的组织。1935年8月底在萨格勒布举行了南斯拉夫共青团第四次代表会议。南共青团临时机构书记博里斯·基德里奇参加了会议筹备工作。会议决定要建立自由与和平青年人民阵线和城乡劳动青年联盟；指出南斯拉夫共青团员要参加合法的青年组织和团体；共青团应团结青年，为争取民主权利和民族权利，为实现劳动青年的经济要求和社会要求并反对加强剥削，为改善农村青年的状况，为争取求学的权利和尊重大学的自由，为争取和平与反对反动派、法西斯和战争而斗争。

南斯拉夫共青团工作的这种方针也是以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结论为依据的。这次大会于1935年9~10月在莫斯科召开,会上通过了青年反法西斯和反战的人民阵线纲领,并制定了改组青年团和本着新精神指导青年团工作的思想。根据每个省和地区的特殊情况,南斯拉夫共青团中央详尽地研究了由此而产生的任务,并主张组织全国和各省的合法青年运动,同资产阶级反对党的青年组织进行合作,不管政治、宗教和其他倾向如何而广泛地团结青年,建立共同的文化、体育、经济等团体和组织。

南斯拉夫共青团在青年大学生中拥有最强大的据点。它曾是1935年1月和2月贝尔格莱德大学多起行动的组织者。当时警察和大学生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街垒战,牺牲了一些人,有45名大学生被押进当时在南斯拉夫建立的第一座集中营(维舍格勒)。党和共青团组织了声援活动,支持贝尔格莱德大学生的斗争,要求解散集中营。这些活动在波德戈里察、采蒂涅、乌尔齐尼,以及后来在佩奇,规模特别巨大。因此当局被迫在两个月之后释放了被拘留的大学生,并解散了集中营。除了声援贝尔格莱德大学生的行动以外,1935年在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大学还举行了持续好几天的抗议总罢课。1936年4月,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学生们为了维护大学的政治自由和自治,举行了几乎一个月时间的总罢课,并得到其他大学和学院大学生的声援罢课的支持,这在南斯拉夫公众舆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这些活动过程中,本着人民阵线纲领的精神,实现了同某些资产阶级反对党的学生组织的合作,并在贝尔格莱德大学里建立了大学生统一战线。参加各种所谓同乡会的大学生们在自己的故乡也开展了重大的活动。

越来越关心政治的过程也席卷了中学青年。除了整个国际局势和南斯拉夫局势外,社会进步书籍也对中学生的向左转产生了影响。其中《中学生讲话》一书(1934年初萨格勒布出版)起了重要的作用。书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叙述了青年共产国际关于青年工作的新思想。1935年和1936年在很多地方发生的中学生罢课活

动，证明了南斯拉夫共青团在中学里成功地开展了工作。

对青年工人和农民的工作也得到了加强。除了成立城乡劳动青年联盟(1935年底以前警察还没有禁止它)的分支机构以外，在统一工会联合会范围内还成立了青年小组，它们团结了青年工人，特别是徒工。在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和国内其他地方，它们组织了青年徒工最初的罢工活动。在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人在农村青年协会中的活动也越来越积极。由于摆脱了宗派主义，共产党人在“鹰社”和“童子军”等组织里也开拓了阵地。这些组织中聚集了大量的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

在扩大人民阵线运动方面，所谓的青年和平运动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成立了很多反战和反法西斯斗争委员会，它们在居民区、工厂和学校里组织了集会和各种演出活动。特别是在国际青年和平代表会议(1936年2月于布鲁塞尔)、世界和平代表大会(1936年9月也于布鲁塞尔)和世界青年和平代表大会(1936年9月于日内瓦)之后，这个运动得到了加强。南斯拉夫青年代表也参加了这些大会，并在“让我们今天实现生者的团结，而不要明天在共同的坟墓里实现死者的团结”的口号下，为通过团结全世界青年去进行反法西斯和反战斗争的纲领作出了贡献。

但由于南斯拉夫共青团在根据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方针的精神进行改组的过程中出现了混乱现象，很快使青年运动的迅速发展发生了问题。有些地方不是贯彻扩大南斯拉夫共青团的方针和利用合法的工作形式把共青团活动转移到最广大的青年群众中去的方针，而是出现了解散共青团委员会和组织的现象(如萨格勒布、奥西耶克、贝尔格莱德的部分地区、黑山和斯洛文尼亚的某些地方等)。由于大批的共产党人和许多共青团领导人被捕(其中有博里斯·基德里奇)，南斯拉夫共青团的状况愈益恶化。南斯拉夫共青团不仅处于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而且作为独立和革命的青年组织，它的生存也面临着问题。

随着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合法的妇女团体——妇女运动、女大

学生联合会、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南斯拉夫共产党越来越成功地在妇女当中扩大了影响。在党的倡议下多次举行了妇女代表会议，并使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巴尼亚卢卡、斯普利特、诺维萨德和其他地方的妇女组织建立了联系。在斯洛文尼亚，女共产党人在一些过去社会民主党人具有很大影响的组织里，特别是在劳动妇女和女青年联合会里担任了领导。为此，1935年秋天，当局解散了这个联合会。因新的选举法的公布，进步妇女于1935年10月20日在全国同时举行的行动，有着更加广泛的政治意义。在一些城市的集会和大会上，还提出了争取妇女选举权和她们在整个社会中平等地位的要求。1936年在贝尔格莱德创办了合法报纸《今日妇女报》。

南斯拉夫红色援救会也扩大了活动。它倡议在赦免政治犯的活动中同资产阶级反对党进行合作。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法国、美国和加拿大的组织，以及国际援助革命战士组织也参加了这些活动。在法西斯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后，还广泛地开展了援助埃塞俄比亚人民的行动。1935年10月在萨格勒布举行了红色援救会全国代表会议，并选举出它的中央委员会。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意图，红色援救会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性质和内容，朝着党外的群众性人民阵线组织的方向转变，并很快地改变了名称，最初改为人民保卫会，后来又改为人民援救会。

过去反对君主独裁制度的运动曾大规模地吸引青年和劳动农民，而从1934年底开始工人阶级的运动在明显地发展。1935年和1936年期间，由于经济危机以及国内紧张的阶级关系和整个局势造成的严重后果，发生了数百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的行动和工人集会。这些行动提高了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阶级团结的必要性，同时也加强了共产党人在工会组织中的影响。一些罢工变成了同厂主的持久不懈的斗争，并且往往变成了同警察和宪兵的冲突；有些地方，工人们占领了工厂，设置了警戒线，同警察和工贼发生了冲突，并且上街举行反对工厂主和当局的示威游行（如在

耶塞尼采、科利切沃、萨格勒布和斯普利特的产业工人罢工和杜布罗夫尼克的码头工人罢工)。越来越多的女工参加了罢工、工人集会和示威游行,而工人妻子也越来越有组织地参加活动。

1936年春天的建筑工人大罢工以其尖锐程度和参加人数众多而著称。这次罢工包括了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马里博尔和斯科普里等地近3万名工人。建筑工人在贝尔格莱德同警察和宪兵发生最激烈的冲突,数名工人牺牲,很多工人被捕和被驱逐。在斯洛文尼亚57个纺织厂的工人举行总罢工时(有8500多人参加),工人们占领了工厂20来天,并打退了警察和宪兵想把他们赶出工厂的袭击。就规模而言,突出的工潮还有瓦拉日丁2300名纺织工人罢工,特雷普查2000名矿工罢工,贝尔格莱德油漆工、纺织工和烤面包工人罢工,契切瓦茨和巴拉的矿工罢工,基金达约6400名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罢工,苏博蒂察8000名左右农业工人罢工,以及斯尔博布兰3000名左右农业工人罢工。这一年里仅在伏伊伏丁那就发生了100起左右的农业工人罢工。

工人的罢工以及同厂主、警察和宪兵的冲突,在社会其他阶层中引起了有力的反响,并加强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战斗联盟。劳动者以各种方式表示同情和支持罢工者(附近的市民,特别是商人、手工业者、大学生和农民,为罢工工人的食堂募集食品和钱,为他们的家庭提供手工业服务和其他帮助,并为他们放哨,抵制当局和厂主组织采取的措施)。在某些情况下,声援行动甚至同工人的斗争溶合成共同反对反动当局的统一的政治示威。

绝大多数的工人罢工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他们力图使所有工会组织的成员参加罢工,实现行动的统一。在改良主义分子被工人的行动所鼓舞也参加组织罢工的地方,共产党往往不得不同他们进行斗争,因为他们企图损害工人的利益来同厂主达成协议。党这样做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并有助于工人阶级反对当局借助1936年3月成立的为当局和厂主效劳的南斯拉夫工人联盟及各种压制措施来阻止日益高涨的罢工浪潮的企图。

工人阶级在战斗中的表现,对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人数的增加,以及对加强工会的作用和发展工会的斗争方针都产生了影响。这种情况特别反映在南斯拉夫统一工会联合会中。该联合会的成员由1935年的3万名左右增加到1936年的5.4万名左右。在统一工会联合会范围内开展活动的南斯拉夫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有2.3万多名成员,主要是在伏伊伏丁那。共产党人在统一工会联合会的一些基层组织、地方跨行业的委员会中担任了领导,并在很多州和省的理事会中建立了据点。1936年3月15日在萨格勒布召开的统一工会联合会州代表会议上,共产党人和主张工会统一的人被选进了理事会。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克罗地亚工人联盟的某些组织。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克罗地亚某些地方的工人联盟还接受了阶级统一的纲领。在达尔马提亚,共产党人不仅在统一工会联合会州理事会里,而且在统一工会联合会的各级组织里都有强大的据点。1936年,共产党人接管了黑山统一工会联合会州理事会。1936年4月,在斯洛文尼亚产业委员会(它具有斯洛文尼亚统一工会联合会州委员会的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弗兰茨·莱斯科舍克再度当选为主席。在塞尔维亚,党的某些老干部大多是早期独立工会的积极分子,他们反对加入统一工会联合会及工人总联合会,认为这些工会是改良主义的。然而从1936年秋天起,共产党人在这些工会中的影响也加强了。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些最重要的工业中心里,工会的活动也活跃起来,尽管在工会领导层中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非常强大。在马其顿,针对共产党人日益加强的活动,当局查封了斯科普里和普里莱普的工人之家,禁止了“阿布拉舍维奇”工人协会和逮捕了工会干部。

南斯拉夫共产党还在工人阶级的其他组织里,在社会保险机构里,以及在所谓的工人立法和社会立法范围内产生的一些机构里加强了自己的影响,这种情况导致当局拒绝了工会选举它们的理事会的要求,并在选举工人代表时扰乱正常的法定程序和把自己的候选人强加于人,以此来阻止共产党人和其他拥护工会统一

的人进入这些机构。尽管如此,在每年选举工人代表时,在全国很多工厂和作坊里,统一工会联合会的名单总是压倒南斯拉夫工人联盟和克罗地亚工人联盟的名单。在南斯拉夫银行、保险、商业和工业界职员联合会中,共产党人的影响也在增长。还在独立工会被禁止以前,共产党人就在这些职员联合会中开展了活动,并在很多基层组织中担任了领导。共产党人在打入南斯拉夫印刷工人联合会的工作中成绩较小。共产党人还加强了在劳工协会的代表机构和代理机构中的影响,尽管社会党人在劳工协会的理事会中占优势。

南斯拉夫共产党在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有着新的政治纲领的精神和在国内政治活跃的气氛中开展活动的同时,也加速了组织发展。这个过程在1935年年中贯彻南共中央关于成立国内局的决议之后加快了速度。国内局设在萨格勒布,它直接领导国内党的工作。党中央指导员乔尔杰·米托罗维奇被指定为国内局的领导人,很多党的干部被指定为委员。国内局在它存在的半年时间里,大大加强了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改善了党的联系和促进了党的群众化。然而,情况很快就表明,不论是由于工作的繁重和复杂,还是由于国内局在权力和干部组成方面受到限制,都有必要在国内建立更有权威的领导机构。一些中央委员,特别是布拉戈耶·帕罗维奇于1935年秋天在国内作一番逗留之后,也提醒要这样做。他们要求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先迁回国内,然后逐步地把整个政治局迁回国内。当时决定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和弗拉迪米尔·乔皮奇参加国内局。但由于当时警察在全国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阻挠了这个决定的实施。

由于不同的活动条件,以及克服过时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形式的速度不尽相同,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国内各地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在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人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得到了加强,尽管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人当中仍然有着非常强大的据点。在知识分

子中,特别是在大学生中,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人数增加了。他们在党的领导机构里占有很大的比例。1935年秋,在斯洛文尼亚约有480名南共党员,并在卢布尔雅那、耶塞尼采、克拉尼、科切维耶、扎戈列、特尔博夫列、赫拉斯特尼克、罗加什卡斯拉蒂纳、普图伊、贝拉克拉伊纳、古什塔涅、诺沃梅斯托和马里博尔等地建立了党的领导机构。除了具有人民阵线性质的合法报纸《人权报》外,还出版了南共青团省委机关报《青年之路》和工会报纸《劳动报》。共产党人还成立了所谓出版委员会,以便购置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其他反法西斯性质的书籍,用来促进编写所谓中立的和进步的刊物和杂志。

南共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省委员会领导着拥有650多名党员的组织。萨格勒布党组织(有140多名党员、5个区委和1个大学组织)是省内人数最多,同时又是最强大的一个党组织,其次是锡萨克、瓦拉日丁、别洛瓦尔、斯拉沃尼亚布罗德、奥古林、代尔尼采及其他一些地方的组织。来自工人阶层的党员人数增加了,而来自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党员人数也有增加。党组织特别为筹备克罗地亚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而加紧工作。这次代表大会计划在1935年11月底召开。为此,在斯拉沃尼亚布罗德、戈尔斯基科塔尔、克罗地亚滨海地区和萨格勒布召开了地区和地方代表会议,会上选出了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领导机构创办了多种合法报纸,如《综览》、《回声》、《新大学生报》、《青年之声》等。在1936年夏天又创办了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统一工会联合会省理事会机关报《工人报》,该报在全国发行。从1934年9月起和在1935年期间出版了《镰刀和锤子报》,作为南共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省委的地下机关报。还组织了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出版工作。

在达尔马提亚,除了党的省委员会外,还成立了一些地方委员会和县委员会,它们有112个党支部,大部分在斯普利特及周围地区和一些岛屿上,如赫瓦尔、维斯、科尔丘拉、普雷克岛,以及在希

贝尼克、锡尼和马卡尔斯卡等地。1935年秋，在达尔马提亚约有530名党员；在斯普利特出版了进步青年报纸《和平之声报》。

南共塞尔维亚省组织有近900名党员。党在工人和手工业者当中的影响最大，同时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学生当中有强大的据点。通过所谓的同乡会和其他合法的工作形式，学生党员们还在自己的故乡开展了活动，扩大党在人民中的影响。在贝尔格莱德、克拉古耶瓦茨、克拉列沃、查查克、乌日策、瓦列沃、奥布雷诺瓦茨、斯梅德雷沃、沙巴茨、莱斯科瓦茨、尼什、克鲁舍瓦茨、亚戈迪纳、特尔斯特尼克和弗拉涅等地建有党的组织和地方委员会。在贝尔格莱德出版了南共塞尔维亚省委机关报《共产主义者报》（1934年恢复），以及在共产党人的倡议下创办的《新闻周报》，还有《我们的现实》杂志。在内地出现了几家合法的人民阵线报纸（克拉古耶瓦茨的《光明报》、查查克的《新声报》和沙巴茨的《德里纳河流域之声报》）。

南共在黑山、博卡、桑贾克、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组织1935年底有610名左右的党员，其中有430名农民。这些组织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活动。当时黑山的组织最为发展，有很多地区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组织多数在佩奇和科索沃米特罗维察。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学生们在黑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开展了广泛的活动。省委于1935年夏天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突击报》，并出版到1935年10月。科索沃米特罗维察的党组织创办了《黎明报》，它探讨社会问题和文教问题。

早些时期的逮捕及中央的帮助不够，影响到马其顿党组织的发展缓慢。1935年2月，当时的南共库马诺沃地方委员会改为南共马其顿省委员会，它开始把韦莱斯、斯科普里、普里莱普、比托利、什蒂普、斯特鲁米察、杰夫杰利亚和卡瓦达尔齐等地党组织的工作统一起来。同年秋，马其顿党组织约有250名党员，在一些文化团体，特别是在“阿布拉舍维奇”协会、工人之家和人民阅览室里有广泛的影响。这些团体成了共产党活动的讲坛和中心。

1935年秋,在南共中央国内局的直接帮助下,萨拉热窝地方委员会改组为省党的领导机构,并着手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地的单个组织联合起来,但此项活动因1936年初共产党人遭逮捕而中断。南共党员的人数不详,但根据某些材料可以推定1935年秋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约有140~150名党员。1935年期间,伏伊伏丁那好几个城市(彼得罗夫格勒、基金达、弗尔沙茨、贝拉茨尔克瓦、潘切沃、诺维萨德、苏博蒂察和索姆博尔)的地方委员会和一些乡村组织建立了联系,并于1935年9月29日在彼得罗夫格勒召开了省代表会议,会上选出了南共伏伊伏丁那省委员会。1935年秋,在伏伊伏丁那有300名左右南共党员,他们在农业工人当中和一些乡村里有了自己的据点。

把服苦役的和在国外的党员(南共中央机构或国际组织机构中的党员,在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和莫斯科列宁国际学院中学习的党员,以及在一些西方国家政治流亡的党员)都算在一起,南斯拉夫共产党在1935年底共有4500名左右党员,这是自党转入地下以来党员人数最多的时候。

在1935年头几个月里还在进行的对共产党人的搜捕,由于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在夏天几乎全部停止了。很多共产党人及其他被捕的革命运动和反对派运动的成员,或未经审讯而被释放,或被判短期徒刑。米兰·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以此表明所谓的自由化和有别于前政权。然而,当新政府因资产阶级反对党放弃公开的政治斗争而得到一定的稳定之后,又重新开始了对共产党的残酷镇压,企图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1935年底重新开始搜捕共产党人,并很快波及极大的范围,成为1921年“通令”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逮捕以1935年10月锡萨克一批共产党人被捕为开端,接着在萨格勒布以及在贝尔格莱德几乎同时进行,以后又很快地扩大到全国。到1936年春,在全国75处地方共逮捕了将近1000名南共党员和共青团员,而到同年秋,有2000多名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者入过狱。其中近800名受到审讯。当时几乎所有

的省委委员，以及南共中央国内局委员和南共青团中央机构的成员都被捕。党和共青团中央的大部分技术设施，以及省、地区和众多的地方领导机构被破获。

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两地有240名左右的共产党人被捕。在这之后的1935年12月和1936年1月，在卢布尔雅那，尔后在斯洛文尼亚其他地方也进行了搜捕。1935年12月和1936年1月，在达尔马提亚很多地方逮捕了约200名共产党人，而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约100名共产党人被捕。1936年2月初，在马其顿逮捕了70名共产党人和其他反政府者。而在2月底和3月里，在黑山逮捕了近300名共产党人和党的同情者。1936年期间，奥地利警察在维也纳逮捕了好几名南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而在1936年11月，在伏伊伏丁那有122名共产党人被捕，其中包括大部分省委委员和地方领导机构的成员。同年10月，在巴尼亚卢卡也对共产党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

发生如此规模的逮捕，也因为党在加紧政治活动时没有能成功地用相应的合法活动形式去代替过去的地下工作的方法，其次也因为必须同国外的中央委员会保持经常联系的国内局的保密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在逮捕时，警察局在国内局书记乔尔杰·米特罗维奇那里查获了很多文件，特别是一些党组织的报告，里面有接头地点、联络网及很多活动分子的假名。因此，警察局能很轻易地破获党的领导机构。为了逼供，侦查机构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了最残酷的拷打，并在长时间的侦查中，拖延把被捕者提交法庭的时间，使大批共产党人在一段时间里被隔绝和不能进行党的工作。

尽管当时的内务大臣安东·科罗舍茨博士于1936年3月在国民议会里满意地指出了警察同共产主义运动斗争的成绩，然而同时也带着惊恐的心情谈到共产党的工作无孔不入，强调“整个1935年是在共产党大肆活动的标志下度过的”，因此他声嘶力竭地呼吁同“共产主义的莫大危险进行斗争”。他承认“光靠警察、监狱和判

决”是不可能阻止共产主义的，所以要求动员和联合“教会和学校”、“政党、文化团体和社会团体、以及经济组织和整个新闻界”，共同与共产主义进行斗争。当时南斯拉夫王国的军队十分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在陆海军大臣的倡议下，拟定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要求各部和其他机构同时开展行动。当时在县里和中学里还成立了反共委员会，加强了新闻检查，并要求解除所有“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官员的职务。警察局和政府的其他机构加强了同第三帝国盖世太保和其他机构的合作。在反对南共的斗争中，它们还依赖所谓的反对第三国际的国际协约组织。该组织在南斯拉夫出版了反共的《新闻公报》。除了各种各样亲法西斯的和民族主义的组织（如廖蒂奇的“集训队”、霍杰里纳的“战斗队”、各民族大学生组织、民族主义者学生联合会、切特尼克组织、弗兰克分子等）加强了活动以外，天主教和东正教教会的反动上层也更加积极地参加了反共斗争。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某些代表（如斯特皮纳茨、沙里奇等人）还亲自参与建立“十字军”组织，而瓦尔纳瓦大总主教在1937年圣诞节贺词中激烈地指责共产主义。

在国内政治生活愈益紧张和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愈益复杂的条件下，南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措施来限制这次大规模逮捕的损失范围和消除不良后果，同时努力把秘密的联系和工作方法同合法的政治活动区分开。然而，在党遭到大逮捕的沉重打击时，党的领导层内又发生了同一些宗派活动分子的严重分歧。这种情况于1936年4月9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南共中央会议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会上通过的有关党的任务的决议中，不再提为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而开展广泛的和有组织的行动的必要性，轻视了外来的法西斯危险和国内各种亲法西斯组织的活动，片面地评价米·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亲法西斯的政策，忽略了它越来越露骨地同法西斯势力勾结的情况。在围绕政治局人选变动的讨论中分歧加强了。由于保密工作中的过错，布拉戈耶·帕罗维奇已在1936年1月被开除出政治局。同时由于某些中央委员在布拉格被捕（如当时南共中央

组织书记洛夫拉·库哈尔以及伊万·克尔恩代利),党的领导机构的活动能力已处于严重瘫痪状态。因为党的领导机构的工作保密很差,在维也纳的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如卡尔·胡多马利、伊万·马里奇、博里斯·基德里奇、斯尔贾·普里察、德拉古廷·马鲁希奇,于1936年6月又遭逮捕,斯洛文尼亚的一些共产党人也遭逮捕,这些情况更加强了党员对党的领导机构的保留态度。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南共中央4月会议的方针和决议表示不满。它于1936年8月中旬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重新审查了南共中央的政治方针和工作方法。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和由米兰·戈尔基奇、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和伊万·格尔热蒂奇组成的南共中央代表团外,还有当时在苏联的其他一些党的积极分子,如布拉戈耶·帕罗维奇、拉代·武约维奇、菲利普·菲利波维奇、博日达尔·马斯拉里奇、西莫·米留什、维利姆·霍尔瓦伊、德拉戈廷·古斯廷契奇、爱德华·卡德尔。会议批评了南共中央的工作,特别批评了4月会议的方针和结论,指出它们背离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策。会议还指责南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不知道的情况下召开了会议。季米特洛夫强调指出,在南斯拉夫有条件通过同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的合作来建立人民阵线,然而南共中央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使党单纯地为自下而上地建立人民阵线而斗争。会议认为南斯拉夫已被纳入希特勒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因此南共必须加强同米兰·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的斗争。这个政府越来越露骨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把国家同法西斯列强联结在一起,企图推行法西斯制度。会议特别重视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并且首先从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会议特别强调指出,南共必须更加坚决地表明反对分裂南斯拉夫,主张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平等和建立南斯拉夫民主联邦共和国。会议决定任命新的南共领导机构。会议批准了以往作出的南共领导机构迁回国内的决定。为此,米兰·戈尔基奇留在国外,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而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返回国内,为

成立新的领导机构创造条件。这次会议的决定对南共具有深远的意义。它首先为在国内建立党的领导机构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个任务交给了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这意味着他对南斯拉夫革命运动的发展开始产生重大的影响。

1936年11月初,共产国际确定了南共新领导机构的组成。除了戈尔基奇和铁托以外,中央委员会指导员罗多留布·乔拉科维奇和斯雷滕·茹约维奇,以及南共斯洛文尼亚省委委员弗兰茨·莱斯科舍克被任命进入南共中央委员会。尽管在已被撤换的领导机构里,米兰·戈尔基奇曾是一名最主要的负责人,但他作为南共中央总书记,仍然对应在国内成立的领导机构的工作具有较大的权力,包括对新领导机构作出的政治决定的否决权。

本着莫斯科会议方针的精神,南共新领导机构作出了决议和发表了宣言。这两份文件于1937年初发回国内,里面采纳了铁托1936年11月2日寄给国内的《致塞尔维亚的信》中的一些意见,其中对解决南斯拉夫民族问题提出了完整的观点。

南共中央在这些文件中没有忽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因素和民族因素的关系的观点和只有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最终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并在确定开展直接政治行动的方向时强调指出,共产党人主张“在现存边界内建立基于联邦原则之上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自由共同体”;南共同意农民民主反对派关于一些民族的代表会议及议会的作用的观点;现在重要的是根据秘密投票权和比例选举制选举国民议会,使所有的民族,如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以及伏伊伏丁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各民族,都能够自主地决定国家制度。所有这一切“基本上可以保证各族人民能够提出意见并表明他们希望建立有什么样内部制度的国家,并确保今后没有任何霸权、压迫和侵略”。南共中央对不久以前同联合反对派代表协商制定的人民阵线纲领草案提出了批评,指出在这个纲领中必须强调不仅应该承认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大部分资产阶

级政治力量已经承认他们具有民族特性——有自决权，而且应该承认马其顿人和黑山人，以及伏伊伏丁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人民有自决权，同时也应该承认少数民族的平等。

鉴于南斯拉夫社会中民族关系的复杂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科学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取得的成就，南共中央还指出了共产党人和其他主张民主和民族平等的人的貌似矛盾的任务（这些任务产生于实际生活的辩证法）：“没有民族自由就没有民主（应该向联合反对派贝尔格莱德分部再次说明这一点），同时，没有民主也就没有民族自由（应该向萨格勒布再次说明这一点）”。

南共中央1937年1月的决议，特别是宣言，还指出了将南斯拉夫变成“自由人民的自由联盟和民主联邦国家”的目标和道路。根据民族自决的民主权利的原则来解决民族问题，“必须符合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愿望和意志，首先必须符合被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压迫和鄙视的那些民族的愿望和意志”。因此必须终止大塞尔维亚占统治地位的制度。在这里，塞尔维亚人民及其一切进步力量将起特殊的作用。“塞尔维亚的民主人民必须懂得，只有同南斯拉夫各民族开展自愿的合作，才能保证它本身的政治自由和独立。如果不打倒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如果不根除它在本身队伍中的残渣余孽，甚至如果还留下监护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阴影，那么塞尔维亚人民就不可能战胜反动派和法西斯。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压迫其他民族，是不可能自由的”。根据这个宣言，为民族平等和自由而斗争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和其他民族的共产党人和所有民主力量的职责是，阻止南斯拉夫国内外法西斯势力把争取民族自由的崇高情感和愿望用来支持法西斯的战争计划。因此，“任何分割南斯拉夫目前的国家领土或威胁其生存的企图，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都意味着帮助法西斯及其备战活动。任何这样的企图都是违背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切身利益的……为此，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的民主人士必须认识到，任何玩弄分裂的倾向，任何对法西斯民族主义分子（如以帕韦利奇为首的弗兰克

分子和 万查·米哈伊洛夫家族的马其顿法西斯分子)的宽容,都帮助了外国帝国主义分子把世界推向战争的阴谋活动。”

2. 铁托担任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

(1937~1939年)

“我们保卫国家”的运动。争取工会运动的统一和扩大政治影响的斗争(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克罗地亚共产党的成立)。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遇到困难和建立党的新领导机构。

1936年7月,佛朗哥的将领们依仗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军事援助发动叛乱,反对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政府。法西斯国家就此开始将侵略战火扩大到欧洲。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那些震撼着南斯拉夫的国内问题和矛盾,以及捍卫南斯拉夫独立的问题就更加尖锐地摆在面前。当时日本正继续入侵中国,而希特勒也开始更改欧洲的政治地图。1938年3月,德国军队占领了奥地利(“吞并”),紧接着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区移交给德国。在1938年9月签订“慕尼黑协定”——英国和法国的首脑以此认可了法西斯强行改变疆界的作法——之后,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将自己的一部分领土割让给纳粹德国;1939年3月中,德国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建立了第一个傀儡国——“独立的斯洛伐克”。1939年3月,由于德国和意大利军队的干预,西班牙共和国的力量遭到失败。1939年4月,法西斯意大利占领了阿尔巴尼亚。人类面临着新的世界大战。

这些事件严重地影响了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及其所有政治因素的活动。统治集团尽管高唱奉行中立政策,但以赞赏的态度对待法西斯在欧洲的侵略;政府力图用法西斯方法来维持政权,并同德国签订了好几项经济协定和其他协定,致使南斯拉夫在经济上依赖德国经济。但是,1938年12月11日的议会选举中,有1/4以上

的选民没有投票，而约有45%的选票被反对派获得。选举结果表明了人民对这样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对国家愈益屈从于法西斯列强的利益深表不满。在这种不满情绪和南斯拉夫愈益困难的国际地位的压力下，以保罗亲王为首的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决定对克罗地亚资产阶级作出让步。1939年8月26日，在德拉吉沙·茨韦特科维奇（他在1939年2月上台当政府首相）和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弗拉特科·马切克（他事后成了政府副首相）之间签订了协定。该协定被称为克罗地亚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案”。建立了实行广泛自治的克罗地亚总督辖区，并占有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的部分地方，同时还计划建立其他自治的总督辖区。

随着法西斯侵略的危险日益迫近，南共把政治活动的重心转移到保卫南斯拉夫的独立上。在提出“我们保卫国家”的口号的同时，共产党人要求在国内进行坚决的民主改革，作为加强国家防御能力的基本条件。

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是对革命力量和民主力量的第一次大挑战。这次战争唤起世界民主舆论，因为它不仅是内部冲突，而且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法西斯军事干预，其目的是借助国际反动派的力量，并伙同西班牙天主教会中的反动分子和其他反动势力，推翻合法政府，使其不能执行人民阵线的纲领，从而打击世界上整个反法西斯运动。所以，来自54个国家的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其他反法西斯志士自愿参加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战斗。他们相信，这样做也是在保卫自己国家的独立和自由，防止法西斯的威胁。

南共组织了各种声援西班牙人民斗争的活动——从驳斥亲法西斯分子对这场斗争性质的宣传、募集援助物资，到派遣志愿者参加西班牙共和军的国际纵队。南共在宣传活动中以西班牙为例，向南斯拉夫人民指出他们正面临着法西斯的威胁。尽管南斯拉夫政府在西班牙事件中宣布中立，但它还是阻止共产党人的这些活动：很多企图去西班牙的人被逮捕，而加入西班牙共和军部队的人

则被剥夺南斯拉夫的国籍。

在西班牙参加斗争的有1700多名南斯拉夫志愿者。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约700人直接来自南斯拉夫。在西班牙的南斯拉夫战士中还有数量众多的杰出的共产党人、著名的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如布拉戈耶·帕罗维奇、弗拉迪米尔·乔皮奇、马尔科·奥雷什科维奇、阿莱什·贝布莱尔、德拉戈廷·古斯廷契奇、弗兰茨·罗兹曼、伊万·戈什尼亚克、布兰科·克尔斯马诺维奇、杜尚·克韦代尔、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韦利科·弗拉霍维奇、博日达尔·马斯拉里奇、阿莱克萨·代姆尼耶夫斯基、彼得·德拉普欣、乔科·科瓦切维奇、尤利约·瓦雷斯科、梅苏德·穆伊基奇。南斯拉夫志愿者在西班牙战场上牺牲了800多名,伤了300多名。很多南斯拉夫志愿者在西班牙共和军里当上了政委、指挥员和司令员。

随着法西斯侵略南斯拉夫的危险性的增长,南共愈益重视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问题,并通过传单、党的合法和秘密刊物上的文章、以及口头宣传对每个较重要的外交行动作出反应。在1937年期间,南共组织了几起重大的政治示威和群众行动:3月25日法西斯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伯爵来访时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示威游行;4月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爱德华·贝奈斯来访时举行的反法西斯游行;6月7~10日德国外长冯·诺伊拉特男爵来访时举行的示威游行;以及1937年12月法国人民阵线政府部长伊·戴尔博斯来访时举行的集会。尽管宪兵和警察采取了激烈的行动,并事先逮捕了几百甚至几千名反法西斯分子,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人,但仍有数万人走上街头,表达了反法西斯的情绪。

为了扩大人民阵线运动的基础和在人民当中宣传自己的政策,南共支持了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和东正教会的民主力量在1937年夏天和秋天反对批准同罗马教廷缔结的协议的行动。而政府企图通过这个协议来寻求国内外的支持,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1938年3月奥地利被“吞并”时,南共中央反对当局公开赞同

纳粹德国这一暴力行径，并在自己的《争取和平、独立和自由的声明》中指出，希特勒主义是南斯拉夫自由和独立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它企图恢复昔日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东征”计划。这个计划企图经过南斯拉夫向爱琴海挺进，而法西斯意大利则期望到达达尔马提亚和波斯尼亚。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在1938年4月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上也指出了威胁着南斯拉夫人民的巨大危险。当时铁托也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的工作。

在捍卫国家独立的运动中，青年大学生和其他进步青年占有重要的位置。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学生在1938年3月底多次举行了大会和群众集会，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南斯拉夫政府的措施表示担忧和不满，而卢布尔亚那大学的学生组织了反对希特勒占领科鲁什卡的示威游行。南斯拉夫很多地方都举行了保卫国家的集会和反法西斯的示威活动。

1938年夏天，南共在谴责英国和法国对纳粹侵略者奉行投降政策的同时，号召南斯拉夫人民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独立。苏沙克码头工人和市民的示威游行及1938年9月22日和23日同警察的冲突，斯科普里和黑山很多地方、贝尔格莱德、马里博尔、萨拉热窝、莫斯塔尔、巴尼亚卢卡、图兹拉、诺维萨德、查查克、佩奇及其他地方的示威游行，都证实了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的战斗情绪和激励这种情绪的南共富有成效的政治活动。1938年9月，共产党人同黑山的农民党领袖一道，在尼克希奇组织了反对当局的盛大示威活动。四个县的居民参加了这些活动，使得政府首相米兰·斯托亚迪诺维奇在竞选运动中没有能在比莱奇—尼克希奇铁路通车典礼上发表庆祝演说。这是黑山革命民主运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举行的规模最大和最成功的示威活动。卢布尔雅那大学的学生成立了保卫斯洛文尼亚北部边界行动委员会，并在1938年夏天组织了所谓民防劳动营。在南共和南共青团发起的活动中，还有很多志愿者报名去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就签订慕尼黑协定一事南共中央在1938年10月发表声明指出，南斯拉夫当

权者的政策是卖国的政策；并号召南斯拉夫人民起来捍卫受到威胁的国家独立。南共中央在1938年12月的决议中强调，南共的基本任务是组织“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为保卫国家的不可分割和独立而斗争，反对德、意法西斯侵略者及其帮凶”，而要做到这一点的条件是，推翻反人民的政府和建立依靠工人阶级和所有民主爱国力量的国防政府。

在1939年4月法西斯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之后，共产党人在很多地方组织了抗议和示威活动。南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州委员会组织了招募保卫阿尔巴尼亚志愿者的工作。贝尔格莱德统一大学生青年联盟在每天出版的《公报》上标上“南斯拉夫在危险中”的通栏标语。它还提出“我们保卫国家”的口号，成立了保卫国家委员会和大学生营。萨格勒布大学的左派学生通过《新大学生报》的社论写道：“克罗地亚在危险中”。他们要求“让我们来拯救克罗地亚！让我们来保卫南斯拉夫！”斯科普里哲学系进步的青年学生组织了保卫国家的群众集会，指出卡拉万凯的边界同杰夫杰利亚的边界^①是一样的。在南共领导下，黑山很多地方的人民表示决心要捍卫国家的自由和独立。

由于党对捍卫国家独立这一生死存亡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许多活动是在保卫国家独立的感召下进行的），党在广大阶层的人民中赢得了信任和声誉，并且在军队里和在准备抵御法西斯侵略者、保卫国家的爱国军官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在把活动重点转到反对法西斯和法西斯侵略危险上的同时，南共并没有忽略南斯拉夫现实的其他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它特别重视工人阶级社会状况的问题，并努力参与国内当前的政治发展进程。

党的活动的基本方向之一是为工会运动的统一而斗争。但在1937年秋筹备统一工会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因为右翼社会

^① 卡拉万凯边界为南斯拉夫西北部与奥地利的边界，杰夫杰利亚边界为南斯拉夫东南部与希腊的边界。——译者

党人的阻挠，工会运动的统一发生了问题。由于铁托的斡旋避免了分裂。南共中央工会委员会和统一工会联合会领导机构中的共产党人到处奔走，终于作出了代表大会推迟召开的决定。这次代表大会于1938年4月在萨格勒布召开，当时所有的工会已有约10万名会员。会上统一工会联合会的成员一致表示要维护工会运动的统一。会上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有8名共产党人当选；并达成协议，南共的代表也参加《工人报》的编辑部。该报原先是社会党人的报纸，现在成了工人阶级统一的机关报。

在同左翼社会党人的合作中，共产党人希望所有阶级的工会组织和联合会在组织上统一起来，同时也努力同非阶级的工会取得行动上的统一。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它建立了由产业委员会、基督教社会党的南斯拉夫产业联合会和自由党的人民产业联合会的代表组成的斯洛文尼亚中央产业委员会。

尽管警察施加压力和改良主义工会领袖进行恶意宣传，很多罢工仍继续举行。为了阻止罢工和破坏阶级的工会运动，政府在1937年4月15日颁布了《关于最低工资、调解和仲裁的命令》，规定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基本工资，禁止在具有全局意义的部门里（交通、采矿、发电）罢工，而对其他部门则规定在厂主和警察局代表平等参与下进行调解。但是，在1937年发生了约400起罢工，而在1938年发生了约340起罢工。罢工也席卷了较落后的工业部门和农业工人。就罢工的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而言，突出的有斯普利特建筑工人为期两个月的罢工，波德戈里察建筑工人的罢工、德尔瓦尔林业工人的罢工、普里莱普烟草工人的罢工及贝尔格莱德纺织工人的罢工。大部分罢工是成功的。

在黑山，共产党在人民阵线纲领的基础上，为改善穷苦农民的经济状况而进行了独立的政治活动。为此，党在1937年成立了“农民兄弟会”，第二年就被当局禁止。于是南共黑山省委成立并直接领导了“农民自助”合作组织，约有1万户（约5万人）参加。

通过这些合法的群众组织，共产党促使黑山穷苦农民的迫切问题得到解决，并在工人和农民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

在建立统一工人党的工作受挫之后，在政治上的动荡不定导致各种政治力量重新组合（这表现为成立反对派的人民协议联盟）的情况下，南共中央提出了建立合法的劳动人民党的倡议，希望以此保证工人阶级能够参加这个联盟。当时在萨格勒布成立了劳动人民党发起人总委员会（主席是博日达尔·阿季亚博士），接着成立了省、县和很多地方发起人委员会。发表了劳动人民党的纲领，内容包括以往人民自由阵线及统一工人党纲领中的基本要求。1938年5月中旬，在萨格勒布举行了党的成立代表会议，来自马其顿、塞尔维亚、黑山、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劳动人民党在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要求的纲领基础上，很快地团结了广大的支持者，主要是工农当中的支持者，促进了人民阵线思想的宣传。

然而，南共为使劳动人民党加入人民协议联盟所作的努力没有取得成果，重现了1935年统一工人党所遇到的情况，资产阶级反对党的领袖拒绝同劳动人民党合作。因此，南共在1938年秋的议会选举时通过伏伊伏丁那、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的劳动人民党，斯洛文尼亚的农民劳动党和黑山的工人农民党，独立地开展活动，并在警察的追捕下，大力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在克罗地亚出现了严重背离党在竞选运动中和在选举时独立活动的决议的现象。一部分有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认为克罗地亚农民党是克罗地亚民主和民族运动的领导力量。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联合反对派的名单在克罗地亚得到支持。

党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活动日益活跃的情况下，也开展了党内组织整顿的过程。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在1936年底回到国内后首先抓的工作之一，就是要贯彻建立克罗地亚共产党和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的决定。首先在1937年初同南共斯洛文尼亚省委员会举行了会议，以便消除南共中央和斯洛文尼亚省组织之间的

纠纷。这些纠纷是由于这个组织的部分成员想同共产国际直接建立联系的分裂主义倾向而产生的。应铁托的要求,并根据中央的命令,爱德华·卡德尔从莫斯科回到斯洛文尼亚,以便参加南共斯洛文尼亚组织的整顿工作和斯洛文尼亚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斯洛文尼亚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于1937年4月17日夜间到18日凌晨在萨瓦河畔扎戈列山区的切比奈村召开。爱德华·卡德尔在《我们为什么要建立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的报告中阐明了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改造斗争中的历史性作用,他特别对斯洛文尼亚人民正面临着法西斯威胁提出了警告,并强调保护自己的人民免遭这一威胁是斯洛文尼亚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为此,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人应该面对全体斯洛文尼亚人民的问题,而不能象以往那样,主要处理狭义的阶级政策问题,而部分地处理阶级联盟的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斯洛文尼亚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强调必须把反对外来的纳粹法西斯危险的斗争同争取国内民主改革的斗争结合起来,国内的民主改革包括争取民主自由、国家联邦制、召开立宪议会和援助在邻国的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因为斯洛文尼亚人民不放弃建立统一的斯洛文尼亚。宣言强调工人阶级是斯洛文尼亚人民的最有觉悟的、最进步的和最有组织的一部分,因此它对斯洛文尼亚人民的未来负有历史责任。在特别决议中还指出,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的建立应有助于加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团结;要求共产党人以同样的坚定态度同自身队伍中和斯洛文尼亚工人运动中的分裂主义倾向和民族主义倾向进行斗争,因为这些倾向不仅削弱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共同斗争,而且首先削弱斯洛文尼亚人民和斯洛文尼亚工人阶级的斗争。代表大会选举了由10名委员和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选出了2名南共中央委员候选人。弗兰茨·莱斯科舍克当选为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建立克罗地亚共产党的筹备工作是由铁托经办的。代表大会

于1937年8月1日夜间到2日凌晨在萨莫博尔附近的阿宁多尔召开。铁托在报告中叙述了建立克罗地亚共产党的理由，而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则详尽地解释了克罗地亚共产党政治活动的纲领，其中强调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克罗地亚人民真正的利益”的一致性，并要求同民族狭隘性和沙文主义进行斗争，要求克罗地亚人民同南斯拉夫其他各族人民在推翻不民主的政府、争取民主权利和自由、实现民族平等(这是国家共同体生存的条件)的斗争中进行合作。代表大会指出，在争取民族平等的斗争中，自由选出的和享有主权的立宪议会具有特别的作用，它的“使命是在这个国家建立以来第一次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之间达成自由的和民主的协议”，也就是由它们自己自由地确定彼此间的关系和自己的国家共同体。代表大会告诫说，弗兰克分子关于“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家”的法西斯蛊惑宣传和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之间散布沙文主义的仇恨情绪，特别是对塞尔维亚人民的仇恨情绪，以及竭力阻挠在各民族之间达成兄弟协议等，都只能引起战争和法西斯的进攻，而且可能把克罗地亚人民从一个深渊推向另一个更悲惨的深渊。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实现这些历史性任务的根本条件，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团结，刻不容缓地为改善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处境而斗争，以及为所有民主人民力量的合作和团结而斗争。代表大会选出了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久罗·什波利亚里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克罗地亚共产党的建立，不仅加强了工人阶级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民族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而且促使国内其他地区的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力量更加重视民族问题。党也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黑山的民族问题，并同某些接受共产党人关于黑山在南斯拉夫联邦范围内的地位的观点的反对派民主团体和左翼联邦主义者进行了联系。关于多民族的伏伊伏丁那的地位问题的讨论也活跃起来了。更加直接地提出了塞尔维亚人民在实现南斯拉夫民族平等的斗争中的作用问题。南共更加坚决地同

民族主义政党和某些资产阶级政党的观点划清界线，因为它们要在政治宣传中把塞尔维亚人民同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的资产阶级混为一谈。党同时指出，塞尔维亚人民本身也应该同南斯拉夫其他民族一道参加建立平等民族共同体的斗争，并以此来驳斥上述指责。在实现这些要求中，塞尔维亚共产党人依据的是南斯拉夫各民族平等和兄弟友谊的方针。塞尔维亚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从斯韦托扎尔·马尔科维奇和迪米特里耶·图佐维奇开始，都把这一方针作为运动本身的基础。由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地区的民族成分复杂，特别是牵涉到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的地位问题，南共在1937年年中成立了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州委员会。南共早在20年代就要求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在一切权利上同国内其他民族平等。

1937年10月8日在农民民主联盟和塞尔维亚反对党之间建立了人民协议联盟。南共中央就此事发表的一份公报中称这一行动是“朝着南斯拉夫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兄弟协议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铁托指出，在这方面塞尔维亚人民作出了贡献，因为他们日益强烈地要求保证克罗地亚人民的权利。同时铁托写道，这一民主派联盟应该扩充斯洛文尼亚人民的真正代表，并包括作为非常重要的社会因素的工人阶级的代表。青年大学生也赞成协议，并提出南斯拉夫联邦制的要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青年大学生在1937年12月发表了一封“致政工人员、公职人员和尊敬的公众”的公开信，主张加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的兄弟情谊和团结，谴责南斯拉夫穆斯林组织的反动政策及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资产阶级企图瓜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民族主义野心。在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协议的谈判过程中，提出了根据民族重新改组南斯拉夫的问题，并讨论了除克罗地亚总督辖区外，还建立专门的斯洛文尼亚总督辖区和所谓“塞尔维亚国”总督辖区的问题。当时南共在自己的要求中特别提出了马其顿和黑山问题，并坚决反对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和克罗地亚资产阶级关于瓜

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伏伊伏丁那的协定,主张保证这些地区的人民在国家改组时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治地位。马其顿共产党人在1939年夏发表了一本纪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50周年的小册子,其中还刊登了马其顿文的《克鲁舍沃共和国宣言》(1903年)。当时还发表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青年大学生的第三封公开信,信中除了指出战争危险以外,还提出了“争取自由、民主和各民族平等,争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自治”的要求。

当时正在监狱里服劳役的共产党人莫沙、皮雅杰、奥托卡尔·凯尔绍瓦尼、奥格年·普里察、伊万·米卢蒂诺维奇、约万·韦塞利诺夫、扎尔科·兹雷尼亚宁、杜尚·凯尔马夫奈尔、奥尔采·尼科洛夫等人为阐明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这些年来组织了对南斯拉夫各国和各地区民族特点的系统研究。特别是爱德华·卡德尔(斯佩兰斯)写出了《斯洛文尼亚民族问题的发展》一书(1939年4月)。这本书加强了进步的民族意识,促使斯洛文尼亚的民主知识分子和其他创作人员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卡德尔分析了小小的斯洛文尼亚民族的命运,为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反对法西斯危险的共同斗争中解决斯洛文尼亚民族问题奠定了革命的道路,同时他预见到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将结合成为统一的历史进程。

当时还非常重视从组织上整顿青年运动的工作。尽管青年运动在1935~1936年期间出现高潮,但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已感觉到由于南共青团很多组织和领导机构遭到解散而造成的组织上混乱的严重后果。经过同党和青年团的积极分子多次开会和交谈之后,铁托于1937年3月在南共中央下面成立了以伊沃·洛拉·里巴尔为首的中央青年委员会。委员会承担了南共青团临时领导机构的职责,它的任务是恢复共青团的组织,并在反对战争危险的反法西斯和民主纲领基础上建立广泛的青年运动。此外,南共中央在1937年4月初成立了以铁托为首的专门委员会,紧接着通过了该专门委

员会拟定的南共青团改组的纲领及其在团结最广大的青年群众方面的活动方针。

中央青年委员会在1938年年中改为南共青团中央委员会。1937~1939年期间,还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伏伊伏丁那、达尔马提亚、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党的领导机构下面成立了青年委员会。1939年7月中,南共青团已有9000名左右团员,在卡姆尼克附近的小山上召开了南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来自全国的17名代表和南共中央的代表莱斯科舍克和卡德尔出席了会议。会议选举了南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伊沃·洛拉·里巴尔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1937年夏,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内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很快使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南共的生存发生了问题。这一年的7月中旬,党的总书记米兰·戈尔基奇从巴黎被召到莫斯科,一个月后便被撤去总书记的职务,并很快被捕。随着苏联共产党(布)内部进行大规模的清洗(这意味着斯大林对老一代革命家的清算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开始了对其他党在苏联的一些领导人的逮捕。制造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很多杰出人物的法庭审讯,而有些党,如波兰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则被解散。在1937~1938年期间,有100多名南斯拉夫的革命者被捕,他们被毫无根据地指控为“帝国主义间谍”和“托洛茨基分子”,尔后大部分人被枪决或从此下落不明。其中有米兰·戈尔基奇、菲利普·菲利波维奇、弗拉迪米尔·乔皮奇、西马·马尔科维奇、久罗·茨维伊奇和斯捷潘·茨维伊奇兄弟、卡米洛·霍尔瓦廷、伊万·格尔热蒂奇、科斯塔·诺瓦科维奇、沃伊斯拉夫·武约维奇(1936年就被杀)、拉多米尔·武约维奇和格尔古尔·武约维奇三兄弟、姆拉登·乔尼奇、安顿·马夫拉克、西马·米留什和托扎·米留什兄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尼古拉·奥罗夫查纳茨、阿基夫·舍雷梅特、约万·马利希奇(马尔蒂诺维奇)、戈伊科·萨马尔季奇和约万·拉杜诺维奇。

1937年8月中旬,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应南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罗多留布·乔拉科维奇和斯雷滕·茹约维奇的邀请离国去巴黎，接过了党的书记的职务，并将此事报告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但是铁托在履行这一职责时遇到了很难预料的特殊困难。共产国际对铁托送去的报告和其他信件的答复越来越少。财政援助也中断了。这种援助是共产国际向处于地下状态的支部特别提供的，首先用作党的报刊和其他出版物的经费。在南共原先的领导成员中间又重新爆发了派别斗争。伊万·马里奇和拉布德·库索瓦茨把戈尔基奇的撤职和被捕、共产国际对铁托和中央委员会持保留态度以及停止财政援助都解释为南共领导机构不复存在的标志，因此他们开始同国内某些人建立个别联系。不久后在巴黎成立了以伊万·马里奇为首的平行的南共领导中心。1937年底，共产国际领导机构撤销了乔拉科维奇和茹约维奇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同时，原来南斯拉夫侨民通过法国共产党领导机构向南斯拉夫共产党提供援助，现在法共领导机构也拒绝给铁托这笔资金。在西班牙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也感觉到了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遭到了干扰。同时，南共派驻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中央的代表以及在其他有大量南斯拉夫侨民（南共党员在他们中间开展活动）的国家中的代表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南共受到了被解散的威胁。

依靠国内党和运动的力量，铁托并没有在这些困难面前动摇。他首先努力维护党的统一，防止领导层内出现的问题给党在国内的政治活动带来麻烦，并把这一意图写信告诉了卡德尔和里巴尔；同时为了保证领导机构的正常工作，他还邀请当时在巴黎的全体原领导成员参加会议。他们是马里奇和库索瓦茨（在他们尚未开始以宗派主义的方式进行反对活动的时候）、乔拉科维奇和茹约维奇（甚至在共产国际已作出撤销他们领导职务的决定之后）、拉伊科·约万诺维奇、伊万·克尔恩代利和洛夫拉·库哈尔。1937年12月初，铁托建议在斯雷姆米特罗维察监狱中有近200名党员的党组织停止派别活动。在原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佩特科·米莱蒂奇的影响下，在服劳役的共产党人中间出现了一种违背共产国际第

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要求党恢复极端宗派主义政策的主张，而对那些不赞同这种主张的人则采取毫不宽容的态度，这就使得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言不由衷、两面三刀和胆小怕事的现象。通过出狱的共产党人，这种情况也影响了其他的党组织。在多次提出警告无效之后，中央委员会根据铁托的建议决定：撤销监狱委员会和授权莫沙·皮雅杰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整顿斯雷姆米特罗维察监狱的党组织。绝大多数共产党人赞同中央委员会的立场，这样在1938年年中就恢复了监狱委员会，而佩特科·米莱蒂奇身边只剩下一小撮追随者，不久后他们都被开除出党。

在共产国际停止财政援助之后，铁托在致国内党的领导机构的信件中指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为党的工作，为出版报纸、小册子和书籍及组织某些政治活动和其他活动而筹集资金。他要求在南美和北美及某些西欧国家的南斯拉夫侨民中工作的共产党人也参加这项工作。他主张解散在国外的党的领导机构和技术部门，而在国内组织党的领导机构，这样就能比较容易地解决物质问题。

当明白了共产国际在拖延解决所谓的南共问题时，铁托决定返回祖国。他于1938年3月告知季米特洛夫：根据1936年8月莫斯科会议的决定，党的领导机构所在地将移到国内。1938年5月初在塞夫尼察附近的利斯察，成立了南共临时领导机构，其成员有：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爱德华·卡德尔、弗兰茨·莱斯科舍克、米哈·马林科、约瑟普·克拉什、德拉戈·佩特罗维奇、安德烈·扎亚、米洛万·吉拉斯、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尽管根据党章和共产国际迄今的惯例，南共临时领导机构不等于中央委员会，但是它在国内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一次独立的政治行动，它对南共今后的发展和命运具有深远的影响。经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在国内成立了一个能够真正履行党的领导职能的领导机构。

临时领导机构积极开展整党工作。为了帮助一些地方领导

机构,除了克罗地亚,铁托还几次去斯洛文尼亚,并在5月中旬来到贝尔格莱德。当时召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党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已经完毕。代表会议于1938年7月末举行,南共临时领导机构的代表米·吉拉斯和伊·洛·里巴尔参加了会议。会议选举了以穆约·帕希奇为首的南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委员会。

铁托特别重视提高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涌现的和已参加党的领导机关工作的青年干部。衡量党的积极分子的基本标准是对党的事业的忠诚、革命的坚定性和联系劳动人民。要求共产党人遵守纪律,根据党的政策和方针开展活动,同时也强调共产党人在执行既定任务和决定时要发挥最广泛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态度,还强调有必要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还在1937年就加强了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出版工作,并创办了新的报纸和杂志(如贝尔格莱德的《艺术与评论》和《青年文化》,萨格勒布的《科学与生活》和《新报》,彼得罗夫格勒的《人民觉悟》)。共产党人在1936年接办了两年前创刊的杂志《桥》,直到1941年4月,它一直是一份最有影响的匈牙利文杂志。党的刊物的文风也发生了变化,它摆脱了空洞的革命词藻,在题材的选择及探讨的方式上,越来越被党员所喜爱。

铁托曾多次给季米特洛夫写信,要求尽快解决“南共问题”。在这之后,铁托应共产国际的邀请于1938年8月底抵达莫斯科。在铁托的报告和同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员和领导机构讨论的基础上,拟定了有关南共状况的决议和南斯拉夫青年工作的决议;最后在1939年1月5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铁托受命在国内成立中央委员会,即把目前的临时领导机构改组为南共中央委员会。这同时也肯定了铁托迄今在改组和巩固南共方面所做的工作。

返回国内后,在1939年3月15~18日在波欣斯卡比斯特里察召开的南共临时领导机构会议上,铁托执行了关于建立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担任了党的总书记职务。进入南共中央委员会的有:爱德华·卡德尔、弗兰茨·莱斯科舍克、米哈·马林科、约瑟普·克

拉什、来洛万·吉拉斯和亚历山大·兰科维奇。除了铁托作在共产国际会谈结果的报告外，会上还结合国内政局和世界形势讨论了党的活动的迫切问题，发表了《致南共党员的公开信》，信中提出了共产党人在今后时期的行动纲领。鉴于在当前和将来的阶级冲突中，加强革命运动的团结和加强领导这一运动的党的作用和权威，对南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会议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削弱这一团结的一切言行。由于当时流传着革命者在斯大林的清洗中遭受迫害的消息，在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中间，首先是在有左倾思想的知识分子队伍中间，不仅开始出现了苏联的批评，而且出现了实现社会主义解放目标可能性的失望和不信任感，同时在个别共产党人中间也对参加革命运动本身产生了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南共争取在革命纲领的基础上实现运动统一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通过和借助毫无保留地支持和宣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就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南共也接受了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提法。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还接受了苏联官方机关关于逮捕许多南斯拉夫革命者和谴责他们是敌人和帝国主义间谍的说明，并作出了将这些人开除出党的决定，尔后把这些情况发表在南共中央机关刊物《无产者》杂志上。会议决定要对从地区委员会直到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干部以及党的一切工作部门的领导干部进行审查，各省领导机构要召开会议，并在最短的期限内筹备全国会议。会议还作出决议，要对南共黑山省委员会和塞尔维亚省委员会进行改组，并通过了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其在选举中所犯的政治错误和违背南共中央决定的行为的自我批评。

在贯彻这些决议的过程中，1939年6月9～10日在什马尔山下的塔采恩举行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除马其顿和达尔马提亚以外，来自各中央委员会和省委员会的29名党的积极分子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南共完全团结一致的标志下进行的。会上作了有关党内状况、国内外政治形势、南共青团状况和工会状况等报

告。会议批准了新的领导机构的选举和工作,并肯定了新的领导机构特别在清理党的队伍和制定意识形态工作计划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意识形态工作计划包括在国内出版《无产者》杂志,翻译书籍,学习《联共(布)党史》,为党员以及从支部书记到中央委员会领导成员组织学习班等。会议强调,支部是“党的基础,是党得以建立、发展和壮大的基础”,同时重申了列宁主义的革命党与国内秘密工作的条件和社会深刻的变化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会议首先要求加强党在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活跃党内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定不移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和提高警惕。同时会议还强调必须在其他社会组织中开展群众工作,要求让更多的妇女参加党组织和领导机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在遇到战争动员时能够更顺利地保证党的工作的连续性。

尽管近几年来警察局频繁而大规模地进行逮捕,约有3000名党员蹲过牢,但在会议召开时,南共已有了近400名党员。同前一阶段相比,党员人数增加较多的有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党组织,它们分别有1500名和800名左右的党员。

铁托在莫斯科逗留期间(从1939年9月初到11月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批准了铁托在改组党及其领导机构方面所做的工作,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在顺利地发展和开展活动。这样,所谓的南共问题就从共产国际的议事日程上去掉了。

3. 国内革命危机的深化

(1939~194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和国内政治动态。南共政策的变化及其行动的基本方向。文学左翼的冲突。

在资本主义体系出现新危机的条件下,当很多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正着手克服长期的冲突并在共同面临法西

斯危险的情况下联合起来的时候,经过长期公开准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企图霸占全球的侵略成性的法西斯列强挑起了这场战争。1939年9月1日,由于纳粹德国不宣而战地进攻波兰,这场战争就突如其来地和背信弃义地开始了。两天之后,英国和法国因此而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了6年(1939~1945年);60多个国家卷入战争旋涡,40个国家的领土上进行了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那次战争主要是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冲突,而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使它具有了解放的性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国际关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1938年9月签订的慕尼黑协定和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的条约。对侵略者采取投降主义态度的慕尼黑政策遭到了彻底破产,而这一政策的主要鼓吹者、英国首相张伯伦当年曾断言它将确保“我们时代的和平”。这个政策并没有缓和慕尼黑协定签署国之间的矛盾,也没有像西方列强所期望的那样,使德国的侵略锋芒指向东方。1939年春天和夏天,英国、法国与苏联就战时保证援助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的问题进行的莫斯科谈判,由于西方谈判者的反苏主义和波兰统治集团拒绝苏联军队穿越波兰领土而没有获得成功。当这次谈判已隐约地显露出失败的结局时,1939年8月23日突然发表了苏德协议,内容包括十年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在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发生政治和领土变动时划分利益范围和承认苏联在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的利益的秘密议定书。9月底,该协议又补充了经济贸易协定。希特勒决定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挫败西方列强的抵抗,因此他想通过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使德国避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据说这是中欧同盟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苏联政府注意到英法力图把德国侵略的锋芒引向苏联,因此希望通过签订这个条约来消除这一危险,并希望通过履行条约义务尽可能延长时间,确保自己西部边境的和平。

尽管波兰人民及其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抵抗,但德国用“闪电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蹂躏了波兰。当德国在波兰的攻势接近尾声时,苏联军队于1939年9月17日越过苏波边界,占据了乌克兰^①和西白俄罗斯。随后苏联同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了互助条约。这些国家在苏军进驻和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于1940年夏并入苏联。由于芬兰政府拒绝了苏联以更有效地保卫列宁格勒为理由提出的交换领土的要求,在1939年11月底爆发了苏芬战争。这场战争以1940年3月12日签订的和约而告终。1940年,原属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并入苏联。

1940年4月,德军占领了丹麦,而到1940年6月又征服了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随后开始空袭英国,但战绩不大。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于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三国条约,在它们之间划分了在欧洲、亚洲和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在签订这一条约之后,意大利于1940年10月28日向希腊发动了进攻,而德国在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范围内,也把侵略重点转向欧洲的东南部。在希特勒的压力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紧接着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都参加了三国条约。在南斯拉夫1941年爆发的三月事件中,签署参加三国条约的议定书的政府,在人民反抗的压力下垮台了。在这些事件之后,法西斯德国及其欧洲盟国对南斯拉夫发动了进攻,南斯拉夫国家崩溃了;紧接着希腊的抵抗也被摧毁。由于在巴尔干遇到了这些麻烦事,希特勒不得不把原定于1941年5月中旬对苏联发动进攻的日期推迟了五个多星期。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导致共产国际政策的急剧变化,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果。共产国际在斯大林的影响下,放弃了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的方针,强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接受苏德条约,并根据这一条约的精神开展活动。

^① 原文如此。一译者

南斯拉夫共产党也接受了这一切。这样一来，一些国家中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之间在共同抵抗法西斯、实现工会统一及所有其他方面的一切合作形式都中断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重新恢复的冲突，在苏芬战争爆发后进一步深化。共产国际总路线的这些变化，使那些直接面临法西斯侵略的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处于极其复杂的局面中。这些党的政策在战争开始时就出现了动摇，而有些党很快采取了失败主义的立场，这对它们在人民中的威望和在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中的作用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不良后果。

南斯拉夫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本身对苏德条约的签订感到意外，并开始对自己过去以为法西斯列强是对付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最可靠支柱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在它们的队伍中由于战争爆发也出现了混乱。一些主张依靠英国和法国的力量，主张南斯拉夫站在英法一边参战的倾向和行动加强了。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持久。当希特勒成功地横扫欧洲，特别是法国垮台（1940年夏）后，对希特勒“使命”的信仰又重新在南斯拉夫资产阶级上层激起了亲轴心国的情绪，促使它们向法西斯列强靠拢，并加强了在南斯拉夫推行法西斯统治形式和方法的倾向。

多年来一直是德国和英国资本竞争对象的南斯拉夫经济也很快感觉到了欧洲战争的后果。德国工业资本对南斯拉夫市场的渗透大大影响了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也影响了南斯拉夫货币的价值。战争环境使劳动人民的状况恶化，特别是物价高涨为害最烈（南斯拉夫已跻身于欧洲物价最高的国家之列），其原因是：通货膨胀，加紧向法西斯国家出口原料，食品和其他消费品的投机倒把，以及国家的经济政策，一些社会阶层和一些国家机构（特别是流通机构）的特权地位。一个中等工人家庭的生活费用从战争开始到1940年秋天增加了45%以上。在国内形势普遍恶化的过程中，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的反动性马上就暴露出来了。它通过经济政策，即通过扩大同德国的贸易，支持厂主压制要求增加工资

的行动,发布所谓的同投机倒把作斗争的命令,有意识地把经济困难的重担转嫁到劳动群众身上。在克罗地亚总督辖区,长期拖延区议会的选举,却任命了区的管理机构,取消了24岁以下青年的选举权,并允许弗兰克分子盘踞的所谓民防队和农民防卫队对革命运动采取暴力行动。很快,本着法西斯精神,制定了《犹太人法》及各种教育法规。

由于茨韦特科维奇和马切克达成协议和联合反对派联盟垮台,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和活动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协议标志着领导反对派运动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假民主的结束,但南斯拉夫政治生活中的实质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上台后,没有实现自己在纲领中多年来所强调的、并用来笼络克罗地亚人民群众的各种要求中的任何一个。这就加快了这个政党和整个农民民主联盟的分化过程,并动摇了它的政治威望。1940年5月19日举行的区选举特别证实了这一点。尽管当时提出工人候选人名单和独立候选人名单的条件很困难,但共产党人在好几个区里获得了胜利,并在很多区里工农候选人名单或独立候选人名单得到了多数选票和代表席位。过去同克罗地亚农民党和独立民主党结成联合反对派联盟的那些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政党,基本上被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抛在一边,而且它们本身由于在对内对外政策上没有独立见解而处于衰落阶段。这些政党中有一股势力变得最为积极,它实质上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一元主义和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在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协议之后,它同极右势力一道,开始从沙文主义立场出发,鼓吹维护“受到威胁的塞尔维亚民族”,号召“塞尔维亚人团结起来”保卫“塞尔维亚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伏伊伏丁那”,免遭“克罗地亚的威胁”。它们的领导人分裂为小团体和俱乐部,在人民中的影响越来越小。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1939年11月的决定,使南共领导了解了共产国际对国际关系和共产主义运动任务的变化和共产国际总路线的变化。这个决定首先强调了阶级对抗和同资本

主义作斗争的方针。决定估计到“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及其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并设想在帝国主义战争过程中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将迅速成熟,由此出发决定强调国内力量“不能再按‘反法西斯’和‘民主’的界线来组合,而应根据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之间阶级斗争激化的界线来组合”。决定特别强调战争的罪魁祸首是英法帝国主义分子,“因此首先应该开展一场最广泛的运动来说明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及其原因”,揭露“第二国际作为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和进攻苏联的组织者的帮凶所起的叛徒作用”。决定放弃了以往所强调的共产党人同其他政治团体联合的主张,代之以这样的方针:应该在“统一的人民阵线范围内自下而上地进行斗争,不要并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及类似政党的领导机构”。

南共的政治路线适应共产国际政策变化的过程,尽管引起了一些混乱,但没有造成长期的后果,这首先因为南共的政治路线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某种比较明显的变化。南共多年来为在人民阵线纲领基础上实现民主力量和反法西斯力量团结所作的努力,遇到了所有主要资产阶级政党的不断抵制,但它已经为愈益坚决地要求实现社会政治根本变革的革命民主运动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并从南斯拉夫社会最重大的问题和矛盾出发制定了自己的纲领性方针。对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解决,南斯拉夫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和各民族都同样地表示关心。所以,南共主张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方针实质上具有阶级特征,并导向阶级对抗。战争的爆发,参战集团之间统治上层的动摇,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的协议,联合反对派联盟的崩溃,只不过是深化了这个进程。因此,共产国际政策变化后出现的所谓同盟军危机是短暂的。

从对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估计出发,南共一开始就反对南斯拉夫资产阶级统治上层所鼓吹的亲西方的方针,并宣布南斯拉夫人民对站在英法一边作战丝毫不感兴趣,南斯拉夫应该置身于战争之外。南共根据铁托在1940年4~5月号《无产者》杂志上作出

的估计，制定了党在南斯拉夫国际地位方面的政策。铁托指出：“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分子的代理人竭尽全力推动南斯拉夫站在假民主的帝国主义列强一边参加战争”，与此同时，“邻国的帝国主义占领者如意大利和德国等也在不断寻求时机，企图进攻和瓜分我国，破坏南斯拉夫人民的独立，并给人民准备了更沉重的枷锁和灾难”。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南共行动的基本方向之一是同把南斯拉夫拖入战争的倾向进行斗争。在1939年9月开展了反对动员预备役军人的行动。在卡尔洛瓦茨发生了106步兵团哗变，有80名士兵被捕。工人罢工变成了反对战争的示威游行，变成了谴责当局增加出口、纵容投机和减少工资政策的行动。1939年12月初萨格勒布工人的示威游行，特尔博夫列和赫拉斯特尼克约6000名矿工的罢工，“特雷普查”约3500名矿工的罢工，以及莫斯塔尔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都具有这种性质。在当时党所组织的多次反战行动中，1939年12月14日贝尔格莱德的示威游行有着更为广泛的意义。当时数万名工人、学生和其他劳动者涌上街头，在同警察的冲突中有3名示威者被打死，约40名示威者被打伤，其中有些人伤重身死。因为发生了这些示威游行，政府通过了《保卫国家法》补充条例，授权行政当局可以不经法院审判就把共产党人送进集中营，这种集中营很快在比莱奇、莱波格拉瓦和斯梅德雷沃帕兰察等地建造起来。12月17日和18日在斯普利特由于当局禁止工人举行反对物价高涨的集会而爆发了示威游行，并同警察和宪兵发生了冲突，很多人被打伤。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为死难工人举行的葬礼变成了反对当局的政治示威，斯普利特和周围的很多市民同工人一道参加了这次示威。1940年5月11日，南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州委员会在佩奇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提出了“要面包、要和平和要自由”的口号，有几千人参加，其中19人受伤，28人被捕。黑山的共产党人于1940年6月在几个地方组织了示威游行，要求建立人民政府，实现黑山人民的民族平等，并要求依靠苏联和保卫祖国。

诸如此类的反战行动显示了革命民主运动的力量，并加深了反动当局和人民之间的鸿沟。然而，当法西斯侵略南斯拉夫的危险愈益迫近的时刻，一些反战行动，特别是1940年4月里和5月初在黑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马其顿部分地区和国内其他地方举行的示威游行所提出的军队复员的口号，却开始带有失败主义的色彩。因此，南共中央委员会提醒说，这种情况会给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为军队复员的口号将给保卫受到威胁的国家独立造成损害。铁托驳斥了资产阶级就失败主义而向共产党人提出的指责，他于1940年春在《无产者》杂志中写道，共产党人“早在三年多以前”就指出了“为使国家有能力自卫而应该做些什么事情”。铁托强调指出，共产党人必须“同人民一起”，共同消除一切“阻挠我国确保独立”的障碍，而首先应该使人民本身通过建立“真正的人民政府”而把国防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还在1939年秋天就开始了反对物价高涨的斗争，而在1940年春天和夏天，这场斗争就成了广泛的运动。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斯洛文尼亚，成立了街道、地区和乡村委员会，组织了代表会议和进行了群众性示威游行。在开展这些活动的过程中，还选举了向区、县当局递交请愿书的代表团；而在一些工厂里，工人停工并集体到国家政权机关所在地请愿。

工人阶级的罢工和其他经济行动变成了反对当局的政治行动。在1939年举行了约350起，而在1940年举行了约450起组织良好、斗志顽强且时间较长的工人罢工。这些罢工的特点是同当局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特别在克罗地亚总督辖区更是如此。1939年在韦莱斯打着“我们要面包、要工作”的标语连续三天的群众性示威游行，第二年在普里莱普和奥赫里德举行的伊利亚节示威游行，以及1940年夏天留比亚矿工连续五周的罢工，都已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而1940年春天贝尔格莱德和泽蒙的航空工业约2300名工人持续三月之久的罢工更是以其顽强和激烈的程度而著名，当时同当局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致对罢工者实行了军事动员。在萨

格勒布的“五一”行动中，城市交通停顿，绝大部分企业停工，同时
在其他很多地方也出现了停工。为了阻止工人罢工，克罗地亚总
督辖区于1940年5月6日制定了《解决劳动纠纷条例》，大大地限制
了罢工权。但是，这类条例以及政府为制止工人运动而采取的其他
措施，都再也不能阻挡工人阶级斗争的攻势了。

在准备制定新的选举法和准备宣布进行议会选举(这是茨韦
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没有兑现的许诺)期间，在南共的倡议下，
1939年末和1940年初在国内很多城市举行了妇女集会。会上除提
出妇女的选举权及妇女平等的要求外，还提出了南共纲领中的其
他要求。

1940年初组织了要求解散仿效法西斯国家而建立的集中营的
行动。当时这些集中营关押着全国许多共产党人。抗议行动更激
起了人民对亲法西斯的当局的不满。在这些行动的压力下，政府
被迫解散了比莱奇集中营。大部分被拘留者于1940年春天获释，
而其余的主要是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南斯拉夫志愿者也于1940年秋
天获释。

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建立了贸易关系，紧接着又建立了外交关
系之后，在南共中央的倡议下于1940年6月和7月成立了“苏联之友
协会”。尽管当局拖延批准这些协会的工作，以便尽快禁止它们活
动，共产党人还是利用这一机会成功地开展了宣传苏联及其政策
的活动。在斯洛文尼亚还加强了同基督教社会党人、“鹰社”中的民
主力量和进步文化人士的合作。

在战争爆发一周年的时候，党于1940年9月初在许多地方组织
了示威游行和其他活动，其中青年人站在最前列反对战争，要求不
割地和不赔款的媾和，并反对当局亲法西斯的政策。在这些集会上
常常同警察发生冲突，1940年9月8日在科舒特尼亚克(贝尔格莱
德)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有很多青年伤亡，这激起了公众的
愤怒和全国的抗议行动。

以南共为首的革命民主运动通过这样的方针和行动，愈益坚

定地不仅向企图在投靠法西斯列强和推行法西斯治国方法中寻求出路的当局发动了攻势,而且向愈益明显地分裂为亲西方的和亲法西斯的两大阵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和派别的领导集团发动了攻势。这种对抗基本上是阶级的对抗,在悬而未决的和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从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剥削的社会阶层的社会问题,争取实现基本民主权利、自由和民族平等的斗争,直到保卫受到威胁的国家独立等问题),它愈益成为南斯拉夫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现象,成为广大阶层的人民发生分化的基础,并迅速朝着有利于南共的方向改变着政治力量的对比。南共已成为南斯拉夫政治生活中最积极的政党。除了反映最广大阶层人民切身利益的党的纲领性方针外,党的队伍在政治思想上的团结及党员的斗志也促进了这种情况的发展。

南共奉行的人民阵线政策受到具有民主和反法西斯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从而更有必要维护革命先锋队的团结。知识界没有彻底地接受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大多数人还是主张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这种情况有时导致非法的南共同一些独立活动的知识分子作者之间关系的暂时紧张。尽管这些人依赖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威望,但同时又要求在运动政策问题上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发生“吞并”奥地利时,保卫祖国的问题已尖锐地提了出来,当时在党和克罗地亚一部分左派知识分子之间出现了公开的分歧。部分左派知识分子认为,如果不解决克罗地亚的民族问题,克罗地亚人就不应该保卫南斯拉夫。他们的这种立场影响了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致它对南共中央因国家独立受到威胁而提出的所有反法西斯和爱国力量团结起来的号召持保留态度。这种情况在1938年12月议会选举运动中就已经出现。当时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违背南共中央委员会的立场,没有支持联合反对派提出的名单^①。南共中央委员会当时在资

^① 原文如此,应为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支持了联合反对派的名单。参看本章第2节(第213、222页)的有关叙述。—译者

产阶级政策显然越来越没有能力使南斯拉夫社会摆脱深刻危机的条件下，正致力于把党确立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在《烙印》杂志(萨格勒布1939~1940年)中表现出这部分左派知识分子同党的政策的最为明显的公开分歧。克尔莱扎的周围聚集着一批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的知识分子，他们早在30年代初就同“社会文学”拥护者，接着同党的科学普及杂志《科学与生活》(萨格勒布1937~1938年)展开过辩论。“社会文学”的倡导者和由博日达尔·阿季亚和奥格年·普里察主编的《科学与生活》杂志的撰稿人也曾提出一些理论上狭隘的、甚至是教条的观点。这些在1933~1934年辩论中的观点在党的政策中不占位置，但在1937年期间和1938年初进行的第二场辩论——主要讨论哲学问题及其更直接的政治含义——中遭到尖锐的批评。批评尤其使党的对苏政策遭到非议。关于清洗、斯大林政权的性质及其在共产国际中的统治地位的传闻，使聚集在《烙印》杂志周围的部分知识分子(同样也是由各派别组成的)，开始把斯大林主义同南斯拉夫共产党混为一谈，削弱对南共的支持，并对革命行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提出非议。他们没有认识到，革命运动只有在本国的土壤上，在寻找解决本国问题的办法过程中才能成熟起来。在拒不支持革命行动和看不到战争爆发前后摆脱日趋危急的局势的出路的同时，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团体退缩了，而另一些团体则支持资产阶级的政策。所有这些倾向——以及其他种类较多但影响较小的思想——在《烙印》杂志中都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烙印》杂志重新挑起了过去的有关哲学和美学问题的辩论，并更为激烈地攻击党内很多著名人物。这一举动具有了直接的政治影响。这种情况在党的队伍中也引起了混乱，因此共产党必须更准确地阐明自己的立场，以正视听。铁托在1939年5月的《无产者》杂志中解释了党的立场，从而公开了所谓文学左翼的冲突。这一冲突在1939年8月苏联—德国条约和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协议之后进一步激化，尽管这些事件在南斯拉夫各地的反应不尽相同。苏

联—德国条约导致了同盟军的危机,即导致了一部分民主知识分子的分离,这些人过去在观望革命前途时就是动摇不定的。而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协议使相当一部分左派知识分子公开地提出资产阶级的方针。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协议在克罗地亚被当作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而受到拥护,但在塞尔维亚却由于同样的阶级原因而遭到拒绝。南共中央委员会指出了这一协议的阶级内容,认为南斯拉夫的资产阶级再也没有能力解决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了,因此它准备不惜牺牲国家的独立。南共在接受共产国际关于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评价的同时,坚持要保卫国家和提出更彻底的社会要求。当时党的思想上的统一是实现这种政策的先决条件。克尔莱扎在1939年12月发表的激烈的论战性文章《辩证的反野蛮论》中对所有这些时代的历史性要求置若罔闻。铁托在1939年期间和1940年初同克尔莱扎的谈话并没有解决冲突问题。1940年5月的《无产者》杂志刊登了铁托的一篇文章,阐述了南共进行的思想斗争的性质。而在1940年夏天对广大公众出版了合法的刊物《文学笔记》,刊物对冲突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探讨思想问题和文学美学问题而提出的,尽管当时都很清楚,这里涉及到对国家的命运具有重大意义的迫切的政治问题。《文学笔记》中发表了党内最杰出的政论家的文章(如奥格年·普里察、奥托卡尔·凯尔绍瓦尼、米洛万·吉拉斯、科查·波波维奇、爱德华·卡德尔、布兰科·布伊奇的文章)。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做思想政治解释工作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左派知识分子脱离了党,但大部分知识分子则更紧密地同党联系在一起。从1940年年中起,“文学左翼的冲突”不再成为迫切的问题了。根据《烙印》杂志编者的决定,杂志出版了第13~15号合刊之后便停刊了。

4. 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和在法西斯侵略南斯拉夫的前夕革命民主运动的壮大

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和决议。争取国家民主化和保卫独立。3月27日、法西斯的侵略和南斯拉夫王国的崩溃。

南共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40年10月19~23日召开。就其召开的时刻及其通过的纲领性方针而言,这次代表会议是南共迄今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1940年春天,共产国际已经解决了所谓的南共问题,而在世界上和国内也因战争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铁托认为应该着手准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并将此事报告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当时党在组织上得到了加强,成立了各民族和各省的领导机构,拥有了几个州委员会,以及地区、县、地方委员会和基层组织网。以南斯拉夫共青团为核心的青年运动也蓬勃发展。共产党人不仅在统一工会联合会中,而且在其他许多组织、协会和团体中起主导的影响。党还通过大量合法的、半合法的和非法的报刊杂志,以及其他公开宣传形式(如传单、声明、公报和通告等)开展活动,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介绍苏联的书籍。共产党人还在一些发行量最大的、相对独立的资产阶级报纸,如《政治报》中具有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保证党员能够更加广泛地参与研究党的发展和活动,参与制定党的政策、战略和策略,根据南共中央委员会的提议,在1940年5~9月期间召开了地方、地区、州和各省党组织的代表会议。当时南共约有7000名党员,其中约1500名党员参加了这些代表会议。南共塞尔维亚省第五次代表会议于1940年5月初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会议于6月末在维尼耶召开,有45名代表出席会议;南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第五次

代表会议于7月27~28日在萨拉热窝召开,有20名代表参加;在8月3~4日召开的克罗地亚共产党达尔马提亚省代表会议上有30名代表参加;8月16~18日在扎布利亚克召开的南共黑山、博卡、桑贾克、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地区第八次代表会议上也有30名代表参加,在这之前,有20名代表参加的南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州第二次代表会议于7月在维托米里察召开。克罗地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8月25日在萨格勒布召开,有64名代表参加。南共伏伊伏丁那省第六次代表会议于9月上半月在斯雷姆卡梅尼察附近召开,有30多名代表参加。南共马其顿省代表会议于9月8日在斯科普里召开,约有25名代表参加。

在这些代表会议上,南共中央的代表也参与了工作,其中一些会议铁托亲自参加了。会上选出了参加南共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这些会议分析了党组织的内部发展和政治活动,特别是确立了党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新政策。这些代表会议的文件表明,南共是多么坚决地同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和霸权主义作斗争,同它的南斯拉夫民族一体化的思想作斗争,同时也驳斥了过去认为解决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民族政党的事们的看法。这些代表会议警告说,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资产阶级的协议并没有解决克罗地亚的民族问题,只不过是它们在它们之间瓜分了权力,从而更加深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间的冲突。党的这些代表会议表明,南共已成长为思想上和政治上统一的组织,它已摆脱了以往的缺点,它紧密地联系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它的成员已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自觉的纪律性、警惕性,并作好了进行革命斗争的准备。

在筹备南共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过程中,还进行了南斯拉夫共青团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的。该代表会议于1940年9月8~9日在萨格勒布召开,党的总书记铁托参加了会议的工作。1940年8月在萨格勒布还召开了人民援救会(原红色援救会)全国会议。南共共青团的代表会议认为,南共共青团已经克服了过去一直

阻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发展的那些缺点。南共青团当时有1.78万名团员，并在企业、很多乡村、大中学校、合法的青年政治、专业、文化、体育和其他团体和组织中形成了发达的组织网，这些组织团结了广大阶层的青年，并带领他们开展众多的反法西斯和反当局的政治活动。在共青团代表会议上选出了以伊沃·洛拉·里巴尔为首的南共青团中央委员会。

南共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就其参加人数(共108名)而言，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20年秘密活动期间最大的一次集会。鉴于其准备工作时所处的条件及其面临的任務，这次会议具有党的代表大会的意义，尽管南共中央委员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举行党的代表会议(因为“召开有100名左右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会有被警察局发现的危险”)，而代表会议不能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南共中央的组成和补充”的问题，则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协商解决，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般作法。尽管当局加强了反对南共和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措施，然而无论是在代表会议筹备期间还是在代表会议的五天工作期间，都没有发生警察搜捕，这件事本身证实了党的力量，证实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

在代表会议上除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外，还提出了以下10个报告：关于政治形势和南共的政治纲领，关于工会运动，关于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关于民族问题，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关于青年工作，关于妇女工作，关于军队工作，关于党的保密工作和技术部门工作，关于南斯拉夫人民援救会的工作。党内问题在代表会议工作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这也是铁托开幕词的主要内容。铁托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回顾了党自第四次代表大会(1928年)以来，特别是自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1934年)以来的发展情况，强调指出革命民主运动顺利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党本身的内部巩固。铁托特别回顾了三年来为加强党的队伍所作出的努力——从最终结束派别斗争到恢复一些地区党的领导机构和在国内建立南共中央

委员会，他认为南共已具备了一个革命运动的真正先锋队的一切重要特征，它直接地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决战的前景。在肯定组织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同时，铁托还非常重视党的干部的培训和提高、南共党员的个人生活、共产党人的形象、党的纪律和警惕性、党内关系和关心群众等问题。铁托还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党的政治纲领和战略的依据。

代表会议详细地讨论了同战争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发展相关连的南斯拉夫国际地位问题，并确定了党的任务。这是所通过的决议的内容，它的方针将指导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日益迫近的翻天覆地的历史事态中的工作和斗争。

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很多因素导致阶级冲突的激化，并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将进行决战。首先，这里指的是不断蔓延并给很多国家和人民的生存带来威胁的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战火，而与此相反的则是世界上革命力量成熟的进程和“革命战胜帝国主义的前景、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前景和铲除帝国主义战争根源的前景”；其次，这是指把战火直接引向巴尔干和轴心国列强加强对南斯拉夫的压力，从而给南斯拉夫的独立造成威胁；最后是指南斯拉夫统治者迎合德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意图，执行反动的国内政策和投降主义的外交政策。代表会议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阶级分化的进程日益深化，广大阶层人民提高了对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必然性的认识。

根据这样的估计，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确定了党在今后时期政策的两个基本要求：坚决保卫独立和反对把南斯拉夫变成“轴心国列强的殖民基地”，同时要动员人民群众为实现广泛的民主化纲领而斗争（争取民主自由、撤销反动法令、要求民族平等和自决权、改善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处境）。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日益清楚地看到南斯拉夫统治集团上层不准备也没有能力保卫南斯拉夫的独立时，在极为复杂和矛盾重重的条件下制定了自己的革命纲领，把保卫祖国——南斯拉夫的独立看作是民族生存和

今后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关键问题。因此，南共把抵御法西斯国家侵略的斗争同反对南斯拉夫王国反动政权及其外交投降政策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并认为没有国内的民主改革，就没有有效地保卫国家的基本前提。

根据这个展示了革命前景的政治方针，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确定了共产党人在农村、工会和青年工作方面发展党组织的具体任务，以及在党的政策的所有其他方面的具体任务。代表会议还肯定了目前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决议主张实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少数民族的真正平等和兄弟情谊，同时强调指出，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反对国内占统治地位的反动资产阶级及其同法西斯列强相勾结的活动，而且要反对愈益露骨地充当这些列强代理人的分裂主义势力。根据这种精神，代表会议向每个民族及每个历史地域的共产党人提出了任务。代表会议还决定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党组织脱离黑山省党组织，成立一个设有州委员会的单独组织，州委员会直接同南共中央委员会联系。

代表会议选出了由22名委员和16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有：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斯帕塞尼娅·察娜·巴博维奇、亚科夫·布拉热维奇、米洛万·吉拉斯、弗拉多·亚尼奇、爱德华·卡德尔、博里斯·基德里奇、拉代·康查尔、维茨科·克尔斯图洛维奇、弗兰茨·莱斯科舍克、博若·留莫维奇、米哈·马林科、伊万·米卢蒂诺维奇、莫沙·皮雅杰、久罗·普察尔、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伊沃·洛拉·里巴尔、斯蒂佩·罗马茨、梅托迪耶·沙托罗夫、维达·托姆希奇、扎尔科·兹雷尼亚宁和斯雷滕·茹约维奇。

在代表会议上铁托当选为南共总书记，选入南共中央政治局的除铁托外，还有爱德华·卡德尔、米洛万·吉拉斯、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伊万·米卢蒂诺维奇、拉代·康查尔和弗兰茨·莱斯科舍克。

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党更加坚决地反对反动当局及其

面对法西斯列强的压力所采取的劫摇和投降的政策。反动当局的这种政策随着德军开进罗马尼亚、意大利在10月侵略希腊及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11月加入三国公约而变得更加露骨。在国内，由于当局不加制止，第五纵队分子、亲法西斯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猖獗。南斯拉夫和德国的政府代表也很快地就南斯拉夫加入三国公约的条件开始了“磋商”。

南共根据第五次代表会议决议的精神开展活动，指出了法西斯侵略的直接危险，并越来越经常地强调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的内外政策削弱了国家的防御能力，政府本身和军队上层正在“阴谋破坏保卫国家的准备工作”，应该停止“两面应付的对外政策”，应该同苏联签订互助条约。南共中央委员会指出，“德国和意大利帝国主义分子不断地对我国施加压力，企图把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党中央号召“全体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同代表着战争危险和威胁着南斯拉夫人民独立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斗争，并为建立根据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办事的真正的人民政府而斗争”。

在充满紧张事件的局势中，广大阶层的人民群众表示支持共产党人的这些要求和呼吁。这是革命民主运动急剧高涨和党在人民中的威望日益增长的时刻。南斯拉夫统一工会联合会到1940年底已发展到约15万名会员。在这个联合会中，除极小部分外，南共发挥着领导作用。在其他工会组织中和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当中，党的影响也扩大了。党预见到事态的发展，更加加强了在企业里建立工人团结委员会的工作，吸收有组织的和没有组织的工人参加，甚至一些失业工人也参加了团结委员会的工作。共产党人加强了在农村中的活动，党在那里的影响也大大增加。根据党的倡议，在农村建立反涨价委员会和实现经济要求委员会的运动规模越来越大。农民的示威游行和向区里进军的运动越来越频繁。党召开了多次会议来研究农村问题和党在农村的政治工作，1941年初还制定了党的农村纲领和发表了论农民问题的小册子。

进步青年运动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南斯拉夫共青团扩大了自

己对文化、教育、体育团体以及合作社和其他组织的影响,团员人数在1940年底已达到约3万人。在党和共青团的影响下出版的合法青年刊物也在增加。通过举办教育、卫生和其他学习班,党加强了在工人、妇女团体中的工作和团结农村妇女的工作。连国家职员和自治管理机构职员行动委员会也接受了党当时提出的要求,这一情况说明了党在南斯拉夫社会各界扩大了影响。当时这个行动委员会包括25个不同的联合会和协会,从官员、农艺师、技术员、邮政人员、见习律师的联合会和协会,直到医生、工程师、铁路办事员、交通部职员的联合会和协会。共产党人还在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些组织中,特别是在农村的一些组织中扩大了影响。南共中央委员会通过自己的代表同新成立的人民农民党和民主党左派就合作问题进行了谈判。

根据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党更加重视军队工作。除了早在1939年春就在南共中央委员会下面开展工作的军事委员会以外,还在所有的中央委员会、省委员会和大地区领导机构的下面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共产党人在服兵役期间扩大了党在士兵中的影响。在一些部队里,特别是在预备役军人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和军人积极分子小组;共产党人同有进步和爱国思想的军官建立了联系,开展了反对第五纵队分子的斗争,并在士兵中进行了政治工作。党在飞行员中的活动最为成功。党在萨格勒布空军部队里开展了十分紧张的活动,其次在诺维萨德、莫斯塔尔、尼什、克拉列沃、泽蒙、拉伊洛瓦茨和斯科普里等地的空军部队里也紧张地开展了活动。在萨格勒布的博龙加伊空军部队和萨拉热窝的军事技术局成立了党支部。党还在贝尔格莱德军用机场,潘切沃空军学院,克拉列沃、莫斯塔尔、萨拉热窝、卢布尔雅那、科索沃米特罗维察、卡尔洛瓦茨、斯特鲁米察等地的卫戍部队里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并在贾科维察步兵团里成立了南共团委员会。

南共开展的争取原西班牙共和军志愿者从法国集中营返回祖国的活动,特别是在1940年秋,具有很大的规模。当时向政府递交

了30万份抗议信,要求允许他们回国,并为他们返回祖国采取了直接的措施。

在扩大党的影响方面,党的非法的和合法的报刊杂志及其他进步的报刊杂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遭到迫害,党在1940年底拥有7所地下印刷厂,而每个地区委员会都有自己的滚筒式印刷机。南共中央委员会出版《无产者》杂志,而各民族和省党的领导机构都有自己的机关报:如塞尔维亚有《劳动人民之声报》和《共产主义者》;伏伊伏丁那有《真理报》;克罗地亚有《镰刀与锤子》、《劳动人民信使报》、《呼声报》和《劳动人民战斗报》;斯洛文尼亚有《劳动报》、复刊的《人权报》和《斯洛文尼亚通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有《工农联盟之声报》;黑山有《黑山之声报》;马其顿有《火星报》和《通报》。党还出版很多合法的报刊和杂志(如《工人周报》,在萨格勒布发行量为4万份,行销全国;以及斯科普里的《我们的话》、萨格勒布的《反映》、贝尔格莱德的《艺术和评论》等),并拥有几个合法的书店,合法地出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

根据铁托的倡议,马卡尔斯卡的党校于1940年9月开学。南共和南共青团各民族和各省领导机构的很多成员在该校毕业。根据南共中央委员会的决定,1941年2月1日在杜布拉瓦(萨格勒布附近)举办了党中央的学习班。学习班在南共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到3月初,中央委员会和省委员会的很多委员及南共中央政治局的某些委员参加了学习班。1940年期间和1941年初,在全国很多地方有几百名党和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参加了数日一期的学习班。在贝尔格莱德还举办了党的高级学习班。南共中央委员会加强了同各省领导机构的联系。在1940年底和1941年初,南共中央委员出席了省委的会议。塞尔维亚党的领导干部会议于1941年2月中在贝尔格莱德召开,铁托参加了会议。会上联系到法西斯侵略南斯拉夫的直接危险日益迫近,讨论了政治形势和共产党人的任务。

为了阻止革命民主运动的扩展,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

采取了严厉的措施。1940年12月末,宣布了解散统一工会联合会的决定,并在1941年1月决定征集约2000名警方掌握的共产党人去“军训”。这些共产党人被派往所谓的劳动营,而实际上是特殊的集中营。因此当时在很多地方爆发了示威活动,要求解散这些集中营。由于统一工会联合会遭到禁止,南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号召工人开展抗议活动,同时共产党人通过分支众多的工人团结委员会网,继续开展工会活动,领导争取工人阶级日常利益的斗争。尽管到1941年4月,仍有约3000名共产党人被关在集中营和监狱里,党已经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队伍在组织上的统一,并能够指导各种不同的革命活动。

1940年底,铁托注意到在帝国主义矛盾加剧和世界大战扩展的情况下,马其顿问题已成为欧洲南部的中心问题之一。他提出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希腊人民必须同马其顿人民一起,共同为马其顿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思想。他强调马其顿人“作为单独的民族,同巴尔干所有其他民族一样,享有自决直到分离的权利,享有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权利”。南共中央委员会于1941年2月派了自己的代表去索非亚,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进行会谈。南共中央委员会还准备同希腊共产党接触。但是不久希特勒对巴尔干的入侵中断了这一行动。

在1941年3月1日保加利亚政府参加三国公约和德军开进保加利亚之后,希特勒就向南斯拉夫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当政府代表和外交大臣,然后是保罗亲王同纳粹领袖谈判时,党就向南斯拉夫人民发出警报,要注意政府准备出卖国家。南共中央委员会在3月上半月就发表了“反对投降,同苏联缔结互助条约”的声明,并告诉工人、农民、市民、士兵、士官和军官:尽管已到了最后时刻,但“如果驱逐这个卖国政府和建立首先关心人民利益的人民政府的话”,还有时间来拯救独立;南斯拉夫人民绝不允许使自己成为“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互相撕杀的工具,也不能容忍奴役者把南斯拉夫当作进攻苏联的“跳板”。1941年3月24日,在南斯拉夫执政当局决定签

署南斯拉夫参加三国公约议定书(并于3月25日在维也纳签字)的当天,在共产党人的倡议下,本着党的声明的精神,在克拉古耶瓦茨和其他地方开始举行示威游行,并在3月26日和27日扩大为全民规模的运动。共产党是发动和指导这一反对政府卖国行为的人民群众示威活动的唯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一些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只有少数具有民主和反法西斯思想的领袖,以及少数政府成员向人民靠拢。示威者提出了“宁可打仗,不要公约”、“宁可死亡,不当奴隶”的口号,要求成立人民政府,由它废除同轴心国缔结的公约,依靠苏联,实行国家民主化和准备保卫国家的独立。许多南共中央委员、党和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在这些日子里脱离了秘密状态,公开在集会上发表了演讲和领导了示威群众。

在这场人民运动中,一些具有爱国和亲英思想的军官于3月27日凌晨在贝尔格莱德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建立了以杜尚·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新政府。人民欢欣鼓舞地欢迎这次政变,希望它能改变国家政策。贝尔格莱德和全国各地人民涌上街头,把3月27日看作自己的胜利,并根据南共政策的精神,向新政府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但是,新政府中有很多原政府的成员,它的这种组成情况本身就不能保证它坚决地走上保卫国家和满足人民要求的道路。西莫维奇将军在政府的第一个宣言中,没有宣布废除南斯拉夫参加三国公约的议定书,并把政府的更迭解释为需要平息“危及公共秩序”的“令人不安的公众舆论”。

新政府企图用不彻底的措施和在轴心国、英国和苏联之间应付周旋的办法来寻找使国家摆脱困境的出路。为了平息人民不满的风潮,政府决定对政治犯实行大赦和解散军事集中营。这就是新政府在国家民主化方面所作的主要贡献。新政府向希特勒表示忠诚,要他相信南斯拉夫参加三国公约的议定书仍然有效。它同英国进行了秘密谈判,想在军队和作战物资方面得到英国的援助,并同苏联进行了缔结友好互助条约的谈判。同时,尽管德国对南

斯拉夫的侵略迫在眉睫，但在不刺激德国的借口下，迟迟未宣布总动员。

与政变者和站在他们背后的资产阶级势力的这种政策相反，3月间的人民运动是人民深刻的社会要求和民族要求的表现，是人民决心抵抗侵略的表现。南斯拉夫共产党在这些事件中证实了自己的政策的正确性。南共塞尔维亚省委员会在这些日子里成了领导贝尔格莱德和整个塞尔维亚人民运动的战斗指挥部。它在3月27日发表的声明中提出了符合人民愿望的要求。同一天，铁托在萨格勒布同当地的南共中央委员进行磋商后，认为对南斯拉夫的侵略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派南共中央指导员和中央委员去一些地方，向党的领导机构传达指示。而铁托本人在3月29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塞尔维亚党的积极分子扩大会议，会上分析了事态的变化，估计了国家所处的局势，并确定了共产党人的任务。南共欢迎西莫维奇将军的政府上台，但是很快就发现这个政府的不彻底性，所以南共中央委员会在3月30日发表的新的文告中，提出了同苏联缔结互助条约的要求和采取措施实现国家民主化和加强国家防御能力的要求。

德国对南斯拉夫发生的这些事件很快地作出了反应。在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垮台的当天，希特勒就作出了进攻南斯拉夫和消灭南斯拉夫的决定。经过十天的准备，德国在4月6日不经宣战就疯狂地轰炸了贝尔格莱德，而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约50个师开始大举入侵南斯拉夫。

在1941年4月短暂的战争期间，暴露出了南斯拉夫王国的不稳定性，以及它的政界和军界上层集团的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意图。南斯拉夫王国军队的武器装备陈旧，军事理论过时和作战计划不当，根本不可能有效地抵御侵略者。它的一些部队在与敌人的战斗打响之前就瓦解了，或者根据将军和高级军官的命令投降了。形形色色的第五纵队势力——从个别大臣、将军、高级官吏到乌斯塔什分子和德裔居民——纷纷加紧破坏活动。在斯洛文尼

亚，纳特拉琴省长在战争的第一天就建立了所谓的人民委员会，却不让共产党人参加。在南斯拉夫国家实际崩溃之后，他企图成立在第三帝国卵翼下的“独立的斯洛文尼亚”。政府的副首相马切克在国家遭到侵略后立即离开政府来到萨格勒布，并声称反对进行抵抗。在4月10日，当德军进入萨格勒布和宣布成立乌斯塔什傀儡的“克罗地亚独立国”时，马切克向克罗地亚人民发出号召，要求他们效忠和“真诚地同新政权合作”。黑山的分裂主义分子、马其顿的亲保加利亚的法西斯代理人、德裔居民、怀有民族统一主义情绪的匈亚利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以及马其顿西部的阿尔巴尼亚民族统一主义分子，纷纷开展了第五纵队活动，并把侵略军当作“解放者”来迎接。西莫维奇将军的政府在战争的头几天就丧失了实际权力。

唯一力图防止国家崩溃和坚持抵御侵略者的有组织的力量是共产党。它号召党员、共青团员、同情者和所有爱国者志愿参军，为提高部队的士气而工作。南共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各级领导机构曾同部队指挥部联系，为工人和其他反法西斯人士寻求武器，并要求加强反对“第五纵队”的斗争。共产党人在很多地方成立了志愿者部队，组织警戒，主动同第五纵队分子进行斗争。受共产党人的影响较大的一些部队，同具有爱国思想的军官一道，在某些地区的前线阵地进行了抵抗（如在斯库台湖地区抗击意大利人，在查查克、瓦拉日丁、弗尔沙茨附近以及在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的一些地方抗击敌人）。一些空军部队也进行了抵抗。在德军进入萨格勒布和宣布成立所谓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后不久，南共中央委员会于4月10日在萨格勒布召开会议，讨论了在国内中部地区组织抵抗的可能性，并决定继续抗击侵略者。

几天以后，铁托本着这次会议决议的精神起草了南共中央告南斯拉夫人民书（1941年4月15日发表），其中特别揭露了“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卖国性，以及一小撮走狗和第五纵队分子在克罗地亚的叛国行径，“而这种叛国行径在历来克罗地亚统治者卖国史中是

绝无仅有的”；告人民书号召克罗地亚人民起来反对侵略者及其乌斯塔什帮凶。告人民书还号召南斯拉夫其他各族人民坚持保卫独立的斗争，这场斗争必将取得胜利，因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全体工人阶级将站在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前列，并坚持到最后胜利”。

然而，南斯拉夫军队的失败和南斯拉夫王国的崩溃已无法挽回。4月10日后，南斯拉夫军队如此迅速地瓦解，以致不可能组织任何较重大的抵抗。南斯拉夫王国的这场灾难是建立在民族不平等、劳动人民受残酷剥削和政治上无权的基础上的国家制度弊病的必然结果。这是统治集团把国家和人民的民族利益服从其狭隘的阶级剥削利益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覆灭。西莫维奇将军的政府在4月15日就决定谋求停战，同日就和国王彼得二世逃离了祖国。1941年4月17日在贝尔格莱德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尽管南斯拉夫王国迅速崩溃，但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在3月间的垮台和4月的战争，都是具有特别重大的国际和国内意义的事件。因为南斯拉夫的事态发展，以及当时整个巴尔干战争的进展情况，使德国不得不把开始进攻苏联的日期推迟了一段时间，这对于德军在东线，特别是在俄国严冬条件下进行莫斯科郊外的战役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此外，一个小国的人民不愿接受法西斯侵略者的控制和不能容忍把南斯拉夫变成轴心国的附庸而奋起反抗，这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国内，这些事件也说明了资产阶级反人民的统治已把南斯拉夫人民引向何处。因此，南斯拉夫王国成立以来在资产阶级统治者与人民之间早就存在的鸿沟变得不可弥合了。

在这场民族大灾难的日子里，事实还表明一些新的社会政治力量在南斯拉夫得到了发展，它们有能力和有决心为民族解放和真正的社会复兴而继续斗争。南共中央委员会在1941年4月15日发表的告人民书中高瞻远瞩地嘱咐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即使在这场斗争中暂时受挫也不能灰心丧气，因为从这场血腥的帝国主义屠杀中将诞生一个新世界，并将永远铲除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奴

役的根源。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真正平等的基础上将建立一个自由的和友好的大家庭”。

第三编

人民解放战争和 以革命的方式更替政权

第一章

人民解放战争的准备和发动

(1941年)

1. 国家被占领和准备武装斗争

占领下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纲领。武装斗争的政治准备和军事准备。

轴心国列强在占领了南斯拉夫王国和希腊王国之后，就完成了对巴尔干的进犯。这样，它们占领了大部分欧洲，其势力达到了顶峰。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里都建立了所谓的欧洲新秩序，而它们的经济潜力则被纳入德国的战争计划；在整个欧洲蛮横地推行一种种族主义的理论。德国直接着手准备进攻苏联。希特勒指望在自己的军队闪电般地入侵苏联时，使英国保持中立，从而避免两线作战。当时只有英国在保卫其地中海和近东受到威胁的地盘，并对轴心国列强进行了抵抗。在希特勒的侵略进军中，闪电战的战略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在这之后，一些被奴役国家的人民，由于惧怕侵略者的力量和占领当局的恐怖措施，感到束手无策和斗志涣散。

德国在肢解被占领的南斯拉夫中起了主导作用。希特勒认为南斯拉夫王国是人为的国家，它建立在占据邻国领土和将南斯拉

夫其他民族强行并入塞尔维亚的基础之上,因此他决定要消灭南斯拉夫这个国家。根据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协议,南斯拉夫的领土——大体上按国家的中心线——被划分为德国和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在这一基本分界线的范围内,各占领国把南斯拉夫的大部分领土宣布为本国领土的一部分。于是德国夺取了斯洛文尼亚的北部(什塔耶尔斯卡、戈伦斯科以及多伦斯科和科鲁什卡的一部分);意大利并吞了余下的斯洛文尼亚的西南部(被称为卢布尔雅那省)、克罗地亚滨海地区和达尔马提亚大部分地区以及若干岛屿、博卡科托尔斯卡;保加利亚获得了马其顿的大部分地区、科索沃的部分地区和塞尔维亚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匈牙利则获得巴奇卡、巴拉尼亚、梅久穆列和普雷科穆列。德国和意大利利用了南斯拉夫王国未能解决的民族问题,把南斯拉夫部分领土宣布为“解放区”,并建立了傀儡“独立”国。例如还在四月战争期间就宣布成立乌斯塔什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并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斯雷姆并入其疆域,以满足克罗地亚资产阶级的欲望和加深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的隔阂。意大利把绝大部分科索沃、西部马其顿和小部分黑山并入它一手操纵的傀儡国“大阿尔巴尼亚”。意大利还依靠黑山联邦党领袖,企图建立傀儡的“黑山独立国”。希特勒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认为塞尔维亚人民是南斯拉夫王国的支柱,因此把德国的占领制度强加给塞尔维亚。

在占领区里,占领军建立了民政和军事机构,力图保证尽快地改变居民的民族结构。为实现这一目的,德国采取了尤其令人发指的方法。纳粹分子立即着手大规模地把斯洛文尼亚居民赶往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德国,并开始移入德国居民,同时对一部分斯洛文尼亚人实行强制同化(禁止使用斯洛文尼亚语,更换居民区和街道的名称,把斯洛文尼亚人流放到德国等)。意大利在它所并吞的克罗地亚地区和博卡科托尔斯卡强制施行取消民族特征的措施。保加利亚把占领的马其顿和塞尔维亚部分地区视为自己的领土,并把这些地区的居民当作保加利亚的国民。占领国在

南斯拉夫某些地区执行自己的政策时,还企图得到在南斯拉夫王国时期处于无权地位的少数民族的支持。纳粹分子在德裔少数民族中,即在所谓德裔居民中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在名义上划入塞尔维亚占领区的巴纳特,德裔居民接管了政权。德裔少数民族在“克罗地亚独立国”也享有特殊的待遇。大部分匈牙利族居民同意把巴奇卡、巴拉尼亚、梅久穆列和普雷科穆列并入霍尔蒂的匈牙利,而部分当地居民也支持占领者。意大利以建立“大阿尔巴尼亚”、承认阿尔巴尼亚语、建立阿尔巴尼亚政权机构和阿尔巴尼亚傀儡军队(“志愿军”,后来的“国民阵线分子”)来显示其“解放使命”,并利用了阿尔巴尼亚族群众对在南斯拉夫王国中没有民族权利的不满情绪,获得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有力支持。斯洛文尼亚居民,特别是塞尔维亚族人,在所有被并吞的地区里遭到恐怖活动的打击和迫害。匈牙利在1941年4月就把1918年以后迁居巴奇卡的居民赶走,而阿尔巴尼亚傀儡当局则把塞尔维亚族、黑山族和马其顿族居民从并入“大阿尔巴尼亚”的地区驱逐出去,并在梅托希亚捣毁移民村。

所谓的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建立,为实现轴心国在被占领的南斯拉夫土地上的目标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根据德国和意大利的协商,以安特·帕韦利奇为首的乌斯塔什恐怖组织掌握了这个傀儡国的政权。乌斯塔什分子在这方面得到了克罗地亚农民党领导集团的支持,它的领袖弗拉特科·马切克号召该党的支持者和原克罗地亚总督辖区的行政人员同新政权合作。克罗地亚农民党的一些具有右倾思想的首脑分子和支持者参加了乌斯塔什组织。乌斯塔什还在天主教上层教士中获得了有力的支持。乌斯塔什把穆斯林宣布为克罗地亚族的一部分,从而得到了南斯拉夫穆斯林组织个别领袖和一部分伊斯兰教上层人物的积极支持。为了实现“纯种的”克罗地亚,乌斯塔什宣布“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的全体塞尔维亚族居民,与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一起,不受法律保护。迫害从一开始就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大规模地驱赶到塞尔维亚,在集

中营和居民村里残酷杀害,掠夺财产等。乌斯塔什对塞尔维亚族居民施行的恐怖行为的特征之一是强迫他们信奉天主教。乌斯塔什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对立和宗教对立,极力鼓动克罗地亚族群众和穆斯林群众参加迫害塞尔维亚族居民的暴行,从而最大限度地煽动了沙文主义和复仇的狂热情绪。

四月战争的失败、南斯拉夫国家被肢解和占领者的政策,都深深地影响了国内所有社会政治力量的态度和活动。当亲法西斯的和分裂主义的集团和派别千方百计地为占领者效劳时,在一些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却出现了土崩瓦解和迷失方向的现象。这些政党的大部分领袖和头面人物同王国政府一道离开了国家,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政府极力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期望在盟国获胜之后恢复南斯拉夫王国和旧制度。政府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通过伦敦电台向国内发表讲话,为四月战争的失败辩解,并号召人民要经得住占领的考验,要相信能够战胜轴心国,同时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刺激占领者。根据这种方针,国内主要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些集团和个别领导在失败和迷惘的气氛中,也成了消极等待政策的拥护者,即准备到战争结束时再见分晓的政策拥护者。他们根据被占领的南斯拉夫各个地区的具体条件来制定执行这种战略方针的策略——从对占领者效忠到准备在“关键时刻”采取行动而从事某些活动等。对占领者持忠诚和容忍态度的愿望也表现于:要在占领当局经济纲领的范围内继续从事经济活动,同占领当局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南斯拉夫王国的个别高级官员和某些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参加了塞尔维亚德军占领总部建立的“委员协议会”,即“委员制政府”。在这个政府的调停下,按照塞尔维亚德军占领总部的地方机构的建议,南斯拉夫王国的国家机关继续照常工作。在所谓的卢布尔雅那省意大利占领总部接受了该地区的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集团表示合作的诚意,建立了所谓的协商会,某些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参加了该会。克罗地亚农民党的领导集团在发出效忠新政权的号召之后,便从公开的政治舞台隐

退,等待战争的结局。流亡政府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从国外发回的一些指示,使得曾以各种方式表示愿意在反占领者的行动纲领的基础上参加斗争的、本来就为数不多的个别资产阶级集团和个人丧失信心。在这些资产阶级集团和个人当中,就其在以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而言,最主要的是以总参谋部上校德拉戈留布(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为首的二十来个南斯拉夫军官组成的集团。他们在南斯拉夫军队投降后躲进了塞尔维亚西部的拉夫纳山。米哈伊洛维奇主动地开始建立组织,为在较有利的战略条件下开展行动作准备。

根据南共领导机构4月10日会议所明确表示的方针:不管四月战争的结果如何,将坚持反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南共继续作为全南斯拉夫的政党开展活动,并克服着因战争和占领者瓜分南斯拉夫领土而出现的一些组织上的混乱现象。一部分党员被关进监狱,而另一些党员,其中多数是学生和工人,离开了原住地,被遣送或返回了故乡。克罗地亚共产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那里乌斯塔什上台时,很多党的杰出干部仍关在监牢里,其中有奥古斯特·采萨雷茨、奥格年·普里察、博日达尔·阿季亚、奥托卡尔·凯尔绍瓦尼。尽管杜尚·西莫维奇将军的政府作出了决定,但克罗地亚总督辖区当局却没有释放他们。在上台后的头几个星期里,乌斯塔什又逮捕了几十名共产党人、工会领导人、文化和社会工作者;很多南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大规模迫害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的运动中被驱逐或遭杀害,而党和团的许多领导机构,特别是在克罗地亚西北部,遭到了破坏。南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州的组织出现了组织上的混乱,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个组织由于塞尔维亚族和黑山族居民的迁出(当地南共党员和南共青团员中的很大一部分是这两个民族的人)而只剩下一半。巴奇卡的一些党团组织也因为塞尔维亚移民的迁出而削弱了力量或停止了活动。南共马其顿省组织中也出现了造成长期不良影响的动乱。马其顿省委书记梅托迪耶·沙托罗夫·沙尔洛在四月战争之后马上就断绝了

同南共中央委员会的联系，把在保加利亚占领下的马其顿党组织并入保加利亚工人党，并以“一国一党”的原则作为辩护。沙托罗夫并没有把这个在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赞同和支持下作出的决定报告南共领导，以致南共中央委员会当时认为同南共马其顿省委的联系中断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

除了党的领导机构和党组织为整顿组织和调整在更为复杂的占领条件下开展活动的方式所采取的措施外，共产党人仍然坚持在人民当中开展政治工作。他们解释了南斯拉夫王国崩溃的原因、占领的性质和意图、以及卖国者的作用，打破了一些民族地区对占领者“解放使命”的幻想，抵制了占领者企图挑动民族冲突的政策。他们向人民指出了解放斗争的前景，消除了畏缩不前的现象，发扬了抵抗的精神。共产党人在被击溃的南斯拉夫军队指战员中开展鼓动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去当俘虏和把武器藏起来，同时他们自己主动收藏了一些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南共中央委员会在《五一宣言》中指出，党“将更加坚决地组织和领导人民为反对占领者及本国的帮凶，反对散布民族仇恨，争取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巴尔干各国人民的兄弟友好，……争取更美好幸福的未来而斗争”。为了团结广大阶层的人民来反对占领者及本国的通敌分子，根据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的倡议在1941年4月26日成立了斯洛文尼亚人民反帝国主义阵线。当时响应这一倡议的有基督教社会党人、“鹰社”组织的部分爱国人士和一批文化工作者。这个阵线的建立，是战前几年里在人民阵线纲领的基础上团结斯洛文尼亚爱国政治力量的工作的继续。

5月初，即南斯拉夫王国投降仅仅两个星期之后，南共中央委员会就在萨格勒布召开会议，除南共马其顿省委书记之外，所有的中央书记和省委书记都出席了会议。会上对刚发生的事件进行了分析，肯定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南斯拉夫王国资产阶级制度陷入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的估计，正是这场危机使南斯拉夫王国在四月战争中瓦解；会上肯定了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指导

共产党人为实现深刻的民主改革和保卫国家独立而斗争的政治纲领的正确性。还在四月战争期间就已确定的进行解放斗争的方针，充分表现了南共基本思想的连续性。由于南斯拉夫王国的投降是其资产阶级制度的危机和资产阶级政策失败的必然结果，所以在五月会议上确定解放斗争的社会政治内容的基本依据是，在四月战争之后的条件下，南斯拉夫社会中统治力量必然发生变更和工人阶级替代资产阶级发挥领导作用和承担领导责任的历史时刻已经到来了。因此，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就其国内社会内容而言，同时也是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及争取社会根本改革的斗争。四月战争和占领所造成的局势，使南共更加坚信，南斯拉夫所有基本阶层的人民群众和各族人民在客观上都同样地关心实现这种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的斗争，这就促使共产党人为建立人民解放斗争的最广泛的政治基础而开展行动。在整个民族遭到屠杀威胁的恐怖和迫害的形势下，唯一现实的抉择就是进行反对占领者和本国帮凶的解放斗争，而这场将要实现民族愿望和社会愿望的斗争的革命内容正是它的基本动力。

当时轴心国的势力正处在顶峰，唯有英国在进行抵抗，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则把这场战争看作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同时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仍然有效。在这种非常复杂的国际条件下，南共坚定地指出世界上存在一些现实的因素，它们将为一个被占领的小国里的人民解放斗争开辟胜利发展的前景。南共主要领导人在五月会议上表示相信，苏联将在解决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危机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帝国主义战争将变成革命战争，将变成一连串的无产阶级革命。会议把自己的人民解放斗争的思想纳入这些关于解决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世界性危机的途径的设想之中，并特别强调了这场斗争的革命内容，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所以，解放斗争不能理解为革命的预备阶段，而是由占领所决定的革命的特殊形式。在五月会议上作为首要任务提出来的的是要在解放斗争中实现人民最广泛的团结，要团结南斯拉

夫社会基本阶层的人民，特别是数百万农民群众，同时明确地强调了南共的领导作用。在准备解放斗争的工作中，共产党人将只同原先的资产阶级政党中这样一些集团和成员建立联系，这些人“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占领者和所有给南斯拉夫人民带来当前的深重灾难的人进行斗争”，共产党人还将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形形色色走狗，不管它们是为轴心国侵略者效劳，还是为英国人和为恢复造成今日灾难的旧制度效劳”。尽管杜尚·西莫维奇将军的政府“在人民争取建立真正的人民政府的方面前进了一步”，但南斯拉夫人民还将同它进行斗争，“因为它把自己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指望借助英帝国主义来恢复过去的状况”。

鉴于各省和各地区的特点，会议详尽地规定了那里的党组织在准备和组织反对占领者和本国帮凶的斗争方面的任务。向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克罗地亚共产党特别提出的任务是，要把活动扩大到本民族在1918年以后被并入意大利和奥地利的那部分领土上去。这一方针的根据是这些地方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群众希望同本民族的母体联合，这些地方的革命工人运动有战斗的传统。早在1919年9月通过关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社会主义者的独立社会党（1919年4月成立）加入意大利社会党的决定时，党就曾特别强调指出过，这一决定没有预先规定要实施民族自决权的原则。此后在尤利地区斯洛文尼亚族和克罗地亚族革命工人运动的活动中经常出现这方面的问题。这些群众有着在1921年3月和4月同意大利军队和法西斯组织进行最初的武装冲突的革命传统。克罗地亚族和斯洛文尼亚族居民在意大利资本家蓄意破坏其经济基础的压力下，经济状况越来越困难。此外，1922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上台后，这些地区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尤其受到迫害，遭到沉重的打击。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民族采取个人恐怖手段的秘密革命组织的出现，反映了他们决心要继续反抗法西斯当局取消民族特征的政策，因为当局到1928年已经取消了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所有民族权利。意大利共产党关于解决民族问

题的方针对加强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群众反抗法西斯当局的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方针也载入南斯拉夫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和奥地利共产党于1934年发表的声明中。尽管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时遭到法西斯当局的沉重打击(1929~1941年枪决了10名斯洛文尼亚族和克罗地亚族的反法西斯战士),但由于它执行了人民阵线的政策,从3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在1936年1月以后有了迅速发展,当时意大利共产党同尤利地区的斯洛文尼亚族和克罗地亚族人民革命运动缔结了行动协议,而这个运动受到了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克罗地亚共产党的直接支持。

五月会议坚持南共关于南斯拉夫各民族团结是历史的需要的观点,要求切实贯彻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和建立各民族新的国家共同体的原则,特别强调各省和各地区的党组织要通过执行统一的纲领而成为能把本民族人民的斗争同南斯拉夫其他各民族人民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最强大的因素。

会上还确定了在军事准备方面的任务:决定继续开展收集武器、建立战斗小组、进行军事训练和组织情报机构等方面的工作;决定按照在南共中央委员会下面设立军事委员会的做法,在各级党的领导机构下面成立军事委员会。

鉴于南共在执行武装解放斗争的方针时所处的复杂条件,会议特别强调加强党的组织统一的意义,以及发展党的秘密机构、加强保密工作和保护干部的必要性。同时会议认为,占领制度下日益艰难的条件,人民当中反占领者的战斗情绪高涨,都为壮大党的队伍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可能性。

五月会议之后,铁托马上离开萨格勒布来到贝尔格莱德。为了有更好的工作条件,南共中央委员会的驻地也迁到贝尔格莱德。

五月会议的决议和立场进一步促使党和共青团全力以赴地投入反对占领者和本国帮凶的斗争的准备工作。在各级党的领导机构下面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或任命了军事委员,他们负责组织和训练突击小组和破坏小组,选拔军事干部,组织收集武器和医疗器材

等。共产党人通过宣传鼓动工作，向人民群众介绍党的纲领，解释解放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并指明了斗争胜利发展的前景；为了提高人民的战斗情绪，共产党人还开展行动，反对占领者和卖国贼的各种措施：如建立法西斯极权制度，掠夺国家的经济财富，为德国经济募集劳动力，建立法西斯组织和实行“义务劳动服务”等；同时鼓动人民起来反抗法西斯恐怖和迫害。南共通过这样的活动扩大了同人民的联系和在人民中的影响，加强了反对占领者和本国帮凶的统一阵线。与此同时，南共各级领导主动去团结那些表示反对占领者或不与占领者同流合污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某些人士和集团、工人运动中改良派的代表、文化人士和社会人士。在这方面斯洛文尼亚取得了具有长远意义的成果。在那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发起单位着手建立共同的地方委员会，以团结反法西斯战士和一切热爱自由的力量，从而为实现斯洛文尼亚人民的战斗团结开辟了道路。根据五月会议的精神，反帝国主义阵线的领导发表了纲领，其中指出，“四分五裂的斯洛文尼亚人民，包括滨海地区和科鲁什卡的斯洛文尼亚人民的解放和统一”是人民解放斗争的基本目标，同时特别强调这一目标“只有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在“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卖国政权的”斗争中和依靠苏联，才能实现。在德国进攻苏联后，反帝国主义阵线改名为解放阵线。

纵观全局，“事实表明，在资产阶级政治营垒中没有哪种力量愿意接受任何一种解放斗争的思想，因为在这场斗争中武装的人民将成为解决自己命运的主体，而在解决过程中将体现人民的社会愿望和民族愿望”（铁托）。事实上，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特别是那些充当旧制度支柱的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甚至在人民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也不愿意接受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合作。不仅如此，南共为在解放斗争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团结而作出的努力，也遭到这些力量在宣传上的日益强烈的反对，它们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任何反对占领者的行动都注定会失败，并将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应该等待更有利的条件。

为了同南共马其顿省委员会建立联系并指导它的活动，南共中央委员会在五月会议之后派拉扎尔·科利舍夫斯基以省委委员的身分去斯科普里。但是，在6月中举行的省委会议上，沙托罗夫拒绝了南共中央的过问，强调马其顿没有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而马其顿党组织由保加利亚工人党来负责领导。

在准备武装斗争的工作中，南共仅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就对国内的政治动态和对人民形成摆脱困境的可行办法的认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广大阶层的人民不再由于四月战争的结局而悲观失望和斗志涣散，而是加强了走抵抗和斗争的道路的决心。一些地方对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恐怖行径的自发反抗现象越来越多，便是佐证。黑塞哥维那东部的塞尔维亚族居民还在6月初就拿起武器，抵抗乌斯塔什的暴行，这一抵抗很快就具有了起义的规模。自发抵抗的现象证实了南共的行动纲领是正确的和可以实行的，并鼓舞了共产党人在组织反对占领者和国内帮凶的武装斗争中更加坚定地开展活动。

南共在组织上壮大的材料，也说明了它在准备人民解放斗争过程中的活动规模和成果，以及它的影响的增长。从1941年四月战争前到7月发动武装斗争的前夕，南共党员人数从0.8万名增加到1.2万名，而共青团员人数从3万名增加到5万左右。特别是农村的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人数增加了。据不完全统计，在发动武装斗争前夕，南斯拉夫各省和各地区的南共党员人数如下：塞尔维亚约2500名，伏伊伏丁那约1200名，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约270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约830名，克罗地亚约4000名，斯洛文尼亚约1200名，马其顿约740名（1941年10月底），黑山约1800名。当然，南共的影响不能仅仅以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人数来衡量，但是党团员人数的迅速增加也表明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活动能力和党的政策为人民群众所接受。

2. 人民解放斗争的开始和发展

决定发动起义。开展人民解放战争的思想。武装斗争的发展。起义的武装力量。

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这对南共来说标志着反对占领者及其帮凶的武装斗争的开始。同一天在贝尔格莱德,在铁托领导下召开了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世界局势,同时除了国内条件外,也为在南斯拉夫顺利地开始武装斗争创造了国际条件。南共领导机构认为,苏联参与世界冲突,为解放事业和实现提出的革命目标开辟了前景,这具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伟大意义。在南斯拉夫准备武装斗争的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一事件对提高广大阶层人民群众的战斗士气和自信心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人民群众相信苏联的力量,并期待着能很快地取得胜利;而对于南斯拉夫工人运动和南共来说,进行反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同时也是对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声援。除此之外,德国作战部队离开南斯拉夫去参加对苏进攻,以及意大利师团开始撤离,从军事角度看也为发动武装斗争创造了较有利的条件。

根据这样的估计,南共中央委员会于6月22日发表了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书,指出苏联进行的正义斗争同时也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南斯拉夫人民必须阻止侵略者把南斯拉夫变成法西斯军队的供应基地。告人民书号召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进行“最后的决战”,而全党要为武装解放斗争直接作好准备。

南共的一些省和地区的领导机构在听到苏联遭到进攻的消息后,马上发表了各自的告人民书。这些告人民书在精神和思想方面都同南共中央委员会的告人民书是一致的。这证实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也体现了南共的统一战略。

尽管如此,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日子里在一些党的领导机构的工作中也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中出现的混乱,是由设在萨格勒布的共产国际同几个共产党的联络中心领导人约瑟普·科皮尼奇引起的。他批评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谓的机会主义,坚持刻不容缓地采取大规模的武装行动,而后再利用共产国际授予的权力,决定解散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而由萨格勒布地方委员会接替其职权。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反对这个决定,不接受任何越过南共中央发来的指示,而南共中央政治局也谴责了科皮尼奇的行为,并向共产国际进行了坚决的交涉。这次对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干预,使它在发动武装斗争方面的活动一度停顿下来;此外,在科皮尼奇的催促下,于7月13日进行了解救凯雷斯蒂纳茨集中营中的共产党人的行动。在这次准备不充分的行动中,80名党的优秀积极分子中牺牲了68名。南共中央委员会也采取步骤,整顿了马其顿省党组织的情况。大部分党的干部通过拉扎尔·科利舍夫斯基了解了省的领导机构中出现的混乱和冲突的性质,了解了南共的行动纲领,便开始积极地为武装斗争作准备。但是省委员会继续对抗南共中央委员会的立场和决定。“工人党马其顿省委员会”(南共马其顿省委员会在并入保加利亚工人党后改为此名)在德国进攻苏联时发表的告人民书中,不是号召举行武装斗争,而是号召马其顿人民声援苏联,指望苏联军队带来自由和保证建立“苏维埃马其顿”。在了解了这个省组织的情况后,南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把沙托罗夫开除出南共和暂时停止省委工作的决定,但沙托罗夫拒绝了这个决定。

尽管在城市中心也设想并准备开展各种形式的战斗活动,但成立武装部队和计划武装行动的重点转向了内地。实际力量的对比促使采取这样的方针。维护南斯拉夫占领制度的兵力有意大利、德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18个师及众多的警察和宪兵部队,以及“克罗地亚独立国”卫国军的几个师和其他卖国组织的部队。

这些部队的主力部署在各最重要的行政中心和工业中心，并在各州、县及很多区的所在地派有守备部队。所以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带着组织游击队的任务而离开城市中心。第一批武装队伍的人员由南共党员、共青团员和其他革命民主运动的成员组成。策划已久的在进攻苏联时逮捕共产党人的行动，加速了大批南共党员从城市转入内地。一些领导机构带着党的技术部门离开城市，把驻地转到内地。一部分党员和领导则继续留在城里，其任务是组织怠工、进行破坏和其他活动，并保证武装队伍的物资供应。在得到正在策划打击共产党人的情报后，大部分领导机构发出指示，让暴露身分的南共党员，如果没有去内地，则隐藏起来和转入地下。由于这么做，只有少数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被捕。

6月22日会议以后，南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重点是直接准备开展武装斗争。6月27日成立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设在贝尔格莱德，参加总司令部的有南共中央全部政治局委员。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担任总司令。在萨格勒布还成立了接待站，接待响应党的号召秘密回国的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战士。

在铁托的领导下，于1941年7月4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米洛万·吉拉斯、伊万·米卢蒂诺维奇、伊沃·洛拉·里巴尔、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和斯雷滕·茹约维奇。会上决定发动反占领者的武装斗争。同时决定马上成立以斯雷滕·茹约维奇为首的塞尔维亚游击队司令部，负责在塞尔维亚地区采取武装行动。派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和米洛万·吉拉斯作为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带着同样的指示分别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黑山。根据南共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在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面成立了以弗拉多·波波维奇为首的党的作战领导机构，其任务是执行发动武装斗争的决定。在斯洛文尼亚则委托当时在卢布尔雅那的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爱德华·卡德尔负责执行这一决定。

根据成立游击队及其最初武装行动的经验，并根据人民解放

斗争纲领提出的长远的纲领性目标,铁托很快就制定了运用游击组织和游击战术发展全民起义的完整思想。这一思想作为指示,以“人民解放游击队的任务”为题,刊登在1941年8月10日发布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第一号公报上。指示强调指出,游击队的主要目的是“解放南斯拉夫人民”,因此它们“必须不倦地发动人民起来反抗,发动人民起义”,同时要“作为战斗核心来领导这些起义”。它们将通过经常不断的进攻性的游击武装行动和在人民当中的日常政治活动来实现这个任务。这个指示展示了南斯拉夫各省和各地区根据客观条件建立较大的军事部队和进行较大的战役的前景。在这方面,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可以发挥最广泛的主动性。要实现这样的思想,党的工作就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首先要把党的基本活动从城市中心转向内地。这是因为南斯拉夫人口的绝大部分(76%)是农民,只有他们广泛地参加斗争,才有可能实现这一思想的基本意图,即发动全民起义并使它成为争取实现长远目标的不断的斗争。同时党在城市和工业中心也开展了战斗活动及其他形式的抵抗活动。

根据7月4日南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发动武装斗争的决定的精神,在7月里南斯拉夫各地几乎都开始了游击队的行动。鉴于各省、各地区及某些地方的特殊条件,在开始阶段武装斗争发展的激烈程度是不相同的。

塞尔维亚在6月23日南共塞尔维亚省委员会会议以后就开始建立游击队,并在7月7日开始了最初的武装行动。7月中旬在塞尔维亚地区活动的有7支游击队,而到8月底就有21支游击队。一些游击队在建队时有几十名战士,其中大部分是南共党员和共青团员。最初这些游击队进行了一些典型的游击行动,并取得了成绩。这些成绩加上在人民当中开展的日常政治工作,使得游击队不断壮大。8月底和9月初,在对宪兵站和区公署发动了几次成功的突然袭击后,游击队转而进攻较大的中心,消灭了德国守备部队或迫使它们后撤。在舒马迪亚、塞尔维亚西部和莫拉瓦河流域的战

斗已具有较大的规模。这些地区游击队的活动,是由塞尔维亚游击队司令部根据南斯拉夫游击队总司令部关于在塞尔维亚的这些地区建立广泛解放区的指示精神而直接指导的。9月中旬,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游击队总司令部从贝尔格莱德转移到塞尔维亚西部解放区。到10月初,已经解放了克鲁帕尼、巴尼亚科维利亚查、洛兹尼察、博加蒂奇、乌日策、戈尔尼米拉诺瓦茨、巴伊纳巴什塔、伊瓦尼察、古查、阿里列、波热加、查查克、鲁德尼克和利格,而德军被围困在几个大城市里。在贝尔格莱德的近郊也进行了战斗。在塞尔维亚这部分地方,游击队发展成为较大的武装部队,人数增加到1500名,继而增加到2000名,并建立了连和营。在塞尔维亚的东部和南部,武装斗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塞尔维亚的游击队已拥有约1.4万名战士,并解放了塞尔维亚2/3的领土。9月底,南共中央委员会和南斯拉夫游击队最高司令部迁往乌日策。在游击队开展武装行动的同时,很多被占领的城市里,特别是在贝尔格莱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克拉列沃和沙巴茨,也进行了大量的破坏、怠工及其他斗争活动。

德国占领当局起初企图以警察部队的力量和镇压手段(如公开绞死、枪决、拘留和烧毁一些居民区等)来阻止武装行动的扩大。但是,7个德国警察大队和卖国政府宪兵队的兵力很快就表明无法阻止起义的扩大。还在8月中旬,镇压起义就列入了德国占领军司令部的职权范围,它在塞尔维亚拥有3个警备师。借助于警察部队和强化的卖国部队,德军司令部企图发动攻势来消灭游击队的力量,但这个企图也遭到了失败。所以希特勒根据东南线指挥官的建议,于9月16日发出命令,调德军作战部队去塞尔维亚镇压起义。同时德意志帝国最高统帅部的下列命令也开始生效:在爆发起义的地方,每打死1个德国士兵就枪毙100个居民,每打伤1个德国士兵就枪毙50个居民。由于得到从希腊、法国和苏德战线调来的近3个德国师的兵力,以及炮兵、坦克兵和航空部队的增援,占领军和卖国部队向塞尔维亚西部、舒马迪亚和莫拉瓦河流域的游

击队和解放区发动了围剿。占有无比优势的德国部队在两个月（从1941年9月底到12月初）的战斗中，尽管遭到了游击队局部的坚决抵抗，仍然重新占领了解放区，对人民进行了极为残酷的镇压。下述材料尽管不完全，但说明了这些罪行的规模：9月30日在沙巴茨枪杀了1000人；10月初在马奇瓦的一些村庄里枪杀了1226人，而21440人被关进集中营；10月15日在德拉吉纳茨村及附近枪杀了2000多人；10月21日在克拉古耶瓦茨枪杀了约7000人；这些日子里在克拉列沃枪杀了约5700人。据不完全统计，德国占领者到1941年12月在塞尔维亚共枪杀了男女老幼超过4.4万人，还有数万人被关进集中营。根据南斯拉夫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的决定，游击队的核心力量于1941年12月上半月撤到桑贾克，而留在塞尔维亚这一地区的游击队在占领军的不断进逼下遭到破坏。然而，当塞尔维亚西部、舒马迪亚和莫拉瓦河流域的起义在德军围剿的打击下处于低潮时，塞尔维亚南部的武装斗争却具有了起义的规模。到1941年末，游击队力量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大部分。

在发动武装斗争期间，特别是在德军围剿期间，塞尔维亚党组织遭到了很大的损失。牺牲了一批杰出的活动家，如德拉戈伊洛·杜迪奇、布兰科·克尔斯马诺维奇、米兰·布拉戈耶维奇、米兰·米亚尔科维奇、久罗·斯特鲁加尔、米伦科·布尔科维奇、韦利科·杜戈舍维奇、杜尚·耶尔科维奇、米洛什·马蒂耶维奇、拉特科·米特罗维奇、武基察·米特罗维奇、韦拉·布拉戈耶维奇和博拉·马尔科维奇等。

在黑山，南共黑山省委员会的会议讨论并拥护南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发动武装斗争的决定，紧接着早已准备就绪的游击队突击小组在7月13日采取了最初的武装行动。在以后的几天里，斗争具有了总起义的规模。在截断交通线和流动打击意大利部队的同时，大批起义部队到7月24日转入进攻意大利的守备部队，并解放了几座城市，如安德里耶维察、贝拉奈（现名伊万格勒）、达尼洛夫格勒、科拉欣、比耶洛波列、扎布利亚克、沙夫尼克；而占领军守备

部队则被围困在几个较大的中心城市里，如波德戈里察（现名铁托格勒）、采蒂涅、尼克希奇、普列夫利亚，以及海滨的一些城市里。游击队员人数增加到3万人以上。根据南共黑山省委7月18日的决定，成立了以司令阿尔索·约万诺维奇和政委米洛万·吉拉斯为首的黑山、博卡和桑贾克人民解放部队临时司令部，取代了军事委员会。司令部采取措施组织和加强了起义部队，并指导它们的活动。

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对武装斗争的规模和本国部队的损失感到不安，采取了大量措施来镇压起义。除原先留在黑山境内的部队外，又从阿尔巴尼亚调来5个配备有炮兵、坦克和空军的加强师，于7月17日开始投入战役。这些部队约有10万兵力，尽管它们遭到了起义者有力的局部抵抗，但在以后的几天里沿着交通干线挺进，到8月中旬又重新占领了解放区。意大利军队在作战中对人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如烧毁遇到抵抗的地区的村庄、杀害居民、抢劫财物，并把几千人关押起来。一些起义者对意大利军队围剿的规模及其对人民的暴行感到惊恐，纷纷离开部队回家。在这种情况下，省党的领导力图保存起义部队和运用游击战术继续开展武装行动，但没有收到效果。在起义处于低潮的气氛中，省党组织在8月8日举行会议，认为举行全民起义的时机过早，党现在应该采取建立广泛的游击运动的方针。在8月至10月期间，党的工作重点是准备新的起义。1941年秋末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斗争。游击队力量的突击核心是拥有3690名战士的黑山游击队。它进行了桑贾克战役，于12月1日向普列夫利亚的意大利守备部队发起了进攻，但遭到了严重的损失（死伤472人）。尽管这次进攻的失败对起义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不良后果，但1941年末武装斗争仍蓬勃开展起来，游击队重又控制了黑山相当大的地区。同时，根据南共中央委员会9月的决定，南共桑贾克州组织直接同南共中央委员会建立联系，而由里法特·布尔卓维奇任书记的南共桑贾克州委员会也得到了扩大。在这以后又很快成立了桑贾克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司

令是弗拉迪米尔·克奈热维奇·沃洛乔,政委是沃约·莱科维奇。1941年12月,由于黑山游击队和塞尔维亚游击队核心力量随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来到桑贾克,使游击队更加壮大,并胜利地开展活动。

南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委员会在接到南共中央政治局7月4日的决定后,马上着手成立游击队和发动武装斗争。为了更有效地进行领导,省委决定成立四个地区军事司令部:波斯尼亚克拉伊纳地区、黑塞哥维那地区、图兹拉地区和萨拉热窝地区,同时决定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伊萨·约万诺维奇、博里沙·科瓦切维奇参加省领导中心。最初的武装行动于7月27日开始进行。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内住有大量塞尔维亚族居民并遭到乌斯塔什匪徒恐怖摧残的地区,最初的武装行动促进了广泛的起义运动,因此在8月里,波斯尼亚克拉伊纳、波斯尼亚东部大部分地区和黑塞哥维那东部就出现了起义中心。德尔瓦尔、波斯尼亚格拉霍沃、姆尔科尼奇格勒、汉皮耶萨克、弗拉塞尼察、索科拉茨、斯雷布雷尼察等地的乌斯塔什卫国军守备部队被消灭,建立了幅员广阔的解放区。成千上万名起义者被编入连和营,它们的主力部队则调去围困大地方的守备部队和保卫解放区。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有其他地方几乎都开展了游击队的武装行动,而在1941年秋天,起义也席卷了波斯尼亚中部地区。“克罗地亚独立国”的首脑在8月里把卫国军主力部队投入镇压起义的战役。乌斯塔什杀害了没有来得及躲藏的塞尔维亚族居民,并把沿途经过的塞尔维亚族村落都放火烧毁。由于乌斯塔什的“克罗地亚独立国”没有能力消灭起义,意大利就根据它同乌斯塔什政府的协议,直接出兵讨伐在“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意大利势力范围内的起义。意大利军队打着维护秩序和治安、保护流离失所的塞尔维亚族居民的旗号,并依靠“塞尔维亚民族运动”领袖的帮助,在9月和10月里重新占领了黑塞哥维那东部、波斯尼亚克拉伊纳大部 and 波斯尼亚中部。到1941年底,这些地方又恢复了战斗。在讨伐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地区游击队的战斗中，在德国势力范围内还调动了德军的守备部队，然而起义运动仍然顺利地发展。1941年底，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游击队已有2万名左右武装战士，他们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地方。

在7月13日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根据南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精神，讨论了党组织在发动武装斗争中的任务，并派代表去克罗地亚的一些地方以保证这些任务的贯彻执行。已经建立起来的突击小组和武装部队在城市中心和内地开始进行斗争（最先行动的部队之一是锡萨克游击队），首先是开始怠工和破坏活动。7月27日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武装行动。这些行动在7月底和8月初在有大量塞尔维亚族居民的地区发展成为起义运动。因为那里的塞尔维亚族居民正受到乌斯塔什“清洗”行动的迫害。最大规模的起义行动席卷了利卡和克宁地区，在那里建立了解放区，并于8月下半月粉碎了乌斯塔什卫国军的围剿。在乌斯塔什采取消灭塞尔维亚族居民的行动时，游击队在科尔敦、巴尼亚以及戈尔斯基科塔尔部分地方展开了武装行动。这些武装行动最初是防御性的，是为了保护逃入森林中的人民，尔后在夏末变为进攻性的，从而能建立解放区。意大利军队的进攻及其同“塞尔维亚民族运动”领袖的联合行动，是想粉碎这些地方（其中绝大部分属于意大利势力范围）的起义。征讨使起义者中出现了情绪波动，但是在1941年末，经过整顿的游击队力量重又开始进攻。1941年10月中旬成立了克罗地亚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伊沃·鲁卡维纳和马尔科·奥雷什科维奇分别任司令和政委。1941年末，克罗地亚的游击队约有7000名武装战士。在1941年夏天，克罗地亚的其他地方也开始了武装行动。克罗地亚滨海地区、达尔马提亚和斯拉沃尼亚的武装斗争在1941年里蓬勃发展，但在克罗地亚的西北部第一批游击队却被击溃。在一些城市和工业中心，特别是在萨格勒布、斯普利特、希贝尼克、斯拉沃尼亚布罗德、锡萨克、苏沙克和卡尔洛瓦茨等地，都进行了多次武装行动。

在1941年组织和开展武装解放斗争时期牺牲了数量众多的克罗地亚共产党人,其中有许多党的杰出干部:奥古斯特·采萨雷茨、奥格年·普里察、奥托卡尔·凯尔绍瓦尼、博日达尔·阿季亚、拉代·康查尔、马尔科·奥雷什科维奇、约瑟普·克拉什、帕夫莱·帕普、约瑟普·弗拉霍维奇和安卡·布托拉茨。

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6月22日作出决定,成立以司令弗兰茨·莱斯科舍克和政委博里斯·基德里奇为首的斯洛文尼亚游击队总司令部,接着就加紧进行在斯洛文尼亚发动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总司令部于7月中旬发布了关于游击队的组织和任务的命令(《游击队法》),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中央和总司令部根据南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精神,于7月16日决定着手发动武装斗争和成立游击队。游击队的战斗核心是以前建立的战斗小组和地下工作者小组。7月22日开始了有计划的武装行动,而在7月末和8月初有更多的游击队在戈伦斯科和什塔耶尔斯卡开展活动,于是在那里成立了第一批游击营。德国占领当局依靠本身的武装力量和发达的警察机构,通过围剿和大规模镇压,在1941年夏天和秋天局部地击溃了一些游击队,阻止了这些地方武装行动的扩大。尽管党组织和解放阵线遭到了很大损失,但是它们要恢复游击队组织和继续战斗的决心在戈伦斯科12月起义运动中得到充分的表现。1941年夏末,有好几支游击队在卢布尔雅那地区和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开展活动。约2000名游击队员中有一半是党团员。卢布尔雅那是反对占领者活动的强大的中心,是1941年期间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解放阵线最高会议和斯洛文尼亚游击队总司令部的所在地。在组织武装斗争的党员中有一些杰出的干部牺牲了,他们是斯拉夫科·什兰代尔、弗兰尼奥·弗伦奇、约热·米海尔契奇、米洛什·集丹舍克、斯塔奈·扎加尔、托奈·托姆希奇。

1941年9月中旬,在共产国际同意马其顿省组织仍属南共之后,贯彻执行了南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把沙托罗夫开除出党和任命新省委的决定。新省委的成员有:拉扎尔·科利舍夫斯基(书记)、

马拉·纳采瓦、博尔科·塔莱斯基、布拉戈耶·穆切托、巴奈·安德雷耶夫。同时还成立了马其顿省司令部。一些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过去所进行的斗争,使得第一批游击队能够迅速地成立起来。第一次武装行动——进攻普里莱普——是在1941年10月11日进行的。但是,保加利亚占领军大批兵力的反击,阻止了游击队行动的扩大,同时由于包括拉扎尔·科利舍夫斯基在内的很多党的干部被捕,11月初在省委里又恢复了关于马其顿武装斗争的条件是否成熟的讨论。最后采取的方针是:党将继续进行政治活动,而武装行动推迟到明春。

伏伊伏丁那省党委于6月23日决定成立伏伊伏丁那游击队司令部,司令是达尼洛·格鲁伊奇,政委是斯韦托扎尔·马尔科维奇。司令部直接为武装斗争进行了准备工作。在接到南共中央政治局7月4日的决定以后,伏伊伏丁那开始成立游击队。在巴纳特很多支游击队,约200名战士,参加了行动。然而,实力强大得多的德国占领军和国内警察部队迅速进行反击,使游击队受到了很大损失。实践表明,在巴纳特平原没有条件长期顺利地进行武装行动,于是游击队于9月底离开巴纳特向弗鲁什卡山转移。在这一试图遭到失败后,游击队员分成小组,散居在各村庄里,进行政治工作,并开展怠工和破坏活动。匈牙利占领者在巴奇卡通过大规模的逮捕和恐怖活动阻止了游击队的建立,于是军事小组和突击小组便开展了烧毁庄稼等破坏活动。南共斯雷姆地区委员会由于没有同党的省委领导建立紧密的联系和牺牲了几名委员,所以没有能够在夏天的几个月里为武装斗争进行广泛的准备工作。斯雷姆的共产党人在8月22日深夜到23日凌晨帮助被捕的共产党人从斯雷姆米特罗维察监狱越狱。这些人后来参加了第一批斯雷姆游击队。伏伊伏丁那,特别是巴纳特和巴奇卡的南共组织和南共青团组织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损失。很多党的杰出干部牺牲了,其中有索尼亚·马林科维奇、拉迪沃伊·契尔帕诺夫、米哈利·塞尔沃、乔尔杰·兹利契奇、埃尔奈·基什、扬科·奇梅利克、斯特万·约

万诺维奇、奥特马尔·马耶尔和斯拉夫科·蒙昌。

根据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政治形势的估计,并首先考虑到阿尔巴尼亚族居民不可能接受同占领者进行武装斗争的方针,因此南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州委员会按照南共中央政治局7月4日的决定而得出结论:党的活动重点应继续放在对这部分居民的政治工作上,特别要阻止阿尔巴尼亚族人应征参加卖国部队。同时也决定采取这样的方针:要在塞尔维亚族和黑山族居民村里建立军事组织,以防备卖国当局的恐怖活动,并开展斗争,进行军事训练和为发展武装斗争作准备。根据南共中央关于阻止特雷普查矿井生产的建议,州委员会作出决定,由当地党委领导一个党员矿工小组于7月30日深夜到31日凌晨在矿上采取了第一次武装行动。该小组随后突围到科帕奥尼克,在那里成立了科帕奥尼克游击队。

在国内各个地方的武装斗争极其迅速地但又不平衡地发展的过程中,全党特别是各级游击队司令部最为重视的是建立和发展起义的军事组织,以及在战斗时运用相应的战术原则。在南共中央政治局7月4日的决定和方针中已包含了对开展武装斗争的统一看法,这些看法在铁托的《人民解放游击队的任务》的命令以及以后向各领导机构发出的命令和指示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阐述。但是,由于仅仅靠通讯员来保持的联络工作差而慢,甚至出现同某些领导机构的联系中断,因此在武装斗争的初期,组织武装力量问题的解决和斗争方式的发展,往往取决于地方党和军事领导机构的主动性。所以,尽管最初阶段起义发展情况表明,党内采纳了并顺利地实施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既定方针,但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着迷失方向的情况。当时有人对坚决开展武装斗争产生了动摇,并把游击队撤到隐蔽的基地,以致使它们脱离了人民;而在游击队最初的武装行动推动了广泛的起义运动的地方,出现了要求为保卫解放区而进行阵地战的倾向,以及要求成立相应的部队建制(如团、旅和师)的倾向。

鉴于上述有关武装力量的组织和战术的问题的复杂性,同时

也由于起义的蓬勃发展而出现了更加广泛的可能性,南共中央委员会在1941年8月31日的会议上决定由南斯拉夫游击队总司令部召开“总司令部和各地区代表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于9月26日在塞尔维亚西部解放区克鲁帕尼附近的斯托利采召开,因而以斯托利采会议著称。会议由铁托主持,参加会议的除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伊万·米卢蒂诺维奇和伊沃·洛拉·里巴尔以外,有塞尔维亚的代表斯雷滕·茹约维奇、罗多留布·乔拉科维奇和菲利普·克利亚伊奇,克罗地亚的代表拉代·康查尔、弗拉多·波波维奇,斯洛文尼亚的代表米哈·马林科和弗兰茨·莱斯科舍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代表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和斯洛博丹·普林齐普。

斯托利采会议在分析武装斗争迄今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通过了有关武装力量的组织的决定。决定指出,随着游击队发展成为较大的部队,就要在这些部队里建立有指挥部和参谋部的连和营;要安排好部队供应和照料伤员的工作;省的军事领导机构为总司令部,其基本任务是协调省内各支游击队的活动及计划和领导较大的战役。原来的南游击队总司令部改名为最高司令部。会上特别研究了出现武装斗争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原因,并指出,尽管存在着不同的客观条件,但仍要最坚决地坚持开展全民起义的思想。这样就彻底地批驳了把武装斗争保持在“游击”水平上的倾向。最高司令部颁布的命令也坚持要加强武装起义力量的建设,它规定了游击队战士的标志、旗帜和敬礼方式。

1941年秋,由于贯彻执行了斯托利采会议的决议,游击队开始具有了有组织的军队的基本特征。凡是武装斗争的规模较大的地方,部队编为连、营和游击队。游击队作为最大的编制形式,下设2~5个营,平均有几百名战士,有些已达到3500名战士。在开展较大的战斗活动中,还出现了几支游击队的联合组织。

通过司令部,特别是政治委员们的努力,在游击队里建立了具有革命解放军特点的关系,并制定了建立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的纪

律。在这方面，根据南共中央的指示在所有游击队中建立的南共和南共青团基层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在组织军需机构方面也采取了重大措施。在解放区建立了接收和治疗伤员的医院。建立了第一批维修武器的作坊。在解放后的乌日策，游击队的第一所兵工厂开工生产。除了步兵轻武器外，一些游击队还用缴获的大炮和坦克组建了第一批炮兵和坦克部队。

通过贯彻执行斯托利采会议的决议，游击队的战斗力有了加强，但是经验表明，特别是从占领军和卖国军的某些围剿中汲取的经验表明，还必需进一步发展军事组织。铁托回顾了德军秋季进攻塞尔维亚西部时进行的战斗，指出这些战斗的经验“最清楚地和最有力地证明，我们靠联合起来的游击队和营是不可能胜利地进行较大规模的战役的”，也就是说，“必须建立真正的军队，它能够离开本土，按照命令到需要的地方去打仗”。1941年12月22日建立了第一无产者人民解放突击旅，从而开始了建立新型军队的进程。

这样在南斯拉夫4月失败后仅仅过了几个月，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武装解放斗争就蓬勃发展起来了。建立解放区，切断交通干线，破坏矿山和其他经济企业，使南斯拉夫的占领制度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起义以自己的成绩和规模使轴心国列强的声誉大受影响，它促使人们对希特勒“欧洲新秩序”的稳定性表示怀疑，同时用自己的实例来促进其他受奴役国家开展反占领者的行动。还在1941年期间，占领当局就被迫从其他国家和其他战线上抽调兵力来增援驻南斯拉夫的部队。1941年底，在南斯拉夫战场上共牵制了25个意大利、德国、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师，约50万兵力，还有卖国部队的12万兵力，而人民解放运动的武装力量约有8万名战士。

3. 人民解放运动的政治基础

人民政权和人民解放阵线。投敌的反革命的出现及其活动。

在建立最初的军事组织形式和确定武装斗争观念的同时，南共领导机构根据德国进攻苏联而引起的形势的巨大变化，更加全面而恰当地制定了实现人民解放斗争纲领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则。在号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参加反对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武装斗争的声明中，南共中央委员会强调指出，苏联正在进行卫国战争，这是一场保卫人类自由、文明和进步的战争；在此基础上苏联和英国结成了战争同盟，它得到了美国 and 世界上所有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持。在德国进攻苏联后，共产国际的方针也反映出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看法的实质性变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德国进攻苏联使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具有了正义的解放战争的性质。从这一看法出发，执行委员会号召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上所有其他民主运动全力声援苏联，并要求被奴役国家的共产党开展反对占领者的斗争来表达自己的支持，同时在这场斗争中团结本国的所有爱国力量。执行委员会特别强调指出，“现阶段当务之急是从法西斯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它认为由于德国进攻苏联而出现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力量都要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结盟的基础上为打败法西斯轴心国而斗争。这样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放弃了几十年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论点：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争取欧洲和世界革命胜利的革命的阶级战争来消灭帝国主义。在苏联参战后出现的现实情况的影响下，曾深深扎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信念，即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新的帝国主义战火中将成为世界反帝国主义革命阵线领导力量的信

念也随之破灭了。而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1年8月14日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也促进了这一点，因为《宪章》中表示了同纳粹暴政进行斗争的决心，并强调了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和自由发展权。但是，南共领导没有对原先确定的人民解放斗争纲领的基本原则表示动摇。南共没有改变对南斯拉夫王国资产阶级制度必然发生危机和4月灾难的原因的看法，也没有对自己的下述原则立场产生疑问：只要反对占领者的斗争能够为基本阶层的人民群众开辟实现社会民主改革愿望的前景，人民群众就将参加这一斗争。但是，在德国进攻苏联以后，在南共的面前也提出了重新调整实现人民解放斗争纲领的战略和策略的问题。现在，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调反对占领者的武装斗争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性质，而是强调武装斗争的反法西斯和解放的性质。南共对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态度不再同它们对未来社会制度的看法联系起来，而是首先同它们对待占领者的立场以及支持和积极参加解放斗争的决心联系起来。南共现在不再实行团结原资产阶级政党中愿意接受南共领导的个人和集团的方针，而是表示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所有愿意参加解放斗争的政治力量进行合作。因此，铁托在上面提到过的关于建立游击队武装组织及其任务的命令中指出，游击队之所以称为人民解放游击队，“是因为这不是某个政党或派别的战斗组织，具体说也不是共产党的战斗组织，尽管共产党人斗争在最前列”，因为“游击队的政治路线应当是南斯拉夫的不分政治和宗教信仰的全体人民的反法西斯人民解放阵线”。

但是，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并没有对亲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立场产生较大的影响。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仍然认为不具备进行武装解放斗争的条件。有些集团，包括主张在“有利的条件”下准备进行斗争的某些资产阶级政党领袖或原南斯拉夫军队的军官，支持同共产党人进行谈判；而有些集团则在口头上表示要进行斗争，但在实践中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斯洛文尼亚解放阵线在团结某些集团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它想在解放斗争中实现

合作的主张却遭到了资产阶级政党上层的坚决抵制。实际上，自由主义政党和教权主义政党的某些个人和集团在发动反占领者的武装斗争时参加解放阵线，是这些政党的瓦解过程正在加快的表现。

所以，共产党在发动和开展武装斗争时，几乎只能依靠有组织的革命民主运动的力量。在人民解放斗争纲领的基础上团结和动员人民的最初的组织形式，起源于四月战争以前共产党人起着领导作用的工人团结委员会、人民援救委员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合作社、文化团体、体育团体和其他组织。在确定开展武装起义的思想的同时，铁托提出应建立人民解放阵线委员会作为在解放斗争中团结人民的最广泛的形式。铁托强调这些委员会还应该筹集人民解放基金。人民解放基金委员会由原人民援救委员会发展而成。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努力使一些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也参加这些委员会，而有些地方这种委员会的成立就是同当地这些政党的领导人协商的结果。

南斯拉夫境内，在游击队的最初行动推动了广泛的起义运动的地方和在1941年7、8月间已经建立了解放区的地方，起义的战斗机构也执行了武装人民政权机构的职能。这些最早的解放区在组织方面的特点，是南共各级地方领导机构发挥主动性的结果。在黑山七月起义中，黑山、博卡和桑贾克人民解放部队临时最高指挥部接管了最高政权机关的职能，并于7月22日发布了安排解放区生活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凡年满18岁者，除了为占领者效劳的人以外，都有权选举区和县代表会议的代表，而这些代表会议作为当地最高权力机关选举本区和县的管理机关。命令还保证民主权利和自由，允许成立民主政党，并制定了司法条例。这些日子里，代表会议选举了科拉欣、贝拉奈、安德里耶维察和比耶洛波列等地的县和地方人民委员会。除了共产党人外，还有一些资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也参加了这些代表会议的工作，尽管他们当中某些人同共产党人有分歧，认为起义太早了，南共想建立苏维埃政权等。但是在

7月底，意大利军队的围剿中断了这些委员会的工作。后来到1941年10月，南共省委决定建立地方、区和县的人民解放基金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作为广泛的政治组织，为游击队提供物资，并在解放区履行人民政府机关的职能。

8月初，在以德尔瓦尔为中心、包括波斯尼亚克拉伊纳、利卡和达尔马提亚部分地区的解放区，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作为最高政权机关，下设负责某些方面工作的办事处。根据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建议，在一些已经解放的地方成立了地方革命委员会。不久以后，在德尔瓦尔群众集会上选举了负责主管整个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和人民法院。人民解放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了广泛的工作来保障游击队的供应，维护交通，生产和维修武器，建立军医院及关心从斯洛文尼亚和利卡逃来的难民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在起义后建立的其他解放区里，也成立了人民委员会、革命政治委员会、代表委员会、地方指挥部、人民解放阵线委员会等，它们都履行着政权机关的职能。

尽管在1941年的夏天和秋天，斯洛文尼亚还没有建立解放区，但是解放阵线在发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就已经成为全民的政治力量，并接管了政权机关的某些职能。解放阵线最高会议指出了这一事实，特别强调了斯洛文尼亚基本阶层的人民群众决心承担和履行解放阵线领导机构提出的任务，并于1941年9月16日将自身改组为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委员会。它作为最高权力机关通过了下列决议：《关于斯洛文尼亚游击队加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关于保卫斯洛文尼亚人民及其争取解放和统一的运动》，《关于人民的纳税》，《关于人民公债》等。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立及其通过的决议是朝着“确认斯洛文尼亚人民主权”迈出的第一步，而这些决议的贯彻使解放阵线逐步具有了“国中之国”的某些重要特征。

8月间，在塞尔维亚的一些解放区里，政权机关的职能已由一些战斗机构接管，它们通常是人民援救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基金委

员会,而有些地方则是南共领导机构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地方领导人协商成立的人民解放阵线委员会。同时还出现了各游击队司令部发布的第一批关于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命令。根据这些命令,人民解放委员会在公民大会上选举,而每个爱国者,“不论他具体的政治倾向如何”,都可以当选为代表。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任务是保证游击队的供应,管理地方和协调居民区的生活。第一个县人民解放委员会于9月4日在克鲁帕尼成立,9月间,在塞尔维亚西部和达尔马提亚已形成了广泛的人民解放委员会网。

在最早的解放区里建立政权机关并开展活动,表达了起义群众的民族愿望和社会愿望。这对起义群众来说,意味着旧的压迫制度垮台的开始。尽管出现了一些宗派主义的现象(如提出革命的口号和打出红旗,有些地方还提出了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但在最早举行起义的地方到处都反映出党力图使起义政权机关的建立和活动能适应人民解放斗争纲领的内容。

8月初,南共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着手建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倡议,该委员会将成为“某种形式的人民政府”,成为人民解放运动的最高政治机构。这样的机构的成立表明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团结及其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共同体的决心。倡议规定,除共产党人外,凡是接受人民解放斗争纲领的“民主党派代表”也可以参加这个机构,这样就能够反映人民解放运动的广度并驳斥所谓起义“纯粹是共产党的事情”的宣传。作为南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在解放斗争中团结的标志而成立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同时也是继续同国内任何武装解放行动相隔绝的王国流亡政府的对立物。但是,南共中央委员会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倡议,因为它在8月底得到了关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同苏联政府恢复外交关系的消息(原来的外交关系是在南斯拉夫王国四月战争失败后由苏联政府决定中断的)。这样一来就加强了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国际地位及其在反法西斯联盟中的位置。

在斯托利采会议上才比较全面地讨论了政权问题,并通过了

在解放区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作为政权机关的统一方针。爱德华·卡德尔的一篇文章阐述了南共中央研究制定的关于政权问题的方针。这篇文章刊登在1941年10月19日的南共机关刊物《战斗报》上。起义的政权机关采用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名称是因为它反映了这一机关的性质。卡德尔强调指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全部活动必须服从解放斗争的利益，它的基本任务是：最广泛地动员人民为武装解放斗争服务；维持解放区的秩序和治安；组织对居民的供应和提供食品；想方设法加强前方和后方的团结、人民和子弟兵的团结。人民解放委员会将通过自己的这些活动而“团结全体人民、一切社会阶层以及人民当中所有正直的和爱好自由的人士，使我们能够尽快地胜利结束人民解放斗争”；委员会由“人民自己自由地和直接地选举产生，因此委员会能够同人民一起工作，并得到人民的信任”。鉴于资产阶级政治势力抵制和反对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来取代南斯拉夫王国政权机关，卡德尔指出，人民解放委员会并不是一个政党的机关，“所有今天站在反对占领者一边的政治派别、组织和人士”都应当有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文章还特别强调，人民解放委员会是由于领导解放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临时政权机关，人民自己将在解放了的国家里决定政权的性质和形式。

根据这些原则，1941年秋在国内各解放区里都开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建立和活动的过程。这一过程1941年9月底在塞尔维亚西部和舒马迪亚解放区里达到了最大的规模。除了地方委员会网之外，还很快地出现了许多区和县委员会，然后是第一批地区委员会，这样在11月17日，在新解放区的中心乌日策宣布成立了以德拉戈伊洛·敦迪奇为首的塞尔维亚人民解放总委员会。在波斯尼亚东部和克罗地亚解放区（如科尔敦、巴尼亚、利卡、戈尔斯基科塔尔），以及1941年底在黑山、黑塞哥维那东部和波斯尼亚克拉伊纳等地方，建立地方、区和县人民解放委员会的过程几乎是统一进行的。在一些解放区还成立了第一批地方军事机构——地方指挥部，它们依靠人民解放委员会执行了后方的军事任务。

人民政权机关的基本任务是保证游击队的物资供应和履行对前线的其他义务。这个基本任务要求人民政权机关不断地开展活动和动员人民的一切力量。为此，人民政权机关除了收集粮食外，还要使现有的企业和工场开工生产；在很多地方还招募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开办新的工场和作坊来生产军服、军鞋或维修武器；维护公路和铁路交通；组织和保证军医院和诊疗所进行接收和看护伤病员的工作。人民解放委员会还从事整顿解放区经济生活的工作。它们组织贸易和流通，防止生活必需品的投机倒把活动和走私行为，关心社会上的生活困难者，照顾为躲避占领者的恐怖活动而逃到解放区的人，以及从各地被占领者驱逐的人。在调整经济生活中，人民政权机关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及私有财产，同时保留了为满足前线需要而征用多余物资的权力，暂时接管某些企业的权力和没收通敌分子财产的权力。在解放区里人民法庭和军事法庭开始工作。人民解放委员会鼓励教育和文化活动，恢复了小学教学工作，成立了文艺团体，办起了图书馆、扫盲班，保证了来解放区的艺人的演出，开办了印刷厂，推动了出版活动。在乌日策出版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的《公报》、南共机关报《战斗报》和南共青团中央机关报《青年战斗报》。在黑山出版了黑山和博卡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公报》、南共黑山和博卡省委机关报《人民战斗报》、黑山人民青年联盟报纸《青年运动》；在克罗地亚开始出版《信使报》作为克罗地亚统一人民解放阵线机关报；在斯洛文尼亚出版了解放阵线机关报《斯洛文尼亚通讯》、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劳动报》和游击队总司令部机关报《斯洛文尼亚游击队员报》；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出版了南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委员会和游击队总司令部的《公报》。各人民解放委员会也发布公报，报道国内外大事，而一些游击队指挥部还有自己的报纸。

人民政权的建立和活动，大大推动了起义的发展和加强了人民解放运动的政治基础。人民群众第一次在政权机关的选举及其

括动方式中实际感受到了真正的民主程序。人民解放委员会通过自己的决议和命令使每个公民保证履行他对解放斗争所负的部分义务,同时也通过自己的倡议和政治活动鼓励和引导最广大阶层人民的战斗热情和创造性。这种情形清楚地表现在为人民解放基金募集捐献、认购人民公债和开展义务劳动中。因此,人民解放委员会已不是传统的政权机关,而是根据直接民主的基本原则开展活动的解放运动的战斗机关。所以它在人民解放斗争纲领的基础上扩大和加强人民的团结方面,发挥了头等重要的作用。

在1941年开展武装斗争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使人民团结在人民解放斗争纲领周围的形式。在被占领的城市和工业中心及占领区里,它们通常是人民援救会及人民解放基金组织和委员会。这些组织的最初活动是募集物资以满足游击队的需要,后来扩大到对人民开展政治工作和从政治上组织人民。在国内某些地方,政治组织的职能已由同当地资产阶级政党某些领导人协商建立的人民解放基金地方委员会来承担。1941年底在某些被占领的地方也出现了人民解放委员会,作为在解放斗争纲领的基础上开展政治团结工作和政治活动的中心机构。这些机构如同斯洛文尼亚的解放阵线委员会一样,还行使人民政权机关的某些职能(如经管人民解放基金和作出消灭卖国贼的判决等)。

南共和南共青团在团结青年方面开展了极为广泛的活动。准备和发动武装斗争工作的经验更加明确地证实了,青年是人民中最有战斗力的一部分。在第一批游击队战士中大部分是青年人,农村青年最少发生动摇,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参加了游击队,占领区的青年多半组成战斗小组和突击小组,而解放区的青年成了人民政权的最广泛和最积极的支柱。1941年8月初,南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为建立青年反法西斯阵线组织和开展活动发出的号召和特别指示,促进了加紧团结青年的工作。这些组织能在人民解放斗争纲领的基础上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青年群众。当时规定在企业、学校和居民点成立青年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小组,然后成立地方、区、

县、省和全国委员会。同时要努力使愿意参加解放斗争的其他政党和团体的青年也参加这些委员会。为开展游击队中的青年工作，南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发出了特别指示，规定要成立共青团积极分子小组，除共青团员外，还应该吸收所有愿意参加的青年参加该小组。小组的任务是在游击队和地方的青年当中开展政治工作，发扬勇敢精神和加强纪律性，组织文化教育活动。成立青年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小组和委员会的工作在1941年秋已具有了广泛的规模，特别是在解放区和游击队里。在很多地方，青年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小组联合成区和县的组织，而在一些省里还成立了省反法西斯青年联盟，如：塞尔维亚人民解放青年联盟，斯洛文尼亚青年解放阵线，黑山人民青年联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解放青年联盟。

南共利用战前已取得的成绩，也加强了团结妇女的工作。农村妇女和女青年群众几乎都自发地参加了解放区的各种活动，首先是向起义部队提供给养的活动。这种情况为教育妇女和提高她们的政治觉悟的工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妇女同男子一样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她们第一次平等地参加了人民政权机关的选举。同时，在城市、工业中心和占领区妇女参加人民援救会和人民解放基金委员会工作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在南共倡议下，出现了第一批妇女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小组，而在解放区成立了第一批地方、区和县的妇女反法西斯组织。

南共在为建立和发展人民解放运动政治基础而作出的努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南共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政策和实践。由于占领者瓜分南斯拉夫国家领土和煽动民族冲突，民族问题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被提到了首要地位。南共从战前年代里确定的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立场出发，在制定人民解放斗争的纲领和提出人民解放运动的基本原则和社会政治结构时，特别重视这方面的一些要求。

在要求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团结方面，南共是毫不动摇的。南

共在四月战争和占领者瓜分南斯拉夫之后仍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统一和继续作为全南斯拉夫的政党开展活动,并以此表明了自己在维护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国家统一方面的立场。这种立场以后还表现在人民解放斗争的统一纲领中,并且更直接地表现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和最高司令部的作用中。另一方面,解放斗争同样也是每个民族的事,每个民族只有通过自己的斗争才能获得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南共从这些原则出发,认为建立各民族和省的领导机构以及它们在组织解放斗争方面的活动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些领导机构从本民族的利益出发提出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并逐渐成为民族团结的中心。所以它们在贯彻执行南共的统一纲领时,能够反映南斯拉夫各省和各地区的重要特点。建立民族和省反法西斯组织的方针促进了人民解放运动的民族结构的发展。

这样,还在解放斗争的开始阶段,就为奠定人民解放运动民族政策的基础采取了一种新的作法,它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开辟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真正平等的前景。因此,解放斗争能够成为提高关于南斯拉夫统一必要性的认识的决定性因素。南斯拉夫共产党并没有抛弃南斯拉夫统一思想的积极传统,但是它作为出发点的方针主要是:为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奋斗将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互相接近开辟道路,并在兄弟情谊和平等的新的基础上纠正他们的意识中对南斯拉夫统一思想发生的动摇。

南共倡议在开展武装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实现所有爱国力量的团结。这一倡议对于南斯拉夫资产阶级队伍中所有亲西方的派别和集团来说,是一种历史性的挑战。这些派别和集团有的高唱对占领者采取任何形式的抵抗;有的持保留态度,期待事态的发展;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则表面上宣布继续同轴心国进行战争。当在南斯拉夫绝大多数地方已经开始了游击队武装行动的时候,南共坚持要求一切真正的爱国力量参加解放斗争和履行基本的民族职责,从而加速了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全线分化的过程,并使所有打着

武装斗争为时过早的口号，企图阻止武装斗争顺利发展，从而在客观上帮助占领者和卖国贼扑灭起义行动的人原形毕露。不管是高唱对占领者采取任何形式的抵抗，还是退而等待战争的结局，这个阵营中的各种派别和集团都把南共组织和领导的武装斗争看作是对自己的阶级地位的主要危险。尽管南共主张在解放斗争中实现最广泛的团结，但是在它们看来南共仍然是政变力量和主要敌人，并且把南共领导的起义仅仅视为“共产党政变”的危险。因此，随着武装解放斗争的发展和取得成绩，亲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派别也加紧了反对起义的活动。这个过程在不同省和地区有不同的发展程度，并有很多特点，而在1941年就已经开展了广泛起义运动的地方，资产阶级势力挑起了公开的武装冲突，企图把人民解放斗争转变为内战。

在发动武装斗争的时候，塞尔维亚人民反对占领者的情绪，在历次解放斗争和战争传统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德帝国主义斗争的记忆犹新的经验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有力地影响了塞尔维亚土地上所有政治力量的立场和活动。因此，南共领导一开始就把自己活动的重点放在发展塞尔维亚的起义上。在人民的这种情绪的影响下，塞尔维亚资产阶级，主要是亲西方的资产阶级，为了保持自己的影响，也采取了某些主动的姿态，如出现了一些由没有被俘的军官和战前切特尼克组织的个别骨干组成的秘密集团。其中最积极的是以德·米哈伊洛维奇上校和切特尼克首领科·米·佩查纳茨为核心的集团。其实佩查纳茨早在1941年8月已经就参加建立“秩序和治安”的行动同德国占领当局达成一致意见，并把自己的总部搬进贝尔格莱德。在游击队的武装行动日益扩大的影响下，德·米哈伊洛维奇打着国王的名义，开始建立切特尼克军事组织。他成立了灵活机动的武装部队，并拟定了所有预备役军人的动员名单，命令他们等候军事指挥部的征召。与此同时，他还伙同某些迅速投靠他的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大肆宣传武装斗争为时过早，它会带来新的牺牲，应

该等待更有利的条件。他也开始建立切特尼克运动的政治基础：在切特尼克最高司令部下面成立了中央国民委员会。该委员会提议成立地方政治委员会。当时还发表了切特尼克运动的第一个政治纲领，包含有最露骨的大塞尔维亚政策的内容：为强大和单一的“塞尔维亚国家”而斗争，即为在南斯拉夫的组成中清除一切“非塞尔维亚”民族的“塞尔维亚单一国家”而斗争。

尽管切特尼克的行动在人民当中不无反响，因为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这种行动是较容易被人接受的，但是进展顺利的游击队行动仍然是基本阶层人民当中政治气候和政治情绪形成的主导因素。这种情况也影响了切特尼克部队的一些指挥官，他们开始接受游击队指挥部提出的共同进行武装斗争的建议。在斗争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切特尼克的首领也容忍了这些局部达成的协议。但是在8月中，米哈伊洛维奇在同塞尔维亚游击队司令部的代表进行初步谈判时，拒绝缔结共同作战的协议，而是建议停止武装行动，尽管他也主张相互之间建立宽容的关系，即主张两个运动各自有行动的自由。

这个时候德国占领当局在游击队的活动不断扩大和取得进展的压力下，开始改变对待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政界人士和工商界人士的态度，向他们提出了更能令人容忍的占领条件，并停止了当时反对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势力即所谓“三·二七阴谋集团”的行动。这个新方针的第一个成果是8月10日发表的《致塞尔维亚人民的呼吁书》，签名的有500多名工业家、大商人、东正教高级僧侣、大臣、议员、原南斯拉夫军队将领、院士、大学教授、文学家和艺术家等。《呼吁书》号召塞尔维亚人民起来反对“共产党人和逃犯”企图用来阻止实现“祖国的民族复兴大业”的起义。很快，在8月29日成立了以原南斯拉夫军队将军米兰·奈迪奇为首政府，取代了委员制政府，并扩大了权限。德国占领当局宣传这么做可使塞尔维亚人自己对塞尔维亚民族的命运负责，并期望他们能最广泛地参加反对共产党威胁的斗争。德国占领当局通过这种宣传鼓励塞尔维亚

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本民族人民的起义。除切特尼克首领佩查纳茨外，以迪米特里耶·廖蒂奇为首的亲法西斯组织“集训队”和俄国白卫军流亡分子也参加了这一行动。米哈伊洛维奇期待这次行动能获得成功，从而能为实施其“抵抗运动”思想创造较好的条件，于是同米兰·奈迪奇达成秘密协议，表示愿意参加扑灭起义的行动。

但是，通过反共宣传硬说起义是“布尔什维主义代理人”的孤立行动的企图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恰恰相反，绝大多数人民认为他们的那种行动倒是叛国行为。因此占领者的“塞尔维亚人打塞尔维亚人”的策略没有得逞，于是德意志帝国的首脑机构决定动用自己的部队去镇压起义。这次行动受挫使切特尼克的首脑机构继续对人民解放运动玩弄手段。它通过以前同英国建立的无线电联系，在10月份恢复了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接触，并从流亡政府那里得到了今后活动的指令，从而为确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奠定了更加牢靠的基础。1941年10月第一个英国军事使团来到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使它们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巩固。对南斯拉夫政府而言，最为重要的是把起义的领导力量共产党孤立起来，使切特尼克首脑机构在坚持为“决定性时刻”作准备的策略的同时，保证对国内事态的发展起主导影响。为此政府采取了措施，让盟军承认切特尼克是南斯拉夫唯一的抵抗运动，从而向切特尼克提供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援助，与此同时，政府本身通过英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施加压力，让苏联政府通过共产国际迫使南共接受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领导。流亡政府一方面在致切特尼克首脑的指示中告诫他们不要采取武装行动，另一方面在英国的帮助和支持下在自己的宣传活动中把起义的所有成绩都归功于切特尼克分子。

在流亡政府的这种建议的唆使下，切特尼克首脑机构更加坚定地采取了扑灭起义的方针。在准备向塞尔维亚和舒马迪亚最强大的起义中心发动进攻时，米哈伊洛维奇同国内忠于旧制度的势力勾结起来。他决定在一些省和地区建立切特尼克指挥部，并向

它们发布了同人民解放运动作战的命令。在德军向以乌日策为中心的解放区发动攻势的前夕，切特尼克首脑机构向德国占领当局建议由切特尼克分子在塞尔维亚进行安抚活动，并为此而进行了谈判。与此同时，切特尼克首脑机构也接受了铁托提出的谈判建议。这样于10月26日在布拉伊契村进行了铁托和米哈伊洛维奇的第二次会晤。但是，仅仅几天之后，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利用德军开展攻势之机，派遣主力部队进攻乌日策和解放区的其他城市，并向游击队指挥部发出最后通牒，要它们停止同德军作战和服从切特尼克的指挥。当时占绝对优势的德军迫使游击队退却，切特尼克利用德军进攻对居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种情况使人民产生沮丧情绪并使游击队遭到很大破坏。切特尼克领导还认为这样的局势证实了起义过早论的正确性，从而加深了人民和战士中的动摇和沮丧情绪。切特尼克大肆宣传，说南共企图利用人民的爱国情绪实现自己的政变目的。这种宣传给切特尼克对游击队的进攻打上了挑起内战的反共行动的烙印。

在“塞尔维亚人打塞尔维亚人”的策略受挫之后，德国占领当局决定动用本国军队镇压起义。它在1941年11月11日在迪夫齐村同德·米哈伊洛维奇谈判时，拒绝了切特尼克首脑机构提出的由切特尼克分子在塞尔维亚采取安抚行动的建议，并要求切特尼克部队缴械。德国采取这样的立场也因为切特尼克分子已经同英国人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建立了联系。切特尼克首脑机构没有接受上述要求，而是决定参加米兰·奈迪奇政府的军队，使自己的机动部队“合法化”，同时继续为在“更有利条件下”开展行动而建立秘密组织。

英国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支持把南斯拉夫“所有抵抗运动的力量团结”在米哈伊洛维奇的指挥下的行动，使切特尼克首脑感到鼓舞，他们决定用武力清算游击队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决定承认切特尼克分子为自己在国内的武装力量。1941年12月，米哈伊洛维奇被晋升为将军，切特尼克分子被宣布为

“南斯拉夫国内军”，而切特尼克首脑机构被称为“最高指挥部的杰出组成部分”，不久后又被称为“南斯拉夫国内军最高指挥部”。1942年1月，米哈伊洛维奇被任命为斯洛博丹·约万诺维奇政府的陆海空军大臣。通过流亡政府的联系，切特尼克分子在1941年底开始收到英国提供的首批援助物资。尽管得到的武器和其他物资数量不多，但这些援助的到达有利于加强切特尼克分子在人民当中的影响。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通过伦敦电台和其他新闻工具，并动用其驻盟国和中立国的外交使团，大肆宣传“南斯拉夫国内军”在反占领者的斗争中取得的成绩。

英国政府尽管对南斯拉夫的事态掌握了足够的情报，但仍决定支持南斯拉夫政府和切特尼克运动，而苏联政府则持保留态度，强调不想干涉他国内政。实际上苏联政府采取这样的立场是想避免同英国政府产生可能有损它们战争同盟的误会。除此之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游击队和切特尼克分子发生武装冲突之后，对南共政策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并提出了南共在开展解放斗争中主张建立民族统一阵线是否有足够的广泛性和灵活性的问题。为了获得对解放斗争的支持和扩大解放斗争的影响，通过共产国际的工作，于1941年11月11日在苏联开始了“自由南斯拉夫”电台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广播。但是这个电台也没有介绍切特尼克分子和游击队之间冲突的情况，而是广播了有关南斯拉夫爱国者武装斗争的战果的消息，并号召国内一切爱国力量联合起来。当时，南共中央通过设在萨格勒布的秘密电台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保持联系，这也是人民解放运动领导同外界保持的唯一联系。从贝尔格莱德，以后又从乌日策到萨格勒布，通过通讯员和秘密渠道来传送电报，不仅慢而且不经常，这种情况还导致了不久后发生的误会。

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南斯拉夫事态的真相仍然没有能够被世界公众和盟国公众所了解，而人民解放运动则面临着争取得到国际承认的长期而复杂的斗争。

黑山的全民起义是黑山人民的战斗热情和南共强有力的影响的结果。起义以其声势和成就也带动了很多原来没有受到南共影响的人,其中包括两个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治阵营——倾向于南斯拉夫统一的阵营和倾向于民族主义的阵营——的个别人。而这些势力的大部分人则由于四月溃败而分化瓦解,并在大规模的起义运动面前惊慌失措,消极观望。

但是,尽管起义的胜利增强了人民对即将获得解放的信心,并有助于扩大战斗的联合,然而在当时,一些没有接受南共行动纲领的集团和个人就已经开始进行活动。这特别表现在他们抵制党作出的关于组织解放区生活的决定中。早在意大利发动攻势的初期,国内社会政治力量冲突的重点就转到了对待占领者的态度问题上。资产阶级政策的拥护者谴责起义,批评共产党人的冒险主义,并指责他们是造成占领者大规模迫害人民的罪魁祸首。他们在解放区开始成立所谓的救国委员会,为阻止对意大利军队的抵抗而四处活动,理由是这样做可以避免占领者对人民进行迫害。黑山联邦党上层中的分裂主义集团继续主张建立傀儡的“黑山独立国”。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表明了反对占领者的立场,但是它们坚决反对继续进行武装斗争,认为应该只限于准备在“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武装斗争。这样的立场在把意大利进攻的结果看作起义失败的人当中得到了理解,甚至被接受。而意大利占领当局采取的政策也大大促进了这种状况。当局宣布,意大利军队将以无情镇压老百姓来回答任何武装行动,如果停止武装行动,当局将保证和平和安全,并将采取措施来克服极为严重的经济困难。1941年10月中旬,南共省委发表告人民书,提出了直接准备新的起义的方针,共产党人为此发动了“全民讨论”。在讨论中,资产阶级势力在宣传武装斗争为时过早的同时,着手建立自己的军事组织。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发布的命令促进了这个行动。这道命令任命了黑山切特尼克部队指挥部,并拟定了同人民解放运动作战的方针。这样在1941年底,随着反占领者的武装行动的发动

展,出现了第一批切特尼克的“民族委员会”和“民族军”即切特尼克的军事组织。不久后,就导致了最初的武装冲突。1942年初,冲突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反对人民解放运动的纲领的基础上,黑山资产阶级势力的两个传统政治阵营——黑山联邦党的分裂主义分子和倾向于南斯拉夫统一的分子——实现了联合。

黑山地区内部对抗的社会政治势力的这场冲突,从一开始就具有比南斯拉夫任何其他地方都明显的内战的因素。资产阶级指责共产党人发动武装起义似乎是利用了黑山人民反占领者的情绪来实现自己的政变阴谋。为了回击这种指责,1941年8月8日省党委召开的会议认为,人民解放斗争就其社会政治内容来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已经名誉扫地,因此在人民解放斗争中不存在同它们进行合作的条件。由此而产生的方针是:应该把反对执行党的行动纲领的人,当作“第五纵队分子”和“间谍分子”,即当作政治敌人和“亲英分子”加以消灭。当时并没有在一部分对恢复武装行动表现不坚决的居民与打着起义应等待“更有利的条件”的口号反对人民解放运动的资产阶级势力之间划清明确的界线,以致在这种气氛下,在准备新的起义的日子里往往把一些主张推迟武装斗争的人杀害了。这种做法得不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南共省委政策中的宗派主义有利于资产阶级势力采取挑起内战的方针。南共中央委员会撤销了省党委会议的文件,但由于它同黑山领导机构的联系中断,它对省党组织的批评直到1941年11月才送到。当时任命了伊万·米卢蒂诺维奇为南共中央委员会驻黑山的代表,取代了米洛万·吉拉斯。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南共在发动和开展武装解放斗争时期,是在非常复杂的条件下为实现和扩大人民的团结而进行工作。条件复杂是因为这里存在着多民族的结构,特别是因为各个民族地区愿意接受人民解放斗争纲领的程度不尽相同。南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委员会预计到受迫害的塞尔维亚族居民会接受党的战斗方针,因此在讨论南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发动武装

斗争的决定时提醒，解放运动可能会具有纯塞尔维亚的性质，因此应该千方百计吸收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群众参加斗争。但是，在乌斯塔什“清洗塞尔维亚人的行动”的气氛中发动的游击队武装行动，很快变成了塞尔维亚族居民的起义运动，他们把抵抗看作是争取自身生存的唯一选择。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是不可能发动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居民参加斗争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此外，难以做到这一点还因为当地乌斯塔什对一些起义根据地进行围剿，乌斯塔什宣传起义具有切特尼克运动的性质，他们让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居民武装起来进行自卫，而某些地方起义者对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人发表了民族主义的攻击性言论。

在防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族人民互相残杀和实现他们之间的兄弟友好的斗争中，南共没有得到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治集团的支持。对“克罗地亚独立国”表示不满的穆斯林资产阶级的政治和宗教上层的某些派别，主要想通过德意志帝国来保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纳粹“欧洲新秩序”内部的特殊地位。他们之中只有个别人，特别是知识界的某些人是倾向于人民解放运动的。争取仍然持保留和消极态度的人的工作，是长期而又艰巨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农民党大多数领袖和大部分天主教士在占领之后立即接受了乌斯塔什政权，并投入了反对起义的斗争，企图保持自己在克罗地亚族居民当中的主导影响。

此外，在起义初步告捷的同时，南共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就已经面临着另一场艰巨而复杂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势力挑起的，它们极力想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决定起义的社会政治性质和目的。所谓的塞尔维亚民族运动的领袖在其宣传中硬说塞尔维亚人民拿起武器是要反对“克罗地亚独立国”，而起义的胜利则创造了条件，可以要求占领当局取消乌斯塔什政权并改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起义地区的地位。意大利想利用这一运动来平定“克罗地亚独立国”中属于它的势力范围的起义地区，于是在8月初就支持这一行动，并向起义者保证和平、安全和取消乌

斯塔什政权。在意大利军队侵占黑塞哥维那东部、波斯尼亚克拉伊纳部分地方和波斯尼亚中部的解放区时，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势力也蠢蠢欲动，其中包括起义队伍中和解放区的个别人，他们的目的是要破坏起义和孤立南共。在占有无比优势的意大利军队面前，在“塞尔维亚民族运动”领袖宣传的影响下，起义者和人民当中出现了动摇，甚至放弃了一些起义的阵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势力利用当时的形势并直接依赖意大利守备部队，开始建立切特尼克部队。意大利占领军司令部把这种部队称为“志愿反共民兵”部队，并把它当作占领军兵力的一部分，向它提供武器和其他军需品。这些势力很快就同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建立了联系，并加入了切特尼克武装力量，即“南斯拉夫国内军”。

这样，大塞尔维亚主义势力就成功地破坏了起义群众的团结，但是它们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公开与占领者合作，并参加通敌叛国的统一阵线。南共保存了游击队的核心力量和自己在起义群众中的有力影响，从而在1941年底就已经能够通过揭露切特尼克行动的实质和解释人民解放斗争的目的，保证起义出现新的高潮，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势力只能在某些地方保持切特尼克部队和保留自己的影响。同黑山的发展情况相似，黑塞哥维那在1941年底随着起义的蓬勃发展，也开始出现了切特尼克的据点，这种情况影响了下阶段冲突的结局。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属于德国势力范围的地区，争夺塞尔维亚族起义群众的斗争具有某些特点。塞尔维亚本土的局势对波斯尼亚东部事态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在那里，大塞尔维亚主义势力在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首脑机构的策动和指示下开展活动。根据米哈伊洛维奇的决定，早在1941年9月份就成立了波斯尼亚东部切特尼克指挥部，它进行了有组织的活动，提出了自己对起义的目的和性质的看法。但是，面对着乌斯塔什恐怖活动的威胁，切特尼克首脑机构被迫同意共同作战，并接受了成立游击队和切特尼克作战指挥部的协议。到1941年底，切特尼克首

脑机构利用德军在塞尔维亚围剿的结果，采取了破坏起义的行动，这一举动在游击队和人民当中造成了动乱。与此同时，切特尼克在波斯尼亚中部也开始了反对起义的行动。

塞尔维亚族起义群众的分化过程和人民解放运动长期的军事和政治原则的确立，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居民政治上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人民解放运动同大塞尔维亚主义势力划清界线并同切特尼克分子作坚决的斗争，从而向这部分居民敞开了大门，并提高了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民族问题的社会内容和各族人民在共同的解放斗争中的兄弟情谊。在开始武装斗争时一批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的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工人运动参加者就从城市中心被派到起义者当中，他们在宣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兄弟情谊思想方面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在这方面起突出作用的，还有人民解放运动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些被占领的城市中心的有组织的据点，这些据点的核心是各民族的工人和青年。

在克罗地亚最初想通过全部由共产党人组成的游击队的武装行动在农村建立据点，但这一尝试没有成功。这种情况要求党的活动转向建立人民解放斗争的更广泛的政治基础。而南共中央委员会在作出发动武装斗争的决定后所确定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方针，也指向这一目标，特别是南共中央为此目的而主动建议与克罗地亚农民党进行合作，但该党领导机构应放弃其效忠乌斯塔什政权和占领者的政策。当时克罗地亚的形势使这一行动成功的希望变得较为现实。乌斯塔什政权采取了使“克罗地亚独立国”卷入轴心国战争的措施，并大规模征兵以充实派去镇压起义的“卫国军”部队，同时加强了消灭塞尔维亚族居民的行动，迫害克罗地亚的一切进步事物，并在克罗地亚农民党的支持下，用高压手段来确保乌斯塔什政权有更广泛的政治基础。因此，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创办的《克罗地亚民族解放统一阵线信使报》在1941年8月11日的第一号中指出，在解放斗争中“要建立共产党人同克罗地亚农民党

人、独立民主党人、天主教徒、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族人的团结”，而解放斗争的目的是“赶走占领者，推翻傀儡政权，使人民能够自己选择符合大多数自由人民愿望的政府和制度”。不久后，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告克罗地亚农民党书》，呼吁其领导层和成员在解放斗争中进行合作。同时，克罗地亚共产党领导人同弗拉特科·马切克及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其他领袖进行了接触。但是，该党的头面人物没有接受合作的建议，并继续坚持弗拉特科·马切克的“不和共产党人进行任何来往”的立场。于是克罗地亚共产党对该党的上层领导不抱幻想，而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同该党的个别领导人和地方领导机构的联系上，首先是争取把该党成员团结在人民解放斗争纲领的周围。这样一来就加速了克罗地亚农民党分化瓦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克罗地亚各地的发展情况不尽相同。如在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滨海地区和戈爾斯基科塔尔，这个过程发展较快，南共以前在那里就具有较大的影响，而意大利的吞并政策和消灭民族特性的政策激起了人民极大的不满，因此在1941年，克罗地亚农民党领导机构的效忠占领者和消极等待的政策就已经遭到惨败。这个过程也广泛地席卷了斯拉沃尼亚和莫斯拉维纳，但在其他地方，克罗地亚农民党仍有主要的影响。

在利卡、科尔敦、巴尼亚以及戈爾斯基科塔尔的部分地方，游击队最初的行动汇集成塞尔维亚族居民的全面起义。在这些地方，为争取各族人民团结和奠定人民解放运动基础的斗争发展情况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相似。在利卡，由于意大利占领者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势力的联合行动的破坏，起义在8月中旬就趋于低潮，在利卡的南部更是如此。8月11日，“塞尔维亚民族运动”的领袖就同意大利占领军司令部签订了一个协议，其中指出，塞尔维亚人民拿起武器只是为了反对乌斯塔什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双方将为制止“共产党的行动”而斗争。1941年底，确定塞尔维亚族起义群众的政治方向的斗争获得了有利于人民解放运动的结局。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势力仅仅在部分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和直接

依赖占领军守备部队的切特尼克军事组织。在其他一些起义中心，如科尔敦、巴尼亚和戈尔斯基科塔尔，由于意大利和切特尼克联合行动的影响，曾出现了混乱和动摇，但这些现象很快就被克服。因此还在1941年底，这些地方就在解放斗争中奠定了各族人民团结的牢固基础。由于在这些地方制止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势力的活动和建立了人民解放运动牢固的根据地，克罗地亚族和塞尔维亚族居民之间隔阂加深的过程也终止了，而这一点正是乌斯塔什“清洗塞尔维亚人行动”时期和爆发起义时期的特征。起义摆脱了民族主义的干扰，成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接近的有力因素，也成了在共同斗争中贯彻各族人民兄弟情谊思想的有力因素。

发动反对占领者的武装斗争，是对斯洛文尼亚人民在解放阵线中实现的团结的第一次大考验。尽管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在局部地区受到了挫折，并失去了很多积极分子，特别是干部，尽管在开始阶段确实没有广泛地开展进攻性战斗，但坚持武装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解放阵线发达的地方、区和地区委员会网的建立，都使解放阵线得到了加强。基本阶层的人民群众广泛地团结在人民解放斗争纲领的周围，保证了游击队和武装行动的恢复。共产党人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坚定性，使解放阵线内部一些政治集团成员中的动摇现象能够比较容易地克服。

解放阵线的加强及其开展反对占领者的武装斗争的决心，从一开始就触动了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上层集团的利益。这些政党的不同派别，从主张同占领者合作以便在较好的条件下度过占领时期的派别，到持旁观态度或仅仅在口头上反对占领者的派别，在对待解放阵线的态度上很快就有了一致的立场。它们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它们企图阻止人民解放斗争发展和破坏在这一斗争中实现的斯洛文尼亚人民团结所使用的策略。当天主教行动组织号召进行反共的十字军战争时，自由党的首脑则指责解放阵线和斯洛文尼亚共产党采取冒险主义，并把占领者迫害人民的暴行归罪

于它们。一些所谓中间派别同意与解放阵线领导机构谈判，有些还加入了解放阵线，但要求解放阵线具有联合的结构，从而使它们能在解放阵线内部鼓吹延缓斗争、等待“有利的条件”和贯彻其恢复旧制度的纲领。

1941年秋，在解放阵线努力把武装斗争扩大到斯洛文尼亚各地区和发动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斗争的时候，资产阶级势力也加强了上述活动。当切特尼克首脑机构决定武装镇压游击队时，它也任命了“南斯拉夫国内部队”斯洛文尼亚指挥部，并命令它同人民解放运动作战。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副首相和斯洛文尼亚平民党领袖米哈·克雷克博士也采取了行动，成立了流亡的“斯洛文尼亚人民委员会”，并宣布了团结斯洛文尼亚人民的纲领，企图与解放阵线对抗。当米哈伊洛维奇在斯洛文尼亚的行动迅速遭到失败时，“斯洛文尼亚人民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勾结在一起的斯洛文尼亚资产阶级上层集团开始为下阶段的行动进行更广泛的联合，而“中间派”的一些集团则在自己的宣传中硬说解放阵线是莫斯科的代理人，企图把冲突转到阶级斗争方面。但是，这种破坏斯洛文尼亚人民团结的企图也没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在这方面，解放阵线纲领（“九大要点”）的通过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纲领除强调反对占领者的武装斗争是人民解放斗争的基础这一方针外，还提出要为新南斯拉夫和统一的斯洛文尼亚，为各民主力量的团结和在解放后的斯洛文尼亚建立解放阵线政权而斗争。

尽管在南共马其顿的组织中因沙托罗夫决定把党组织并入保加利亚工人党而引起的混乱延缓了在解放斗争纲领的基础上实现马其顿人民统一的过程，但准备和发动武装行动的工作和其他抵抗占领者的形式仍激励了人民的战斗情绪。保加利亚占领者奉行的消灭民族特性的政策，没有得到马其顿人民中任何一个阶层的支持。保加利亚派去实施马其顿人保加利亚化政策的全套军事、政治、教育和宗教机构，对马其顿人民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和敌对的。连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派别为加强在人民中的影响而作出的努力

也没有取得较大的成效。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局限在一小部分主张建立在德国卵翼下的“自治马其顿”的知识分子的范围内,并对保加利亚的占领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原先主张南斯拉夫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少数成员勉强地发挥着微不足道的影响,而他们想在马其顿建立切特尼克运动的企图也只不过是南斯拉夫王国个别军官和官员的活动。

1941年夏巴纳特的游击队武装行动并没有促使大分化的过程朝着有利于人民解放运动的方向发展。不仅如此,反占领者的武装行动使大量的德裔少数民族成员站到占领者一边进行活动,而其他民族的居民则消极起来。只有塞尔维亚族居民的战斗情绪明显增长,他们在占领制度下的处境十分艰难。但是,随着武装行动的削弱和占领者对人民的迫害,这个过程也停止了。巴奇卡的情况也相类似。共产党人被大批逮捕和枪杀,对部分有反占领者思想的居民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斯雷姆,党为在人民中间建立政治据点和筹建军事组织开展了几个月的活动。在这期间,特别是通过团结塞尔维亚族居民,为人民解放运动奠定了广泛的基础。然而,在克罗地亚族的居民中,除了对“克罗地亚独立国”抱有幻想外,克罗地亚农民党领导机构的消极等待和效忠占领者的政策仍起着主导的影响。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首脑机构想以反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纲领为基础,在塞尔维亚族居民中建立某种形式的据点,但这种企图从一开始就没有得逞。

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政局发展中,阿尔巴尼亚卖国分子的活动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动员阿尔巴尼亚族人参加反对黑山起义的斗争,特别是沿塞尔维亚边界地带同切特尼克分子的斗争,这些斗争具有民族之间冲突的特征。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这些冲突,进一步加深了以阿尔巴尼亚族居民为一方与以塞尔维亚族和黑山族居民为另一方的隔阂。然而,大塞尔维亚主义势力想破坏人民解放运动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尔维亚族和黑山族居民区中的据点并想加强自己的地位的企图也没有得逞。

这样,还在起义的开始阶段,国内阶级力量就在赞成还是反对解放斗争的问题上发生了分化。南共在发动和开展反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武装斗争时,到处都遇到南斯拉夫资产阶级的主要政治势力的反对,它们提出了斗争为时过早的论调,主张等待世界战争冲突的结局,有的地方则为在战争结尾时开展行动作准备。这些阻力从全局上讲加重了广泛动员人民参加解放斗争的工作的困难,而在有些地方则使这项工作无法进行。但是,在资产阶级势力用这种策略未能阻止广泛的人民起义运动的地方,它们就从反共的立场出发,走上了挑起国内阶级战争的道路。于是在1941年底就面临着这样的抉择:是人民解放战争还是内战?

第二章

为巩固和扩大人民解放运动而斗争

（1942年）

1. 南共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革命的第二阶段”是否已到来？关于人民解放委员会的福查条例。同共产国际的误会。为在人民解放斗争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各族人民最广泛的团结而斗争。人民解放运动的国际地位。南共的组织问题。

从乌日策撤退到桑贾克之后，南共中央委员会立即在1941年12月7日的会议上和以后的日子里，分析研究了由于切特尼克分子武装袭击游击队和得到英国政府支持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大肆宣传切特尼克运动而造成的局势。南共中央委员会在1941年12月中旬和1942年1月初的信件中，阐述了自己对局势的估计及南共所面临的任务。

南共中央探索了切特尼克部队反对起义的行动以及南斯拉夫政府和英国政府支持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原因，认识到由于红军在莫斯科城郊的胜利，国际关系中开始出现新的大改组。这一胜利预示着“希特勒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和为期不远了”，“红军将是

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明天它将在欧洲起主导作用”。因此,“无论是在整个世界上,还是在我们这里,反动势力上层态度的转变”,现在已经特别明显地反映在“从伦敦通过各国流亡政府”而采取的行动中,这些行动反对“从人民内部深处涌现出来的并激励着势不可挡的革命热情”的人民解放运动,首先是“反对共产党人及其同群众的联系”。在南斯拉夫国土上,这种行动的最初表现就是切特尼克分子袭击游击队和切特尼克同占领者合作,即沿着米兰·奈迪奇——切特尼克分子——南斯拉夫流亡政府这条线勾结起来,形成“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反动势力的牢不可破的锁链”,以便建立“具有最恐怖形式的大塞尔维亚霸权”。南共中央委员会提醒说,在南斯拉夫其他各省里也出现了类似的进程。在斯洛文尼亚,个别亲西方的资产阶级政客集团(所谓的中间派)企图破坏解放阵线,即把它分为“伦敦派”和“莫斯科派”,并把自己旨在恢复旧国家制度的抵抗运动思想强加于人。当时,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人民解放斗争纲领的基础上同克罗地亚农民党的马切克领导集团进行合作的一切现实可能性已彻底消失,任何继续对这个领导集团讲究策略的做法将有损于克罗地亚人民战斗团结的扩大。塞尔维亚起义群众中力量分化的过程已经日益加深,并由于“塞尔维亚民族运动”领袖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大部分地区同意大利占领者合作而进入异常激烈的阶段。穆斯林资产阶级和宗教界上层对“克罗地亚独立国”持保留态度的用意也暴露出来了。事实表明,他们努力的基本方向是要改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希特勒“新秩序”范围内的地位,其动机是企图阻止穆斯林群众在人民解放运动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1941年底,黑山联邦党领导机构的“第二套班子”也决定公开反对起义和同意大利占领者合作。尽管这些势力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不尽相同,但它们一致反对南共为在人民解放斗争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南斯拉夫各阶层和各民族广大人民的团结而作出的努力。

南共中央委员会认为,国内主要的资产阶级势力和南斯拉夫

流亡政府反对人民解放运动的行动是世界性大改组的预兆，阶级矛盾居于首位的时刻已经临近，革命的“第二阶段”已在眼前，因此它要求对政治行动的方法作出相应的改变。首先它指出有必要加强党在解放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并确认，党是致力于实现各族人民在解放斗争中的团结、实行真正的民主改革和反对恢复旧社会制度的唯一的政治力量。中央委员会要求党“加强民族解放阵线中的工农核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农村穷苦百姓团结在自己周围并依靠小农和中农”；“要从工人、农民，特别是从小农群众中建立牢固的核心”，这个核心“将在已经到来的阶段中防止整个解放阵线内部各种不同的背叛行径”；要“领导在农村已经开始出现的分化过程”；要建立能保证劳动农民占优势和加强党的领导作用的人民政权机关；要着手建立固定的工人连和工人营等。中央委员会指出，根据南共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组建的第一无产者旅，将成为解放斗争的突击力量，“以后将成为使反动势力的阴谋不能得逞的保证”；将在“各省建立更多的无产者旅，它们不仅有能力完成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任務，而且有能力完成斗争的第二阶段的任務”。中央委员会提醒说，“不应该把这一切理解为我们迄今的政策中出现了急剧的转折”，而是相反，应该继续为扩大人民解放斗争中的团结而工作，同时要清楚地看到“反动资产阶级的叛卖作用，它们越来越急不可待地聚集自己的力量来反对我党。”中央委员会同时还要求进一步宣传苏联，强调人民解放运动依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性。

这样，南共中央从直接革命搏斗的阶段即将来临的估计出发，开始从十月革命的实践和经验的角来处理人民解放斗争的问题，并强调这场斗争的阶级内容，要求有区别地看待各种社会阶级和阶层的作用和地位。但是，这样的方针很快被放弃了，因为这么做将导致削弱人民解放斗争的政治基础。在苏德战场局势发展的影响下，以及由于美国参战而使世界冲突进一步扩大的影响下，不仅对莫斯科战役的成果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评价，而且对国际关系的性质和世界大战的发展前景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同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比较及时地交换情报,以及共产国际对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性质的说明,都对此起了促进作用。南共中央委员会在1942年2月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立了直接的无线电联系。当时还彻底消除了对苏联和西方列强在打败法西斯轴心国的战争中结成同盟的可能性的怀疑。这些怀疑产生于国际工人运动中共产党左翼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革命战争,而其突击力量将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占上风的信念是:反法西斯同盟是比较长期的结盟,尽管它是由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组成的,尽管它们的关系中存在裂痕;这个同盟进行的斗争是被奴役国家开展解放运动的良好国际环境,因此也是南斯拉夫人民开展解放斗争的良好国际环境。这样,南共中央委员会在确定所谓革命的第二阶段已经临近的方针时所依据的前提已彻底消失;于是重新确定,人民解放斗争政治纲领原先包括的范围同时也是革命变革的范围。这一点特别清楚地反映在关于人民解放委员会是解放区政权机关的条例中。这些条例是最高司令部根据南共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于1942年2月初在福查颁布的(又称《福查条例》)。如同以往一样,这些条例把人民解放委员会看作临时的政权机关,而政权的产生首先是由于武装解放斗争的需要,政权机关的地位是同人民解放运动的政治纲领范围相适应的。条例保证全体成年男女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为占领者效劳的除外。委员会的基本任务仍然是保证供应游击队所需要的一切和安排好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委员会在动员广大阶层的人民群众去完成这些任务时,扩大和加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并且巩固了前后方的联系。委员会并没有改变当时的所有制关系。委员会在职权范围内经管国家财产以及因财产所有者同占领者合作而被人民法庭判决没收的私人财产。事实上,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南斯拉夫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斗争本身的实践过程中建立新的地方政权机关,能团结各族人民群众,并提高他们对社会民主改革的必然性的认识。

事实上,即使在预计公开的阶级冲突即将来临的时候,南共中央委员会仍强调指出党的总路线没有改变。尽管在复杂的实际斗争条件下曾出现过宗派主义的现象和有利于挑起内战的行为,但南共坚持了人民解放斗争的纲领。

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南共的这种政治纲领持保留的态度,而不顾在南斯拉夫国土上发动和开展起义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具体对比关系。共产国际在1942年3月5日发来的电报中说,在看了南共中央送来的材料后得出一种印象:伦敦的人们有一定的理由怀疑“游击队运动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并且朝着使南斯拉夫苏维埃化的方向发展”。电报中还提出问题:为什么要建立特别的无产者旅呢?电报强调基本任务仍然是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联合一切反希特勒的人士,并表示很难同意说伦敦和南斯拉夫政府与占领者走在一起。因此,电报建议南共中央委员会“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政策,并检查一下所做的一切是否符合“在南斯拉夫建立一个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所有敌人都包括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

铁托在给共产国际的回电中断定,他们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铁托强调指出,南斯拉夫政府的追随者从一开始就反对武装解放斗争,他们的策略是反对南共为发展起义所作的努力,这就把他们自己摆到了同占领者合作的地位;无产者旅是在切特尼克袭击游击队之后成立的,况且这也不能成为袭击的理由;在南斯拉夫成立的不是苏维埃,而是人民解放委员会。

共产国际以后才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切特尼克运动是反对起义的,而且这里指的是一小撮原南斯拉夫王国统治集团的上层分子,他们依靠西方盟国,力图恢复旧制度,并把起义看作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大危险。共产国际还同意有必要揭露同占领者合作的切特尼克分子及其首脑的卖国嘴脸,但是共产国际对南共中央多次要求苏联援助人民解放运动和开展揭露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卖国嘴脸的运动等事却一再重复说,苏联对人民解放运动的援助要

取决于苏联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的关系；公开反对南斯拉夫政府，“就会给以苏联为一方和以英国与美国为另一方的共同战斗和关系造成新的困难”；南共不应该“仅仅从本国的角度出发，而应该从英、苏、美同盟的国际角度出发”来考虑自己的斗争。

共产国际不再责难南共的总路线，而只限于根据苏联政府的政策提出要求，首先建议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不要再提南斯拉夫流亡政府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苏联政府极力回避一切可能恶化与西方国家的同盟关系的事情，同时对公开支持和援助人民解放运动持克制态度，但它也最后拒绝了承认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是南斯拉夫抵抗运动唯一领袖的要求，理由是它不愿干涉南斯拉夫的内政。

南共中央委员会在1942年4月4日和6日的会议上分析了各省和各地区人民解放斗争的发展情况，并在1942年3~4月的《无产者》杂志上更加全面地阐述了党在南斯拉夫资产阶级的主要力量日益公开地反对人民解放运动的条件下的战略和策略。南共中央委员会从反对占领者的斗争仍然是所有爱国力量的主要任务这一方针出发，提醒人们注意，伦敦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所谓追随者同占领者合作反对解放起义，并不是“同苏联一道反对轴心国的英国和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某些变化的结果”；出现这样的合作是南斯拉夫王国上层统治集团的卖国投降政策的合乎逻辑的继续，它们为了维护其狭隘利益，现在企图“把人民解放斗争的锋芒转向内战和阶级战争”。南斯拉夫共产党不接受内战，它更加坚决地继续进行反对占领者及其一切国内帮凶和合作者的斗争，主张实现各族人民最广泛的团结，把所有爱国者聚集到解放统一阵线内，同时主张评价各社会政治集团行为的基本标准不应是它们对将来社会制度的看法，而是它们对占领者的立场和对解放斗争的态度。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上层集团同其他民族地区的资产阶级主要政治力量由于反对解放斗争直到公开同占领者合作，便加入了叛国阵线，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同占领者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了。因此，人民

解放斗争就其内容和性质而言,同时也是争取彻底的社会改革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由此出发,南共中央委员会要求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继续为实现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和建立全面的解放阵线而斗争。除了加紧努力使更多的工人参加游击队以加强游击队的士气和战斗素质外,还应该更加顽强地坚持团结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农民当时占南斯拉夫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他们就不可能保证人民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和胜利,尤其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贫农和中农,他们对从占领者统治下解放出来和对彻底的社会变革有着切身的利益。

这样认识人民解放斗争的内在逻辑和内容,使南共能够在对待所有其他阶层人民的态度上,以及在对待仍然动摇和旁观的各种政治集团和个人的态度上摆脱宗派主义观点的残余。在党的文件和党的宣传活动中比以往更加强调了曾积极参加人民解放运动的原资产阶级政党领袖的政治态度;并肯定了一些神甫、前军官、杰出的文化和社会工作者及其他参加运动者的爱国表现。当时还举行了爱国者集会,会上谴责了占领者的帮凶,并号召人民进行斗争。当时采取的强制措施,包括没收私人财产的措施,仅仅是对占领者的积极合作者和帮凶规定的。至于那些仍然动摇和消极观望的人,不管其政治观点和社会地位如何,应该看作是人民解放运动的潜在的成员,应该争取他们。党确信需要进行长期、顽强和耐心的斗争来提高广大阶层的人民对人民解放运动的内容和目的的认识。党的战略和策略必须与此相适应,即根据解放祖国的斗争,同时也根据人民解放运动的民主革命实践来确定。而这种民主革命实践将为最广大阶层的人民群众开辟民主改革和实现其社会和民族宿愿的前景。

南共中央委员会首先指出,党应当在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方面开展更加广泛的活动。人民解放委员会应该成为“我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要的和最重要的纽带”,成为团结最广大阶层的人民群众和发动他们参加全民起义的因素。党要求在非解放区也要

成立委员会，“在委员会中应有民间所有主张坚持解放斗争的政治派别的战斗代表”。

南共中央委员会特别指出党应该更有组织地在农村开展工作。过去的经验表明，农村已成为激烈争夺的主要战场，争夺的对手是敌对的阶级力量，而人民解放斗争的进一步顺利发展取决于这场争夺的结局。在这方面南共没有选择的余地，尽管农民群众有动摇性，而且这种动摇性曾明显地表现在起义的实践中，特别表现在占领者围剿和切特尼克分子袭击起义时起义者中间出现士气低落和队伍涣散中。在丧失解放区之后仍愿意在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残酷镇压下坚持斗争的，以及愿意离开家乡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主要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运动的其他成员。在德军围剿塞尔维亚时退到桑贾克的游击队的组成情况就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一点。当时这些游击队的大部分战士是共产党人，主要是工人和大中学生。因此，南共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争取起义地区农民战士的工作条件的复杂性，决定成立特殊的所谓志愿者部队。那些不愿意当游击队员的人，以及那些在占领者围剿和切特尼克袭击的影响下曾发生动摇、离开战斗或投靠过切特尼克的战士，可以参加这些部队。党的一些积极分子被派往这些部队，他们的任务是通过耐心的工作，提高战士们对人民解放斗争目的的认识。

同时中央也指出了必须更加广泛地团结青年，特别指出了开展农村青年工作的意义。农村青年在这之前已经越来越广泛地接受了党的斗争路线。中央要求广泛地团结和动员解放区和非解放区的青年，建立单独的青年连队，并把它并入无产者突击部队。中央还要求更加重视发挥妇女在人民解放斗争中的作用，更加有力地推进成立妇女反法西斯组织作为人民解放阵线组成部分的进程。最高司令部也要求让更多的妇女参加游击队。南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在1942年3月发布的指示信有力地促进了组织青年的工作，首先是游击队中的青年工作。指示信对南共青团吸收团员工作中的宗派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强调团组织的基本任务是

把青年人团结到共青团积极分子小组中去，而共青团积极分子小组应该成为在军队青年和地方青年中开展政治、文化和教育工作的中心，这样做的目的是建立群众性的青年反法西斯联盟，作为人民解放运动的支柱。

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机构从人民解放斗争的纲领出发，要求所有的爱国力量都履行自己的基本民族义务，因此正是在当时，就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大臣德·米哈伊洛维奇同占领者的合作，以及就流亡政府对勾结敌人的切特尼克运动的支持，公开地提出了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责任问题。南共中央委员会既考虑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民族利益，同样也考虑了盟国在反对轴心国的斗争中的共同利益。南共中央委员会坚持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问题首先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及其斗争的内部事务，决定由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机构公开谴责这个政府，并着手准备建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作为国内最高权力机关。这样一来，人民解放运动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方针问题便成了注意的中心。鉴于盟国之间的关系中突然出现了所谓的南斯拉夫问题，鉴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加紧进行有利于切特尼克分子的宣传活动，于是力争让全世界了解南斯拉夫事态的真相就作为最迫切和最复杂的任务提了出来。南共中央委员会不顾共产国际的警告，仍通过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这也是同世界的唯一联系），坚持要求揭露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和国内切特尼克运动的真面目，并要求苏联政府在这方面予以支持。

对反法西斯同盟性质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特别是对苏联政府对待所谓南斯拉夫问题的立场及其对南斯拉夫政府的态度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之后，就需要更加现实地看到人民解放运动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的位置，并要更加恰当地制定人民解放运动对待主要盟国的方针。尽管南斯拉夫共产党继续把苏联看作是最强大的国际因素、人民解放斗争的支柱和实现其长远目标的保证，尽管南斯拉夫共产党清楚地知道，英国政府支持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和

切特尼克运动是想阻止在南斯拉夫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和为恢复旧制度创造条件,但是在南共的公开言论中以及在最高司令部和和其他领导机构的表态中都更多地强调反法西斯同盟的作用和意义,并特别强调苏联、英国和美国的战争同盟。这样做就不仅突出了人民解放运动是这个同盟的组成部分的事实,而且揭露了南斯拉夫政府和切特尼克首脑机构关于盟国政府只承认切特尼克运动的宣传。

为了进一步建设人民解放运动的武装力量,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最高司令部在作出关于建立作为运动的突击部队的第一无产者旅的决定之后,公布了《人民解放无产者突击旅章程》,随后又公布了几项命令,这些命令的贯彻执行加速了建立这种新型部队的进程。这样就更加强调有必要把地方起义部队改组成更加强大、更加巩固和有更大战斗力的运动的部队。随着运动的部队的建立,最高司令部提议建立特别的地方军事机关——地方指挥部和地区指挥部。这些指挥部依靠人民解放委员会,履行解放区军事行政机关的职能。

除了战略和策略外,南共和南共青团的某些组织问题也摆到了首位。由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动和开展起义上,党团组织的基本骨干在短期内也顺利地 from 城市和工业中心转移到了内地。尽管如此,但在某些地方还有过多的积极分子,包括一些省、地区和下级的领导机构,仍留在中心城市里。在这些城市中,由于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恐怖镇压,工作条件尤其是保持联络和进行有效领导的条件极其恶劣。除了党组织起义的工作条件十分艰难以外,上述情况也是党在人民解放斗争的头8个月里遭到重大损失的原因之一。当时党损失了3000多名党员,占党举行起义时的党员人数的1/4强。由于牺牲的人中间有很多最杰出的党的干部,如南共中央委员、各级领导机构成员、杰出的起义组织者等,因此损失就更为惨重。造成损失的原因往往是:组织形式和活动方法不适应新的复杂条件,特别是党的一些领导机构、大量的基层组织、技术部

门、印刷厂等仍留在城市中心，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准备不足和过分勇敢的战斗行动。在最初的解放区里使党合法化的做法同样也是有害的，因为随着解放区的丢失，如塞尔维亚所发生的那样，很多党的积极分子就不得不撤离，留下的人很难做到坚持工作而不被占领者的帮凶和密探所发觉。

因此，南共中央要求党尽快地适应新的活动条件；把领导机关的驻地迁到解放区；在被占领的城市里留下精干的领导班子和少量的组织，留下一些为占领当局所不熟悉的年轻干部；在解放区党不搞合法化，因为万一这些地区重新被占领后，党的活动必须继续进行。为了创造条件使党员人数更快地增加，南共中央要求放宽入党的标准，因为此项工作早已存在着很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在游击队和解放区里。尤其应该更加大胆地吸收表现勇敢的青年战士和后方青年积极分子。为了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恢复了党校和训练班的工作，并在党组织中经常举行理论讨论会，除了学习党在解放斗争中的路线外，还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

从塞尔维亚撤到桑贾克后，南共中央委员会面临着一个特别尖锐的组织上的大问题：它同大多数民族地区和省的党组织领导机构的联系中断了。通过萨拉热窝党组织同萨格勒布的唯一联系既慢且不可靠。为了保持领导的连续性，南共中央委员会于1941年12月末作出了成立南共中央组织书记处的决定，并任命爱德华·卡德尔和伊沃·洛拉·里巴尔为成员，他们的任务是去萨格勒布设立组织书记处的工作机构，保证南共中央委员会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马其顿和科索沃的领导机构的联系，并指导它们的工作。当时还规定，如果以铁托为首的南共中央领导机构在斗争中遭到不测，就由这个组织书记处接替它的职能。在1942年1~3月这段时间里，卡德尔和里巴尔从萨格勒布同各地大部分领导机构建立了联系，并向它们传达了南共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和方针。

2. 人民解放战争最艰难的一年

占领者的新战场。以福查为中心的解放区，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新攻势。无产者旅向波斯尼亚克拉伊纳挺进。人民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

1941年底和1942年初，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由于日本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和美国参战，使战火几乎席卷了整个世界。在非洲，德国和意大利军队争得了主动，继续排挤英国部队，威胁着英国在地中海和近东的战略要地。在最重要的战场——苏德战场上，莫斯科保卫战和红军的反攻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个重大的转折：在莫斯科城下，希特勒的“闪电战”理论遭到惨败。

世界大战中的这些事件，特别是德军进攻莫斯科战役的失利，对南斯拉夫战场上事态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希特勒强调在东线需要投入新的德国部队，因此要求其盟国军队和卖国贼军队来接替驻南斯拉夫的德军作战部队。这样，在1942年1月，应希特勒的要求，保加利亚接管了塞尔维亚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并派去了有三个师兵力的第一占领军。德国还努力巩固傀儡政权和加强它们的武装力量。在1941年底以前，改组了“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卫国军”，加强了奈迪奇的武装部队。然而，在同意大利的关系中出现了新的问题。墨索里尼在1941年夏曾考虑过把自己的大部分驻军撤离南斯拉夫的可能性，并打算把意军的大部分派去同苏联作战；但在10月份，意大利开始加强自己的占领军，这样在1941年12月，意大利在南斯拉夫战场上有19个师，而原来为东线准备的6个师中没有一个师撤离南斯拉夫。在对待切特尼克分子的态度上，意大利和德国之间也产生了纠纷。德国以乌斯塔什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和奈迪奇的傀儡政府作为自己的占领制度的支柱，同时鉴

于切特尼克首领同英国的联系,认为不应该允许独立的切特尼克部队及其政治组织的存在。与此相反,意大利则首先重视在反对人民解放运动的斗争中同切特尼克分子合作的直接效果,此外,意大利还把依靠切特尼克分子看作是对付乌斯塔什“克罗地亚独立国”的一种手段,因为“克罗地亚独立国”违反以往的协议完全处在德国的控制之下。

德国没有做到把维持南斯拉夫占领制度的事情移交给同盟者和卖国贼。除了在塞尔维亚的秋季攻势获得成功时曾认为可以把德国部队撤离南斯拉夫以外,到1941年12月德国最高指挥部就被迫制定德国部队在波斯尼亚东部展开攻势的计划,以后在1942年2月底又建议德意双方在南斯拉夫中部开展一系列的联合战役。德国除了在1941年底派兵加紧镇压戈伦斯科的起义外,还越来越公开地出现在傀儡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反起义的战斗中。保加利亚占领者于1942年初把自己的军事活动重点放在镇压塞尔维亚南部的起义上。匈牙利占领者以残酷迫害诺维萨德及其周围地区的塞尔维亚族居民来报复巴奇卡南部的游击队活动。当时约3,500人被杀害,几千人被关押和拘留。

当塞尔维亚西部的起义处于低潮时,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于1941年底把其军事行动的重点转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桑贾克和黑山。1941年12月,在切特尼克的宣传以及切特尼克部队同意大利军队勾结的影响下,同时在整个局势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波斯尼亚东部的起义群众中出现了思想混乱,游击队中出现了瓦解现象,很多游击队员转而投向切特尼克部队。

在这样的条件下,南斯拉夫共产党于1941年底和1942年初,坚持在南斯拉夫一些武装斗争发展缓慢的地方燃起起义的烈火,并坚持保卫和巩固现有的起义根据地,抵御占领者在切特尼克分子和其他投敌分子破坏起义群众团结的行动的配合下展开的攻势。南共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一方面指导全国起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在1941年12月底就采取措施粉碎了切特尼克在波斯尼亚东部

的军事行动,以便能够直接促使塞尔维亚西部和舒马迪亚地区掀起起义的新高潮。这么做是因为认识到整个塞尔维亚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尤其是着眼于粉碎切特尼克运动和清除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影响。第一无产者旅被派往那里。在离萨拉热窝不远的伊万契切村,铁托和其他南共中央委员参加了于1942年1月7~8日召开的南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委的会议。会议决定,为了巩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起义,应着手建立无产者突击部队,并在人民和战士当中开展更加活跃的政治工作,解释人民解放斗争的目的和揭露切特尼克的卖国行径。会上特别研究了更加广泛地发动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居民参加人民解放斗争的可能性。然而,1942年1月15日开始的德军和卖国贼部队的攻势中断了这项工作。面对这场攻势,最高司令部连同第一无产者旅,依靠黑山和黑塞哥维那的游击队力量,向南撤到福查地区。

在1942年1月底来到福查后,南共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继续进行巩固和联结波斯尼亚东部、黑山、黑塞哥维那和桑贾克等地人民解放运动根据地的工作,为的是从这些地方出发把重点转向塞尔维亚。很快在国内这部分地方出现了以福查为中心的统一的解放区。在这个地方,有很多人民解放委员会和人民解放运动的其他组织在开展工作。1942年2月8日在奥斯特罗格召开的黑山和博卡爱国者代表会议上选出了黑山和博卡人民解放委员会;在1942年4月召开的黑塞哥维那地区代表会议上选出了黑塞哥维那人民解放委员会。在解放区成立了地方军事机关——地方指挥部和地区指挥部,它们依靠人民政权机关,处理军队后方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游击队的食物供应、组织军工厂生产、看护伤员、组织春播、整顿商业、社会救济工作等。青年和妇女反法西斯组织的活动也得到了加强和扩大。除出了多期最高司令部《公报》和南共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无产者》杂志(1942年3~4月)以外,在黑山还出版了南共省委机关报《人民战斗报》,以及总司令部的《通报》和黑山人民青年的机关报《青年运动报》。在波斯尼亚东部粉碎了切特尼克

的进攻，曾受切特尼克分子的影响而离开游击队的起义者大部分参加了各种新成立的志愿者部队。1941年底从塞尔维亚撤出的营于1942年3月1日成立了第二无产者旅。

但是，在1942年早春，这一地区的人民解放运动又开始处于低潮。黑山的局势最先恶化。战前具有大塞尔维亚一元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政党首脑和原南斯拉夫军队的大部分军官，根据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的命令行动，于1941年底着手建立切特尼克军队和政治委员会。南共黑山省委员会和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从一开始就努力阻止这种活动和打击最早成立的切特尼克部队，但是没有收到效果。这时，切特尼克的首领却同黑山联邦党的领导机构建立了合作。自从与游击队发生最初冲突后，黑山的切特尼克部队和分裂主义部队公开同意大利军队合作，并依赖意大利的守备部队。在一些游击队里发生了切特尼克分子的暴动，使其中大部分游击队瓦解了。在切特尼克分子的暴乱中和以后的战斗中，牺牲了很多党的干部和游击队指挥员，其中有武克曼·克鲁什契奇、巴约·塞库利奇、布多·托莫维奇、拉多米尔·米特罗维奇、米卢廷·拉基切维奇、布拉戈塔·米丘诺维奇、维多耶·久罗维奇、布兰科·代莱蒂奇和尼科·罗洛维奇。切特尼克分子控制了黑山大部分地区。德军在塞尔维亚攻势所获得的战果，非常庞大的意大利军队（约10万兵力）的参与及其对人民的惨无人道的迫害，游击队进攻普列夫利亚的失利及遭到巨大损失，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致使维持固定的和流动的游击队发生困难），在极其寒冷的冬天进行持久的和疲劳不堪的阵地战等等，都有利于切特尼克分子开展行动。切特尼克首领和分裂主义头子宣传推迟武装斗争和等待有利条件，向人民许诺保证和平和安全，呼吁依靠盟国的支持，同时也巧妙地利用了南共省委在实际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南共中央委员会在1942年4月6日的会议上讨论了黑山的形势，指出：联合起来的投敌分子成功地聚集了一部分人民和战士，并带领他们反对人民解放运动；省党组织的缺点，特别是在贯彻南

共路线中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上述情况的出现;这些缺点和错误表现于:执行开展国内战争的方针;把个别人当作政治上的敌人即叛徒杀掉,尽管他们的叛卖活动得不到证实;忽略了党的工作和作用,致使敌人能够自由地活动。因此南共中央委员会认为,克服黑山人民解放运动的危机应该从整顿南共省委组织状况入手;于是作出了撤销原省委和任命新省委的决定。新省委的成员有:拉多耶·达基奇、亚戈什·乌斯科科维奇、韦利科·米丘诺维奇、布拉若·约万诺维奇、乔科·武约舍维奇和韦利米尔·克奈热维奇。根据这种精神,南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致黑山党员的公开信》。在这以后,南共中央委员会在1942年6月19日的会议上认为,中央的代表米洛万·吉拉斯和伊万·米卢蒂诺维奇也要对黑山出现的局势负政治责任,“因为他们没有能保证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得到贯彻执行”。

与此相似,在黑塞哥维那南共州委组织的工作中也出现了背离党的总路线的现象,这表现于:强调革命“第二阶段”的方针,提出“苏维埃化”的口号和消灭“阶级敌人”。这种做法帮了大塞尔维亚主义势力的忙。这些势力,特别是在一伙原南斯拉夫军官带着切特尼克首领的指令到来以后,加紧了建立切特尼克据点的工作。1942年4月中旬,南共中央委员会在致南共黑塞哥维那州委员会和各游击队司令部的信中,对这种违背南共政治路线的现象提出了警告,不久又派去了党中央指导员,在1942年6月19日党中央会议上决定:由于同样性质的,“但在形式上和规模上要严重得多的错误”,撤换黑塞哥维那人民解放游击队作战司令部,并将其中最负责的成员开除出党。

波斯尼亚东部、黑山、黑塞哥维那和桑贾克等地人民解放运动的危机,由于占领者和卖国贼在南斯拉夫这些地区发动新攻势而进一步加深。根据德意两军最高指挥部1942年3月初达成的协议,德国部队、意大利部队和乌斯塔什的“卫国军”部队参加了这场攻势。德意作出进行第一次联合攻势的决定表明它们对南斯拉夫战

场的重视。在联合作战协议的范围内，德军最高指挥部又重新提出对切特尼克分子的关系问题。尽管意大利在口头上接受了德国的建议：中断同切特尼克分子即轴心国潜在敌人的合作，并解除其部队的武装，但在自己的占领区里继续同切特尼克分子合作。此后不久，德国也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那部分地区改变了对切特尼克分子的态度，并同意卖国傀儡政府的方针：在反对人民解放运动中同切特尼克首领进行合作。德国于1942年3月和4月在其控制地区同切特尼克分子的当地首领在这方面达成了协议。

在1942年4月中旬到6月初占领军和卖国贼部队发动攻势的过程中，切特尼克分子在整个解放区加强了镇压起义的活动，使得志愿部队和很大一部分游击队瓦解。南共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努力想把游击队改组成运动的突击部队，使它们能运用进攻性游击战术在本地区坚持斗争，但这些努力没有取得成果。没有能实现的基本原因是，在基本阶层的人民群众中出现了动摇，他们接受了切特尼克的“安抚”政策和占领者的保证。尽管第一和第二无产者旅，以及拥有约5000名战士的黑山和桑贾克突击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但解放区仍然丧失了，游击队的主力撤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黑山的交界处，最高司令部于6月上半月在那里成立了三个无产者旅：第三桑贾克旅、第四和第五黑山旅及黑塞哥维那游击队。1942年8月2日在东波斯尼亚由几个突击营组成了第六东波斯尼亚旅。在黑山和桑贾克地区留下的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继续为开展斗争而坚持工作。黑塞哥维那的局势最为困难，在意大利和切特尼克发动攻势的过程中，那里党的领导机构遭到了破坏，一些领导成员牺牲了，而没撤走的共产党人和部分战士也失去了联系，四处躲避着切特尼克分子的迫害。

1942年上半年，塞尔维亚的形势发展也对人民解放运动不利。在去年的秋季攻势之后，德国和卖国贼部队继续开展强有力的行动，打击留在塞尔维亚西部的游击队，或打击根据最高司令部的决

定从桑贾克返回塞尔维亚西部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1941年底和1942年初被击溃，其中小部分人撤到了波斯尼亚东部。1942年初保加利亚部队和卖国贼部队的进攻和对人民的野蛮迫害，使塞尔维亚南部起义的发展受到阻挠，解放区重新被占领，而在一些游击队中出现涣散现象。由于失去了联系和得不到指示，一些地方党的领导和指挥部决定把游击队分成小组。

南共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曾力图贯彻1941年12月作出的关于改组南共塞尔维亚省委员会和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的决定，以便把它们驻地转移到解放区，从而能够建立更可靠的联系和进行更有效的领导。但是这一努力并没有收到效果，南共塞尔维亚省委员会的驻地仍然留在贝尔格莱德。在塞尔维亚的大部分地方，特别在其西部和中部地区，由于蒙受巨大损失，一些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也遭到破坏。曾试图从桑贾克派党的干部去恢复这些机构和组织，但没有成功。在某些州里党员人数不超过20~30人。尽管南共中央委员会坚持从被占领的城市中心派尽可能多的党的积极分子去游击队和内地，但人数最多的组织仍然留在贝尔格莱德和尼什。1942年初，贝尔格莱德约有500名南共党员。然而在1942年2月，这两个组织遭到大规模的逮捕。仅在贝尔格莱德就逮捕了约200名南共党员和南共青团员，包括地方委员会委员和许多区委委员。南共中央组织书记处于1942年春天从萨格勒布同在贝尔格莱德的南共塞尔维亚省委书记布拉戈耶·奈什科维奇建立了联系，并向他传达了发展人民解放运动的指示。奈什科维奇成功地同几个州和其他地区的领导机构取得了联系，但是在当时复杂的条件下，党的活跃塞尔维亚武装斗争的工作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绩。

这样，塞尔维亚地区的人民解放运动在1941年冬和1942年春进入低潮时期。由于这一运动遭到沉重的打击，特别是省党组织的行动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因此指望迅速巩固和加强党组织的前景并不美妙。在广大阶层的人民群众中，由于受到占领者的进

攻和残酷镇压的影响,也出现了战斗情绪低落的现象。而切特尼克分子的活动大大促成了这种状况,因为一部分人民根据来自伦敦的信息接受了切特尼克分子采取的“准备在有利条件下”开展行动的策略。切特尼克分子杀害人民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拥护者并对其家属进行迫害,从而加剧了恐惧和动摇的气氛。德国占领当局采取的加强米兰·奈迪奇卖国政府机关的方针和为了“拯救”塞尔维亚人民而建立“和平和秩序”的政策,也产生了某些影响。

伏伊伏丁那的人民解放运动也在复杂的条件下发展。党的省委员会在失去大部分成员后,在1942年上半年不再作为统一的领导机构开展活动。这种情况使伏伊伏丁那地区人民解放运动力量的相互联系处于更加困难的条件下。扎尔科·兹雷尼亚宁在巴纳特和斯韦托扎尔·马尔科维奇在巴奇卡所采取的措施,仅仅在恢复党组织方面和首先在某些塞尔维亚族居民区建立运动根据地方面取得了初步成绩。在巴纳特和巴奇卡发展人民解放运动的一般条件仍然非常不利。塞尔维亚族居民以及斯洛伐克族居民都处于占领者的恐怖之下;匈牙利族群众,特别是在巴奇卡,作为统治民族的一部分,受到占领者的青睐,但他们是消极的;而德意志族人则支持占领者,并响应号召参加纳粹武装冲锋队,1942年春在巴纳特由这些部队组成了冲锋队“欧根亲王师”,这支最活跃和最顽固不化的法西斯武装部队在南斯拉夫战场上一直活动到战争结束。在斯雷姆,党在人民解放斗争纲领的基础上为团结人民,特别是团结处在乌斯塔什政权恐怖统治之下的塞尔维亚族居民,进行了几个月的组织工作,从而在1942年初为发动武装斗争创造了条件。这一斗争开始于1942年2月,以后发展得越来越迅猛。1942年春,弗鲁什卡山成了斯雷姆游击队员的强大的根据地。由于他们的斗争,以及团结在人民解放运动组织周围的人民的广泛参加,在1942年夏成功地开展了“不给占领者一粒粮”的行动。

1942年初,南共科索沃地区组织的恢复和整顿过程有所加快,

这样在州党委会2月会议前夕共有302名党员、37个支部和四个地方委员会，直到这时党员人数才超过了该组织在四月战争前所拥有的人数。当时还新成立了几个南共青团组织。而在阿尔巴尼亚族人也出现了第一批人民解放运动组织。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居民中开始感受到阿尔巴尼亚解放斗争的积极影响。1942年3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和南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州委员会向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发表了联合宣言，号召他们同占领者进行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人民解放运动组织加强了活动，特别是在塞尔维亚族和黑山族居住区加强了活动，但随之而来的是在佩奇、普里兹伦、科索沃米特罗维察等地的大规模逮捕和拘留。

在马其顿，在省委的推迟武装斗争的方针的影响下，由于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在人民中间开展政治工作，于是领导内部的团结问题和党组织是否坚决开展解放斗争的问题又重新被提到了首位。南共中央委员会曾试图同马其顿省委员会恢复早在1941年秋就已中断的联系，但没有成功。这种情况就使得保加利亚工人党的领导便于继续干预马其顿省党组织的工作，它在1942年初甚至建议马其顿省党组织脱离南共。由于存在这种情况，党没有能够对人民的政治运动产生更加有力的影响，尽管人民对保加利亚占领者取消民族特征的政策反抗正在增长。由于缺乏扩大武装斗争的坚定方针，几个在1942年春成立的规模较小的游击队也没有能够对提高人民的战斗热情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党的积极分子中抵制的情绪在增长，一些领导机构和组织也日益要求党根据南共路线的精神采取开展解放斗争的方针。这一抵制的结果是在1942年6月初撤换了省委，并成立了临时领导机构，其成员有茨韦特科·乌祖诺夫斯基、马拉·纳采瓦、米尔切·阿采夫、茨韦坦·迪莫夫和留普乔·阿尔索夫。新的领导机构鼓励在巩固党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方面的活动。

在克罗地亚，1942年上半年人民解放运动处于高潮，尽管各地

的发展情况仍然很不平衡。年初，南共中央组织书记处来到萨格勒布后，采取了重要措施使党在组织上适应斗争的条件。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补充了成员，它的驻地迁到了包括科尔敦和利卡大部地区的解放区，并设立了萨格勒布和斯拉沃尼亚的特别代表处。根据南共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的建议，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更大规模地发动克罗地亚人民进行斗争上。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在解放区继续出版宣传人民解放运动纲领的《克罗地亚民族解放统一阵线信使报》。在克罗地亚一些起义地方，如利卡、巴尼亚、戈爾斯基科塔尔和科尔敦，清除了切特尼克活动的后果，并建立了人民解放运动稳固而强大的根据地。到这个时期的后期，游击队约有1万名战士，并成功地进行了几次武装行动，使这些地区联结成统一的解放区，并设立了人民政权系统。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滨海地区和斯拉沃尼亚的游击队力量得到了加强，这些地方也建立了第一批解放区。1942年春天，由于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努力，克罗地亚西北部、茹姆贝拉克和波库普列地区党团领导机构和组织的恢复和整顿工作也活跃起来，逐渐建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其他反法西斯组织网，来自科尔敦和斯拉沃尼亚的游击队被派往了这些地方。

尽管乌斯塔什分子依靠占领者并借助克罗地亚农民党部分领导人的效忠和支持，凑成了“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基础，但这个卖国的产物表明它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阻止人民解放斗争的扩大，并在克罗地亚人民中建立广泛的政治基础。帕韦利奇企图在1942年初建立“克罗地亚议会”，并使1938年按克罗地亚农民党名单当选的国民议员出来活动，但这个企图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宣布对塞尔维亚族居民采取“安抚”政策也没有引起广泛的反响。尽管建立了新的“卫国军”部队，而且它的人数在1942年4月增加到约9万人，但是这支卖国军队的战斗力却在不断下降。在克罗地亚农民党马切克领导集团的消极和效忠思想与人民解放运动的战斗纲领之间的冲突下，克罗地亚人民的政治分化越来越明显。尽管消极

的政策在人民当中仍具有主导影响,但是对乌斯塔什当局持越来越强烈的保留态度和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抵制,则预示着人民当中首先是农民群众当中战斗情绪高涨的过程正在加快。

根据开始阶段的经验,并按照南共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的指示,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于1942年初着手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工作的来扩大人民解放斗争。解放阵线在诺特兰斯科和多伦斯科,特别在卢布尔雅那具有最强大的影响。它在卢布尔雅那拥有最广大的市民群众。它在那里作出的一些决定和进行的各种战斗行动和群众性政治行动,使它具有了政权的性质,即具有了“国中之国”的性质。因此,卢布尔雅那成了准备在斯洛文尼亚各个地区燃起起义烈火的强大据点。特别是人民自卫队作为抵抗占领者和为游击队提供兵力的形式,具有很大的规模。在戈伦斯科和什塔耶尔斯卡,由于受开始阶段损失的影响,游击队的行动开展得较缓慢,但在科鲁什卡开始了武装斗争,在诺特兰斯科和多伦斯科于1942年5~6月爆发了起义,这些地区的大部分获得了解放。在斯洛文尼亚的这个地区的游击队已有3000多名战士。这些游击队不同于国内其他地方的突出特点是主要由工人组成,但同时也有大量的农民参加。在解放区,解放阵线组织了地方人民解放委员会的选举工作。

在斗争蓬勃发展的条件下,也强烈地感觉到解放阵线上层内部的磨擦,基督教社会主义集团的一部分人强烈希望成立自己的政党,“中间派”力量的动摇态度加强了。而共产党人的宗派主义表现也助长了这种状况。1942年7月初由博里斯·基德里奇主持召开的卢布尔雅那地区党代表会议,除了分析党在起义条件下的作用之外,也研究了上述问题。在从内部破坏解放阵线的企图失败后,主要的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和教权主义法西斯团体,根据斯洛文尼亚平民党领导的倡议,于1942年3月成立了“斯洛文尼亚联盟”,与解放阵线相抗衡。这一联盟谴责武装解放斗争为时过早,并着手组建自己的武装部队,人民称之为“白卫军”。

波斯尼亚东部和黑塞哥维那起义的低潮也波及波斯尼亚中部地区和波斯尼亚克拉伊纳部分地区。由于切特尼克势力的活动,波斯尼亚中部的起义部队在1941年底和1942年初出现了混乱,随后有些部队宣布为切特尼克部队。1942年2月,在久罗·普察尔·斯塔里的领导下,在斯肯代尔瓦库夫召开了南共波斯尼亚克拉伊纳和波斯尼亚中部地区代表会议。会议分析了起义的成绩,特别指出了切特尼克行动的危险性,因此必须更加坚决地动员人民解放运动的一切力量去粉碎切特尼克的行动,同时还要加紧发动广大的穆斯林族和克罗地亚族群众参加解放斗争。波斯尼亚克拉伊纳人民解放游击队作战司令部大力调动克拉伊纳突击部队去粉碎切特尼克分子在波斯尼亚中部的行动,但没有收到效果。由于切特尼克分子在一些部队中进行宣传和策动暴乱,起义力量被打散了。在切特尼克分子的暴乱中和在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切特尼克分子的斗争中,牺牲了很多南共干部和杰出的游击队指挥官,他们是:姆拉登·斯托亚诺维奇、法迪尔·亚希奇、伊万·马尔科维奇、丹科·米特罗夫、米罗·波帕拉、德拉吉察·普拉维察、卡西姆·哈季奇、兹德拉夫科·切拉尔和埃萨德·米季奇。这个时期在波斯尼亚克拉伊纳大部地区,人民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克拉伊纳游击队和1942年5月21日成立的克拉伊纳第一突击旅约有7000名战士。他们多次战胜了占领者和卖国贼部队,解放了德尔瓦尔、波斯尼亚佩特罗瓦茨、普里耶多尔、克留奇、格拉莫奇和其他地方,开辟了广阔的解放区,使人民政权机构和其他人民解放运动组织得以开展工作。1942年6月,占领者和卖国贼的大部队在科扎拉开展了攻势,这场攻势就其战斗规模、激烈程度和塞尔维亚族居民遭难的惨状来说,已作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一首悲壮的史诗而载入史册。

1942年年中,在国内中部地区起义处于低潮的影响下,在南共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面前十分尖锐地提出了选择战略重点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已存在着比较可靠的标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持续时间方面的问题已彻底消失了。盟国在1942年

5月和6月达成的新协议,进一步巩固了反希特勒同盟,并更加有力地强调了它们坚持斗争、直到战胜轴心国的决心。然而,各条战线上的形势并不利。德国在1942年6月大举进攻斯大林格勒(现名伏尔加格勒)和高加索。轴心国军队还在1942年初就在北非掌握了主动权,而日本军队到1942年年中占领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大片土地。同时,一年来人民解放斗争发展的经验表明,占领军不仅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保卫现有的地盘,而且能够通过增援其在南斯拉夫的部队而重新夺取失去的地盘,特别是那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盘。事实同样表明,正是强大的占领军的存在,以及它们的进攻和对人民的迫害,大大促进了国内各种资产阶级派别的联合和活动,帮助它们在反对起义的斗争中取得成果。根据1942年年中在塞尔维亚西部、黑山、桑贾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大部地区出现的局势,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这些地方稳定人民解放运动的战役已暂时失利。

当时曾指望人民解放运动能得到苏联的政治支持和物质援助,并指望这种支持和援助有助于揭露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活动,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实现。“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原定是用来宣传人民解放斗争的,但其广播内容一直没有什么变化。这个电台不顾铁托的坚决要求,并不揭露切特尼克运动的真正作用。共产国际在1942年2月答应提供的援助,在扎布利亚克临时机场等待了一个多月,最终被取消,理由是出于技术缘故援助物资不能运来。

与此相反,切特尼克在国内的影响加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的对切特尼克分子的支持。电台和其他新闻工具,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的电台和其他新闻工具,报道了切特尼克分子同占领者斗争的消息,编造了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是欧洲最强大的抵抗运动领袖的神话。此外,通过南斯拉夫政府,切特尼克分子从英国得到武器、现金和其他所需物资的援助,这也大大加强了切特尼克分子在人民中的影响。政府和切特尼克首领还极力散布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游击队”同占领者和

卖国贼勾结在一起，南共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不和，拒绝他们提出的在米哈伊洛维奇领导下联合一切抵抗力量的建议。

对人民的情绪产生消极影响的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如占领者和卖国贼的进攻和残酷迫害（烧毁房屋、大屠杀、掠夺和逮捕），解放区的丢失和游击队的撤离，占领者允诺保证给放弃战斗者以和平和安全，基本食品和药物的缺乏，以及饥饿的威胁等等。游击队的供应，特别是枪支弹药的补给越来越难以保证，因为游击队员只能靠从敌人手里夺取；同时也很难保证伤员的安置和医疗。这一切都涉及到游击战的战略，以及运用游击战术和组织的原则来开展全民战争。要实现这一点，就不仅需要在战斗中坚定不移地运用游击战术，而且需要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人民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地方，以及有可能通过加强人民解放运动的武装力量和政治基础来影响国内全局发展的地方。所以，南共中央委员会于1942年6月19日在泽伦戈拉山召开的会议上决定，几个无产者旅向波斯尼亚克拉伊纳挺进，以便把南斯拉夫西部地区人民解放运动的各根据地联结起来并进一步求得发展。同时会议还决定恢复和加强南共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与各省和各地区领导机构的联系，因为这种联系在1942年5月警察在萨拉热窝搜查之后就中断了。为此，会议决定派一名或两名南共中央委员尽快去萨格勒布。

无产者旅向波斯尼亚克拉伊纳的进军是当时游击队力量在南斯拉夫战场上所进行的一次最复杂和最成功的战役。从1942年6月底到8月初，几支无产者旅在最高司令部的直接指挥下，对萨拉热窝至莫斯塔尔的铁路进行了大破坏，击溃了驻守在科尼茨、普罗佐尔、戈尔尼瓦库夫、杜夫诺等地的乌斯塔什“卫国军”守备部队，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解放区，同波斯尼亚克拉伊纳的解放区联成一片。由于最高司令部恢复了同波斯尼亚克拉伊纳和达尔马提亚的起义领导机构的直接联系，然后又恢复了同克罗地亚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的直接联系，就为开展越来越大和越来越成功的战斗创造了条件。在这些战斗过程中消灭了很多敌军守备部队，

解放了很多地方。1942年11月初进行了比哈奇战役，共投入了8个突击旅。在这场战斗中粉碎了占领者和卖国贼部队想争取主动的企图，从而使波斯尼亚克拉伊纳、达尔马提亚、利卡、戈爾斯基科塔尔、巴尼亚和茹姆贝拉克等地的解放区连接成为统一的解放区。到1942年底，战斗扩大到波斯尼亚中部地区，在那里消灭了大量的切特尼克部队和乌斯塔什“卫国军”力量。1942年底，统一的解放区以解放后的比哈奇为中心，沿萨格勒布、卡尔洛瓦茨和里耶卡一线向东南延伸到波斯尼亚河和奈雷特瓦河。当时南共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就驻在比哈奇。尽管占领者和卖国贼的兵力很强大，却不能阻止人民解放斗争新的高涨，更不能阻止游击队力量在波斯尼亚西部和克罗地亚的攻势。德国最高指挥部为乌斯塔什国家的命运感到不安，同时鉴于阿拉曼战役之后在非洲战场上出现的变化，以及考虑到英美联军进入巴尔干的危险性，便要求德意联合采取反对人民解放运动的军事行动。

1942年下半年，南斯拉夫的其他某些地区的武装斗争也日益高涨，特别是斯拉沃尼亚和斯雷姆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起来。在那里，强大的游击队力量的武装行动连连告捷，并扩大了解放区。占领者和卖国贼企图以发动攻势和残酷迫害人民来镇压这些地区的起义，但是没有得逞。下列材料说明了乌斯塔什分子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如仅仅在1942年8月的斯雷姆攻势中就杀害了约6000人，关押了约1万人。游击队在萨格勒布地区的行动也得到了加强。1942年11月，波斯尼亚东部的游击队同斯雷姆游击营一道，战胜了马耶维察的切特尼克部队。东波斯尼亚和斯雷姆的游击队力量的联合行动在波斯尼亚东部开辟了一个联合战场。这个战场在整个战争期间，对波斯尼亚东部地区和伏伊伏丁那的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斯洛文尼亚的诺特兰斯科和多伦斯科在1942年7~11月期间是游击队同意大利军队激战的地方。该地意大利军队约有8万兵力，它们同“白卫军”武装部队一起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对老百姓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恐怖活动。在这些斗

争过程中,解放区重新被占领,但改组成4个旅和若干独立部队的游击队在1942年底又掌握了主动权。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游击队直接进行了战斗合作。更大的游击部队的建立和克罗地亚西北部稳固的游击根据地(比洛戈拉、莫斯拉维纳和卡尔尼克)的开辟,都是人民解放运动在克罗地亚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加强的结果。1942年春,在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紧接着又在伊斯特拉开始了游击队的活动。

塞尔维亚、黑山、黑塞哥维那、桑贾克、巴纳特和巴奇卡的人民解放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可以感觉到以往起义低潮的消极后果。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南共组织的恢复和巩固进展缓慢。遭到破坏的南共塞尔维亚省委员会仍然留在贝尔格莱德,它对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指导很不够和不及时。在巴纳特和巴奇卡,南共组织的恢复和相互联系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1942年11月扎尔科·兹雷尼亚宁牺牲和斯韦托扎尔·马尔科维奇被捕之后,南共伏伊伏丁那省委员会就不复存在,从而延缓了伏伊伏丁那这一地区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塞尔维亚东南部、舒马迪亚和巴纳特的几小股游击队,由于互相没有联系,并且对开展攻势没有明确的方针,因此没有能力扭转局势。在黑山、桑贾克和黑塞哥维那,切特尼克分子根据同意大利占领当局达成的协议,设置了自己的政权机构,并对人民实施骇人听闻的恐怖暴行。他们组织了针对穆斯林居民的大规模的罪恶活动,并迫害人民解放运动成员的家属。在切特尼克的搜捕中,很多南共积极分子牺牲了。仅仅在黑山就牺牲了约200名党员和20名省委和州委委员。在戈伦斯科和什塔耶尔斯卡,占绝对优势的德军在1942年春游击队加强活动之后又开展了攻势,同时对人民的恐怖活动也达到了顶峰。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产党人和人民解放运动的其他成员也没有停止过活动。在黑塞哥维那,恢复了党和团的州委员会及一些地方领导机构,并同坚持活动的一些党组织恢复了联系。

1942年8月,在南共中央委员会指导员多布里沃伊·拉多萨

夫列维奇来到斯科普里以后，党的省委领导机构进行了补充，并着手整顿马其顿的党组织和开展解放斗争。党揭露了分裂主义分子和亲保分子关于人民解放运动具有塞尔维亚族性质的宣传，粉碎了他们成立和加强所谓的抵抗小分队的企图，并反对大塞尔维亚主义势力建立切特尼克根据地的阴谋和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子提出的归并“大阿尔巴尼亚”的要求。由于人民加强了反对占领者和国内各种反动势力的抵抗运动，以及由于党开展的活动，出现了扩大解放阵线的条件。这一切表现在建立了广泛的战斗组织网——人民解放委员会、青年和妇女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小组。建立了更多的游击队，它们以自己的战斗行动，特别是通过消灭占领者的政权机构而提高了人民的战斗热情。然而，针对南共加紧开展的活动和游击队的武装行动，保加利亚占领者采取了反措施。由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仍然留在城市里，占领者警察局就易于发现并逮捕大批党的积极分子，其中包括几名省委委员，同时，保加利亚占领部队击溃了几支游击队，并对人民实行恐怖镇压。

1942年7月和8月召开的南共和南共青团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州会议强调要加强人民解放运动的工作。会议还特别指出，必须在阿尔巴尼亚族人民群众中开展广泛的政治工作，为发动武装斗争创造条件。当时成立了两支游击队，并在1942年10月成立了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游击队临时总司令部。

但是在这段时间内，南共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司令同这些省和地区的党和起义领导机构的联系仍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这一事实对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及马其顿的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伊沃·洛拉·里巴尔以南共中央委员会驻萨格勒布的组织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通过书信同贝尔格莱德的南共塞尔维亚省委书记保持了较经常的联系，但是同伏伊伏丁那、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马其顿的领导机构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南共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没有能够对国内这些地方运动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它们的一些指示和建议或者没有

能送达有关的领导机构,或者很晚才得到贯彻执行。1942年8月,以尼古拉·格鲁洛维奇为首的一批富有经验的党的干部被派往伏伊伏丁那。为了保证对马其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人民解放斗争发展的直接影响,南共中央委员会于1942年11月中旬特派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以南共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全权代表的身分去那里。伏克曼诺维奇的任务是向马其顿省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传达南共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在南共的范围内,建立马其顿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这个决定对于确认全体马其顿人民的民族地位是一项重大的促进措施。此外,这个决定的目的也是为了阻止保加利亚工人党的领导干预马其顿党组织的工作。

1942年底,南共中央在收到来自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马其顿和黑塞哥维那的多种报告和情报以后,才对这些地区的形势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并在1943年1月中旬向这些地区党的领导机构发去了指示信和最新一期《无产者》杂志,其中阐述了南共战略和策略的最重要的问题。在致南共塞尔维亚省委员会的信中,南共中央提醒说,必须更加坚决地揭露在塞尔维亚继续广泛开展活动的切特尼克分子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南共中央强调最重要的任务是巩固党和恢复塞尔维亚西部党组织的工作,同时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省委员会和总司令部,更加坚定地继续建立和扩大游击队并广泛开展游击活动。在给伏伊伏丁那的信中,南共中央委员会对中央1942年8月关于恢复南共伏伊伏丁那省委员会的指示执行缓慢进行了批评,并提醒必须开展更加广泛的行动,在人民解放斗争纲领的基础上团结克罗地亚族居民,特别是斯雷姆的克罗地亚族居民。在给南共马其顿省委员会的信中,南共中央委员会特别强调指出,开展人民解放斗争和在这一斗争的纲领基础上最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是能够保证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包括马其顿人民实现自决权的唯一道路。南共中央委员会谴责了在省委中出现的认为马其顿省党组织脱离南共在“政治上有利”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明显地反映在南共马其顿省委的文告和其他文件的名称中删掉

南斯拉夫等字样的作法上。南共中央认为这是“在马其顿人民的敌人或未来的奴役者面前的机会主义的退却”。这种现象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党的一些地方委员会里也有所反映。在给南共黑塞哥维那地区委员会的信中，对在恢复和联系党组织中所取得的成绩作了肯定的评价，并强调这仍然是最重要的任务；特别要求更加坚决地消除以往这个地区所犯下的“左”的错误的的影响。

3. 人民解放军的建立和南斯拉夫反法西斯 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第一批师和军。通敌分子的反革命队伍的危机。人民政权机关的长期性。南斯拉夫反法西斯青年统一联盟和南斯拉夫妇女反法西斯阵线。开辟让全世界了解人民解放斗争真相的途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大会。

1942年下半年游击队力量在波斯尼亚克拉伊纳和克罗地亚展开攻势的时候，最高司令部根据过去通过的关于建立武装部队的决定的精神，加快了建立旅的过程。到1942年底，改组了波斯尼亚克拉伊纳、利卡、科尔敦、巴尼亚、戈爾斯基科塔尔、克罗地亚滨海地区和达尔马提亚等地的游击队，成立了27个旅。这些旅是在游击队力量开展攻势的过程中成立的，而不像以往那样，由于遭到占领者和卖国贼的进攻，在丧失大量兵力和放弃本土的情况下由游击队的核心组成的。这样就实现了铁托关于按照人民解放无产者突击旅章程的精神使全部游击队向更高级组织发展的思想。这无疑反映了南共在提高游击队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战斗素质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绝大多数战士是农民，他们自觉地接受了人民解放斗争的目标，并决心接受新的、更加困难和更加复杂的战斗条件的考验。在波斯尼亚东部、斯洛文尼亚和斯拉沃尼亚也成立了第一批突击旅。

在几个突击旅协同作战的情况下，仗越打越大。在这种条件下关于成立更大的部队建制的思想很快就成熟了。最高司令部在1942年11月作出了建立第一批师和军的决定。铁托在最高司令部《公报》中写道，将通过成立师和军来建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他认为这是“人民起义迄今最大的成绩”，并强调这支军队不是按照条令建立的，而是自下而上地由小型的游击队，由赤手空拳的人们靠夺取敌人的武器而建立起来的。第一批师和军的指挥官由武装斗争的杰出组织者和军事领导人担任，他们是伊万·戈什尼亚克、科斯塔·纳吉、科查·波波维奇、佩科·达普切维奇、斯拉夫科·罗迪奇等人。

在武装力量的建设方面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如建立了最高司令部军事学校以培养各级指挥官，制定了医疗部门的章程，设置了地方军事机构系统、情报机构和军事法庭。最高司令部作出了建立海军作战署的决定，其任务是继续在亚德里亚海开展游击战。这样就实现了南共关于为了开展具有长远的解放目标和革命目标的全民战争而发展军事组织的思想。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在被占领城市中的战斗小组和破坏小组、游击队、设有后方机关网的地方军事机构，到旅、师和军——都在这个军事组织的结构中占有自己的位置。

南共中央委员会认为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具有特殊的意义，并提出了在人民解放军部队中党的建设方面的基本组织原则。除了连设党的基层组织和营设党的领导机构外，由于旅的建立而在旅里设党的领导人的职务。旅党的领导人直接同省或地区党的领导机构建立联系，如该旅归最高司令部直接指挥，则直接同南共中央委员会建立联系。在师里则建立师党委员会。1942年6月19日，南共中央委员会决定，在旅司令部下面成立政治部，作为党和团的指导机构，它的任务是帮助建立组织和帮助对指战员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除了南共的组织和领导机构外，在人民解放军部队里还建立了强有力的共青团组织，由于绝大多数战士

是青年，因此团在战士的道德、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组织部队的政治、文化和教育工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很多报纸和杂志：从连队的袖珍小报、营和旅的报纸，到各总司令部的机关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的机关报。由于系统地进行了思想、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由于共产党员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英勇果敢、遵守纪律、关心同志和人道主义帮助树立了革命解放军战士的形象，因此人民解放军部队成了革命的学校和坚强的战斗集体。

随着军事行动的发展，国内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反映在如下事实中：主要的资产阶级势力再也不用责备起义为时过早和应推迟武装解放斗争以等待“有利条件”的宣传，以及在消除“共产党威胁”的口号下直接参加镇压起义的武装斗争，来大力帮助占领者消灭某些人民解放运动根据地了。这一转折也明显地反映在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1942年7月的作战计划的失败上。当时这个计划设想在占领者1941年秋和1942年春在塞尔维亚、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大部地区发动第一批大规模攻势之后，消灭波斯尼亚西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保留下来的最强大的起义根据地。

事实本身清楚地表明，各主要的资产阶级势力，尽管其中某些派别坚决反对人民解放运动，却没有能制定一个统一的恢复旧制度的斗争纲领。不仅如此，它们队伍中的分歧，首先是有关民族关系的分歧，在杜尚·西莫维奇将军的政府垮台后达到了顶峰。当时“塞尔维亚文化俱乐部”的著名代表斯洛博丹·约万诺维奇出任王国政府首相，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则被任命为新政府的陆海军大臣，切特尼克部队被宣布为“南斯拉夫国内军”。最激烈地主张恢复大塞尔维亚霸权的人在政府中起主导作用，这样就引起了其他民族某些资产阶级政党领袖的反对，其中最强烈的反对来自维护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协议原则和克罗地亚总督辖区地位的克罗地亚农民党的代表。

因此，王室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没有能够成为广泛团结国内各种资产阶级政治集团的中心。以弗拉特科·马切克为首的克罗地亚农民党领导机构仍然坚持忠于“克罗地亚独立国”的立场，并决定日益加强自己在该“独立国”行政机构和“卫国军”中的影响，企图以这样的方式进一步阻挠克罗地亚人民群众参加人民解放运动，并保证在战争结束时自己对解决克罗地亚命运能起决定性影响。对“克罗地亚独立国”持保留态度的穆斯林资产阶级和宗教界上层认为，乌斯塔什政权已表明不能保证和平和安全，因此它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范围内具有自治地位。黑山分裂主义势力和切特尼克势力在同意大利占领者合作以镇压黑山人民起义这一行动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但它们之间在解决黑山地位方面的分歧并没有消除。在斯洛文尼亚，教权主义政党和自由党的头面人物在“斯洛文尼亚联盟”纲领基础上实现了统一。该联盟在意大利军队围剿起义的战役中投入了自己的武装部队“白卫军”，从而走上内战的道路。它企图通过“推迟”斗争的策略和反共宣传来削弱人民在解放阵线中的团结，尽管有些成效，但这一行动并没有获得持久结果。把切特尼克的活动扩大到马其顿和伏伊伏丁那的企图也几乎毫无效果。

叛国投敌的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危机，促使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在贯彻以革命的方式更换政权的方针中采取新的步骤。南共中央委员会根据以往制定的必须彻底清算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和建立人民解放运动最高代表机构的方针的精神，在1942年9月8日的会议上认为，党过去制定人民解放委员会是解放区临时政权机关这一方针时所依据的理由已不复存在。随着国内社会政治力量分化过程的发展，南共在起义的开始阶段制定争取同盟者策略时所依据的那些前提也不复存在。只有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范围内深化革命过程本身，才能对扩大基本阶层人民的团结产生新的促进，从而进一步消除反革命势力的影响。因此，铁托在解释南共中央关于

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新方针时强调指出，“旧的政权形式已彻底结束，而起义所创造的目前这种形式将是产生未来政权的萌芽”。

在对待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态度上出现的这一变化和建立人民政权的更加坚定的方针，都反映在最高司令部1942年9月作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委员会的选举、结构和任务》的新规定（《9月规定》）中。这个文件直到战争结束始终是人民政权机关发展和活动的基础，它较全面地规定了人民解放委员会的选举、内部组织和任务的各项原则，阐述了《福查条例》确定的原则。

这样就促进了人民政权机关的迅速发展。人民政权机关在南共组织和领导机构的经常关怀下，成为团结解放了的人民和发挥他们的创造主动性的中心。在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以比哈奇为中心的拥有5万多平方公里面积的大片解放区里，进行了人民解放委员会的选举工作，建立了统一的人民政权体系。除了约900个地方委员会和区委员会外，在这块解放区里还有33个县委员会，它们的工作由最高司令部下属的临时管理部指导。临时管理部于1942年10月成立，由莫沙·皮雅杰担任部长，它的任务是在“南斯拉夫中央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之前领导人民政权机关的工作。在其他解放区，特别是在斯雷姆、斯拉沃尼亚和波斯尼亚东部也加快了建立人民政权机关的进程。斯洛文尼亚解放区刚开始的人民解放委员会的选举受到了意大利大举进攻的干扰，所以解放阵线委员会继续履行政权机关的职能。

人民政权机关尽管处于非常困难的战争条件下，但成功地解决了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最广泛地动员人民（其中青年和妇女反法西斯组织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保证了军队的供应、伤员的看护、交通的维护及满足进行战争的其他需要。人民政权机关指导了解放区的经济生活，如组织收获和播种，恢复企业和作坊的生产，整顿商业和交换，从事公用事业，关心社会救济工作，建立卫生机构和处理诉讼争议等等。在尊重现有的所有制关系和并不正式触动私有权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委员会对私有经济成分实行

监督,这仅仅是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人民解放委员会还使一些被厂主遗弃的企业开工生产,并组织耕种荒芜的土地。当时还要求把满足战争需要和救济难民的义务更加均等地分配给各阶层居民,这里除了按自愿捐献原则募集各种援助物资外,还采取了一些强制收购剩余产品的措施。唯一的一种永远改变所有制关系的形式,仍然是没收与占领者合作的人的财产。这种财产上缴人民政权机关掌管的人民解放基金。该基金是全民财产和否定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最初形式。

人民解放委员会推动并组织解放区的文化教育生活,如小学复课,成立扫盲班,建立文化馆,出版电讯简报、报纸和杂志。在这些报刊的编辑部里有很多(特别是年轻的)文学家、画家和其他文化工作者和社会人士在工作。当时还出现了第一批有关人民解放斗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突出的有布兰科·乔皮奇、约万·波波维奇、斯肯代尔·库莱诺维奇、拉多万·佐戈维奇、科斯塔·拉青、马特伊·博罗(弗拉迪米尔·帕夫希奇)、米尔科·巴涅维奇、奥顿·茹潘契奇、卡雷尔·代斯托夫尼克-卡尤赫的诗和散文,以及不久以后弗拉迪米尔·纳佐尔和伊万·戈兰·科瓦契奇等人的诗和散文。在解放区有很多业余剧团在活动,在比哈奇还成立了人民解放剧院,有一批著名的舞台艺术家登台表演。随着最广大阶层人民的文化和教育普及运动的发展,也开展了反对法西斯黑暗愚昧、反对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斗争。这也反映在被占领的中心城市里的“文化沉默”运动中,反映在大中学校停课和罢教中,以及其他抵抗和抵制形式中。

南共、南共青团和一些群众性反法西斯组织的报纸,特别是南共机关报《战斗报》、南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无产者》杂志和南共青团机关报《青年战斗报》,在扩大人民解放运动影响和加强人民解放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这些过去早已创办的报刊杂志以外,1942年各地还创办了多种报纸和杂志,如《人民之声报》(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人民解放统一阵线机关报)、《公报》(南共

马其顿省委员会机关报)、《劳动统一报》和《年轻的斯洛文尼亚报》(劳动统一总委员会和斯洛文尼亚青年解放阵线机关报)、《青年战士报》(克罗地亚青年联盟机关报)、《自由的伏伊伏丁那报》(伏伊伏丁那省人民解放委员会机关报)。一部分报纸和其他刊物在解放区印刷,还有一部分在被占领的中心城市地下印刷厂中印刷。由于运输条件困难,一些地方收到的报纸和其他刊物的份数很少,于是通常在当地的印刷厂复印分发。此外,由于需要在最广泛阶层的人民中开展政治、文化和教育工作,各地人民解放运动的机关和其他组织(如南共和南共青团的领导机构、人民解放委员会、妇女和青年反法西斯组织的委员会)都加强了出版活动和书面宣传工作。

在占领区也加快了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的过程。这些委员会首先发挥了战斗的政治机构的作用。除南共积极分子外,一些拥护人民解放运动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党员和其他反法西斯分子也参加了委员会。委员会团结和动员了越来越多的市民群众,提高了他们的战斗热情,使他们愿意拿起武器。委员会还在全国很多被占领的城市和工业中心开展活动。在斯洛文尼亚仍由解放阵线委员会开展这些活动。

同人民解放委员会一样,妇女和青年反法西斯组织也是加强政治团结的重要因素,是人民政权的最强大的支柱,是人民政权发挥基本阶层人民的革命创造性的最强大的依靠力量。除了反法西斯青年组织的众多的积极分子小组、地方组织和全国组织外,还形成了妇女反法西斯阵线的地方、区和县组织网。

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大部分战士是青年人。他们的优点是勇敢、守纪律、并愿意作出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最复杂的战斗任务。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成为能干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青年给部队带来了年轻人的朝气、开朗和热情。为此,党提出应更加广泛地动员青年人参加游击队,建议成立特别的青年连和青年营。这些连和营很快就成长为坚强的突击队。由于党支部和共青团积极分子

小组在青年战士中有组织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游击队成了政治上和道德上坚强的战斗集体。在后方，青年也是人民解放运动的突击力量和最强大的支柱。在南共青团的领导下，在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小组中，解放区的青年大量地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政治、文化和教育工作。青年劳动连、营和旅参加了播种、收割和其他经济活动，维护交通，修建医院和仓库等。在占领区，在各种反占领者的示威活动和校内行动中，如罢课以及一些大中学校停课中，青年也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青年人经常参加一些突击小组，进行破坏、怠工和其他战斗行动，并响应号召投奔游击队。

妇女反法西斯阵线组织也起着类似的作用。人民解放运动的解放目标和革命民主的实践推动了大批南斯拉夫妇女，特别是一些起义根据地的大批没有文化的女农民，参加了斗争。她们在照顾家庭的同时，还承担了游击队后方的绝大部分工作，包括供应战士的需要、照顾伤员和医院的所有工作。由于南共积极参与教育和提高农村妇女政治觉悟的工作，农村妇女也参加了政治生活，并成为争取祖国解放和社会革命变革的一支重要的和积极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妇女不仅作为医护人员，而且作为手持武器的战士参加了游击队。

在人民解放斗争纲领的基础上加强妇女工作的结果是，在被占领的城市和占领区里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抗议活动和其他行动。南共努力克服自身存在的缺点：在有能力的党团积极分子中妇女的人数较少。在人民解放斗争中团结和动员妇女的条件大为改善和需要更加迫切的情况下，上述缺点就显得尤为突出了。

南共中央委员会很重视青年和妇女反法西斯组织的作用和意义，于1942年底建议它们各自组成统一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联盟。南斯拉夫妇女反法西斯阵线组织于12月6~8日在波斯尼亚佩特罗瓦茨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成立。不久后于12月27~29日在比哈奇召开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青年统一联盟第一次成立代表大会，

反法西斯青年统一联盟的领导核心是南斯拉夫共青团。很快这两个组织的领导机构分别创办了自己的报纸：《今日妇女》和《我们年轻人》。

通过各级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各种反法西斯组织的活动，实现了南共从政治上把广大阶层人民团结在人民解放运动周围的设想。从而在政治生活中消除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消除了在民族和宗教基础上产生的各种组织形式和冲突形式，而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些领导人和党员越来越多地参加人民解放运动则说明了这些政党瓦解的进程正在加快。

南共在民族问题上的政治纲领和实践对扩大人民解放运动的政治基础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国内的各种阶级力量因对待占领和解放战争的态度而重新组合的条件下，以及在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的资产阶级上层竭力反对人民解放运动和企图恢复旧社会制度的条件下，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迫切。因此，南共更加坚决地提出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参加解放斗争的问题。铁托在1942年期间给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党的领导机构的信件中强调指出，反对切特尼克分子的斗争不仅是塞尔维亚人民的事情，同样也是不愿恢复旧的压迫制度的南斯拉夫所有其他民族的事情。这是铁托的《从人民解放斗争角度看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一文的思想。该文发表在1942年12月的《无产者》杂志上。铁托分析了南斯拉夫王国的民族压迫的实质和形式，以及占领者利用未解决的民族问题的方式，同时阐述了南共的民族政策和在人民解放斗争范围内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铁托指出了解放斗争和民族问题是紧密相联的，并强调，“如果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我国的人民解放斗争中除了看到战胜法西斯之外，看不到战胜那些支持旧统治者的人；看不到战胜那些曾压迫过和妄图继续压迫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人，那么这一斗争就不会这样顽强和取得这样大的胜利。”

1942年底，在人民解放运动争取得到国际承认方面也取得了

初步成绩。1942年春反希特勒同盟的加强进一步展示了胜利的前景。但是，鉴于以往的经验，人们并没有奢望盟国政府能很快采取行动来反对不择手段地镇压人民解放运动的南斯拉夫政府。南共在争取人民解放运动得到国际承认方面所处的条件仍然是非常差的，实际上在这方面只能通过共产国际做一些事。南共中央除了在国内开展揭露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卖国行径的宣传活动外，还继续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并通过它寻求苏联政府的支持，以便让世界公众了解南斯拉夫的事实真相。

最初关于切特尼克分子卖国的消息是通过“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向全世界宣布的。这个电台广播了1942年6月16日在天蒂什特代表会议上通过的黑山、博卡和桑贾克爱国者决议。然而，这些消息引起了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强烈反应，它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抗议。共产国际重又警告南共中央委员会要注意苏联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的同盟关系，指出攻击南斯拉夫政府将引起同西方盟国政府的不和。因此，苏联政府对人民解放运动的支持局限于通过外交途径向南斯拉夫政府进行交涉。它从1942年8月开始指出切特尼克分子同占领者合作反对人民解放运动，并通过在苏联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和新闻工具加强了反对切特尼克的宣传。尽管英国政府继续公开支持南斯拉夫政府和切特尼克运动，但它对南斯拉夫流亡者上层内部的弱点和冲突，以及切特尼克分子同占领者的合作也越来越感到不满。英国军事机构为了配合英美在非洲进行的战役曾布置切特尼克分子袭击莫拉瓦河谷和瓦尔达尔河谷的交通干线，但毫无成效。在此以后，英国政府对切特尼克分子的保留态度也特别加强了。

尽管这一切都发生在外交关系内幕中，同时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仍被公认为同盟者，但是上述状况还是对削弱它的地位产生了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南斯拉夫事态发展的真相终于为全世界所了解。“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在这里发挥了最显著的作用。由于领导这一电台工作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久罗·萨拉伊和韦利

科·弗拉霍维奇的努力,电台播放了最高司令部的战报以及关于切特尼克分子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卖国行径的报道。这些消息最初被共产党报刊杂志转载,以后又被盟国和中立国的其他报刊杂志转载。南斯拉夫在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侨民也开展了宣传和支持人民解放运动的活动。

把关于南斯拉夫事态的真相告诉世界,是南共中央委员会决心对南斯拉夫流亡政府进行清算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世界其他战场态势的发展也有利于这么做。1942年下半年,轴心国武装力量到处都被迫转入守势。1942年11月,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开始反攻;而西方盟国的武装力量在阿拉曼战役中的胜利和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登陆,都预示着轴心国在非洲的力量即将垮台。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的侵略也遭到遏止。

1942年10月,南共中央委员会着手准备实现早在当年春天就提出的建立南斯拉夫人民最高代表机构的想法。为了明确地表示同流亡政府及其不惜同占领者合作来反对人民解放运动以确保恢复旧制度的企图彻底决裂,南共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个代表机构应该履行人民政权最高立法和执行机关的职能。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是当时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唯一代表机构,由它提出了召开“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倡议。该委员会将成为“南斯拉夫最高立法、执行和司法政权”。南共中央委员会指出,应该保证这次会议的成员有更大的代表性,从而表明运动的广泛性。根据这一方针的精神,最高司令部采取措施,除了南共著名的活动分子以外,还吸收参加人民解放运动的原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社会名流和文化人士参加这个机构的工作。

在积极筹备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南共中央委员会向共产国际通报了关于建立名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机构及其性质的决定。共产国际的答复指出,建立这样的机构很有必要和非常重要,但应该使它具有南斯拉夫各民族和各党派反法西斯的性质,

而不应该使它具有与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相对抗的政府的性质，因为南斯拉夫的政治制度问题将在战胜轴心国和国家解放之后来解决。鉴于共产国际这一立场的背后是苏联政府，以及建立具有政府权力的机构不可能被盟国政府所理解，因此南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把正在筹备召开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建成一般的政治机构，而不是最高的立法和执行的政权机关。但是，南共中央委员会没有接受共产国际关于解决南斯拉夫政治制度问题途径的立场，因为这同人民解放运动迄今的整个发展过程和成果是相违背的。为此，南共中央委员会采取的立场是：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在人民解放斗争范围内进行的革命变革的意义和性质；据此确定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在人民政权体系中的职能；谴责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是卖国政府；强调南斯拉夫人民将坚决抵制其恢复旧社会压迫制度的企图。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代表会议于1942年11月26日深夜至27日凌晨在比哈奇举行。代表会议的成员由各民族和各省的代表团组成。这符合南共民族政策的精神，并表现了南共对在将来的南斯拉夫共同体中实现民族平等道路的观点。由于路途遥远，马其顿代表团未能参加代表会议，而斯洛文尼亚代表团因战事阻隔也未能与会，但解放阵线执行委员会事后同意并接受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定和立场。

铁托在代表会议开幕时的讲话中阐述了南共中央委员会对于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的看法，并指出国际局势不允许在这次会上宣布成立政府。在会上通过的文件（《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和组织的决议》、《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告南斯拉夫人民书》）中列举了在发动和进行武装解放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特别强调了给这一斗争指出明确的社会政治方向的那些因素。文件还指出了国家上层集团对南斯拉夫王国4月失败的责任，指出了国内很多人同占领

者合作的现象,其中包括以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大臣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指挥的切特尼克分子,同时还指出了原资产阶级政党上层同占领者的越来越公开合作的现象。另一方面,文件强调了南共在发动人民解放斗争和在这场斗争中实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团结方面的作用。文件还指出了实现人民解放斗争基本目标的直接任务——消灭轴心国强加的法西斯制度,阻止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企图恢复“反动的旧制度”。为此,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作为“人民解放斗争的各民族和各党派的政治代表机构”,将依靠人民政权机关和人民解放运动的所有其他有组织的力量开展活动,把“南斯拉夫各民族和各社会阶层的反法西斯爱国力量团结起来,为最终摆脱法西斯奴役、消灭一切人民公敌和为我国各民族在自由的兄弟大家庭中更美好和更幸福的未来创造条件而共同奋斗”。文件特别强调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下列任务:“发展和巩固人民解放委员会;……加强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提高居民的教育水平;组织社会救济和保健机构”。为了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代表会议选出了自己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将指导人民政权机关的活动,从而实际上承担了最高执行和管理政权机关的职能。除南共领导人外,选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还有一些积极参加人民解放运动活动的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文化人士和社会名流。伊万·里巴尔博士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他是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和1921年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立宪议会主席。

尽管没有宣布在法律上意味着以革命方式变更政权的决定,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代表会议以上述方式明确地表示了人民解放斗争迄今的发展过程中体现的社会政治变革的革命目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立及其立场和决定,显示了以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政权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兄弟情谊和平等的新关系为基础的新国家组织的轮廓。

第三章

革命的转折性胜利

(1943年)

1. 南斯拉夫战场上的转折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战役和南斯拉夫战场。奈雷特瓦战役和苏捷斯卡战役。意大利的投降和人民解放运动的普遍高涨。被占领城市里的抵抗。人民解放军是南斯拉夫国土上的主要武装力量。

1942年底和1943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的转折,虽然离胜利还遥远,但它向一切被奴役的人民展示了自由的前景。尽管盟国通过签订条约表示决心把反对轴心国的战争进行到胜利,但当时它们之间并没有就盟国的所有武装力量最有效地参战达成一致意见。苏联军队承受了德国战争机器的主要打击,德军把2/3以上的兵力投到苏联战场上。苏联政府认为,美国和英国只有在西欧开辟所谓第二战场,才能挑起战争的相应的担子。美国政府早在1942年春天也主张英美部队在西欧登陆,但英国和美国考虑到德意军队向苏伊士运河进攻,很快决定把兵力集中到非洲和地中海,并把登陆西欧的战争推迟到1943年。后来于1943年1月又决定进攻西西里岛,即进攻意大利,从而把“开辟第二战

场”一事又推迟了一年。这件事遭到了苏联的尖锐批评,但毕竟没有使反法西斯同盟的牢固性及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决心发生问题,尤其是在决定性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经受了战争最严峻的考验,它在世界上的威望和影响都极大地增长了,而苏联的胜利促进了抵抗运动的加强,特别是在被奴役的欧洲国家。

如果说在阿拉曼战役以前西方盟国战略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需要是保卫近东和苏伊士运河,那么在进攻西西里岛的决定中也表现出英国要确保自己在地中海地区和巴尔干的支配地位的欲望。因此英国对巴尔干国家解放运动的兴趣增加了,这不仅是因为它们能够对反对轴心国的战斗作出贡献,而且是为了加强英国自己对这些国家解放斗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内部社会政治力量冲突施加的影响,而这些国家战后制度的性质将取决于这种冲突的结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盟国在非洲的胜利(这一胜利预示英美联军有可能把战事转移到欧洲地中海国家),对南斯拉夫战场和人民解放运动的战略有重大的影响。德国和意大利在估计南斯拉夫的形势和采取相应的措施时,其出发点再也不能仅仅要求在相对稳定的“欧洲新秩序”中使不平静的南斯拉夫地区安宁,而必须考虑到,一旦盟军进攻巴尔干时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可能起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已成为盟军总战略的直接因素,因此对人民解放运动领导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要保证这一运动被承认为南斯拉夫国土上唯一反对占领者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同时不能不考虑到,一旦英美进攻巴尔干,切特尼克分子会根据“在有利时机采取行动”的设想而站到英美方面开展活动。当时切特尼克分子在亚得里亚海南岸一带——黑山、黑塞哥维那和桑贾克具有很强大的据点。因此,十分尖锐地提出了在这一地区以及在整個塞尔维亚、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马其顿地区迅速地壮大和发展解放斗争的要求。占领者及其南斯拉夫帮凶依然能够投入大量军队和警察部队及采取大规模恐怖手

段来遏制起义的蔓延,但南共组织的恢复和壮大以及游击行动的继续扩大,表明在南斯拉夫这一地区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人民解放运动的方向迅速变化。

南共中央和最高司令部1942年11月采取的某些措施以及向塞尔维亚、马其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领导机构发出的指示都促进了这一进程。人民解放军的几个师从波斯尼亚克拉伊纳解放区向波斯尼亚和奈雷特瓦河谷进军,于1942年底开始实现最高司令部关于把军事行动转移到南斯拉夫东部地区的设想。

1942年夏季和秋季,人民解放斗争在波斯尼亚克拉伊纳和克罗地亚取得的重大胜利使德国司令部感到不安,尤其使他们担忧的是“克罗地亚独立国”傀儡政权的处境。希特勒早在1942年10月同安特·帕韦利奇会晤时就确信,只有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才能扭转局势。东线和非洲战局的发展促使希特勒在12月18~19日召开的会议上迅速作出关于德意在南斯拉夫战场上进行冬季战役的决定。这一战役的目的是粉碎人民解放军的主力,消灭“铁托国家”。1942年12月希特勒发出指令,规定部队“有权利并有义务在这场战争中为了取胜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无论对妇女还是儿童都不例外”,“任何一个德国人都不会由于在对付匪徒及其同伙时所采取的行动而被追究任何责任”。德国部队正是按照希特勒这一指令的精神去对付解放区居民的。德国和意大利司令部的作战命令都贯彻了这一指令。它们要求把抓到的所有身带武器的人或在作战地区抓到的不带武器的人统统枪毙,并把年满15岁的男子统统拘留起来。考虑到英美部队可能在巴尔干登陆,德国最高统帅部不久以后就计划在消灭人民解放军主力之后派出相应的部队去解除切特尼克分子的武装(“黑色行动”)。

以占领军和卖国贼部队的第四次攻势而著称的战役始于1943年1月20日。在科尔敦、巴尼亚、利卡和波斯尼亚克拉伊纳等解放区进行的长达两个月的战斗中,敌人曾断定将有计划地围歼人民解放军部队。当人民解放军的克罗地亚军和克拉伊纳军仍控制着大

部分以前解放的地区时，最高司令部根据把战斗转移到东部地区的精神，率领5个师向黑塞哥维那和黑山挺进。这5个师在拉马河谷和萨拉热窝—莫斯塔尔交通线上击溃大量意大利部队后，不得不等待从波斯尼亚克拉伊纳缓缓而来的约有4000名伤病员的中央医院。为此，这几个师受包围，被迫在包围圈里同比自己强几倍的占领军和卖国贼部队进行艰苦的战斗，即著名的“奈雷特瓦战役”，或称“抢救伤员的战役”。人民解放军的这几个师在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为了赢得这场战斗，决定强渡奈雷特瓦河，然后击溃切特尼克部队的主力。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派遣这一主力部队到奈雷特瓦河一带，是想利用占领军的攻势，给“共产党人以毁灭性打击”。到1943年5月中旬，黑塞哥维那、黑山、波斯尼亚东部和桑贾克的大部分地区都已解放。

1943年春，德国和意大利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处境更加困难。5月中旬，英美部队在突尼斯发起的攻势，以轴心国部队的失败和投降而告终。盟军进攻欧洲大陆的道路打开了。占领军和卖国贼部队在冬季进攻人民解放军的一系列战役，未能达到任何一个预定的目标。德国和意大利不仅未能占领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一带的解放区，而且失去了对南部大片地区的控制。因此，希特勒同意放弃原先计划在黑山、黑塞哥维那和桑贾克地区解除切特尼克武装的行动，决定向当时控制这一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各师发起新的攻势。

5月中旬，人民解放军的几个师在很难通过的偏僻山区被12.7万名占领军和卖国贼部队包围，没有粮食和足够的弹药以及其他军用物资。他们在前几个月的战斗中已精疲力竭，却还要掩护约有4000名伤病员的医院。这几个师在铁托指挥下为突围而进行了整整一个月日以继夜的艰苦战斗。这是人民解放战争中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就是著名的“苏捷斯卡战役”。人民解放军部队的兵力损失了1/3以上。在率领本师冲锋陷阵中，传奇式的游击队指挥官萨瓦·科瓦切维奇牺牲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执行

委员会委员韦塞林·马斯莱沙、西马·米洛舍维奇博士、努里亚·波兹德拉茨、诗人伊万·戈兰·科瓦契奇和其他许多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也牺牲了。但占领者的计划未能实现。几个师突围后，于7月中旬向波斯尼亚东部挺进，并在人民解放军伏伊伏丁那部队和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在那里扩大了解放区。

奈雷特瓦和苏捷斯卡战役极其明显地证明了人民解放军在组织上和战术上的优势以及它的高度的战斗力和士气。德国部队的一名指挥官在给本国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中对这些战役的失败作了如下的解释：“铁托指挥的共产党军队组织得极好，训练有素，他们的士气令人吃惊。”在地中海的英美部队正准备在西西里岛登陆时进行的这些战役，使得英国政府决定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直接建立联系，以便在反对轴心国的斗争中进行合作。根据英国中近东指挥部提出的建议，第一个英国军事联络使团于5月27~28日在苏捷斯卡战役激烈进行的时候，抵达最高司令部。

1943年上半年的这几场大战役标志着南斯拉夫战场上的根本转折。占领者和卖国贼集中兵力也无法用攻势、围剿和宣传来扑灭起义的浪潮或消灭起义的某些据点。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是强大的解放军，这支军队在战斗力和士气方面都比他们强得多，而且在粉碎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势之后，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解放区的人民尽管遭受重大牺牲和苦难，仍然毫不动摇地决心把解放斗争和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占领军指挥部期望通过打击人民解放运动主力的几次战役来遏制这一运动向全国发展。同这个愿望相反，在南斯拉夫各地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加强了，在最高司令部关于加强行动以支援进行奈雷特瓦战役和苏捷斯卡战役的各师的指示的推动下，各地的军事行动增加了。

1942年意大利发动了几次大攻势之后，在诺特兰斯科和多伦斯科，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军部队掌握了主动权，并在同意大利部队和“白卫军”部队作战中打了几个大胜仗。在斯洛文尼亚其他一

些地方也打了胜仗，建立了新部队。1943年7月，根据最高司令部的决定又成立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两个斯洛文尼亚师。

在克罗地亚，除了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占领军和卖国贼发动的攻势中和攻势以后在利卡、达尔马提亚、科尔敦和巴尼亚获得重大的胜利外，武装斗争的高潮还席卷了所有其他地区，特别是斯拉沃尼亚、戈爾斯基科塔尔和克罗地亚滨海地区，以及萨格勒布地区和伊斯特拉半岛。除已有的许多旅外，在克罗地亚还成立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3个师和1个军。在整个克罗地亚出现了大片解放区。

在冬季攻势以后波斯尼亚克拉伊纳仍是人民解放运动的强大据点，在波斯尼亚中部和东部也掀起了斗争的高潮。波斯尼亚的大部分地区获得了解放，在那里还成立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3个师和1个军。

虽然条件极其困难，并作出了重大牺牲，但南共领导和组织通过政治工作和游击活动在黑山、桑贾克和黑塞哥维那坚持了斗争和抵抗，从而在奈雷特瓦战役时和粉碎切特尼克主力时就能着手建立游击部队，使这一地区的武装斗争出现新高潮。

在伏伊伏丁那、塞尔维亚、马其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建立了人民解放运动的新据点。在斯雷姆进行的战斗取得了特别大的成效。1943年7月在波斯尼亚东部作战的伏伊伏丁那部队主力组建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伏伊伏丁那第一师。南共中央和最高司令部代表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到来以后所采取的措施，大大地促进了塞尔维亚、马其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人民解放运动的壮大。在塞尔维亚南部建立了广大的解放区。在舒马迪亚、塞尔维亚东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以及马其顿的几乎所有地区有许多支游击队在活动。

1943年7月10日在西西里岛的登陆意味着英美部队的军事行动开始转移到欧洲大陆，而7月25日墨索里尼的垮台预示着意大利即将脱离轴心国联盟。驻扎有大量意大利部队的南斯拉夫意大利

占领区的命运问题作为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提了出来。因此，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于1943年7月中旬着手发动军队和人民，准备使新形势变得对自己有利——在意大利占领区的某些地方加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号召伊斯特拉半岛和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人民动员一切力量投入解放斗争，向各指挥部下达袭击意大利部队的命令。

意大利投降前夕，人民解放运动拥有的兵力，足以保证人民解放运动在解除南斯拉夫境内的意大利占领军武装方面具有对德国占领军和卖国贼部队的优势。1943年年中，人民解放军拥有57个旅和70支游击队，组成18个师和4个军，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的积极支持，成长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它在南斯拉夫战场上牵制了15个意大利师、7个保加利亚师、2个匈牙利师以及占领者的警察、宪兵、边防军和各种卖国贼部队，而德国在意大利投降前夕即1943年秋季在南斯拉夫作战的部队增加到了13个师。

墨索里尼垮台后，德国采取了周密的措施，以便在没有意大利的情况下为保卫亚平宁半岛和巴尔干半岛创造条件。计划派一批德国部队进驻意大利和巴尔干，以便解除意大利军队的武装，并控制意大利过去占领的地区。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德国改组了指挥系统，重新部署了在巴尔干的兵力。在贝尔格莱德成立了“F”集团军群司令部，分布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5个德国军都归它指挥。同时还建立了相应的政治和经济机构。补充了1个师兵力的保加利亚部队应德国的要求，控制了塞尔维亚的一些新的地区，而德国的精锐部队则开拔到靠近沿海的地区，以便能迅速地控制重要港口和意大利占领区的其他设施。

在西西里岛登陆和意大利国内发生变化后所出现的形势是如此复杂，以致德国最高当局不得不考虑盟军在巴尔干登陆的可能性。在作出向西西里岛登陆的决定之后，英国政府和总司令部研究了进攻巴尔干和吸收土耳其参战的方案。然而，美国从切身的利益出发，希望早日打败德国，以便把反法西斯同盟的力量转过来

对付日本这个美国的最危险敌人，所以不赞成开辟巴尔干战线的主张。美国军事专家认为，这不是能给德国以决定性打击的方向。

意大利投降的消息把起义的浪潮推向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伊斯特拉半岛、克罗地亚滨海地区和意大利在南斯拉夫的整个占领区——诺特兰斯科、多伦斯科、达尔马提亚、黑塞哥维那、黑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部分地区、马其顿西部。意大利占领军已被打垮，大部分已被解除武装。缴获的武器可装备约8万名新战士。几乎所有上述地区，以及亚得里亚海沿岸及岛屿和许多城市，包括斯普利特，都已解放。数千名意大利士兵响应人民解放运动领导和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号召，参加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

德国最高指挥部解除意大利占领军武装和抢占意大利在南斯拉夫的占领区的有计划行动，变成了德国部队同日益壮大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部队从内地到亚得里亚海沿岸几乎在所有地方进行的艰巨斗争。希特勒被迫同意这样的建议，即需要在南斯拉夫重新加强德国部队，并制定夺取南斯拉夫战场上的重要地区、交通线和其他重要设施的作战计划。1943年9月底和10月，德国从意大利北部调来部队，向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伊斯特拉半岛、戈尔斯基科塔尔、克罗地亚滨海地区、多伦斯科和诺特兰斯科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发起攻势，并攻占了很大一部分解放区。

同时，德国还采取措施在原意大利占领区推行自己的占领制度。原来的“卢布尔雅那省”划归德国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带作战区”。在卖国贼莱奥·鲁普尼克的支持下，着手建立所谓“斯洛文尼亚卫国军”的卖国部队。在从前归意大利管辖的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伊斯特拉半岛以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其他地区，德国军事当局依靠了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设置的民政机关。同时还采纳了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和被划入“大阿尔巴尼亚”的那部分南斯拉夫领土的地位的解决办法，宣布阿尔巴尼亚人从意大利统治

下“解放”出来,而阿尔巴尼亚的卖国贼则成立了“第二普里兹伦联盟”,宣布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同阿尔巴尼亚“合并”。意大利投降后德国很快就采纳了同原意大利占领区的切特尼克部队的合作。在黑山,切特尼克分子的代表和黑山的民族主义分子依靠他们残存的部队成立了所谓的人民行政署。

南斯拉夫战场所有其他地区战斗的特征,也是人民解放军采取主动和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1943年夏季,人民解放军在整个波斯尼亚加强了攻势,解放了许多城市,而德国人和卖国贼则只占据几个中心大城市。根据最高司令部的决定,在波斯尼亚克拉伊纳成立了第一无产者军。在整个克罗地亚地区人民解放军也是处于攻势。斯拉沃尼亚军进行了特别有成效的战斗,它的部队把行动扩大到莫斯拉维纳、波德拉维纳、克罗地亚扎戈列和卡尔尼克,并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领土。意大利投降时人民解放军斯洛文尼亚部队主力在意大利占领区活动,同时在斯洛文尼亚北部地区,特别是在戈伦斯科,而1943年秋又在什塔耶尔斯卡打了许多胜仗。人民解放军又成立了3个师和2个军。除了斯雷姆有人民解放运动的强大据点外,在巴纳特和巴奇卡也有许多支游击队在活动。

南斯拉夫东部地区的武装斗争也达到高潮。较大的游击队和最初几个突击旅已在那一带活动。不仅由于军事原因,而且由于政治原因,必须加快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地区武装斗争的发展。英国虽然同最高司令部建立了直接的接触,特别是在意大利投降以后,同人民解放军开展了合作,但仍没有断绝同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的联系。1943年8月,美国军事情报机关派遣一名联络军官驻在米哈伊洛维奇的指挥部里。英国政府建议游击队和切特尼克部队“和解”,并在反对占领者的斗争中相互合作。它所依据的估计是:人民解放军在南斯拉夫的西部有重要的影响,而切特尼克在塞尔维亚有影响。最高司令部考虑到英美部队有可能在巴尔干登陆,特别是在获悉南斯拉夫国王和政府已从伦敦迁到开罗并预定很快

将回到南斯拉夫的消息以后，认为英美部队首先会支持切特尼克。因此，南共中央和最高司令部尽力直接帮助塞尔维亚地区掀起武装斗争的高潮，并向那里派遣了一批有经验的军事领导人以加强干部队伍。最高司令部关于聚集人民解放军兵力向塞尔维亚挺进的思想成熟了。11月份的头几天，几个师从桑贾克进入塞尔维亚西部，从而开始了支持塞尔维亚武装斗争更加迅猛地发展的军事行动。

虽然活动的重心在战争初期就从城市和工业中心转移到内地，但南共仍然十分重视在敌占城市里开展人民解放运动。诚然，开展这一活动的条件大大地恶化了。由于党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加入了游击队，由于城市的党组织遭到很大损失，它的活动能力大大地削弱了。在这种条件下，尤其是在党的中央、省、州和许多地区的领导机关转移到解放区以后，在城市里建立了精干的实际工作领导机构，负责保持党的联系和为最高领导机关提供技术服务。在市委员会里留下的主要是敌伪当局不了解的年轻积极分子。党组织的数量和各支部里党员的人数也减少了。南斯拉夫共青团组织也按同样的原则建立。只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和实行高度的保密，才有可能至少在一定的时间里避免遭到敌伪机构的打击，因为当时占领当局拥有十分发达的谍报系统和镇压系统，城市变成了布满碉堡、架设铁丝网、驻有强大卫戍部队的据点，当局采取了周密措施力图在行政中心和工业中心消除人民解放运动的一切影响。

党团组织在城市里开展活动还依靠了城市居民群众反占领者的情绪的高涨。在斗争初期，城市和工业中心里党和革命运动的力量曾是建立游击队和掀起民众斗争浪潮的核心。与这一时期不同，后来对城市居民的意向产生日益重大影响的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解放区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人民政权的建设及其民主革命的实践。在被占领的城市里，运动的社会政治基础扩大了，这就使得人数很少的党组织能够建立反法西斯组织网，使公民

参加支援人民解放运动的各种活动——从募集钱、食品、医药、衣鞋，到宣传活动、情报活动和动员更多人参加人民解放军。在南共和南共青团的领导下，成千上万反法西斯分子和爱国人士参加了人民解放阵线即解放阵线、妇女反法西斯阵线、南斯拉夫反法西斯青年统一联盟和人民解放基金的市、区、街道、工厂的组织和委员会。

尽管存在严酷的白色恐怖，运动的群众基础使得活动能持续下去。在大多数被占领的城市里也成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在地下印刷所里翻印人民解放运动的报纸和其他出版物，同时通过秘密渠道从解放区运来报刊和其他出版物，在被占领的城市散发。一些学校和文化单位停办或者变成抵抗的据点。一批杰出的文化界人士没有屈服于占领军和卖国贼的压力。工厂和矿山由于工人被逮捕、参加游击队和怠工，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生产水平。占领者越来越多地利用被拘留的人员和强制动员来的人员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对家属实行拘留和其他恐怖形式，是工人和其他公民没有大规模地离开被占领的城市和工业中心去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基本原因之一。尽管如此，还是经常组织大批人离开贝尔格莱德、斯普利特、斯科普里、莫斯塔尔、卢布尔雅那、萨拉热窝、萨格勒布、苏沙克、尼什等城市。1942年和1943年建立或重建的游击队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在意大利投降和1943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取得重大胜利时，参加游击队的人特别多。仅意大利投降时斯普利特就有约5000人、卢布尔雅那就有约4000人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即使占领军和卖国贼在某些城市破坏了党的组织和领导机构，也不意味着人民解放运动的消失。要想消灭城市居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和青年的抵抗和斗争的精神，已是不可能的事了，因而要想清除党团组织得以重建的条件，也办不到了。

在被占领军和卖国贼控制的地区，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情况大致与被占领的城市里的情况相同。在敌占区开展政治斗争和战斗活动，是处于地下状态的南共领导机构和组织的首要任务。各

地都实现的一条原则是，不管条件多么艰难，也不允许党的活动长期停顿。诚然，占领者和卖国贼依靠分布很广的奸细和告密者网，能够在部分地区破坏党组织和人民解放运动的其他组织，并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使它们的活动停顿下来。但由于广大阶层人民群众的斗志继续高涨，党采取了有组织的行动，活动还是恢复了。

奈雷特瓦和苏捷斯卡战役以及意大利投降时的几场战役的结果，是南斯拉夫战场上的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解放运动的方向发展的转折点。1943年底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已拥有9个军、27个师、许多独立旅、100多支游击队，共约30万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部队控制了南斯拉夫一半以上的领土。在前一个时期，人民解放军的大部队集中在一个地区，即以比哈奇为中心的解放区。1943年底情况不同了，人民解放军的军和师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和部分塞尔维亚地区活动。在塞尔维亚中部和东南部以及在马其顿成立了第一批旅。德国人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策划和进行企图包围和消灭人民解放军主力的战役了。1943年秋天，南斯拉夫战场上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意大利投降的结局就已经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人民解放军的优势已清楚地显示出来。尽管德军在兵力上、特别是在装备上仍占明显的上风，但德军指挥部在作战时不得不大大地缩小目标，现在只占据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地区和交通线，其他地区由人民解放军控制。

人民解放军在各方面都已成长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人民解放军是按统一建制组建的，有司令部、指挥部和必要的后勤机关。1943年5月，最高司令部通过了关于实行军衔的决定。这些军官大部分原先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南共党员，他们由于自己的英勇胆略和作战经验而成为指挥官。1943年8月中旬，最高司令部发布了关于嘉奖的第一号命令，9月初又发布了关于司令部给养和供应的命令，关于军人的军纪和军风的命令，关于佩带军徽和军衔标志的命令，关于表彰、奖励和晋升的命令，

关于军官登记造册的命令。1943年9月，在亚伊策重新开办最高司令部直属军官学校。由于建立了各军种的部队和各种服务机构，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大大地加强了。由于海上作战行动增加，由于建立了许多海上部队，1943年10月又成立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在海、陆军部队配合下，亚得里亚海上的军事行动开展起来了，有些岛屿处于人民解放军的控制之下，其中一些岛，如维斯岛，变成了强大的根据地，从而有助于同英美部队保持联系和配合作战。

人民解放军比占领军和卖国贼部队具有的主要优势是：它是作为人民要求解放和革命的结果而产生的，是人民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和构成人民解放运动的其他军事组织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人民”的思想的具体表现。因此，这种优势的基本源泉在于它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人民解放军由于具有高昂的士气和良好的战斗素质，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也能进行顺利的战斗并取得胜利。

南斯拉夫共产党特别重视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其力量的壮大。鉴于部队的基本群众是青年，党在保证自己的领导作用中尽量依靠南斯拉夫共青团组织。部队的各种作战活动和其他活动及其内部生活，都是党和团日常关心的工作。它们的组织机构和工作内容都适应这一要求。在每一个连队里，即在每一个基本作战单位里，都有南共的组织——支部和共青团积极分子小组在开展活动。这些组织的工作包括各个方面：军事问题、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工作、群众工作和地方工作。每次战斗之前都要开支部会和积极分子小组会，会上确定共产党员的任务，研究在行动中如何执行任务。党支部会和共青团积极分子小组会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也带到连队的会议上，在那里表扬做得好的和成功的事，指出错误的事，目的是帮助官兵和整个部队。在经常召开的连队工作会议上讨论部队的总形势，指出必须克服的缺点，以加强战

斗的集体。战斗间隙的连队生活，除必要的休息外，排满了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教育活动。党的领导和政治委员关心的是，除了最低限度的一般政治教育要把重点放在领会南共的政治路线、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知识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之外，还要使政治工作的内容能帮助战士更充分地了解当前形势和国内外事态。在组织文化教育工作中，政治委员依靠连和营的文化教育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有文化的战士和擅长这方面工作的军官组成）；还依靠旅和师司令部下设的文化教育小组。部队中这种工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办扫盲班，出版连和营的墙报或小报，组织合唱团和业余爱好小组，在部队和居民区演出节目，组织给旅报和其他报纸写通讯报道的工作，建立简易图书室。努力保证每个连队，特别是营和旅，都备有收音机、打字机、油印机、纸张及为开展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所需的其他用品。

地方工作是军队中党团领导机构和组织的活动的十分重要的部分。早在组织武装斗争的初期，南共就要求游击队除开展武装活动外，还应在人民当中开展日常的政治活动；认为开展武装活动和在人民中进行政治工作是游击队活动的真正意图和内容。对人民解放运动武装力量的地位和作用的这种理解，在整个战争时期始终有效。随着人民解放军的某些部队开进未解放的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机关和人民解放运动的其他组织，开展了紧张的政治工作。顺利完成这些任务的首要条件是部队对人民及其财产采取慎重而又正确的态度。人民解放军只有持这种态度才能被人民当作真正的解放军来欢迎。因此，这是部队中党团组织 and 领导经常关心的问题。人民解放军通过对人民的这种态度和在地方上开展的日常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为南共发展和加强人民解放运动及完成革命任务的整个斗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尽管环境极端困难，但部队的给养问题还是顺利地解决了。直到1943年夏天，军需品都是靠人民群众提供的物资和战斗中缴获的物品来满足的。实际上，人民解放军拥有的全部装备和军需

品,除了少量是1941年四月战争中南斯拉夫军队溃败时隐藏下来的轻武器和弹药以及更少量是游击队工厂的产品外,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从占领军和卖国贼部队手中夺取武器和弹药被当作部队供应的正常形式。铁托于1942年10月17日在第二无产者旅的队列前说,“至于武器,我们至今还是从敌人那里得到的。但不是自愿给的,而是我们夺过来的……我们的战士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我们的弹药少。弹药少,就必须从敌人手中夺……只要敌人在,我们就会有我们所需的武器和其他一切。这是我们的武器的来源。”

护理和治疗伤病员的工作就更难了。除有少量的医生和一般医务人员外,很难弄到药品和医疗设备。因此,经常用最简陋的方式进行最复杂的外科手术。然而,尽管有这一切困难,人民解放军仍然成功地建立起医疗机构。举办了许多训练班,培养了医生和其他专门医务人员。由于南共和人民解放运动组织的努力,从被占领的城市运来药品和医疗器材,供应人民解放军的部队。1942年9月,在已解放的波斯尼亚佩特罗瓦茨召开了游击队医务工作者代表大会。越来越多的医生从城市来到解放区。这样就有可能成立外科医生小组,建立有专门人材、必需的药品和器材的医院。医院建于所有解放区以及非解放区的隐蔽场所。在这些医院里治愈了成千上万的伤员。曾为消灭由于生活条件不卫生而发生的、往往蔓延到整个部队和一些地区的传染病而作出巨大的努力。最大的困难是在占领军和卖国贼部队发动攻势的时候,人民解放军的某些部队要直接参加保护医院的战斗,有时由于丢掉解放区,不得不转移成百上千的伤病员,为掩护他们而进行艰苦的战斗。

同从前一样,特别是在奈雷特瓦和苏捷斯卡战役中,南共中央通过共产国际多次要求苏联和西方盟国首先在武器和医疗用品方面向人民解放军提供援助。在给共产国际的有些电报中指出,人民解放军的许多师处境极端困难,医治伤员的问题几乎无法解决。但没有给我们运来援助物资。只是到1943年5月底第一个英国

军事联络使团抵达最高司令部后，才为获得盟国的援助和在全局上开展同盟国的配合作战创造了较现实的条件。但是，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人民解放军从盟国获得的援助几乎是象征性的。到1943年9月1日止，总共只有约40架盟国飞机空投包裹，主要是破坏交通线的炸药、药品、其他医疗物品、少量武器及其他军事装备。意大利投降后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当时英美指挥部根据驻最高司令部的联络使团的报告，认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对盟军在意大利的胜利挺进有极重要的意义。因此，英美部队地中海指挥部决定派遣由菲茨罗伊·麦克莱恩准将率领的正式使团，该使团于1943年9月中旬抵达最高司令部。不久以后，1943年10月初，在意大利的巴里建立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基地，其任务是：组织接收英美援助的武器、其他军用物资和装备；接待曾被关进法西斯意大利集中营的南斯拉夫人、曾在意大利军队中服役的伊斯特拉半岛的克罗地亚人和滨海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把他们组成海外旅，并送回南斯拉夫；关心开始送入盟军医院的人民解放军伤员的安置和治疗；关心为免遭德国军队残害而从沿海地区和岛屿逃离的南斯拉夫人难民营。早在1943年10月就成立了两个海外旅，并很快地转移到南斯拉夫。在亚得里亚海曾与盟军的小部队配合作战。为了更有效地协同作战和向人民解放军供应军用物资，商定由最高司令部派一个军事使团驻英国中近东指挥部。被任命为这个使团团长的伊沃·洛拉·里巴尔于11月27日在德机轰炸格拉莫奇科波列机场时牺牲，后来由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率领的使团于12月初抵达盟军指挥部。

11月28日到12月1日，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就今后如何作战达成了协议并讨论了战后欧洲秩序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盟国首脑一致同意，“应当尽可能多地向南斯拉夫游击队提供军用物资援助，并以派遣突击队深入敌后的办法支援游击队”，还按此精神向英美地中海部队指挥部发布了命令。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接到通知：红军最高统帅部将派遣军事使团驻在南

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

尽管占领军不顾最高司令部的要求仍然不承认人民解放运动武装力量作为交战一方的地位,但实际上这方面的关系已发生变化。最高司令部驻在乌日策时就根据国际公约发布特别命令,规定了游击队和司令部对被俘的占领军和卖国贼部队士兵的态度,要求占领军指挥部停止枪杀被俘的游击队战士和人质。占领军指挥部被迫作出的最初让步是在交换俘虏方面。早在1941年就进行了谈判,最后交换了俘虏。在最高司令部的代表和萨格勒布德国将军参谋部的代表之间进行谈判之后,在1942年夏天和秋天经常交换俘虏。有鉴于此,占领当局才越来越经常地把被俘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和在占领区被捕的人民解放运动积极分子当作俘虏。最高司令部利用这种惯例,在奈雷特瓦战役结束阶段建议交换俘虏。这次最高司令部提出倡议,还出于这样一个愿望,即在一定的时间里使德军中立,让人民解放军的几个师能成功地采取行动,击溃黑塞哥维那、黑山和桑贾克的切特尼克分子,因为估计英美部队一旦在巴尔干登陆,就会接纳切特尼克分子,从而使人民解放斗争的成果发生问题。同时考虑到这种做法还有助于从奈雷特瓦河谷突围出来的有4000名伤病员的中央医院撤退。从德国指挥部方面来说,它想利用这段时间来准备“黑色战役”和苏捷斯卡战役。交换俘虏的做法后来仍继续进行。

2. 人民解放运动发展为南斯拉夫 决定性的社会政治力量

南斯拉夫各地区和各省的人民解放运动。南共的组织 and 干部的发展及工作方法。人民解放运动得到国际承认。共产国际的解散。为革命的主要成果合法化而斗争。

南共和人民解放运动中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在1943年开展活动

的基本方向仍然是：团结并发动最广大阶层的人民为争取解放、建立人民政权和实现保证南斯拉夫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原则而斗争。在这些问题上党力争把人民解放运动变成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力量。这也是出于国内形势特别是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1942年底和1943年初世界各大战场上局势的发展表明，人民解放军正面临着将使南斯拉夫战场发生转折的决定性战役，而革命的社会变革的实现将取决于把人民解放运动变成南斯拉夫的决定性的社会力量。共产国际关于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不应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决裂的主张，特别是英国和美国政府的主张，使人们毫不含糊地得出结论：反希特勒同盟的国家不想放弃参与解决战后南斯拉夫制度的问题，而反革命势力由于在国内遭到失败，日益指望在反法西斯同盟国家首先是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下，根据王室和流亡政府的合法权利来保证重建南斯拉夫王国。由此就更加直接地提出了一项任务：要保证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即保证他们的真正独立。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依靠人民解放运动的力量和潜力，因为它在1943年已具有了全民的性质。广大阶层的人民，不分民族、宗教信仰、过去的政治信念和社会地位，都成了这一运动的主体。在人民的意识中几乎到处都是这样一种信念占上风：人民解放斗争是人民求得真正解放和实现其社会与民族宿愿的唯一途径。虽然这一进程在南斯拉夫各地区的发展程度和形式各不相同，但取得的成果总的说来都意味着有利于人民解放运动的根本性变化。

在斯洛文尼亚，很快地消除了纠集在“斯洛文尼亚联盟”周围的本国通敌分子于1942年夏天和秋天采取行动所造成的后果。资产阶级的一些党派由于同意大利占领者公开合作而身败名裂，现在力图恢复“中间派”的地位。由于1942年底正式组建了由总委员会领导的“斯洛文尼亚工人团结会”，解放阵线得到了加强，从而加速了克服斯洛文尼亚工人阶级过去遗留下来的思想上分裂状态的进程。社会政治力量分化的过程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现在在人

民解放运动的目标和性质方面再也不能模棱两可了。基督教社会党要求在解放阵线的基层也保留并扩大联合因素的愿望又出现了,但这只会使斯洛文尼亚人民团结的扩大和巩固成为问题。因此,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43年初倡议在解放阵线领导机构中取消联合形式,而其他集团也不要建立自己的组织。由于解放阵线执行委员会接受了这一建议,创建该阵线的几个集团于1943年3月1日发表声明,承认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认为解放阵线已成长为“斯洛文尼亚人民统一的全民的政治和民族组织”,而领导作用属于共产党,即“斯洛文尼亚最先进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声明在1943年4月底得到解放阵线积极分子大会的确认。为了扩大人民的团结,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青年统一联盟和南斯拉夫妇女反法西斯阵线成立大会召开以后,1943年10月举行了斯洛文尼亚妇女和青年反法西斯组织代表大会。1943年,斯洛文尼亚共产党机关报《人权报》重新出版。在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出版了《游击队日报》。

当所谓的斯洛文尼亚联盟想瓦解解放阵线和游击队的企图显然毫无结果的时候,1943年春,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指挥部有直接联系的势力接着采取了行动。根据他们的指示,曾参加过“白卫军”的旧南斯拉夫军队的军官组成了“南斯拉夫王国国内军”部队,企图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来同人民解放军相对抗,并掩盖自己同占领者的合作。然而,直到意大利投降,当这种行动失败时,一共只建立了几个人数很少的小分队,即在人民群众中臭名昭著的“蓝卫军”。这些小分队的残部在意大利投降后加入了刚成立的、受德军指挥的斯洛文尼亚“卫国军”。

在解放斗争普遍高涨的形势下,解放阵线执行委员会于9月11日宣布举行斯洛文尼亚人民议会选举。当时成立了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而解放阵线最高会议以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名义于9月16日发布了这一地区并入斯洛文尼亚的

公告。10月1~3日在科切维耶召开了斯洛文尼亚人民议会。鉴于人民解放运动已成为斯洛文尼亚的主导力量,议会选举产生了成员较多的解放阵线会议,作为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运动的最高政治机构,同时它作为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委员会也履行人民政权最高机构的职能,而解放阵线执行委员会同时发挥人民政权最高执行机构的作用,即履行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的职能。议会主张新南斯拉夫实行联邦制,宣布要动员一切人力和物力进行解放战争。议会选举产生了斯洛文尼亚参加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代表团。

占领军和卖国贼部队向克罗地亚人民解放运动最大的根据地发动的大规模冬季攻势,未能阻止人民解放运动的继续高涨。1943年3月1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克罗地亚代表成立了克罗地亚最高政治机构——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筹备委员会。这个机构的建立标志着人民解放斗争发展中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个委员会还从事组织解放区的生活和领导人民政权机构的有关工作。

当时“克罗地亚独立国”没有能成为德国的支柱,却成为德国越来越重的负担。1943年10月底,德军东南战线司令冯·魏克斯元帅分析了这个傀儡国的形势后指出,乌斯塔什分子没有能力控制克罗地亚的局势,丧失了对克罗地亚人民的任何影响;他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排除帕韦利奇,成立由“克罗地亚农民党人和专职人员”组成的政府,进一步扩大德国武装部队的权限,因为再也不能寄太大的希望于“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卫国军”,尽管它的人数增加了(1943年底约有15万人),但它日益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活武器库”。占领军由于建立了外籍师而取得了较大的战果,这些师的军官都是德国人。这些师没有按计划调往东线,而是投入了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战斗。

当时以马切克为首的克罗地亚农民党的领导核心,由于采取消极等待和效忠占领者及“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政策,也处于绝境:

一方面它无法阻止克罗地亚群众日益积极地站到人民解放运动一边的过程,另一方面德军拯救“克罗地亚独立国”的一整套措施也不能依靠克罗地亚农民党来打开局面,即在轴心国于各条战线都遭到失败的条件下阻止上述过程。这种情况就加快了克罗地亚农民党瓦解的过程。在该党党员和地方领导人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人民解放运动。克罗地亚共产党看到克罗地亚基本阶层人民群众的战斗情绪日益高涨,便更广泛和更灵活地开展斗争,以消除消极等待和效忠占领者及乌斯塔什当局的政策所造成的影响。随着人民解放运动的壮大,这种政策日益明显地表现为积极支持乌斯塔什政权和“卫国军”的政策,因为克罗地亚农民党的马切克领导集团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寄希望于乌斯塔什政权和“卫国军”。

1943年6月13~14日,举行了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关于成立克罗地亚人民解放运动的这个一般性政治机构的决议。决议规定了下列任务:进一步动员人民参加解放斗争,消灭卖国的“克罗地亚独立国”,清算克罗地亚农民党投靠敌人的首领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决议特别强调了克罗地亚境内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友好和团结的政策,强调了为在南斯拉夫各民族兄弟大家庭中建立自由的克罗地亚而坚持斗争的决心。决议提出了在加强人民政权方面的任务,规定人民政权的工作由大会选出的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来指导。在扩大人民解放运动的政治基础方面迈出的重大步骤,是1943年6月召开的克罗地亚妇女反法西斯阵线和克罗地亚反法西斯青年统一联盟成立大会。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接受了伊斯特拉人民解放委员会9月13日关于伊斯特拉同克罗地亚合并的决定,并于9月20日通过了关于伊斯特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归意大利统治的所有克罗地亚地区都归还克罗地亚并废除南斯拉夫王国和“克罗地亚独立国”同意大利签订的所有边界条约的决议。10月12~15日在普拉什科召开的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

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更明确地规定了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及其执行委员会在领导人民政权机关和建立新的国家组织方面的任务。同时,由于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扩大和克罗地亚农民党的某些领导人参加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当时他们在解放区成立了农民党的执行委员会),人民解放运动政治基础扩大的过程显得更加清楚了。克罗地亚农民党执行委员会的建立和它的成员当选为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代表,并未使该党在组织上得到复兴,而是反映了该党瓦解及其成员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的进程。促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事实是,该党参加运动的多数地方领导人的观点同共产党人的观点接近,或者完全接受南共的领导及其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改造纲领。1943年秋,统一的人民政权机关系统在克罗地亚地区开展活动。这些机关在社会经济生活各领域中的工作受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指导,后者当时实际上已行使了政府的职权。

人民解放运动的普遍性和广泛性还表现在它出版的许多新的报纸和刊物上。1943年在解放区出版了克罗地亚共产党机关报《前进报》、人民解放统一阵线的许多地方机关报(《伊斯特拉之声》、《斯拉沃尼亚之声》、《自由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妇女反法西斯阵线的机关报《战斗中的妇女》、解放区的克罗地亚农民党报纸《自由之家》。

1943年人民解放军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进行的重大战役和取得的重大胜利,粉碎了“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政权机构,解放了绝大部分地区,使人民解放运动的力量和影响普遍增长。1943年期间,南共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中部和东部的组织和领导机构得到了恢复,并有了重大的发展。由于改组了南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委员会和任命久罗·普察尔-斯塔里为省委政治书记,省党组织的行动能力增强了。战前时期、特别是在占领情况下使塞尔维亚族、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居民之间隔阂加深的消极过

程终于被制止了。在这方面，南共在同切特尼克分子争夺塞尔维亚起义群众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切特尼克的主力部队以及它们于1942年春同意大利指挥部和乌斯塔什行政当局达成协议后建立的政权机关都被消灭了。切特尼克的残余部队则直接投靠德国的和乌斯塔什的卫戍部队，因此切特尼克分子过去所采取的主要是使一部分人民丧失信心和动摇的行动的后果逐渐被消除了。

人民解放运动的建立和取得的胜利也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穆斯林居民群众的政治动向发生影响。乌斯塔什统治当局未能在这些居民中得到广泛的支持，但穆斯林的资产阶级政界人士和教会上层却为建立在德国保护下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自治”而加紧活动，倡议成立名为“波斯尼亚穆斯林军团”的特殊武装部队。德国没有采纳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享有特殊地位的主张，但接受了关于建立穆斯林部队的倡议，并于1943年5月成立了一个地方特种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向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转变和人民解放军取得伟大胜利的影响下，穆斯林资产阶级集团开始改变策略，指望加强自己在穆斯林居民中的影响，以便能够影响战争的结局。他们力图维持并加强“克罗地亚独立国”武装力量内部在反共和反切特尼克基础上产生的“穆斯林民兵”以及由“卫国军”的逃兵和拒绝应征到“卫国军”和乌斯塔什部队服役的人所组成的“绿色部队”。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同蛊惑人心地宣扬“民族和解”的切特尼克头目进行勾结的倾向。然而，由于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参加了人民解放运动和他们赞同运动的革命目的与阶级目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对穆斯林居民的政治影响大大地削弱了。早在1943年下半年，“穆斯林民兵”和“绿色部队”的某些队伍就已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有的则军心动摇，灰心丧气，日益消极。这也是南共特别是人民解放军部队开展政治工作的结果，因为他们曾在穆斯林聚居的村庄向人民耐心地做政治宣传工作。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曾受教士和克罗地亚农民党右翼很

大影响下的克罗地亚族居民中，上述过程进展得慢些。大城市中的分化加剧了；克罗地亚农民党的一些地方领导人参加了人民解放运动；克罗地亚族农民开始对“克罗地亚独立国”持保留态度；一些人逃避应征参加“卫国军”，不履行乌斯塔什当局规定的其他义务。参加人民解放军的人，尤其是从城市和工业中心来参军的人，与日俱增。

尽管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过去遗留下来的宗教和民族偏见尚未消除，但广大阶层人民在劳动者阶级团结和各平等民族兄弟情谊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关系的进程已经展示了新的历史前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族人民的基本群众支持人民解放运动，这意味着对持续几十年的民族冲突和霸权主义欲望的否定。这些变化是解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新的联邦共同体中地位的牢固基础。在研究有关筹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大会的问题时，南共中央委员会和南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委员会认为，采用战争前夕南共某些文件中强调的自治思想，并不意味着真正解决问题。根据彻底实行自决原则的精神，采取了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成为新南斯拉夫联邦中的平等一员的立场。

当1943年9月中旬筹备召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最高政治机构成立大会的时候，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大部分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得到了加强和发展，联合成了统一的政权系统。1943年11月25～26日在姆尔科尼奇格勒召开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全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确定了全国委员会作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治代表机构的性质和职能。全国委员会主张建立自由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这里，保证全体塞尔维亚人、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完全平等和一致”，他们同其他民族一道平等地参加“人民民主联邦南斯拉夫的建设”。全国委员会选举了自己的主席团，其任务是领导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指导各地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活动。

除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解放运动机关报《解放报》外,1943年又创办了许多报纸和杂志:南共波斯尼亚克拉伊纳地区委员会的报纸《来自自由阵线》、东波斯尼亚反法西斯阵线的报纸《自由阵线》、波斯尼亚克拉伊纳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机关报《波斯尼亚克拉伊纳人民解放运动之声》。

1942年下半年和1943年头几个月,黑山切特尼克的恐怖统治使过去曾经态度消极或站在切特尼克一边的那部分人民群众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在奈雷特瓦和德里纳战役中失败的切特尼克部队的崩溃使人民的战斗热情高涨,在意大利投降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人民踊跃参军使人民解放军有可能补充现有的部队和建立新的部队,并成立在黑山、桑贾克和黑塞哥维那一带活动的一个新的军。黑山的绝大部分地区解放了,切特尼克部队瓦解了,切特尼克的领导机构被消灭了。南共组织的恢复和建立联系的过程迅速发展。到1943年底黑山有1860名党员和339名预备党员,有2296名共青团员。建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妇女、青年反法西斯组织网。共产党人努力消除过去党组织的宗派主义影响所造成的不信任气氛,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力求最广泛地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在德国占领者的庇护下在黑山建立的卖国的“人民政府”,使反革命势力在一定程度上重整旗鼓。相当数量的切特尼克部队和分裂主义部队依靠德军得到了恢复和重建,并继续进行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斗争,不过反革命势力毕竟越来越弱了。

1943年10月27日铁托指示在黑山和桑贾克着手成立地区的即省的反法西斯委员会,接着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筹备召开黑山和博卡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大会。成立大会于11月15日在科拉欣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黑山人民解放委员会及其执行委员会以及参加即将召开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黑山代表团。大会接受了新南斯拉夫的联邦制原则,黑山在其中享有联邦平等一员的地位。11月24日黑山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指令,出版了自己的机

关报《自由言论报》。1943年11月底和12月初,召开了黑山和博卡反法西斯青年组织和妇女反法西斯阵线成立代表大会,出版了黑山和博卡妇女反法西斯阵线机关报《我们的妇女》。

南共中央尊重桑贾克的特殊性(由于这种特殊性中央委员会迄今一直同南共桑贾克地区委员会保持直接的联系),决定这个地区仍保持独立的地位,允许在桑贾克召开最高政治机构的成立大会。在几乎包括整个桑贾克的解放区,已经形成了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反法西斯组织网。11月20日召开了桑贾克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特别指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穆斯林的团结是人民解放运动的力量和胜利的根本因素。桑贾克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桑贾克之声》。

塞尔维亚的德国占领当局依仗着强大的占领机构和卖国势力,竭尽全力阻止人民解放运动的壮大。德国和卖国贼的十分发达的政治机构首先是为反对南共而建立的。尽管南共加倍警惕,这个机构仍不断给南共以打击,给党加强人民解放运动的工作造成困难。由于警察多次严重地破坏了贝尔格莱德、克鲁舍瓦茨、查查克的党组织,1943年初许多党员和运动的积极分子牺牲了。已经建立的恐怖制度毫无减弱。对每一次游击活动都加以报复——烧毁房子和整个村庄、枪杀人质、把老百姓成批送进集中营或送到德国及塞尔维亚矿井强迫劳动。据德国统计,1943年2月21~28日,为了报复游击队的行动,枪杀了约600名人质,1943年3月下半月枪杀了417名公民,5月间枪杀了1139名公民。保加利亚占领军在自己控制的地区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1943年3月,德国占领当局颁布了关于实行战时经济措施的命令,提高农产品的征集额,招募更多的劳动力去从事强迫劳动。到1943年底,贝尔格莱德有11000多人被送去强迫劳动,而1943年上半年塞尔维亚其他大城市就有660到1300人被送去强迫劳动。1943年5月,仅博尔矿就有23000名强迫劳动者。

切特尼克运动在反对塞尔维亚人民解放运动的斗争中继续给

予强大而凶狠的占领当局以巨大帮助。切特尼克运动的首领在卖国的奈迪奇政府的行政机构和武装部队中建立了据点,形成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德国占领当局力图在英美军队进攻巴尔干前夕粉碎切特尼克组织,为此逮捕了一些人。在英美新的军事使团于1943年9月抵达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以后,英国竭力促使切特尼克反对德国。然而,无论是德国粉碎切特尼克组织的行动,或是盟国使团促使切特尼克参加反对占领者的斗争的努力都没有能够改变切特尼克首领的立场。他们顽固地认为,切特尼克的主要目标是打击人民解放运动,以阻止“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因而千方百计地推托盟国军官要他们对德国人作战的要求。切特尼克部队继续参加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斗争,他们的臭名昭著的“三人小组”用最野蛮的方式杀害人民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和同情分子。

德国人想瓦解切特尼克组织的行动使一部分群众更加相信同流亡政府和西方盟国有联系的切特尼克首领真的在追求国家的解放。意大利投降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德国占领当局的机关产生一种想法,认为塞尔维亚可以成为“反对巴尔干布尔什维克化的最强大的阵地”,德国应当依靠大塞尔维亚集团,甚至同意建立由塞尔维亚、黑山、桑贾克、东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可能还有斯雷姆组成的“大塞尔维亚联邦”。于是采取了缓和对塞尔维亚镇压的方针。尽管希特勒实际上拒绝了根据这一想法提出的建议,但1943年秋天塞尔维亚地区的德国指挥部和切特尼克司令部签订了共同反对人民解放军的秘密协议。

尽管条件十分复杂,1943年在塞尔维亚地区人民解放运动壮大了,这首先由于党加强了活动。南共塞尔维亚省委员会扩大后在地方上有了更大的影响,恢复并加强了党组织。1943年年中,在塞尔维亚有10个南共地区委员会及许多下级领导机构在活动。党员人数增加了,一些地区的党员人数从60人增加到130人。南斯拉夫共青团组织也加强了,它们在团结青年、重建和加强游击队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塞尔维亚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总司令部

充实了力量,又积极开展了活动。各州和其他地区的党组织召开了许多次会议。1943年7月和8月在布库利亚还召开了塞尔维亚中部和西部军政领导人会议。塞尔维亚中部的游击活动增加了。在南方,1943年初春,强大的游击队建立了广大的解放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和人民解放运动的其他组织在解放区开展活动。1943年年中,成立了许多突击营,接着建立了第一批旅。在塞尔维亚南部,人民解放军的塞尔维亚部队、马其顿部队和科索沃—梅托希亚部队协同作战。1943年10月,发生了一起警察破坏党组织的重大事件。许多领导干部和数以百计的党员和运动积极分子牺牲了。尽管如此,这次打击未能阻止人民解放运动的继续高涨。人民群众的斗志高昂,切特尼克和奈迪奇通敌分子的影响削弱了。南共塞尔维亚省委员会密切注视政治局势的发展,倡议成立塞尔维亚地区反法西斯委员会,想趁此机会吸收原资产阶级政党的某些领导人参加解放运动。但这一尝试仍没有取得结果,不过这些政党的下层人员越来越多地参加了解放斗争。

南共为在巴纳特和巴奇卡开展斗争而积极进行的活动,也为伏伊伏丁那统一的人民解放运动的高涨迅速地创造了条件。1943年1月重建以约万·韦塞利诺夫为首的南共省领导机关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斯雷姆人民解放运动继续十分顺利地发展。人民政权机关以及妇女和青年反法西斯组织网几乎全部建立起来。在克罗地亚族居住的农村中的工作以及在少数民族当中的工作加强了。斯雷姆居民的组织能力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贝尔格莱德郊区和交通线附近的一些村庄只要没有占领军把守,实际上已解放。1943年夏季,人民解放委员会领导了“不给占领者一颗粮食”的运动,把大批粮食隐藏到解放区,并运到波斯尼亚东部供应人民解放军部队。1943年5月中旬,成立了伏伊伏丁那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作战司令部,并根据最高司令部1943年7月2日的决定改为总司令部。1943年7月,恢复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伏伊伏丁那省委员会。南共伏伊伏丁那省委员会加速了巴奇卡和巴纳特党领导

机关的恢复并加强了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成立了许多人民解放委员会和青年、妇女反法西斯积极分子组织。巴奇卡和巴纳特数以百计的战士加入了伏伊伏丁那旅。《我们的斗争报》成了南共省委员会的机关报，而《青年之声报》则成了伏伊伏丁那反法西斯青年联盟的机关报。

1943年11月伏伊伏丁那人民解放总委员会的建立，完成了伏伊伏丁那建立人民解放运动机构的过程，从而为解决伏伊伏丁那在未来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同体中的地位问题奠定了基础。当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建议从斯雷姆选派代表参加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时，南共中央决定，斯雷姆并入克罗地亚的问题从议程上取消；但为了避免过早地就伏伊伏丁那的地位问题、特别是就某些地区的划界问题进行讨论，决定把彻底解决伏伊伏丁那地位的问题也向后推延。南共中央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只会损害动员各民族一切力量去进行解放斗争（因为这仍然是主要任务），尤其在巴纳特和巴奇卡地区，在团结各民族群众方面更是如此。

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人民解放运动根据地的方针于1943年春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取得了某些成果，但阿尔巴尼亚族群众政治觉悟成熟的进程仍然缓慢。他们仍不能区分人民解放运动和切特尼克复辟旧压迫制度的政策之间有什么差别，因此对建立南斯拉夫国家共同体的任何设想都继续持保留态度。1942年底在阿尔巴尼亚建立的所谓民族阵线，于1943年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进行反革命活动，成为与人民解放运动相抗衡的力量。在保卫“大阿尔巴尼亚”的口号下建立了政治委员会和以“阵线部队”为名的卖国武装组织。因此，新组建的游击队想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武装活动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所以它们只能继续在邻近的地区开展活动。同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运动的合作开始取得某些成果。党在加强活动的过程中遭到了一次更大的打击。1943年4月，州委书记博里斯拉夫·武克米罗维奇和州委委员拉米

兹·萨迪库牺牲了。卖国贼实行控制和恐怖的措施严重地阻碍了塞尔维亚族和黑山族群众大批参加游击队。

意大利的投降和“大阿尔巴尼亚”国内卖国贼政权机关的摇摇欲坠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阿尔巴尼亚族群众中的动乱加剧了。但在政治态度上仍未发生重大变化，因为德国人宣告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人已从意大利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以此迅速地收买了城乡的富有阶层，依靠他们来保证自己对阿尔巴尼亚居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些居民听信了德国占领当局倡议下建立的卖国的“第二普里兹伦同盟”的蛊惑性纲领和口号。

意大利投降后，南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州组织为扩大人民解放运动的政治基础而加强了工作。1943年10月，成立了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临时人民解放委员会。1943年11月初，州党组织会议决定，召开州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代表会议，为成立人民解放运动的组织而加紧工作。当时南共州组织约有400名党员，其中有45名是阿尔巴尼亚族的党员。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代表会议于1943年12月31日至1944年1月2日在阿尔巴尼亚的解放区布亚诺召开，有49人参加，其中有43名阿尔巴尼亚族人，而且很大一部分人是阿尔巴尼亚国民。代表会议特别强调必须开展更广泛的政治工作，争取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阿尔巴尼亚族群众参加人民解放斗争。代表会议的决议还提出了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将来同阿尔巴尼亚合并的问题。因此当时南共中央就提醒南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州委员会说，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就会支持卖国的大阿尔巴尼亚势力，他们正是依据德国的“大阿尔巴尼亚”的主张竭力阻挠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反法西斯阵线的加强。

贯彻南共中央关于建立马其顿共产党的决议和1943年3月19日成立由拉扎尔·科利舍夫斯基（他仍被关押在保加利亚的监狱中）、马拉·纳采瓦、库兹曼·约西福夫斯基（任委员会书记）、斯特拉希尔·吉戈卡、茨韦特科·乌祖诺夫斯基和巴奈·安德雷耶夫组

成的中央委员会，对马其顿人民解放斗争的发展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整顿党的队伍和坚决采取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为人民解放运动迅速而全面的高涨创造了条件。早在1943年春，在马其顿的许多地区就出现了运动的根据地。取得的胜利有助于贯彻马其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43年8月2~4日会议通过的下列方针和决定：组建更大规模的部队和建立自由区；发展人民政权系统；由马其顿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总司令部发布关于人民解放斗争的目标和性质的宣言；着手筹备成立马其顿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

意大利的投降促使马其顿人民解放运动更加汹涌澎湃地高涨。马其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马其顿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总司令部在意大利投降之时把斗争重点转向马其顿西部，在那里卖国的阿尔巴尼亚政权垮台了，在阿尔巴尼亚族居民当中发生了动乱。由于基切沃、代巴尔等地的解放，在马其顿开辟了第一个辽阔的解放区，建立了许多突击营，不久又建立了马其顿—科索沃第一旅。在代巴尔一带、普雷斯帕、蒂克韦什和库马诺沃地区建立了人民解放运动的强大据点。同塞尔维亚、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游击队开展了广泛的配合作战，在边境地区同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解放力量开展了合作。

人民解放运动发展的转折点还表现为加紧成立人民政权机关和其他反法西斯组织。10月初发表的马其顿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总司令部宣言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宣言指出，马其顿人民通过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实现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这一斗争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争取建立兄弟情谊与平等的新关系的斗争的组成部分。当时还成立了马其顿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筹备委员会，它除了准备选举参加马其顿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和参加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代表外，还起着最高政权机关的作用。马其顿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立大会由于德国发动攻势而推迟了。1943年12月21日马其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富什塔尼举行会议，会上确定了进一步加强和

发展人民解放运动的任务。就在这些日子里，还召开了马其顿反法西斯青年组织成立大会。

人民解放运动的壮大日益缩小了提出“自由”和“统一”马其顿口号的势力的活动余地，使大塞尔维亚主义代表者想建立切特尼克据点的企图彻底失败。南共考虑到巴尔干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并认为这里的主要问题是马其顿人民的命运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通过马其顿人民和巴尔干各族人民的共同斗争与合作才能解决，马其顿人民在这一斗争中将实现自己的自决权。从这一立场出发，南共倡议巴尔干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开展合作并建立紧密的联系。然而，在1943年下半年，一方面，巴尔干各国解放运动发展程度的差别已明显地表现出来，而这些运动对待马其顿民族问题的立场和实践的重大分歧也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运动正面临着争取国际承认的复杂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南共把活动重点放在解决南斯拉夫境内的民族问题上，认为具体实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自决权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南共中央放弃了关于成立所谓巴尔干联合指挥部的思想，因为那样做，正如铁托所说的，有可能“用在斗争过程中还远未明朗化的全巴尔干运动来排斥南斯拉夫运动”；尤其是“鉴于国际形势，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南斯拉夫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已经存在并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南共坚持在南斯拉夫的范围解决民族问题和瓦尔达尔马其顿具有联邦平等一员地位的方针，同时没有放弃使巴尔干各国人民接近的努力，包括成立巴尔干联邦的思想。南共中央认为，只有在每一国人民以自己的斗争保证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的条件下，这一点才能做到。

在人民解放斗争发展过程中，南共的组织结构和干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43年底，党员的绝大部分在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中和在斗争初期以及在战争时期成为人民解放运动最强大根据地的农村地区中。另一方面，在党的基本积极分子转移到游击队和地方上以后，在被占领的城市和工业中心里，由于警察搜

捕,继续保存党组织是十分困难的。在占领者和卖国贼得以阻止人民解放斗争扩大的地方,特别是在起义一开始就被镇压下去和党的干部遭到重大损失的地方,情况大体也是如此。

由于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党员队伍的恢复和扩大首先有可能在农村实现。尽管这一方针来自人民解放斗争的纲领本身,即出自这样一个信念:人民解放斗争的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目标是广大阶层人民愿望的表现,但这一方针的贯彻不是没有困难的。问题不仅在于党的干部对小私有者阶层采取传统的保留态度,而且在于吸收党员的现行标准与农民较低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之间很不协调。要求被吸收入党的人不但必须具备一定的优良品质和斗争精神,而且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思想教育程度,这就成了斗争初期党员队伍迅速扩大的严重障碍。因此,南共中央多次提醒注意这方面的关门主义,指出在斗争中士气高昂和品行优良的战士和积极分子,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水平较低不应成为加入南共的障碍。与此同时提出一项任务,党支部要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举办专门的训练班,使新党员了解南共的政治路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1942年下半年,南共中央办的党校开学,数十名领导干部在党校学习班结业。南共各省委员会和下级领导机构也开设了党校和训练班。

由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也由于武装斗争初期损失很大,南共队伍扩大的工作进展相当缓慢。据保存下来的南共中央文件的资料,1943年10月,南共约有2万名党员。实际上,在这个时期里,南共党员的人数在人民解放军的部队里和解放区里激增。各地区保存的零星材料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波斯尼亚克拉伊纳南共党员人数起义前夕只有约200名,1942年初就增加到640名,1943年11月增加到5078名。在科尔敦,党员人数从起义前夕的210名增加到1942年初的740名。在利卡,1941年底只有250名党员,到了1943年7月有674名。在斯雷姆,起义前夕只有约200名党员,1942年底则有约400名,1943年底超过700名,这里还不算在波斯尼亚东部作战

的伏伊伏丁那人民解放军部队中的党员。在斯洛文尼亚,起义前夕只有640名党员,1942年约有900名。在黑塞哥维那,起义初期约有130名党员(其中约有60名在莫斯塔尔),1942年5月仅在黑塞哥维那东部就有约270名党员。

保存下来的关于克罗地亚共产党党员发展的材料表明,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组织发展取决于战争头几年人民解放运动发展的水平。在准备和发动武装斗争时期,克罗地亚城市中特别是北部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但在起义地区党员人数却增加了。克罗地亚共产党党员人数从起义前夕的约4000名增加到1942年11月的约5100名左右。其中约有1600名党员在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中,多数党员即约3500名在科尔敦、利卡、巴尼亚、戈爾斯基科塔尔、克罗地亚滨海地区、达尔马提亚和斯拉沃尼亚等起义地区。1943年在整个克罗地亚地区人民解放运动顺利地和平衡地发展过程中,党员人数于当年年底增加到约1万名。

与此同时,在斗争进展得较慢的地区,党的发展也十分缓慢,在某些地方由于党遭到破坏党员人数减少了。例如,在塞尔维亚西部和中部起义长期处于低潮之后,1943年年中,塞尔维亚总共只有约1000名党员。由于斗争初期遭到巨大损失,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党员人数没有增加,1942年底的人数和开始起义之前几乎一样。1942年初,南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州组织约有党员300名,即和四月战争前夕差不多,而1943年底则有约400名。马其顿的情况也相似。1943年春,马其顿共产党成立后,有521名党员。党在巴奇卡和巴纳特的发展更慢。在1941年的秋冬到1942年初遭到巨大损失后,南共在这些地区的党员从武装斗争初期的约1000人减到1943年的不到200人。尽管恢复了党的一些领导机构和组织,但党员没有增加多少。

人民解放军中的南共组织发展得最快。某些地区保存下来的关于军队和地方南共党员人数的材料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在波斯尼亚克拉伊纳,1943年11月初总共5078名党员中有3517名在部队

里；在伏伊伏丁那，1943年底总共约有2150名党员，在人民解放军部队中就有约1340名党员；在黑山，有1860名党员，在部队里有930名；在黑塞哥维那，1944年初在地方上和游击队里有446名党员，而在第二十九黑塞哥维那师里有481名党员；在斯洛文尼亚，1942年12月共有1212名党员，在人民解放军部队中有550名党员；在桑贾克，1944年2月共有390名党员，军队中就有280名党员。

党的组织机构也得到了发展。在人民解放军部队中党的组织和领导机构网最为发达。每个连队和指挥部都有基层组织，这些基层组织的工作由营的党委来统一领导，更高的领导机关是旅党的领导人和师党委。党的组织机构在地方上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在一开始就积极开展人民解放运动和建立了解放区的那些地区。在许多村庄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基层组织，在没有基层组织的地区，建立了由靠近党的和成为党发展对象的人组成的积极分子小组。这些党组织经管本地区的所有问题，根据南共总路线和党领导机关指示的精神指导运动的全部活动和发展。它们的工作，以及在人民解放军部队中的工作，分成若干方面，由党员个人或小组分别负责经管人民政权机关的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少先队工作。这些南共党员通常也是人民委员会的委员，或是共青团、反法西斯青年统一联盟、妇女反法西斯阵线等组织中及人民解放阵线委员会中的积极分子。在支部的工作会议上，除迫切的日常工作（如组织播种或收获、完成供应前线需要的有关任务）外，定期讨论共产党员在各部门中的工作，分析执行任务的情况，检查缺点和失误，确定今后的任务。支部中的关系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之上，建立在严密的纪律性和高度的责任心之上，建立在教育党员和树立共产党员形象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之上。

早在1941年乌日策通过的南共中央关于整顿党的组织形式的决议和指示中就强调要扩大党的领导机构网。1941年底到1942年初，在起义地区实施一项原则：凡是有一支游击队在开展活动的地区，都要成立南共地区委员会，其任务是指导部队和地方的党的工

作。由于建立了大量的基层组织,领导体制也发展了,逐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地方党领导机构。例如到1942年底,在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大片解放区几乎完全建立起地区、县和区的委员会网。保存下来的零星材料说明了党组织发展的这一进程:在利卡,起义前夕只有1个地区委员会和7个下级领导机构(县或区委员会),到了1943年7月,除利卡地区委员会外,还有7个县委员会和27个区委员会;在斯拉沃尼亚,武装斗争开始前有3个地区委员会、8个县委员会和3个市委员会,到了1942年底,就有1个州委员会、4个地区委员会和18个县或市委员会;在斯雷姆,武装斗争开始时有1个地区委员会和5个县委员会,到了1943年底有2个地区委员会、9个县委员会和1个市委员会;在波斯尼亚克拉伊纳,起义前夕除有1个州领导机构外,有9个县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到了1943年秋,除1个州委员会外,还有6个地区委员会、15个县委员会和许多区委员会。

1943年,在发动武装斗争时期或在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攻势中南共遭到严重损失甚至遭到破坏的地区,党组织也得到了整顿和加强。黑山、桑贾克、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中部和东部、克罗地亚西北部、塞尔维亚东南部、舒马迪亚和马其顿的发展尤为典型。在黑山,1943年底除有1个省委员会外,还有5个地区委员会,11个县委员会和25个区委员会,共有167个基层组织。在黑塞哥维那,除有1个州委员会外,还有2个地区委员会,1个地区党派出机构,7个县委员会和1个地方委员会,4个区委员会,14个区派出机构和55个基层组织。

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来说,干部问题尤为复杂。几乎全国所有地区党员的数量都很少,而党的有经验的积极分子则更少。在准备和发动武装斗争时期党遭到的损失如此之大,以致不得不从其他地区抽调党的工作人员,尽管在起义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处处都感到需要有才干的军事和政治领导者。全国各地经常向党的上级领导机构要求派给有经验的党的积极分子,特别是军事专家。党的领导机构运用战前地下工作的经验,在极其广泛的范围内配备

党的积极分子,最大限度地运用了领导干部流动的原则。尽管主要是由于在处理新形势和新任务中遇到困难而出现了一些缺点,但武装斗争初期党的干部的第一次大调动和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和工业中心转移到内地,首先是转移到农村,使南共能顺利地完成任务:保证起义的发动和开展。在这方面,南共中央争取在西班牙内战中参加国际纵队的南共党员于1941年返回祖国的行动具有重大的意义。虽然条件极其困难,这一行动仍十分成功地完成了,数十名有经验的军事人才从法国和德国通过秘密渠道回到国内,在发动武装斗争时把他们分配到全国各地,因为那里十分需要干部。

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战争和革命的特殊条件而选拔和分配党的干部的做法经常化了。除了关于干部的教育、培养和选拔的指示和通知外,南共中央还直接作出了关于分配党的干部的重要决定,特别是在成立了第一批无产者旅之后,在这些旅里集中了大批来自塞尔维亚、黑山和桑贾克的党的积极分子。南共中央决定在1942年初把这些干部中的一部分派往波斯尼亚东部的志愿部队和地方上担任军事和政治职务。后来,当几个无产者旅向波斯尼亚西部挺进并于1942年下半年在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建立起广大的解放区时,数十名党的积极分子从这些旅调往克拉伊纳旅和克罗地亚旅担任党政职务及担任地方党的领导职务。最高司令部从无产者旅和克拉伊纳旅抽调大批有经验的军事领导人到斯洛文尼亚总司令部,分配到各旅和师担任指挥职务。

虽然这种做法十分普遍,但有的时候把大批党的积极分子从一个民族地区派往另一个民族地区,是由于非常的条件和需要而被迫采取的措施。诚然,受国际主义精神培育的党员无保留地和不带民族偏见地接受了其他民族的干部,并首先根据他们作为领导人表现出的素质来衡量他们。不过作为南共的长远方针,应是不断地培养党的民族干部。从别的民族地区派党的干部的做法被看成是提高当地民族干部水平的一种帮助,所以这种帮助首先通

过南共中央派代表或指导员的方式进行,尤其是对于民族的领导机构。干部政策的这一总方针具体体现在南共中央关于培养和提高民族干部和本地干部的指示中。指示强调要举办各级党、政、军训练班和学校,出版各民族和各少数民族语言的报纸和各种读物。用这种办法逐渐发展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下培养和提高干部的制度,而战争环境本身又为真正考核干部素质提供了可能性。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党的直接支持下作为党的最强大的支柱也得到了发展。在发动和开展起义时期,青年表现出了坚定地接受斗争道路的决心。党和共青团的领导根据这一时期的经验,更加重视团结青年群众的工作。早在1943年底南斯拉夫共青团就已成长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青年统一联盟的思想和政治上的领导力量,这个联盟团结了人民解放军部队中、解放区和占领区中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共青团的组织和领导机构网——连队和居民区中的积极分子小组,营、旅和师委员会,地方上的地区、县和区委员会——逐渐建立起来了。除了以人民解放运动的宗旨对青年进行政治教育和让青年有组织地参加各方面斗争外,南斯拉夫共青团活动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对年轻人进行文化教育。同时也使青年组织不断扩大。1943年底人民解放军部队中约有3.5万名共青团员。根据保存下来的零星材料可以得出结论,在地方组织里有更多的共青团员在进行活动。

随着人民解放运动成长为国内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力量,1943年它的国际地位也发生了某些积极的变化。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的前夕,南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的建议,要求在这次会议上不要成立政府,即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不要反对在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而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问题将在打败德意联盟之后再作决定。这个建议未能动摇南共坚定地贯彻自己的总路线的决心,但影响到南共争取国际上对人民解放运动的承认的策略。当时就已非常清楚地表现出国内的社会政治改造和保证真正独立之间的相互制约,所以人民解

放运动的领导不顾共产国际的建议,开始为取消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代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权利和谴责流亡政府同占领者合作而斗争。1943年1月,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给各盟国政府发出的照会就抱有这个目的。这一照会公开地提出了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同占领者合作的责任问题,当时不仅苏联政府而且英国政府都不能无视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同占领者合作的事实,而且南斯拉夫战场已经更加直接地列入了盟国总战略的范围。

当时英国政府开始明显地改变了对待南斯拉夫事态的态度。1942年12月英国政府使团未能使切特尼克分子停止同占领者合作并参加解放斗争。在此之后,英国政府看到了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便不再倾向于无保留地支持切特尼克分子。所以英国政府在执行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中,就绕过南斯拉夫流亡政府,而且往往违反这一政府的意愿,独自作出决定,力求依据南斯拉夫国内的现实条件和力量对比,来保证自己的势力范围,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和恢复南斯拉夫王国。由此英国政府也同意了中近东指挥部的建议,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进行接触。从人民解放运动获得国际承认的角度来看,这个决定有重大意义,但并不意味着英国政策的彻底转变。但这一决定毕竟反映出这一政策的重大变化:英国政府终于放弃了原来的立场,即1941年底采取的使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一切力量都归德·米哈伊洛维奇指挥和完全受流亡政府领导的立场。英国政府这时更加主张切特尼克分子和游击队和解,进行合作,反对占领者,而不再坚持要由米哈伊洛维奇来指挥。这样就能保证英国人有某种机会对解决巴尔干地区战后制度问题施加影响。

英国指挥部与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之间建立接触,促使盟国新闻工具报道了许多关于南斯拉夫真实事态的消息,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已长达数月之久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危机。在越来越明显地得不到英国支持的情况下,除了历来给予支持的

某些塞尔维亚政治家外，克罗地亚的和其他某些资产阶级政党的著名代表人物也都减少了对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支持。然而，1943年6月政府的更迭也未能改变局面。在政府中拥有主要发言权的仍然是最激进的大塞尔维亚主义政策的代表者，他们不能容忍英国对南斯拉夫形势的看法。不赞成这一政策的某些集团和个人本身软弱无力，不能坚决地面对现实并在新的基础上争取对国内施加影响。他们无力克服出现的危机并建立一个能同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保持某种伙伴关系的政府。这一角色最后只能完全由英国政府来扮演，在它的坚持下，8月10日成立了博日达尔·普里奇的文官政府，其目的是使国王彼得能在有利的时机得到相应的安排。

在这个时期里苏联政府对所谓南斯拉夫问题的立场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虽然苏联政府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已较少地依赖西方盟国，但它仍把解决“南斯拉夫问题”的主动权交给英国政府，对英国政府的立场持忍让的态度。苏联报刊和电台已经更加经常和详尽地报道南斯拉夫斗争的消息，“自由南斯拉夫”电台除播放最高司令部的每日战报外，还广播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转播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的各种公告，通过这种途径把消息和公告传送到盟国和中立国的某些报纸和电台，从而广泛传播关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的真相。

1943年5月初，发表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南共中央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即这个组织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团结的集中形式，已不符合各国共产党及工人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南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战前年代和战争期间的关系，最好不过地说明，这个严格集中的世界共产主义组织已日益变成本身的成员即各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发展的障碍；尤其是在斯大林的影响下这一组织实际上完全服从于苏联对外政策的日常需要。因此，西方盟国政府和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要求苏联政府对南共及其政策施加影响。共产国际解散后，南共中央仍同莫斯科保持无线电联系。铁托通过这一途径同苏联

政府通话,要求苏联政府并通过它要求英国政府了解切特尼克分子参加奈雷特瓦战役的情况,请求给予军事物资援助,要求盟国政府派使团到南斯拉夫了解事实真相,建议红军指挥部派出使团到最高司令部,要求承认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是盟军。不久后情况表明,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并非出于执行委员会所说明的理由,而是出于苏联对外政策的需要和他自己对反法西斯同盟各国之间关系的看法。

虽然在1943年里为使人民解放运动得到国际承认而采取了重大步骤,但这一进程同南斯拉夫战场上的形势和南斯拉夫国内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相比,是大大地落后了。一方面,人民解放运动已成长为主要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它在许多方面仍没有一定的国际地位。这两个事实之间不协调的状况已越来越明显。不但如此,意大利投降前后的许多情况说明,西方盟国不准备接受南斯拉夫在人民解放斗争中出现的实际情况,没有放弃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企图。英国政府的“在切特尼克分子和游击队之间进行调停”的方针,实际上反映了英国政府力图为一个在同人民解放运动的冲突中已遭惨败的通敌分子运动恢复名誉的打算。以下事实也证明这一点:英国政府仍把自己的军官留在切特尼克司令部里,并于1943年9月同时向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和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派遣英国正式军事使团。早在8月间就传出了南斯拉夫政府从伦敦迁往开罗的消息,其意图是让政府更接近于正在发生的暴风雨般的事态;接着传出了彼得国王和政府代表关于他们即将回国的信息。

这一切都使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更加相信,英美部队即将在亚得里亚海岸登陆,它们将为实现英国的政策目标而直接行动。诚然,英国关于英美部队进攻巴尔干的想法在8月底的魁北克会议上被否决了,但会议的决定没有披露。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致同意继续做“调停游击队与切特尼克”的工作,并在即将于莫斯科召开的盟国政府外长会议上对南斯拉夫采取共同的立场。然而,盟国

在巴尔干参战的问题并未因此从议程上取消。丘吉尔于1943年10月7日再次试图使罗斯福对巴尔干发生兴趣,建议他采取某些行动,把重点放在同巴尔干各国“解放运动的联系上”,但这一建议也未被接受。

对西方盟国的意图不明促使南共中央决定彻底清算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并把这一决定通知了苏联、美国 and 英国政府。铁托于10月2日向莫斯科发出了这一内容的电报。铁托强调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英、美代表会议上“十分可能”也会提出南斯拉夫的问题,他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委员会以及最高司令部的名义宣布:人民解放运动不承认国王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因为他们支持切特尼克分子;“不允许他们回南斯拉夫,因为那就意味着内战”;大多数人民希望建立一个“以人民解放委员会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当前,以反法西斯委员会为首的人民解放委员会是唯一合法的人民政权”。铁托在电文最后提到,他还将把这一声明交给驻最高司令部的英、美使团。

最后,在1943年10月16~18日召开的会议上,南共中央决定,着手在国内建立国家政权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从而剥夺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作为合法政府的权力。会议上通过的这一方针发表于就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而发布的《告南斯拉夫人民书》中,书中指出,提出“彻底改变整个政权关系”和“争取实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优秀儿女的宿愿——建立兄弟的联邦共同体……”的问题的时机已成熟了。还强调指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不承认伦敦流亡分子和国内其他各种反动集团以人民的名义发言的权利”,他们“再也不能无视下列事实:国王和君主制已成为各种准备和组织自相残杀的战争的集团纠集的中心……”,今天“只有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及其产生的机构才能代表人民,因为它是从我国各族人民流血牺牲的解放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因而它最有资格成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主权和真正人民政权的体现者”。《告人民书》特别强调,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正当地要求盟国”承认

他们在解放斗争中所表达的这种意愿。

与此同时,也请各民族的代表团出席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会议。会议召开前两天,即11月26日,铁托电告莫斯科,“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将于11月28日开幕”,议程包括“把该委员会改组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临时立法机关”,并“建立全国委员会作为隶属于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临时政权执行机构”。

3.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权力的革命更迭

民主联邦南斯拉夫的基础。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决议的反响。南共同邻国共产党和解放运动的关系。

1943年11月29~30日在亚伊策召开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之后,铁托作了报告,他阐述了人民解放斗争发展的基本方向、阶段和道路,社会政治力量的改组过程和人民解放运动范围内的革命进程。铁托指出,必须采取措施来“进一步顺利地开展人民解放斗争”,建立一种“以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和平等为基础并能保证社会各阶层享有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制度;鉴于君主制作为“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和对其他民族压迫的体现者”以及由于支持切特尼克分子而名誉扫地,人民解放运动主张建立“共和民主政体”。他认为,必须使“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确实成为南斯拉夫人民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执行机构”,建立“一个具有临时政府形式的执行机构,这个机构将有能力领导一个真正人民政府必须从事的一切工作”,“一国人民的这样重大步骤……一开始可能遇到障碍和产生误解,甚至在国外我

们的盟国那里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国外还存在着一个所谓的政府”，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自己的解放斗争中“赢得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而且这个权利是完全符合大西洋宪章的”。

根据这一立场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宣言》，《宣言》公布了如下决定：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是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南斯拉夫的最高立法和执行的人民代表机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是临时的最高人民政权机关；剥夺在国外的所谓南斯拉夫政府作为合法政府的权利；禁止国王彼得二世·卡拉乔尔杰维奇在战争结束前回国，战争结束后让人民自己决定君主政体的命运；按联邦制原则建立南斯拉夫；奖励并感谢人民解放军；批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的决定、命令和声明。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新选出的主席团接着作出如下决定：任命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批准斯洛文尼亚解放阵线最高会议和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关于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统治的那部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地区并入南斯拉夫的决定；授予以瑟普·布罗兹·铁托南斯拉夫元帅的称号；成立确定占领者及其帮凶罪行的委员会。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和全国解放委员会的组成，反映了在共产党人领导下人民解放运动的广泛性和南共在广大阶层人民中赢得的信任，特别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接受南共的政治纲领，在人民解放运动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伊万·里巴尔博士再次当选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罗多留布·乔拉科维奇当选为秘书。63名主席团委员中，有28名是南共的杰出领导人，还有这么多名额的委员是各种资产阶级政党的前领导人、文化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神甫和军官。有17名委员的全国解放委员会中，除主席以瑟普·布罗兹·铁托和3名副主席之一爱德华·卡德尔外，还有3位南共的著名领导人：斯雷滕·茹约维奇、伊万·米卢蒂

诺维奇和托多尔·武亚西诺维奇,其他委员是原资产阶级政党成员、文化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弗拉迪斯拉夫·里布尼卡尔、博日达尔·马戈瓦茨、约瑟普·斯莫德拉卡博士、弗拉达·泽切维奇、爱德华·科茨贝克、杜尚·塞尔奈茨博士、米利沃伊·亚姆布里沙克博士、安东·克尔日什尼克博士、弗拉奈·弗罗尔、米莱·佩鲁尼契奇、苏莱曼·菲利波维奇。

把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建成最高立法和执行机构和成立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作为临时政府,从国家法的观点看,实现了权力的更迭,从而反映了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赢得的革命的基本胜利。关于建立最高国家政权机关的决定是以已经很发达的人民解放委员会系统为基础的。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期间,除了6个国家委员会外,还有14个省和州委员会,52个地区委员会以及遍布各地的县、区和地方人民解放委员会,在斯洛文尼亚叫解放阵线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共有约15万名委员。

第二个重要决定是按联邦制原则建立南斯拉夫,它把战争期间建立的新的民族关系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联邦制的决定指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过去从未承认、现在也不承认法西斯帝国主义者对南斯拉夫的宰割”,“他们用共同的武装斗争证明自己愿意留在南斯拉夫和继续联合成南斯拉夫的坚强意志”。这个决定从“每一个民族拥有自决权、包括分离权或同其他民族的联合权出发,遵照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锻炼了他们之间牢不可破兄弟情谊的三年共同的人民解放斗争中所表达的真正意志”,规定:“为了实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自主的原则,为了使南斯拉夫成为各族人民的真正祖国,而且再也不致变成任何霸权主义集团的领地,南斯拉夫现在和将来都应建立在联邦制原则之上,这一原则将保证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完全平等,即保证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

各族人民完全平等”。决议还规定要“保证南斯拉夫各少数民族的一切民族权利。”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这些决议同南共在人民解放斗争中的总路线是完全一致的。以法律形式肯定权力的革命更迭和规定联邦制原则是新南斯拉夫的基础，它们都反映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基本阶层在反对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武装斗争中建立并加强团结的愿望。因此，这些决议是促使一切爱国力量进一步团结和确认南共是真正人民的力量和民族的力量新动力。

与此同时，南共在贯彻这些决议中最大限度地考虑到国际因素，并现实地估计到实现长远的解放目标和革命目标的斗争重心已从国内舞台转移到国际舞台。现在，人民解放运动已赢得了转折性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已成长为一支能够在反希特勒同盟的整个战斗中保证在本国战场上打胜仗的力量，而国内同敌人合作的力量基本上已遭到失败。在这种条件下，最终的革命高潮使盟国想在解决所谓南斯拉夫问题中充当主要仲裁者的打算受到威胁。英国政府已经完全承担起关心维护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合法地位和挽救君主制的工作。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反映了人民解放运动阻止外来干涉和保证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自己解决内部问题的权利的决心。当连续不断的胜利已展示出战争结局的前景时，盟国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抓世界某些地区战后制度的问题。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正是在这个时刻通过的。南共中央认为，为了在反对外部强加的解决办法的斗争中加强新南斯拉夫的地位，有必要在指出最高政权机关的临时性和推迟最终解决君主制问题的同时，更加强调在解放了的国家里由人民自己决定国家制度的根本问题。

11月30日，会议刚结束，铁托就电告莫斯科关于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和选出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和全国解放委员会成员的名单。电报说，208名当选的代表中有142名出席了会议，“各民族代表团的组成表明，人民

解放运动最广泛地团结了各民主派别的人士”，会议的工作极好地表现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高度团结和兄弟情谊”。紧接着，12月3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和全国解放委员会决定正式通知盟国关于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决议。

盟国政府很快对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发表了正式声明。它们继续支持国王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合法性。英国政府特别强调，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的临时性对英国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政体的最终解决将取决于战后人民的意志。英国政府在这里看到了探索解决“南斯拉夫问题”的适当办法的可能性。在英、美政府发表声明后，苏联政府接着发表公报，认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是“促进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今后反对希特勒德国的胜利斗争的积极事实”，是“南斯拉夫新领导人团结一切民族力量”的重大成就，但苏联政府不愿意进一步肯定这些决议。

盟国和中立国的报刊大量报道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许多评论指出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取得的胜利和德黑兰“三巨头”同意援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许多报纸，包括一些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都作了客观的报道，从而有助于增进对新南斯拉夫的同情和削弱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声望。

尽管应英国政府的要求和为了推动“南斯拉夫问题”的解决，成立了博·普里奇政府，但这个政府仍然是继续支持切特尼克分子的最激烈的大塞尔维亚主义集团的代表。它坚决拒绝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把这些决议说成是“恐怖主义的文件”。当它获悉德黑兰会议承认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并决定援助它的消息时，对盟国政府深表不满。

切特尼克领导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他们主张采取独立行动来反对新南斯拉夫，以支持普里奇政府抵抗英国的压力。他们决定，为了对付南斯拉夫反法

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及其决议,准备召开支持切特尼克运动的原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会议,以谴责盟国对人民解放军的态度,阐明自己对国内制度问题的看法。1944年1月成立了“南斯拉夫人民民主联盟”,参加这个联盟的,除塞尔维亚、黑山和斯洛文尼亚资产阶级政党的某些领导人及“主张建立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外,还有以日夫科·托帕洛维奇为首的社会党人。在巴村(塞尔维亚)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这一伙人谴责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对盟国援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表示遗憾,主张在三元制“联邦原则”^①的基础上恢复君主制的南斯拉夫。然而,切特尼克的这一行动并未在国内和世界舆论中引起广泛的反响,而是被看作通敌分子企图阻碍从南斯拉夫现实力量对比出发探索解决办法的一种尝试。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在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党组织了十分广泛的活动,使战士和人民了解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决议的内容和意义。这些活动促进了人民解放运动的高涨,坚定了军民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决心。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为仍处于动摇之中的那部分群众展示了前景,促使他们作出拥护人民解放运动的决定。卖国贼军队里的动乱也加剧了。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受到了成千上万国外的南斯拉夫人——包括普通侨民、在俘虏营和集中营中的南斯拉夫人——的欢迎。美洲各国的南斯拉夫人或南斯拉夫血统的人支持人民解放斗争的运动早在前一个时期就已产生了,此时则具有了广泛的规模。他们通过自己的报刊和集会传播关于南斯拉夫的真相,揭露南斯拉夫政府及其在国内的势力的叛国活动,募集现金和物资支援人民解放军,从而为新南斯拉夫获得国际承认作出

^① 所谓三元制联邦原则是指南斯拉夫联邦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组成,不承认马其顿和黑山的民族独立地位,不承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联邦的独立单位。——译者

了贡献。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还推动了德国俘虏营中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人——旧南斯拉夫军队官兵的分化过程，在那里早在1941年秋就在人民解放运动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斗争。尽管条件十分艰难，南共组织和领导仍在俘虏营中为团结俘虏和揭露流亡政府、切特尼克和其他通敌分子的背叛行为而开展活动。在国内和国外的集中营里，尽管条件更加困难，南共和人民解放运动在那里建立了组织并开展了活动。这些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成功地获悉国内外局势的发展，并传播给被关押的人们。党在集中营里开展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发动各种形式的抵抗，包括受审时英勇不屈，对强迫劳动实行怠工，组织越狱。数以千计的被关押在意大利集中营里的南斯拉夫人在意大利投降后逃出集中营并开始组成游击队。除了由南斯拉夫人组成的若干支游击队外，他们还参加了意大利的游击队。许多南斯拉夫人参加了希腊、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被占领地区、阿尔巴尼亚、比利时、挪威、荷兰和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游击队和其他抵抗运动组织。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决议和人民解放军胜利的影响下，1943年底驻在近东的南斯拉夫政府少数武装部队发生了动乱。政府用迫害和逮捕来回答他们提出的参加人民解放军的要求。对此铁托于1944年2月以最高司令部的名义向盟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中所反映的人民解放运动的巨大胜利，在所有被奴役的欧洲国家中引起巨大的反响。保存下来的各种抵抗运动组织的地下刊物和出版物的材料特别说明了这一点。在战争的早期阶段，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散布的消息占压倒优势，关于起义的核心是由南斯拉夫王国军队的残部组成和政府通过德·米哈伊洛维奇领导这支部队的宣传似乎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可是从1942年底起，特别是意大利投降以后，关于南斯拉夫事态的真相已经大白，它鼓舞了欧洲被奴役的各国

人民加强反抗占领者的斗争。同时，在抵抗运动中，共产党人领导的集团和各种资产阶级派别领导的集团之间的分歧加深了。共产党人强调，南斯拉夫的例子证明可以开展广泛的斗争直到起义；而资产阶级右派则借此散布反共宣传，特别强调南斯拉夫运动的背后有莫斯科在操纵，运动的目标是“共产主义革命”。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波兰以及其他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抵抗运动中。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决议所反映出的革命变化，在邻国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反响，从而推动了南共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同这些国家的工人党和解放运动的合作。

南共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根据南共中央的建议，早在1941年夏天和秋天南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州委员会就利用以前同阿尔巴尼亚某些共产主义小组的联系，积极筹备建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以便由它来着手组织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解放斗争。根据同阿尔巴尼亚的一批共产主义者商定并应他们的要求，南共州委委员米拉丁·波波维奇和杜尚·穆戈沙作为代表被派往阿尔巴尼亚，去帮助建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开展武装解放斗争。1941年11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成立大会召开以后，采取解放斗争方针的两党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密切了。共产国际通过南共中央同阿共保持联系。1943年3月，以布拉若·约万诺维奇为首的南共中央代表团出席了阿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团向阿共领导转交了南共总书记铁托的一封信，信中建议正在阿尔巴尼亚顺利发展的人民解放运动建立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基础。通过介绍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发展的经验也给了阿共领导以帮助。而阿尔巴尼亚的解放斗争也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根据南共马其顿省委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达成的协议，1941年底和1942年初阿尔巴尼亚解放运动和马其顿解放运动进行了合作。根据南共中央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代表团的倡议，1943年夏天和秋天斯韦托

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同阿共中央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的接触和达成的协议,是对这种合作的一个新的推动。

除了南共中央于1941年夏天和秋天给予那些从国外来到南斯拉夫以便在意大利北部重建党的领导机构的意共某些领导人以帮助外,1941年底和1942年,当南共的活动扩大到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和伊斯特拉以便开展这些地区的人民解放斗争时,这两个党之间的直接接触和合作开始建立起来。虽然它们之间首先由于在纲领和战略上有分歧而使合作的可能性受到限制,但这一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毕竟在顺利地发展。南共采取了主动,它把积极分子派往这些地区去组织武装解放斗争,并首先依靠参加意共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意大利人。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即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人和克罗地亚共产党人在支持意大利人民的反法西斯运动的同时,强调指出他们也为争取这些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民和克罗地亚人民的自决权而斗争。1943年初,同意大利共产党达成协议,在的里雅斯特除意共组织外,还建立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组织。在工厂建立了工人团结委员会,把斯洛文尼亚工人和意大利工人团结起来。当时还同富尔兰尼亚的意共组织建立了联系。意大利投降时,这一合作扩大了。当时已很发达的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人民解放运动对于在意大利北部毗邻地区组织意大利抵抗运动给予了巨大的帮助。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伊斯特拉、的里雅斯特和富尔兰尼亚的意大利反法西斯分子,主要是工人,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编制内组成了几个旅,后来又成立了“加里波第·纳蒂松”师。南斯拉夫其他地区意大利占领军的士兵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编制内组建了6个意大利旅和“加里波第”师。随着意大利解放运动的发展,边境地区的民族关系问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参加运动的资产阶级政党反对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人民解放运动领导及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的解决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和伊斯特拉问题的办法。意共中央则强调接受这种解决办法有损于该党的政治影响,因而只是

在原则上赞成这些地区人民的自决权，但把具体的解决推迟到解放以后。

在南共中央和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于1941年就南共马其顿省组织的地位及其在反对占领者斗争中的任务问题交换信件后，到1942年下半年保加利亚方面才停止了对南共马其顿省委员会的干涉。由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条件下革命斗争的看法有分歧，两党合作的可能性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这一合作只限于边境地区的接触。塞尔维亚南部和马其顿的南共组织接受了保工人党积极分子和保加利亚占领军中投诚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某些人。1943年12月，马其顿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总司令部决定，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编制内组建“赫里斯托·鲍特夫”营，由转到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方面来的保加利亚士兵组成。

到1942年夏天，南共和希腊共产党组织才在边境地区第一次接触。由于双方在人民解放斗争的战略上，特别是在对马其顿民族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南共中央在1943年里为扩大合作而作的努力未能取得明显的效果。

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中央根据南共中央决议的精神，于1942年通过在科鲁什卡南部地区开展游击斗争，努力同奥地利共产党进行接触。到1943年底，当同奥地利共产党科鲁什卡和什塔耶尔斯卡省领导机构的代表就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帮助建立奥地利游击队和开展合作达成协议后，上述这一点才得以实现。

南共伏伊伏丁那省委员会为同匈牙利共产党和罗马尼亚共产党进行接触的尝试没有取得结果。1942年夏天，在南共伏伊伏丁那省委员会的倡议下，几名南共积极分子到了巴纳特的罗马尼亚部分，后来在那里时而有南巴纳特游击队在活动，但没有同罗马尼亚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

第四章

战争结束阶段的新南斯拉夫

(1944~1945年)

1. 全国解放

战争临近结束。解放南斯拉夫的最后战役。战争中人员和物资的损失。

1943年底和1944年初,反法西斯同盟对轴心国及其盟国的优势在各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轴心国武装力量在遭到多次失败和重大损失以后,在各条战线上都处于守势。红军继续在苏德战场上全线展开进攻。在粉碎了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后,红军解放了苏联辽阔的地区,向苏罗边境突进,击溃了芬兰的抵抗,并于1944年8月底抵达华沙近郊。此时英美军队粉碎了德军在意大利冬季防线上的防守,继续向意大利北部挺进。英美空军加紧轰炸德国,大西洋和地中海上的海战表明盟军占有明显的优势。最后,1944年6月6日,英美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它们攻入法国后,在法国抵抗运动的配合下,于8月底解放了巴黎。盟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也顺利地展开。

欧洲和亚洲被占领国家里的解放运动也加强了。意大利和法国强大的抵抗运动同英美军队密切合作。1944年8月,华沙和斯洛

伐克发生了起义。

在盟军节节胜利的影响下法西斯阵营的危机加深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它们的军队在东线遭到沉重的打击后，于1944年初先后企图同盟国政府进行接触，以求单独媾和。芬兰在它的军队被击败后于1944年8月要求停战，并立即签了字。德国也开始出现严重的动乱迹象：大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开始减少对希特勒的支持，1944年7月20日企图刺杀希特勒的行动是加强反抗的反映。

希特勒不顾一切地决心把战争进行到底。德国将军曾建议把分散在辽阔地带的已遭严重削弱的德国部队撤到靠近德国边境的地方，但希特勒拒绝了这一建议，顽固地坚持保卫“欧洲堡垒”。希特勒为了制止霍尔蒂政府的媾和企图，命令德国部队占领匈牙利，并于1944年3月完成了这件事。60多万德国士兵在罗马尼亚防守与红军对峙的战线，并保证使罗马尼亚俯首听命。还必须在希腊驻扎德军的强大兵力和在南斯拉夫战场上控制住重要的阵地，以保住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法西斯制度。鉴于反希特勒同盟各国之间有可能围绕欧洲的战后制度和控制权问题发生冲突，纳粹分子加强了反共宣传。同时，希特勒加紧制造新武器，希望通过使用新武器使力量对比变得对自己有利。

德国最高指挥部对意大利投降后南斯拉夫战场上出现的局势表示忧虑，考虑到英美部队1944年春在巴尔干登陆的可能性，便命令于1943年冬到1944年春向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发起进攻，因为不然的话，“面对将要发生的大举进攻，无法守住亚得里亚海沿岸”。当时在南斯拉夫除了有8个保加利亚师、2个匈牙利师、几支意大利法西斯部队和卖国贼部队外，还有15个德国完整的师和3个不完整的师、12个独立团和约30个卫戍营和警卫营。

1943年南斯拉夫战场发生转折之后，在南斯拉夫最高司令部的指导思想中，原来的全面游击战的战略让位给了要求彻底解决问题的战略。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不仅由于军事方面的原因，而且还由于必须保障当时已取得的革命成果，因为新南斯拉夫要是

没有有利的国际地位,这些成果就可能发生问题。为此,向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提出了进一步扩大解放区的任务。而人民解放军面临的与盟军配合的任务也要求改变作战方法。

1943年12月到1944年1月时期的标志是德军发动攻势,其主要目标是占领亚得里亚海沿岸和岛屿,消除人民解放军部队从黑山和东波斯尼亚向塞尔维亚挺进的危险,保证对连结亚得里亚海和内陆的交通线的控制。虽然德军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1944年上半年南斯拉夫战场上战斗的主要特点,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部队的连续不断进攻。

由于红军逼近巴尔干,英国政府对新南斯拉夫的领导加紧施加压力,要求它接受同彼得国王的协商,英国认为彼得国王在塞尔维亚拥有据点和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塞尔维亚的军事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与日俱增。有鉴于此,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于1944年早春采取新的措施,加紧在塞尔维亚地区开展斗争。当时根据最高司令部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强大的部队把作战行动从黑山转移到塞尔维亚的西部地区。在塞尔维亚南部,到1944年年中人民解放军部队已发展到5个师,打了许多胜仗,威胁到莫拉瓦河南部河谷的巴尔干重要交通线。在马其顿人民解放运动也蓬勃发展,1944年早春在那里建立了广阔的解放区。1944年5~6月,保加利亚和德国强大的兵力发动了攻势,经过长期而艰巨的战斗以失败而告终。

德国最高指挥部鉴于南斯拉夫战场上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不利,而且争夺巴尔干和中欧的决战即将来临,于是决定用空降部队和摩托化部队配合进攻德尔瓦尔,企图消灭以铁托为首的新南斯拉夫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从而使人民解放军失去首脑机关,在其队伍中造成混乱和涣散。在1944年5月25日德国部队发动的战役中,由于遭到空降伞兵的突然袭击,德尔瓦尔的某些机关特别是居民遭受重大损失,但德国人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铁托元帅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于6月3日夜间乘飞机转移到了意大利,随后又从意大利

利到了维斯岛。南共中央、最高司令部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都转移到了这个岛上。

尽管德国和乌斯塔什宣传机构密切注视这次战斗的进程，散布所谓战胜铁托军队的消息，但仍无法掩盖自己的失败。人民解放军处处打胜仗。根据德黑兰会议精神和最高司令部同英美地中海指挥部达成的协议，人民解放军和盟军之间开展了日益密切的合作。1944年2月23日以科尔涅耶夫中将为首的苏联军事使团抵达最高司令部，接着美国军事使团也到来。人民解放军的使团也被派往莫斯科。通过空运和海运，人民解放军部队从盟国那里收到了大量武器和其他物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部分英美部队在亚得里亚海上配合作战。人民解放军中越来越多的伤员被送往设在意大利的盟军医院，进行复杂的外科手术。在盟国帮助下，举办了首批飞行员和坦克兵训练班，为建立空军和坦克部队进行准备。某些南斯拉夫船队的船员转到人民解放运动一边，使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得到加强。由原意大利统治地区应征参加意大利军队的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以及集中营里的南斯拉夫难民所组成的新的海外旅，也开到了南斯拉夫国内。

1944年年中，最高司令部估计了欧洲战场局势的发展，特别是估计到红军左翼突破罗马尼亚边界之后有可能很快开始进行争夺巴尔干的决战，于是着手制定彻底解放全国的第一阶段战役的计划，把解放塞尔维亚作为作战的基本战略目标。军事战略因素和政治因素对作出这一选择也有影响。塞尔维亚的地理战略地位对即将爆发的争夺巴尔干的战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但如此，鉴于德国有大批部队驻扎在希腊，因此控制巴尔干的主要交通线及其枢纽——贝尔格莱德，是保证红军左翼即将向潘诺尼亚低地进攻的条件。与此同时，塞尔维亚的解放将粉碎切特尼克分子和奈迪奇分子的最后一个强大的据点，而力图复辟旧制度的人仍对这些分子寄予希望。

随着战役的重心转移到塞尔维亚，最高司令部还计划发动解

放达尔马提亚的战役。这里也考虑到，解放达尔马提亚沿海和岛屿会使英美在南斯拉夫登陆的理由不能成立。

按照最高司令部的计划，1944年7月以前要加紧准备塞尔维亚的战役，除了已进驻塞尔维亚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外，计划参加这一战役的还有黑山和东波斯尼亚的7个师。同时，德国东南战线指挥部遵照希特勒的保卫巴尔干的决定，从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抽调兵力加强在塞尔维亚的部队，并于7月下半月在塞尔维亚南部、黑山和东波斯尼亚发动了攻势。来自黑山和波斯尼亚的人民解放军的几个师进行了艰苦的战斗，从1944年7月底到9月初，完成了向塞尔维亚的进军，并在塞尔维亚人民解放军部队的配合下控制了广大的地域，在莫拉瓦河的南部和西部河谷切断了交通线，击溃了奈迪奇和切特尼克的大量部队。

德国在巴尔干的地位急剧恶化。红军左翼于8月20日攻入罗马尼亚。8月23日罗马尼亚发生起义，法西斯政府被推翻，罗马尼亚解除了同轴心国的结盟关系。红军部队于9月6日向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边境的多瑙河挺进。在这些事态的影响下，保加利亚的统治集团力图使国家在没有较大震动的情况下退出战争。保加利亚政府于8月17日命令自己的部队从1941年底按照希特勒的指示占领的那部分塞尔维亚地区撤出，但不从保加利亚在四月战争后瓜分南斯拉夫时夺取的那部分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地区撤出。在南斯拉夫领土上的保加利亚部队指挥部按照保加利亚政府“宣布中立”的意图，拒绝了塞尔维亚和马其顿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关于共同打击德国人或交出武器的建议；于是德国人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解除了保加利亚部队的武装。只有一部分保加利亚部队撤回保加利亚，小部分则被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解除了武装。苏联政府于9月5日向保加利亚宣战，接着红军部队开进保加利亚。在这些事态的影响下，9月9日保加利亚人民举行起义，亲法西斯的政权被摧毁，建立了祖国阵线的政府。

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切特尼克分子和奈迪奇分子分崩离

析。但奈迪奇和米哈伊洛维奇仍决心顽抗到底，于8月底宣布总动员，并草拟了关于德国人撤退后在塞尔维亚接管政权的指令。奈迪奇于9月6日下令，要自己的部队接受米哈伊洛维奇的指挥。他们的这些活动受到了下列消息的鼓舞：一方面美国军事使团于8月28日抵达切特尼克指挥部；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向铁托提出在塞尔维亚停止“自相残杀”的建议，继续主张人民解放军同仍然忠于卡拉乔尔杰维奇王朝的切特尼克分子“和解”。

直到1944年9月初，希特勒仍然不同意德国的“E”集团军群从希腊撤出和缩短巴尔干战线。当时只计划沿着蒂米什瓦拉—杰尔达普—尼什—阿尔巴尼亚北部建立防线。为实现这一计划，希特勒命令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边界开辟防线，以便固守莫拉瓦河谷的交通线，为此从这个集团军群中抽调一些部队到塞尔维亚。人民解放军的部队继续发动攻势，到9月中旬已控制了塞尔维亚的大部分地区，并在多瑙河和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边境同红军部队建立了联系，为进行解放贝尔格莱德的战役创造了条件。9月中旬，根据最高司令部的决定，由进入塞尔维亚的人民解放军部队组建成第一集团军群。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商谈红军和人民解放军协同作战的问题，铁托于1944年9月19日从维斯岛赴莫斯科，代表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同红军最高统帅部达成协议：“考虑到同在匈牙利的德国部队和匈牙利部队作战的利益”，红军部队暂时通过南斯拉夫的一部分领土，但那里的南斯拉夫政权机关继续行使职权，红军部队完成任务之后便撤离南斯拉夫。苏联塔斯社当时公布了这一协议的内容。这对加强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的国际威望和声誉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应苏联政府的要求，铁托接受了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政府的请求，让它的部队参加解放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一部分地区。

在这个时期里，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在向塞尔维亚挺进中，粉碎了切特尼克分子和奈迪奇分子的最后抵抗。德拉扎·米哈伊洛维

奇于1944年9月底带领约1.5万名切特尼克士兵撤到波斯尼亚东部,而米兰·奈迪奇解散了卖国政府和在塞尔维亚的其他管理机构。10月初,红军和人民解放军部队打响了解放塞尔维亚和伏伊伏丁那的最后战役。经过激战,到10月20日解放了贝尔格莱德以及伏伊伏丁那的大部分地区,接着又解放了塞尔维亚的大部分地区。10月底,红军乌克兰第二和第三方面军的一部分转移到南斯拉夫北部边界,并进入匈牙利,到1944年底在南斯拉夫只留下苏联一个军。

塞尔维亚和伏伊伏丁那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贝尔格莱德的解放,使德国最高指挥部关于从希腊撤出“E”集团军群和建立蒂米什瓦拉—杰尔达普—尼什—阿尔巴尼亚北部防线的想法遭到彻底失败。这个集团军群的主力被迫经过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桑贾克、黑山和波斯尼亚撤退,进行了近三个月的防御战,于1944年底建立了比原计划偏西约300公里的防线。这时又出现了斯雷姆战线,1944年冬在这条战线上展开了激战。在1944年10~12月期间,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同这个集团军群的部队和卖国贼残余部队作战中终于解放了马其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及黑山。在这些战役中,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政府的部队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部队配合作战。

人民解放军第八军及其海军根据最高司令部的指示精神进行了三个月的战斗,到1944年12月初,经过多次连续的战役,终于解放了达尔马提亚。

在进行解放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马其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黑山和达尔马提亚的最后战役时,人民解放军有8个军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控制了大部分地区,日以继夜地进行胜利的战斗,首先攻击交通线,使德军无法向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盟军战线上的重点战役转移兵力。

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彻底解放使南斯拉夫战场上的战略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建立了稳固的后方,人民解放军的主力转向阵

地战,而其余的大量兵力控制着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后方广大地区,继续采用原来的作战方法,使德军和卖国贼部队的后方瘫痪。由于缴获战利品、盟国的援助和在解放区组织生产,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大大加强了。在过去的战斗中有大批新战士加入人民解放军队伍。1944年底,人民解放军有57个师,约60万名战士。根据这些变化,最高司令部于1945年1月1日决定,把在前线的部队组建成3个集团军,后来又组建了第4集团军。1945年3月1日,人民解放军改名为南斯拉夫军队,最高司令部改组为总司令部。建立了一条从多瑙河到亚得里亚海的战线,这条战线一边依靠红军在匈牙利的战线,另一边通过亚得里亚海同英美部队在意大利的战线联系,南斯拉夫军队承担了解放南斯拉夫其余地区和消灭南斯拉夫领土上的德军和卖国贼部队的任务。

1944年底至1945年初,德国的处境已经无望,但德国武装力量仍到处顽抗,还时而转入反攻。1945年2月4~11日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会议,会上确定了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的立场,并就在战败的德国领土上划分盟国占领区问题、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问题、德国赔偿给盟国造成的损失的义务问题达成了协议。关于战后世界组织问题,决定成立一个普遍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以维护和平和和平合作。盟国通过欧洲解放宣言作出保证:它们将帮助解决某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将尊重大西洋宪章关于各国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的原则。会上专门讨论了波兰和南斯拉夫的问题。1945年5月初盟军的联合攻势粉碎了德国的抵抗,德国被迫于5月9日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在欧洲战争的最后日子里,1945年4月25日,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50个国家代表参加的联合国会议在旧金山开幕。会上提出了未来的世界和平与安全组织的原则,这些原则写进了1945年6月26日公布的《联合国宪章》。1945年7月17日~8月2日在波茨坦召开的“三巨头”会议上确定了对待战败的德国的方针。在苏联向日

本开战后，特别是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引起的灾难性破坏后果之后，日本于1945年9月2日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

在发起彻底解放全国的战役前，南斯拉夫战场上敌方有45万多名士兵的德国“E”集团军群和23万士兵的各种卖国贼部队。卖国贼部队的主力是“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于1944年底在合并了“卫国军”和乌斯塔什部队后，改组为17个师，约有15万人。战役于3月20日开始。当时拥有80万兵力的南斯拉夫军队在前线和后方开展行动，于5月初突破了南斯拉夫西部边界，解放了的里雅斯特、戈里察和特尔日奇，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西部包围了德军和卖国贼部队的主力。德军和卖国贼的残余部队千方百计地想逃出南斯拉夫，向西方盟军投降，以逃避他们直到最后一天仍在对南斯拉夫居民犯下的罪行的责任。他们在德国宣布投降后仍继续顽抗，只是到了5月15日才缴械。

在解放南斯拉夫的最后战斗过程中，通敌卖国势力开展了紧张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克罗地亚独立国”政府在以阿洛伊集耶·斯特皮纳茨大主教为首的上层天主教士的支持下，采取措施想获得西方盟国的帮助以挽救这个卖国政权。1945年3月24日在萨格勒布召开的主教会议通过了一项呼吁书，要求“保护信仰”、维护神职、反对“非正义的迫害”、反对共产主义、保卫“克罗地亚独立国”。接着乌斯塔什政府立即向西方盟国送交备忘录，要求保护它的武装力量。克罗地亚农民党首领马切克等人宣传西方盟国将能阻止克罗地亚革命的胜利，在这种宣传的影响下，一部分人民群众发生了动摇。斯洛文尼亚反革命势力也大肆活动，企图宣布斯洛文尼亚“卫国军”为“斯洛文尼亚人民军”并成立“人民政府”，以便在德军撤退后接管政权，向西方盟国寻求支持。所有这些企图都没有得逞，也没有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广泛的反响。最后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是以德·米哈伊洛维奇为首的切特尼克部队，它们仍寄希望于国内的变化，特别是寄希望于盟国之间的冲突，于是决定继

续抵抗,但于1945年5月中旬在泽伦戈拉山广大地区里被歼灭。残存部队,包括米哈伊洛维奇本人,躲进了森林。乌斯塔什分子、切特尼克分子、阿尔巴尼亚“民族阵线”分子和其他卖国贼部队的零散残部躲藏在其他地区,其中有些人奉上级命令潜伏下来,以便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

在被占领期间和进行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南斯拉夫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这是法西斯占领者残暴统治的结果,也是4年战争中战斗的性质和形式以及其他多种斗争和抵抗的形式所决定的。

人民解放军和后来的南斯拉夫军队在战争中牺牲了约30.5万名战士,受伤的有42.5万名战士。南斯拉夫的平民遭受了更大的牺牲,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受到占领者及其帮凶暴行的摧残。约有140万南斯拉夫人作为人民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法西斯恐怖统治的受害者而牺牲,或作为卖国贼部队的士兵而丧生,而在各种集中营中的死亡者则更多。仅在南斯拉夫领土上就有70多个集中营,这个数字说明了这种残害生灵的机构系统是多么发达。有些集中营是在占领之后由占领当局和卖国政权立即决定建立的,并一直保留到战争结束;而其他一些则作为收容营以安置需要迁移的居民,或关押在某些战役中被俘的人质或其他人员,然后把他们送进集中营或送去强制劳动。乌斯塔什分子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内对塞尔维亚族居民犯下了许许多多的罪行,在南斯拉夫最大的亚塞诺瓦茨集中营里约有70万人被杀害,其中大部分是塞尔维亚人。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人被关押在南斯拉夫境外的集中营里,据查实,这种集中营有69个。约有9万名南斯拉夫人在这些纳粹集中营里关过(奥斯威辛、毛特豪森、达豪、诺恩加梅、布痕瓦尔德、特莱勃林卡、卑尔根—贝尔森、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其中约有6万人死在那里。成千的南斯拉夫人被关押在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和挪威的集中营里。

在占领军和卖国贼部队向某些起义根据地发动进攻的过程中

大批南斯拉夫公民遭难。除了为被杀的占领军士兵而向居民实行报复的命令和枪杀人质的制度外，占领军和卖国贼部队司令部在作战命令中规定对某些地区实行大“扫荡”，他们的部队野蛮地杀害老百姓、妇女和儿童，——从大批枪杀到焚烧房屋和畜舍。

南斯拉夫牺牲了170多万人，约占全部人口的11%，是除苏联和波兰之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最大牺牲的国家。

除了人员牺牲之外，在4年的战争中南斯拉夫还遭到其他的损失和严重的破坏。曾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数万名南斯拉夫公民特别感受到这一点。约有17万名旧南斯拉夫军队的官兵，主要是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在四月战争中被俘，他们在德国俘虏营里度过了战争的岁月。由于纳粹分子不遵守关于俘虏地位的国际公约，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约有27万南斯拉夫公民被运往德国从事强迫劳动，其中有一部分在对德国战时经济有重大意义的南斯拉夫工矿企业里从事强迫劳动。约有53万南斯拉夫居民被强迫搬迁或作为难民在他乡度过了战争岁月。约有32万南斯拉夫公民曾在卖国贼部队和占领军中服役。此外，几乎没有一个村庄未成为战斗场所或未遭占领者洗劫，尤其是许多起义地区是反复拉锯和长期作战的场所。在这场战争中，前线与后方、士兵与平民之间通常的界线是不存在的。全体居民，包括儿童、妇女和老人，忍受了战争带来的贫困和精神创伤，他们经常在人民解放军部队的掩护下撤退或躲藏起来，忍受着饥饿、严寒、轰炸、伤寒和其他疾病的折磨。

南斯拉夫还遭到重大的物质损失和破坏。有822,237座建筑物被毁或受损，有330万居民无家可归，露宿街头。有56%的农具被毁坏，有250万头即60%的大家畜和24%的果园被毁。有223个矿井和近2/5的工业被破坏或受损坏。57%的铁路、80%的火车头、90%的车皮和50%的轮船遭到破坏。几乎所有钢结构的大型桥梁、81%的小型水泥桥和钢桥被炸毁。许多文化、科学、教育和卫生设施和文化古迹被破坏。许多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被

劫掠。

2. 为争取新南斯拉夫得到 国际承认而斗争

英国倡议全国解放委员会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进行协商。铁托一舒巴希奇协议和国内反革命。铁托前往莫斯科。贝尔格莱德协议和雅尔塔会议的建议。巴尔干合作问题。

1944年，当预示着德国行将覆灭的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在盟国的关系中日益明显地出现战后制度的问题。由于苏联红军部队逼近东欧和巴尔干国家的边境，由于在这些国家里解放运动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得到了加强和国内各阶级力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这些国家的命运问题提到了首位。当时英国政府政策中产生了由盟国对这些国家的命运“分担责任”的思想。丘吉尔解释说，这是由于盟国必须保证做到：使解放了的人民在胜利后能获得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权利；而实际上则是想用盟国之间的协议来阻止斯大林在东欧国家和巴尔干打算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同时，英国政府还提出倡议，要求欧洲这一地区被占领国家的流亡政府和解放运动之间实行妥协。

盟国政府在德黑兰会议上就援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本身就已反映出它们倾向于用新的方式着手解决所谓南斯拉夫问题。英国政府朝着这个方向又提出倡议，力图使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改变政策，为同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进行协商开辟道路，以便成立王国联合政府。然而，丘吉尔在力图实现这一想法时，遇到了流亡政府和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的抵制。这是已取得基本胜利的革命力量和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社会阶级的统治集团之间不可弥合的鸿沟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妥协的办法不符合

任何一方的要求。旧社会制度的统治集团不相信能够用妥协的办法改变在战争中形成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实际关系并保证恢复旧制度，而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也不想作有损于革命成果的让步。

只是经过数月的努力和对双方都施加压力，才为实行妥协的想法创造了条件。丘吉尔征得苏联政府的同意：同铁托协商成立南斯拉夫王国新政府，同时迫使博日达尔·普里奇政府辞职。接着他在1944年5月17日的信件中通知铁托：彼得国王决定委托原克罗地亚省总督伊万·舒巴希奇组阁。舒巴希奇由于斯洛博丹·约万诺维奇政府执行大塞尔维亚主义方针和支持切特尼克分子而较早地脱离了这个政府。丘吉尔在信中要求铁托在成立新政府中予以合作，说该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人民的一切力量去反对占领者。他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吸收人民解放运动的几名代表参加王国新政府，从而使这个运动服从流亡中的原统治集团。当时在希腊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选派若干代表参加了希腊的流亡政府。

南共中央一开始就十分清楚，英国政府这一倡议的目的是阻止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发展起来的革命进程。另一方面，日益明显的是，尽管在世界大战中整个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和苏联政府明显地倾向于人民解放运动，但苏联政府的政策在对待解决“南斯拉夫问题”的态度上仍没有变化。在这种条件下，捍卫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决议的斗争首先成了争取新南斯拉夫独立的斗争。因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新南斯拉夫领导在国际关系中即在盟国关系中争得独立因素的地位，从而能继续争取对解决“南斯拉夫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这方面，过去的经验是令人鼓舞的。人民解放运动首先由于自己取得的成就和胜利而登上了国际舞台，迫使盟国同它打交道，并早在1941年就坚决抵制盟国想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解放斗争完全服从于它们的军事和政治利益的企图。正因为如此，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被承认为盟国与之进行合作的重要军事力量。各盟国政府虽没有打算同南斯拉夫流亡

政府断绝关系,但也不能对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置若罔闻。丘吉尔在竭力维护南斯拉夫王国统治阶级的地位的同时,不得不接受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作为伙伴,并作出不小的让步,包括抛弃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和博日达尔·普里奇政府,接着公开承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是解放斗争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这一斗争中的团结的鼓舞者。尽管对共产党人有根深蒂固的保留和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感到惧怕,但英美统治集团逐渐明白了一个真相:在南斯拉夫存在着一种从人民的解放和民主愿望中产生的土生土长的独立运动。西方盟国驻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外交官或驻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的军事使团都相信这一点。

南共中央决定接受盟国政府关于全国解放委员会同伊万·舒巴希奇就成立联合政府进行谈判的要求,从而向缓和“南斯拉夫问题”的尖锐性和加强新南斯拉夫在盟国关系中的地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然而,作出这一让步有一个条件,不允许损害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基本决定。

以铁托为首的全国解放委员会代表团于1944年6月在维斯岛同伊万·舒巴希奇谈判时坚持这一立场,拒绝了丘吉尔关于在铁托和彼得国王达成协议的基础上成立以舒巴希奇为首的王国统一政府的建议,也拒绝了舒巴希奇关于以全国解放委员会委员参加王国政府的方式成立联合政府和承认彼得国王是最高统帅的建议。协议是根据全国解放委员会代表团的建议达成的。协议规定,参加王国流亡政府的应是没有因同占领者合作而名声败坏的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在国外援助军队和人民,谴责国内同占领者合作的各势力,同全国解放委员会配合行动以便尽快地建立统一的国家代表机构。还一致同意不再提国王和君主制的问题,国家政体问题将在解放后根据人民的自由意志来解决。商定由全国解放委员会和伊万·舒巴希奇政府就达成的协议发表宣言。

有关的任何一方都对协议的这一内容不完全满意,至少是倡议签订这一协议的英国政府不完全满意。

在人民解放运动队伍中对协议的内容感到不满意的理由最少,尽管同意进行这种谈判意味着放弃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关于剥夺流亡政府合法权利的决议,而同舒巴希奇签订协议是向已遭失败的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某种让步。不过关于签订协议的最初消息还是在战士和人民中引起某种不安,因为他们把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看成是彻底清算旧势力的结果。有鉴于此,铁托在签订协议之后立即向全国和各省的反法西斯委员会说明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同意进行谈判的理由和协议的内容,强调指出并没有因此而损害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作出的让步“基本上只限于:目前把承认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的问题从议程上实际取消,但却为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同在外国的政府的联合开辟了前景”,如果这个政府“正确地 and 真心诚意地”执行协议的话。

与此相反,英国政府除了使全国解放委员会同意同舒巴希奇谈判这一点外,没有从这一协议中达到任何一个预期的目的,就连成立以伊万·舒巴希奇为首的王国联合政府这个最主要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彼得国王的地位依然如故,舒巴希奇根据协议条款成立的政府的实际职能只不过是起着为了人民解放运动的利益履行对外事务的机关的作用。因此英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在根据维斯岛协议发表宣言以前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英国政府估计到时间对人民解放运动有利,决定对成立以伊万·舒巴希奇为首的联合政府一事施加压力,首先减少在南斯拉夫战场上的军事援助和盟国空军的参战。在这种微妙的形势下铁托向苏联请求援助。1944年7月5日在给斯大林的信中,铁托指出同西方盟国关系中的问题,强调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需要得到坦克和飞机装备;指出新南斯拉夫的领导坚决要求,西方盟国军队一旦在南斯拉夫的任何地方登陆作战,都应尊重南斯拉夫的军事当局和民政当局。鉴于同西方盟国的关系问题,铁托特别强调,如果红军“通过喀尔巴阡山和罗马尼亚向南挺进”,那是苏联对新南斯拉夫的最大

支持。

尽管如此，新南斯拉夫的领导并没有在压力下退让。它将坚持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人民解放军新的伟大胜利即将到来，特别是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塞尔维亚开始发动的攻势预示这一胜利的到来，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英国政府为了保证国王和王国政府相应的地位，终于接受了以铁托和舒巴希奇在维斯岛签署的协议的内容作为出发点。在英国首相的倡议下，铁托和丘吉尔于8月中旬在卡塞塔和那波利进行了会谈。铁托同意丘吉尔的如下建议：尽快发表关于伊万·舒巴希奇政府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之间合作的宣言，包括关于人民解放运动不把共产主义强加于国家，即解放后让人民决定社会制度的重大问题的声明；但应铁托的要求推迟讨论丘吉尔提出的关于铁托同彼得国王会见的建议。

丘吉尔无疑考虑到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关于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归意大利统治的那部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领土并入南斯拉夫的决议，于是主张必须由和平会议来解决这些领土的归属问题，在此之前由盟国军事管制。丘吉尔还要求铁托对盟军可能在伊斯特拉登陆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在这一战役中可能作出的贡献表明自己的看法。铁托声称愿意配合作战，但强调伊斯特拉、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和科鲁什卡实际上是南斯拉夫领土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部队已在那里活动，盟国必须尊重当地人民解放运动的政权机关。丘吉尔接受铁托关于盟国增加军用物资援助、归还盟国控制的南斯拉夫船只、对南斯拉夫的现实和人民的情绪给予更多的谅解的建议，但以下述要求为条件：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要更加关心彼得国王，同王国政府紧密团结。丘吉尔强调英国同保加利亚处于战争状态，告诫铁托英国政府反对巴尔干发生变化，特别是反对提出马其顿问题，并告知英国政府坚决反对提出建立巴尔干联邦的思想，而在南共努力发展巴尔干各国人民解放运动更有成效的合作的活动中是存在这一想法的。

尽管在这次会晤中彼此表现出对立的观点，但铁托作为英国首相的平等伙伴进行会谈这一事实本身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对加强新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和伊万·舒巴希奇政府关于达成协议的宣言很快就发表了。舒巴希奇政府在自己的声明中赞扬人民解放军，谴责卖国贼，号召一切力量团结起来，在铁托元帅领导下为彻底解放祖国而斗争；接受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全国解放委员会的“临时管理”，赞成民主联邦的南斯拉夫，支持把1918年以后处在南斯拉夫境外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地区并入南斯拉夫，愿为人民解放军的供应和国家的恢复作出努力。全国解放委员会在自己的声明中再次强调，人民将在解放后决定国家制度的最终形式，解放运动及其军队不会用武力强制推行共产主义。

这一场强加给新南斯拉夫领导的复杂斗争的第一阶段就这样结束了；这场斗争的目的是想通过英国和纠集国内残存的反革命势力来阻止南斯拉夫的革命变革。

指望用外部强加给人民解放运动的妥协政策来纠集和加强国内反对这一运动的势力并建立有利于他们的均势，这是没有根据的妄想。与此相反，倒是实现了南共中央的预见：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主要决议仍然有效的条件下接受丘吉尔的倡议这样一种妥协，有助于加深已经开始的反革命阵线瓦解的过程，而不是反革命阵线联合和加强的起点。所有较为重要的资产阶级集团作为与敌人合作的统一战线的一部分，都已土崩瓦解。因此，这些集团的任何一个领导机构都不认为有可能靠自己在人民中的影响作为人民解放运动的平等伙伴出现。

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处于最深刻的危机之中。它由于采取了多种多样的与敌人合作的形式而几乎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后备力量。不但在主张大塞尔维亚政策的人中已不可能找到适合于同人民解放运动实行妥协的人选，而且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表示反对舒

巴希奇和反对协议，仍然不承认人民解放运动，坚决主张盟国有义务保证恢复旧秩序。他们甚至在伊万·舒巴希奇政府和彼得国王根据铁托和舒巴希奇关于撤销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和解除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最高指挥官职务的协议于8月25日和29日分别发表宣言和决定之后，仍然指望切特尼克分子作为自己在国内的可靠支柱。8月底以麦克道威尔上校为首的美国军事使团抵达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一事使一些人产生某种幻想。美国统治集团派出这个使团是为了表示对签订协议的政策，特别是对谴责切特尼克分子持保留态度，但罗斯福总统在丘吉尔提醒只有铁托和舒巴希奇的协议才提供了彼得国王回国的可能性之后，立即命令撤回这个使团。此外，同切特尼克的任何协作都失去了现实的基础，因为使切特尼克残余部队迅速彻底瓦解的战斗过程正在进行中。

其他战前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的首领也不认为铁托和舒巴希奇的协议将保证自己有现实的可能来决定国家制度问题。以弗拉特科·马切克为首的克罗地亚农民党领导把“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卫国军”看作该党的武装力量，建议克罗地亚人民解放军同这支卖国贼部队合并，以此来实现该党同人民解放运动的合作。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乌斯塔什分子的某些首领同该党一些领导人合作，准备寻求西方盟国的支持以挽救傀儡的“克罗地亚独立国”，但这种活动很快就碰壁了。与此同时，在铁托和舒巴希奇协议的影响下，特别是克罗地亚农民党的下层领导人要求同人民解放运动合作的进程加速了。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协议可以使该党作为共产党的合作伙伴而在克罗地亚人民中重新成为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另外一些人则真心诚意地接受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主张，谴责自己党的领导人。维斯岛协议引起了斯洛文尼亚平民党上层的分化：在伦敦的米哈·克雷克坚决反对协议，而该党的某些领导人则认为协议为该党提供了最后的机会，以便在西方盟国的帮助下并依靠国内残存的据点，保证自己能够参加斯洛文尼亚人的“解放和统一”，从而保证在解决战后制度问题中的地位。

英国政府看到南斯拉夫的战事和政治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解放运动的方向发展,所以在铁托和舒巴希奇协议发表后,更加坚决地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新南斯拉夫的领导再次拒绝了英国的要求。9月12日,铁托在维斯岛发表讲话,表示坚决反对英国的压力。铁托提到一句谚语:“别人的东西我们不要,自己的东西我们不给”,从而强调了南斯拉夫决心捍卫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意大利统治的伊斯特拉、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权利。英国政府把铁托代表全国解放委员会(避开了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同红军最高统帅部就在南斯拉夫配合作战达成的协议当作铁托靠近苏联的征兆,接着便威胁说,英国政府将只承认伊万·舒巴希奇政府,不再为建立联合政府而努力,并指责塞尔维亚人民解放军挑起内战。

铁托莫斯科之行的目的不仅限于就即将进行的战役达成协议。在铁托和舒巴希奇协议的结局日益临近时,有必要更多地了解苏联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真实看法,以便更有把握地确定在争取国际上承认新南斯拉夫和粉碎反革命残余势力抵抗的斗争中的立场和策略。斯大林提翻铁托不要轻易地拒绝英国的主张和要求。他不但支持协议,而且建议必要时还可以接受国王,然后在某个适当的时机把他废除。铁托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力求使斯大林相信南斯拉夫革命的力量,指出南斯拉夫革命的领导没有理由也决不会背离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铁托不知道斯大林的立场是斯大林同丘吉尔商定对南斯拉夫实行共同政策的结果,所以认为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南斯拉夫发生的革命变革的深度和实行这一变革的力量没有较全面的了解。几天后,1944年10月9日,斯大林和丘吉尔在莫斯科开始会谈。两个大国为达成在巴尔干、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划分责任”的协议所作的长达数月的努力终于在这里结束了。根据这个协议,它们在南斯拉夫的影响是一半对一半,为此必须通过相应地实现铁托和舒巴希奇协议、首先通过成立联合政府来保证做到这一点。

在铁托同斯大林谈话之后，南共中央对下列估计再也没有怀疑了：新南斯拉夫领导如决定拒绝同舒巴希奇达成协议这种外部强加的解决办法，它就会陷于孤立。因此它终于接受了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以便保证国际上对新南斯拉夫的承认；同时它也承认了旧形式的南斯拉夫，以便在筹备和召开立宪议会过程中确认并贯彻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决定这么做是出于下列估计：鉴于实际的力量对比，这里涉及的确实只是确认已赢得的革命胜利的方式。1944年秋，在解放全国的最后战役的第一阶段中这一点已十分明显了。1944年10月初，南共中央决定接受关于着手实现铁托和舒巴希奇协议的要求。

1944年11月1日在贝尔格莱德同伊万·舒巴希奇达成的新协议规定：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在选举前仍是立法机关，成立联合政府来确定立宪议会的选举，在最终决定国家政体以前国王把自己的权力交给摄政委员会，摄政委员会的委员在征得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的同意后任命。协议也确定了联邦制原则，规定联合政府要发布关于民主权利和自由，包括信仰、言论、结社、出版自由以及所有权和私人经营权的宣言。不久以后，12月7日，在舒巴希奇的坚持下协议补充了一条：联合政府应尽快建立“民政机构”，着手筹备立宪议会的选举以开展恢复工作，这次选举最迟应在解放后3个月内进行；应保证各政党和团体的工作，根据民主的精神建立司法机关。

谈判期间，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没有减少对南斯拉夫领导的压力，指望它会在成立联合政府方面被迫作出让步，从而为已被革命赶下历史舞台的统治阶级的活动创造尽量有利的条件。丘吉尔在1944年12月的信中毫无顾忌地告知铁托，他已同斯大林就在南斯拉夫采取共同政策达成了协议。新南斯拉夫的领导对这种压力作出了坚决的和毫不动摇的回答，因为这种压力直接威胁到南斯拉夫的主权，并使革命变革的实质受到损害。全国解放委员会拒绝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因为它提出的条件为西方盟国

的机构直接干涉南斯拉夫内部问题提供了可能。在不排除直接军事威胁的紧张气氛下，铁托命令人民解放军各指挥部驻守和控制南—希边境和亚得里亚海沿岸，不允许英美部队在不征得全国解放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的同意下入境和登陆。

1944年12月底，紧张的关系有了缓和，英国的压力也减弱了。这是由于受到协议内容影响的结果，因为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同意作出一定的让步，包括允许恢复资产阶级政党。在这一切之后，当国王彼得坚决反对协议并要求舒巴希奇辞职时，他只得到宫廷集团和最极端的大塞尔维亚分子的支持。丘吉尔拒绝了国王彼得提出的要盟国保证恢复旧秩序和君主制并不惜代价进行公开武装干涉的要求，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实际上，由于国王反对盟国赞同的贝尔格莱德协议，斗争的重心已转移到国内关系方面，而在这种关系中，革命的社会力量占有绝对优势。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已解放的塞尔维亚的群众性游行示威中，十分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广大阶层人民反对国王彼得回国的情绪，以及他们对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决议的支持和坚持走革命道路的决心。国王彼得处于孤立，于1945年1月底终于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摄政委员会。

不久，1945年2月11日，盟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为彻底解决所谓南斯拉夫问题创造了条件，建议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和伊万·舒巴希奇政府执行贝尔格莱德协议，扩大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组成人员，让那些没有因同占领者合作而声名狼藉的南斯拉夫王国最后一届国民议会议员也参加，委员会的立法文件事后需经立宪议会批准。

在彼得国王发布关于任命摄政委员会委员的命令之后，1945年3月7日成立了由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任主席的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政府。在这个政府中，代表资产阶级势力的是伊万·舒巴希奇、米兰·格罗尔和尤拉伊·舒特伊。政府成员的绝大多数是共产党的最杰出的领导人和人民解放斗争的组织者。政府在自

己的宣言中特别指出，政府今后工作的出发点是体现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决议中的“民族和民主的伟大成果”，政府将竭尽全力从事恢复国家的善后工作。

虽然各大盟国、其他盟国和中立国很快就先后承认了民主联邦南斯拉夫的临时政府，并同它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但南斯拉夫仍遇到严重的困难，特别是在同西方盟国政府的关系上。在的里雅斯特危机时期这一困难通过各种表现形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例如：在提供粮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援助方面的障碍，扣留南斯拉夫的黄金和船队，接纳在南斯拉夫军队进逼下溃退的各种卖国贼部队官兵，西方报刊发动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专政”的运动。

为了巩固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首先是对西方盟国的地位，临时政府于1945年4月11日同苏联政府签订了《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条约也反映出南共对今后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看法。党内普遍存在一种坚定的信念：不仅在南斯拉夫抵挡外来压力方面，而且在南斯拉夫的经济恢复和政治整顿方面，以及在制订战后发展战略和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方面，苏联都将是强大的支柱。

在战争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在南斯拉夫同西方盟国的关系中，围绕的里雅斯特、伊斯特拉和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问题发生了深刻的危机。既然这些地区是南斯拉夫的武装力量解放的，那么在和平会议最终解决这些地区的归属问题之前由南斯拉夫军队作为盟军对这些地区实行控制，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协议的一切努力都遭到西方大国的阻挠。南斯拉夫由于处于孤立地位，在英美侵略的威胁下，接受了强加于它的解决办法，把有争议的地区划分成英美占领区和南斯拉夫占领区。

至于同邻国的关系，南斯拉夫在战争结束阶段只同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有较多的联系。南共中央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继续执行同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运动密切合作的政策，并应阿

尔巴尼亚领导的要求,向这个国家派遣许多经济领导人员和党的干部,帮助新阿尔巴尼亚的巩固和发展,加强友好与合作的关系。

1944年,南共大力支持保加利亚工人党发展保加利亚人民解放运动的工作。依靠在塞尔维亚南部和马其顿解放区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建立了许多支保加利亚游击队。新南斯拉夫充分支持1944年9月9日以后成立的祖国阵线的保加利亚。由于过去君主制保加利亚同希特勒结盟,祖国阵线的保加利亚处境困难。为了使保加利亚困难的国际环境得以改善,也为了使保加利亚人民能够雪洗由于法西斯统治者的军队于战争期间在南斯拉夫扮演占领者角色而给他们带来的耻辱,并为战后南保友好合作开辟前景,铁托于1944年10月5日在克拉约瓦(罗马尼亚)同祖国阵线代表团签订了协定。铁托代表全国解放委员会接受该代表团的如下请求:祖国阵线的保加利亚军队也参加从南斯拉夫某些地区赶走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最后战役。这是继苏联之后,一个盟国对面临严重的复辟危险和外来压力的祖国阵线保加利亚的又一次实际承认。南共中央为了使两国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合作,还倡议同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的领导就建立联邦问题进行会谈。1944年12月和1945年1月举行的会谈表明,双方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有重大分歧。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没有接受关于南斯拉夫人民和保加利亚人民建立联邦共同体的思想,因为这意味着要让皮林马其顿地区的马其顿人自决,即把马其顿的皮林地区和瓦尔达尔地区合并,于是建议不成立人民的联邦,而成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联邦。实际上这里反映出两国客观条件的不同和革命领导力量觉悟程度的不同。在南斯拉夫,在人民解放战争和革命过程中已经清算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政治思想残余,共产党在实践中实现了民族自决的思想;而在保加利亚,这一过程刚刚开始,而且仍受过去遗留下的消极东西的阻碍。

虽然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党、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反对把斯洛文尼亚滨海地区和伊斯特拉并入新南斯拉夫的立场缩小了两个解放

运动合作的可能性,但由于南共和意共的努力,在战争结束阶段这一合作仍继续进行。这一合作特别表现在统一的反法西斯工人团结组织的活动中,这个组织团结了意大利族和斯洛文尼亚族的工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基本力量。这一合作也表现为民族杂居地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部队和意大利游击队的战斗合作。1944年6月,成立了伊斯特拉和里耶卡地区意大利反法西斯同盟,作为克罗地亚人民解放统一阵线的一部分。1944年10月17日爱德华·卡德尔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会谈推动了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合作。1944年秋,的里雅斯特地区两党的组织开始合并成属于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的统一组织,并在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军内建立了一个军事组织,该组织于1945年4月28日在的里雅斯特投入武装斗争,协助南斯拉夫第四军解放了这个城市。

在战争即将结束的阶段里,南共和奥地利共产党在共同开展解放斗争和南斯拉夫运动帮助发展奥地利抵抗运动方面继续进行合作。在这个基础上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奥地利共产党的组织在科鲁什卡和什塔耶尔斯卡的合作也扩大了。其结果是建立了奥地利游击队,1944年11月先在第五斯洛文尼亚旅内建立第一个营,后来又建立了其他一些部队。

由于受到希腊共产党领导越来越公开地反对希腊境内马其顿族的民族权利的影响,同希腊共产党的合作在战争结束阶段开始削弱了。这也是军事方面的合作削弱、越来越多的马其顿族士兵从希腊解放军逃到马其顿人民解放军方面的原因所在。1944年12月英国对这个国家实行军事干涉和在那里建立起特别残酷地扼杀马其顿人民族权利的君主制以后,南斯拉夫同希腊的关系急剧地恶化了。

3. 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发展

南共在战争结束阶段的战略与策略。人民解放统一阵线。贯彻关于联邦制的决议。恢复国家的运动。所有制关系的变化。文化和教育领域开始复兴。反革命势力的反抗。战争结束时的南共。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本身就反映出用革命的方式变更执政者,并预示着有可能采取更坚决的方针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但在战争结束阶段南共的政策没有朝着这个方向转变。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后不久,委员会主席团从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变革的愿望出发提出的一些倡议和设想被搁置下来。对南共的战略和策略继续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是那些在过去时期里确定人民解放斗争的性质和内容的因素,首先是基本阶层的人民在争取解放、人民政权和民族平等的斗争中以及在粉碎原统治势力恢复旧的压迫制度的阴谋的斗争中实现的广泛团结。

新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也使南共决心坚持人民解放斗争的纲领,决心根据这一斗争中产生的特殊条件和社会政治关系来确定自己在选择道路和形式方面的观点和行动,以便使这种道路和形式能建立和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英国政府倡议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后,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立即签订协议。这一倡议的目的是重新组织已被打垮的国内反革命阵线,并使其能够重新开展斗争。同时,寄希望于国内还没有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的那些势力,包括还在动摇的和站在一旁观望的部分人民群众,仍采取等待策略的政治集团和个人,以及已被查明与占领者合作的人。联合这些势力重新战斗的标准不是他们对占领者的态度,而是他们在

“赞成还是反对共产主义”、“支持铁托还是支持国王”、“主张民主还是主张共产党专政”等问题上所作的抉择。总而言之，就是企图在反共的基础上建立所有反对人民解放运动的人的联合。

为了粉碎这种企图挑动内战的新阴谋并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保证为实现铁托和舒巴希奇协议创造条件，南共仍然坚持人民解放斗争的纲领，但把某些问题放在一边，因为处理这些问题会加剧内部的阶级对抗，并使盟国舆论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准备在解放和民主纲领的基础上团结全国一切爱国力量的行动产生偏见和疑虑。

因此，党的活动的一个基本方面是发展和建设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的政治组织形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以后，在加紧进行建立国家机关的工作的时候，产生了更长远地解决问题的需要。这就要求把政权的职能和政治组织的职能分开，而在过去这些职能到处都是由人民解放委员会或解放阵线委员会来行使的。现在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建立新国家的统一政治基础，它将彻底消除多党制遗留下来的残余，并能充分发展在实践中已经产生的以共产党为首的全民政治组织的新形式。这一情况之所以必然发生，尤其因为各资产阶级政党瓦解的过程日益加速，这些政党的某些首领和集团参加了人民解放运动，而南共则在某些资产阶级政党对人民仍有明显影响的地区曾同意在解放区建立它们的领导机构。同时必须考虑到，这些政党的某些首领和集团主张同人民解放运动合作的动机是并不一样的。他们当中有些人真心诚意地参加运动，另一些人则力图恢复自己的政党，以便加强对革命变革的抗拒。铁托和舒巴希奇的协议更加鼓舞了他们这方面的行动，后来对这一协议的补充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恢复提供了可能，这也促使他们为恢复多党制而进行活动。

南共继续强调动员全体人民力量参加彻底解放国家的斗争是首要的任务，同时着手建立全民政治组织——人民解放统一阵线。已经建立的人民广泛的政治团结还必须有相应的统一组织形式。

这种团结首先表现在共产党的独一无二的影晌和威望上,表现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力量和组织性上,表现在广泛建立起来的、在多方面活动中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民解放委员会网上,表现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青年统一联盟和妇女反法西斯阵线组织上,这两个组织成立于1942年12月,后来成长为人民解放运动的广泛而强大的因素。几乎在所有地区都有反法西斯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的地方委员会、区委员会、县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在活动。1943年间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和马其顿召开了这些组织的代表大会并选出了领导机构。1944年5月2~4日在德尔瓦尔召开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青年统一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816名,他们代表了50万名有组织的男女青年——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和解放区及非解放区的积极分子。这次代表大会充分体现了在解放斗争和革命斗争中发挥非凡作用的青年的团结一致。共产党通过建立人民解放统一阵线来努力团结已经产生的各种人民解放运动组织,加紧团结仍在旁观的那部分群众,以及受到把妥协政策看作反对革命的新机会的社会力量影响的那部分群众。这种统一阵线也是团结那些在人民解放运动胜利和得到国际公认的影响下愿意参加解放斗争和建设民主联邦南斯拉夫的资产阶级政治集团和领导人的最合适形式,并且是消除想恢复旧资产阶级政党和恢复已经丧失任何历史前景的多党制的企图的最合适的形式。同时,共产党还必须消除共产党员和战士身上的某些宗派主义现象,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在革命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对党的团结资产阶级政党活动分子和领导人的方针表示不理解。

1944年初春,南共倡议建立各民族的人民解放统一阵线组织。首先于1944年5月19日,在有克罗地亚共产党、克罗地亚农民党在解放区的执行委员会、克罗地亚青年统一联盟、克罗地亚妇女反法西斯阵线、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塞尔维亚族委员俱乐部的代表和著名的文化人士参加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建立克罗地亚人民解放统一阵线的决定并选出了这一阵线的执行委

员会。代表会议体现了克罗地亚共产党、克罗地亚农民党成员、非党的反法西斯战斗组织之间在解放斗争和建立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中的团结和合作，同时他们把涉及战后制度的所有其他问题放在一边。这样新建立的组织在组织上和纲领上为团结受克罗地亚农民党领导的影响而仍在动摇的那部分人民群众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在这次代表会议上选出的执行委员会于1944年6月中旬发布了关于成立阵线的地方组织和选举它的委员会的指示，坚持让克罗地亚农民党中的人民解放运动积极分子也参加这些委员会，但要保证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从1943年4月起担任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书记职务的安德烈·赫布朗，由于过高地估计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影响和持有某些民族主义观点，于1944年10月被解除了这一职务，由弗拉迪米尔·巴卡里奇继任。另一方面，以弗拉特科·马切克为首的克罗地亚农民党领导核心从等待的策略改变为日益坚决地抵制革命。这个党的领导企图在“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卫国军”和人民解放军合并并成立由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代表和1938年克罗地亚农民党当选的人民议员组成的“克罗地亚共和国最高委员会”的基础上同克罗地亚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进行合作。在这个企图受挫后，该党的领导便反对铁托和舒巴希奇协议，力图加强自己在“克罗地亚独立国”中的地位，同时同西方盟国接触，希望借助它们的支持来对抗革命。

到1944年底，根据同样的原则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塞尔维亚、马其顿、伏伊伏丁那，稍后又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建立了人民解放统一阵线的组织，而且在成立这些组织中反映出了各个地区政治形势的特点以及在铁托和舒巴希奇签订协议的情况下产生的政治力量对比。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马其顿和伏伊伏丁那建立人民解放统一阵线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旧资产阶级政党恢复领导机构。克罗地亚农民党和南斯拉夫穆斯林组织的领导集团的残余分子进行了较为活跃的政治活动，他们的政策仍然是等待“良好的时

机”开展活动以便依靠西方大国夺取政权，并以此对一部分克罗地亚群众和穆斯林群众产生影响。

在塞尔维亚建立人民解放统一阵线的活动是在更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必须用这种活动去推动团结广大阶层人民群众的过程，因为有些阶层的人民群众由于塞尔维亚某些地区人民解放运动开展得晚而站在一旁观望，而且当时那些原来采取等待策略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由于英国倡议全国解放委员会和流亡政府之间妥协而开始积极开展活动。因此，提出在彻底解放国家和保证战后民主发展的斗争纲领基础上建立全民政治组织的倡议也正是时候。1944年7月，南共塞尔维亚省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成立人民解放统一阵线地方组织和选举其领导机构的指示，并计划尽快召开成立大会。然而大会由于军事行动而推迟了，最后于1944年11月14日在铁托和舒巴希奇的贝尔格莱德协议签订后不久在解放后的贝尔格莱德召开。而这个协议预示着旧资产阶级政党有可能恢复组织，从而使已解放的塞尔维亚地区的政治活动活跃起来。南斯拉夫共产党努力使某些政党的恢复不越出其建立人民解放统一阵线的设想的范围，即防止把这一阵线变成联合政府的企图并尽量缩小从组织上恢复这些政党的可能性。已恢复的共和党、独立民主党、农民联盟和某些小团体的领导参加了阵线，而以米兰·格罗尔为首的民主党已恢复的领导拒绝这样做，坚持要在联合政府的基础上建立阵线。

在斯洛文尼亚，早在1941年解放阵线就已发展为全民的政治组织。1944年2月召开了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并确定这个委员会是最高代表机构，后来还进行了各地人民解放委员会的选举。1944年9月，解放阵线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扩大了，它仍然是人民解放运动的政治机构，而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则履行最高权力执行机构的职能。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分化的过程也临近结束，那些属于“中间”派的政治集团，即从1941年起就在解放阵线和反革命卖国阵线之间摇摆的政治集团已趋于崩溃。资

产阶级政治力量想利用铁托和舒巴什奇协议的条款在斯洛文尼亚政治生活中重新发挥任何重要作用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了。

1945年初,由于成立了南斯拉夫统一职工会,人民解放统一阵线的政治广泛性和行动能力都加强了。贝尔格莱德刚一解放,就出现了人民解放统一阵线的工人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工作首先是引导工人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1944年12月底,南共中央倡议成立工会组织。1945年1月23~25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工会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工人和职员统一工会,通过了工会章程和纲领,不久就出版《劳动报》作为工会组织的机关报。与青年和妇女的反法西斯组织一样,统一工会加入人民解放统一阵线。这样,群众性社会政治组织系统的建立过程就结束了。这些组织构成了人民政权的政治基础,共产党通过这些组织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

南共努力使今后的一切工作仍集中于普遍动员人民力量去胜利地进行人民解放战争和贯彻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本着这一精神,开展了建立国家组织的活动。党在这方面的重点工作是实施关于按联邦制原则建立新南斯拉夫的决定。根据这一精神,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斯洛文尼亚、黑山反法西斯委员会成为最高立法机构和执行机构。马其顿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大会于1944年8月2日召开,塞尔维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大会于1944年11月9~12日召开。这些会议一致同意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并根据决议的精神行使本地区最高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职能。这些会议的主席团、各部门主管机关、各种专业委员会开始行使各联邦单位的最高执行权。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联合政府成立以后,根据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的指示,从1945年4月7日到5月5日任命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和斯洛文尼亚的政府。由全国解放委员会和伊万·舒巴希奇的流亡政府合并而成的联邦政府在政治上是拼凑的,根据铁托和舒巴希奇协议条文的规定实际上是过渡性的政府,而各联邦单位

级政党的党员,但都已是经受过考验的人民解放运动积极分子,并接受南共的领导。

战争即将结束时,还着手解决某些省和地区的地位问题。一致同意没有任何社会政治理由和民族理由使桑贾克享有特殊地位,因此桑贾克反法西斯委员会于1945年3月29日作出决定,按1912年划定的边界把这一地区分别并入塞尔维亚和黑山。塞尔维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大会在1945年4月8日召开的会议上接受了伏伊伏丁那人民解放总委员会关于该地区作为自治省加入塞尔维亚的建议,接着1945年7月30日伏伊伏丁那的代表会议同意了这个解决方案,而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则通过专门的决议批准了这个方案。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整顿工作是在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1944年11月这一地区解放后,地下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委员会便开始了预谋的活动。这个委员会由同占领者合作的分子——对阿尔巴尼亚族群众有很大影响的民族阵线分子组成。委员会在宣传中援引阿尔巴尼亚人在旧南斯拉夫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并把旧南斯拉夫同革命中诞生的新国家相提并论。到1944年12月,这一活动采取了武装暴动的形式。由于出动了人民解放军部队,暴动于1945年2月被扑灭了,但各种形式的反抗仍在继续,如1945年3月南共州委书记米拉丁·波波维奇被杀害。共产党在阿尔巴尼亚族群众中开展了积极的政治活动。1945年3月底,召开了阿尔巴尼亚族代表会议,会议选举产生“阿尔巴尼亚委员会”,作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人民解放统一阵线的组成部分。1945年7月8~10日召开的州代表会议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决定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作为自治州加入塞尔维亚。后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决议也批准了这一方案。

与此同时,还根据雅尔塔“三巨头”会议建议的精神做了扩充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成员的工作。鉴于1938年选出的最后一届国民会议议员中只有很少人符合提出的标准,即没有因为同占领者合作而声名狼藉,所以根据南共的倡议,让已重建的

的政府则是政治上团结的。这些政府中的某些成员曾是原资产阶级政党和团体的领导选派代表参加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此外还特邀一定数量不属于政党的著名社会人士参加。根据这一方案，除最后一届国民议会36名议员外，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扩充了82名委员。

由于建立了全国解放委员会作为临时政府，由于这个委员会在战争后期在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提出了各种倡议，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制度和生活安排工作都有了发展。尽管经济极端凋敝和遭到占领者破坏（几乎没有一个村庄能幸免），而且在物资极其匮乏、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足的情况下，人民政权依靠团结在人民解放统一阵线中的广大阶层人民，组织农业生产，保证军队和难民最必需的食品，重建被毁坏的村庄，使小学、有些地方还使高等学校复课，开办扫盲班、文化馆、卫生院和法院，保证它们的工作顺利进行。为使受战争破坏的贫困地区的群众不挨饿，从产粮区组织运粮工作。在伏伊伏丁那、斯拉沃尼亚、波萨维那（萨瓦河流域）、塞姆贝里亚和其他产粮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夺取丰收的战役”。

随着南斯拉夫大部分地区的彻底解放和南共中央委员会、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和全国解放委员会于1944年秋天迁入解放后的贝尔格莱德，除了准备和进行最后战役外，共产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家上。根据全国解放委员会早先提出的方针，恢复工作由各地人民解放委员会来组织和领导。

除了重建被烧毁的房屋和村庄外，工作重心在于恢复关键的经济部门——交通、工业和农业，因为这些部门是联系和活跃整个经济的基础。在这项工作中，人民政权机关依靠人民群众的自愿义务劳动，这种义务劳动是由参加人民解放统一阵线的各种有组织的社会政治力量发起的。统一阵线组织利用过去积累的经验在村庄里组织劳动队，尤其是青年在劳动队中起着带头作用。全靠解放了的人民的劳动热情，才有可能在相当短的时间里修复被

破坏的交通,恢复最重要的工矿企业的生产,组织春播。除了恢复工业生产和组织农业劳动外,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是整顿市场,因为市场上充满了占领时期就已出现的投机倒把和黑市。为了做到这一点,当局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消灭这些现象,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合理供应,粮食实行义务交售制。

在恢复工作和供应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方面,争取盟国的援助只取得部分成果。原来商定英美组织提供民间援助45万吨粮食,但仅收到约12万吨。根据1945年3月24日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签订的协议,第一批物资、主要是粮食到战争结束后才开始运到。由于美国政府对南斯拉夫持保留态度(这种保留态度在发生的里雅斯特危机时特别加重了),早先开始的、1945年4月继续进行的关于美国根据租借法给予南斯拉夫援助的谈判没有取得结果。

在南斯拉夫大部分地区完全解放以后,在进行恢复工作的同时,共产党提议采取先前已采取过的没收占领者和南斯拉夫通敌分子的财产的措施。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于1944年11月21日通过决议:国家没收在南斯拉夫领土上的德意志帝国及其国民的财产,没收德裔居民和所有战犯及其帮凶的财产。之所以作出没收在南斯拉夫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成员的财产,是因为他们同德国占领者关系密切,也因为这个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人居住在塞尔维亚和伏伊伏丁那,而在进行解放这些地区的战斗时,他们大量地随德军撤走。德意志帝国及其国民和德裔居民的财产根据这项决议全部变为国家财产,而没收战犯和通敌分子的财产则根据法庭判决逐个地进行。鉴于叛国罪行具有阶级性,没收财产是剥夺资本家的基本措施。没收南斯拉夫王国的国家财产(铁路、大部分河运交通设施、邮电通讯、某些工业企业、矿山、银行),以及早在战争期间就实行的没收通敌分子的财产,为建立国有经济成分奠定了基础。

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文化落后状态和实现文化民主化的工作,在战争后期具有了更加广泛的规模。人民解放运动以其革命

和民主的内容及取得的成就团结了社会生活这一领域的许多工作者和创作者——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其他社会活动家。他们通过在复兴文化的广大战线上的活动，对清除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反动社会意识、宗教偏见和民族偏见作出了重大贡献，大力宣扬关于文化在促进人们关系人道化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新观点。这也是1944年召开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伊斯特拉文化工作者会议提出的建议。在文艺创作方面，努力发展民族文化和承认各民族的语言，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全国解放委员会的建议，在战争后期许多科学和文化机构以及几乎整个教育系统就已经恢复并在新的基础上开展活动。扫盲运动在更广泛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各地人民解放委员会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由各民族和各省反法西斯委员会执行机构的有关机关来指导。

一些基本统计数字也可以说明1941~1945年人民解放战争和革命期间在文化、教育和新闻方面的工作规模和活动广度。除了印刷成千上万份各种传单、布告、标语外，战争期间还发行了3500多种报纸——从连队小报到南共中央和最高司令部公报，印刷了近6000种专门出版物，即书籍和小册子。在保留下来的出版物中有151种诗集、111种散文集、102种通讯报告集、112种剧本，以及参加战争和革命的230位造型艺术家创作的约11000幅木刻画和素描画。战争期间编写了216部大型乐曲，发表了160多本曲谱或歌本。

全国解放委员会的建议和各民族反法西斯委员会执行机关的活动促进了各地人民解放委员会内部组织的发展，使它们在组织解放区生活和满足不断扩充的军队的需要方面的工作效率提到更高的水平。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这些委员会从1941年和1942年就不间断地开展工作的地区，建立了统一的人民政权机构。虽然这一时期人民委员会同上级机关直到联邦执行和管理机关的联系加强了，而且中央集权制已日益表现出来，但人民委员会在本地区行使政权的职能时，和过去一样依靠广大阶层人民的革命创

造性,保持着自治机构的重要特征。1945年初春,在彻底解放的地区着手进行了人民委员会的选举工作。

各种卖国贼部队和反革命武装力量寄希望于西方盟国可能进行军事干涉,因此仍留在解放区,企图通过扩大叛乱活动来制造动荡不安的气氛。因此消灭这些残余势力是稳定局势和过渡到和平发展的前提。为此动用了安全机关——人民保安部(1944年5月成立,属于全国解放委员会)、民警部队(更早以前成立,属于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南斯拉夫民防军(1944年8月15日全国解放委员会决定成立)。

此外,联合政府成立后,共产党建议制定法律,首先必须规定立宪议会的选举办法。然而,这一建议的意义不仅在于满足雅尔塔“三巨头”会议的要求,即应由立宪议会解决国家制度的关键问题,而且首先在于用法律的形式规定战争期间创立的新秩序。在这方面依据的方针是:在旧国家和新国家之间不存在内在的法律连续性,新的立法和整个法律制度必须建立在人民解放斗争的基本原则之上,具有阶级特征,并促进人民的基本阶层发挥革命首创性和创造性。

战争即将结束时,反革命势力加紧反对共产党为整顿国内局势和奠定社会主义发展基础所作的工作。在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政府成立以后,这些势力又取得了从事这种活动的合法地位。由于盟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冷淡,反希特勒同盟在解决战后制度问题方面的裂痕日益加深,这些反革命势力更寄希望于盟国之间的冲突和西方大国对南斯拉夫的干涉。因此,在整个这一时期里这些势力进行的活动都力求在世界上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南斯拉夫内部的社会政治力量自己无力使国家摆脱战争的混乱状态,从而要求外国进行干涉。

虽然同共产党和革命力量相比反革命势力在国内不能指望有多大影响,但战争末期的条件客观上为它们提供了某些机会。一方面,国家面临着占领和战争破坏造成的极大困难,生活必需品紧

缺,甚至遭到饥饿的威胁,而有效地克服这些困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面,为奠定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而在经济关系方面实行的变革引起了动荡和分化,局部地触及了人民中的某些阶层,特别是富裕阶层。保守观点的残余,教会上层和一部分神职人员的加紧活动,以及卖国贼武装残部的破坏活动也都加剧了上述紧张的局面。

当迈出第一步即发表联合政府的宣言时,米兰·格罗尔就表示异议,强调宣言中包含的政府纲领并不反映妥协的政策,而是反映了坚决继续贯彻人民解放斗争和革命的实践的決心。不久又围绕扩大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成员问题展开了斗争。格罗尔不同意彻底实行下列原则:增补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只能是没有同占领者合作过的人。反对派首领反对政府和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为巩固人民政权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因素而采取的措施,要求停止在战争条件下产生的临时机构——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权力,抵制为调整联邦关系而采取的措施。他们坚持三元联邦制的原则,对解决马其顿和黑山民族问题、对黑山和马其顿在联邦中的平等地位以及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同样地位持保留态度。他们承认国家在组织经济工作中的调节作用,但主张国家机关采取的措施要为生产的正常化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而不是为永久性的结构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

在彻底解放国家的战斗中,南共作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自己本身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这方面起促进作用的,既有前线的重大胜利(它展示了战争行将胜利结束的前景),也有建立新的国家组织、使国家摆脱战争废墟、以及为社会主义发展奠定基础的复杂任务,因为这些任务尤其是在完全解放的地区里已放在党的工作的首位。

在这个时期里党的内部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员人数十分迅速地增长。下列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1943年秋南共只有约2万

名党员，到战争结束时增长到约14.1万名党员。南共在战争中损失了3/4战前入党的党员，总共牺牲了约5.5万名党员。

党员人数增加最多的是1944年底以前解放的那部分地区，即塞尔维亚、巴奇卡和巴纳特、马其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也就是同其他地区比较党员人数较少的地区。如在塞尔维亚，在半年里，即从1944年底到1945年5月，党员人数从约6000人增加到15534人；在伏伊伏丁那，1944年9月约有1700人，到1945年4月增加到7,631人；在马其顿，1944年底约有2660人，到1945年5月增加到6000多人。黑山省党组织的人数在1944年里有了很大的增加——1943年底在基层有930名党员，到1944年12月彻底解放时有3596名党员。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在战争结束时有党员1238名。

在彻底解放了的地区，最大的注意力放在恢复和发展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党组织上，重点是吸收工人入党和在工厂、企业里建立党组织。1945年初，中央委员会发出指示：放宽入党和入团的标准，并取消共青团员入党后的预备期，以便在国家机关十分迅速发展和社会经济生活其他各个领域日益需要干部的情况下保证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为了加快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进程，从南斯拉夫军队中抽调了一些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到城市和工业中心去做党的工作，诚然，抽调的人数是很有限的，因为在彻底解放了的地区有大量新战士自愿入伍或者被动员入伍，南斯拉夫军队人数大量增加，在部队里需要加紧开展政治工作，因为部队还面临着重大的战斗任务。南共努力维护自己作为战争和革命中的领导力量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赢得的威望，并维护党员的崇高道德品质和共产党人的形象，但也面临着一种危险，即不仅野心家和诸如此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大批投诚或转到人民解放运动方面来的原卖国贼部队成员都钻进党的队伍里来。因此南共中央和其他领导机构提醒大家，在从这些社会阶层吸收党员时，标准要更严，预备期要更长。

在国内战斗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的那些地区，党的组织发展工作更加紧地进行。从斗争一开始人民解放运动就持续发展的起

义地区,仍然是南共的最强大的根据地。在那里党的群众化过程早已十分明显,特别是在意大利投降以后。例如1944年5月,斯洛文尼亚共产党有8373名党员,其中在部队里有3497名党员,在地方上有4876名党员。1945年1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组织有11684名党员。1943年底克罗地亚共产党约有1万名党员,到战争结束时增加到约有2.5万名党员。

如同过去一样,这时南共在军队中的组织里党员人数最多。除政治领导人外,几乎所有军事领导人都是党员。战争结束时南斯拉夫军队中约有7万名南共党员。

新党员的大量增加就有可能在过去没有党组织和领导机构的地方或它们遭到破坏的地方建立起党组织和领导机构网。党的基层组织——支部设在大多数农村里、企业里和机关里。发达的地方领导机构网——州、地区、县、市、区委员会充实了党的组织结构。在1943年3月马其顿共产党成立以后,根据南共中央的决定,1945年5月召开了塞尔维亚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伏伊伏丁那省党组织和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州党组织都并入塞尔维亚共产党。

从保存下来的部分资料中可以看出,战争结束时南共的社会结构近似人民解放运动的社会结构,即当时南斯拉夫社会的基本阶层的结构。例如,1945年4月底召开成立代表大会前夕,塞尔维亚共产党的社会结构是:农民占45%,工人占28%,知识分子和学生占19%,其他占8%。根据1945年6月的材料,克罗地亚共产党的社会结构是:农民占63%,工人占24%,职员占7%,知识分子和学生占5.5%,其他占0.5%。

在年龄结构方面,南共显然是年轻人的党。战争期间约有10万名共青团员加入了党。党的大部分干部包括最高领导干部年龄在25岁到35岁之间。由于大批新党员涌入党内,需要更加重视对党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这项工作仍然由南共中央、省、地区及基层党的领导机构的宣传鼓动部来直接领导。在战争后期,特别是在贝尔格莱德解放以后,为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及研究南共政

策和实践迫切问题的政论和报刊创造了有利条件。南共机关报《战斗报》在贝尔格莱德继续出版,经常刊登指导性的文章。除了加紧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著作外,还出版了苏联作者论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各种书籍,这些书籍是作为对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读物被推荐和翻译过来的。党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训练班的时间延长了,学员人数增加了。

战争后期大批吸收党员的过程并没有影响南共的建党基本原则。南共仍保留干部党的性质,它的内部关系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队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牢固团结的基础上。当时除了军事行动外,还要进行复杂的斗争来争取国际上的承认,扩大和加强人民解放阵线,挫败反革命势力在外来支持下恢复多党制的企图。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南共在战争和革命中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时,仍使自己的组织和组织机构保持原来的秘密状态,党员不公开,党的内部生活也不公布。和过去一样,仍公开强调南共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的领导作用,但南共准备同所有愿意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决议的基础上为国家的彻底解放和南斯拉夫的建设事业作贡献的政治集团和个人进行合作。鉴于已经直接着手建立国家组织和奠定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党的纲领性方针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在这种条件下党的纲领性方针并没有成为南共积极分子在会议上广泛讨论的题目。在战争和革命的前一阶段和这一阶段里,南共中央政治局是制定党的政策和策略、确定党在实践中对所有问题的立场以及全党都应执行的指示的中央领导机关。在这方面,由于全党对形势的客观要求有充分的认识,由于南共中央政治局、特别是总书记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具有崇高的声望和权威,由于共产党在过去年代里取得了成就,尤其是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赢得了胜利,所以没有发生过背离的现象。

南共在社会活动的各方面——军队、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经济部门、教育、文化、卫生及所有群众性社会政治组织中,都发挥直接的领导作用。专职的党务工作者的人数大大地增加了,

他们是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处于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的所有领导岗位上。为了了解并指导整个社会活动，在党委员会里设立了各工作部，工作部内产生了党的专职机构的最初形式；而党的基层组织——支部则对所在单位的一切活动负责。尽管这样的先锋队作用为党政合一和官僚主义倾向开辟了道路，但在党的工作方法中革命创造性和主动性精神仍占上风。党的领导机构和基层组织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并按他们的社会愿望和民族愿望办事，所以推动了各项社会活动，并在完成任务中起带头作用。

南共青团的发展和南共的发展相似。它仍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干部组织，是南斯拉夫反法西斯青年统一联盟（在1945年11月团结了137.4万名青年人）的领导力量。南共青团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大批青年参加人民解放斗争所决定的。以下材料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人民解放军以及后来的南斯拉夫军队的战士中有75%是青年，战争后期军队领导干部有一半是26岁以下的年轻人。因此，整个战争期间南共青团都是南共组织恢复和壮大的最广泛的基础。战争中约有10万名南共青团员牺牲，而在战争结束时，南共青团约有15万名团员，其中在南斯拉夫军队中有7万多名。

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在具有许多特点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准备和领导人民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发挥先锋队作用的。这些新的条件要求在确定纲领性方针时和在为实现解放与革命的长远目标选择战略与策略时作出新的回答。顺利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前提，在南斯拉夫王国的资产阶级制度危机加深时，以及在它无力解决南斯拉夫社会的迫切问题和矛盾时，就已经具备了。当时南斯拉夫社会的迫切问题和矛盾有：保证民主的和民族的权利与自由，为国家摆脱长期的落后状态开辟道路和前景，在纳粹法西斯侵略时不仅捍卫受到威胁的独立，而且保卫民族生存。共产党在战前年代为解决人民和民族的这些普遍性问题而开展政治活动时，也为建立和加强广泛的革命民主运动开辟了道路；在这一运

动的纲领性方针中，争取民主改造和捍卫独立的斗争同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这个基础上，在被侵略和占领的条件下提出了人民解放斗争的纲领，这一纲领体现了解放目标和革命目标的统一。

南共在战争和革命蓬勃发展的各阶段确定的这种纲领性方针、战略和策略，反映了南共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成熟、摆脱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并成长为全民的革命政治力量的过程。南共整个活动的基本特征是：它决心坚持人民解放斗争的纲领，挫败资产阶级旧统治集团把这一斗争引上国内战争和自相残杀的道路的企图，保证人民解放运动的广泛政治基础，保证广大阶层人民发挥创造主动精神。这一点对实现胜利的基本前提——发动人民起义、建立军队和进行全民战争、建立人民政权和各平等民族的民主国家共同体——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早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就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关系铺平了道路。

在争取国际上承认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和承认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的复杂斗争中，共产党保证了新南斯拉夫真正独立的重要前提。这同时也是对在大国利益彼此交错和发生冲突的一个小国里革命能否获胜的问题的回答。从这一点来看，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战争和革命以自己独特的规模和积累的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推动了被占领国家的解放运动和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组织性和干部素质——党的队伍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团结、纪律、执行任务时的责任心和主动性、自我牺牲精神、对胜利的信心以及高度的人道主义——对南共在人民解放战争和革命中实现领导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 四 编

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践中

(1945~1980年)

第一章

革命民主制度及其矛盾

(1945~1948年)

1. 世界的变化,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和南共的外交方针

社会力量总的对比的变化。国际关系的新原则。世界分割为集团。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结盟。为西北边界而斗争和的里雅斯特危机。

南斯拉夫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急剧变化的世界里,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南共领导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人民解放斗争,亲自参与了改变世界的过程。战后从根本上改变世界面貌的最深刻的变化之一是社会主义的、反帝的和民族解放的力量和进程的加强。战争结束时苏联成了世界大国,享有巨大的政治威望,这首先是由于它对打败法西斯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它在国际关系中成了没有它参加就不能解决任何一个重大国际问题的因素。此外,苏联已不再象战前那样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对法西斯占领的人民解放斗争过程中,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从战后头几年到1948年,在苏联帮助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的共产党也

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

西欧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影响的加强是社会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在这些国家里共产党在反对法西斯占领的抵抗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参加了本国的政治生活,在战后头几届政府中担任了职务。在这些国家的新宪法制度的讨论中,共产党人主张对社会政治制度进行根本的民主改革,但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他们同资产阶级势力开始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1949年,尽管美国支持国民党,而且中国共产党人同斯大林有分歧,中国革命还是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重大突破和在具有很不发达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里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新经验。这场真正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世界上社会力量总的对比发生变化的角度来看,或者就这一胜利对其他亚洲国家的影响而言,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大的反殖民主义和解放的运动和进程,在战后年代里发展为世界范围的反帝革命。成立了新的独立国家——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在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年轻的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发动千百万农民群众,进行了争取独立、实行社会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的斗争。从1950年起又开始了非洲的非殖民化,但这一过程遇到了殖民主义者的顽强抵抗,遇到了美国想取代原殖民国的地位、从而填补“真空”的企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4~6月在旧金山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建立了联合国。民主联邦南斯拉夫的代表团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这个组织的宪章是在大国妥协的基础上通过的,而宪章关于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并不妨碍大国在世界组织机构中、首先在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主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中占主导地位。尽管宪章有不彻底性,尤其是这种不彻底性被大国所滥用,但在由于各种危机、武装干涉和年久日深的不信任感而动荡不安的

战后世界的国际关系实践中,联合国表明是一个促进和平、安全和维护人的自由的组织。宪章规定,国际关系应建立在各国人民平等和自决的基础上,各国负有义务不使用武力威胁,和平解决争端。各国人民参加这个组织不仅是为了维护和平与安全,而且是为了促进本国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小国代表可以在联合国讲坛上阐述本国的观点并谴责侵略,主张维护和平与裁军。联合国决议的政治和道义力量约束了大国的行为,对世界公众舆论发生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分布也有了重大变化。纳粹法西斯国家和军国主义日本的失败,使这些国家在战后初期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地缩小了。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法国在英国的帮助下曾竭力维护国际关系的凡尔赛体系,但战争结束时法国的力量削弱了,戴高乐却徒劳地想保证法国发挥它实际上已不存在的大国作用。英国在战争期间成了美国的债务国,它在欧洲的影响大大下降了,这就有利于美国和苏联。英国人在自己传统的地中海势力范围内即在希腊和土耳其被迫向美国让步。英法“殖民王国”开始瓦解。被奴役的附属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亚洲被压迫的人民对日本侵略的反抗,反法西斯同盟胜利的军事行动,特别是苏联的作用以及中国的革命,都大大促进了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了经济上和军事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占世界社会总产值的56%。美国的工业生产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年代里翻了一番。美国垄断了原子弹,保持了战争时期强大的军工潜力。世界上约85%的科学发明是在美国创造的。美国扮演了资本主义世界领袖的角色,放弃了对外政策中的孤立主义。根据“大西洋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战略,美国填补了由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某些地区影响削弱而出现的空缺;哪里有机会,就在哪里插手。在美国的利益或整个资本主义的利益受到威胁的地方,美国就进行干涉,挑动工人运动的分裂。

斯大林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共战略时，代表苏联从大国霸权主义的政策出发来对待已发生变化的历史形势。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在战后，社会主义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已发展成世界进程，而亚洲和非洲人民的反殖民主义革命成了这一进程的组成部分，但斯大林仍把社会主义局限于共产党取得了政权的国家，即受苏联控制的国家。他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界线说成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界线。在他看来，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运动不是新的独立的革命运动，而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后备军”。在对待东欧和东南欧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上，斯大林不是主张平等，而是力图使这些国家服从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斯大林主义的理论竭力说明苏联和这些国家政治制度的区别，同时抹杀不同的民族革命经验的差别，把所有这些国家都纳入所谓人民民主的范畴，并把这个概念理解为从资产阶级国家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形式。与此同时忽视了这些国家之间的重大差别，把资产阶级政党和共产党联合掌权或保留君主政体残余的政治制度同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在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建立的政治制度等同起来。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的革命经验摒弃了这种分阶段夺取政权的教条说法。南斯拉夫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人民解放斗争理解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统一而不可分的进程。

南斯拉夫共产党作为南斯拉夫社会的领导力量，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和国家间的军事同盟瓦解产生消极后果的条件下，在解放了的国家里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在德国的命运以及东欧和巴尔干国家社会变革等问题上，反法西斯同盟主要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昔日的盟国围绕边界和战后世界秩序问题发生了冲突。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势力，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对苏联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的增长感到不安。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为了“大西洋民

主”的团结,在反对极权主义和保卫“自由世界”的借口下发起进攻,要求“大西洋共同体”在军事上靠拢;他于1946年3月在美国的富尔顿市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面公开号召对共产主义进行“十字军征讨”。他重申了在1945年的里雅斯特危机时以书面形式提出的思想,即从吕贝克到的里雅斯特、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一幅“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它成了“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分界线。丘吉尔的演说是世界进入“冷战”的标志。按照1947年3月提出的杜鲁门主义,帮助受到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美国承担义务:通过给与军事、技术和财政援助,维护希腊和土耳其的领土完整,使其防止外来侵略和内部政变。所谓内部政变指的是希腊的人民解放运动。美国通过同年制定的马歇尔计划向欧洲国家提供财政资金,目的是加强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对“共产党颠覆”的防御能力。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正式标志着对立的国家分为两个集团或两个“阵营”。1947年9月成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加深了这一划分。按照联共(布)代表安德烈·日丹诺夫在情报局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一方是反帝国主义的和民主的“阵营”,而另一方则是帝国主义的和反民主的“阵营”。1949年4月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除美国、英国和法国外,还有意大利、加拿大、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和葡萄牙参加。苏联和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于1955年签订了华沙条约,以军事集团的形式确立了它们的“阵营”地位。

已开始的特种战争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相互对峙的大国不断进行军备竞赛,剑拔弩张的政治思想宣传,普遍的不信任气氛和国际会议上激烈的外交角逐。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最强烈地表现在欧洲。“冷战”特别明显地反映在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执掌政权、情报局攻击南斯拉夫(1948年6月)和封锁西柏林等事件上。1949年,西方盟国帮助成立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而苏联则帮助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由于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和美国在联合国旗帜下进行干涉，世界已接近世界大战的边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人民解放斗争在世界反法西斯的进步舆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解放了国家，为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新的权力机关和各平等民族的联邦国家。

从世界舞台上力量对比的变化出发，南共把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紧密合作看成是巩固新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迅速克服战争破坏造成的经济困难、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条件的前提。1945年4月11日同苏联签订的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是这一国际方针的表现。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把这个条约看成是维护革命成果的最可靠的支柱，因为在战争刚结束的一个时期里这些成果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南斯拉夫施加的各种压力的威胁。南共认为，这样做也是对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的贡献。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积极支持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相信这是有原则的、国际主义的和爱好和平的政策，是符合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利益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在捍卫本国的独立时，处在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反革命压力的斗争前哨；它反对外国对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反对用军事对峙威胁世界和平，谴责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集团纵容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残余和思想残余。

南斯拉夫特别努力加强同邻国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亲密关系。南斯拉夫支援阿尔巴尼亚，同时打破了这个国家在战争结束时所处的国际孤立状态。鉴于这个邻国的战略地位，南斯拉夫因此也加强了自身的安全。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是在反法西斯解放斗争中进行合作的继续，是对这个国家在战争中进行的革命变革的支持的继续。在所有国际会议上南斯拉夫都主张承认阿尔尼亚的盟国地位并给它赔款。1946年下半年南斯拉夫联

邦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签订的经济合作协定,不仅是两国在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的步骤,而且部分地也意味着南斯拉夫承担单方面的义务。协调了两国的经济计划,取消了关税限制。由于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1947年南斯拉夫还承担了维护阿尔巴尼亚独立的国际法义务。南斯拉夫支持祖国阵线保加利亚的内部整顿,帮助加强保加利亚的国际地位。南共曾努力消除战争时期南斯拉夫人民和保加利亚人民之间的隔阂,因为保加利亚在战时曾是纳粹德国的盟国,并占领过南斯拉夫的部分领土。南共支持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反对强大的资产阶级势力的政治斗争;这些势力既不承认马其顿人民在南斯拉夫境内赢得的民族自由,也不承认保加利亚境内马其顿少数民族的民族权利。同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实现了高水平的合作,这种合作达到了已开始具体考虑三国人民联合成共同的联邦国家的地步。

1945年11月,当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担任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的领袖和保加利亚政府的首脑时,开始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合作取得最丰硕成果的阶段。季米特洛夫于1946年表示了赞成南斯拉夫人民和保加利亚人民建立联邦的设想,并在实现这一前景时承认保加利亚境内马其顿少数民族的民族权利。1947年7月30日~8月1日举行的布莱德会谈为建立联邦开辟了道路,并商定要进行大量的换货,建立两国合营企业的新制度,开展文化合作和准备建立关税同盟。1947年11月27日,在瓦尔纳—埃夫克西诺格勒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南斯拉夫不惜牺牲本国人民的利益放弃了保加利亚根据和约应付的2500万美元的赔款。

由于1946年和1947年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在东南欧和东欧建立了所谓人民民主国家特殊的地区安全体系。开始发展日益紧密的经济合作。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作出自我牺牲为代价,于1946年向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提供了

1.7万吨小麦和1.65万吨玉米,同意以无息贷款的形式给予50亿第纳尔的援助。

除了加强国家之间和党之间的联系外,还同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受苏联影响的世界组织开展了合作。在世界工会联合会内和通过双边关系,南斯拉夫工会同所有进步的工会运动和工人组织发生联系。妇女反法西斯阵线加入了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而人民青年组织则加入了世界民主青年联盟。1945年7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巴尔干青年代表大会,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五国的代表参加,成立了巴尔干青年委员会,后来匈牙利和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青年代表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南斯拉夫人民青年组织还同西欧的及其他的民主进步青年运动和组织开展联系。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早在战争期间就表示赞成联合国的宗旨。联合国宪章尽管有不完备之处,但它的精神符合世界关系的新秩序。宪章关于会员国主权平等、应当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以及不干涉别国内部问题等原则,也体现在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思想中。1946年4月1日,铁托向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作关于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报告时指出,南斯拉夫作为联合国会员国,主张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紧密合作,南斯拉夫执行这一政策,不仅是由它的和平愿望所决定的,而且还是由它作为联邦共同体的内部制度所决定的。

南斯拉夫同苏联的紧密合作,以及南斯拉夫对“人民民主”国家内部稳定的支持和对其他国家民主解放运动的支持,越来越引起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不理解和不友好态度。它们认为苏南签订条约标志着南斯拉夫不执行独立政策和同所有国家建立自主关系的政策。而对内实行的剥夺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的经济和政治措施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保守集团把这一切都看成是南斯拉夫开始按照苏联社会制度的模式发展的证明。西方统治集团对资产阶级势力没有能利用铁托—舒巴希奇协议保证自己在

政权系统中的影响，特别是对南斯拉夫武装反革命残余的失败和立宪议会的选举没有达到它们预期的结果而感到不满。美国虽然早在1945年3月就承认了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政府，并派大使到贝尔格莱德，但在立宪议会选举和宣布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却拖延对新情况的承认。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6年1月初声称承认南斯拉夫的变化是有条件的，并将继续这样做。美国政府只是到了1946年4月，才指令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呈递国书，并表示同意新南斯拉夫大使驻华盛顿，因为在此之前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承担了前南斯拉夫政府对美国的义务。

把1918年以后属于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领土归并南斯拉夫的斗争，是1943年11月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和1945年3月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政府宣言中提出的最重要的国际任务之一。在这方面，新南斯拉夫的依据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宣布了要实行民族自决权，伊斯特拉、的里雅斯特和科鲁什卡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族居民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斗争，这些地区的民族结构，要求纠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这些民族的不公正待遇。1945年5月发生的里雅斯特危机时，西方大国用军事对抗相威胁，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南斯拉夫部队撤离包括的里雅斯特在内的尤利地区已解放和已驻军的部分，接着撤离普拉以及伊斯特拉半岛西岸其他港口，撤离在法律上属于意大利王国的经过索查河谷通往奥地利的公路地区。尽管斯大林于1945年5月22日就这种压力向杜鲁门提出了正式抗议，但南斯拉夫在这场较量中力量单薄，所以南斯拉夫部队不得不撤离的里雅斯特、普拉和斯洛文尼亚西部滨海地区，撤出属于奥地利的科鲁什卡和什塔耶尔斯卡部分地区。但是南斯拉夫不能容忍撇开民族自决权来解决南斯拉夫西北边界问题和不尊重南斯拉夫是独立国家这一事实。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于1945年5月27日在解放后的卢布尔雅那发表的讲话中，向大国讲明了这一点。根据南斯拉夫和西方盟国军事代表1945年

6月9日签署的贝尔格莱德协议,南斯拉夫部队的少数人员仍留在的里雅斯特;在和平会议解决之前,争议地区分为“A”区(由西方盟国军事管制)和“B”区(由南斯拉夫军事管制)。

在发生的里雅斯特危机时,以及在1946年巴黎和会上,美国和英国对南斯拉夫维护合法民族权利的要求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而支持意大利的野心(对此丘吉尔早就表示过支持)。鉴于南斯拉夫发生的革命变化和密切的南苏关系,它们把满足南斯拉夫的要求也看成是加强苏联的地理战略地位。

南斯拉夫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解放从1918年起并入意大利和奥地利的那部分人民,使他们回归祖国。由爱德华·卡德尔率领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在苏联的支持下力争尽可能有利地解决边界问题。南斯拉夫代表还发言维护阿尔巴尼亚的利益,积极参加了不仅同意大利,而且同保加利亚(它在保护少数民族权利方面承担了义务)、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缔结和约的讨论。南斯拉夫代表团在和会上的活动得到了国内的大力支持,国内开展了支持南斯拉夫要求的广泛的人民示威运动。

1947年2月10日同意大利缔结了和平条约,规定在的里雅斯特大片争议地区建立的里雅斯特自由区,作为“缓冲地”,设总督和政府。有7000平方公里土地约47万人口归还南斯拉夫。这样就部分地纠正了1918年后把这些领土并入意大利而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造成的不公正待遇。意大利应在7年内向南斯拉夫支付1.25亿美元的赔款,这个数目只是1941~1943年意大利占领期间给南斯拉夫造成的损失微不足道的部分,同时归还从南斯拉夫掠夺去的艺术珍品、历史文物和文化典籍。南斯拉夫特别声明,南斯拉夫并不因签订和约而放弃自己的正当要求,不管将来争议地区的民族成分有何变化。南斯拉夫在大国外长会议上提出要求,希望根据民族自决权把科鲁什卡的斯洛文尼亚族聚居部分并入南斯拉夫,依据的事实是,科鲁什卡的斯洛文尼亚人早在战争期间就已有组织地参加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从而对此表了态。但这

一要求没有得到西方盟国的理解。包括苏联在内的盟国坚持1943年10月莫斯科会议关于战后重建奥地利的决定，按照后来对这一决定的解释，奥地利保持1938年并入第三帝国以前的疆界。

2. 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人民政权 广泛的政治基础

革命民主政治制度的形式和性质。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
工作方法。人民阵线和其他群众性社会政治组织的组织状况
和纲领性方针。

战争结束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统一的强大的组织。在政治制度中开展活动的还有在战争时期建立的群众性反法西斯组织：人民解放统一阵线（从1945年8月起改称人民阵线）、统一职工会、反法西斯青年统一联盟和反法西斯妇女阵线。这些组织的工作都由共产党通过这些组织中的党员积极分子和主要领导人来指导。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群众性的社会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捍卫革命成果和国家领土完整，为实现当时年轻的、人数不多的和不发达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纲领而斗争，它领导整个社会，加快社会经济进程，以利于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共产党制定并解释思想政治路线，向人民群众灌输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当前任务和道路的革命意识。党把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看成是新人民政权的重要阶级基础。革命的人民民主机构的主要特征是所有的进步力量团结在人民阵线中。思想上和政治上团结一致的共产党在这些机构中起领导作用，这是人民解放斗争的重要政治成果。政治组织团结一致的原则是从共产主义运动中继承下来的，而在南斯拉夫的情况下，它也吸取了1941年以前和战争期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同资产阶级政党打交道的历史教训，当时

这些政党的大部分领导人即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同占领者合作,从而走上了叛国的道路。无论在人民解放斗争期间,或是在解放了的国家里进行恢复和实行革命措施时期,人民群众都接受并支持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党员和人民共命运,但特别积极地工作和忘我地劳动,尽管在1948年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前,首先由于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人民阵线在政治制度中的作用,部分地还由于地下工作时期习惯的惰性和某些宗派主义的残余,党员身分并没有公布,党内生活也不公开。

共产党是政治制度的基本力量和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的体现者。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几乎占据所有关键性的岗位,往往一个人同时在党内、人民阵线中和政权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524名议员中有404名是共产党员;1062名共和国议会议员中,只有170名不是共产党员。公民们选举他们当议员,是因为对他们怀有巨大的政治信任。仅以部长助理、委员会副主席、局长、经理等职务为例,1948年党员所占的比例如下:在塞尔维亚占83%,在克罗地亚占89%,在斯洛文尼亚占71%,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占83%,在马其顿占81%,在黑山占90%,在联邦机关中占67%。

南共的纲领性方针不能根据正式通过的纲领或统一的理论和行动文件来进行判断,因为在武科瓦尔代表大会以后没有通过新的党纲。党的革命行动纲领是1940年在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制定的,并在战争期间在党的领导干部军事会议和政治会议上得到进一步完善的。战争刚一结束,南共中央政治局就提出了关于革命改造的道路和性质的基本政治理论思想,并通过人民阵线的机关报公布于众。在党内、人民阵线内和政府内担任关键职务的南斯拉夫领导人,特别是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爱德华·卡德尔、莫沙·皮雅杰、米洛万·吉拉斯在自己的讲话和著作中,分析了社会现实,指出了社会进步的前景。

共产党依靠青年一代和年轻的领导干部,相信任何障碍都是

可以克服的，谁也无法阻止南斯拉夫革命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党员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复杂而矛盾的。由于夺取了政权和剥夺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前景广阔地展现出来了。但有人以为这样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和迅速地建设社会主义，尽管党的某些领导人一再指出社会发展的困难。在物资普遍匮乏和紧缺的情况下，发扬了相互支援和平均主义的精神。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在恢复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主要靠体力劳动，用精神鼓励代替物质刺激。苏联在组织国家、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社会实践有着影响，被当作社会主义发展的榜样，虽然这实质上同南斯拉夫革命的经验背道而驰，因为南斯拉夫革命成功地把党的领导作用同群众的主动性结合起来。

党的领导把扩大党的队伍看成是紧迫的任务，这是由于党在革命改造中起着领导作用，由于认识到：当党对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正在建立的国营经济部门、群众组织、军队和恢复国家的整个进程实行领导时，规模很小和人数很少的党同在解放了的国家政治制度中起统治力量的作用不相适应。对宗派主义现象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意味着放弃过去吸收党员的基本标准，因为中央委员会仍然要求预备党员具有思想战斗性、政治积极性、在工作中作出榜样、忠于人民解放斗争和南斯拉夫社会的革命改造事业。仍保留党员的预备期。中央委员会曾一再告诫党支部和各级领导要防止野心家钻进党内。

共产党员的人数迅速增加。最有觉悟的、政治上积极的和为实现党的当前任务和长远目标而作出最大努力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加入了党。从全国解放到1946年底，党员人数增加了48492人，从1946年底到1948年7月，增加了278617人。共产党在1948年年中，已有468175名正式党员和51612名预备党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有331940名团员。在党的社会结构中主要是农民，即有231333名农民党员（占党员总数的49.41%），有138235名工人党

员(占29.53%),有67329名知识分子党员(占14.38%)和31277名其他党员(占6.58%^①),但其中许多党员是按原来的职业登记的,而不是按当时从事的工作登记的,因为许多原来的农民和工人现在已在国家管理机关、军队等部门工作。党内妇女人数为93604人(占19.99%)。然而,尽管党员人数增加很快(3年里几乎增加2倍),共产党仍保留干部党的性质,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吸收新党员的方法上,而且表现在党的整个组织和目标、党的纲领基础和意识形态以及十分活跃而有纪律的党内生活上。南共中央政治局一再告诫各联邦单位党的领导,在吸收新党员时要注意把“无政府主义和松懈作风”带进党组织的危险。

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反映了南斯拉夫多民族的性质。根据这一点,在统一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内,于1945年成立了塞尔维亚共产党;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党组织联合在塞尔维亚共产党中。共产党在解放后的国家中执行的民族平等政策意味着:各民族在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管理机关、安全机关、群众性社会政治组织中有相应的代表,而不考虑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或各民族和少数民族参加人民解放战争的情况;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不受阻碍;使用本民族语言办学校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民族语言;有权建立民族文化设施(剧院、文化馆)和创办民族报刊。在塞尔维亚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铁托在反对那种想在各联邦单位之间确定严格的国内界线的企图时,叙述了南共的民族政策:“热爱自己的联邦单位,意味着热爱整体的南斯拉夫”,因为各联邦单位之间的界线犹如大理石上的纹路,人民必须“用这样的觉悟武装起来:克罗地亚人为马其顿境内发生的事情而担忧,塞尔维亚人为伊斯特拉发生的事情而担忧”。战争刚一结束,南共中央政治局就决定,把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党代表会议也变成这些联邦单位的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但是几个月后决定推迟召开这

^① 原文如此,据计算应为6.68%。——译者

些代表会议,直到把对重大问题的提纲草拟出来,因为这是召开这些会议的前提。根据后来没有实现的南共中央政治局1946年1月10日的决议,共和国组织的代表大会应于1946年7月和8月召开,然后在1946年8月或9月召开南共代表大会。

在战后头几年里,党的领导工作方法沿用了战争年代的做法,当时由于战争的环境南共中央委员会没有召开全体会议。南共中央政治局实际上作为党中央办事机关开展工作,通过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最重要的决议,研究了政治工作的实际情况,但主要是确定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战略,展望前景,对所采取的行动和措施从思想政治上作出评价。在政治局的例行会议上,在某些政治局委员的非正式会晤中或他们同铁托的会见中,通过各部门研讨的方式,在政治局同出现了某些思想政治问题(孤立主义和山头主义倾向、教权主义、机会主义)的共和国党的领导干部的会议上,就某些问题确定政治立场和通过决议。根据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某些不是南共中央委员、但领导有关国家机关的共产党员也出席了政治局会议。

各联邦单位(共和国)的党组织,由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的党中央委员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的省委员会来领导。1945年年中,在争取尤利地区归还南斯拉夫的斗争中,成立了南共的里雅斯特和尤利地区自治组织,受斯洛文尼亚共产党领导。在南共组织结构中,曾设有州、地区(1946年底撤销)、县、地方和区委员会。在塞尔维亚共产党内还设有省委员会(伏伊伏丁那)和州委员会(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地方党委员会通常每周召开一次会议,并通过自己的委员掌握政治生活的全部重要工具。指导检查机构给予党组织以直接的帮助。南共中央委员会直接过问各共和国党的领导机构的工作,南共中央委员视察各共和国,或者一些中央委员同共和国党的领导举行联席会议。1948年南共组织网内,除南斯拉夫军队中党的机构外,有393个县委员会和县级的地方和区委员会,441个地方委员会,53个区委员会和

1957个局。

企业、机关、乡村、城区和街道、军队的连队中的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1948年，在大工业企业和大村庄的支部里有100~300名党员，有的甚至更多，这样的支部分成许多小组。党支部由以书记为首的支部委员会领导，每周召开一至两次会议，如有必要，可以更多。党支部按党的工作方面进行组织，这样每个党员都承担一定的工作任务，支部则具体地指导本单位的政治生活。1948年年中，党支部总数达35635个。经济企业党支部的工作是提高工人的社会主义觉悟，组织群众性的劳动竞赛，在实际工作中表彰突击队员、合理化建议者和革新者，鼓励提高劳动生产率，关心工人的生活，保护国家财产。农村支部率领劳动农民开展活动，实行土地改革，恢复被毁坏的农业，重建被烧毁的村庄，落实播种和收购计划，征收税款，组织并管理农业合作社，反对投机倒把和教权主义，扫除文盲和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

1945年年中，党内进行了一次组织变动，其目的是在工作重心转移到恢复国家、活跃经济、建立整个人民政权机关体系并使它在人民阵线这一全民政治组织的广泛政治基础上有效地行使职能的条件下，使党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但党的机关在组织结构上和政治工作方法上的变化，没有使共产党所依据的任何一个重大原则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民主集中制原则表现为由一个中心来进行领导，少数服从多数的决议，共产党员就自己的工作向党组织负责，党的领导机关经选举产生。通过决议和执行政治经济措施的方式取决于这些决议和措施的内容。

根据1945年7月通过的组织问题工作条例，南共中央的机构包括：组织指导部、干部部、宣传鼓动部和九个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对外政策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学校委员会、人民政权建设委员会、社会政策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共和国党的领导也有同样的组织机构，只是没有对外政策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组织指导部传达南共中央的指示，监督指示的执行。

中央委员会组织书记领导干部部，干部部的职权是确定党、团、国家政权机关和反法西斯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监察委员会是党的统一的监督机构，它贯彻党的路线，维护党的纯洁，检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和党组织的整个工作。南共中央和共和国党的领导机构下设的其他委员会是起咨询作用的党内机构。在重建国家和实行工业化的条件下，在党的领导机构内设立了若干“处理”国家事务和群众组织活动的基本问题的工作部门。共产党通过国家机关和新的立法指导社会发展。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对所有国家机关中的共产党员来说，都是必须执行的。在国家机关中，无论是在联邦国家机关中或是在共和国国家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除了战前的干部和在人民解放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外，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干部也迅速成长起来。工会组织和青年组织，首先是共青团，成了“党和国家干部的后备队”。

根据1945年8月10日的决定，南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国防部的政治部全部掌握了对南斯拉夫军队党组织的领导。国防事务由南共中央的军事委员会来抓。1946年4月，这个委员会改组成由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同时撤销了各联邦单位党的领导机关的军事委员会。

南斯拉夫军队保障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免受外来侵略，同时也是一支促进国内制度巩固的力量。南斯拉夫国防军和其他部队保卫边界，参加消灭国内切特尼克分子、乌斯塔什分子、“民族阵线”分子和白卫军的叛乱恐怖集团及西方派遣的破坏分子。南斯拉夫军队由于自己的革命性、组织性和高度政治觉悟而成为建设新政权的重要因素。1946年军队复员和缩编后，还有7万多名党员和约8.9万名共青团员，占全军人员的41.9%。士官中约有80%是共产党员，军官中有96%是共产党员。

军队中的士官，来自广大人民阶层，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在战争中受到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但文化教育和专业教育知

识不够,如1945年年中,有83.38%的士官没有受过中等教育。许多士官后来在15个军事学校中受到各种专业培训。这些学校于1945~1946年创办,运用了人民解放战争中的经验和翻译过来的苏联军事教材。一部分军官和将军被送到苏联军事学校学习,而苏联的军事专家在1948年以前曾在南斯拉夫军队的某些部队里工作。在对士官进行专业训练的同时,也加紧进行了军队的管理机构建设以及创立并发扬本国的战术的工作。

共产党还通过自己的党员来领导人民保安部即后来的国家安全局,并通过检察院对法院的工作施加影响。

当时的工作方法是由党政领导合一这个事实所决定的。在对社会经济发展实行集中的指令性计划时期,1947年4月南共中央通过一项决议,把群众性社会政治组织的领导机构、国家经济主管机关同党内的各部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更加强调党的工作的职业化。

以南共中央宣传鼓动部为首的各级党的领导机构的宣传鼓动委员会是党内外整个思想政治工作和理论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南共中央宣传鼓动部还制定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宣传鼓动机关在工作中依靠群众组织的积极分子、国家的文化教育机关和报刊。南共中央办的“久罗·贾科维奇”高级党校继承了战争时期训练班的工作,起了党中央思想教育机关的作用。到1946年11月改为一年制学校为止,共培训了623名学员。学员通过学习了解了新南斯拉夫建设及其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教员当中有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学员攻读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学习人民解放斗争史、“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法西斯主义起源、联共(布)党史、民族问题和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如同在宣传鼓动工作中一样,十分重视学习苏联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习南斯拉夫革命本身的经验。然而南共要求共产党员在学习苏联经验时考虑

到南共所处的条件。铁托本着这种精神在1947年指出：“脱离我国发生的事情研究联共(布)的历史,是徒劳无益的。我国发生了某些新事物。在我国,在我国的发展中有许许多多新途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许多新途径。这些途径实质上同苏联的发展并不矛盾……”

到1948年7月止,有927名学员在高级党校学习过。此后高级党校改为两年制。这一年里,又有6个共和国的一年制中级党校和10个三月制低级党校、6个函授学校和许多夜校加入了党的干部教育系统。还举办了许多学习当前迫切的理论问题的学习班,1/4的党员或预备党员上过学习班。在县委员会领导下举办教员进修班,在党支部里组织学习小组,作为党内教育的最广泛的形式,通常每周学习一次。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推动了理论工作。大量出版了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发表了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1941—1945年南斯拉夫的解放斗争》、爱德华·卡德尔的《新南斯拉夫的道路》、《米洛万·吉拉斯言论集》。1946年出版了《共产主义者》杂志,作为南共的理论刊物。1947年间出版了148种2441042册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著作。1945年全国97种报纸中最著名的是南共机关报《战斗报》,该报的文章具有指导性质。然而,思想教育方面最严重的问题是党员的文化程度低,有258973名党员是小学毕业,有32136名党员未上过任何学校。

通过宣传鼓动工作,解释了各种当前的和长远的政治措施和经济措施:如临时国民议会的法律、土地改革、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平会议的活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意义、合作制、税收政策、收购工作和播种工作。当时宣传鼓动方面的工作,具有按党的最高机关的指示搞运动的性质。1946年11月,在过渡到计划经济的前夕,南共中央在《关于今后提高劳动群众政治思想水平的工作》的决议中,提出了思想教育方面的新任务。介绍第一个五年计划变成了由报刊掀起的全民运动。宣传鼓动机构审查文艺演出和

书刊出版,批准纸张用量和书刊发行量,出版社的代表参加宣传鼓动委员会或与委员会进行密切的合作。新闻机构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团新闻部统一领导。

南斯拉夫人民阵线这个全民动员的统一政治组织的发展,也符合南共关于社会统一的政治结构的观点,符合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性质,符合革命民主改造的统一政治纲领。共产党通过人民阵线保证人民政权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和社会阶级基础,利用自己在政治制度中的领导作用来恢复国家和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创造经济社会前提。按照共产党的看法,“只有在人民政权不局限于无产阶级”而且扩大到社会所有劳动阶层的前提下,人民政权才能得到巩固。人民阵线的扩大巩固了本身的组织和人民政权的社会阶级基础,从而实际上也加强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1945年8月5~7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南斯拉夫人民阵线成立代表大会完成了人民解放统一阵线的改组过程。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前,1945年7月在卢布尔雅那召开了解放阵线代表大会,其他共和国也召开了人民阵线代表大会。各共和国的阵线联合成统一的组织——南斯拉夫人民阵线,通过了纲领和章程,章程规定了阵线的组织结构。根据基本组织原则,人民阵线不具有传统政党的性质,而具有特殊的全民政治组织的特征,有着明显的宣传鼓动职能。人民阵线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全民反法西斯民主运动”,是维护和发展人民解放斗争成果的“主力”和“基本政治力量”。凡是享有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接受本组织的纲领并缴纳会费的一切“诚实和爱国的”公民,均可参加人民阵线。人民阵线组织的成员可以是个人和集体,即公民和各个政治组织。集体会员不会自动取消这些组织的成员加入人民阵线的可能性。群众性的青年、妇女和工会组织构成人民阵线的基本力量;一切反法西斯组织、合作社、联合会和民主爱国人士在人民阵线中彼此有组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资产阶级残余势力把人民阵线说成是“扩大了南共”。人民阵线的每个成员都应参加一个基层组织,并向它缴纳会

费。基层组织有领导机构、各个工作部门、义务劳动队及其指挥部。在人民阵线里开展群众性的思想政治工作，而这一全民组织的成员也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主办的思想政治活动。

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的纲领反映了共产党在革命现阶段的观点和政策。人民阵线纲领的出发点是：南斯拉夫的独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团结和平等，要求反对资产阶级残余分子对劳动阶层的经济剥削，争取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条件，恢复经济和实行全民教育。在国际关系方面，强调巴尔干各国人民要团结，要加强同苏联的同盟和同所有民主国家的友谊。纲领以其革命民主的内容促使还在动摇的、或由于出身和以前的政治主张而倾向于资产阶级政党和集团的那些社会阶层发生分化。

人民阵线还包括战争后期加入人民解放统一阵线的资产阶级政党和集团，特别是它们的进步核心（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1945年6月起恢复了原来的名称、农民联盟、人民农民党、南斯拉夫共和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前进”小组）。共产党同这些党的代表合作，争取他们积极支持人民阵线，但反对他们恢复组织。有一个时期共产党也支持“农民协会”和“启蒙”组织（居住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族人的文化教育团体）、“前进”（居住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族人的教育团体）、“复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文化团体）的活动，使它们成为在人民阵线纲领基础上团结群众的形式。

人民阵线的章程正式规定保留资产阶级政党和集团在人民阵线领导机构中的特殊地位。这是铁托—舒巴希奇协议的义务所要求的，但也出于共产党想限制旧政党的影响和使所有爱国的和主张民主的公民团结在革命民主发展纲领周围的愿望。这些政党在人民阵线中的特殊地位被其他条款（必须接受人民阵线的纲领、这些政党的成员必须同时参加人民阵线相应的地方委员会）所削弱。不影响大局的联合因素基本上只存在于人民阵线某些上层领导机构中。在1946年1月，南共领导就已经认为，资产阶级政党和集团

的作用和影响已无足轻重了。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青年统一联盟是人民阵线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的突击力量。该联盟于1945年11月有137.4万盟员，是作为南斯拉夫共青团领导的群众性青年运动而发展起来的。1945年11月南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该联盟改组为南斯拉夫人民青年组织，这一工作于1946年5月在萨格勒布召开的人民青年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完成。南斯拉夫人民青年组织的任务同时也是南斯拉夫共青团的任务，后者是前者的先锋核心。要求人民青年组织巩固队伍，扩大成员，加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广泛团结青年参加国家的建设，发扬劳动干劲。1948年7月，南斯拉夫人民青年组织有1415763名成员，占全国青年的80%左右。

1945年6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妇女反法西斯阵线代表大会强调了这一组织在解放后的国家里的意义。妇女组织在战后负责对妇女开展各种人道主义的社会活动、教育活动和政治学习活动，以提高妇女的政治和社会积极性。在这一组织的各种活动中最突出的是：关心儿童的社会福利，教育落后地区的妇女，消除宗教迷信、宗法势力及各种落后习惯，对妇女进行政治教育和吸收她们参加政治生活。南共中央政治局于1945年秋要求各级党的领导机构更加重视妇女反法西斯阵线的发展和推动它的工作。

统一职工会团结了所有就业人员——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私营企业雇员和国家机关职员。取消了从前按行会的组织形式，采取了按工作部门组织工会的形式。工会组织是人民阵线内工人阶级自愿的和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特别是在经济部门里，工会组织把共产党同工人阶级直接联系起来。南共中央指导工会在完善生产组织方面的活动，但1945年年中也强调工会组织关心工人状况的任务。工会组织除政治和社会经济方面的保护职能外，还有政治教育的作用，这种作用特别表现于树立对劳动和生产的新态度，对爱护国家财产和加强工农联盟的新态度。工会继承了劳动竞赛的传统，

在庆祝五一节或11月29日国庆节时组织了群众性的劳动竞赛活动。在临近恢复的第二阶段时，即1945年底和1946年初，统一工会立即实行了劳动定额，作为开展竞赛和更有效地衡量劳动的前提。

生产会议是工会动员工人参加劳动和发扬他们的创造主动精神的工作方法。1945年年中，所有国营企业、私营企业、机关和团体都实行工人代表制，作为工人参加管理的间接的和咨询的形式。1946年底经济国有化后这种形式便不存在了。

几乎每一次政治、经济或文化教育活动，人民阵线都是它的组织者、执行者、推广者和积极的宣传鼓动力量。共产党虽然没有公开宣布自己是人民阵线的领导力量，但通过人民阵线来组织立宪议会的选举，说明和贯彻土地改革和移民政策，就巴黎和会、联合国会议和南斯拉夫的某些国际性倡议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人民阵线使共产党领导提出的总任务具体化。人民阵线各级组织于1946年募捐援助遭水灾的阿尔巴尼亚难民和从爱琴马其顿逃来的难民，宣传苏联和苏联的文化。人民阵线揭露敌人的口号，组织许多义务劳动，援助国内受战争破坏的地区，帮助重建被烧毁的村庄，发扬各民族间兄弟情谊的思想，派遣工人小组到农村帮助工作。人民阵线中的共产党员实际上是人民阵线的骨干、组成部分和领导核心，他们在群众中直接开展活动。各种运动通常都通过人民阵线在街道、企业中的基层组织的代表会议以及县或市组织的代表会议来开展。开完县和地区代表会议和集会以后，召开共和国或联邦的大型群众大会。

人民阵线组织在1947年9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约有700万成员，体现了人民的政治团结。共产党通过人民阵线指导人民群众的活动，检验自己的政策，从而确定了人民同国家政权机关合作的现有形式（如选民大会、公民会议、公民委员会、积极分子小组、人民检查委员会）的内容。

3. 巩固人民政权和镇压反 社会主义势力的反抗

建设人民政权机关。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政治活动和宗教团体对新制度的态度。1946年通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

战争结束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面临着在四年战争浩劫后使国家生活正常化的重大问题。它首先必须着手巩固人民政权，作为解决这些问题和实现自己提出的社会革命变革的基本工具。在这方面南共依靠了人民解放战争和革命时期的经验，依靠了已建立的机构和新干部。人民政权的基础是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是革命民主自治的机关，是在全国某些地区经过选举产生的。

根据1944年11月1日在贝尔格莱德签订的铁托—舒巴希奇协议，在政权系统中，除临时政府、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外，还存在摄政委员会。临时政府虽然有资产阶级势力的代表（米兰·格罗尔、伊万·舒巴希奇和尤拉伊·舒特伊）参加，但实际上继承了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的活动。成立了经济委员会作为国内的主管机关，在经济委员会内又成立了专门的恢复委员会。临时政府内设各联邦单位部，正式反映了南斯拉夫的联邦性质。1945年4~5月，又成立了民主联邦南斯拉夫各联邦单位的政府。根据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的法律，根据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和这个委员会于1945年8月10日改组成临时国民议会以后所通过的法律，成立了新的机构，采取了新的社会经济措施。在较短的时间里通过了立宪议会选举法以及解决迫切的社会经济问题和巩固新制度的其他许多法律，如土地改革和移民法、取消矿业中外国租赁制法、法院组织法、国籍法、反对人民和国家的刑事罪法。

绝大多数公民在政治上都参加了人民阵线、南斯拉夫反法西斯青年统一联盟、妇女反法西斯阵线、统一工会。共产党领导这些组织，并对国家机关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国家机关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化的政权机关。由于实行了陪审员制，法院民主化了。从公民中选出人民检察员，作为国家检察员的助手。公民十分积极地参加了政治、社会和国家生活，被选入人民委员会，参加人民委员会的各种工作委员会，参加选民大会的工作，参加各群众组织的工作，被选入打击投机倒把、没收国难财、征税等委员会，从而使开展这些活动具有群众基础。

反革命在战争中的军事失败，国际上对新南斯拉夫承认的特点和1945年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都决定了反社会主义势力反对革命所建立的制度的活动方式和激烈程度。共产党警惕地注视着遭到失败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尽管他们已不能严重地威胁新制度。在这些势力当中，占显著地位的有逃往国外的曾同占领者合作过的人、残留在国内的约2.1万名叛匪、不甘心南斯拉夫发生变化的部分政治流亡者、最大的教会里的上层人物和一部分教士、由于同占领者合作而被取消选民资格的公民(约20万)。民主联邦南斯拉夫政治生活中的合法反对派分子构成了一个特殊范畴，这是英国要求推行妥协政策的结果。敌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残余势力抱着新制度长不了的心理，同外国勾结，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国家对民主联邦南斯拉夫的干涉或昔日盟国之间开战来摧毁新制度和恢复旧制度。国际保守势力的每一个胜利或失败都使他们增强信心或灰心丧气和失去恢复旧制度的希望。在民族杂居地区煽动沙文主义是敌人最危险的斗争方法，因为它破坏作为人民政权基础和南斯拉夫大家庭根基的各民族兄弟情谊和团结。为了破坏南斯拉夫的防御能力和制造战争恐惧心理，他们散布失败主义，使人民在收复西北边界地区的斗争中丧失勇气；在这方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报刊和无线电广播大肆渲染东西方之间的冲突和原子弹的意义也帮了他们的忙。

战争结束后,西方大国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压力和军事压力以及支持南斯拉夫国内外反革命势力来阻碍南斯拉夫国际地位的巩固和国内形势的稳定,支持南斯拉夫的政治流亡分子开展反南斯拉夫的斗争。南斯拉夫的俘虏和被扣压的人员从德国集中营回国一事受到重重阻碍。从1945年到1947年有数十个南斯拉夫流亡者组织在西方活动,它们加入了接受美国大量物资援助的国际流亡者组织。在按军事原则建立的卖国部队营地里训练恐怖分子,派他们潜入南斯拉夫执行破坏和收集情报的任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阻挠引渡战犯的工作,拒绝归还南斯拉夫的内河船只和在国外的南斯拉夫黄金储备。反南宣传的强大浪潮通过电台和发行量很大的报刊冲击我国,这一宣传力图煽动沙文主义,攻击新政权,散布对制度稳定性的怀疑,贬低经济上的努力。1946年夏在切特尼克首领德拉戈留布(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之后,接着1946年秋在萨格勒布大主教阿洛伊集耶·斯特皮纳茨以战时亲乌斯塔什的行为和战后勾结乌斯塔什叛乱分子的罪行而被判处徒刑之后,对南斯拉夫的攻击特别加强了。从1945年到1947年,美国和英国武装力量在南斯拉夫边境从空中和海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挑衅。南斯拉夫由于支持希腊的民主力量和解放运动而使西方大国感到更加不能容忍。它们还对南斯拉夫施加经济压力,除限制经济贸易外,这种压力特别表现在归还南斯拉夫财产、赔款和帮助南斯拉夫恢复经济等问题上。

1945~1947年间,南斯拉夫法庭审判了许多乌斯塔什“思想家”、“军事将领”和部长、切特尼克首领、白卫军分子、“民族阵线”分子和其他卖国贼。尽管西欧国家拒绝引渡与占领军合作者和战犯,但不能不向南斯拉夫交出某些通敌分子,如德国占领下的塞尔维亚“民族拯救”政府总理米兰·奈迪奇将军,但没有交出臭名昭著的乌斯塔什战犯,如安特·帕韦利奇、韦科斯拉夫(麦克斯)·卢布里奇、安德烈·阿尔图科维奇以及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其他许多地方同占领军合作的人。切特尼克、乌斯塔什、白卫军、“民族阵线”分

子队伍中留在国内的同占领军合作过的恐怖叛乱分子,早在1945年年中已经被南斯拉夫军队、民防军、人民保安部、人民政权和人民阵线的积极分子所坚决打垮。这些集团的残部主要躲藏在边远地区,对某些设施以及对人民阵线、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成员和领导人进行恐怖袭击,企图使居民意志涣散。叛乱分子盼望即将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改变他们的处境。但外国干涉没有如期实现,经济恢复的成就和人民阵线在1945年11月选举中获胜,都使他们更加孤立。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开始寄希望于南斯拉夫发生暴乱和共产党屈服于西方压力。1946年年中还有数千名残存的叛乱分子,这并不构成制度不稳的重要因素,但安全机关不得不在难以通行的山地和林区同凶恶的匪徒和恐怖破坏分子进行顽强的斗争。

资产阶级政党的某些代表人物尽管意识到单独地同共产党和人民阵线较量是没有希望的,但他们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仍竭力想影响国内局势的发展,期待西方的支持。他们参加了民主联邦南斯拉夫的临时政府以后,或者说根据克里米亚会议的建议参加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它在1945年8月改组成临时国民议会)以后,便竭力要取消或改变人民解放斗争中通过的国家法规和政治决定,阻挠南斯拉夫朝着社会主义发展。以米兰·格罗尔为首的没有参加人民阵线的民主党企图合法地纠集并动员所有反对革命的人。该党得到其他政党和集团的某些派别和个人的支持,竭力主张修改解放战争和革命过程中作出的一切决定和取得的成果,要求尊重多党制的传统。格罗尔之流攻击联邦制和革命过程中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认为把马其顿作为联邦一员和强调黑山的民族特性是人为的做法。他们把建立联邦的思想看成是削弱国家稳固性的祸根。民主党头目在主张实行多党制的同时,建议按“民主原”则重新开始建立人民政权。他们贬低人民政权在经济方面的自力更生,要求依靠大国来恢复国家。然而,民主党在革命制度的力量面前没有什么广泛的政治影响,不久就从国家的政治

生活中销声匿迹了。

根据铁托—舒巴希奇协议，南共允许资产阶级政党和集团活动，尽管他们不赞成革命中建立的制度。共产党在他们当中区别哪些是人民阵线的拥护者，哪些是人民阵线的反对者，但没有把他们看作是新南斯拉夫政治结构的永久因素。1945年秋，对南共来说他们不是反对派，而是想使“历史车轮”倒退的“旧势力的营垒”。

一批流亡的政客(斯洛博丹·约万诺维奇、米兰·加弗里洛维奇、韦切斯拉夫·维尔代尔等)纠合在伦敦的所谓南斯拉夫人民委员会周围，于1945年9月要求对南斯拉夫公开进行干涉。他们自封为多数原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法代表和民主卫士，在提交大国外长会议的备忘录中，要求在盟国监督下进行立宪议会选举，监督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助物资的分配，取消“政治警察”即人民保安部。

教会上层和一部分教士对新国家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在战争期间同占领者的关系以及同民族资产阶级队伍中的通敌分子的关系。特别是全国解放后，国家和“好斗的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处于危机之中。以萨格勒布大主教阿洛伊集耶·斯特皮纳茨为首的罗马天主教上层继续保持战争期间对人民解放运动的敌意，抵制人民政权机关，拒绝调整同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通过土地改革和移民法时，在立宪议会选举前夕，当实行教会和国家分离、学校和教会分离时，由于个别教士帮助了“十字军骑士”即乌斯塔什叛乱分子，这一冲突表现得很尖锐。

罗马天主教会和塞尔维亚东正教会都攻击土地改革，认为这是威胁教会的物质生存和信仰活动以及从根本上亵渎社会正义的措施。

1945年9月20日在萨格勒布召开的主教会议通过了“神甫之信”，其中充满了对现行制度的攻击。罗马天主教上层反对土地改革，反对整个新政权，庇护同占领者合作的人和战犯，要求享受同新社会关系不相容的特权，要求通过“教廷”来调整国家与教会的关系。这是1945年秋竞选运动中对民主联邦南斯拉夫的一次最有

组织的攻击。一年后对大主教斯特皮纳茨的审判在西方和受梵蒂冈影响的报刊上以所谓信仰迫害为名对南斯拉夫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击。由于这个大主教在战争期间给乌斯塔什政权以宗教上的承认并执行了乌斯塔什政权强迫东正教徒皈依天主教的法律,对这个大主教的判决并没有使国家同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具有全面冲突的尖锐性,但仍然是紧张而不协调的。

共产党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承认教会团体有举行宗教活动的权利,但坚决反对利用宗教信仰达到政治目的。在探索处理教会与国家关系的方式中,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信仰是社会历史现象,不能用行政决定予以取缔的观点,根据天主教在南斯拉夫某些共和国里有悠久传统的事实,依据避免同梵蒂冈天主教中央机构发生冲突的愿望,以及依据有着许多教会和宗教团体的南斯拉夫多民族结构和联邦制国家组织这一事实。但同时,共产党坚持一条原则:教会在宗教领域里虽然是自由的,但不得影响信徒的政治生活。把教会排除出政治生活,某些教士由于同占领者合作而受惩罚,这些并不会影响党调整国家与教会之间关系的原则性方针。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政府主席铁托于1945年6月同大主教斯特皮纳茨会晤时,试图调整同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并坚持如下立场:必须通过国家和教会代表的直接会谈、而不是通过梵蒂冈和国家之间的条约来调整关系。共产党通过人民阵线和国家机关支持所有宗教团体中的爱国神职人员,从而在东正教神职人员、伊斯兰宗教团体神职人员、特别是斯洛文尼亚神职人员当中引起强烈的反响。然而,罗马天主教上层在教皇使节的支持下,在斯特皮纳茨受审后,仍拒绝成立神职人员联合会和调整同国家的关系。全国刚解放,就开始恢复原奥赫里德大主教区和成立马其顿自治和独立的东正教会,但这一行动遭到了塞尔维亚东正教会首领的反对。东正教教士中成立了神职人员联合会后,人民政权和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上层之间的关系开始改进,特别是总主教加弗里洛1946年回国以后。这一分化的进程,特别是在罗马天主教会以及塞尔维

亚东正教会部分上层里面，是艰难而缓慢的，因为问题在于存在旧的集中的组织，它有严格的纪律，建立在被革命废除的旧社会关系的体系之上。

在1945年秋立宪议会的选举运动中，人民阵线的积极分子揭露了资产阶级势力的真正目的和他们依靠外国改变现行制度的企图。现存的资产阶级政党和集团从组织上巩固和扩大的企图被制止了。公众生活的民主化激发了解放后的人民群众支持人民阵线深入贯彻社会经济措施的政策巨大能量，同时也揭示了旧制度的一部分追随者消极和倒退的迹象。1945年11月11日人民阵线的名单获得了绝对多数票，尽管米·格罗尔的民主党号召选民不参加投票；这里面也包含着该党已感觉到无力同人民阵线公开较量。

新选举出的立宪议会于1945年11月29日通过宣言，宣布成立共和国，正式废除君主制。宣布南斯拉夫是各平等民族的联邦人民共和国，正式名称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根据当时的发展水平，立宪议会于1946年1月31日颁布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宪法从法律上巩固了人民解放斗争的民主、社会和民族的成果，也包含了开辟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措施。宪法宣布了人民的主权，建立了议会制度，根据这一制度，代表机构（议会和人民委员会）是政权的基础，所有其他机关都是由它们产生并向它们负责的。1946年5月通过的人民委员会法把选民大会和公民委员会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宪法规定了政权统一的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组织的基本特征。宪法确认了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平等，保障各少数民族有发展本民族的权利。根据宪法，各人民共和国独立地行使权力，但由于权力集中在联邦最高国家机关手里，各共和国的权力实际上受到限制。确定塞尔维亚是一个复合的联邦单位，它包括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科索沃—梅托希亚自治州（根据1945年7月各该议会通过的决议）。宪法规定了建立在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之上的混合经济体制，在社会经济

关系中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起决定性的作用。

11月立宪议会选举和人民阵线外的资产阶级势力失败以后,在人民阵线内出现了反对派,即有名的“阵线反对派”,其代表人物是人民农民党总书记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以及所谓各农民党——人民农民党、农民联盟和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的一些议员。这一反对派的活动反映了阶级敌人反抗的新形式。从1945年底开始,约万诺维奇攻击“共产党人的一党专政”,主张多党制,反对低估”和“轻视”农民,批评使社会“国家主义化”的过程。约万诺维奇同人民阵线分道扬镳在人民农民党中引起混乱,“左派”的力量得到加强,把总书记开除出党,并于1946年秋在人民阵线纲领的基础上把几个农民组织(人民农民党和农民联盟)联合成统一农民党。

4. 经济恢复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

战争破坏的后果和恢复国家的主要方向。没收和接管。1946年和1948年的国有化。土地改革和移民。

随着国家的解放,在革命力量面前十分尖锐地提出了恢复国家和组织经济生活的问题,这就要求年轻的政权机关和劳动群众在一片废墟的欧洲物资普遍紧缺的条件下为了消除战争破坏的后果而作出非凡的努力。南斯拉夫居民在战争中历尽艰辛,除苏联和波兰外,遭受到的物质破坏也是空前的。根据1945年底南斯拉夫政府向巴黎盟国赔偿委员会提出的正式材料,南斯拉夫在战争中牺牲了170.6万人,其中约有9万名有技术的产业工人,约有4万名知识分子,这对不发达国家来说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损失。有822237栋建筑物被烧毁、摧毁或严重毁坏;约有28.9万家农户及其农用设备和农具被毁灭;交通线被破坏。贝尔格莱德至萨格勒布的铁路全线遭破坏,巴纳特和巴奇卡同其他地区的联系勉强保持,因为

多瑙河和蒂萨河上的桥梁都已被破坏；萨瓦河、德拉瓦河、德里纳河和其他河流上的桥梁也被破坏；火车车厢被毁；杜布罗夫尼克至萨拉热窝干线上伊万山的隧道被炸毁，奈雷特瓦峡谷和加贝拉的桥梁也被炸毁。利卡铁路从奥古林至克宁段有90%被毁坏。起义地区、人民解放斗争根据地遭到破坏、被烧毁、经济上一贫如洗。人民和人民政府机关不得不作出极大努力来恢复这些地区的生活。在战争期间的许许多多多次轰炸中，贝尔格莱德遭受巨大损失。波德戈里察被彻底摧毁，斯拉沃尼亚布罗德、扎达尔等城市受到严重破坏。有973个工业企业受到破坏或完全被毁。一部分工厂和火车车厢被占领者拆卸并运走。文化古迹、学术机构、图书馆和学校都未能幸免。

共产党极其重视恢复问题，认为政治局势的安定也取决于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当时必须安排好对居民的供应工作，因为在占领制度下供应十分糟糕。尤其必须向曾是人民解放斗争根据地的地区提供援助，保证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建立统一的货币制度，恢复交通联系。党把恢复工作不仅理解为消除战争后果和整顿经济生活，而且理解为创造最必要的物质条件，以便在国家所有制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着手实现国家工业化。人民政府机关依靠战争时期解放区的经验和工人及青年的劳动干劲来组织恢复工作。

鉴于有必要把经济联合成统一的整体，除工业和农业外，交通也在恢复工作中占首要位置。贝尔格莱德至萨格勒布铁路日以继夜地抢修。随着战线向西移，从萨格勒布开出的第一列火车于1945年6月中旬抵达泽蒙。除铁路线外，公路交通也修复了。在沿海地带和内河清除了占领者在战争期间或撤退时布下的水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从1945年6月起提供的机车和卡车也有助于改善交通状况。

1945年年中匆匆恢复起来的工业转向民用品生产，但许多客观因素妨碍了工业产量的增长。除了整个工业不发达、工厂遭破

坏和农业落后外,原料、专家和运输工具不足对此也有影响。许多企业开工不足。根据1945年统计,工业部门就业工人总共只有393299人,而且技术熟练程度很差。本来就很少的专门人材在战争中又减少了35~40%。农业中缺少农业机器和农具、役畜和种子。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在南斯拉夫军队中。在伏伊伏丁那,主要是从战争破坏的地区把军属迁移到这里,填补了由于占领军撤退和德裔居民迁走而造成的无人区;但由于来自山区的移民难以适应和不习惯新的劳动条件,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没有立即明显地表现出来。国家机关用行政措施——动用个人的机器、拖拉机和机耕犁,对农业进行了干预。

1946年土地耕作计划规定,要耕种750万公顷土地即要达到1939年的水平,这超过了乐观的预计。农具被毁坏或已不能使用,农村一贫如洗,土地贫瘠,在起义地区尤其如此。1946年春开展了农业生产运动,农村投入了“五一”竞赛。行政干预和国家其他调节措施仅仅是农业活动的一个方面,群众组织的成员,特别是青年、南斯拉夫军队战士、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人使这一活动达到了真正的高潮并赋予它实际内容。

人民政权机关从战争一结束就特别关心居民的粮食供应。城市居民和军队的粮食、工业所需的原料和国家工业发展所需的积累资金都是通过收购农产品来保证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于1945~1946年向南斯拉夫提供了大量食品、原料、药品、车辆、拖拉机、野战医院、包括医学专家小组,尽管这一援助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战争中的贡献、所遭受的苦难和巨大牺牲相比是不相称的。供应政策所依据的原则是,在供应的数量、品种和次序方面,从事生产的居民优先于不从事生产的居民。首先供应遭毁坏的地区。在战争中部分遭难或部分遭破坏的地区有义务动用一切储备,在提供援助方面起带头作用。从1945年春天起,法律禁止不法经商和投机倒把,这些行为在商品缺乏的条件下十分猖獗。1945年4月到7月实行币制改革,停止各种占领者货币的流通,并发行民

主联邦南斯拉夫的第纳尔，这对整顿总的经济形势和建立统一的经济环境是一种促进。

从纳粹法西斯俘虏营和集中营中遣返南斯拉夫公民的工作，是解放了的国家的最重要的政治、社会、人道和经济活动之一。根据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社会政策代表机构的统计，由于人民政权的迅速干预，到1945年10月，440750名南斯拉夫人中，遣返了约33.5万名，其余的人“散居”于国外。

全国刚一解放，就开始关心约23.6万名战争孤儿，把他们送进孤儿院、幼儿园、国家办的儿童之家，或由某些家庭收养。妇女反法西斯阵线、统一职工会和反法西斯青年统一联盟在这项人道主义的事业中对国家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保护机关给予了决定性的帮助。

在恢复经济和安排生活的同时，还恢复了学校网和教育机构，同时采用新的教学方法，这是革命带来的关系民主化的现象。除增加各种学校的学生人数外，还开办了少数民族的学校，强调了职业学校的意义。共产党发扬学校中的民主精神，强调宪法规定的学校与教会分离的原则。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三所大学虽然招生人数有限，但还是于1945年秋天开学了。在斯科普里开办了第一所马其顿大学。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成立了医学系和法律系，为未来的大学奠定了基础。新的教育政策是，力求增加学校学生和训练班学员的人数，使文化成果为工农所享受。普及国民教育、普及科学和艺术成果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增多了。1946年底，南斯拉夫约有1000所人民大学，一年以后，有2216所文化馆和约3000个业余爱好者小组。扫盲班具有统一的规格和搞运动的性质，它的成绩也像在经济部门中那样可用超额完成计划的程度来衡量。根据1948年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供的材料，1946～1947年期间，有40多万名妇女学会读书和写字。在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妇女不再戴面纱，这件事得到了人民阵线和妇女反法西斯阵线的积极分子的支持，保守势力和保守观点的阻力被他们扫除了。

南斯拉夫经济恢复工作的特点是，这一工作是靠本身的力量完成的，虽然也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不少援助。在国家遭破坏、物资普遍紧缺和同外国的贸易停顿的情况下，动员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主要方法，而各种形式的自愿劳动，包括群众性的义务劳动、竞赛和突击运动，是恢复的最主要的手段，自愿劳动的运动起源于战争时期，但到了解放后才具有广泛的规模，遍布全国，成为经常的做法。自愿劳动体现出劳动阶层的革命热情和他们共产党的政策及已开始的社会经济关系变革的支持；它解决了财政经费和机器不足的问题，从而也表现出新的劳动态度。在竞赛中对忘我劳动者授予突击队员的称号。工农群众，特别是青年，使自愿劳动的运动蓬勃而广泛地发展。1946年建设长达92公里的布尔奇科—巴诺维契青年铁路，标志着南斯拉夫青年全国性大型义务劳动的开始，有来自欧洲和世界各地22个国家的青年参加了这次劳动。工人在恢复经济和国家工业化中所作的努力是出自道义和政治的动机和受到物质的鼓励。体力劳动崇高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声望弥补了建筑业和其他生产活动中机械化设备的不足。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不发达，面临着战争的严重后果，工人阶级的技术熟练程度不高，不熟练工人和学徒工占大多数，在这种条件下义务劳动的形式具有特殊的意义。共产党只有通过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潜力，运用政治热情和劳动干劲，才能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特别是在恢复国家的过程中，政治上和劳动上意气风发的群众解决了看来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和生产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群众这么广泛地动员起来，是由于保持了刚结束的人民解放斗争中的革命干劲，由于群众忠于共产党对社会进行革命民主改造的政策，由于劳动人民相信在克服了战争留下的困难之后将会有美好的生活条件。

在恢复工作中，除精神鼓励外，新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对工人的干劲是巨大的推动，如开放工人休养所，禁止青年和妇女上夜班，整顿卫生和社会保险制度，对经济部门战前的学徒实行义务专

业培训。在贯彻新的劳动立法和社会立法的斗争中，政权机关同工会紧密合作。国家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会组织和积极分子也推动了生产的技术进步。

全国解放后继续执行早在人民解放斗争中在爱国和革命的基础上执行的“剥夺剥夺者”的政策(没收同占领者合作的人及战犯的财产、接管、没收国难财)。到1945年底，在南斯拉夫已实现国有化的有：约55%的工业，约70%的矿山，约90%的黑色冶金工业，100%的石油生产，约60%的非金属工业。根据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没收了德裔居民的土地(总共119451户，618761公顷土地)，但极少数同人民解放运动合作的德裔居民除外。虽然在经济生活的某些领域，如在商业和建筑业中，还保留私有制，但资产阶级在经济关系中不再有重要的地位。在实行大规模的剥夺措施之后，资产阶级的残余仅是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仅代表不多的居民阶层。

外国资本在南斯拉夫经济中曾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客观上曾威胁国家的经济独立(在工业中占49.51%，在个别经济部门还要高得多，如在冶金业占90.9%，在金属加工业占55.8%，在化学工业占73.6%，在纺织业占61.4%，在木材加工业占51.4%)。对这种外国资本采取了接管的措施，即在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前把财产置于国家管理之下。鉴于即将召开和平会议，从国际角度考虑没有把外国财产转为国家所有，但这一措施客观上加强了国营经济成分，因为利用接管财产的积累具有与没收相同的实际效果，能比较充分地消除外国资本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从而为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创造更多的条件。

人民财富国家管理局作为中央集权制的经济机构对全民财产实行管理和监督，按这个式样建立了各共和国的人民财富管理局及其在各地区、市和县的下属机关。1945年夏，没收和接管的财产转交给联邦和共和国相应的经济部经营。

由于剥夺了资产阶级，建立了国家所有制，作为新的社会力量

所依靠的革命政权的物质基础,从而也为国家的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全民(国家)所有制的财产在经济中占最重要的地位,按经济力量比合作社成分和私有成分强大。除农业领域外,国家所有制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关系。虽然没收和接管的措施没有完全取消私有制,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据垄断地位,从而客观上确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国家所有制被认为是革命力量最牢固的经济支柱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这种经济发展不仅能解决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能解决国内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共产党抱着这样的信心提出生产资料国有化,从而最终解决了接管的外国财产和被遗弃的财产的问题。南共中央政治局在1946年9月22日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于1946年12月5日通过了国有化法。国有化从法律上正式确认了基本上已存在的状况,即农业以外的经济部门中私有制基本上已被消灭。国有化法涉及到42个经济部门中具有“全国意义”和“共和国意义”的企业:所有工业部门和矿业、银行和保险、温泉疗养地和医疗矿泉产地、批发商业、交通。在这些部门中完全消灭了私有成分。约有70%的地方工业企业转为国家所有。

这一法律为1948年4月28日通过的新法律所补充。新法律把国有化的范围扩大到小工业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驳斥斯大林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政策的阶级性有问题的指责。只有手工作坊和小型手工企业仍归私人所有,但也在国家的监督下被纳入计划经济的范围。

土地占有关系方面的革命变革是国家社会经济结构总变革的组成部分。这一变革早在起义开始的时候就已在全国各地发生了,但由于各地区有特殊的和不同的历史情况和人民解放斗争进程,这一变革具有很不相同的形式:从取消对分制和佃农义务,接管和没收敌人财产,到土地改革的某些措施。然而,在战争结束阶段这些变革就已生效,并已体现出共产党在农民问题上的

方针。

鉴于农民广泛参加了人民解放运动,农民历来同土地连在一起和必须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共产党认为必须毫不拖延地着手制定土地改革法。全国解放后仅三个月,在立宪议会选举前夕就完成了这项工作。1945年8月23日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国民议会根据耕者有其田的原则通过了《土地改革和移民法》。这一法律的实施剥夺了大地产,废除了土地关系中的封建残余。私人占有土地限额为45公顷,雇佣劳动力耕种的土地限额为20~35公顷,非农业人口占有土地限额为3公顷。剥夺了宗教团体的土地(占其占有土地总面积的85%)、以及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土地。

物质上受损失的宗教团体以及临时国民议会中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反对土地占有关系中的变革和这种变革的社会阶级内容。共产党依靠受益的农民的支持,通过国家机关和群众组织彻底地执行了土地改革和移民。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可用于进行土地改革的土地总额为156.6万公顷。其中绝大部分在伏伊伏丁那、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超过一半的土地(约79.7万公顷)分给了农民,其余部分分给国营农场(28.8万公顷)、国家机构(20357公顷)、国营企业(4万公顷)、农业合作社(4.07万公顷)和其他使用者。土地改革就其社会后果而言客观上超过了资产阶级社会土地改革的范围。同时,大型国营农场的建立也为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农业中的所有制关系形式(国家、合作社和私人三种所有制),反映出南斯拉夫革命的特殊性,为整个农业政策发展的新方向开辟了道路。当时的出发点是,相信所有制关系的这种结构客观上将促进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由于农民有分割地块的传统,土地改革前在南斯拉夫绝大多数是中小土地占有者。把土地分给曾是革命基本社会力量的农民,同时也意味着满足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时附带提出的一个革命要求。战后的这一次土地改革不仅消灭了资本家大地产,而且使它不能恢复。

移民也是解决农民问题的组成部分。移民于1945年秋天开始,是革命政权重要的社会政治措施,它解决了受战争破坏的贫困地区居民的社会经济状况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伏伊伏丁那地区德裔居民随纳粹军队撤走后缺乏劳动力耕种土地的问题。伏伊伏丁那是主要移民区,那里拨出一部分土地安置从其他地区移来的居民和战士。包括外来的(跨共和国的)和本地“内部的”移民在内,共迁移了约6万户。人民政权机关通过提供住房、农具和农业生产贷款,给移民物质援助。

农民劳动合作社被当作合作制的最高类型,但重点放在发展统一形式的基层农业劳动者合作社上,前景是使农村的所有经济活动部门都联合在这种合作社的周围。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批判了资产阶级关于“合作制国家”和“全盘合作”的陈词滥调,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的传统观念,即合作社的管理工作只能由有经验的男人(“男主人”)来担任,把妇女和青年排除出合作社的管理机构。社员还通过社员大会对合作社的工作发生影响。

共产党人把建立起合作经济的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看成是克服农业生产分散状态和逐步过渡到农村合作组织和合作经营的高级类型的合适形式。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和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在农业中占优势的“私有成分”也离不开全社会的利益。个体农户拥有绝大部分供应市场的剩余农产品,但国家通过行政收购政策指导这些农产品的分配。根据南共中央委员会的倡议,1947年底开始修建合作社之家,想使它在改造农业中成为农村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虽然法律规定为建立农民劳动合作社提供优惠,但原始的生产工具妨碍了通过建立这种合作社来广泛实现合作化。农业中所谓联邦级、共和国级和地方级的“国有成分”表现为国营农场、地方农场、苗圃、养马场、科研机构、农业学校、农机站。

1946年通过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保证劳动群众免受剥削,保证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决定

性作用和合作社在紧密联系合作制成分和国有成分中的新作用。

5. 工业化政策和行政集中管理的 官僚主义后果

国家管理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关系官僚化的倾向。

南共认为,加快工业化是使南斯拉夫摆脱经济和文化不发达状态、为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创造前提的唯一途径。为了能够为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创造初步的基本的条件,在把政权相应地集中在国家即党的手中的同时,有必要把物质生产力和资源集中起来,即实行革命的国家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初期的必要过渡阶段。在调节生产和交换的所有过程中以及在调节社会生活所有其他领域中的国家所有制垄断,构成了革命的国家主义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因此,共产党把继续革命同被剥夺的资产阶级财产国有化和在生产、交换、分配领域实行集中的国家计划联系起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还规定了计划体制以及为了公共利益而实行剥夺和对私有生产成分实行监督的权利。发展工业的积累由国家掌握。按行政方式制定生产和分配计划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而党和国家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制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组织社会的唯一形式。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过程表现为社会经济的根本变革,这种变革在革命的武装斗争阶段结束后在国内展开,其目的是加强工人阶级的社会作用。这些过程基本上反映了南斯拉夫社会的发展。1946年年中以前,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开始恢复,这是过渡阶段的特点。在这个过渡阶段结束之后,社会经济制度具有国家集中制的特征。1946年12月国有化前夕,通过一些总局和总管理处把经济企业完全纳入

国家结构。总局成了部长的“派出机构”和部长的“报告员”。行政分配取代了市场，价格的确定脱离了经济标准。1946年12月，南共中央政治局要求完成五年经济计划和一年经济计划草案的起草工作。1947年4月国民议会通过了1947~1951年南斯拉夫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法。南斯拉夫第一个五年计划具有国家法律的效力，它和国家管理经济的整个制度一样，是按苏联“五年计划”和苏联经济制度的模式制定的。国家预算具有整个经济财政计划的特点。产品流通税是税收的基本形式，经济部门创造的大部分积累通过这种税收形式流入预算。经济委员会领导各种经济活动，整个国民经济都归它管辖。经济计划机关起主导的作用，而每个主管部领导各自的经济部门。

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规定，要用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来克服历史遗留的十分不利的状况和很低的劳动生产率。五年计划法特别强调必须克服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即加速发展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黑山和南斯拉夫其他不发达地区；规定在不发达的共和国里工业发展速度要更快，以便逐渐消除或者至少大大缩小过去遗留下来的发展程度的差距。今后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发展基础工业上，认为这是发展轻工业、交通和农业的条件。力图通过大规模建设重工业来改变生产结构，用过去国家经济中短缺的工业品代替农产品出口，为发展交通、恢复原有企业、实现矿业和农业生产机械化创造条件。还规定要扩大文化、教育、卫生和福利机构网。由于迫切希望国家尽快摆脱不发达状态，以致过高地估计了现实可能性。五年计划规定，南斯拉夫工业生产同1939年相比要增加4倍，农业生产要增加50%。为了实现五年计划，使用了靠流通税以及农产品、原料及工业品差价政策而获得的全部社会积累。打算拨出大量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同时也依靠苏联和发达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援助，特别是在设备和技术资料方面。

1947年4月1日到11月15日，约21.2万名南斯拉夫人民青年联

盟盟员用冲天的干劲和劳动热情建成了242公里长的沙马茨—萨拉热窝铁路。这是五年计划头一年的最大工程,约有4800名专业人员(工程师和技术员)参加了这项工程。这条铁路建成后有2.5万多名青年参加了各种专业训练班学习和到各经济部门工作。来自五大洲42个国家的近6000名有不同政治倾向的男女青年(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民主党人)参加建设这条铁路,为不同国家、不同信仰和不同政治主张的青年之间的合作和谅解开辟了道路。在修建尼克希奇—铁托格勒铁路中,青年打通了穿过“顽石”山的56公里线路。约有1.6万名南斯拉夫人民青年联盟盟员在贝尔格莱德和当地人民阵线的帮助下于1948年1月在热莱兹尼克建成了“伊沃·洛拉·里巴尔”机床厂,该厂的设备是用德国的赔款购置的。1947年青年义务劳动的总值占整个基本建设的13%。1948~1949年间建成了一些大型钢铁厂——泽尼察、锡萨克、瓦雷什、伊利亚什等地的钢铁厂。在金属加工工业方面,除了热莱兹尼克的“伊沃·洛拉·里巴尔”工厂外,建成了卢布尔雅那的“利托斯特罗伊”工厂和萨格勒布的“五一”工厂。建成或改建了一些大型企业,如萨格勒布的“拉代·康查尔”工厂、斯拉沃尼亚布罗德的“久罗·贾科维奇”工厂、斯韦托扎雷沃的电缆厂、塞沃伊诺的铜材厂、特雷普查的炼铅厂。在亚布拉尼察、弗拉西纳、梅久弗尔谢、莫斯特、兹沃尔尼克、马弗罗夫、维诺多洛等地动工兴建水电站,在泽尼察、科卢巴拉、卡卡尼、绍什塔尼等地兴建火力发电站。1949年约有6万名南斯拉夫军队战士和约25万名青年组织成员参加了贝尔格莱德至萨格勒布“友爱团结”公路的修建。

五年计划还规定要提高农业生产,增加耕地面积和转向多种经营。然而,1947~1948年农业投资要比工业投资少得多。这一经济部门仍然落后,在农业的产量和产值方面1956年才达到战前水平。农业很慢地从战争中遭到的严重破坏中恢复过来。许多耕地被荒弃,农业的技术装备很差,农产品市场也组织得不好。

为了保证向军队和城市居民正常供应主要食品,向工业供应

原料,以及保证工业加速发展所需的积累,当时实行了粮食、肉类、羊毛、工业原料的义务交售制,按统筹分配的任务和预先确定的价格交售。在开展收购运动期间,共产党人作为人民阵线的积极分子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要求农民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粮食交售义务,同时提高他们关心公共利益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通过这种途径保证供应居民食品和工业原料的必要性。然而,轰轰烈烈的政治工作并不能消除对这一行政措施的抵制、农村的不满情绪和动乱、以及各种紧张的局面。为此,对农民也采用了刑事制裁和其他强制措施,实行罚款和没收粮食、农具和不动产,甚至采用剥夺自由的处罚。

在战后头几年里,由于对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实行剥夺,在南斯拉夫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大地主从社会结构中消失了。由于实行没收和国有化(1946年和1948年)以及土地改革(1945~1948年),资产阶级丧失了从前的经济实力。南斯拉夫王国的一部分统治阶层在战争旋涡中消失了,另一部分则流亡国外,期待新制度的覆灭或积极从事颠覆新制度的活动,以利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国家迅速工业化从人口过多的南斯拉夫农村吸收大量劳动力,使居民原来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从1945年到1948年底,在经济部门、行政机关,以及教育、文化和其他领域就业的人员超过100万人。1945年全南斯拉夫有职工46.1万人,1946年有72.1万人,1947年有116.7万人,1948年有151.7万人,1949年有199万人。新工人涌入城市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工程。各种各样行政机关的职员随着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国家作用的加强而日益增多。这些职员加上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对城市、特别是对大的行政中心也产生巨大压力,使本来就不足的住房更加紧张。

到1947年底工业生产就已比战前增加了21%,但以加紧积累为基础的迅速工业化产生了工业品价格高昂的后果。另一方面,农产品、房租、交通和城市劳务的价格仍然很低。商品流通和商业

网及劳务仍然不发达。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机器、工业设备和原料，除食品外，几乎没有进口任何日用品。虽然也向社会福利设施投资——修建休养所、文化设施、体育场等，但投资主要用于工业化。南斯拉夫不得不为自己的不发达状况付出代价，因为用紧缺的物资和大量就业的办法来加紧实行工业化必然会影响居民的社会生活水平，特别是个人生活水平。对经济实行集中领导，特别是在通过五年计划以后，有助于财力和人力的集中使用，但同时也削弱了工人的主动性和对合理使用物资、财政资金和劳动力的关心。授予集体荣誉称号和表彰个人为突击手、功勋农民、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这种精神鼓励形式虽然在初期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从调动劳动积极性来看，是很重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不能刺激劳动者对经济的直接关心。在经济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各领域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支配着收入。实行凭票供应。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在供应上享受优待。给领导干部的实物供应和其他形式的特权开始越来越盛行（特供的内部商店、免费的住房等）。

随着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直接调节作用的加强，特别是在实行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制度之后，执行和管理机关、一般政治机关、指挥机关、专业管理机关和监督机关的意义增加了。国家扩大了对经济的管理，从而使复杂的层层管理监督的机构膨胀。1946年年中，建立了从联邦到县的计划机关及计划主管部门。执行机关绕过了代表机关。根据宪法，政府有很大的权限，实际上是经济和社会的行政领导体制中最有权力的机关，享有最大的政治威望。对事务的集中管理，首先是对经济的集中管理，是在国家所有制垄断的基础上进行的。除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邦的各部集中管理事务外，各共和国的部也集中管理事务，忽视人民委员会的自治性。国家在经济和生活的其他部门中作用的加强必然使职员的人数增加。人民委员会日益作为上级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行政执行机构而行使职能。各个国家管理部门的组织单位实际上是按严格的等级自上而下地联系在一起，这样就改

变了人民委员会的本来面貌，削弱了它在工作中的自主性和决策权。人民委员会被上级机关下达的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忙于完成行政事务。由于人民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负有双重责任（要向人民委员会和上级执行委员会负责），它的权力越来越大了。人事工作严格集中。党的干部在相应的国家机关中同时兼任这些工作。

在物资普遍紧缺的时期里，联邦主管经济的各部直接地或通过共和国各部领导经济工作，制定计划，分配原料、燃料、劳动力、贷款，监督经营，并通过各总局和总管理处对企业实行业务领导。企业具有法人的资格，但却没有充分的业务自主权，处于国家管理部门的领导之下。企业的创办者决定了对企业的行政业务领导，拥有很大的管理权。1946年通过的《国营经济企业基本法》规定经理作为国家代表对企业进行直接领导，授予经理在劳动关系和纪律责任方面以巨大的权力。劳动集体对企业的经营只有间接的影响，即通过协商会、生产咨询会、工人代表、工会组织施加影响。

一方面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人民解放斗争时期和早期恢复战争创伤时期养成了革命民主精神，另一方面加强国家作用的社会需要却在客观上具有官僚化的倾向。在这两者之间存在客观矛盾的条件下，党直接指导建立国家集中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机制。官僚集中制倾向是在国家所有制关系和权力集中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执行机关手中这一土壤上滋长起来的。南共当时没有看出官僚集中制的危险。南共批评“官僚主义”，但把它理解为“旧官僚习气的残余”，或理解为“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任务”、按照旧规章办事、战后仍存在的旧官吏作风、道德沦丧、旧工作作风的残余。不但如此，从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中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过程使共产党人对分散主义倾向——“共和国主义”和地方主义——更加持批评态度，尽管在这一体制中隐藏着革命意识和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之间的潜在冲突。

随着国家在经济和整个社会中作用的加强，事务的管理越来越

越集中,特别是在通过五年计划以后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党的领导越来越把人民阵线当作一种纯粹的摆设,从而使它开始丧失劳动人民政治组织的特点。党和国家机关日益明显地溶合在一起。社会关系及党本身的官僚化过程是同物资和资金的集中管理以及严格集中分配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群众的社会活动和自觉的政治行动死气沉沉。人民阵线中的共产党人等待党领导的指示。1946年底和1947年期间,随着工业化的开始,人民阵线的工作重点越来越明显地转移到经济建设领域。1947年9月26~27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人民阵线是“我国情况下工农联盟的理想的形式”,但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却使这个组织适应于集中领导计划经济的需要,把它同国家机关连在一起,发挥经济职能,主要是组织义务劳动。这一切都导致逐渐压抑革命热情,但群众的革命觉悟仍然很高,因为战争时期和恢复时期政权的民主性是根深蒂固的。短时期的行政集中管理经济和社会的体制具有革命国家主义的特征,没有发展成为引起严重社会动乱的异化的官僚主义体制。尽管出现官僚化倾向,南共依旧同群众保持着联系。

第二章

维护独立和抗击霸权主义

(1948~1952年)

1. 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攻击

情报局的成立。南苏关系中的矛盾和斯大林对南共领导的攻击。情报局《关于南共状况》的决议和南共中央的声明。

1947年9月底,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共产国际解散后仅4年,根据联共(布)的建议,在波兰西部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温泉疗养地成立了几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共产党情报局)。情报局是在苏联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加剧和分歧加深的时候成立的。在国际关系中运用实力政策的做法日益频繁。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日益导致国家之间的对峙。关于德国问题的谈判中断了。苏联政府反对杜鲁门主义,拒绝美国政府的马歇尔计划,理由是这一计划提供的经济援助会损害欧洲受援国的主权。其他东欧国家遵照这一立场也没有接受美国的这种援助。由于同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签订了和约,苏联军队驻扎在这些国家的国际法依据便不复存在了。这一情况也对情报局的成立产生影响。

情报局是作为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

利、波兰、罗马尼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西方两个最大的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国际机构而成立的。参加这一组织成立会议的是：安·日丹诺夫和格·马林科夫代表联共（布），爱·卡德尔和米·吉拉斯代表南共，伏·契尔文科夫和V·波普·托莫夫代表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鲁·斯兰斯基和S·巴什托万斯基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M·法卡什和约·雷瓦伊代表匈牙利共产党，瓦·哥穆尔卡和希·明茨代表波兰工人党，乔·德治和安·波克代表罗马尼亚共产党，雅·杜克洛和艾·法戎代表法国共产党，路·隆哥和E·雷阿勒代表意大利共产党。联共（布）代表安·日丹诺夫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波兰工人党代表瓦·哥穆尔卡作了关于各国共产党交流经验和协调活动的报告。

安·日丹诺夫对形势的估计是：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其主要目的是加强美帝国主义；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其目的是制止帝国主义和防止法西斯危险的再现。日丹诺夫的这种估计被接受了。根据这一估计，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力量削弱而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加强的条件下展开的。联共（布）代表认为，对方“阵营”采取军事战略措施来反对民主国家，实行经济扩张和加剧意识形态的斗争来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各国共产党应当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民主的总纲领基础上团结自己的力量，以便消灭帝国主义扩张、西方的侵略、经济和政治上的奴役。这就要求一切民主力量团结自己的队伍，联合行动。

鉴于共产国际活动中的消极经验和共产国际解散时所作的说明，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集中的组织不符合各国共产党作为本国工人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所以情报局的任务仅限于“组织经验交流，必要时在相互同意的基础上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会议决定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

南斯拉夫共产党对战后国际力量总的对比作出了类似的估计,同时深信苏联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支柱,认为世界革命进程不可避免地会扩大,社会主义力量和进步力量不可避免地会加强。因此,南共也主张各国共产党更密切地联系,开展平等的合作和协调反帝国主义的行动。本着这种精神,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于1945年和1946年访问莫斯科时,曾讨论了关于建立欧洲共产党的共同机构的想法。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反共主义害怕“共产党的颠覆”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从而加深了国际关系的危机并使世界分成集团,南共领导更加肯定了上述想法。

然而,情报局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的新形式。它仅仅是表面上规定交流经验和协调某些活动,实际上却超越了协商和协调的权限,具有确定共同政策的组织的特征。它只是形式上适应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新关系的客观需要,这种客观需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新的力量对比而产生的,是由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形式多样性和社会主义发展为世界进程而产生的。实际上情报局的成立并没有消除旧关系,这种旧关系作为对资本主义势力的联合的回答,包括:把苏联经验绝对化、否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各国共产党之间磐石般的团结。在成立会议上就没有采取协调立场,而且指责某些共产党的政策,从而开了先例。联共(布)代表批评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同资产阶级合作和对社会民主党态度温和;南共代表也因为他们热衷于议会主义、向梵蒂冈和戴高乐主义让步而提出了类似的批评。

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把情报局(过去把共产国际)首先看成是贯彻自己的国际政策的工具,这种国际政策的表现之一是对其他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派别持宗派主义态度,低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进程和反对殖民主义的解放斗争。国际工人运动中尚未消除的共产国际的过时精神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倾向恰恰适应了上述的政策,而建立情报局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合作和联系的观点含有霸权主义的意

图,它表现为力图决定和指导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并通过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和其他合作控制这些国家的内部发展。斯大林除了要使东欧国家共产党的政策“划一”外,还竭力想指导西欧几个最大的共产党的活动,使它们的活动也服从于自己的对外政策的利益。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样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仅仅归结为保卫和支持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义务,而忽视如下事实:在国际大家庭中已存在若干个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国家。斯大林不承认各党及其领导的自主活动,也不接受任何党的政治建议,如果事先不向他报告或者他没有直接过问的话。联共(布)保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的作用。

斯大林的观点必然会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依靠本国革命成果和自身经验的力量、首先同南斯拉夫共产党发生冲突,因为南共同斯大林相反,主张各国共产党之间和共产党执政的各国之间建立平等的关系。早在战争期间斯大林同南共虽然没有发生直接冲突,但是存在着芥蒂。斯大林之所以对南共有保留,是由于他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作教条主义的解释,首先是由于他力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保持霸权地位,对南斯拉夫的内部发展和对外政策强加或保持适当的影响,这尤其是因为南斯拉夫的政治地理位置在苏联的战略行动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树立起来的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时同南斯拉夫共产党和铁托个人日益提高的威望发生冲突,同南斯拉夫独特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产生的威望发生冲突,因为这一革命的经验在当时历史情况下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当中。鉴于所有这些情况,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冲突必然要给情报局的整个活动和政策打下基本烙印,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反抗实质上不仅是捍卫走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道路的权利,而且也是为争取国际关系和共产主义运动及工人运动中一律平等的原则而斗争。

1947年以前,包括战争时期,南苏关系就已经出现了矛盾与不

和,虽然总的说来双方的合作在顺利地发展。不和主要是斯大林引起的,他力图在相互关系中(经济往来,建立合营公司,成立苏南经济银行的设想)把某些不平等的形式强加给我们。1946年4月,爱德华·卡德尔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安德烈·赫布朗在对苏经济关系中退让和忽视南斯拉夫的需要和利益。

1947年底,当看起来南苏两国和两党是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实现最密切的合作的时候,南苏关系开始恶化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根据斯大林倡议而成立的情报局的成员,该组织的总部设在南斯拉夫。情报局的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在贝尔格莱德出版发行。这些年里铁托到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访问都证实了南斯拉夫在“人民民主”国家中享有威望。这一切都表明在南共、联共(布)和情报局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观点无疑是一致的。但就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相反的情况,不能不使人感到突然和意外。首先,1947年底采取了经济压力措施:苏联领导决定推迟同南斯拉夫签订1948年贸易协定,从而威胁到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保加利亚党的代表(格·季米特洛夫、瓦·科拉罗夫和特·科斯托夫)和南斯拉夫党的代表(爱·卡德尔、米·吉拉斯、弗·巴卡里奇)时,批评签订南保同盟条约,批评季米特洛夫1948年1月提出的关于巴尔干和多瑙河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希腊建立联邦或邦联的想法,还批评南斯拉夫应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为对付希腊对阿尔巴尼亚伊庇鲁斯地区的野心而同意派去两个师。批评南斯拉夫代表事先不同苏联协商,要求爱德华·卡德尔代表南斯拉夫政府以书面形式保证今后就所有外交政策问题同苏联相互协商。在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建立联邦或关税同盟的同时,斯大林又急忙要实现南保联邦的方案,可是1945年他曾同西方盟国代表一起不赞成这个方案。

1948年3月1日南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拒绝了斯大林关于立即成立南保联邦的建议。根据铁托的估计,当时与保加利亚建立

联邦意味着把“特洛伊木马”牵进南斯拉夫。会上指出,近来同苏联的关系已陷入“死胡同”。铁托认为,斯大林的压力威胁着南斯拉夫的独立。

1948年3月18日,苏联政府从南斯拉夫召回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一天以后,又召回文职专家,理由是他们“被敌意所包围”。铁托在1948年3月20日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指出了这一决定的危害性和提出的理由是没有根据的。1948年3月27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代表联共(布)中央给铁托复信,这一封信意味着强大政治思想压力的开始,其目的是迫使南斯拉夫共产党屈服。形式上是进行思想批评,实际上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提出了严重的政治指控。批评的靶子是对苏联的态度和南斯拉夫的国内状况。指控南共领导没有制止所谓对苏军的诽谤。谴责南共领导制造所谓反苏气氛,散布关于联共(布)“蜕化”的反苏言论,贬低苏维埃制度并“污蔑”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的体现者。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攻击南斯拉夫共产党处于“半公开状态”,缺乏党内民主。说在南斯拉夫农村资本主义因素在增长,南共“正在被从伯恩斯坦、福尔马尔和布哈林那里抄来的关于资本主义因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理论所蒙蔽”。信中一再不满地表示苏联专家被所谓“敌意气氛”所包围。除了表示“苏联政府和联共(布)中央的不满”而提出的这些指控外,信中还指出,在南共党内感觉不到“阶级斗争”政策的精神,南共已溶化在人民阵线中,党的干部处于国家安全部长的监督之下,所以联共(布)中央不能“认为这样的共产党组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

实际上,斯大林掩盖了冲突的实质。他批评南共的农业政策,但这一政策比任何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农业政策都更激进。那些国家的人民阵线组织是传统的联合结构,而南斯拉夫的人民阵线则保证人民政权在南共领导下有最广泛的政治基础。联共(布)在自己的活动中破坏了党内民主的基本准则,却指责南共具有“半公开的”工作作风。

联共(布)中央背着南共把1948年3月27日信件的副本发给了情报局的其他成员,从而把苏南两党关系范围内的冲突扩大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南共中央在答复斯大林的指控之前,就收到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的来信,信中表示赞同联共(布)中央信件中的论断和指责。

南共中央在4月12~13日的会议上讨论了斯大林的信件。南斯拉夫党的领导认为,在对南共政策批评的背后,隐藏着联共(布)和南共在看待一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问题上的分歧。会议通过了铁托对联共(布)中央信件答复的基本思想。在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复信中,南共领导批驳了无端的指责并阐明了自己对某些原则问题的看法。复信中强调指出,“我们当中的人不管多么热爱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但无论如何不会减少对也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自己国家的热爱”。同时还强调,“在南斯拉夫社会改造中有许多特点,可以被其他国家在革命发展中有益地利用,而且已经在利用”。鉴于冲突的实质是对待各国和各党之间平等问题的不同态度,铁托特别强调指出,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和加强相互关系,就必须尊重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及相互信任;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公民应当懂得,他们是在独立的兄弟国家中,不要干涉它的内部事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革命经验不仅应看成是十月革命经验的继续和补充,而且也应看成是革命实践中新认识的反映。南共中央主张加强同苏联的合作。铁托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对内政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为基础的。信中驳斥了关于共产党“溶化”在人民阵线中、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正在加强等错误论断。指出这一“严重的误解”只有通过两党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全面解释才能消除,因此建议联共(布)中央派来一名或几名中央委员,以便就地切实弄清所有的问题。

塞尔维亚共产党、克罗地亚共产党、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马其顿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南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黑山省委员会,以及南共青团中央和南人民军中南共组织都支持对斯大林

的这一答复。只有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斯雷滕·茹约维奇不同意给联共(布)中央信件的这一内容。

在联共(布)中央1948年5月4日的复信中,以更激烈的方式叙述了并扩大了原先对南共的指控。新内容是大力强调苏联和南斯拉夫对外政策中的分歧,说南共领导人对苏联的“污蔑宣传”的出发点是“铁托同志的反苏立场”。指责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把苏联的政策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混为一谈。复信中还指出“极端的狂妄自大”可能会“毁灭”不准备接受“批评”的“南斯拉夫领导人”。斯大林警告说,南共中央的立场将对两国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因为“苏联只能向朋友提供援助”。信中否定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解放战争和革命中的功绩,断言这些功绩决不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功绩大,而是比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功绩小。同时还断言,南斯拉夫军队没有对南斯拉夫的解放作出比较重大的贡献,南斯拉夫革命的胜利“并不是因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有某种特别的素质”,而主要是因为“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处于严重危机的时刻,苏联军队赶来帮助了南斯拉夫人民,打败了德国占领者,解放了贝尔格莱德,从而为共产党执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信中拒绝了南斯拉夫方面提出的请联共(布)中央派代表到南斯拉夫来弄清争议问题的建议,而提议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争端。复信最后提到,“考虑到把其他共产党排除在这一事件之外是不正确的,已把苏南分歧问题转告情报局各成员党的中央委员会”。实际上,情报局多数成员党已接受了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批评,因此毫无疑问,它们在情报局会议上仍将这样做,而不会触及争论的实质。

南共中央在1948年5月9日的全体会议上讨论了联共(布)中央的信件,不同意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争议,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感到是如此不平等,所以我们不能同意现在在共产党情报局面前解决这件事。”会议决定召开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尽管当时有

人违背事实仍在缩小对南共攻击的反响，因为一部分党员、甚至某些共和国的领导成员，特别是在是否参加预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情报局会议的问题上发生动摇。南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的领导中有人认为，应当应邀参加情报局会议并承认某些指责，如南共处于半公开状态等是正确的。这些看法在1948年7月7日召开的南共中央和这个领导机构的联席会议上也曾提出，但得到了澄清并已被放弃。南共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早先成立的党委员会的建议：由于安德烈·赫布朗和斯雷滕·茹约维奇进行宗派活动，由于他们对经济政策某些措施的态度以及在同情报局冲突中的表现，决定把他们开除出南共。

南共中央意识到面临的困难和危险，决定面向全体党员，以便在他们的支持下，在捍卫民族的根本利益以及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利益中，在捍卫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独立和平等原则中坚持到底。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直到区和县委员会）通报了同联共（布）中央来往信件的内容、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事件、以及南共中央不派代表参加情报局会议的决定。这种立场得到了南共各共和国、省和地方领导机构的赞同。在这些领导机构中都讨论了联共（布）中央和南共中央的来往信件，少数党员发生动摇，只有个别人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立场。斯大林期望茹约维奇和赫布朗能够造成南共中央分裂，并在受斯大林威望蒙蔽的党员的压力下推翻南共领导对这一冲突所采取的方针。然而斯大林的期望未能实现。

1948年5月20日举行的南共中央会议一致通过决定：南斯拉夫共产党不派代表团出席将要召开的情报局会议。1948年5月19日由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署名的联共（布）中央信件指责南斯拉夫领导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声称在即将举行的情报局会议上不是讨论联共（布）和南共的关系而是讨论南共的状况。该信重申的这种要求遭到了拒绝。南共中央会议决定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将于1948年7月21日召开。

尽管如此，联共（布）中央在1948年5月22日的信件中仍然坚持

要求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预定要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会议将“讨论南共的状况问题，南共中央代表应向会议作关于自己的工作和行为的报告。信中警告说，即使南共代表不出席，会议也将召开，他们不出席会议，说明“他们在情报局里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为自己辩护，从而默认他们错了，害怕在兄弟的共产党面前露面”，这就等于承认南共中央走上了分裂和背叛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和“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事业”的道路。

在5月29日南共中央致情报局的声明中，南共表示愿意参加情报局的活动，但强调它不能派代表出席情报局的这次会议，因为它不能接受会议的议程，因为联共(布)中央和南共中央之间的“分歧”问题一开始就被歪曲了。也就是说，情报局成员党的领导不问南共中央对发生的争论有什么解释，不作任何调查，就接受了联共(布)中央的指控，在已经发表的声明中片面地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而不顾南共中央对联共(布)中央第一封信的复信中所提出的论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争端只会加深分歧而不会消除分歧。与此相反，消除分歧的唯一正确途径，是南共中央代表和联共(布)中央代表通过直接会晤来讨论争执问题。南共要求从将要召开的情报局会议议程上取消对“南共状况”的讨论。

然而，在联共(布)中央代表的坚持下，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情报局第二次会议上没有接受这一要求。1948年6月28日，在南共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并公布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决议引用了斯大林给南共中央信件中的评价和指控。决议把南斯拉夫共产党说成是“富农党”，其领导人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对苏联和联共(布)执行敌对的政策”，在对内政策中放弃了工人阶级的立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完全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走上了民粹主义的“富农党”的道路。指责南共偏爱富农分子，在农业政策方面犯了错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抹煞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决议告诫说，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政策似乎会使南斯拉夫蜕

化为“普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使南斯拉夫丧失独立，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决议责备南斯拉夫共产党，说它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溶化”在非党的人民阵线中，从而重犯了俄国孟什维克的错误；破坏了党内民主，把南共变成一个宗派-官僚型的组织。决议指出，南共领导由于对自己的党采取这种“取消主义的”政策和发布蛊惑人心的左倾的命令和宣言，从而“走上了背叛劳动者国际团结事业的道路，转向民族主义的立场”。南共领导人被说成是“野心勃勃、骄傲自满和目空一切”，他们实行冒险的和蛊惑人心的政策，走上了完全不承认错误的反党道路。决议指责南共中央没有接受“向情报局提出自己工作报告”的要求，并由此得出结论：南共中央“把自己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置于兄弟共产党大家庭之外”。

决议认为，南斯拉夫如果没有各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也不能捍卫只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威胁的独立。从这一观点出发，决议最后号召南共中的“健康力量”取代以铁托为首的领导，并“建立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的新领导”。情报局决议实际上号召对南斯拉夫施加强大压力，以便阻止它的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迫使它俯首听命，同时间接地清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些不甘心处于不平等地位和不能容忍斯大林在运动中的政治思想垄断的力量。

几乎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表示“无保留地赞成”情报局的这一决议，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则通过了专门的决议，支持联共(布)领导“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的行动。几乎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在1948年7月1~10日期间都通过了在政治上完全孤立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有关决定，这就导致同南共中断一切正式联系，直到拒绝应邀派代表团出席南共五大，甚至连观察员也不派。

南共中央决心坚持在决定自己的内外政策中维护独立自主和在各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维护平等，这一决心已

表现在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南共中央1948年6月29日的声明更充分地表达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独立方针。这一声明连同情报局决议一起发表在《战斗报》上,可是支持情报局决议的任何一个党都没有发表这一声明。声明指出,情报局决议中的批评是“以不准确和不真实的论断为依据的”,关于南共活动不公开的说法“表明对南共在一定时期的工作形式不了解”,因此,关于党“溶化”在人民阵线中的论断产生的根源在于“不了解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的实质和工人阶级在阵线中实现领导作用的方式”。声明表示了要在国内更加顽强地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决心。声明指出,南共丝毫没有危害共产主义阵线的团结,因为这种团结不能以承认捏造的错误和污蔑为基础,恰恰相反,是情报局破坏了自己的“每个党在接受决议方面的自愿”原则。声明认为,这种指责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和整个南斯拉夫作出了历史上不公正的论断。

这一冲突随着情报局决议的发表而公诸于众。冲突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首先反映了斯大林霸权主义政策的后果。这一政策无视工人党和解放运动从本国具体条件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斗争的道路和形式的历史规律和客观革命需要。尽管斯大林利用联共(布)和苏联的巨大威望进行活动,但是他想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服从于自己的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观点的企图,必然会导致冲突,首先是同共产主义运动中对此进行抵制的力量发生冲突。然而,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使世界社会主义力量认清这一冲突的实质和引起冲突的问题的严重性。由于当时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关系密切,这一冲突,尤其是斯大林的粗暴指责和号召南共党员推翻自己的领导,使南共党员不胜惊讶。惊讶和愤怒是人民、特别是起义地区人民所作出的反应的基本特点。情报局对南共的攻击也使西方感到意外,因为西方把南共看成是联共(布)的最可靠的盟友。

2. 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 对情报局的坚决抵制

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之后二十年和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八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就其决议的纲领性质、组织整顿、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团结的恢复、各省代表会议上代表的选举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式而言，具有代表大会的性质。到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南共有468175名党员和51612名预备党员。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在联共(布)猛烈攻击南共(广大公众当时还不了解这一情况)的时候作出并在报纸上公布的，这意味着中央委员会决心把正在发生的冲突问题摆到全体党员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面前。共选出了2344名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每200名党员选一名代表)，其中只有106名代表没有参加过人民解放战争。

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48年7月21~28日在贝尔格莱德“卫队之家”召开，由铁托致开幕词。通过电台直播和报刊广泛报道会议情况，使广大公众了解代表大会的进程。代表大会对南共走过的发展道路作了批评性的分析。报告和讨论的重点是南共在组织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铁托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作了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报告，米洛万·吉拉斯作了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报告，爱德华·卡德尔作了关于为新南斯拉夫、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报告，博里斯·基德里奇作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报告，莫沙·皮雅杰作了关于南共纲领草案的说明报告，布拉戈耶·奈什科维奇作了关于南共章程草案的说明报告。

代表大会检验了党走过的革命道路，总结了解放战争和革命的成果以及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同时在政治上支持中央委员会捍卫南斯拉夫的独立。对历史经验的研究服从于

对党的当前方针的维护。党的领导得到了与会代表、绝大多数党员、南斯拉夫各大民族及少数民族的一致支持。

代表大会反对情报局决议中提出的充满敌意的无端指责，反对否定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南斯拉夫军队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建立和作用、否定人民阵线（这是以共产党为首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的联盟）的经验和意义的种种指责和污蔑。代表大会肯定了人民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过去没有公开宣布过的），从而有助于理解这一革命的实质和研究其他解放运动中新现象的性质，同时还提出了“人民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和南斯拉夫在当前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地位的条件下能够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论点。从政治上和理论上总结南斯拉夫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提出关于南斯拉夫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在南斯拉夫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论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认为，情报局攻击人民阵线的目的是要孤立党，使党脱离“阵线中的群众”，在这里斯大林以及后来情报局歪曲了铁托在1947年9月召开的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的精神，忽视了他关于党在这一组织中的“带头作用”的提法。共产党人通过人民阵线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联系，而阵线的许多成员虽然不是党员，却象优秀共产党员那样地工作。全体成员积极参加活动也是南斯拉夫人民阵线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在代表大会发言中也有人认为，人民阵线是长期的组织，而不是某种暂时的机构。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此证实了列宁的如下思想：革命工人党的纪律表现为它的革命觉悟、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坚持不懈、自我牺牲、英雄主义，表现为它有决心并有能力同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保持联系、相互接近和在某种程度上“打成一片”，推动并组织非党群众积极参加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

代表们在反对情报局的压力方面是一致的。在一项专门的决议中指出，联共（布）中央信件中的批评是“不准确的、不正确的和

不公正的”。代表大会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强调了这一点。南共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保证,南共领导将努力向苏联党的领导“就地提供一切可能来证明他们的指责是不准确的”。代表大会强调,南共并没有因为它不参加情报局最近一次会议而把自己排除在情报局之外,也不会因要消除南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之间的分歧而不参加这一组织的活动。代表大会驳斥了情报局的论断之后指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它相信,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力量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以及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不会减少对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受到社会主义敌人攻击的国家的支 持。新通过的南共纲领保留了情报局成立会议上通过的宣言中关于形成两个世界性阵营的提法,即一方面是美帝国主义领导的帝国主义的、反民主的和好战的阵营,另一方面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主的和爱好和平的阵营。

代表大会力求避免为加强攻击提供口实,所以没有放过机会表明希望消除冲突的良好愿望,尽管南共中央政治局在这方面不抱幻想。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作出一切努力,尽可能消除同联共(布)领导的分歧。这种方针还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表示这样的决心意味着争取时间以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从而使情报局让南共中所谓健康力量起来推翻自己领导的号召不起作用。同时也考虑到有些党员期望南共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不能不考虑到一个事实,即尽管情报局对南共进行了粗暴攻击,但是长期培育的关于斯大林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侵犯的领袖的观念,以及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制度的观念对南共广大党员仍有强大的影响。

代表大会以联共(布)纲领性文件为蓝本,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这是1920年6月举行的武科瓦尔代表大会之后的第一个纲领。由于南斯拉夫社会很快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这一纲领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在新通过的章程的前言中写道,南共是“南斯

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先进部队，是工人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南共在自己的活动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南”。为了回答情报局的批评，规定可召开有非党人士参加的党的公开会议。章程确认了代表大会前已开始实行的党员预备期的规定。在强调南斯拉夫革命在发挥主观力量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发挥作为全民组织的人民阵线的作用方面的积极民主传统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尽可能仿效苏联实践中形成的党和革命的“模式”，以便冲淡情报局和斯大林的批评，这一点在南共新章程的内容中有所反映。在这方面代表大会还强调，党在文化生活方面即在艺术创作方面支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此“宣传鼓动”机关的任务是从政治上直接指导文化教育生活和出版活动，“密切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

为了使党同工人阶级保持尽可能密切的联系，第五次代表大会特别重视党员的社会阶级结构。大会指出，接纳新党员、特别是从产业工人、突击队员和妇女中接纳新党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党员的社会结构中农民人数最多，1948年农民（主要是贫农）占全体党员人数的49%，工人占29%，专家和职员占14%，其他占7%。从1945年到1948年，南共中工人的比重仅提高了2%。由于大批党员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职业而到人民政权机关、党的机构和其他组织的机构中工作，农民和工人在党员结构中的实际比重大大下降了。绝大多数党员来自人民解放斗争参加者队伍和南共青团组织，但战后头几年在国家和党的机关及其他社会政治组织中工作的党员越来越多了。

第五次代表大会一致支持南共中央委员会，上届中央委员都被选入新机构。中央委员会有63名委员，42名候补委员。除铁托当选为总书记外，选入党的最重要的执行机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还有：爱德华·卡德尔、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和米洛万·吉拉斯（三人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博里斯·基德里奇、久罗·萨拉伊、伊万·戈什尼亚克、弗兰茨·莱斯科舍克和布拉戈耶·奈什科

维奇。

各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都遵循南共五大的政治路线。南共黑山省第九次代表会议成为黑山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8年10月在采蒂涅召开；南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第六次代表会议于11月1日在萨拉热窝开幕，这次代表会议成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克罗地亚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48年11月21日在萨格勒布召开；马其顿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2月19日在斯科普里召开；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48年11月11日在卢布尔雅那开幕；塞尔维亚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49年1月17日在贝尔格莱德开幕。

南斯拉夫已达到这样的社会政治发展水平，致使“青年一代应团结在一个最广泛的人民青年组织中，这一组织建立在共产主义青年的思想基础之上并在南共的领导之下”（铁托在1948年10月12~15日召开的南斯拉夫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从这一估计出发，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统一的人民青年组织。代表大会认为，南斯拉夫共青团和人民青年组织（它也是一个十分坚强的组织）有同样的政治纲领，因此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两个组织。南斯拉夫共青团代表大会之后，1948年12月中旬召开了南斯拉夫共青团和人民青年组织的联合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把南斯拉夫青年联合在统一的组织中，约有150万成员，包括约30万名南共青团员。联合代表大会召开过后，许多青年、特别是原来的共青团员被吸收入党。新的青年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党向新组织提出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对青年进行理论和专业教育，派他们到工业部门中工作，吸收他们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组织青年义务劳动。

随着南共五大的召开，南斯拉夫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一个阶段结束了，虽然当时还无法预见这一斗争在各方面的实际后果和理论后果。

3. 政治压力和经济封锁

废除两国之间的条约和情报局第二个决议。加强国防力量 and 经济发展。农业集体化。南共内部的分化和人民在保卫国家独立中的团结一致。

情报局决议发表后,情报局对南共的指责更加激烈和凶猛。情报局的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为反南宣传运动定下基调。该刊物作为情报局各成员党——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喉舌及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刊物在布加勒斯特继续出版。面对南共五大捍卫南斯拉夫革命和国家独立的一致立场,情报局却硬说代表大会是在“警察统治”的情况下组织召开的。各国共产党的报刊充斥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它的领导和国家制度(南共是这一制度中的领导力量)的性质的粗暴而庸俗的评述,发表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叛徒”、“铁托集团”、“杀人犯匪帮”、“一小撮铁托派别分子”、南共依靠行政和警察机关等等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鼓励并支持反对南共五大选出的领导机构的破坏活动。从1949年夏天起,南斯拉夫受到攻击的所谓罪名有:日益明显地加入帝国主义阵营,变成帝国主义分子的国际间谍中心和向“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进攻的战略基地。1949年11月中旬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情报局第三次会议(最后一次会议)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的决议断言,南共领导“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转到法西斯主义和公开背叛南斯拉夫民族利益的立场”,在南斯拉夫“已建立了法西斯式的反共警察国家制度”。根据这种判断,情报局得出结论:“反对铁托集团这帮受雇佣的间谍和杀人犯”,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主义义务”。各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对这些荒谬的指责又不断进行“加工”,给南共领导人扣上“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帽子,说他们扮演“犹太”的角色,早在战争时

期,英国谍报机关就已在铁托身边安插了自己的人。

从1948年秋天起,南斯拉夫受到邻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用国家政策的一切手段施加的压力。在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宣传中心,这些中心得到了物质资助、公开的政治支持和道义支持。情报局决议发表时,由于各种原因(留学、进修、在使馆或领事馆及其他代表机构中工作)而逗留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南斯拉夫公民,也受到强大的思想政治上的压力和精神上的压力,要他们表态支持对南共的指责,但绝大多数南斯拉夫公民拒绝这样做并回到了南斯拉夫。在反对南共的宣传中,约有5000名南斯拉夫公民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活动,他们有的是从南斯拉夫跑出去的,有的是表示支持情报局决议而留在这些国家里的。

1949年里,在苏联代表的影响下,有几个南斯拉夫的社会政治组织(妇女反法西斯阵线、工会联合会、人民青年联盟)被开除出它们参加的国际组织,有的由于受到歧视而退了出来。南斯拉夫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被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驱逐出境。1949年7~8月间,南斯拉夫受到强大的政治外交压力和军事威胁。苏联为保护白卫军分子而进行的外交干预使关系更加恶化了。这些白卫军分子在十月革命后逃到南斯拉夫,1945年以后得到了苏联国籍,在情报局同南斯拉夫发生冲突时因进行反对南斯拉夫宪法制度和机构的敌对活动而被逮捕。苏联给南斯拉夫政府的照会中提出了释放被捕的白卫军分子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暗示着准备运用极端手段——进攻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东北部边界集结了这些国家的部队。1948~1954年期间发生了7877次边境事件,其中有142次武装冲突,有24名南斯拉夫边防人员丧生,12名公民被打死或打伤。多次发生侵犯南斯拉夫领土和领空的事件。有90个间谍中心进行反南活动,向南斯拉夫派遣了713名情报局的间谍和破坏分子。

除此之外,还对南斯拉夫施加了强大的经济压力。1948年底,

苏联领导决定，苏南之间换货额比上一年减少7/8，从而开始了全面的经济封锁。所有“人民民主”国家都按这一决定的精神办事，致使它们同南斯拉夫的换货总额从冲突前的67.08亿第纳尔下降到情报局决议公布后的21.22亿第纳尔。1949年下半年同南斯拉夫的换货完全中断。南斯拉夫和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分别签订的1947~1951年期间投资协定也遭到相似的命运。苏联于1948年年中停止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于1949年5月底停止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致使原定向南斯拉夫经济的投资187.5亿第纳尔到1950年一共才投入11.84亿第纳尔，仅占6.3%。1949年9月底到10月初，仅6天时间这些国家就都正式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的友好、互助和合作条约。根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所有重要的工业企业从可能受到军事干涉威胁的伏伊伏丁那、斯拉沃尼亚和巴拉尼亚边境地区迁移到南部山区，同时修改了原定向靠近北部和东部边境地区投资的计划。

在1949~1950年期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制造了数十起大案，审讯那里共产党的某些最高领导人，指控他们“卖身投靠”南斯拉夫，参加“美、英间谍机关”，有“民族主义”思想。在阿尔巴尼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科奇·佐治受审讯并被枪决；匈牙利的外交部长拉斯洛·拉伊克、保加利亚的副总理特拉伊乔·科斯托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也受审讯并被枪决。波兰工人党总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由于“右倾民族主义”而被判处多年监禁。

情报局骇人听闻的压力使南斯拉夫革命力量处境极端困难。由于拒绝参加情报局会议，南共实际上不再是这一组织的成员。1948年，南斯拉夫只同29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在当时国际联系较窄的情况下，政治抵制使南斯拉夫面临着在国际上几乎完全遭到孤立的危险。它单枪匹马地处理同邻国意大利、奥地利和希腊之间不好的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力图利用南斯拉夫当时的特殊情况。一开始它们怀疑冲突的性质，甚至以为是“家庭

争吵”，后来看到这一冲突有利于西方，因为冲突导致对方集团的涣散，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扩大“异端”。经济封锁在南斯拉夫的整个经济生活中引起严重的紊乱。投资协定的取消、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占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的中断，威胁到五年计划规定的“基本建设”任务的完成。投资额大大地减少了，从而不可避免地要把五年计划压缩为“重点基本建设计划”。保证为压缩后的计划提供资金，意味着在三年时间里不得不停止建设住宅、市政公用设施和其他设施，减少日用品的生产，使个人消费明显下降。鉴于出现的新形势，必须刻不容缓地寻找新的外贸伙伴。使经济联系和合作转向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作为最紧急的任务提了出来。

然而，在这条道路上遇到许多经济障碍和政治障碍。南斯拉夫的出口产品在结构上、品种上和质量上都不符合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市场的需要。向西方国家寻求贷款、设计和设备不可能一下子办到，而且代价十分昂贵：只有在赔偿外国财产国有化的损失和承认南斯拉夫王国的债务之后，才得到贷款，归还期限最长为4~5年，利息甚至高到11%。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经济封锁外，在这危急的时刻南斯拉夫还遇到了其他困难。1950年和1952年的旱灾使国民收入减少，而1950年的朝鲜战争引起世界市场上价格大涨，使购买工业设备和原料发生困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施加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也给南斯拉夫带来困难。美国、英国和法国于1948年3月20日发表三方宣言，违背和约的精神，采取了使的里雅斯特的整个自由区归意大利的立场。

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压力使情况加倍困难：由于存在武装侵略的危险，南斯拉夫军队的大量部队不得不长期处于戒备状态，用于购买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弹药的短期贷款，利息高达42~44%。党决定不惜作出最大的牺牲使社会努力发展本国的军事工业，作为自力更生政策的重要因素。早在1948年年中就开始建立军工企业；1951年同1947年比，军事工业增长了5倍。南斯拉夫不得不增

拨14.075亿美元用于国防,而这方面的外国援助总共才2.412亿美元,这就是说要拨出约20%的国民收入用于军事目的。由于经济封锁和增加国防开支而使南斯拉夫遭受的损失近20亿美元。正是由于南共的团结和全党齐动员,由于人民的大力支持、团结一致和为了维护国家独立而决心作出最大的牺牲,这些极其严重的困难才被克服。

南共中央委员会要求依靠本国的资源,进一步动员全国的一切人力和物力。党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建设,从而揭穿了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将被资本主义国家“吞掉”和没有苏联的援助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宣传。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作出决定,把计划的执行延长一年(到1952年)。加紧开发森林和矿产,用于出口。1949年1月召开的南共中央全会提出了比较现实的计划目标。1948年南斯拉夫所处的危急形势暴露出第一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弱点:建设中没有经济核算,投资的“战线太长”。

计划首先是靠劳动者的巨大干劲和自我牺牲精神来完成的。尽管工人阶级作出了巨大努力和自我牺牲,但由于经济封锁、巨大的国防开支、不现实的计划任务、缺乏机器设备、原料进口下降,许多重要部门的计划产量都没有完成。虽然如此,仍然逐渐感觉到了工业化的成果。从1950到1952年,竣工或建成了许多作为工业化基础的大工厂、水电站和其他设施。从1948到1950年,人民阵线成员自愿参加了矿业、林业、建筑业的大型项目以及许多地方建设项目。长达400公里的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现代化公路投入使用。

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农业仍然明显地落后。小农经济原始的农业技术无法保证较高的产量。为了保证军队和由于实行工业化而大大增加的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为了保证工业的原料供应,南斯拉夫不得不进口粮食。实行行政方式的收购制和播种计划,使本来就很低的农业产量进一步下降了。在1949年1月28~30日召开的南共二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民劳动合作社以加快农村集

体化的方针。南共中央在一年以前就通过了关于农业集体化的决定，相信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建立将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加快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但是情报局关于在南斯拉夫农村“富农”占优势的批评对现在执行上述方针是有影响的。在这次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南共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提高农业生产方面的基本任务的决议》指出，“农民劳动合作社是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我国农业的最有效的手段”，是“把劳动农民的个人利益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最适宜的形式”。决议指出，“有必要和有可能更大胆和更迅速地着手建立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次中央全会的讨论和决定反映出当时阶段上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矛盾，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概念也没有研究，而且与南斯拉夫农村的社会情况不相适应。

党的领导机构的这一决定作出后，现有合作社社员人数和新合作社的数量开始猛增，同时合作社的土地也扩大了。到1949年底，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数量增加到6625个，有34万多农户和138.9万公顷耕地，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的数量则增加到9060个，有354万社员。建立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工作变成了名符其实的一场运动，在运动中不考虑入社自愿的原则，也不考虑新的集体农业经济赢利的条件。大部分农民是在政权机关的政治经济强制下或在亲友——党员、人民代表、南斯拉夫军队的军官或现役士兵——的压力下加入合作社的。加入合作社就可以免除交售义务和捐税负担，而交售义务和捐税负担当时曾引起普遍的不满和抵制。例如1950年5月在反对情报局的斗争处于高潮时，察津地区在人们对农村收购和集体化采取行政措施不满的情况下，在少数有不满情绪的第一批参战的老战士和退伍军官的鼓动下，发生了农民的大规模骚乱，以致不得不动用部队来平息这次骚乱。

当时南共主要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忽视了人民阵线这个全民的政治组织。根据南共五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党的干部专职制度和党的机构在领导国家管理机关中的作用加强了，党的领导

机构和群众性社会政治组织同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社会联系削弱了。共产党的发号施令作用越来越明显了，它首先通过国家机关和政治机构来开展活动，从而脱离了人民群众。1949年决定成立州人民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行政机关，并派革命干部进入这些机关；通常是派最优秀的工作者到行政部门去。随着国家所有制垄断的建立和工人阶级重新沦于雇佣地位，再加上斯大林的压力，党政合一的倾向开始加强了。

南共把主要的力量用于加强人民群众在捍卫独立的战线中的团结一致，同时从1949年春开始对过去的社会发展作批评性的回顾。1949年4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纲领性宣言，宣言更有力地强调了这一组织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要求在群众中开展更加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发动公民参加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批评和监督政权机关的活动。人民阵线接受南共的纲领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纲领，因为两个组织的目标是一致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在人民阵线这个劳动者长期的全民政治组织中继续发挥社会的基本引导力量的作用。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的基础上加强人民阵线组织的首创精神。南共中央在1949年12月9日的信件中也本着这种精神批评了把青年组织变成动员劳动力的中心的做法，要求加强对青年的群众性政治工作。

情报局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也在一部分共产党员中造成严重的心理上的危机，他们感到孤立无援、灰心丧气，在他们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化的观念和对自已革命事业的忠诚（这一革命事业的所有价值和内容都被情报局的宣传否定了）之间出现了矛盾。在这些情况和其他情况（包括斯大林间谍机关的加紧活动）的影响下，在发生冲突后头四年里，有数万名南共党员支持情报局决议，或发生动摇和态度消极，暗地里同情这样做的家属或亲属。

政治上的分化涉及到一部分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但党在同情情报局发生冲突的同时，在政治上加强了，人数上增加了。在党的

会议上和国家安全局的活动中揭露了情报局的追随者，他们被开除出党和开除公职。公开表示支持情报局并从事有组织的敌对活动、包括同外国情报机关联系的人，作为背叛国家和人民的刑事罪犯，交付法庭审判。积极支持情报局对南共的指责的人受到行政处分，并被送到亚得里亚海上的孤岛——裸岛和格尔古尔岛。这些人共有16312名，其中有12名十月革命参加者、36名西班牙内战的战士、26名战前入党的党员、1673名“1941年游击队纪念章”获得者、2300名南斯拉夫军队的军官、士官和现役士兵、1618名内务机关工作人员、23名联邦和共和国的部长、99名部长助理、36名联邦议员。这是在决定命运的历史时期为保卫革命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南斯拉夫共产党处于自卫的地位，受到斯大林的狂暴的压力，孤立无援，被迫为生存而作无情的斗争，所以不得不为保卫革命和民族独立而采取激烈的、甚至是严酷的手段。所以在进行并赢得这场伟大的历史性战斗时，由于处在完全不平等的条件下，就需要孤立那些自觉地为外国反革命间谍机关效劳和背叛民族的人。然而，在行政机关的工作中也曾采用了一些所谓“再教育”或“开导”的方法，这些方法使被监禁者的精神受刺激，违背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的人道主义思想。1951年6月初正当同斯大林的霸权主义的斗争处于高潮时，南共五届四中全会上研究了侦查和审判机关工作中的法制问题。全会通过了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的报告，批判这种审讯方法是不合法的，批评了司法政策方面的偏差，要求严格遵守法制。党的领导机构批判了在农村集体化过程中和反对情报局的激烈斗争中安全机关、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工作中采取惩罚方法时的违法行为。

在这以后的几年里，纠正了当时条件下发生的某些错案，为被错判的人平了反。1948年4月审讯的所谓达豪集中营案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有37位公民（战前的党员、西班牙内战的战士、达豪和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中的关押者）被指控是盖世太保的帮凶，接着又被指控为“战后的间谍、暗害分子和怠工分子”。先是军事法

庭、后来是卢布尔雅那地区法庭进行了总共9次刑事审讯，对31人判了刑：11人初审就被判处死刑并执行（还有3人在侦查过程中死了），20人被判处徒刑。然而，后来情况表明，指控是没有根据的，这些案件的所有被判刑的人后来（1971～1976年）都按刑事法律程序恢复了名誉。

联共（布）中央和情报局对南共的政策和南斯拉夫独立的攻击，一开始就极其猛烈，并在各方面不断加强，在方法上和手段上是无所不用其极和异常粗暴，但这种攻击未能摧毁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团结。由于南共中央立场的坚定和明确，情报局决议的发表所引起的最初的疑惑和惊讶，被广大劳动群众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不惜一切代价、作出最大牺牲来保卫祖国的独立和自主、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的决心的浪潮冲垮了。共产党和群众性社会政治组织有能力进行总动员，控制了全国的政治局势。乌斯塔什流亡分子企图通过派遣恐怖分子潜入南斯拉夫破坏内部秩序的活动，很快被国家安全局的行动和人民的支持所制止了。社会主义邻国政府想在南斯拉夫、特别是在少数民族中挑起政治上不满情绪并唆使他们抵制党的政策的企图也未能得逞。国家安全机关在同人民、群众性社会政治组织和共产党的密切配合下，同情报局分子和在南斯拉夫的外国情报机关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南斯拉夫军队的强大和巩固也有助于成功地抵抗各种形式的侵略压力。

对情报局压力的抵抗依靠的是革命的最广大的社会基础。抵御外来的霸权主义攻击和防范内部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腐蚀的力量，来自革命的真正民主进程。在抵抗对我国独立的进攻中，人民同共产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艰苦的斗争和作出巨大的牺牲，赢得了自由，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事实表明，斯大林低估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广泛社会基础和道义力量。用自己的肩膀承担了人民解放斗争重任的广大战士，对贬低这一斗争和攻击南斯拉夫独立的言行感到愤怒。

南共把捍卫国家独立看成是参加人民阵线的各族人民的立场,而不仅仅是共产党人的立场,因此这一冲突的结局必然是人民和军队有坚定的决心保卫住国家的边界。

第三章

工人自治和党的新作用

（1950～1952年）

1. 自治的社会发展道路

批判地研究本国的和国际的经验以及自治的思想。工人委员会法和社会主义直接民主的开始阶段。

与情报局发生冲突后，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特点是在矛盾中寻找新道路。一方面坚决不同意指责南斯拉夫的社会实践背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强调苏联的经验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意义。根据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立场和决议开展积极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特征，是在本国实践中开始与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作斗争，但同时又处在当时观点惰性的强大影响下。仍然引用斯大林的语录，尽管是选择那些实质上批评斯大林主义的引文，如说服是共产党人工作的基本方法，共产党人应该经常倾听群众的呼声并在工作中加以遵循等等。但是，在党的刊物上已出现了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民族解放斗争的经验以及对民族问题的比较深刻的批评性反思。党的理论家们批判地分析了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合作中得到的经验。米伦蒂耶·波波维奇在《共产主义者》上发表了《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

系》；阿莱什·贝布莱尔研究了人民主权和工人阶级的关系；米洛万·吉拉斯阐述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观点，博里斯·集海尔发表了《共产主义和祖国》的论文，而拉扎尔·莫伊索夫则发表了《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和马其顿民族问题》一书。其中，米伦蒂耶·波波维奇的文章特别重要，它没有停留在从道义上保卫南斯拉夫革命免受情报局的“不公正指责”，而是探索斯大林霸权主义的更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根源。这是对整个当代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社会性质进行研究方面的理论突破。

如果不对霸权主义政策执行者的社会本质进行分析，就不能解释对南斯拉夫奉行的霸权主义政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深受鼓舞的一种愿望是，不仅保卫本国革命的基本价值，而且保卫社会主义的原则。他们在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同时，揭开了与情报局发生冲突的背景和根源。这场冲突动摇了斯大林的磐石般的统一局面，成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通过批判地分析现实和重新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对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提出了挑战。摒弃了斯大林主义的教条，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构想，并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新观点。日益清晰地形成了对行政集中制和加强国家在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批判性态度，以及对党内和整个社会关系中官僚化倾向的阶级性质的认识。南斯拉夫的革命及其革命民主实践是有效地动员人民力量保卫独立的基本前提，也是重新肯定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的基础。像战后初期那样，南斯拉夫共产党强调了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力量，并受到人民的革命创造性的鼓舞。

在党的领导中，必须对南斯拉夫以往的社会发展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的想法逐渐成熟了。在分析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理论和社会经济基础时，南斯拉夫共产党提出了与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及其开始阶段有关的问题：关于国家和党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关于过渡时期社会政治组织的作用；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所有制的性质；关于在经济发展和计划工作中对待客观经济规律的态度

度；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关于对待艺术、文化和科学创造的态度。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基本理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研究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实践，批判地回顾了本国的经验，从而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主义倾向的社会性质，以及国家主义倾向的加强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偏差。同时还逐步认识到，官僚主义也表现在国家机构和党的机构融合成一体上，官僚主义的加强是阻挠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社会主义社会官僚化的根源在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就是国家所有制关系和国家对物质生产的管理，因为这里仍保留着工人阶级的雇佣地位。从这些认识中得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结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如果对国家所有制垄断和本身的官僚化不采取批判的态度，那么它在这方面面临的危险比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更大；斯大林主义是由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本身的内部矛盾所产生的，克服斯大林主义的可能性在于选择历史上可行的民主制而不选择国家集权的官僚主义倾向；只有系统地和彻底地把国家管理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制度改变为劳动人民自治的制度，才能克服官僚主义。

1949和1950年在党的领导机构中经常进行讨论，并从中得出了如下认识：尽管战后初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新的社会制度中还保留着旧的社会关系的许多特征。党的领导看到国家所有制在经济方面带有传统所有制的实质性的残余，因为它保留工人的雇佣地位；而社会主义所有制应该具有全民的、社会的性质，并由直接生产者来管理。

这些观点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从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应该开始生产资料社会化和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过程，从而导致权力的非集中化，也就是国家的传统职能的消亡。当时逐步认识到，在过渡时期必须尊重商品生产的客观经济规律，这与有计划地指导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并不矛盾。与

此相反，斯大林的理论观点是：计划取代了价值规律，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规律。在极其沉重的国际压力和特别严重的经济困难的条件下，逐步形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构想。新构想是这样产生的：根据南斯拉夫革命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消亡的思想，特别是根据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分析，批判了斯大林主义，反复研究了本国的和国际的经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在这些研究中，恢复了原有的、几乎被遗忘了的无产阶级自治思想。这样就能继承巴黎公社的经验和十月革命中苏维埃的经验，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中继承民族解放统一战线和人民解放委员会的经验。人民解放委员会作为人民政权机关，在工作中已清晰地显示出劳动人民自治的萌芽。

1950年6月26日，铁托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上，就劳动集体管理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基本法草案发表的讲话中，联系到南斯拉夫社会为实行工人自治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尚未解决的问题表明了崭新的态度。这个“革命法律”反映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的总路线的基本因素”，其实质在于：认识到国家消亡的过程不能推迟到将来，共产党不应该丧失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根本特点而变成行使政权的机器，国家所有制应该让位于社会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将由直接生产者管理。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崭新构想主张优先发扬劳动人民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而不是发挥国家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爱德华·卡德尔强调，官僚不能成为社会的霸主，正如官僚化的国家或官僚化的党不能成为社会的霸主一样，任何国家机器都不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博里斯·基德里奇1950年底在《论过渡时期经济的提纲》中强调，经济制度应该使商品生产的客观经济规律能够发挥作用，同时实行严格的总计划和有计划地使用积累。从这些基本思想中，形成了南斯拉夫社会组织的最初形式，它建立在实行工人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在以新的态度对待国家和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的作用的基础上。

南斯拉夫共产党并不认为实行工人委员会是其他国家也必须走的唯一道路。相反,南斯拉夫共产党认为不同的经济、文化和其他条件要求采取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形式。铁托早在1948年11月在克罗地亚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强调,有许多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由每个国家的特殊条件和发展阶段来决定。

为了加强工人在生产组织中的作用,还在1949年共产党就开始恢复原先被忽视的经理和优秀工人生产会议,这就促使关于工人委员会是工人管理企业事务的机构的思想成熟,也促进了“工厂和事业单位中实行政治民主的形式”。1949年春,政治局委员与铁托在斯普利特的谈话中得出结论:要在企业中更坚决地发展自治趋势并重新研究革命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南斯拉夫工会中央理事会授权建立第一批工人委员会;久罗·萨拉伊和博里斯·基德里奇授权签署了《关于在国营经济企业中成立工人委员会和开展工作的指示》,该指示于1949年底通过,并立即发往各共和国工会总委员会和应当成立工人委员会的企业。指示说,在国营经济企业中成立工人委员会是“为了充分实现关于工人直接参加经济管理和实行经济监督的宪法原则,为了使工人积极投入完成计划任务的斗争”。工人委员会的成立和开展工作,使工人不仅有可能了解企业的管理工作,而且有可能对决定生产和管理问题施加直接影响。当时规定,仅仅在一些大型企业里成立工人委员会。工会组织同总管理局、总经理处一起,共同挑选了一批组织得最好的企业试点,也就是挑选在劳动生产率、报酬制度、工会组织和党组织的力量、工人的一般社会政治觉悟等方面最好的企业试点,这里也要努力照顾到所有共和国和所有重要的经济部门。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工作应当是慎重的,为的是要取得初步的经验,然后根据结果逐步推广到其他企业中去。但实践表明,工作的开展并不很慎重,在那些没有要求建立工人委员会的企业里也自动地产生了工人委员会。

1949年底和1950年初,在215个南斯拉夫企业中建立了工人委员会。索林的“老战士”水泥厂选出了第一个工人委员会。这是实现关于国家的经济职能消亡的构想的开端。根据政府的决定,拟定了工人自治法的第一个草案,博里斯·基德里奇认为,这是“官僚主义末日的开始”。这时在全国已建立了520个工人委员会。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在1950年6月26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基本法》。根据铁托的阐述,在该法律通过以前,在“年轻的南斯拉夫革命社会中”,一切社会过程都处于国家的监督之下;从经济和小农户,到文化、科学和艺术创作,几乎没有一个社会生活领域不处在国家领导体制之中。共产党在反复研究以往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和方法后得出结论:应该阻止国家化的过程,因为它有可能断送工人阶级的政权。铁托摒弃了一些人对工人管理经济的政治成熟性的怀疑,认为工人阶级恰恰是在直接参加社会实践中能够最迅速地学习自治。同时他强调,法律的通过不是“太早了”,而是“晚了一点”,原因是对苏联经验存在“太多的幻想”,“不加批判地接受和照搬”。把工厂交给工人管理应该能够防止经济中“一种名叫官僚主义的传染病”,这种传染病是“社会主义最大的敌人之一,这恰恰是因为它悄悄地渗入了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人民在开始的时候是觉察不出来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并不把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看作“抽象的宣传口号”,而把它们看成是“在社会所有制方面、在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方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新“纲领”。建立工人委员会的法律没有按修改宪法的程序制定,但它的条文改动了宪法里社会经济制度部分涉及经济管理方式和所有制性质的重要条文。

工人委员会由15~120名委员组成,在职工不足30人的企业中,整个劳动集体组成工人委员会。劳动集体有权在普遍、直接、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选举和撤换工人委员会委员,他们的任期为一年,后来延长为两年。工人委员会制定企业最重要的规章(规

则、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工资条例), 审议经营的结果, 决定留给企业的那部分积累的分配, 选举和撤换管理委员会。从1950年8月到10月, 共建立了7136个工人委员会, 155166名工人和职员当选为工人委员会委员。

实际上, 在物质关系方面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属于企业的那部分积累仍然很少, 企业规章的通过要得到国家机关的认可, 而企业的经营活动要在集中的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范围内进行。但是, 工人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不仅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中, 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发生深刻变化的开端。

1949年5月在讨论和通过新的人民委员会法时, 确定了深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方针, 当时强调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即发展“人民自治”的意义。权力的非集中化和地方自治影响的增长使人民委员会的物质基础开始加强, 使管理部门的监督职能开始缩小。

1949年底在南共五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不顾政治和经济条件建立农民劳动合作社以及在建社时破坏自愿原则的做法, 认为一部分贫穷的农民, 主要是共产党员, 满足于建立较小的、经济上很弱的、没有能力独立发展的合作社, 这就使党在农村中脱离了大多数农民。共产党员是农业集体化的基本代表者, 但他们实践的结果却是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逐步离开这条路线, 使一些单位、领导机构、特别是农村的党员开始发生严重的分化, 一些党员认为必须坚持集体化道路, 另一些党员则对集体化政策感到极端失望。许多农民党员消极了, 或者退了党。在1951~1954年期间, 共有112858个农民被开除出党。

根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国家职能必然逐渐消亡的思想理论观点, 开始了民主化、非集中化和非官僚化的过程。通过把权力交给下级国家机关, 开始了国家政权和国家管理的非集中化。国家的经济职能缩小了, 取消了把经济企业分为三级(联邦的、共和国的和地方的企业)的原则, 撤销了当时领导企业的联邦和共和

国的主管部。为了协调由共和国经营的经济活动,建立了一些委员会,而为了直接领导仍由联邦行政机关直接管理的少量企业,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总经理处。1951年4月,对联邦和共和国政府进行了新的改组,把联邦政府直接管理的、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108个企业都转交给共和国管理。

在有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探索了官僚主义的社会经济根源和思想政治根源,讨论了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在国家机关、社会政治组织、司法部门、社会服务部门——根除官僚主义观点和现象的可能性,官僚主义在政治上、道义上和思想上遭到了批判。民主化包括采取措施反对官僚特权。要求实现按劳动强度、劳动质量和工作责任进行分配的原则,同时防止党的干部和党的领导变为官僚特权阶层的倾向。此外,还批评了浪费社会资金的现象。

2.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文化教育政策 及其思想基础

居民的扫盲工作和学校的发展。批判对科学艺术的实用主义观点和创作自由。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

新的社会关系在原则上使劳动群众在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里就有可能受到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学校教育。享受文化成果的人数以及各类学生的人数增加了。以文教政策为基础的教学大纲是在宣传鼓动委员会的直接影响下拟定的,文教政策思想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工业化、电气化以及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学校工作中包括通过青年组织和文化教育联合会对学生和教师进行思想教育和群众性政治工作的要求。

1949年在南斯拉夫大约还有200万文盲,鉴于这个事实,扫盲工作成了共产党的注意中心。但文盲的人数减少得很慢,因为有

些人在马马虎虎组织起来的扫盲班结业后，很快忘记了刚刚获得的起码知识，重新加入了文盲队伍。同需要量相比，教师的人数极端不足，因此许多经过短期训练的人也从事居民的扫盲工作。

由于政权的革命更迭，在文教政策中也要求改变大学生和中学生的社会结构。但是到1949年估计，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工农子弟仍然主要进技工学校和各种职业学校，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儿童则进普通中学，这在艺术学校和其他类似学校中更为明显。

在原有的和新办的大学中学生人数猛增。在南斯拉夫王国的民族政策限制和忽视教育事业发展或采取民族歧视措施的地区，学校、文化设施、出版企业和报刊的数量增加最多。对少数民族实行普及教育的学校里，特别改编了文学和历史的教学大纲。

由于宪法规定教会与国家、学校分离，教学大纲去掉了宗教内容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除了神学院以外，取消了其他宗教学校。允许在教堂范围内传教，但不得把信仰用于政治目的。处在“宗教神秘主义”影响下的教师不能任教。南共中央认为，鉴于反宗教的斗争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不应采取行政手段和搞运动的方式来进行这一斗争，同时宪法已经对宗教团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了规定，宪法规定有表达宗教感情和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只是禁止把宗教滥用于政治目的。

全国解放后，共产党根据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新需要，努力改变遗留下来的学校系统，首先是克服原有学校分布不匀的现象，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民族不平等的反映。根据这个政策，必须开办尽可能多的新型学校（这种学校在战前学校系统中是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的），首先是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企业中培养所需专业干部的经济学校。同时，共产党要求不要一概否定原有的教学工作，而要保留其中一切积极的和能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东西。

这一文化教育政策的贯彻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国家要进行

恢复工作和加紧实现工业化,校舍和文化设施在战时遭到严重的破坏,战争中专业干部遭到严重的损失,原有的组织和物质基础需要改变、补充和扩大。战后初期教育和文化的物质基础不足以对它们进行较深刻和较全面的改革。在开办新学校时,特别是在不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人民政权想方设法解决教育干部和文化干部缺乏的问题。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不发达的共和国,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怎样保证学龄儿童上小学。在南斯拉夫的某些地方,由于教师人数少,学生只是形式上已从学校毕业,而实际上仍是半文盲。在一些最不发达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学校。向大学生和中学生提供助学金,并规定这些学生毕业后必须回到自己的家乡工作——通过这种方法有计划地指导教育事业。共产党要求政权机关、企业和群众组织更多地关心建立各种校外设施,提供资金兴建新的学生宿舍、文化馆、学生食堂、幼儿园和少年宫。1948年,在党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范围内,人民阵线组织加速建立学校和文化馆,它们成了农村文化教育工作的中心。1947年底,中央委员会原定要建立约4000个文化馆(“合作社文化馆”),作为开展文化活动和社会主义活动的根据地,但由于缺乏物资和资金而没有实现;此外,有的文化馆往往是临时凑合的,由于不符合原来的宗旨很快就解散了。

尽管国内的社会关系发生了迅速而重大的变化,但学校和文化机构改变得很慢,尤其是在它们作为文化教育活动的体现者方面更是这样。南斯拉夫共产党认为,需要进行长期的思想斗争和方法论方面的教育工作,因为在人们的意识和观念中还保留着过去的旧观点和误解。因此,大力克服唯心主义的残余和掌握科学的社会主义教育原则是文化和教育制度改革的基本思想任务。

1949年12月29~30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南共五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全面而详细地讨论了发展学校工作的问题。批判地分析了从学龄前教育、校外教育、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各种与学校工作发展有关的问题。强调要发展被忽视的学龄前教育

和采取关心在职妇女的子女的方针,同时要求卫生和教育干部以及工会和妇女组织更多地参加这一工作。强调了建立少年之家作为了解自然和技术的中心的意义,要求在校外教育机构里建立图书馆、阅览室和娱乐场所。中央委员会提醒人们注意,要防止宗教团体在课余组织儿童集会来对教育工作施加影响。期望以新的教育政策来克服中等专业教育干部和高等教育干部之间的不平衡,新的教育政策规定,把经济部门的徒工学校改成工科学校并扩大学校网,在专业学校中增加女生数量,有关部门要更多地考虑所需干部在专业方面的提高的问题,努力使七年制学校毕业生进入工科学校学习。

在与情报局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南斯拉夫共产党反复研究了本国经验,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并日益强调自由形成的、具有创造性的人物的意义。南斯拉夫共产党强调,与南斯拉夫王国学校中进行片面培养和教育的状况不同,新学校的总目标应该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这里指的不仅是智力教育,而且是德育、体育、美学和技术教育。强调了技术教育的意义及其在教学过程中与生产过程的联系,也强调了德育的重要性,它应该帮助提高学生的觉悟、责任性、顽强的求知欲和意志。通过这个途径同时摒弃了战后初期从苏联经验中照搬过来的对文化和教育的教条主义观点。

南斯拉夫共产党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着手进行发展学校的工作,认为在这方面必须利用过去流传下来的教育和文化的积极成果。新的教学干部应当在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下为思想的自由发展而斗争,开展思想交锋和发扬首创精神。反对情报局的严重政治压力和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要求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改变对于文化生活和领域思想斗争方法的观点。在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工作中要求摒弃刻板的公式和照搬他人经验,特别是在民族史、党史和文学史中,强调研究南斯拉夫经验的意义。要求防止年轻干部对老科学工作者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但

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并没有忽视必须反对旧社会势力的反动的和反革命的观点,特别是反对教士在教育 and 整个精神生活中对青年的影响。还批评了文化领域中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其中还常常表现出宗派主义。同时打击了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新的文化创作形式(其中,爵士音乐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性”和“反文化”的表现)。文化创作领域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仍受到官方的支持。

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政治上的批评,建立工人委员会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变化,都促进了对创作自由的批评性讨论;开始对艺术和科学作用的功利主义观点进行批评。南共五届三中全会和1949年12月爱德华·卡德尔在斯洛文尼亚科学院的讲话,标志了这些讨论的开始。文学评论和报刊、文学家和画家的会见、他们之间的对话和争论,都有助于在艺术生活中造成自由的气氛,从而促使艺术摆脱前一时期教条主义公式化的腐败杂质。当时强调,尽管艺术受到社会的制约,但它不应该依附于日常政策的需要,它的价值也不应该用实用主义的政治标准和思想标准来衡量。艺术生活中日益自由的思潮是在文学、绘画和文学理论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影响的标志下产生的。开始日益经常地批评过去的苏联模式,以及命令式地规定艺术职能的做法和对艺术作品的功利主义政治观点。批评了反映论、日丹诺夫的文学标准、绘画中的“格拉西莫夫思想”和文学理论中的“季莫费耶夫思想”。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也摆脱了从苏联经济理论家作品的译本中照搬过来的简单化和机械论的观点。

同时,随着工人自治的建立和争取社会关系民主化的斗争的开展,南斯拉夫共产党也为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前提。在党组织的思想工作中,越来越多地注意研究和批判地阐明本国的和国际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经验。指出了研究党史的意义,培养了新的史学干部,收集和整理了党的文献资料。在高等学校中,在新建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在共产党的理论刊物上,首先是在共产党最杰出的领导人队伍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蔚然成风。特

别注意解释南斯拉夫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民族解放斗争的特点、在南斯拉夫革命中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以及过渡时期的经济。社会科学获得了强大的动力,能更加勇敢地、创造性地和深入地研究革命的社会实践问题。

党在十分紧张的国内和国际环境里指导了这个社会关系民主化的过程,进行了反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斗争,但同时也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性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思想影响。在这方面,还批评了那种把党的机构的一切干预都看成是“日丹诺夫主义”的观点。但是,摆脱教条主义思想压力的过程不是没有遇到官僚主义势力的抵抗,官僚主义势力企图阻止或至少延缓这个过程。在文化领域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决裂的正式界线是1952年在卢布尔雅那召开的南斯拉夫文学家代表大会,会上米罗斯拉夫·克尔韦扎作了关于文学的报告,着重强调了文学内在的自治实质,它不能用行政和党的规范的尺度来评价,而只能用本身对现实的艺术感受及其艺术价值来评价。

3. 南共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 ——党的新作用

工作方法的改变。代表大会决定党的新作用和改变党的名称。人民阵线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关系的新观点。

在开始实行社会事务管理非国家主义化和非集中化的过程中,客观上也提出了共产党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政治行动的问题。与国际环境和对外政策方针相联系,也由于党在国内推动了新的社会过程,党员中间发生了重大的分化。从党的队伍中清除了那些在困难和复杂的条件面前(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开拓了本国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道路)动摇的党员,其中还有一小部分原先的军队干部。同时,党以新的年轻成员充实了自己的队伍,这些成

员都坚决接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新方针。总的来说,从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党员人数不断增加:1948年下半年从468175人增加到530812人,1950年底增加到607443人,1951年增加到704617人,1952年6月30日共有779382人。与1948年年中相比,增加了63%。因此共产党在培训党员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大大地增加了。

随着工人自治的实行,在实践中也日益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国家的某些职能开始社会化(“消亡”)和逐渐转交给自治机构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用,首先是如何改变基层组织的作用和工作方式。在寻找解决办法时,根据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理论和南斯拉夫的具体情况,走了一条未经检验的道路。从1950年起就逐步改变党的工作方式。党开始与政权分开,日益努力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方法进行活动。加强了社会政治组织的工作,大大减少了共产党和这些组织的专职干部。例如在1952年11月共产党组织里共有4599名工作人员(其中有1816名领导干部),而在1950年曾有11930名。要求共产党员以自己的觉悟、有教养的榜样、义务劳动和说服的力量带领群众前进。要求在思想斗争的基础上发展理论观点。党员可以对党的每个领导人的立场和行动自由发表看法。

理论工作活跃起来了,社会实践重新受到检验。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博里斯·基德里奇、爱德华·卡德尔、米洛万·吉拉斯、莫沙·皮雅杰、弗拉迪米尔·巴卡里奇、米伦蒂耶·波波维奇、韦利科·弗拉霍维奇和南共其他领导人的著作,推动党的积极分子队伍创造性地对待理论,特别是研究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所提出的问题。社会科学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枷锁。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深入批判斯大林主义,也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党的工作方法。1950年6月22日在通过工人委员会法之前,南共中央向各共和国中央发出指示,说明随着工人自治的实行而采取的党的工作的新方针。强调指出,实行经济的非集中化、建立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是与党进一

步发挥群众的真正首创精神和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作有紧密联系的。指示要求,在党的县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的工作方式并按各部门进行分工。为了防止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融合,决定党的县委政治书记不兼任县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农村基层组织的书记不兼任村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是党委书记仍同时担任人民阵线相应机构的主席,这种人事上的联系继续保留,是因为这些职务具有政治性质。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分开被认为是党对国家机关的具体工作采取必要的批评态度的前提。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作为党的头等任务提了出来。

1950年9月在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代表会议上,1950年12月在克罗地亚共产党代表会议上,1951年初在各共和国中央全会上,都讨论了党和其他政治组织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中的作用问题。特别强调了在实行工人自治和工会具有新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地位的条件下,基层党组织在本单位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总路线方面的独立责任。1950年,南共中央曾多次就新观念与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发生冲突的问题向党员发出指示信。随着工人委员会的建立,工会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保卫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工会还应成为劳动组织利益的代表。在1950年11月10日南共中央致各共和国中央的信中,提醒要注意共产党员对人民阵线工作的轻视态度。

1951年6月3~4日南共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理论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全体党员有权自由地,在口头或是在党的刊物和其他刊物上,讨论一些党员公开提出的观点,而不管这些党员在党内担任什么职务。决议确定了下列方针:在党组织中必须学习的只是党的机关的决议和指示,以及南共中央政治局明确作了结论的党的领导人的理论讨论文章。决议提醒说,个别领导人的理论文章不代表党的路线,因为党的路线必须是党员和领导创造性合作及自由理论讨论的结果。

全会以后,改组了宣传鼓动部,因为对宣传鼓动工作的集中领

导,使基层组织和下级领导缺乏工作积极性,而宣传鼓动工作的内容又没有与每个单位切身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决定由基层党组织最负责的领导人——党委书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特别强调县党委及其报告员的作用。认为宣传鼓动工作是每个党员的任务和对本单位思想理论阵地的关怀。这样,基层党组织和下级领导就有可能发挥首创精神,但是,许多组织没有利用这个可能性,而开始节约进行这类活动的开支。1952年在制定关于人民委员会的一般法时,爱德华·卡德尔指出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主观力量的新的社会作用,他强调,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任务不是代替工人阶级去领导国家和经济,而是作为工人阶级最有觉悟的部分,在劳动群众“内部”,在他们的组织、代表机关、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机关内,为作出最进步的決定而斗争。

党的组织和领导机构逐步放弃了直接领导和直接决策的方法,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劳动群众的觉悟上,放在提高他们在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直接管理的能力上。共产党人必须进行斗争,反对把工人委员会变成经理的机构或企业管理机构,反对缩减劳动集体的法定权利,也反对把工人委员会的活动局限于解决社会问题。逐步地形成了关于党和工会组织在工人自治制度和政权民主化新形式中的新作用的思想。共产党批判了贬低工会的独立性和社会作用的倾向。1951年在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的全体会议上和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都讨论了这一点。特别是从1950年开始,坚持实行党章规定的公开举行党的会议的作法,这有助于加强党员和党的领导人的个人责任心。

1949年2月,决定设立南共中央全权派出机构作为南斯拉夫军队中的集体领导机构,以代替过去军队中党的领导人。在军队中也开始举行“公开的”党的会议。对批评的态度也变得比较灵活,可以对最负责的军队领导人提出批评,而过去在他们指挥下的基层组织和党委会议上是不允许对他们提出批评的,理由是需要维护他们的权威。这样就开始把指挥部政治机关的职能和党的领导职能

区分开,从而导致消除领导工作中党委和司令员双重首长制;1952年党的机关和政治机关的作用分开,1953年年中,取消了政治委员的职务和实行一长制原则,于是这个过程也就结束了。

为了巩固在直接生产者管理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社会关系,共产党逐步放弃了这方面的行政式的“党的工作作风”,代之以思想斗争和政治工作的方法。在实践中检验了减少职能重叠的思想和精减了党的机构。群众性政治组织开始从党的传声筒发展成独立自主的组织。在共产党员中工人的数量开始增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创造积极性日益提高。

1952年11月2~7日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萨格勒布举行,有2022名代表参加。大会全面批判了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政治实践,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照搬苏联经验的愿望表现了他们对苏联经验的“天真的尊敬”。在代表大会上阐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对国内发展中的矛盾和国际关系的看法,并确定了在全国社会发展中采取政治行动的方针。特别尖锐地批评了斯大林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并通过了在较小的不发达的国家里也能够发展社会主义的方针。代表大会指出了在社会改革过程中采用人道方法的意义。实行工人自治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发展中的转折点。在工人委员会中、在企业的改变了的地位中、在国家开始消亡的过程中、在党的指导社会的作用中体现的社会的发展,都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构想。这些构想是在严重的外部压力和为反对内部的官僚主义反革命力量而实行有力的国家强制手段的条件下形成的。

代表大会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力量在自治民主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上。代表大会划清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在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方面的界线,确定了党的新的社会作用。在分析过去有限的实际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在历史上和理论上都是崭新的关于党在工人自治条件下的作用的方针。与此相适应,按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榜样,把党的名称也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决议强调指出,党在

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再也不能起发号施令的作用。党将继续决定总路线,但作为指导力量,要以说服的方法来为实现总路线而斗争。共产主义者要通过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觉悟、观点和态度施加影响。特别要求共产主义者以自己的政治教育行动和个人榜样在社会中进行活动,作为人民阵线中最有觉悟的成员“在群众中”工作。

代表大会还指出共产主义者与威胁社会主义基础的倾向作斗争的直接责任。提醒注意社会主义的敌对力量也有可能利用新的民主管理社会的形式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除官僚主义倾向和国家资本主义倾向外,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教权主义力量进行活动的危险。还提醒注意存在着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它们在工人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作用中寻找根据。新党章规定基层组织有义务提高党员在反对敌对观点和敌对活动中的政治警惕性,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那些以自己的立场和行动损害共盟威望的野心家和小资产阶级分子。

批评了党的封闭现象,批评了党的领导特别是党的机构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党章规定了共产主义老联盟的组织和领导公开工作的原则,规定只有在讨论党内问题时才召开内部会议。党章规定,南共联盟盟员不享受任何社会的或物质的特权。加强了基层组织和下级领导的自主性,基层组织今后可以自行决定吸收新盟员。取消了新盟员的预备期和候补中央委员的设置,取消了国家机关中的基层组织,把那里的盟员并入地方党组织。选举了由109名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所有原来的中央委员都重新当选)和由23名委员组成的中央检查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全会上选举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为总书记;选入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有:弗拉迪米尔·巴卡里奇、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伊万·戈什尼亚克、米洛万·吉拉斯、爱德华·卡德尔、博里斯·基德里奇、拉扎尔·科里舍夫斯基、法兰茨·莱斯科舍克、莫沙·皮雅杰、久罗·普察尔、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久罗·萨拉伊。

第六次代表大会总结了使党组织和机构的政治工作适应由于实行工人自治而形成的社会条件的不长经验,以大无畏的精神作出了关于根本改变革命先锋队的作用、工作内容和工作的政治决定,要求努力把重点转移到群众性政治组织和自治机构在群众中直接开展的工作中。这样就开始了改变南共联盟作用的困难而长期的过程,其中充满着矛盾和曲折。在刚刚开始实行自治的条件下,由于对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地位和作用的基本方针阐述得不够,由于一些实际决定不够完善(在组织工作方面特别是共盟盟员在基层组织中统一行动的问题没有很好地说明),首先是由于老一套的实践的惰性,在实现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新的社会作用和运用新的工作方法中遇到了明显的困难、矛盾、阻力和误解。新的工作方法要求更多地实干,在行动上起表率作用,在执行党的政策中不发号施令。没有社会中物质生产关系的改变(但在以后的发展中这种改变进展缓慢并有停顿),单靠组织方面的改变和党的基本方针本身,不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全部需要,也不能展示根本改革党的作用的前景。这一切都引起了党员、以至整个社会、尤其是青年的迷惑、动摇和思想混乱。

与上述这些变化相适应,人民阵线作用问题的提法也与过去不同。在1949~1952年期间,该组织通过自身的活动促使人民群众理解与情报局发生冲突的实质,并满怀信心地面对这一冲突给南斯拉夫社会带来的巨大困难。人民阵线组织能比较自由地探索对成员进行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最适当的形式,同时,克服前一时期政治生活官僚化造成的组织涣散和消极现象。其他社会组织的活动也更加积极了。1950年10月底,举行了妇女反法西斯阵线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要动员妇女组织去解决就业妇女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在改变南斯拉夫的社会结构的过程中,经济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就业妇女的数量大大增加了。这就要求妇女组织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关心保护母亲、关心就业妇女、更勇敢地引导妇女从事社会事务上。根据1950年12

月人民青年组织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人民青年组织减少了专职机构。强调了该组织在管理机关工作中有关关心青年的思想政治进步、文化提高和开展体育娱乐活动的任务。青年的志愿义务劳动对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共有966420名男女青年参加了54个项目的建设,1951年约有8.6万名青年参加了多博伊——巴尼亚卢卡铁路的建设,1952年约有9.2万名青年参加了大规模的义务劳动。1952年11月,解放战争战士联合会有1328792名成员。从1947年成立时起,该组织就大力保卫人民解放斗争的成果和发扬其传统,关心阵亡战士的子弟和生活困难的父母,决定残疾军人的抚恤等级,处理有关革命战争参加者的社会保护的一切问题。这一组织扩大到了全国,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活动,为保卫独立、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实现民族平等、兄弟情谊和团结而斗争。

根据全国社会和政治发展中发生的变化,1953年2月22~25日举行了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把该组织改名为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该组织的宗旨和任务的宣言和章程,章程规定各群众性社会政治组织为其集体成员。在宣言中强调,该组织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自主的民主的政治联盟,在组织内全体成员平等,并在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社会主义联盟虽然在自己的活动中从南共联盟提出的目标和政治方针出发,但它被看成是一个政治论坛,因为它能在自由讨论、批评和进行思想斗争的基础上,在最广大的劳动者包括宗教信徒的参加下,通过不同观点的争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中某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个组织之所以改名,还因为它的活动需要与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力量和社会主义运动进行合作。

1953年3月南斯拉夫人民青年组织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的新章程也本着同样的精神取消了青年组织对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直接从属关系。1953年9月26~28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妇女反法西斯阵线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该组织改名

为南斯拉夫妇女团体联合会并参加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其任务是研究有关妇女的社会地位、家庭的进步、组织儿童保护和教育工作的具体问题。

随着关于过渡时期社会组织的新的理论观点的形成和开始运用,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也形成了关于国际关系的新观点(尽管也存在许多争论和一定的内部分化)。1948年以后,南斯拉夫处在被集团分割的世界的中心,它受到两个集团的强大压力,尽管施加压力的动机和背景各不相同。南斯拉夫抵抗斯大林霸权主义政策的压力,同时争取西方国家的帮助,保卫自己的独立立场和行动自由,努力实现关系的正常化,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发展经济合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放弃了战后初期对待南斯拉夫的态度,南斯拉夫与这些国家发展了内容丰富的合作,它们保证向南斯拉夫提供不附带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以克服经济封锁的最严重的后果和加强南斯拉夫的防御力量。它们在帮助一个保卫自身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看到了自己的利益,认为通过这种帮助将能削弱对方军事和政治集团。从1949年开始,一些西欧国家特别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直接或通过银行、后来又三方联合向南斯拉夫提供贷款。1950年在美国和南斯拉夫之间签订了第一个关于以优惠条件向南斯拉夫供应“剩余农产品”(谷物、棉花和食品)的协定,南斯拉夫政府建立了专门委员会来主管该协定的执行。还签订了关于向南斯拉夫供应一些军事物资(零备件)的协定,1951年11月还签订了关于加强南斯拉夫的防御能力的协定。

调整与希腊的政治关系,使得南斯拉夫与希腊的经济来往、希腊国民的遣返工作、以及经济界人士和军政人员的互访都得到了发展。在希腊共产党领导和情报局的反南宣传中,这一切都被说成是南斯拉夫转向另一个“阵营”的见证。南斯拉夫不能容忍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国际孤立地位,努力根据和平共处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促进巴尔干和平区的扩大,发展与土耳其和希腊的三方合作,从而在与意大利的尖锐的边界争端中建立了平衡关系。1953年2

月,签订了安卡拉协定(巴尔干条约),从而使三方合作固定化,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想通过这一合作把南斯拉夫拉入北大西洋公约的打算没有实现。尽管处境十分困难,南斯拉夫还是抵挡住了强大的集团分割过程,没有与国际军事政治集团建立联系。

南斯拉夫与一系列新解放的亚洲国家和埃及建立了关系,特别为在联合国组织中的活动争得了新的外交伙伴。南斯拉夫的外交活动证明,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可能在尊重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基础上扩大国际合作。在这个基础上,南斯拉夫与一系列过去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合作,从而日益加强自己的国际地位。1950年南斯拉夫与29个国家有外交关系,1953年底与49个国家有外交关系;从1949年底到1953年,与从前没有经济关系的国家缔结了16个新的经济协定。南斯拉夫反对实力政策,认为运用积极和平共处原则是克服国际关系中存在的深刻危机的唯一出路。与实力政策和集团冲突政策相反,南斯拉夫提出了下列原则:各国之间在平等、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主权、和平解决争端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加强联合国的效率,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提供援助。

人民阵线即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在与进步运动,尤其是与社会党建立关系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关于宗旨和任务的宣言中强调,该组织在发展国际合作中,坚持完全平等、不把自己的立场强加于人、不干涉别的党和运动内部事务的原则,这种合作要为和平、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的具体利益服务。在这个基础上,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与比利时、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印度、缅甸、以色列的社会党和工党,以及亚洲的社会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与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进行了首次接触。其他群众性社会政治组织,即工会组织、青年组织、妇女组织、人民解放战争战士组织,在扩大南斯拉夫的国际联系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看到反殖民主义革命带来社会

政治力量的新布局，并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开辟新的前景，因此也通过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国际合作的领域来大力促进这一革命的发展。

第四章

社会自治的发展和 为平等的国际关系而斗争

(1953~ 1964年)

1. 自治发展的最初步骤

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经济体制的变化。实现党的新作用过程中的矛盾。公社制。加快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共产主义者联盟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方面,这场改革将能实现以下基本思想:直接生产者从国家手里接过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并把国家本身变为自己的行使社会力量的工具。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情况加重了实现这个构想的困难,这里包括:非常落后的物质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工人阶级的人数较少、非常年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有联系;资产阶级反革命已被打倒,但其残余仍然存在;党的干部包括领导干部过去形成的国家集中主义思想有着强大的惰性;国际关系中的“冷战”潮流没有减弱。1950年初,经济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而国防费用已接近国民收入的1/4。作出了重大牺牲的居民的生活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农业生产仍落后于战前,而且农村的人口过多。南斯拉夫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重

大变化。1953年放弃农业集体化政策,使农村党组织感到茫然和动摇,因为在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以后,好几年没有确定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政策。所有这些情况和其他情况都自发地促使国家的力量壮大,促使社会关系中出现集中制和官僚主义倾向。

造成这种情况的还有党的干部习惯于依靠国家干预,而不理解社会改革的新观念所开创的过程的意义和实质。工人自治已被人们充分信任地接受了,但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干部中间许多人认为,工人自治所包含的变化将仅限于经济领域,在那里这些变化能使劳动生产率提高,能使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和经济决策中发挥更大的影响。但他们对商品生产规律有很大保留,认为它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朝着非国家主义化和自治方向进行的初步重大改革,引起了“前途莫测”的恐惧,以及对“商品经济自发性的破坏作用”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无政府现象的害怕。担心由于实行按劳付酬原则而造成社会分化,这种心理在那些习惯于平均主义观念的阶层中尤其严重(在革命年代和不存在重大物质差别的“早期社会主义”最初年代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平均主义观念一般地说是可以理解的)。此外,政治生活民主化为更自由地讨论各种社会发展问题和创作自由问题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唤起了反社会主义社会力量的复辟希望,他们指望批评斯大林主义、与苏联决裂和民主化进程,将使国家的发展走向资本主义并有可能实行资产阶级的政治多元化。南斯拉夫落后的物质状况和社会结构对人们的意识造成一种压力,而反社会主义力量企图利用党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来加强自己的思想影响和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

尽管存在着客观困难和较不发达的社会意识,但工人自治有着现实的社会前提。建立工人委员会发挥了生产者的劳动创造性和经营积极性,降低了生产费用,特别是减少了劳动力的浪费,因此,还在1952年,经济就开始迅速增长。这些令人鼓舞的经济成果加强了继续进行革命的社会改革的要求。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

人民把这种社会改革不仅看成是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条件,而且看成是探索与斯大林主义相反的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发展形式的国际主义义务。自治所产生的新的社会意识,使党员重新确信社会主义的民主性质,因为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与情报局发生冲突以前,全世界都把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南共联盟盟员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确认了共产主义思想。这种认识也扩散到广大阶层的人民群众中。在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全国政治领导的巨大权威和具有解放性质的自治政治思想(还在人民解放斗争中它就以特殊形式扎下了根)的有力影响下,南共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战略,作为新的民主的自治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得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原则上的一致支持。

根据这个精神,还在1952年就开始了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更深刻的改革。1952年4月1日通过了关于人民委员会的一般法,修改了宪法的有关条款,改组了地方自治机构,从而加速了地方社会共同体中自治的发展。人民委员会在直接关系到地方共同体的市政、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事务方面具有了更大的权力;它们的物质基础加强了。在人民委员会中设立生产者院作为政权机构中的自治因素。该法律规定建立各种委员会作为具有直接自治因素的政治执行机构。这实质上确定了后来实行的公社制度的基础。

1953年1月13日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和联邦政权机关的宪法性法律,规定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是“享有主权的各平等民族的社会主义民主联邦国家”。这个定义消除了国家性质中的“人民民主”因素,同时强调了作为国家制度和社会政治制度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天然联系。这个定义的产生也由于劳动人民在实施政权职能和管理职能中具有了新的地位和新的作用。根据宪法性法律,“劳动人民通过在人民委员会、国民议会、工人委员会和其他自治机构中的代表,或直接经过选举、罢免、全民投票、选民大会、管理部门和审

判机关中的公民委员会、以及其他直接管理形式来行使政权和管理社会事务”。

宪法性法律加速了非集中化和民主化的过程,特别推动了当时刚刚开始扩展到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中的自治。保证劳动者在教育、文化和社会服务部门的自治。更详细地规定了经济部门生产者自治的内容。在人民委员会和国民议会中设立了生产者院。规定劳动者通过自己在生产者院中的代表,确定用于满足社会需要的资金并决定这些资金的使用;这清楚地说明了社会所有制的阶级政治内容。在1946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扩充了区、市和县的自治权,第一次列入了劳动权。把地方政权机关建成非集中的地方自治机构。

由于在两院制的联邦国民议会中设立了生产者院,由于相信自治观念本身将以非集中化的方针为扩大共和国的权利和义务开辟道路,宪法性法律取消了民族院作为一个独立的院的地位,它的职权转归联邦院的部分代表行使,他们在必要时单独作出决定。国民议会成了经常开会的“工作机构”,它确定社会发展的政策并行使联邦管辖的全部职权。撤销了政府和议会主席团;把政治执行职能交给了共和国总统和联邦执行委员会,而联邦管理机关则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共和国总统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他同时也是联邦执行委员会的当然主席。联邦执行委员会是联邦国民议会的合议制执行机构,它在组织上和职能上同国家管理分开,努力使国家管理机关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对议会彻底负责。共和国权力机关的结构也进行了同样的改革。党委书记的职权与相应的政权执行机关主席的职权也分开了。

在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它把自治的因素带进国家政权结构)的同时,经济体制也进行了改革,打算用直接生产者起决定性作用的新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来逐步代替国家集中支配扩大再生产资金的做法。在南共联盟领导机构内和报刊杂志的讨论中,特别研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商品货币关系的问题。要求

更迅速地实行民主化和缩小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服务中的作用,尊重商品生产的规律,更广泛地在经济生活中建立市场关系,把银行从国家机构变成筹集和投放资金的业务机构。博里斯·基德里奇强调,忽视客观经济规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停滞,最终会使直接生产者和整个社会遭受奴役和剥削,也就是说,“由国家支配剩余劳动的制度也就是官僚制度的起点”。认为,现行经济体制建立在遏制价值规律和国家集中分配商品、货币和劳动力的基础上,它是发展自治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需把企业变成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法人’进行活动”,国家将不给它们规定产品的计划任务,而是规定国民收入分配总的比例和总的经营条件。当时出现一种想法,主张“在全南斯拉夫按部门建立工人委员会”,从而“用直到联邦一级的劳动集体集中的民主联合来代替按国家系统的业务经营非集中化”。设想经济企业由工人委员会来管理,而经济部门和组成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集团则由全国范围内按部门建立的工人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和经理部来管理。但是,这些设想被否定了。因为,当时认为那样做就会在自治的外衣下实际上保留国家主义的结构。

1952年初建立了新经济制度的最初形式,1953年作了一些修改,以避免商品生产规律的自发作用(追求利润、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放弃了对商品、货币和劳动力的行政集中分配。作为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经济组织,摆脱了由国家直接规定的生产任务,而在联邦、共和国和地方的社会计划范围内参加市场联系,社会计划的决定性的核心因素是“计划比例”,联邦继续用计划比例来决定国民收入分为个人消费基金、共同消费基金和投资消费基金的总的比例关系。

社会主义企业是指生产—商业劳动组织或商业劳动组织,它们作为劳动人民国家的法规所规定的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生产和交换商品,或者仅仅交换商品。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商品生产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

所有制的基础上,这就是说,全民财产是在国家的监督和保护下由自由联合的直接生产者进行管理,从这一观点出发,生产者一般是在计划的“基本比例”的范围内,通过商品交换来互相发生联系。

同样也放弃了农业集体化政策并改组了农民劳动合作社。仅仅保留了那些有能力独立地发展经济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在1954年初也与其他经济组织一样,按同样的原则经营。

实际上,国家继续掌握着最大部分的积累,但在1953年进行了扩大再生产资金的再分配。1952年联邦掌握约78%的投资资金,1953年减少为16%左右;过去,共和国几乎不掌握扩大再生产资金,1953年掌握48%左右;经济组织约掌握1/3的扩大再生产资金,其余的积累资金属于地方社会政治共同体。1954年放弃了“计划比例”制度。自由的商品流通也扩大到了基本生产资料方面,实行自筹资金和向经济上最有能力的借款者提供贷款的办法来代替无偿投资贷款。改变了计划体制和扩大再生产拨款办法。由于国家工业化刚刚开始,要求一定程度的积累集中,联邦再次成了对全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广泛意义的项目的“主要投资者”。为此,规定了经济部门固定资产的利息,由这些利息组成了全南斯拉夫的投资基金。在共和国和区也建立了类似的投资基金。这些国家投资基金中的资金作为贷款提供给提出最佳投资方案的投资者。这样,到1954年初,简单再生产已基本上交给了劳动集体,而国家保留了对绝大部分扩大再生产资金的支配,在社会计划的基础上把整个积累的25~30%让给了企业。在这方面,准备在已经开始的工业和能源的“关键性基本建设项目”完成后,根据物资条件继续进行经济生活非国家主义化的过程,但是,在这方面,在南共联盟领导中出现了许多犹豫和动摇的情况。在经济封锁、世界市场价格上涨、国防开支巨大的困难条件下,在工人阶级的人数急剧增长已经停止,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减少(回到农村)的情况下,把扩大再生产资金的支配权交给劳动集体被看成是对社会的生存甚至可能带来风险的措施。

在摆脱了严格的行政制度后,过去依靠预算拨款常常不赢利的企业,成了市场经营的主体和自主的经济组织,引进了新的企业精神、劳动纪律和创造性。商品总额增加了,以市场价值来衡量的产品质量提高了,品种也增多了。证实了原来的期望:即使在市场规律只发挥最低限度作用的情况下,经济组织比较自由的经营也要比最有能力的国家计划制定者能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通过实行有刺激性的报酬制度,解决了劳动力经常不足、特别是专业干部经常不足的问题,这是过去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基本问题之一。继续进修已作为政治需要提了出来,因此,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就作出特别的努力来培养干部,开办各种训练班、夜校、人民大学和工人大学来有目的地造就新干部。

南共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认为,只有发挥共产主义者联盟新的作用,工人自治才能发展。但是,实现共盟的这种作用是一个复杂的和矛盾的过程。南共联盟仍然是组成政权系统的整个社会政治结构的支柱,它实际上领导着其他社会政治组织。占统治地位的一种信念是:这种状况仍然是需要的,不仅是为了保卫革命成果,而且是为了能够指导在自治基础上的革命改革。同时,恰恰是为了有利于自治的发展,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力量应当放弃直接行使政权,从而消除自身的官僚主义。在“执政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仍然需要的那种党)和在思想政治上指导社会进程的党(已开始自治的国家消亡过程所要求的党)之间寻找正确的措施,已成了社会政治发展的中心问题。

许多南共联盟盟员缓慢地摆脱党的作用的老观点、发挥作用的老方法和党的工作中的老习惯。此外,共产党在社会事务中的实际领导作用已被党首先是在思想上影响人们的觉悟,从而指导社会政治发展的观点所代替,虽然当时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和自治制度尚未在社会实践中扎根。因此,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的新的政治工作方法,没有能比较充分地 and 毫无困难地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得到确认,这就在党员中造成了困惑、不适应、责任心不

强和纪律松弛等现象。盟员很难习惯于新的条件，因为新的条件要求具有更多的知识、政治上的创新精神和对实践进行理论探索。许多共盟盟员习惯于从执政地位出发进行工作的老一套方法，却在非社会主义现象面前退让，从应该作出榜样和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上起带头作用的地方退缩下来。这部分地也是由于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方针和结论本身不清楚，尤其是在共盟盟员有组织地进入自治过程方面。这种不清楚带来了思想混乱，从而影响到共盟盟员之间一定程度的士气涣散，基层组织也由于思想政治上的动摇而积极性下降，加入南共联盟的兴趣也降低了。尤其是青年失去了思想政治方向，还出现了青年组织“涣散”的倾向。人民青年组织的成员人数减少了。多年来成为青年活动中心的大规模义务劳动逐步减少，后来完全停止了。

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看到了盟员不适应的现象后，于1953年6月16~17日在布里俄尼岛召开了中央全会。会上决定向各基层组织和委员会发出指示信。批评了共盟盟员容忍反社会主义的倾向和不为实现自己的观点和目标而斗争（还批评他们不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负责）。否定了继续用老一套的方式进行工作的想法和认为民主是一种宣传鼓动策略的观点。在指示信中还强调，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在毫无阻碍地出现。那些失去了政治斗争反应的党员领导干部受到了批评。中央委员会要求党员把工作方针首先放在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上，在人民和群众性组织中进行政治工作，在本单位开展反对消极现象的斗争，这些应该成为衡量他们工作的主要尺度。指示信通知要采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行动，强调共盟盟员要对社会发展负责。要求从盟员中开除那些消极分子。

但是，尽管进行了提醒，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米洛万·吉拉斯发表了极端露骨的无政府自由主义观点。他在南共联盟六大后不久解释六大的决定时，对代表大会已作出决定的问题展开讨论。米洛万·吉拉斯负责南共联

盟的思想宣传工作，他在1953年底，在党报《战斗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提出了与代表大会的路线相违背的观点，从而在党员中引起了思想混乱。而在文章发表前，他并没有按照惯例（特别是在涉及思想理论问题时），与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讨论自己文章的内容。

吉拉斯在自己的文章中，对南斯拉夫阶级力量的布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官僚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和民主）作了估计，认为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作用。他认为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也不能是一种目标（因为这是客观必然性，因此“它归根到底将通过不同方式必然会到来”）。他重新肯定了无政府主义的老观点：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根据这个精神，他认为“唯一真正的和持久的目的”是不断地为民主而斗争，要求保证“尽可能自由地运动，使一种主观力量取代另一种主观力量，而不是只由一种力量来垄断社会生活”。在这里，这一些和那一些力量都是社会主义的，只是一些力量的民主性“少些”，而另一些力量的民主性“多些”。由此他得出结论：“像现在这样的共产主义者联盟”是民主的主要障碍，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他认为在南斯拉夫已经出现了某种社会主义“左翼”，不能排除在南斯拉夫发展出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可能性。因此，他号召进行全面的思想斗争，而共盟盟员对运动的统一不负任何责任。他特别尖锐地攻击革命领导干部，认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变成了异化的官僚阶层，这个官僚阶层已发展成了享有特权的封闭的执政者集团。

围绕这些观点开始聚集起一些右的、伪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和遭到失败的资产阶级力量，以及南共联盟内部的一些知识分子。反社会主义力量和反共产主义力量把吉拉斯的观点看作是自己的一种机会，西方资产阶级力量也支持他。

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吉拉斯离开了南共联盟的政策。1954年1月16～17日召开了六届三中非常全会。会议认为，米

洛万·吉拉斯的观点违背了南共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政治路线,给公众带来了混乱,给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全国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失;他以自己的观点和行动,为破坏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为取消共产主义者联盟打下了政治基础。中央全会强调,南共联盟仍然对继续革命直接负责,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方向、与反革命作斗争直接负责,因此,南共联盟必须保持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的作用,它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内部进行活动,指导社会的发展。铁托强调,必须把党的领导作用的消亡理解为长期的过程。吉拉斯的民主观点被看成是“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式的大杂烩”。与他的民主观点相反,卡德尔强调,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这种民主的目的是消灭阶级对抗”,“归根到底是消灭一切政权”,以便使“每个公民能够成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直接参加者”。

米洛万·吉拉斯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并受到最后警告的处分。吉拉斯本人同意这个决定,接受了对他的观点的绝大部分批评,并提到他该被开除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南共联盟中央认为,必须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来反对无政府自由主义倾向。1954年3月29日南共联盟六届四中全会分析了共盟内部的状况。会议作出结论:必须贯彻执行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组织上加强共产主义者联盟,而许多盟员没有正确理解六大的决议,认为要求放弃发号施令的方法就是可以放弃盟员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问题应有的统一立场。还补充了和解释了六大对南共联盟在自治发展的初始阶段所起的社会作用的原则性观点,防止出现威胁其统一和行动能力的倾向。铁托主张加强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加强党员的纪律和自我纪律,首先必须增加党员中的工人成分。在共产主义联盟基层组织的工作中,要求定期对盟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共盟盟员在社会主义联盟及其他自治组织的范

围内参与各种形式的社会管理,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自治活动,他们的积极性就会随之增长。共产主义者的道德面貌和责任心处于党的政治生活的中心。1956年3月,中央委员会批评了对待青年的关门主义态度,决定重新组织青年的义务劳动活动,作为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学校。

50年代中期,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制止了组织上“涣散”的倾向,在所有组织和领导机构中恢复和加强了党的纪律,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自治机构和社会组织的日常实际活动中。但是,也开始出现在活动方式中恢复老一套做法的倾向。中央领导机构的作用加强了。鉴于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主要忙于从事国家机关和社会政治组织领导机构的工作,而且往往在其中担任领导,因此改组了中央委员会组织政治书记处,由它来承担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绝大部分工作。

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员的社会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共联盟的盟员总数没有增加很多,却发生了大起大落。从1950年到1955年273464名盟员被共盟开除,112537名盟员受到各种党纪处分。农村组织中离开党的人数特别多,因而到五十年代中期,盟员中农民占相对多数的情况消失了。在农民劳动合作社解散或改组后,许多共盟盟员离开了农民劳动合作社,或者被视为合作社的官僚主义者而丧失了政治威望,在政治上后退了。这样,农村中的党员就减少了。1957年底,在共产主义者联盟中有工人243819人(占32.29%),农民130783人(占17.32%),职员244592人(占32.39%),大学生和中学生27455人(占3.64%),其他108417人(占14.36%)。在盟员的结构中,职员和工人所占的比例最大。党员中职员人数增加,部分地是由于改变了统计方式,因为从1952年起在党的统计中登记党员的现职而不是登记他的最初职业;同时也是由于大力向国家机关输送经过考验的忠诚的干部。

在这个时期里,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日益成为在区和居民

点团结劳动人民的政治组织，它组织讨论公民的日常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并成为选举社会政治共同体代表机关的一切活动的主要组织者。社会主义联盟的盟员人数减少到500万左右，但开始增加各种组织和公民联合会作为其集体成员。在社会政治组织的上层，设执行机构，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和主要国家领导人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

工会主要从事培养劳动人民行使自治职能的能力的工作，并逐渐成为工人自治机构进行工作的强大依靠（在这方面与共产主义者联盟一样）。工会直接关注工人自治的发展问题，并研究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工作的实际问题。

50年代中期，完成了地方政权和自治系统的改革。1955年9月建立了公社（区）制度，它是由于受到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和列宁关于工农苏维埃的思想的鼓舞，并吸收了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经验而提出的。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地方人民政权机关（人民解放委员会）是群众在战争的环境里直接行使政权和管理社会事务的形式。建立公社（区）被理解为国家逐步消亡的道路。公社（区）被设想为区域性的基层社会经济共同体，它与劳动组织中的自治一样，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并对社会服务事业（教育、文化、卫生和社会保护）的发展和资金来源负责。

为了使区的经济力量更加强大和更加自主地执行上述社会职能，把区的面积扩大到大体上相当于过去的县。当时的4052个区改组成了1479个新区；1957年区的数目再次减少为1193个。区的物质基础也增强了，它取得了自主地决定和分配某些收入的权利。地方基金成了区贯彻扩大再生产政策的工具。区在统一的经济地域内，按照统一的分配制度，根据统一的经济计划，对发展生产力负责。区发展的前景在于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区的收入。努力发展区的下列服务工作以保证满足公民的物质、文化和其他生活需要：如关怀儿童、帮助家庭、保证供应、开展各种服务活动、管理住宅、住宅建设、直接的社会保护和保健。准备在今

后的发展中,使区日益减少行政区域单位的性质,而日益成为组织人民的特殊社会政治形式。为了管理本地区共同的社会事务,建立了社会管理机构和自治机构;在这些机构中,公民以各种形式决定着有关自己工作和生活的重大问题。这些机构有:人民委员会、社会委员会、选民大会、组织全民投票的机构、地方委员会、住宅共同体。

区里的全部机构应当既向选民大会负责,又向整个社会负责,接受公民和公民组织的公开批评,同时在遵守法制方面受上级机构的监督。区的章程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管理本区以及通过区管理其他社会自治机构和整个社会的可能性。共盟组织与工会组织一起,举办训练班,召开讨论会和咨询会,开展提高工人的政治和文化水平的运动,努力培养他们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在这方面,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工人大学起着重要作用。

50年代中期经济政策的变化大大促进了公社(区)制度的发展和自治主动性的发扬。根据铁托的建议,1955年9月执行委员会决定放弃重工业和动力工业的发展较之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居于优先地位的方针。这样作的动机是,在连续十年作出巨大牺牲(为投资和国防动用了48%的国民收入)以后,希望减轻为进行革命、恢复国家和实现初步工业化作出贡献的那几代人的负担,保证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1955年秋,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了农业令人担忧的落后状况,它不能够满足城市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青年大规模地从农村流入城市、从农业流入工业和其他社会部门,从而使城市的需求猛增。加工工业缺乏农业提供的原料和再生产材料,农产品的进口,特别是从美国的进口增加了,从而扩大了国家的国际收支逆差。执行委员会决定积极发展农场和增加农业投资,特别是采用现代化农艺技术的投资。新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政策要求增加对农业的物资投入,建立实行工人自治的农工联合企业,把个体农户纳入各种形式的社会经营(“合作”)。

决定除农工联合企业外,还要发展农业合作社,把个体农民组织到与农场和合作社组织的“合作”中。

随着所谓关键性基本建设阶段的结束和转向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规定优先发展轻工业和加工工业、农业和交通、住宅建设和提高生活水平),在加强企业、公社(区)和县自治的同时,为发扬劳动人民的强大的和群众性的主动精神创造了社会条件。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经济高速度发展,加强了自治思想和埋葬了流传下来的教条主义思想。在1952~1957年期间,南斯拉夫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7%、国民收入增长了68%,经济发展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而工业发展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2.6%,属于世界最高增长率之列。由于农业投资的增加,提高了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在这个时期里,出口增长了78%,进口增长了70.7%。

工业化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所有制经济成分中的就业人数从1952年的228.3万增加到1957年的282万。工人阶级增加了80万新工人。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从1952年到1957年,每年增长7.8%,而个人消费增长6.3%。根据社会主义原则迅速发展了社会保护和健康保护。1953~1957年,享受社会保险的公民人数增加43%,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1%。退休人数从39.2万增加到49.3万,32.06万名公民获得了残废军人抚恤金,而7.2万人长期领取社会救济。全国解放后立即开始发展的教育事业继续迅速发展。五十年代中期,14.2%的总人口在各类学校中学习。1954/55学年,有62875名学生进入大学和专科学院;社会结构中,受过中等、高等和专科教育的人口比重显著提高。

许多文化机构以及整个文化领域都处在新旧决裂之际:一方面是行政国家主义的预算拨款关系,另一方面是需要把文化这个人类劳动和创造的非常重要的领域纳入自治关系的轨道。过去遗留下来的顽固的官僚主义习气,文化垄断现象的形成,派别利益的加强,老一套机构形式的保持,以及文化工作者中特权阶层的影响(他们在拥有实际权威的地方决定自治的措施)——所有这些都

加重了在文化领域里争取自治的斗争的困难。在这个领域里探索自治的办法时没有考虑文化的特殊现象,这就遭到人们的抵制,并在许多地方导致自治的庸俗化。物质基础不发达也加重了自治发展的困难。社会拨给文化和教育的经费不够,而学校的发展也没有为文化领域干部的补充创造足够广泛和结构合适的基础。

新创办的杂志有:贝尔格莱德的《作品》与《当代人》、斯科普里的《当代》与《观察》、萨格勒布的《各界》、卢布尔雅那的《自由》与《对话》、萨拉热窝的《生活》,以及用少数民族的文字出版的杂志。这些杂志进行反对艺术中的教条主义和日丹诺夫主义的斗争,对艺术评论、哲学评论、特别是文学评论具有特殊意义。放弃以宣传鼓动的方式指导文化发展和排除教条主义,都促进了新的创造性探索和艺术中各种流派美学观点的发展;文化气氛的特点是创作自由,寻找新的表达形式,各种文学活动和艺术活动一视同仁,它们之间开展批评性对话(从1954年起在“现代派”和“现实派”文学之间的对话)。开始积极进行翻译工作,不仅翻译美学评论和艺术评论方面的经典著作,而且翻译现代理论家的作品。翻译了乔治·卢卡奇、阿诺德·豪塞尔、让·保罗·萨特、亨利·勒弗夫尔、安东尼奥·葛兰西、吕西安·戈尔德曼及其他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作品。在文艺创作中恢复了批评精神,重新肯定了文艺作品的广泛社会批评职能。批评得到文化界以外的社会人士和政界人士的支持,具有日益广泛的意义,它既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和艺术中的功利主义,也反对原始观点和低级趣味,主张肯定真情流露和真正的价值。

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中的巨大成就,保证了全国政治的稳定发展。社会各阶层——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都感到社会发展体现了他们自身的进步,而实践和生活本身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劳动人民参加自治,尽管范围有限和物质基础薄弱,但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源泉和主要力量。50年代中期,自治从工厂扩大

到商业和旅馆业的劳动组织,扩大到铁路、海运、公路交通、电力以及邮电服务部门的劳动集体。这样,就使工人委员会成为管理整个经济的组织形式。到1957年初,大约有60万工人,或者说劳动集体全部成员约有1/3先后担任过工人委员会委员。1956年在区和县人民委员会及其机构中(包括地方委员会),有20多万名委员。在区委员会中共盟盟员占60%,在县委员会中占83%。这些都促使区党组织更积极地开展活动。共盟盟员也参加了社会主义联盟、公民联合会、市政自治机构的工作。

自治者全面的主动精神加速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在发挥这种主动精神的同时,也出现了地方主义倾向和自给自足现象,它们在当时受到了共盟中央机关和各种社会机构的批评。区里的自治机关随自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加强(预算自主,建立自己的投资基金,管理交通,兴建住宅),很快就雄心勃勃地要发展“自己的”企业、“自己的”经济和“自己的”社会服务事业,而忽视了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在投资政策中特别表现出狭隘的地方利益。社会资本的地域化(按地域分配)导致了不合理的投资决策,其后果是兴建“政治工厂”;在作出投资决策时估计到中央机关通常会支援已建立起来的不赢利的企业。南共联盟领导机构批评了把公社(区)变为封闭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倾向。同样也批评了在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尤为突出的共和国本位主义倾向:即共和国力求从联邦投资基金和联邦其他基金中取得尽量多的资金,而联邦机构中的领导干部则日益成为“本共和国延长的手”。

1957年6月25~27日召开了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这是在工人委员会法通过七周年时召开的。大会的宗旨是推动自治的发展。大会要求扩大企业的自治权,改变企业收入的形成和分配方式,更客观和更长期地规定企业对社会共同体承担的义务,发展工人直接参加管理的形式。但是,有关社会发展的更重大的问题——计划、扩大再生产、市场和价格,没有进行讨论。

1958年特尔博夫列煤矿约4000名矿工举行罢工,原因是煤价

不合理和矿工对自己在决定个人收入和煤矿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不满。这是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发生的首次罢工。为此，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58年2月分析了全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状况和趋势，认为在劳动集体中存在着破坏自治权利和压制工人批评的现象，有的地方还迫害批评领导的工人。认为党的组织和领导首先陷在生产的圈子里，放弃了政治工作，削弱了与劳动人民的联系。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致南共联盟各级组织和领导机构的信，号召它们为克服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加强党的责任心和纪律而斗争。特别强调了共盟盟员的义务是在工会中工作，但不是作为“国家的延长的手”去工作，而是要更直接地面对工人阶级的切身需要和要求而去工作。

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发展以及社会政治体制中的改革，也促进了国防建设。根据最高统帅铁托的建议，1955年开始系统地研究建立符合社会政治体制变化的防御思想。确定了在发生侵略的情况下进行全民防御战的学说，这意味着国防社会化的开端。根据1958年确定的这个学说，南斯拉夫人民军仅仅是由全体能够战斗和抵抗的居民组成的武装人民中的一部分。这个学说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战争和军队的观点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中各族人民自行武装起来的经验。南斯拉夫把和平共处作为本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基础。根据全民防御战的学说，南斯拉夫只存在可能的敌人，对南斯拉夫来说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是“天然的”事先注定的侵略者，但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不管其社会制度和宣布进行侵略的动机是什么，只要它用武力威胁南斯拉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就是南斯拉夫的敌人。南斯拉夫把首先依靠本国力量进行防御的客观可能性与新的国际条件联系起来，新的国际条件的特点是目前存在着各民族政治解放和全面社会解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侵略者将遭到全世界进步民主力量的全线反击。

2. 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和南斯拉夫的非集团政策

贝尔格莱德宣言和莫斯科宣言。根据积极和平共处的原则扩大国际合作。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出现新的波动。

经过长期的集团冲突和国际关系紧张之后,1953年初开始出现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某些征兆。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府的政策中也出现了这种趋势。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然后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逐步正常化。这个时期也与过去一样,南斯拉夫的官方代表一直表示关心关系的正常化,准备从自身方面作出一切努力来促进关系的正常化,并强调南斯拉夫只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尊重它的独立和边界,此外别无其他要求。同样,苏联方面也开始表示出调整苏南关系的愿望。1953年,与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互派了大使,并与阿尔巴尼亚商定重新开设外交代表机构;缔结了关于消除、调查和解决边界事件的协议;开始恢复经济、文化和体育联系。

尽管在苏联领导中对于同南斯拉夫发展这种关系存在着阻力,但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是在1954年6月致函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建议使两党关系完全正常化并发展党的合作。信中不否定南斯拉夫具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建议两党之间进行最高级接触以消除误解。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准备接受苏共的建议,并根据这种精神与苏联领导继续通信。1954年11月26日,在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接受了举行最高级会晤的建议,但决定重点应放在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上,因为1948年在情报局与南斯拉夫的冲突中,首先涉及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国家关系正常化应该建立在积极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排除对国家内部发展的任何干预,关系正常化不能理解为一个集团内部调整关系和把南

斯拉夫纳入“社会主义阵营”。会议认为,两党合作也是可能的,但必须与其他工人运动也建立这种合作,而且南共联盟不回到情报局中。

1954年底,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停止了反南宣传,停止出版南斯拉夫政治流亡者的报纸,并解散了他们的组织。

1955年5月26日~6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和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率领国家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赫鲁晓夫到达时对1948年与南斯拉夫发生冲突表示遗憾,并声明“当时据以严重指控并攻击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材料……是人民的敌人和以欺诈手段钻进我们党的队伍的帝国主义的无耻代理人所捏造的”。他表示,苏联政府准备排除一切阻挠根据和平共处原则实现关系完全正常化的障碍,并充分理解“南斯拉夫与东、西方所有国家发展关系的愿望”。

访问结束时,在贝尔格莱德签署了南苏政府宣言(著名的贝尔格莱德宣言)。宣言中确定了南苏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本着这种精神必须采取的措施。宣言强调两国政府在相互关系和国际关系中从下述原则出发:和平不可分;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平等;承认和发展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而不问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这意味着一切国家在一般国际关系中,特别是在经济和文化关系中进行合作;坚持互相尊重的原则,不以任何理由——经济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理由——干涉内部事务,因为国内制度问题、不同的社会体制问题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形式问题,纯属各国人民自己的事;发展双边经济合作和国际经济合作,在本国经济的范围内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消除妨碍商品交换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切因素;通过联合国相应的组织并按照联合国的原则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提供援助以利于这些地区的人民和发展世界经济;停止任何形式的散布不信任的宣传、虚伪报道以及其他行动,停止以任何方式阻碍创造出建设性国际合作和国家间和平共处的气氛的行动;谴责任何侵略和任何在政治上

和经济上支配他国的企图；承认军事集团政策会加强国际紧张局势，破坏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和增加战争危险。

这个文件中包含的原则成了南苏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各个领域里顺利地进行合作以及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合作的长期基础，尽管后来在这些关系中出现了矛盾。贝尔格莱德宣言在世界舆论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尽管这是一个双边文件，却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特别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平等关系意义就更大了。此外，这些原则已成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关系民主化过程的支柱之一。

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给予苏南关系的发展以新的推动。大会的论断和决议意味着开始与最恶劣的斯大林主义畸形现象公开决裂，并重新研究“个人迷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官僚主义现象。南共联盟从苏共二十大宣布的积极过程着眼，认为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在于：它为和平和实现和平共处原则作出了贡献，它为社会主义运动和进步运动之间建立平等和民主的合作创造了条件，它有助于消除世界工人运动中造成思想和政治停滞状态的原因，它朝着苏联内部发展的民主化迈进了一步。苏共代表大会推动了反对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斗争，对于世界工人运动具有重大的影响。在共产党中间就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道路和形式问题展开了公开讨论。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了社会生活民主化的过程。恢复了斯大林清洗牺牲者的名誉，其中有许多杰出的南斯拉夫革命家：菲利普·菲利波维奇、约万·马利希奇、西马·马尔科维奇、久罗·茨维伊奇、安顿·马夫拉克、约瑟普·契任斯基（米兰·戈尔基奇）、科斯塔·诺瓦科维奇、弗拉迪米尔·乔皮奇、西莫·米留什、尼古拉·奥罗夫查诺夫^①、约瑟普·扎尔恩、沃伊斯拉夫·武约维奇、格尔古尔·武约维奇和拉多米尔·武约维奇三兄弟、姆拉登·乔尼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218页为尼古拉·奥罗夫查纳茨。——译者

奇、卡米洛·霍尔瓦廷、阿基夫·舍雷梅特。同样，也恢复了社会主义国家在1948年以后掀起的反南运动中捏造的骇人听闻的审判案的牺牲者(拉斯洛·拉伊克、特拉伊乔·科斯托夫、鲁道夫·斯兰斯基等)的名誉。1956年4月情报局解散了，理由是它“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尽管它“在发展和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兄弟联系和互相交流经验方面，在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方面”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它在组成和工作内容方面“已不再适应新的条件”。在宣布解散的公报中讲到，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体系，因此提出了克服工人运动的分裂和巩固工人阶级的团结的任务。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于1956年6月1~23日率领南斯拉夫国家代表团访问了苏联，签署了关于南共联盟和苏共的关系的宣言(著名的莫斯科宣言)。宣言强调，将继续进行两党合作，其出发点是：国家不同，情况各异，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各不相同，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和形式问题上，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任何倾向，都是不能容许的。两党一致同意，南共联盟与苏共之间的合作“应当以完全自愿和平等为基础，以友善的批评和就有争论的问题同志式地交换意见为基础”。

南苏关系的正常化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被看成是共产党之间关系新时期的开始。贝尔格莱德宣言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成了南斯拉夫与东欧其他国家、以及与其他工人运动和进步运动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在1955年1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南斯拉夫政府就立即承认了它。与中国共产党、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也建立了合作关系；签订了关于贸易和支付、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的协议。1956年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1948~1949年情报局对待南斯拉夫事件”的方式。1956年底，南斯拉夫与蒙古建立了关系；1957年3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关系；1957年10月南斯拉夫政府决定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为此，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中断了与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

在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多年封锁结束以后,南斯拉夫和南共联盟不管保守力量和斯大林主义力量的阻挠和存在的思想政治差别,重新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建立了合作。现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已经与1948~1949年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指责划清了界线。此外,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摒弃了教条主义的偏见,继续扩大同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系。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也作出同样的努力,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几乎所有工会组织以及国际行业工会组织发展了国际合作。南斯拉夫人民青年组织与世界各国约70个青年组织建立了合作。

南斯拉夫在国际关系中严格坚持非集团的立场,同时作为奉行十分积极的对外政策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巩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以后,它继续根据积极和平共处的精神,与其他邻国以及西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发展合作关系。在南斯拉夫经过多年的外交努力后,调整了与意大利的关系,1954年10月5日在伦敦签订了关于解决的里雅斯特问题的协议,协议规定,过去的“B”区以及过去的“A”区一部分(面积为11.5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归南斯拉夫管理,“A”区的其余部分归意大利管理,同时,双方保证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1955年签订了奥地利国家条约(南斯拉夫也参加了该条约),建立了独立民主的奥地利并保证这个国家里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少数民族的民族权利,从而使南奥关系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尽管围绕少数民族在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地位问题发生过争端,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在继续发展。1953年2月,南斯拉夫与希腊和土耳其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巴尔干条约),在这两国之间的关系恶化之后,合作仍然继续着。尽管1957年10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断了与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但在南斯拉夫的外贸流通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仍居于前列。虽然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差别,南斯拉夫与

英国、法国和美国发展了互利的合作。1953年3月，铁托总统正式访问了英国，1956年5月访问了法国。1956年10月底，在英、法、以色列侵略埃及时，南斯拉夫支持了埃及，以致南斯拉夫与法国和英国的关系冷却；与法国的关系冷却还由于南斯拉夫援助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957年底，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南斯拉夫拒绝了美国的军事援助，把重点转移到扩大与美国的经常性经济贸易上。

南斯拉夫在各个领域都向世界开放，扩大在经济、文化、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国际合作。1957年被宣布为旅游年，允许其他国家的公民不要签证可以进入南斯拉夫，并建议所有国家在互惠的基础上取消暂时逗留的签证。南斯拉夫是第一个全面地这样做的国家，它与很多国家签订了取消签证的协议，对进入南斯拉夫的旅行和南斯拉夫公民出国旅行都给予方便，开放了自己的边界。

支持亚非新解放国家的独立，在南斯拉夫对外政策中具有特殊地位。还在1953年就与11个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开始发展经济和科技合作。从1954年开始，埃塞俄比亚、埃及及许多新解放国家（缅甸、印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的国家领导人先后访问南斯拉夫，与他们的会谈中逐步打下了后来的不结盟政策的基础。1954年底和1955年初，铁托总统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一年以后，1955年12月和1956年1月，访问了埃塞俄比亚和埃及。铁托在印度议会和仰光大学的讲话中阐述了南斯拉夫关于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积极和平共处的观点，指出这是对付集团政策和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分割世界的唯一抉择。在访问印度和缅甸的公报中，写入了和平共处的原则：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不侵略别国、平等和不干涉内部事务，这些应该成为联合国政策和工作中的主要因素。在积极和平共处基础上的“不参加集团”的政策不应理解为中立或中立主义，而应理解为“正面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政策，这一政策会导致集体和平，而集体安全只能建立在集体和平的基础上”。

1956年7月,铁托、尼赫鲁和纳赛尔在布里俄尼岛会晤。在共同声明中指出,必需逐步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原因。声明提醒人们,把世界划分为集团是不能实现和平的。而是要“努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集体安全、扩大自由的范围以及结束一国对另一国的支配”才能实现和平。声明支持在联合国范围内进行裁军的努力;要求通过联合国保证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消除发展国际贸易中的障碍。声明对世界局势的分析和结论特别全面,它接受和肯定了1955年万隆会议的共处原则,克服了它在地区上的局限性,特别强调和肯定了不结盟政策的因素。

但是,南斯拉夫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受到新的考验。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是引起新的波动的缘由。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民主改革遇到了阻力,这种阻力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从而使波兰和匈牙利在1956年夏季和秋季出现了危机局势。工人们通过群众性抗议斯大林主义制度来表达愤慨,并要求加速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实行工人自治。10月23日在布达佩斯发生工人示威,反对拉科西的政策,示威转变成与执政当局的武装冲突;10月24日苏联军队进行干涉,之后,苏军撤出匈牙利首都,但很快苏联就进行第二次军事干涉。

南斯拉夫表示帮助卡达尔的“工农政府”,主张在匈牙利局势安定后撤出苏联军队;反对把“匈牙利事件”提交安全理事会。铁托11月11日在普拉的演说中强调,南斯拉夫反对干涉和使用武力。认为苏联第一次军事干涉是不需要的,这个局势已被英、法、以色列用来武装干涉埃及,从而直接威胁了世界和平。但是,第二次干涉是“不得已的坏事”,因为当时有发生国内战争和断送社会主义的危险,即发生西方干涉和霍尔蒂分子重新掌权的危险,而这将导致新的世界战争。如果这次干涉使匈牙利保住了社会主义,维护了世界和平,那末,“它有朝一日将会是积极的,但苏联军队必须在该国局势安定后立即撤走”。

由于波匈事件的发生,苏联政府于1956年10月30日发表了关于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宣言,宣言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才能够建立它们的相互关系。宣言表示准备重新研究苏联军队驻扎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土上的问题。但是,斯大林主义势力恰恰利用波匈事件作为反对改革的根据。同时南斯拉夫也被指责为所谓挑动匈牙利的骚乱。而同意匈牙利政府前总理纳吉及其同事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避难使南斯拉夫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更加冷淡。同时,南斯拉夫的非集团的对外政策也遭到否定,因为这一政策似乎会使社会主义力量在国际关系中一致行动的可能性发生问题。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和消除误解,南共联盟中央与苏共中央交换了信件。但是,直到1957年6月苏联最高层领导从政治上清算了斯大林主义“反党集团”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以后,与苏联的关系才得到改善。1957年8月1日和2日,铁托和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近郊会谈,肯定了贝尔格莱德宣言和莫斯科宣言对于发展友好关系的现实意义,双方表示愿意在两个宣言的基础上全面发展相互关系。

1957年11月14~16日在莫斯科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以后,南斯拉夫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再次遇到阻碍。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南共联盟代表团(爱德华·卡德尔、亚历山大·兰科维奇、韦利科·弗拉霍维奇和乌格列沙·达尼洛维奇),根据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方针,拒绝参加这次会议和签署会议通过的宣言;代表团只参加全体与会共产党(64个)的代表会议(11月16~19日),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1957年12月7日举行的南共联盟中央全会通过了代表团的报告。在南共联盟中央致党员的信中强调,南共联盟不能参加上述会议,因为会议通过的宣言的某些重要内容与南共联盟的立场相违背,而号召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刚开始广泛开展反对斯大林主义

教条主义的斗争的时候,修正主义竟被视为主要危险),包含着对南共联盟和某些其他共产党的立场和实践的间接指责。同时,对军事集团和克服军事集团的政策看法,对“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世界”及苏联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的解释,也存在着差别。根据南共联盟的观点,社会主义的领域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界并不等同;作为最大和最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义务和责任并不意味着由苏联共产党来充当“全世界争取发展和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问题、组织问题和其他问题的仲裁者”,因为这些问题应当由各党自主地解决;宣言草案中包含的某些党认为需要恢复情报局之类多党合作形式的观点,也是不能接受的。宣言还强调各党在所有问题上观点一致。南共联盟认为,签署这种宣言将会掩盖差别,损害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应该存在的合作的发展,并导致对南共联盟对内和对外政策立场的原则性的怀疑。但同时也强调,南共联盟与其他共产党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对某些问题和某些任务的看法存在这些或那些差别,“不应该阻碍目前相互关系的良好发展或者使这种关系倒退,当然,其条件是合作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原则的基础上”。

但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南共联盟拒绝以签署宣言的方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也就是拒绝接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这些普遍规律把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与简单重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联系在一起),这就成了反对南斯拉夫的新的思想政治运动的缘由。在社会主义国家报刊上,还尖锐地批评了1958年初在筹备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过程中发表的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南共联盟欢迎批评性意见,接受了波兰共产主义者的某些建议,但有些人提出的不是善意的建议,而是谴责。草案中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关于国际工人运动中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平等关系,关于需要与所有工人运动、解放运动和其他进步运动进行合作,关于发展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的观点,都被宣布为“修正主义的”观点。硬说南共联盟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自

动长入社会主义和关于“民族共产主义”的观点。要求南共联盟不要通过已公布的纲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没有接受派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七大的邀请,只派本国大使作为观察员参加代表大会。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特别强调,“南共联盟领导集团”辜负了苏共中央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人期待南斯拉夫领导人“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来”的希望。号召国际工人运动开展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声称“世界工人阶级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取决于”这场斗争。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还作出了反对南共联盟的专门决议。莫斯科的《真理报》也认为南共联盟纲领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一些问题的解释离开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南斯拉夫的政策违反了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而符合美帝国主义者们的利益。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南斯拉夫成了导致关系恶化的罪人。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把两大集团等同起来。他们继续顽固地坚持把南斯拉夫纳入“社会主义阵营”。

这样,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就处于“意识形态斗争尖锐化”的中心,因为它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关系中的消极现象,因为它坚持各国和各党之间的平等地位,因为它决心继续进行以自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践,这种实践否定了官僚主义畸形现象,打开了在“国家襁褓”之外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景。

3. 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和 南共联盟纲领

(1958年)

鉴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是1948年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它已被工人自治的社会实践所超越,因此,在筹备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也开始着手草拟新的南共联盟纲领。1958年3月初公布了纲领草案,然后在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中,在报刊杂

志上和最广泛的社会公众中展开讨论。在这场讨论中,集中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工人阶级、尤其是年青人的自治思想理论意识和政治意识。全体党员(1958年初南共联盟共有755066名盟员)和全体南斯拉夫公众都把纲领草案看成是南斯拉夫社会社会主义自治发展的“宪章”。

1958年4月22~26日在卢布尔雅那举行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共有1791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认为,实行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推动了工业的全面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代表大会指出了共产主义者社会作用的基本要素,特别是在协调个人利益、共同利益和整体利益即工人阶级历史利益中所起的社会作用的基本要素,由于自治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由于放弃了以行政集中的方式消除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不同利益的差异,上述这种协调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活动中具有首要意义。代表大会认为,第六次代表大会和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间曾出现过的在吸收盟员方面的宗派主义标准已经得到克服,虽然工人阶级人数的增长比它在党员中所占的比重的增长要快,而且南共联盟中农民的人数还在继续减少。代表大会主张加强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阶级基础和实现干部年轻化,同时坚持南共联盟仍然是干部组织。

大会通过了南共联盟新章程。章程规定南共联盟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在盟员及组织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章程特别强调了党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的新作用所产生的党员的权利:表明和维护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参加讨论党的政策并作出决定;批评任何党员;选举和被选为共产主义者联盟机构的成员;在讨论本人的工作和行为并对此作出决定时有权亲自参加。根据这个精神确定了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组织结构,规定了党内生活准则、各级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在地方、小居民区和住宅区可以建立党委员会;在低级领导机构中建立监察委员会;在某些事业单位和联合组织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政治组织、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机关可以提出吸收南共联盟新盟员

的建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南共联盟今后任务的决议，决议规定了在经济、社会政策、文化、教育、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组织工作等方面的直接任务，以及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领域里的任务。

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委员139名，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23名。在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上选举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为南共联盟总书记，当选为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有：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弗拉迪米尔·巴卡里奇、伊万·戈什尼亚克、布拉若·约万诺维奇、爱德华·卡德尔、拉扎尔·科利舍夫斯基、法兰茨·莱斯科舍克、米哈·马林科、久罗·普察尔、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久罗·萨拉伊、彼得·斯坦鲍利奇、约万·韦塞利诺夫、韦利科·弗拉霍维奇和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

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是南共联盟新纲领，新纲领在以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分析国际和国内社会主义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地阐述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新的政治战略。纲领包括了南共联盟对当今过渡时期的基本问题、工人运动中的关系以及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的观点。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包含着对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彻底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纲领性文件，它与斯大林把世界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政治集团等同起来的观点相反，发展了社会主义是世界进程的思想。它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重新确认并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强调必须开展顽强的斗争，既反对以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低估国家作用的倾向，又反对把国家变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包罗万象的力量。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起来，或者把无产阶级专政与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无限扩大国家和党的权力等同起来；与此相反，南共联盟纲领规定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起着无可辩驳的领导作用的政权和政治制度的社会实质”，并本着这种精神解释自治是劳动。工人阶级和人的社会解放的具体历史

形式。

纲领分析了国际关系和当代世界的社会发展。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过程、许多国家中社会主义社会力量的胜利和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引起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私有制和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已经增长了的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成了过分狭窄的桎梏。国家已成长为独立的经济力量,巩固着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特权,同时逐步限制私人资本的力量并压制工人阶级社会影响的扩大。国家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它的作用正在不断加强。这个加强过程本身证实了人类正在不可阻挡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一些经济职能越是以私人资本所有主手中转入国家手中,经济中新的物质因素和社会因素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压力就越明显;社会主义因素正在成熟和壮大,它加深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面危机,并传播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的不可避免性和为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必要性的思想。尽管资本主义还没有耗尽自己的全部内在潜力,资本主义体系的重大矛盾仍然在于它的经济机制和社会机制显得越来越无能,而制度本身对于人民群众的压力、首先是对于工人阶级的压力比过去远为敏感得多,工人阶级的阶级行动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动力。

由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突破也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变化。现代社会主义肯定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思想潮流、政治运动或社会“试验”,而已成为对世界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起决定性影响的物质力量和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它也促使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社会影响的加强。同时,在许多刚刚从殖民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国家里,表现出越过资本主义的某些阶段、开始为社会主义发展创造经济和社会基础的趋势和可能性。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关系的内部发展问题已日益成为当代人类的主要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思想已经不再仅仅是要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而是应该越来越多地回答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社会

主义的发展正面临着旧关系的残余和资本主义力量的猛烈反抗。现代条件要求工人阶级采取新的斗争方法去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要求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作出新的回答。资产阶级国家中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巨大集中及其国际联系，使工人阶级过去运用的斗争手段和斗争形式遇到困难，而且常常变得无效。资产阶级用各种改良和物质上的让步来加深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削弱它的团结，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越是阻挠工人阶级使政治行动的形式和方法适应阶级斗争的具体条件，上述情况就越是严重。

另一方面，南共联盟纲领详细地考察了社会主义力量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斗争中与之发生冲突的物质、政治和思想因素，特别提醒要防止社会主义关系发生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畸形现象，并始终坚持，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巩固以后，国家逐步消亡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尽管世界上社会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但迄今为止首先是相对不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开始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社会改造，这一事实决定了迄今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堆积起许多巨大的困难。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表明，国家主义倾向的加强窒息了工人阶级的创造性活动，逐步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使工人阶级处于他人利益和异己思想的影响之下，从而引起深刻的社会动乱、政治危机和震荡。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实用主义的修正，首先是在国家理论和党的理论方面，然后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一般社会科学方面。这种修正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阐述现代社会问题方面，特别是在揭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规律和矛盾方面停滞不前，使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教条化，使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假革命的宗派主义。这种情况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包括机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易于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影响和扩大影响，从而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力量，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消极作用。

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是社会主义的力量大大增

长,今天它已经并不仅仅局限于各国共产党了。从这一变化出发,南共联盟纲领坚决主张工人阶级的某些派别、政党和组织团结一致和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以适应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具体斗争的需要。合作的形式将在当前时代发展的基础上,根据劳动群众的利益和维护和平的需要而产生,特别是根据对下列问题认识的提高而产生,这些问题是:必须支持各种形式的真正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支持发展社会主义关系和加强正在旧社会的缝隙中成长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各种形式和各种途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将始终接受并推动各种形式的合作,不仅与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合作,而且与社会党和其他进步党派和进步运动合作,只要认为这种合作有助于巩固和平,能促进各国人民和进步运动的接近和社会主义的前进。纲领主张平等的合作,摒弃干涉各个运动的内部生活和内部发展的一切行为,摒弃一个运动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思想垄断和政治霸权主义的一切倾向。

在回顾国际关系和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时,南共联盟纲领认为,由于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活动的地盘缩小、社会主义和爱好和平的民主力量壮大、殖民主义崩溃),新的世界大战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尽管当代世界经济和政治分割的加深和由此产生的国际关系中矛盾的加深(其表现就是建立军事和政治集团),以及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实力政策和恢复军备竞赛,都在继续给世界和平带来许多危险。纲领强调了要坚持积极和平共处的政策以利于巩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纲领指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的历史意义,它是争取和平和社会进步的因素,是各国人民之间建立联系和互相接近的出发点。本着这种精神,纲领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排除资本主义给小国与大国、强国与弱国、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的消极现象的残余。纲领指出必须向欠发达的国家提供不附带政治条件的集体的国际经济援助。

分析和从理论上总结南斯拉夫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的经验,

在纲领中占最大的篇幅。纲领中指出了自治社会经济关系、民族平等、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发展的基本方向,并仔细分析了在把代表工人阶级的政权变为劳动人民自己的政权的过程中共产主义者联盟实现引导作用的问题。实现这一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基本社会冲突,是国家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和趋势与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和趋势之间的冲突。在分析南斯拉夫革命工人运动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更详尽地探讨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某些关键问题,其中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和作用问题。纲领重新确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范畴的本来含义,同时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指过渡时期国家和政治制度的阶级政治内容和社会实质,而不是指它的形式、机制和方法。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如下:无产阶级专政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的社会实质,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工人阶级起着无可争辩的领导作用,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工人阶级及其社会主义引导力量与其他劳动人民结成联盟并根据他们的社会经济利益改变着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南斯拉夫人民政权从产生之时起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社会意义也正在于此。在社会主义自治的范围内,无产阶级国家在消亡的过程中将越来越少地成为暴力的工具,而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自治的工具。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国家管理机关在直接管理经济、教育、文化、卫生、社会政策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缩小,而由社会自治机构来担负这些职能。

纲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承担者”是生产者,他们使用社会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和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利益必然成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支柱;劳动集体作为经营者,关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结合;公社(区)是劳动人民的基层政治区域自治共同体和社会经济自治共同体;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政治的、社会经济的、文化的和其他的组织),在社会主义公民具有一定利益的地方建立,作为社会共同体的工具进行活动,发挥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不断发展的代表者的作用。在生产

者、劳动集体和公社这些社会基本因素的地位和关系中,反映出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组织,尤其是共产主义者联盟、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和工会,将较少地成为政权系统的组成部分和工具,而将越来越多地把自己活动的重点转移到研究社会发展上,也就是通过吸收劳动人民参与决定社会事务来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和业务教育。这是一条实现没有党的直接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一条国家的某些职能消亡的道路,也是一条把国家的某些职能转变为社会自治职能的道路。

同样,纲领还明确地表述了南共联盟关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理论观点。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侵犯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根据社会需要指导生产,防止剩余劳动与生产者分离,并使生产者能够参与决定社会产品的使用和分配。社会所有制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和保障,这种社会生产关系将逐步消除产生任何所有制垄断(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垄断)的条件。纲领规定了南共联盟关于农村改造和土地社会化过程的长期政策,对于农民所有的土地,不采取强制手段,而是通过建立合作社,或农民与农业生产中的社会所有制成分进行合作来逐步联合土地和加强社会主义农业企业,从而实现土地社会化。纲领首先从消灭雇佣劳动和努力使社会日益成为直接生产者自由联合体的角度出发,来看待生产者在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的地位,这样的直接生产者关心尽可能合理地管理生产和分配,从事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劳动,更彻底地实行以下原则:每个人的个人收入和经济组织的发展取决于他们的劳动和经营成绩。

同时,纲领还总结了以往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表达了南共联盟对经济计划在经济组织独立经营和商品生产规律发挥作用的体制中的作用、地位和性质的看法。同时特别强调,南斯拉夫各民族除了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方面的平等以外,还应该逐步补充经济平等,为此必须保证国内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加速发展,并在今后仍

应维护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兄弟情谊，为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协调各民族间的关系而斗争。

纲领根据上述种种观点规定了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地位和作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将越来越少地借助于政权，而越来越多地通过社会自治机构在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斗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纲领主张用社会主义的目标来激发所有社会发展因素的积极性，使越来越广泛的生产者能进行社会主义管理，从而克服政权与公民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对抗的减弱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稳定，共产主义者联盟越来越少地作为政权的因素，而越来越多地成为促使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形成的因素。它不为自己谋求在政权机构和社会自治机构中的垄断地位，而是为在这些机构的活动中贯彻社会主义的原则而斗争。自治机构和社会机构的决定应该是在这些机构本身内部、在共产主义者联盟组织和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组织中开展社会主义的思想斗争的结果。根据这个精神，纲领规定了共产主义者在工人自治机构、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工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和其他科学技术组织及群众团体中的任务。

对于科学和艺术问题，共产主义者联盟表示赞成创作自由，摒弃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和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观点的一切实用主义曲解，反对把科学和艺术完全变为日常政策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南共联盟政治活动的理论基础，它不是教条的体系，而是社会发展的理论，它本身也是在社会实践和科学思想成就的影响下不断地发展着。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领域里，在社会科学的领域里，南共联盟不为自己谋求任何垄断地位，也不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但是，南共联盟在主张科学和艺术创作自由的同时，也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精神日益广泛地教育人民，主张开展创造性的思想斗争，反对反动观点和反社会主义观点打着科学和艺术自由的幌子进行渗透。

同样，南共联盟虽然依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进行反

对各种宗教偏见的思想斗争,但也不同意用各种强制手段压抑宗教感情;只有在宗教感情被滥用于政治目的,宗教机构成了反社会主义力量的据点的情况下,强制手段才被认为是正当的。

纲领强调,共产主义者应当不断地在社会实践中检验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批判地评价已经实现的东西,如果实践和前进的利益需要,时刻准备以新的方式提出社会发展的问題。他们应当经常牢记,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社会主义引导力量的主观能力,而且取决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因素和其他客观条件,因此,共产主义者联盟既不应该落后于也不应该超越于具体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

在社会主义是世界进程、社会主义革命是群众的创造这些问題上,南共联盟纲领重新确认了马克思主义原来的观点,并以新的认识加以丰富。纲领从一次真正革命的实践出发,否定了各种无政府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和诸如此类的有关新社会的设想和方案以及实现这些设想和方案的可能性,同样也否定了斯大林主义的下列教条:争取建立新社会的斗争必须按照某一个国家和某一个党的实践所特有的同一方式来进行,而不考虑本国的能力、经验和特点。在这方面,南共联盟纲领是一个这样的文件:它在工人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当前历史上,比任何其他文件都更多地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观点出发,解释了当代世界、它的问题和矛盾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改造的可能性。

在以后的年月里,这个文件的基本内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多次争论,但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这个文件的反教条主义的建义也使世界上其他国家在探索适合本国具体历史条件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形式时受到鼓舞。

4. 工人决定剩余劳动的初步尝试

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疑问。南共联盟领导中的思想政治分歧。1963年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

50年代末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特点是：取得巨大的经济成果，南共联盟的队伍团结，国内政治局势稳定和国际地位巩固。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几乎持续了整整十年。1959年11月18~19日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会议确认，1953~1959年工业发展速度为年增长率13.2%。比最发达的西欧国家高2~3倍，同时，也高于东欧国家的增长速度。工业已成了主导的经济部门，发展了新的经济部门，扩大了出口和进口，开始使用新的能源和原料。全国各地都在加速工业发展的过程。用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农业中社会主义成分的土地总额已超过百万公顷，虽然农业还不能满足本国消费的需要。从1956年开始，农业生产已摆脱了停滞状态，随着现代化农工联合企业的建立和农民与“社会所有制成分”“合作”的发展，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已达到世界水平。1946~1957年的农业生产低于南斯拉夫王国时期的十年平均水平，而1957~1961年时期的农业生产则比战前平均水平高60%。1957~1959年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为13.3%。1957~1963年消费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迅速，从而也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

取得这些经济成果，不仅仅是由于实行了自治制度，而且还由于国内外一系列其他的情况，如：开展了积极的外贸联系，南斯拉夫加入了世界贸易，在关系已经正常化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上销售商品，减少了国防开支。

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业化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结构中农民的比重迅速下降和工人阶级的比重迅速增长，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也显著增加。公有经济部门、主要是

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迅速增加。1952~1960年期间,就业人数增加了120万人以上,约增加了70%;1963年就业人数共有340万,约有100万人在工业部门工作。1960年劳动者人数达287万人,非体力劳动者为1015946人,其中知识分子超过45万人,占46.1%,一半略多的人具有大学或大专的学历。与1952年相比,1960年知识分子人数增加了一倍。受过学校教育的人数增加了;1952/53学年,有6810名大学生毕业,而1960年约增加一倍半——有17363名。据1961年人口调查,南斯拉夫有88557名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1945~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有221911名,从高级专科学校(大专)毕业的学生有60925名,从艺术学院毕业的学生有3553名。

大批青年离开了农村的宗法制环境,进入了城市,进入工业和其他劳动部门,这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百万农民群众欢迎农业生产新的增长和整个社会发展的直接前景,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经过战争的这几代人,在整体上仍然表现积极,其中绝大部分精力充沛,是国家稳定的支柱和发展的担当者,他们掌握了社会上几乎所有关键岗位和职务。在革命中,以后又在反抗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中,在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和为在全世界建立新关系而斗争中,南斯拉夫赢得了国际威望,这促进了全国的政治稳定。南斯拉夫人民理所当然地对此感到自豪。同时,这也促进了南斯拉夫社会在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但是,60年代初经济发展的速度开始减慢。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从1959年的17.6%和1960年的15.6%,突然降到1961年的4.1%。这首先是由各经济行业 and 经营部门之间内部比例失调加剧所引起的。它表现为使用进口原料和再生产材料的可能性缩小,广泛地和不合比例地建立起来的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缺乏动力和原料来源,而原料、食品和能源的生产又没有受到重视。此外,经济发展水平还要求领导日益复杂和日益发达的经济的干部具有新的素质,这种素质许多干部还不具备。

尽管在民主化和非集中化方面迈出了巨大步伐,在向自治和

公社制度过渡过程中,国家集中主义仍然很强大。国家在扩大再生产方面仍然起主要作用。尽管联邦国家机关在名义上只支配约35~40%的扩大再生产资金,经济部门支配约30~35%,地方社会政治共同体支配约15%,共和国支配约7~8%,其他组织和银行支配7~8%,但实际上联邦国家机构在分配国民收入中起关键作用。联邦决定着各经济部门、行业和活动的发展政策,以投资贷款的形式分配积累的最大部分。劳动集体、地方共同体、自治省和共和国经常为这些资金的分配问题而向联邦机构施加压力,对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尤其是工会联合会领导曾进行了批评和讨论。联邦集中主义与发展自治、实行非集中化和民主化的方针之间的矛盾激化了。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利益矛盾表现出来了,民族间的关系问题也出现了。领导中主张加强共和国的自主和自治省的自治并扩大它们在本身发展方面的权利和责任的趋势,与联邦中的集中主义发生了冲突。早在1957年,爱德华·卡德尔就提醒道:官僚集中主义倾向破坏着南斯拉夫各民族间的关系,而只有建立在民族平等和紧密合作的基础上,并符合其中每个民族自由发展的利益,南斯拉夫各民族间的关系才能是持久的和牢固的。否则以“南斯拉夫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大国霸权主义倾向,可能导致“官僚主义暴政”。根据民族平等政策的精神,也为了全面发展各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平等关系,1959年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的实施改进了少数民族的状况和作用。

同时,社会发展过程及新趋势使人们对自治社会发展的道路重新产生了重大的疑问,这些疑问是由于对一些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而产生的,这些问题是:关于商品生产规律的作用,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与此有关的关于企业在经济体制中的地位、经济管理的非国家主义化,以及南斯拉夫经济参加国际经济过程。

根据南共联盟纲领关于社会生产应当由直接生产者来管理的观点,50年代末,更强烈地提出了实行直接的工人自治的要求。

在劳动集体中,要求成立车间工人委员会作为经济核算单位,要求在企业中按组成经济、工艺和自治整体的各个部分形成收入。经济单位即劳动单位的产生,是要求适当地解决下列问题的结果:按劳动成果分配个人收入,劳动者能对收入的形成和分配发生影响,同时限制企业管理的官僚主义化。力求使经济单位形成“自己的”收入,成为企业中的基层自治细胞,在那里,全体工人直接参加作出决定。

工会是在分配领域里提出新要求的主要代表者之一,所谓新要求就是实行计件工资,这在1957~1958年就已经在某些劳动集体中开始实行了。在1959年4月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特别有力地肯定了这一点。

共产主义者联盟原则上支持使劳动集体更多地参加企业管理的要求,并赞成在自治实践中形成的形式,但对于可能会使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这些现有自治机构的稳定性发生问题的主张表示保留。1959年5月举行的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会议支持关于采用新的报酬形式的倡议。会议同意下列观点:劳动集体自由支配企业的纯收入,是能推动工人更多地投入劳动的坚实的基础和有利的动机。会议认为,在新的计件工资的形式中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它能促使生产、生活水平和积累实现新的跃进。

为了加强工人自治和公社制度的物质基础,并为商品生产的规律开辟发挥作用的场所,在经济体制中进行了某些改革。1961年3月,联邦国民议会通过的新法令在法律上确认了劳动集体在把收入分为个人收入和积累资金方面的自主权,规定了提取用于全国需要的资金的稳定比例。实行了第纳尔贬值,作为南斯拉夫经济按照世界经营标准实现逐步开放过程的第一步。这些措施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端,其目的,正如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委员会总书记米伦蒂耶·波波维奇所说的,是要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最终消除资本主义的雇佣工资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工资之类的经济范畴和社会范畴”,并在新的社会经济范畴——收入

的基础上建立自治的社会主义关系。要求以新的、按收入原则经营的自治企业代替传统的企业组织。

随着经营体制的改革,明显地出现了企业之间、部门之间,以及全国各地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差别这一敏感的问题。在收入分配方面也出现了重大差别。生产率高于平均水平和取得了高额收入的经济组织决定提高个人收入,这是社会所要求的。但是,经营效果在平均水平以下的劳动组织也开始提高个人收入,以便向同一公社、同一类别、同一部门的企业“看齐”,理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必须尊重工人阶级的物质地位相同和社会平等的原则。生产的节奏开始停顿和下降,个人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自由地把纯收入分为各种基金和个人收入这种做法,减少了经济组织的各种基金,证实了人们对于不受国家监督、而由直接生产者作为投资决策者来决定的那部分积累的命运的担忧(担心“工人会吃掉积累”)。在按定额劳动的工人中间出现了对领导人个人收入的不满,因为他们的收入不取决于劳动成果。不发达的社会负担着超过实际可能性的各种消费。出现了许多想使本身尽快发展的倡议和不能控制的愿望。共和国、区和劳动集体力图在经济结构中占据良好的地位和进行更多的生产投资,以便较快地取得效益,但建立的主要是加工工业。这些都加重了结构上的比例失调。商品生产规律的作用(尽管仍是有限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竞争的矛盾,经营条件的差别,以及各行业、各部门之间个人收入差别的扩大——在人们的思想中的反映是,国家的统一遭到破坏。

由于上述种种情况,经济体制中已经开始的改革(其目的是解决经济组织与国家之间分配社会产品的关键问题)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于是,南共联盟领导决定暂停改革,停止实行已决定的措施。没有正式取消新法令,但刚刚宣布的扩大劳动集体在收入分配中的自治权利实际上被缩小了。1961年下半年政治行动的重点是停止非集中化和非一体化过程,加强中央国家机关的作用。

1958年通过南共联盟纲领和提出全面发展自治的新倡议,使

南共联盟的地位、作用和活动方式问题又一次成为迫切的问题。由于几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扩大了自治,由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作用问题也变得十分复杂。1960年4月18~22日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举行了第五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联盟在本身从人民阵线型的政治组织发展为团结和发动最广大的劳动人民阶层的组织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对社会主义联盟的工作方式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件事是,区成了它活动的基础——区社盟组织设立了各个部门,组织了各种论坛。工会组织由于提出倡议和进行活动而成为决定许多迫切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的重要因素。工会研究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时,要求让劳动组织更多地参与支配扩大再生产,努力使非经济部门的劳动单位也实行按劳动成果分配收入的办法,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劳动组织中的工会基层组织开始处理集体中有关劳动和社会关系的一切问题。人民解放战争老战士联合会也参加全国所有重要的政治活动。

政治生活的活跃和自治关系领域的扩大,重新提出了某些老的疑问。有人认为,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社会作用削弱了,自发势力开始占统治地位,在政治生活中有若干重叠的机构和组织在起作用。于是产生了使南共联盟重新变为“政权因素”的想法。许多组织和委员会继续按老一套方式工作,越过自治机构进行活动;在党的积极分子圈子里关起门来按简化程序作出决议和决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政权机构的联系仍然过多。党委书记处和书记起主要作用的地方党的领导也决定着应由人民委员会、社会主义联盟和自治机构经管的事务。社会政治组织中专业机构和政治机构的专职干部增加了(1958到1961年,人数从6525人增加到12826人)。以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为首的南共联盟中央组织政治书记处日益掌握了对党的生活的具体领导工作,而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开得越来越少(从1958到1964年,中央委员会只举行了5次会议,而中央执行委员会则数月以至一年不召开一次会议;而

在这段时间里,组织政治书记处召开了57次会议)。组织政治书记处不研究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关系问题,多半依靠国家安全局的机构进行工作,了解企业和机关中党的情况和活动,了解党的委员会的工作,执行干部政策,组织党的选举,领导情报系统,贯彻吸收新盟员的政策,指导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活,处理申诉和申请。而共盟组织的工作方向是处理党内生活,加强纪律和责任,执行党的指示。自治的发展遇到了党的机构的阻力。而过去在维护革命成果和破获外国间谍活动的斗争中,特别是在与情报局冲突时期,曾作出过巨大功绩的安全机构,它的某些部门开始成为监督共产主义者联盟、监督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机构工作的工具。

在工业发展中,开始与墨守成规的习气发生强烈的冲突。年轻的专业干部的数量大大增加,但是经济部门的关键岗位仍然由没有相应专业学历的干部占据着(例如,1963年在最发达的斯洛文尼亚,约有50%的经济组织经理只受过初级专业训练,而在486个工业企业里连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也没有)。在政治领域里,一部分革命干部在整个战后时期都担任同一职务。由于这种情况,1962年南共联盟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轮换制和限制干部连选连任的原则,后来载入了1963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政治干部职业化的问题也变得尖锐了,专职干部时间长了就很难再回到自己原先的生产岗位上(例如,在1964年6月的选举中,塞尔维亚共盟区组织更换了46%的书记和组织书记,其中只有26%回到生产中,49%去担任其他政治职务,而25%进入政治学校,以便以后继续从事专职的政治工作)。

在1961年11月举行的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南共联盟今后思想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的迫切问题》的集体报告。总书记铁托在开幕词中指出,共产主义者的党性、觉悟和责任心削弱了。中央委员会主要讨论了党内关系和共产主义者的形象问题,而未涉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改革的阻力引起的疑虑。中央指出,应当把区里的党员组织得能使他们更直接地探讨共同的

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便能够首先在劳动组织和地方共同体中有效地掌握个别利益、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围绕着草拟新宪法的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尚未解决的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特别是涉及共和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加强这种日益强大的趋势和反趋势的问题,南共联盟领导中的分歧加深了。

1962年3月,召开了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这次会议的特点是参加者进行了坦率的争论和相互批评,这说明社会中的矛盾和共产主义者联盟中的思想分歧已反映到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政治机构中。执行委员会在致党员和党的领导的信中,号召他们起来反对社会发展中的反社会主义倾向。信中指出了当时存在的不诚实的竞争、地方主义观点、个人和集团的利己主义糊涂观念、党内的实用主义等现象。铁托1962年5月在斯普利特群众大会上,在约15万名公民面前十分尖锐地批评了社会上存在的这些和其他消极现象。还尖锐地批评了在报酬中的巨大差别(这种差别甚至达到1:20)、外贸中的贪污现象、泄露业务机密和浪费外汇资金、对消极现象不能作有根据的批评、把市场封闭在地方和共和国的范围内、甚至把那些犯经济罪被判过刑的人安排在领导岗位上。铁托认为,社会中开始遇到的客观困难,首先是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犯有主观错误的结果;共产主义者联盟对国家的发展负责,因此,它应该是牢固的和统一的组织。

1962年7月22~23日在南共联盟中央全会上,铁托认为,存在着官僚主义自发势力阻挠自治进一步发展的危险,他表示赞成非集中化,反对集中主义和教条方法。同时,他也提醒防止那种可能使南斯拉夫经济整体瓦解的对非集中化的误解,主张在全南斯拉夫的范围内实行联合和合作,而这种联合和合作,只有在生产者(而不是政治因素)成为经济一体化、参加国际分工和对外贸易的实施者时,才能作到。

对社会发展道路的意见分歧减慢了社会改革的速度,并导致通过妥协性的决定和文件。围绕着1963年制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

联邦共和国新宪法,又出现了意见分歧。需要着手草拟新宪法,是因为全国在自治基础上的社会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已超过了1946年宪法的几乎全部重要规定,1958年南共联盟纲领通过后,宪法条文与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尽管存在许多困难,这些关系还是得到了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

制定宪法的工作是发展自治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理论方面和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这个宪法宣布了全体劳动人民具有同等的社会经济地位。宪法规定,劳动是人的物质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唯一来源,并宣布自治是劳动人民不可剥夺的、受到宪法保障的权利。但是,宪法有关社会经济制度的规定是妥协的产物:确认了支配积累的现状:扩大再生产和管理经济发展工作仍保留在社会政治共同体(地域共同体)的权限内。建立各级社会政治共同体作为社会地域组织的形式,其中实际上还保留着政权的因素,但也反映出自治的因素;这一规定尽管还有些不彻底,但已在理论上有了进步。宪法规定社会组织基本上分三级:企业、区和联邦;联邦议会全部五院的基本选举单位是区,尽管共和国的宪法地位不变;强调了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并以“非主体民族”的概念来代替少数民族这个称呼,而科索沃—梅托希亚自治区获得了自治省的地位。

国家的名称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改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宪法史上第一次规定了各社会政治组织在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它们是:共产主义者联盟、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工会联合会以及其他组织。根据宪法,社会主义联盟具有“劳动人民自治最广泛的政治支柱和形式”的性质。

联邦议会的新的结构反映了宪法关于联邦议会是“社会管理机关”的思想。联邦议会设五院:联邦院(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民族院地位不变)、经济院、组织-政治院、社会-卫生院和文化-教育院。这种结构是根据卡德尔对南斯拉夫社会结构变化的分析而产生的。卡德尔的分析认为,革命的变革形成了“劳动人民”的范畴,因

为全体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处于同等地位,全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根据这种分析,应当保证各个劳动领域在议会中都有代表,而且在其他社会政治共同体的议会中也都采取同样的结构。

宪法把共和国总统的职务与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分开。共和国总统每四年选举一次,只能当选两任,但这个限制不适用于铁托这位历史人物。还设立了宪法法院、共和国副总统和联邦会议,选举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最杰出的领导人进入联邦会议。

实行轮换制和限制连选连任的原则是要使干部政策民主化,防止垄断政治职务和社会职务的现象并使这些职务非职业化,也就是要实行这样的原则:所有劳动者,根据他们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忠诚、担任社会职务的能力和知识,都有可能担任负责的社会职务。同时通过这些措施开辟社会领导机构成员年轻化的道路。

根据新宪法的规定,国防事务不仅属于中央国家机关(联邦)的权限,而且属于其他各级人民政权、劳动集体、所有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权限。宪法规定,劳动人民和公民是防御的主体,保卫国家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不仅仅是义务和荣誉。任何人都无权签署投降书和承认国家被占领。

5. 南共联盟国际合作的扩大和 为不结盟政策奠定基础

与共产主义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进行各种合作。非集团国家贝尔格莱德会议和不结盟政策。

世界上社会主义力量和社会进步力量的成长经历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这特别反映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革命的蓬勃发展中,结果在60年代初成立了一系列从多年的殖民主义压迫和依附下解放出来的新的独立国家。它们坚决表示对内要走自由和

独立的发展道路，对外执行独立的政策；其中相当一部分还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南斯拉夫从一开始就给与了这些民族解放革命以物质上和政治上真心诚意的支持，以后又与新解放国家发展了友好合作。

整个这个过程标志着关于在国家之间，同样也在共产党、社会党、工人党和其他进步运动之间需要建立平等关系的观点得到了有力的突破和确认。但是，这也遭到了强大的反抗，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新的矛盾和分化。这些矛盾特别尖锐地反映在对待南共联盟的态度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之间建立平等关系的斗争中，已经有十多年基本上是孤立的，它反对把斯大林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但是很快就证实了，在这些矛盾中反映出—个广泛得多和深刻得多的过程。

南共联盟七大后立即开始的对南共联盟纲领的批评变成了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政治宣传运动，在其中，中国共产党特别富有进攻性。在1960年11月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其他共产党也赞成这个运动。代表会议试图弥合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思想政治分歧，这种分歧从苏共二十大起就已经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召开会议的目的是制定对世界上所有共产党都有约束力的新的统一的“总路线”。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是，为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条件、道路和代表者十分复杂和多种多样，在这种变化了的历史环境下，想在对立的观点和趋势妥协的基础上制定统一政治战略的尝试，就其实际结果来看是不成功的。会议真的通过了一个想成为新的“政治总路线”的《声明》，但是在这个指望反映当代社会发展的文件中也表现出官僚教条主义的观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待南共联盟的态度。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一的共产党，但在会议的主要文件中，南共联盟被指责为所谓“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相对抗，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南斯拉夫脱离“社会主

义阵营”。与1948年情报局的决议一样，声明表示担心南斯拉夫人民的革命成果将会由于依赖“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助”而有失去的危险。南斯拉夫被指责为进行“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破坏活动”，其非集团政策被指责为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根据这个精神，文件认为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义务。

1961年2月10日举行了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表达了对上述思想政治攻击的原则性反对意见。认为这是有关整个社会主义发展的看法问题，而不仅仅是对待南斯拉夫的态度问题。不能把仲裁者强加给工人运动，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都是不能接受的。会议认为，在不同观点和倾向妥协的基础上得出的“总路线”和在口头上证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磐石般团结”，将无法阻止现有的思想政治分歧的加深。会议认为，南共联盟没有把自己与共产党“隔开”，而是某些共产党对南共联盟这样做。对南斯拉夫进行攻击是企图通过外部压力把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不符合南斯拉夫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强加给它。但是，南共联盟没有理由改变自己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政策，它将力求进行全面的合作，支持一切加强和平和国际合作的行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曾深切地期望，在以后的时期里其他共产党也将十分有力地反对南共联盟现在反对的现象。

为了限制这种攻击的消极后果，当时曾决定把公开反应降到尽可能低的限度；但是，在会议以后，不仅在阿尔巴尼亚和中国，而且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中，反对南斯拉夫的运动变得更加猛烈了，于是决定公布韦利科·弗拉霍维奇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的报告《退一步》。

在对南斯拉夫采取敌对政策的活动中，阿尔巴尼亚表现得特别积极，它在斯大林死后最晚同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思维尔·霍查1961年2月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甚至指责南斯拉夫与美国第六舰队和希腊一起，似乎准备在阿尔巴尼

亚进行阴谋政变。为此,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61年4月发表了《关于1948~1961年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关系的白皮书》。

根据上述这种对南政策的精神,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不仅缩减保加利亚境内马其顿少数民族的民族权利,而且开始否定马其顿民族本身的存在,并通过这种方式以及其他方式否定整个马其顿民族的特性,把马其顿说成是一个充满保加利亚民族内容的“地理概念”。

但是,反南政治宣传运动是短命的,它表现了共产党中保守力量对非斯大林化,从而也对南共联盟的独立政策和自治发展的反抗。通过对南斯拉夫的攻击也反映出在东西关系恶化时期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利益的矛盾。

尽管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发展中存在阻力,非斯大林化仍然迎来了新高潮(1961年10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1962年10月由于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而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危机,此后开始了苏美紧张关系逐步缓和的过程。苏联恢复了与南斯拉夫的政治接触;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62年秋正式访南期间,再次确认1955年贝尔格莱德宣言的原则是南苏长期合作的基础。铁托于1962年12月访问了莫斯科;1963年8~9月,赫鲁晓夫访问了南斯拉夫。1962年12月,南共联盟代表团出席了意大利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1964年1月,意共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访问了南斯拉夫。之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再否定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性质。1964年交换了党的代表团。1963年1月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是1948年以后南共联盟第一次派代表团出席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后来也派代表团出席了1964年12月举行的南共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

尽管企图克服苏共与中共之间隐蔽的思想政治分歧,甚至不

惜在意识形态上作出妥协(就象1960年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在对待南斯拉夫的态度上所作的那样)来努力作到这一点,但在那次会议以后,这种分歧很快就发展成为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公开的意识形态争端和政治争端,成为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国家冲突。这场冲突也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大分化,从而使共产党相互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缘由。

南共联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的一些现象提出批评,是想促使社会主义的真正人道主义价值得到确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外交行动和方针的原则性,使得同某些党的关系中暂时出现的矛盾和误解易于消除,并不断扩大和加深平等合作。

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一系列西欧共产党(意大利、法国、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共产党)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双边合作。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以及与其他社会主义运动和进步运动的多次双边会见中,它们都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关于工人运动内部关系的观点发生兴趣。这些观点的内容已被载入许多党际文件中(与意大利、罗马尼亚、苏联等共产党共同发表的文件)。

南共联盟通过社会主义联盟(也有一部分是直接地)与西欧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发展合作。除了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社会主义联盟与新解放国家的进步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共同合作之外,还与欧洲以外的国家(巴西、智利、印度、摩洛哥、斯里兰卡、加拿大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建立了合作关系。60年代初,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已经与新解放国家45个以上的进步政党和运动进行合作。1960年4月,有35个国家的41个党、运动和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其他社会政治组织,对各国人民争取经济上完全解放、争取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争取各国之间(不管其面积大小、人口多少、社会和政治制度如何)进

行平等民主合作的斗争,给予了政治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援助。

南斯拉夫坚决维护自己独立的对外政策和在自治基础上自主的社会发展,并在与非集团国家的更紧密的联系中证实了自己的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南斯拉夫主张的国际关系指导思想反映了已成为时代特征的民族解放的历史过程,这些指导思想的价值使南斯拉夫在世界上的威望和影响大大超过它的面积、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积极和平共处的思想在许多国际会晤中,尤其是在铁托总统与新解放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中,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并载入了许多国际文件。南斯拉夫奉行特别积极的对外政策,并已成为实现这种对外政策的倡议和要求接受共处政策的国家紧密联系的倡议的发起国。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南斯拉夫的这种活动。有人企图把南斯拉夫描绘成存有建立“第三集团”的野心。恰恰相反,南斯拉夫与新解放国家建立紧密联系,是出于克服世界集团分割的愿望。

在国际组织、特别是在联合国中,南斯拉夫为民族自决权而斗争,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愿望,同时倡议设立联合国援助不发达国家实施发展计划的专项基金。南斯拉夫主张加强联合国组织,主张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国际争端,指出必须缩小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在集团以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实行积极和平共处,导致了“非集团政策”的产生,后来称为不结盟政策。这些国家力求使共处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基础,从而与军事政治集团保持着距离。它们竭力阻止实力政策和“冷战”政策扩大到集团以外的国家,由此就产生了在国际关系中全面实行共处原则的政治纲领和活动。

1961年2~4月,在正式访问西非和北非一系列国家的过程中,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为召开一次非集团国家的广泛会议进行了具体活动。1961年6月在开罗举行的21国代表筹备会议上,明确规定了非集团国家地位的标准:在积极共处和不结盟原则的基础上奉行独立的政策;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不参加反映大国对抗的多边军

事联盟；不与某个大国结成双边军事联盟；不同意在本国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这些是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的先决条件。

1961年9月1~6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共有28个国家参加：10个亚洲国家、12个非洲国家、4个拉丁美洲国家和2个欧洲国家（8个没有参加集团的欧洲国家中的2个）。会议参加者在地域上的不平衡反映了当前集团影响和集团组织的地域布局。尽管如此，会议作为国际舞台上出现一种新的重要的和平力量，还是具有足够的代表性的：参加国的人口在8亿以上，他们生活在约3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24个解放运动、社会党和其他进步政党的代表列席了会议。会议全部工作的方向是：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确立协商的政策；为非集团国家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保卫和平、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各国自由发展而采取的共同行动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为把“建立在控制之上的旧制度转变为建立在各国人民合作之上的新制度”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非集团国家不要求建立新的集团，它们进行的爱好和平的国际活动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而扩大“不结盟”地区则是对付按集团划分整个世界和加剧“冷战”的方针的唯一可能的和必需的选择。

在60年代前半期，“非集团”国家的活动对于许多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的工作具有重要影响。它还促使大国改变对待和平共处政策的态度；“非集团”国家以自己的倡议和活动推动大国进行协商。当集团对抗开始让位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时，不结盟政策的作用和影响更加增长了。它也获得了世界上不执行这个政策的力量承认。不结盟政策也促进了集团内部纪律的减弱，这是与集团之间“冷战”的减弱同时出现的。

积极和平共处原则还载入了1963年制定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因此，该原则在南斯拉夫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具有宪法意义。宪法规定：各民族和国家不管其社会制度的差别如何，实行和平共处和积极合作，是世界和平和社会

进步的必要条件。还规定了宪法义务：南斯拉夫把自己的国际关系建立在下述原则基础上：尊重民族主权和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

积极和平共处政策在世界上被广泛地接受，以致成为作出如下评价（南斯拉夫也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的根据：过去作为非集团国家政策的通用标志的“不参与”这个术语本身已经过时，产生“不参与”政策的条件已发生变化，使这种政策有可能大大地扩展为争取和平和寻找解决国际争端的和平道路的普遍运动。积极的“不参与”已变为“积极的参与”执行联合国宪章的活动。

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铁托、纳赛尔和西·班达拉奈克的倡议，筹备并于1964年10月5～10日在开罗召开第二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参加国比贝尔格莱德会议要多，共57个，其中10个观察员。尽管在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下围绕不结盟政策的性质和真正需要出现了疑虑，同时在以后的几年里不结盟国家的政治活动有所削弱，但这一政策在当时已经成为“国际大家庭发展的现实的进步纲领”（铁托）。开罗会议的召开本身就证实了不结盟政策是国际关系中持久的历史趋势。

1964年12月南共联盟八大认为，不结盟已被确立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和平、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持久因素”。不结盟政策使各国有可能在共同利益和自由决定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合作，从而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成为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变化中的重要因素。代表大会指出了不结盟政策的社会意义及其“国际和国内方面”的进步性。不结盟政策的存在和作用首先是与世界上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相联系的，而不是与军事集团的存在相联系的。不结盟政策意味着民主和平等的国际关系，同时它也是一些国家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社会内部独立发展的因素。不结盟国家是当代世界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不是进步和社会主义的“后备军”。事实已经证明南斯拉夫对不结盟政策忠诚不渝，南斯拉夫同等地关心与不结盟国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及世界上其他进步民主力量加强联系。

第五章

社会主义自治的 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1964~1980年)

1. 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

南共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南共联盟四中全会(1966年)和共盟的改组。社会矛盾和社会动荡。南共联盟第九次代表大会。

60年代前半期,自治关系的发展日益与国家调节经济过程和集中的扩大再生产发生冲突。国家掌握绝大部分收入和国家对经济的其他干预形式(决定价格、支配绝大部分积累、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经济结构中比例失调加剧,一系列经济部门粗放经营和依靠补贴,错误的投资决策,自给自足倾向和对待国际分工的关门主义倾向——所有这一切都使加强直接生产者社会作用的政治行动变得软弱无力。于是尖锐地提出了建立这样的经济体制的要求,这种体制能够进行集约化的经营,把投资限制在现有资金的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生产现代化,参加国际分工和进入世界市场。由于国家迅速工业化,经济发展达到的水平已经使参加国际分工成为客观需要,但是在与世界经济进行更广泛的经济

联系的初步尝试中就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国际收支平衡中赤字的增长表明,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加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明显地低于世界水平,以致不得不为奖励和刺激出口而设立数额越来越大的国家特别基金;主要按行政方式形成的本国价格水平大大脱离了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水平,以致经济行业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别扩大;以能源、农产品和基础工业产品为一方,以加工工业产品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价格不平衡尤为突出。这些情况助长了国家主义倾向并把自治的范围主要限制在简单再生产的领域,还加深了人们的犹豫:是保留国家在经济管理中原有的作用,还是在经济体制中进行根本改革,使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能够更自由地发挥作用,创造稳定的经营条件,并把积累资金交给经济部门。由此决定的在发展方向上的政策分歧变成了围绕市场的自由化、经济的非国家主义化、资金的集中化还是非集中化、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关系的民主化等问题的争论和冲突。关于经济非国家主义化的观点遭到了认为需要继续由国家机关直接指导经济发展的观点的反对。

1964年12月7~13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南共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加快社会经济关系非国家主义化的过程,并使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能根据社会自治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发展,加强自治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单位中的直接自治。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必须“加强劳动组织的物质基础”,要求集体“自己决定自己劳动的条件和资金,从而决定合理支配自己劳动的成果”,要求“使市场更自由地发挥作用,更快地放弃行政调节价格”,要求建立这样的计划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直接生产者决定扩大再生产”,联邦、共和国和地方社会政治共同体的职能在于“为经济更协调地发展创造一般条件,而越来越少地通过直接支配资金的途径来实施职能”。铁托主张本着上述精神“进一步改革社会经济体制”,他在报告中强调,“不管工人的觉悟、意志、知识和能力如何,他们要求尽可能合理地进行管理的直接物质利益,包括要求分工、生产专业化、协

作和其他形式的联合和一体化的直接物质利益,永远不能依靠生产之外或生产之上的政治因素而得到发展。另一方面,直接生产者的这种地位是生产与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相联系的最好基础。”

在代表大会上,战后第一次结合发展自治的斗争而较详细地研究了民族间的关系。铁托强调,代表大会应当充分关心这个问题,但不是因为民族问题是一个原则上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因为南斯拉夫人民还在人民解放战争过程中,就以最民主的方式协商一致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是为了进一步发展这些关系和解决其中出现的矛盾。他认为,民族间关系的矛盾的根源在于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和各民族文化程度的不同。国家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阻碍了一体化过程,同时造成了民族主义的畸形发展,后者一方面产生了官僚主义集中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产生了“在自己的领域内”闭关自守的倾向(同样是在国家主义的基础上)。民族间关系的矛盾是由于对文化教育在各民族接近过程中的作用的错误观点产生的,这种观点否定在各民族的文化创作中存在民族特点。铁托提醒说,甚至有这样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民族已经过时,应该消亡;他们把民族团结同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民族混为一谈,这种做法“有点类似民族同化和官僚集中制、一元主义和霸权主义”。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在经济发展、文化、艺术、尤其是在历史学里,民族主义现象不时出现。他的结论是,官僚集中制的和官僚本位主义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危险性和反革命性决不比传统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小。因此,反对民族主义现象是共产主义者联盟最重要的基本任务之一,在这方面应该遵循列宁的教导,“如果每个人都首先面向自己的地区”,那末这场斗争将是最有效的。

铁托主张民族间的关系应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在经济关系领域,要缩小运用行政方法进行调节的范围,也就是消除国家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文化教育领域,要肃清主张一元主义和千篇一律的官僚主义倾向或在“自己的”领域内即在共和国范围

内闭关自守的官僚主义倾向，为每个民族文化创作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和思想方向而斗争，为加强和丰富南斯拉夫统一的教育制度而斗争。铁托特别强调，全体劳动人民，不论民族成分和民族大小，都具有同等地位和同等待遇，因此，少数民族的成员也享有全部民族权利，而自治制度的发展为实现这些民族权利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卡德尔强调，在南斯拉夫这样的多民族大家庭中，各共和国的经济结构有很大差别，因此经济平等的问题也是经济自主的问题即民族自治的问题，是逐步克服在各民族生活的物质基础发展水平方面的实质性差别的问题。他强调，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民族经济自主”“既不是国家主义的行政范畴，也不是自给自足、民族利己主义的权利，而是劳动人民自治的特殊形式”。因此，在民族间的关系中，应该实行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同一原则，这样，每个民族都有权利和现实的可能根据自己的劳动成果和生产力的发展去生活和发展。卡德尔强调，经济区域和市场的统一，无疑是民族间关系的进步现象，它要求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各族人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担负起十分明确的相互义务”。这种长期的相互义务之一，是加速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的发展，这也是“对社会制度具有原则意义的联邦长期职能”。他主张通过把扩大再生产资金转交给自治领域的途径，克服国家主义和官僚主义集中化以及扩大再生产资金的“地区化”，从而促进经济发展领域民族间一体化的过程。在这方面共产主义者有两项任务：他们应该成为民族间相互接近思想的体现者，同时成为这种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基础的保卫者，为反对可能导致南斯拉夫民族不平等和破坏团结的民族狭隘性而斗争。

韦利科·弗拉霍维奇也指出了国家主义、官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认为革命胜利后民族间的差别将很快消失的观点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他批评了那种认为必须“通过加速经济和文化一体化来摆脱共和国主义”的观点。

代表大会的决议否定了必须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民族的想法,认为这种想法是官僚集中主义和一元主义的表现。同时要求坚决消灭和清除民族间的一体化过程和“自己的”共和国范围内闭关自守的企图。决议认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间关系是基本任务。在这方面,特别强调了加速不发达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经济发展的意义。决议表示,共产主义者联盟将开展广泛的思想教育活动,以进一步加强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兄弟友谊和团结统一,加强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意识和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

大会讨论了在自治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作用。在会前讨论中和在大会上都特别强调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民主化大大落后于社会的民主发展。大会认为,在共产主义者“干预和不干预”其他机构和组织的工作方面,不应该存在疑虑。大会通过的方针是: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和组织“对每一个社会问题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里都不存在不能提到共产主义者联盟日程上来的社会问题,但是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和组织的结论和立场,并不对其他组织和自治机构产生自动的约束力,而是在这些组织中活动的共盟盟员的指导方针,他们应该在自己单位里依靠论据来努力贯彻党的政策。有人认为,在自治条件下共产主义者联盟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已经过时了,应该确认“少数原则”和允许宗派存在。代表大会驳斥了上述观点,但同时强调,应该发扬民主气氛和开展思想斗争,使每个人或一组人的任何进步主张和倡议都能够成为讨论的对象,然后成为多数人的主张。大会特别强调了工作公开性的原则。尽管共盟在盟员数量方面已经越来越群众化,但它仍保持干部党的重要特点。代表大会坚持共盟的阶级性质,否定了下述观点:不需要特别重视吸收直接生产者入党,因为“人人都靠收入生活”,所以对他们应该适用同样的标准。大会批评了严厉处分工人的现象:在1958~1963年被开除的97610名共盟盟员中,48.3%是工人,21.3%是职员。同时,还提醒注意“组织老化”的过程已经开始。在共产主义者联盟中,25

岁以下的青年人的比重从1958年的23.6%降为1964年的13.6%。

为了推动共产主义者联盟中民主关系的发展,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章程。扩大了区共盟组织在选择组织形式和活动形式方面的自主权。更明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共盟的自主权,规定今后在南共联盟代表大会之前,先召开共和国组织的代表大会,而各中央委员会应当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公布会上将要讨论的问题的提纲。章程中重要的新内容是,规定在每次选举中至少需要更换1/4的领导成员。其实在1963年的选举中,区委员会新当选的委员已占40%,而县委员会新当选的委员已占42%。这一情况促进了委员会和各级组织工作的民主化。在章程中还有关于限制各级委员会及其辅助机关、监察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的领导职务连选连任的规定。总的来说,代表大会表达了深入发展社会主义自治的愿望,并把共产主义联盟中关系的民主化看作社会民主发展的前提。

代表大会选举了155名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在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为南共联盟总书记,选举爱德华·卡德尔、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和韦利科·弗拉霍维奇为中央委员会书记。选入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有: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弗拉迪米尔·巴卡里奇、克尔斯特·茨尔文科夫斯基、伊万·戈什尼亚克、布拉若·约万诺维奇、爱德华·卡德尔、拉扎尔·科利舍夫斯基、博里斯·克拉伊盖尔、米哈·马林科、茨维耶廷·米亚托维奇、乔科·帕伊科维奇、久罗·普察尔、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彼得·斯坦鲍利奇、米卡·什皮利亚克、米亚尔科·托多罗维奇、约万·韦塞利诺夫、韦利科·弗拉霍维奇和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

根据南共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社会经济关系进行了重大改革,以便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及其联合组织,而不是国家,成为扩大再生产过程的承担者。取消了国家投资基金——包括联邦、共和国和地方的投资基金,“国家资本”转交给联邦、共和国和区的银行。取消了基本经济部门收入的上缴款项,以后几年又把

这一办法扩大到了整个经济中；为了推动合理经营，简化了上缴款项和税收体制（包括经营基金和个人收入的上缴款项）。规定了这样的经济原则：每一个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公民都承担社会服务事业的费用，例如卫生、教育、文化和管理的费用。联邦只是作为例外向那些收入不能满足最低需要的共和国增拨资金。设立了加速发展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联邦基金。

根据南共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方针和决议的精神，在1965年7月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这些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的方向是：在社会所有制和工人自治的基础上，为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更自由地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改革的目的是：放弃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转向合理的和现代化的劳动组织和经营组织；消灭经济结构内部的比例失调，更多地生产能源、粮食和原料；反对自给自足倾向，更广泛地参加国际分工；调整本国的价格水平，使之与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水平相适应；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把各种消费都纳入现有收入的范围，争取把第纳尔变为可兑换的货币。

使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有利于经济部门（特别是基础产品生产），使经济组织掌握的社会净产值的比重从1963年的44.8%增加到1964年的52%。进行了第纳尔贬值，对本国产品减少了关税保护，决定实行现实汇率的政策，以刺激合理经营和有效地参加国际分工；减少贷款和货币发行总额，从而限制投资；提高了许多种产品价格和运输价格，以便与世界价格相一致；减少或限制了预算开支和所谓非经济费用，减少经济部门的捐税和某些其他义务；大大减少了优惠、补助和奖励；建议个人收入的增长不得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力求发挥生产者的创造主动性，加速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的一体化过程，实现宪法关于区的设想，放弃国家主义的经济管理方法。因此，这些改革具有社会改革的意义。根据这个精神，1966年初，制定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计划规定到1970年，社会净产值的再分配将使经济部门占有约70%。

经济改革初步措施的实行,创造了崭新的经营条件。市场经济的准则迫使经济组织改进劳动组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改善自己的实际地位。劳动态度改变了,对经营成果的责任心加强了,在提高生产效益、采用新工艺和改善就业人员技术结构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鉴于就业人员的数量没有增加,在1964~1968年时期,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8%,如果考虑到劳动时间缩短为每周42小时,劳动生产率的实际提高还要多。也开始了经济结构改革的过程:造船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造纸工业、电力工业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造船工业的实际产量甚至增长一倍)。农业中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日益接近于世界上最高水平(1964~1968年时期,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每公顷约增加5~7公担,而玉米每公顷约增加4~9公担)。个体农户的拖拉机数急剧增加(1960年约0.5万台,1966年增加到约1.2万台)。稳定了价格、生活费用和本国货币的价值,因此,在某些西欧国家的银行中开始按官方牌价自由兑换第纳尔。个人纯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64年的33%增加到1967年的40%左右,积累和各种基金的比重大大下降。

但是,这次向市场-计划经济的转变遇到了重大的困难和阻力。由于放弃了已成惯例的、主要靠不断增加货币量来进行的扩大再生产过程,由于进口商品的直接竞争和一般经营条件的日益困难,大部分工业部门的生产开始停滞,投资的增长速度也下降了。在此之前的四年时间里,投资增长了114%,工业生产增长了54%,而在1964~1968年,投资只增长28%,工业生产只增长18%。在有些年份里,农业生产的增长率下降得更多。这个时期社会产值的年增长率降为2.9%。在这以前南斯拉夫经济部门的出口很少,而在南斯拉夫实行开放时,正好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限制外国商品进入它们的市场,这一情况更增加了困难。

同时,实行经济改革的阻力增加了。一方面,这些阻力出现在过去经营地位和收入都较好的经济部门中,因为它们在本国市场上受到保护,不受世界价格的影响。另一方面,阻力来自那些习惯

于用行政措施调节经济过程的政治力量。

改革初期价格的普遍上涨立即引起了生活费用的显著增加(1965年下半年增加35%)和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种差距是由于就业人员所在单位的物质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银行、保险公司和电力部门的个人收入比物质生产部门、服务部门和交通部门的个人收入多得多,后面这些部门的个人收入必须与劳动成果直接挂钩。在困难的经营条件的压力下,许多劳动集体停止了粗放式的招工,接着开始减少就业人数。过去粗放式地招工,而现在力求在经济上更合理地经营,这就使失业人数增加。从1952年以来就业人数第一次减少。1962~1964年,就业人数约增加56.6万人,1964~1967年,就业人数约减少4.7万人,1967年的就业人数比1964年减少1%,其中,在公有经济成分中的就业人数减少3%,而在私有经济成分中增加42%。越来越多的受过学校教育的人难以找到工作:在1965~1967年,从八年制小学毕业716400名学生,从中学毕业376200名学生,从大学和大专毕业85900名学生。这是战后就业的可能性最小,而毕业学生人数最多的时期。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主要是农民到西欧国家去工作(1968年年中达到40万人),因为在那里可以挣到多得多的工资。这只是使失业引起的政治问题的严重性得到部分缓解。旧型经济领导人的习气不能适应市场经营的要求。而市场经营引起人们对企业倒闭和经营亏损的恐惧。在已经出现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困难的压力下,开始恢复以前采用的经济政策措施。

尽管出现了困难,在1966年2月26~27日和3月11日举行的南共联盟中央全会上,坚持实行经济改革。铁托指出,在对待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态度上,共盟盟员和一部分领导中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在共盟的上层领导中,有些人消极,或在行动上违背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他指出,在领导中存在着一个政治派别,它竭力封锁党的领导机构和代表机构的决定,散布对自治、社会关系民主化和非国家主义化的不信任。在1966年6月7~10日举行了南斯拉

央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是该组织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因为当时通过的章程取消了代表大会,改为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的联邦代表会议),会上预示着要对官僚教条主义势力进行政治清算。在1966年6月16日的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国家保安部门的状况。1966年7月1日在布里俄尼岛举行的南共联盟八届四中全会上,讨论了该委员会的报告。铁托在开幕词中着重指出,在1962年3月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应该提出这个问题,由于中央委员会非常信任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因此从来没有讨论过国家保安部门的问题,致使这个部门长期处于党和代表机构的监督之外,逐步成为反对贯彻南共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政治力量。铁托认为,这是涉及争权的宗派斗争。

中央委员会认为,国家保安部门的某些领导人滥用职权,在这个部门中树立一种忠于某些个人、而不是忠于社会主义和南共联盟宗旨的风气。国家保安部门通过自己在各劳动组织甚至在共盟中的广泛的合作者网,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监督。该部门的领导人力图建立起对整个社会的监督——从劳动集体到全国的最高政治领导;监视党政领导人,甚至包括铁托在内。他们对某个人的评语,常常在执行干部政策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机构还制造民族不和;1966年8月举行的塞尔维亚共盟中央第六次会议指出,国家保安部门的某些机关“特别对阿尔巴尼亚族实行歧视和违法乱纪”。南共联盟中央全会决定,改组国家保安部门,把它置于代表机构的政治监督之下,并同意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辞去中央委员和共和国副总统的职务。

为了消除在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中也在滋长的官僚主义倾向和等级关系,中央委员会决定使干部政策民主化,彻底实行轮换制原则和限制领导人再次当选,防止把若干职务集中在一人身上。同时,还决定发动全党讨论南共联盟进一步发展的问題。

清算南共联盟领导中的一元主义和集中主义核心,对于南斯

拉夫社会自治的发展和民主化过程是新的推动。南共联盟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展的讨论表明,共产主义者联盟不能完全适应社会按照社会主义自治的设想进行的改革,它的工作方式仍然过多地照搬社会主义发展开始阶段的实践。许多共产主义者不明白在共盟不能进行“指挥”但又要对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负责的情况下该怎样行动。在1966年10月4日举行的南共联盟中央全会上,通过了改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提纲。提纲强调,共产主义者联盟应该研究社会上的基本问题,对劳动人民和自治机构所作决定的社会主义内容负责;但是,党委员会不应该成为作出决定的指挥部,而应该是提出思想和政治倡议的中心,是理论战线创见的策源地。会议决定,成立南共联盟主席团、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各工作委员会,设立南共联盟主席的职务。确定了执行委员会委员只能担任党的职务的原则。作为中央委员会常设机构的各工作委员会,除有中央委员参加外,还吸收其他党员——科学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各共和国共盟中央委员会和自治省委员会也进行了类似的改组。选举了35名主席团委员和11名执行委员会委员,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当选为南共联盟主席,米亚尔科·托多罗维奇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

在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就南共联盟的改组、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以及解决客观社会矛盾的民主方法等问题,展开了最广泛的讨论。卡德尔在斯洛文尼亚共盟中央委员会的讨论中指出,“几乎所有的政治改革的进行都伴随着类似政变的重大的政治动荡”。他主张共产主义者联盟要保证以民主方式来改变政策和人,使社会和个人免遭这种动荡。尽管存在着阻力(这种阻力表现为要求用老一套的行政官僚主义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以及要求恢复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但是在社会中,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出现了强有力的民主倾向。在讨论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改组中有人认为,应该放弃按生产部门和地域建立的原则,而使共产主义者联盟完全按地域原则建立,使它朝着群众性政治组织的方向发展。这

种意见被否定了。铁托指出,共产主义者联盟组织和领导的新的工作方式不应该危及它的统一和行动能力,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关系的民主化不应该把它变为“争论不休的俱乐部”。

1967年7月1日举行南共联盟中央全会,会议决定改变党的组织方式和形式。在劳动组织中和按地域都建立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会议,同样,在区组织范围内也建立代表会议,由选出的代表组成,任期两年。干部政策的执行也进行了改革。过去,领导干部的选举受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即它的组织政治书记处的决定性的影响,在全会后,主要由共和国和自治省决定干部。共产主义者联盟中的选举方式也民主化了。在1968年党的选举中,在基层组织和在区代表会议中,对从区到联邦的最负责干部的候选人进行了讨论;比较彻底地实行了领导干部轮换制的原则和大大改变了领导的组成。根据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章程,共和国代表大会和自治省代表会议第一次在南共联盟代表大会之前举行(1968年),在这些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根据对等原则选出了进入南共联盟机构的代表,并在南共联盟九大上得到认可。在某些区组织甚至共和国组织中,更换了全部党的领导干部,从而使政治活动的连续性发生问题,但这些在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实践中得到承认的新人也给工作带来了新气象。

在这些过程中,人们普遍认识了国防事务社会化和建立全民防御体系的可能性。劳动人民的自治权也扩大到国防事务中,因为铁托说:“如果劳动者在国防领域里没有自治权,就不可能设想实现劳动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自治权”。这样就加强了国防体系的阶级实质:除保卫国家独立和革命成果的传统作用外,国防体系正在成为加强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的因素;共和国和自治省也已成为防御主体。

在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共盟组织中,南共联盟中央派驻南人民军的全权代表机构领导人的职务与国防部长的职务分开。在各级领导机构和指挥部中,都取消了全权代表机构和委员会,代之以共

盟代表会议，其代表应能包括军队的全体人员，从战士到高级首长。1969年建立了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南共联盟代表会议作为军队中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与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直接联系，以代替过去的南共联盟中央全权代表机构。还实行这样的作法：选举一定数量的南斯拉夫人民军以外的党领导人参加共盟军队代表会议，这些领导人从南共联盟中央机构或共和国机构中选出。这些变化强调了共盟领导机构和指挥管理机构分开，党组织和领导机构生活和工作的民主化，与南斯拉夫人民军以外的共盟组织加强联系。

从粗放的和自给自足的经营转变为集约化经营和参加国际分工，不仅是客观经济需要，而且是社会目标之一，这促进了经济一体化过程和在生产与流通中建立大型工艺体系。

但是，在经济体制的某些领域里（计划体制、扩大再生产体制、外贸体制、价格体制和税收体制）没有进行改革，没有采取能够同时保证扩大自治的物质基础的经济政策措施。1967年取消了有利于生产组织的资金再分配；过去国家基金的资金不是转交给经济组织，而是转交给银行，那时，由经济组织的工人来管理这些资金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银行和其他金融资金掌握者在分配扩大再生产资金方面代替了国家。银行、批发商、外贸组织的经济力量急剧增长，在那里集中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本。全国所有生产组织的投资资金1961年占29.5%，1966年占39.4%，而1971年占26.8%，银行资金1961年只占0.9%，而1971年占到50.9%，国家所占的比例则从1961年的61.7%减为1971年的15.2%。这些材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所有者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由于生产组织没有组成联合会，相互联系不够，因此在六十年代末受到“金融资本”的压力，后者阻碍了直接生产者社会力量的增长，降低了直接生产者利用国家被排挤出经济领域这一新的机会来发展自治的能力。经济改革逐渐丧失了活力。

南斯拉夫从贫穷的、不发达的小农国家，已经成为中等发达的工业农业国，人口的需要不断增长，结果是个人消费、共同消费

和一般消费之间形成了新的比例结构。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新的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开始进入社会生活。随着高等学校的发展,科学研究工作也发展了,在较大的城市甚至在一些较大的劳动组织中建立了许多科学研究所,设立了科学研究中心,它们大部分研究生产和产品销售的实际问题。除在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和卢布尔雅那已存在的科学艺术院外,在其他共和国和自治省也建立了科学艺术院。由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主编的《南斯拉夫百科全书》第一版已经完成。

在自然科学、医学和技术科学发展的同时,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科学都有了巨大的进步。这些科学的发展部分地是由于与斯大林主义(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作斗争而取得的。经常创造性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可以使社会和文化发展得更为迅速和更为顺利,从这个信念出发,南斯拉夫社会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向世界开放。在与斯大林教条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决裂后,在文学、舞台艺术、美术、音乐和电影中受到了各种美学流派的影响。传统文化被新文化所代替,或者受到与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唱片有关的技术发展的影响,出版企业实行了专业化并刊登了广告。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数量上是令人鼓舞的,但在评选真正有价值的文化成果方面也出现了分歧。体育运动有了重大发展。

但是,文化领域也存在着矛盾。共产主义者联盟为消除国家在文化领域的决定性作用而斗争,但没有能找到根据党的科学和艺术创作自由的纲领性方针用相应的自治方式解决行政预算拨款关系的难题。当时放弃了在科学和文化领域里的仲裁作用,但是,保留旧的社会经济关系使一些文化机构中很容易产生垄断主义的新形式,并与社会机构发生冲突。在这个领域里国家调节的最有力的因素是文化活动经费的获得方式,因为,社会政治共同体(区和共和国)决定着社会活动经费的提取数额,这方面资金的形成和

分配仍然不是由生产者 and 他们的联合会来决定的。

在政治生活日益迅速民主化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使得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尖锐化了,几乎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里过去隐藏的内部矛盾都公开表现了出来。共和国和区的政治决策民主化了,社会政治组织也积极提出倡议并相对独立地活动。实行经济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改革的不彻底性使问题成堆并造成了社会中冲突的局势,特别是在1968年。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迟缓,出现了公开的抗议以至停工。特别引起不满的是:劳动组织在新的投资掌握者和投资决策者面前所处的地位,失业急剧增加和不是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差别的扩大。就业的巨大困难(特别是青年)必然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尽管在这方面采取了措施,如通过了必须招收学徒工的法令,修改了就业的组织和拨款制度,从而减缓了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但没有能阻止严重的政治后果的产生。数十万工人成批到国外临时工作,在最初几年是自发的过程,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但这缓和了国内紧张的经济和政治形势。

出现了各种政治倾向。一部分哲学家开始与南共联盟的政策唱对台戏。他们主要聚集在萨格勒布的《实践》、贝尔格莱德的《哲学》、卢布尔雅那的《前景》杂志周围,他们在哲学上对斯大林主义进行彻底批判中总的说来曾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1960年南斯拉夫哲学家布莱德会议以后。这些集团的主要人物表面上以马克思的“批评现存的一切”的主张为幌子,不仅批评社会主义自治的缺点,而且批评其实质。他们认为,在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力量已经耗尽,必须在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外,尤其是从青年队伍中发掘新的力量,首先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把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民主集中制当作所谓斯大林主义遗产加以摒弃。他们认为,只有共产主义者联盟中能兼容并蓄各种思想政治派别和关于社会实践和发展问题的不同意见,这个组织才能实现民主化。这批人没有能在共产主义者联盟中产生较大的

影响,但在一部分青年学生中引起了思想政治混乱,给学生带来了对立的政治动荡。

1968年6月发生了学生游行——在贝尔格莱德的人数最多。这些游行的爆发也受到1968年春世界上、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声势浩大的学生骚动的影响。学生的抗议表达了对国内经济状况和社会矛盾的不满,对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来解决成堆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制止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纲领的现象的不满。尽管南斯拉夫的各种敌人和自治的反对者竭力想利用学生的不满来挑起更大的冲突和否定南共联盟的政治方针,但共盟领导认为学生游行是自发的反抗,它实质上表达了积极的社会主义倾向。

由于对社会问题、失业、经济困难、各种压力、公众的尖锐批评和对立的政治倾向(它们也表现于贯彻一致通过的经济改革措施时领导人之间行动的不一致)感到担忧,1968年6月,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的《方针》,它提出了消除危机状态根源的政治行动纲领;支持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直接民主的要求和建议,支持学生和青年一代要求建立人道的和民主的关系的正当愿望,支持更有效地解决学生和青年的问题以及大学和教育制度问题的要求;但是否定了使用政治压力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会影响南斯拉夫社会自治和民主的发展。在7月10~11日举行的社会主义联盟联邦代表会议上认为,社会冲突使多党制倾向得到复活和加强,因为许多社会矛盾不在社会主义联盟内部反映出来,因此,必须在该组织中发展能使社会各阶层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利益的活动方式和工作内容。

1968年11月27日,即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和“阿尔巴尼亚旗帜日”前夕,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一些地方(普里什蒂纳、乌罗舍瓦茨、格尼拉奈和波杜耶沃)以及马其顿西部,发生了有组织的反对南斯拉夫统一和完整的阿尔巴尼亚民族统一主义和沙文主义游行,主要是阿尔巴尼亚族大、中学生参加,他们要求有自己的宪法、建立“科索沃共和国”和分离出去。

共产主义者联盟中的动摇还涉及到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基本方针,特别是对商品生产规律的态度。有人认为,业务机构作用的增长和提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途径;南斯拉夫境内专家起支配作用的巨大的生产和流通体系将克服“政治官僚的保守主义”和发展现代生产,从而是经济顺利发展的根本前提(“经济进步的火车头”)。另一方面有人对这种方针开展了批评,认为这种方针存在着建立“异化资本”和异化社会力量的强大中心的危险,这些力量将反对社会主义自治,破坏民族平等。要求在保证共和国和自治省发挥更大作用的基础上改组南斯拉夫的呼声日益强烈;指望通过这一途径来结束共和国之间的争端和紧张关系(它们表现在联邦和共和国国家机关的关系中),增强共和国对社会发展的责任,为“遭到国家垄断窒息”的自治开辟新的场所。早在1965年,爱德华·卡德尔就指出,国家一元主义集中制倾向正在增长,这种倾向(特别是在开创新南斯拉夫的干部离开历史舞台以后)将对国家统一造成严重危险;他认为,如果能保证南斯拉夫各民族社会主义大家庭比那时更加巩固,这将是革命的一代人的最大的成绩。1967年和1968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在联邦议会中重新设立民族院,限制了联邦参与投资拨款的权利;大大增强了自治省作为联邦组成部分的平等地位。

1969年3月11~15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南共联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共有1297名代表(其中90.1%的代表第一次出席党的代表大会),代表着1146084名南共联盟盟员。大会的决议带有上述思想政治分歧的烙印。但是,在代表大会上还是有力地批评了社会上和共盟中的教条主义、保守主义和官僚国家主义意识和实践,坚持加速社会民主化的过程。代表大会要求继续进行斗争,使联合生产者在社会再生产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取消联邦和其他社会政治共同体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固定的资金来源,也就是逐步把业务银行中的“国家资本”变为联合劳动资金,联合劳动的利益必须成为整个政治制度的决定性动力。计划工作的基本承担者应该是联

合劳动自治组织及其联合体,在制定计划的同时发展商品生产被认为是“合理的社会再生产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和发展自治及社会主义直接民主的客观前提”,而收入是经营的动机和作出投资决策和其他经济决策的根据,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经济准则。经济发展的前景与更直接地依靠科学相联系,科学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要在自治和收入的基础上建立大型的工艺技术系统。大会决议指出,通过自行组织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方式实现最广泛的一体化联系和建立经济力量强大的大型联合劳动组织是所有社会因素的长期任务。要求创造尽可能平等的一般经营条件作为加速发展自治的重要前提,同时它应当保证各民族的权利,即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人民的权利,使他们能在统一的南斯拉夫市场内处理自己的劳动成果。代表大会规定了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基本目标,即今后时期的任务,就是“在一体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同时进行相应的经济结构改革。鉴于必须更坚决地与各种形式的自给自足思想和不相信技术工艺革命意义的思想决裂,要求实现“思想革命化”。代表大会强调,必须在各民族平等和社会政治共同体非国家主义化的基础上,发展民族间联系的新形式。代表大会要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对大国一元主义倾向、民族本位主义、孤立主义和分裂主义进行彻底清算,并且深信,“如果每个人在本民族范围内,尤其是每个共产主义者在本组织范围内”进行清算,这场斗争就将卓有成效。同样还强调,由于原则性的理由,共产主义者联盟坚决反对任何公开地或隐蔽地“把民族平等问题作为建立他们的单独国家或建立他们的共和国问题提出来的倾向”。党员必须进行斗争,使政治决策民主化能够保证更高的效率和加强个人和集体的政治责任,并广泛运用撤职和辞职的措施。

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南共联盟章程,章程用新方式规定了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生活、组织和活动的民主集中制,并使之不能流于形式。章程大大加强了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组织的作用,强调了它们在统一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范围内的平等地位、自

主和责任。批准了对共盟组织方式和组织形式的补充修改；在自治劳动组织、地方共同体、南斯拉夫人民军各基层部队（机关）、在区（市）、共和国和自治省，设立共产主义联盟代表会议，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会议（其中有一部分是常任代表），每年至少开会一次。撤销了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设立南共联盟主席团，作为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南共联盟机构，由每个共和国选派同等数量的成员、每个自治省选派相应数量的成员组成，这些成员由共和国共盟代表大会选举，南共联盟代表大会仅仅认可这些选举。同时，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主席是南共联盟主席团的当然委员。确定了南共联盟主席的职权，他领导主席团的工作。鉴于世界政治形势和“需要有力地克服各种偏向和稳固地领导国内发展”，铁托在代表大会开始时，就建议成立南共联盟能够保证组织统一的有威望的领导。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由15人组成的执行局（每个共和国2人，每个自治省1人），作为南共联盟主席团的执行机构。在代表大会上批准了南共联盟代表会议70名常任代表和南共联盟主席团45名委员（每个共和国6名、每个自治省3名、南人民军3名），选举了南共联盟章程问题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强调了南共联盟机关的集体工作制。执行局的工作由执行局委员轮流进行领导，每两个月轮换一次，撤销了主席团书记即执行局书记的职务。

2. 关于联邦制的宪法改革和南共联盟 在思想和政治上的统一

自治和国家主义之间冲突的加剧，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运行中的不稳定性。1971年宪法修正案。对南共联盟中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派别的清算。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新宪法和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

南共联盟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自治与国家主义的强大压力

(技术统治主义力量 and 一元主义集中制倾向,以及共和国和更低一级的国家主义)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了。在社会再生产的资金和职能发生异化和各种经济力量中心(银行、保险公司、大型商业组织)日益独立的基础上,技术统治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压力加强了。经济中技术统治主义力量增长了,它们掌握了社会资金的管理权。党的一些领导人与“上层”管理者相结合,组成了社会政治共同体(区、共和国、自治省)和劳动集体中的“技术官僚结构”。工人被排挤出自治机关或者在自治机关的工作中只起消极的“表决机器”的作用,因为他们很难弄清众多的法规条例,也很难看懂生产组织者和专业服务机构为他们准备的作为自治决策基础的许多复杂的专业分析。建立集团所有制关系的倾向威胁着社会所有制。以停工形式出现的自发抗议增加了,其原因是破坏规章、经理专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坏、劳动组织的地位差和个人收入低。

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发生动荡,是因为解决迫切的社会经济体制问题进展缓慢,特别是因为它牵涉到需要改革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价格体制、外汇和外贸制度、银行和税收制度),牵涉到执行援助不发达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加速发展的政策。在改革后仍不完善的联邦制度中,协调相互关系遇到了日益增长的困难。联邦社会机关失掉了过去的力量,而协调共和国和自治省之间利益的新方式尚未找到。在共和国和自治省各自利益的冲突中,整体利益遭到忽视,这在社会生活普遍民主化的气氛下造成了共和国和自治省领导之间许多公开的误解和冲突。

共和国和自治省,尤其是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日益强烈地要求解决“体制问题”,这些要求变成了对“联邦行政机构”的各种形式的压力,以及共和国领导与联邦机构的对立。这特别尖锐地表现在1969年夏天的“公路事件”中,当时,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一部分政治领导人指责联邦执行委员会在分配国际筑路贷款中歧视该共和国。针对这个事件,1969年10月斯洛文尼亚共盟中

央委员会认为,这些现象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还没有掌握再生产过程,但中央委员会反对国家主义的对抗,并指出需要对联邦中的关系进行更深刻的改革。当时进行了反对民族主义、技术统治主义和国家主义势力的斗争,因为它们以民族利益来反对工人阶级利益,维护自治社会发展的自发性,贬低共盟在联合劳动中的作用,力求取消民主集中制,企图削弱斯洛文尼亚经济与南斯拉夫经济的联系。在1969年底和1970年初,克罗地亚共和国也对“联邦行政机构”、“异化的经济力量中心和金融力量中心”、“一元主义和官僚集中制”提出了尖锐批评,同时要求更彻底地改革联邦,特别是改革外汇制度,以便由赚取外汇资金的劳动组织支配外汇资金。1970年1月,克罗地亚共盟中央第十次会议认为,对自治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南斯拉夫的稳定来说,主要的政治危险是不断增长的一元主义,它不同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克罗地亚“虽然更咄咄逼人和喊得更响,但没有在增长”。这种估计没有得到克罗地亚绝大部分党员和群众的赞同,更没有得到南斯拉夫其他部分和南共联盟领导的赞同。由于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在这次会议上和会后表现出“有害的先锋主义”,由于他们强调克罗地亚共盟磐石般的团结和铁的纪律,而逃避自己对其他共和国和联邦的责任,他们受到了批评。对不赞成克罗地亚共盟领导这种政策的人(米洛什·让科)进行清算的方法也引起了不满。这些情况促使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的政治力量和政治趋势分道扬镳。

民族主义、无政府自由主义和教条主义深深地渗透到政治生活中,是社会经济关系发展中官僚国家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倾向的思想政治表现,它导致社会所有制的分割和使自治流于形式。出现了对社会主义自治的公开攻击。正如南共联盟主席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的,这些攻击指向保证工人有权支配自己劳动的条件和劳动成果的社会经济关系制度,因而它们也反对共产主义者联盟旨在建立工人阶级这种社会地位的倡议和行动。这是对政治

体制的阶级内容的攻击,也是对国家政权系统中革命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宪法地位的攻击,这种攻击打着争取民主的幌子,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或极左的、反工人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此外,还出现了一种“理论”,认为自治与采用现代技术成就是不相容的,因为自治似乎给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无政府和无组织状态。

南共联盟的阶级作用即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引导作用特别遭到非难,南共联盟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它的个别领导自己也成了官僚技术统治倾向的牺牲品,也就是成了民族主义和伪自由主义观点的牺牲品。在共和国和自治省范围内国家主义官僚势力和技术统治主义势力的结合(依靠小资产阶级自发性),导致了南共联盟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分裂倾向,以及把工人阶级按共和国也就是按民族成分分割开来。分裂的思想政治倾向分裂了领导,威胁着南共联盟的引导作用,包含着在这一基础上出现宗派的危险,并在一些领导机构中已经在组织上扎了根。此外有人企图再次确认关于共产主义者联盟作用和关于南斯拉夫多民族大家庭的官僚集中制观点,它表达了经济部门和国家中的国家主义官僚上层和技术统治主义上层的利益。共盟与其阶级基础的联系,首先是与工人阶级基本阶层的联系削弱了;工人在共盟的社会组成中的比重下降了。在理论讨论中出现了工人阶级正在消失的观点,理由是全体劳动者都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而且没有形成“对立阶级”。马克思主义被宣布为过时的理论,开始把它与教条主义即斯大林主义等量齐观。在一些地方的共盟队伍中,无政府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方式大量泛滥,而技术统治主义则代表着它的社会基础。口头应付、机会主义和妥协折衷损害了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思想信念的坚定性,使社会行动带有无组织、不负责任和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党的联邦化倾向加强了;民族主义、一元主义和伪自由主义是共产主义者联盟中派别夺权野心的思想表现。南共联盟的政治团结和行动能力大大地削弱了,出

现了本位主义和思想、政治、行动的不统一，使盟员和组织变得消极。放松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反映这一意识形态的各种理论观点的“革命警惕性”，而在评论某些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时放弃了工人阶级的标准。

所有这些，尤其是通过日常政治实践中的公开争端对政治体制阶级实质进行的攻击，给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作用的发挥带来了不稳定性，造成了政治危机的策源地，导致了重大的思想政治冲突。社会处在历史转折关头。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提议进行新的宪法改革，以巩固和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能保证工人阶级在经济和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系，同时在平等和互相支援的基础上发展民族间的关系，从而保证政治体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1967年和1968年的宪法修正案大大地修改了1963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修改首先是为了加强共和国和自治省的作用，缩小联邦的权限，尤其是联邦在扩大再生产领域里的权限，与此有关，还更明确和更详细地规定了联邦中相应机构的作用。但是，人们认为，这些修改不够彻底，不足以克服自治和国家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共和国和联邦之间的冲突，不足以消除联邦机关的工作常常遭到抵制的情况。

1970年3月，在共产主义者联盟最高领导中讨论了联邦制改革的必要性问题；当年秋天，开始拟订宪法修改草案；10月，在爱德华·卡德尔的领导下，联邦议会各院的特别委员会开始进行工作。1970年10月底举行的南共联盟第一次代表会议，赞成进行联邦制改革，认为需要拟订新宪法。会议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结论认为，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强自治的物质基础的决议贯彻缓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和收入关系的发展不彻底、经济不稳定和生产者在分配中的地位恶化。会议指出，在联邦制改革的讨论中民族主义以本位主义、一元主义的和分裂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思潮的代表人物都在进行活动。

1971年5月3~5日,在萨拉热窝举行了自治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坚决支持修改宪法的要求并希望尽快实现,大会特别坚持实施所谓“工人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社会经济体制的发展要使得直接生产者能支配扩大再生产。社会主义联盟联邦会议也支持修改宪法,在6月8日的会议上作出决定,在平等的基础上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代表团组成社会主义联盟联邦会议。

1971年6月底通过了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的一批新修正案,这是修改宪法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重点主要是改变联邦、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改革的方向是,与过去所有的宪法规定不同,在联邦中建立这样的关系:劳动人民和各民族在共和国和自治省中行使自己的自主权,而通过联邦机关行使的只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并事先征得所有共和国和自治省同意的那些权利。正如联合劳动中的工人应该决定自己劳动的条件、资金和成果一样,各民族人民也应该决定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条件,也就是掌握所创造的剩余劳动。从这个信念出发,共和国和自治省有权利和责任自主地安排内部关系和平等地决定联邦中的共同事务。有关共同利益的领域包括: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在不结盟政策的基础上争取世界和平,实现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统一(即发展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体制的统一基础),保证统一的南斯拉夫市场。特别是,联邦丧失了一切投资权(包括建立投资基金和其他基金的权力),也就是丧失了规定任何财政义务的可能性,但与行使宪法规定的联邦职能直接有关的财政义务除外。

对联邦机构也进行了改革。联邦各机关直接由共和国和自治省在平等的基础上组成。正是“为了彻底地把联邦组成各平等民族的共同体和为了保证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对行使联邦职能的影响和责任”(铁托),设立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它是联邦独立的机构,但同时也是由共和国和自治省组成的机构,是全国联合、综合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它是集体国家元首,是

立法提案权和政治倡议权的行使者。共和国总统的职务在铁托担任这一职务时一直保留着。

通过这些改革,大大加强了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地位,缩小了重犯国家集中主义错误的可能性;同时,这也意味着加强共和国和自治省的责任——既加强它们对本身的自治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责任,也加强了它们对制定和贯彻联邦政策的责任。认为通过这个途径,可以在宪法上为消除滋生民族问题的某些根源和产生共和国相互之间以及共和国与联邦之间不信任的原因创造前提。人们认为,这是为南斯拉夫社会的自治经济一体化开辟道路的必要条件。力求通过这个途径,把民族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与工人阶级内部建立关系和克服矛盾相同的基础上,从而把联邦中实现平等关系与共和国和自治省中发展自治联系了起来。

因此,联邦制的改革同时也包括了社会经济关系的某些巨大变化,宪法修正案的第21号和第22号(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称为“工人修正案”)特别规定了这一点。无政府自由主义观点认为,自治是阶级调和的运动,宪法修正案的上述规定是对这个论点的答复。修正案的条文确定了共产主义者联盟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历史作用的基本论点制定的战略方针;社会主义自治按其社会历史实质来说,反映了劳动、工人阶级和人的解放过程,因此,社会主义自治是工人阶级的运动,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而不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宪法条文规定了自治生产关系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治包括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思想。建立了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作为“劳动和资金联合”的基本形式,劳动者将在这一基层组织内直接支配社会再生产资金,自治的劳动者通过这种方式将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整个社会生活的自治一体化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扩大再生产过程和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建立在自治的基础上。宪法规定,全部收入归联合劳动支配,社会政治共同体和国家机关(联邦、共和国、自治省和区)不能成为社

会资金也即“资本”的“所有者”，不能支配积累。劳动者在基层组织范围内，并通过自己的代表在联合劳动系统内，是宪法规定的扩大再生产资金即社会资本使用的决定者。这样就在法律上规定了联合劳动在整个社会再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

还实行了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制度作为民主解决社会矛盾、发展合作和互相支援的形式——它们既适用于联合劳动领域也适用于社会生活其他领域。这就是说，要由自治而不要由国家来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

从同样的基本方针出发，宪法修正案条文以崭新的方式规定了以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个人劳动的问题，尤其是它与联合劳动和整个制度的关系问题，以及维护统一的南斯拉夫市场的重要因素和基本机制，南斯拉夫的社会计划，银行的作用和银行制度。

可见，修改宪法的社会意图是使劳动者获得有效的武器去反对国家主义、官僚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这些不良现象伴随着社会主义自治关系发展并具有使社会主义自治关系变形的倾向。因此，这些修改不仅意味着摧毁联邦国家主义的体制基础，而且意味着要克服所有国家主义——既有共和国和自治省范围内的国家主义，也有较低的社会政治共同体范围内的国家主义。实际上，这里指的是使整个社会组织都建立在自治和民族完全平等原则基础上的纲领性方针，是削弱传统的国家政权和使劳动者更多地参与决定一切社会事务和增加劳动者在其中的影响的过程，是保证劳动者、生产者在从劳动组织和地方共同体直到联邦的各级机构都成为主要决策者的过程。根据这个宗旨，将在修改宪法的第二阶段（该阶段以通过1974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新宪法、各共和国宪法和自治省宪法而告终）研究其他各种宪法问题，尤其是涉及议会体制的问题。

关于联邦制的宪法改革，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与那些威胁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工人阶级性质和否定共产主义者联盟思想

政治上的引导作用的政治力量划清了界线,那些政治力量企图利用它们反对官僚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的斗争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者联盟。上述这些情况都加快了政治上的解决。

通过修改宪法,大大缩小了民族主义力量和其他反对派力量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这些力量过去加剧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局面,给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带来了不安定和各种恐惧。实际上,民族主义来源于残余的工人阶级阶级敌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它的社会基础则首先是官僚国家主义势力,官僚国家主义的社会实力建立在支配异化的社会积累资金上。民族主义者也找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某些领导人作靠山,他们还开始与某些国家里南斯拉夫政治流亡者中的反革命势力直接建立联系。

因此,为修改宪法而进行的思想政治斗争必然导致对共盟内部的民族主义力量和无政府自由主义力量的政治清算,并在此基础上恢复共盟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统一。1971年4月28~30日在布里俄尼岛举行的南共联盟主席团第十七次(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是由于发生政治危机而由南共联盟主席铁托召开的。当时克罗地亚共盟领导公开指责“一元主义和集中主义”势力进行所谓反对克罗地亚及其领导人的阴谋,硬说联邦外交部和联邦内务部的某些领导人进行了这样的活动,从而使政治危机变得特别尖锐。扩大会议指出,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危机,资产阶级关于党的作用的观点已经侵入,南共联盟内存在宗派活动和联邦化倾向,存在着否定南共联盟的社会作用和把南共联盟排挤出日常社会实践的现象。会议认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思想和政治上的统一是贯彻宪法修正案的重要条件。要求共产主义者联盟各级领导和组织采取坚决的具体行动,在本单位和本地区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一致认为,“民族主义是纠集一切反共势力的基础,它破坏南斯拉夫各民族间的信任和团结,并导致破坏南共联盟的统一”。所有共和国和自治省的领导都接受了这次会议的估计和结论,并答应彻底贯彻。在以后开

展的行动中,劳动人民与共产主义者联盟建立了更为牢固的联系;促成这一点的还有,人们已经更明确地发现,不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社会分化问题是一个阶级问题(1971年11月举行斯洛文尼亚共盟第三次代表会议,1972年2月举行南共联盟第二次代表会议)。

但是,在修改宪法以前已经表现出来的基本倾向仍然继续存在,甚至更为严重。尽管在南共联盟主席团第十七次会议上批判了民族主义的反共阶级实质,但民族主义的滋长并没有停止。民族主义力量在克罗地亚特别猖狂,以萨夫卡·达布切维奇-库查尔和米卡·特里帕洛为首的克罗地亚共盟部分领导,以保护人的姿态对待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者的所谓群众运动,强调这一运动的出现是为了保卫克罗地亚人民的民族民主权利,反对“一元主义—霸权主义”和“官僚集中制”力量,因为这些力量阻碍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联邦制改革,并毫无根据地说存在着南斯拉夫崩溃的危险。“克罗地亚文化协会”成了纠集民族主义力量和指导它们行动的中心,它支持联邦制改革的要求,但很快就变成了共产主义者联盟政治反对派的中心。“克罗地亚文化协会”通过自己的报刊,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这包含着挑起民族间残杀的危险。该协会开始在工厂里建立分支组织,要求按民族成分来“清点”工人。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攻击说,南斯拉夫是“克罗地亚的监狱”,克罗地亚语言受到“排挤”,克罗地亚经济受到“掠夺”,他们要求在“阶级和平”的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家中,使克罗地亚人成为唯一的主权体现者。他们指责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背叛民族利益”,并表示只信任克罗地亚共盟中的“进步核心”,认为只有这个核心才有能力实现“民族解放”和参加“民族复兴”,因为他们关于“群众运动”的纲领实质上接受了民族主义的观点。

1971年7月4日南共联盟主席铁托在萨格勒布参加了克罗地亚共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会上他强调,虽然一般说来在所有共和国都存在民族主义,但“在民族主义恶性膨胀方面,克罗地亚已

成了全国的关键问题”。他指出,这涉及“阶级斗争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取得胜利”。他批评党不积极开展工作,要求进行“另一种性质的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要求领导进行“最尖锐的斗争和采取最坚决的行动”,坚持让那些不肯下决心这样做的人离职。1971年7月12~13日举行的克罗地亚共盟第四次代表会议表示要进行这种斗争;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开除了一些民族主义者。

但是,围绕着“低估”还是“夸大”像“克罗地亚文化协会”这样的政治对手的问题,也就是围绕着政治上有没有必要粉碎民族主义策源地的的问题,产生了分歧;而在宪法修正案通过以后,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中发生了分化,“在解释克罗地亚共盟对重大的生活问题的政策上,以及在解释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中的作用问题上发生了两种相反路线的对峙”。克罗地亚共盟领导中某些成员的行动更多地像“群众运动”的领袖,而不像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因此,反对民族主义的行动很快削弱了,而民族主义反对派没有遇到较大的阻力就占据了新的阵地,掌握了萨格勒布大学学生联合会的领导,要求撤换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某些最高领导人。11月底,民族主义者在萨格勒布组织了大学生罢课,并企图煽起工人总罢工。

由于上述情况,11月30日~12月1日,铁托在卡拉乔尔杰沃与克罗地亚共盟中央执委会委员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的领导人进行座谈,接着在1971年12月2~3日举行南共联盟主席团第二十一次会议,讨论克罗地亚的政治形势。在会上,铁托指出,在克罗地亚形成了民族主义运动,其策源地在“文化协会”,大学中的罢课是“反革命活动”。他在谴责民族主义的同时也谴责了一元主义,反对按共和国划分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是南斯拉夫的,而在每个共和国中,工人阶级应该掌握政权。他要求讨论全国的形势,强调中央委员会不仅应该对本共和国负责,而且应该对全南斯拉夫负责,而南共联盟主席团应该有权干预共和国领导的工作。

会议决定,开展最广泛的社会行动来反对反自治的和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所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首先是各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和自治省委员会,必须在本单位和本地区在这方面采取坚决的思想政治行动。南共联盟主席团表示相信,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将能克服动摇,开展打击反革命的行动。12月12~13日举行克罗地亚共盟中央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通过了行动纲领和决议,号召党员根据行动纲领和决议开展坚决的斗争,粉碎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策源地。会议接受了中央委员会主席萨夫卡·达布切维奇-库查尔和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辞职,米卡·特里帕洛也辞去了南共联盟主席团委员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在反对民族主义的行动中对947名克罗地亚共盟盟员采取了政治措施(辞职、撤职、开除出党),而“群众运动”的头头则送交法院审判。1972年1月25~27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南共联盟第二次代表会议通过了行动纲领,行动纲领认为,反对以分裂主义和霸权主义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的斗争和反对技术统治主义篡夺工人阶级权力的斗争具有首要意义。行动纲领要求加强工人阶级在扩大再生产中和政治决策中的作用,加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思想政治作用、团结和责任,通过改变党员的社会成分(增加直接生产者的比重)和在区组织内建立固定的党员积极分子小组来加强工人阶级的影响。

这就导致了从加强共盟对革命行动的责任出发来批判地考察全党的社会实践。当时在党内出现了思想危机,其表现是机会主义,不彻底执行和背离九大的方针,思想分歧和自发行动等。为了克服这种危机,加强了南共联盟主席团的政治作用,经过改组后的南共联盟主席团执行局开始更积极地工作。1972年1月选举斯塔奈·多兰茨为执行局书记。

鉴于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一些领导中存在着抵制南共联盟主席团第二十一次会议和南共联盟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方针的阻力,1972年9月18日,南共联盟主席和执行局向党员发出公开信,要求

共产主义者联盟成为“革命行动的组织”，号召共盟盟员、组织和领导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反对各种消极现象和不良倾向。要求“坚决反对一切导致南共联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分裂的倾向，反对把南共联盟变为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组织的自由联盟，反对按所属的民族和共和国来划分工人阶级”。

在这个基础上对技术统治主义观点和伪自由主义观点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思想清算。这些观点在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中尤其严重。他们把建设“现代塞尔维亚”的前景与建立大型经济金融体系（业务机构在其经济管理中起关键作用）联系起来；反对联邦原有的“国家资本”的“国有化”，理由是不应该否定曾经取得这些资金的自治组织的自主性；力图使塞尔维亚从联邦政治领导的“监护下”解放出来。为了贯彻这样的战略方针，战争时期的干部被当作教条和保守的社会思想的代表者而受到排挤，新一代较年轻的领导人受到重用。他们不顾这种政策在各地，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中遭到的反对，与1972年7月5～6日举行的塞尔维亚最高政治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批评相反，提出了下列论点：主要危险是重新建立官僚集中制和放弃民主方针。

1972年10月9～12日，南共联盟主席与塞尔维亚政治积极分子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议，会上批评了自由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它们在实际上否定南共联盟的政治路线，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铁托指出了由于把资本集中在银行、外贸组织和批发商手中而产生的问题，对此，几乎所有共和国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铁托认为，在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和南共联盟主席团之间不存在“正常的”关系；他指出，在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对“阶级敌人”的估计中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公开宣传工具的报道中缺乏阶级观点，常常破坏南共联盟的团结和损害国家的利益。当时有人认为，随着对联邦制进行宪法改革，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也应当按同样的办法进行改组。与这种看法相反，铁托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并认为恰恰是经济管理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管理的非集中化，要求“共

产主义者联盟保持更紧密的团结”。

不久以后,在1972年10月21日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中央委员会主席马尔科·尼凯集奇和执行委员会书记提出辞职,接着贝尔格莱德共盟市委书记提出辞职,1972年底,伏伊伏丁那共盟领导人也提出辞职。经济部门的许多经理和宣传机构的许多领导人也被撤换。

在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同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中的机会主义、伪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反对南共联盟方针的现象划清界线的过程中,对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也进行了人事变动:撤换了斯洛文尼亚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塔奈·卡夫契奇,解除了南共联盟主席团委员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委员克尔斯特·茨尔文科夫斯基的职务,撤换了马其顿共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在那些没有把这种划清界线的工作(特别是与民族主义划清界线的工作)进行到底的地方(如科索伏),在以后的年代里产生了远为严重得多的后果。

为了恢复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统一,在1972年12月举行了南共联盟第三次代表会议,1973年5月举行南共联盟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代表会议讨论了青年问题,会议作出结论,必须对整个教育制度进行根本改革,并责成南共联盟主席团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前拟定出改革方案。共产主义者联盟开始更直接地研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问题和许多过去几乎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此外,还将更加重视失业问题,努力对有关工人临时到国外工作和他们在国外的地位问题的解决进行直接的社会指导或施加社会影响。1971年南共联盟主席团建立了专门机构全权处理这项工作,1973年2月南共联盟主席团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的决议规定了共产主义者联盟、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团体在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任务。

所有这些措施都得到了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最广泛的支持。在这个基础上开展斗争,反对威胁社会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

自治实质的畸形现象和不良倾向，反对以各种方式篡夺劳动者自治权利的行为和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特权。

简言之，重新确认了共产主义者联盟在社会上起的阶级作用，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上的和政治上的引导力量，它对社会发展的方向、对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实行和发展、对工人阶级政权的革命性质、对一切社会决策的社会主义自治内容负责。肯定了南共联盟是南斯拉夫统一的革命组织，这与共和国和自治省组织的作用和地位并不矛盾；这个组织中的关系应该是：共产主义者联盟作为整体有能力及时地和有效地对整个社会中的一切思想过程和政治过程作出反应。

在思想上划清界线和政治上进行处理的气氛中，开始的南共联盟十大的立场和决议拟定行动纲领，该行动纲领于1973年6月发表。在这种总的气氛中结束了宪法改革的第二阶段——制定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新宪法，到1974年2月制定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新宪法，并在1974年2月21日在议会通过。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新宪法实际上肯定了有关联邦制改革方面已经进行的宪法改革，并在这一意义上发展了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和自治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其他宪法手段。此外，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的结构中也进行了巨大的改革。

宪法条文完整地反映了在历史上从实行工人自治开始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宪法规定，劳动者根据使用社会所有制的资金从事劳动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承担者；他与其他劳动者联合，实现自己的收入（从而也实现全社会的收入）并支配这种收入。在这个基础上，宪法也规定了所有其他的社会经济关系。确定了建立在尊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规律基础上的自治社会计划的概念。特别重视规定通过自治利益共同体来满足“劳动人民和公民”在卫生、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和科学方面的个人需要和共同需要的有关关系。在自治利益共同体中应当“自由地交换

劳动”，按照互相支援和互助的原则“交换劳动”，保证从事各项社会活动所需的资金，决定享受这些部门的劳务和成果的方式，解决所有其他的共同问题和利益；总之，要创造条件建立“收入关系”。

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自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表现。国家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作用首先是与有组织地保卫社会所有制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更广泛地说，是与保卫社会主义基础、抵御反社会主义力量联系在一起。除普通法院和检察院外，还建立了维护自治权利和社会所有制的专门机关——宪法法院和社会自治维护人。

在政治体制中最大的改革是，在各个领域和各级社会决策中都实行代表团制的原则。与各种传统的议会代表制、多党制或国家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代表团制的原则将保证使自治的联合劳动成为政治体制的关键的阶级支柱。为了保证代表能够真正表达他工作单位和生活地区的利益，宪法规定，在每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地方共同体和其他基层自治共同体中建立代表团，这些代表团在较高一级社会组织中，在相应的议会中，参与决定社会事务。根据这个宗旨规定了宪法义务：对每个要作决定的问题，代表团都要确定自己的立场。代表团制是表达各种自治利益的制度，同时也是民主地综合这些利益的制度。通过代表团制，不仅在社会基层实现自治决策（在那里最容易在组织和技术上保证做到这一点），而且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自治决策。这样，社会主义自治就成了一体化的社会制度。建立在代表团制原则之上的新的议会制度，标志着在宪法上朝着权力社会化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并使行使国家政权本身变为自治的职能。

随着宪法改革的进行，国防社会化的过程即发展全民防御体系的过程也在继续。对此，社会各界都进行了积极的活动，特别是在1968年以后。联邦国防法（1969年）和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有关法律（1970～1971年）、1971～1974年修改宪法以及新的联邦国防法

(1974年),完善了全民防御的思想,根据该思想,防御是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的直接的和长期的职能,它建立在全社会保卫独立和自己的自由自主发展的决心和能力的基础上,建立在全国武装力量(南斯拉夫人民军和地方防御部队)的战斗准备能力的基础上。作为武装力量一部分的地方防御部队,使国内所有有能力的居民都能参加武装斗争,并保证在一切战争条件下和在全国各个地区都进行武装斗争:南斯拉夫的每个地区都是前线,而每个居民都是战士。根据马克思关于武装人民的精神实现的全民防御,是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不可缺少的部分。防御被看成是社会主义自治关系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日常职能和活动。根据这一宪法规定,从70年代初,开始建立(从共和国和自治省到联合劳动基层组织 and 地方共同体)地方防御司令部,同时,增加了南斯拉夫人民军各指挥部、各部队和各机关与全民防御体系的各单位之间的联系形式和方式,但又不为此增加专职的军官干部。南共联盟在地方防御部队和司令部中的引导作用,由共和国、自治省或区共盟领导机关来实现,它们努力使地方防御部队的发展和战斗准备成为有关自治机构和国家机关日常关注的问题。同样,根据安全和保卫(内务)事务社会化的要求,社会自卫也发展了。铁托在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强调,建立全民防御和社会自卫体系是社会发 展方面最大的创造。能够取得这些成绩的主要原因是,无论是官僚集中制势力、自由主义势力、技术统治主义势力,还是民族主义势力,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在武装力量中建立自己的重要据点,这使共产主义者联盟不仅能够经常促进防御和安全的社会化,而且能够克服社会生活其他领域里自治的障碍。南斯拉夫人民军始终不渝地遵循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路线,在客观上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这既在面临外部的直接危险时是这样,同样在内部社会紧张时期也是这样。

1974年5月27~30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这之前,在1974年3月和4月召开了各共和国共盟的代表大

会及自治省共盟和南人民军共盟的代表会议。通过了新的联邦宪法、共和国和自治省宪法，它们保证联合劳动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起主导的社会作用，确认南共联盟作为革命行动的党的统一。从1969年到1972年南共联盟盟员人数不断减少（1968年底为1146084人，1973年底为1076711人），1974年，盟员人数开始增加，但只是在南共联盟十大以后，到1974年底，南共联盟有了1192466名盟员，才超过了1968年的盟员人数。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共产主义者联盟对批判性地研究社会政治过程和本身的政治经验进行了总结，分析了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实质，确定了社会主义自治发展新阶段的基本方向和任务——在自治计划方面，在宪法的基础上实现劳动和资金的经济联合，在支配社会再生产资金方面缔结社会契约和自治协议。

代表大会全面分析了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社会作用和性质方面表现出来的动摇和反常现象，特别是与主张让自治自发发展、共产主义者联盟不应加以“干涉”的无政府自由主义观点有关的动摇和反常现象，以及与南共联盟联邦化现象和背离民主集中制原则有关的动摇和反常现象。

代表大会强调了为实现作为完整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自治而斗争的意义，特别强调了民族完全平等的政策。代表大会指出，以下两种倾向今后也会威胁工人阶级的新的宪法地位：一方面是国家所有制垄断力求保持支配剩余劳动的旧关系（似乎它不反对工人阶级的新地位）；另一方面是技术统治主义垄断产生对剩余劳动的集团所有制占有。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重新肯定了社会主义自治的阶级实质，认为社会主义自治的政治体制按其阶级内容来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在其中体现了社会主义自治的生产关系。

社会发展过渡时期提出的基本任务是，不通过国家，在社会所有制的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实现劳动的联合，以便在工人阶级的直接监督下，在一切领域决定工人阶级劳动的条件、资金及成果。国

家并不因此而“取消”，但它的作用与自治发展的需要相联系——保卫社会制度、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保护社会所有制和工人的自治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进行计划指导。因此，代表大会要求按宪法的规定，从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开始，实行自治的体化；要求打破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界线，实行最广泛的劳动和资金的联合，在劳动和资金的联合中，工人阶级是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直接代表者。代表大会指出，需要制定长期发展政策；要求共产主义者联盟不仅要采取行动实现宪法关于协调民族利益的规定，而且要采取措施克服经济不发达状态，也就是要保证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加速发展，缩小国内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在物质上和整个发展水平上的差距。

在实现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更深刻的改革以及实现这些领域与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自治联系方面，第十次代表大会确定了以下纲领性方针：共产主义者联盟将力争创造这样的社会气氛和这样的关系，它们将在社会主义自治的基础上促进和鼓励文化生活、科学、艺术和社会理论领域里的批判性研究和创造性探索。

为了这个目的，除已经建立的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社会研究中心外，开始着手在自治省委员会和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下面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心，以便系统地研究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事件，并对科学研究方向、在共盟活动中运用科学研究成果、规划和组织南共联盟的思想理论工作施加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还开始建立自治省委员会和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学校，而在1975年建立了南共联盟的“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政治学校（在库姆罗韦茨）。开展了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活动，出版了《列宁全集》，接着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着手出版《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全集》。从1975到1977年，在共产主义者联盟中有840所政治学校和约10万名学员。

代表大会决议强调，“共产主义者联盟组织和领导的日常思想斗争和政治工作的中心应该是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工作和生活中

一切实质性问题,包括当前的和长远的问题”。再次要求改变党员的社会结构,实现“工人多数”,以便加强工人阶级对党的政策的影响。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南共联盟作为统一的革命组织(而不是共和国和自治省党的联邦)的组织原则和活动原则,根据这个观点,更详细地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南共联盟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有共和国和自治省中各族人民的整体利益而斗争;在南共联盟统一的思想政治纲领和行动纲领的范围内,共和国和自治省组织自主地执行政策。此外,还强调了社会主义自治社会关系的民主性质,即在全体自治主体的参加下以自治的方式协调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各种不同利益,这要求共产主义者联盟有准备和有能力和在探索经济和社会发展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时,与一切向往社会主义的力量进行公开的民主对话。

对共产主义者联盟章程也作了一些修改,以便维护和加强共盟从基层组织到最高机构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团结,加强共盟的行动能力,为盟员直接参加制定和实施党的政策创造条件。从南共联盟的机关与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作为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辩证统一出发,更明确地规定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义务和相互责任。根据南共联盟纲领、南共联盟领导和机关的政策和立场,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自主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和作出决定,参加制定南共联盟的政策,并向本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共盟盟员和向南共联盟及其领导和机关承担共同的和直接的责任。规定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地方共同体和自治利益共同体中,建立共盟基层组织;在联合劳动复合组织中规定了共盟多种多样的组织和活动形式,其必要条件是,在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中的共盟组织协商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和确定立场。根据过去的经验,也由于需要使整个共盟组织的组织决定建立在同样的原则和统一的基础上,以便使各个机关更有效地和统一地活动并更负责地行使职能,对共盟机关的组织、权利和义务也作了重大修改:取消了代表会议,重新设立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作为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最高

机关；设立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作为政治执行机关，主席团从其成员和中央委员会成员中选举执行委员会作为政策执行机关，它组织实施南共联盟政策和方针的活动。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委员166名、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36名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2名。选举铁托为南共联盟主席，考虑到他在南共联盟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发展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他的任期没有限制；选举斯塔奈·多兰茨为执行委员会书记。

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南斯拉夫社会和政治生活发展的一个特点是积极贯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新宪法、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自治省宪法。从通过宪法修正案开始，特别是在通过新宪法后，就开始实行以下原则——共和国和自治省在统一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范围内，自主地安排内部关系，共同地和平等地决定联邦事务。

开始了建立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作为新生产关系的基本体现者的过程，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自治民主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建立了代表团，并取得了实行代表团制的初步经验，大量劳动者通过代表团制进行了直接的自治活动。

新宪法通过后很快就开始了草拟联合劳动法的工作。在联合劳动法中发展了并以具体形式表达了有关联合劳动的宪法原则，更充分地确定了某些社会经济范畴即自治范畴，从而为有组织地建立联合劳动新关系并使其发挥作用打下立法基础（联合劳动法于1976年11月25日通过）。同时还着手草拟贯彻新宪法所需要的其他“体制性法律”。1977年制定了新外汇制度，它规定在共和国和自治省“国际收支平衡”的范围内，由出口创汇的经济主体来支配外汇。

1978年6月20～23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南共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南共联盟从十大以来增加了625558名新盟员，到1977年底，共有1629029名盟员。铁托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承前启后、实现稳定性和团结的大会。代表大会指出，尽管建立大型的经济联

合体是发展现代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有效地参加国际分工的条件和要求,但劳动和资金的联合发展缓慢。代表大会认为,在区、地区、自治省、共和国范围内自给自足发展的倾向仍占优势,这种倾向是地方主义、共和国本位主义、政治官僚与技术统治主义势力相勾结的表现。代表大会对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再生产能力和积累能力增长缓慢表示不满。代表大会指出,根据宪法和联合劳动法建立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过程尚未结束,新旧关系交织在一起,于是就容易过多地取走联合劳动组织的收入。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减少从物质生产部门提取的用于非经济消费的那部分收入,并进行有力的斗争以实现劳动和资金的联合以及按自治方式集中积累。

代表大会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发展社会主义自治的政治制度上。1977年6月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决定把爱德华·卡德尔的文章《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作为代表大会确定立场和起草文件的基础,它也是共盟中长达一年的讨论和代表大会讨论的基础。文章从理论上论述了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特性,以及政治制度根据社会物质领域的变化需要进行改革的基本方面和改革方向。文章也是对政治生活中不时出现的动摇和疑惑的回答,这种动摇和疑惑是社会关系矛盾的反映,也是政治制度中复杂因素的表现。文章注意的中心是自治利益的多元化现象,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出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它不同于一党制和多党制),同样也发展出代表团制,它是政治制度的基石和全面的政治决策的原则。代表大会认为,代表团制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恰当地协调各种不同的自治利益和解决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中出现的矛盾。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批判的态度评价共盟在实现其思想政治引导作用方面的实践。代表大会表示要对南共联盟的活动方式和方法进行相应的改革,但不得影响联邦宪法和南共联盟纲领规定的、决定共盟的性质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基本原则。代表大会

指出,必须进行斗争,反对共盟中的官僚集中制倾向和联邦化倾向。为了加深共产主义联盟内部的民主化过程,对章程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内容之一是,规定每个盟员有义务尊重多数的立场和决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其实施。章程强调盟员有权在共盟机关中提出修改他认为没有得到实践肯定的那些决定和方针。代表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委员165名,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23名。

在以后的年代里,民主的总方针具体地贯彻在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彻底实行集体工作原则之中。《主席团的组织和工作方法条例》中确定集体工作原则是主席团行使职能的根本原则(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的执行主席及以后的主席任期为一年)。铁托1978年11月22日在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尖锐地批评了官僚和技术统治主义势力相勾结来决定经济发展的问題。他强调,为了发展代表团制和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必须在所有自治机构和国家机关中、在代表团制的议会中、在从区直到联邦的各级社会政治组织的领导、机构和组织中,都实行集体工作的原则。他认为,“我国自治制度的实质必然要求这样的工作方式”;采取这样的组织方法和组织形式特别是由于“需要让代表团制不受阻碍地发挥作用和进一步发展”。

也象在南共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那样,铁托再次指出,没有按照国家发展的战略方向来迅速改变经济结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慢于实际可能达到的水平;而各种消费的增长大大快于社会产值的实际可能;经济部门的负担过重,债务过多,从而削弱了自治的物质基础,引起通货膨胀,造成收支平衡中的高额赤字,从而助长地方和地区经济的封闭状态,阻碍联合的过程。铁托认为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不执行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逃避“在体制上解决问题”,各级机构不负责任,使制度的运行带有自发性和不稳定的因素,并在这个基础上加强着官僚主义倾向和其他反自治的倾向。因此尖锐地提出任务:共产主义者联盟和一切有组

织的社会主义力量必须采取坚决的思想和政治行动来解决经济问题以及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问题。

1979年初,铁托的一名最亲密的战友爱德华·卡德尔逝世。1980年5月4日,南共联盟主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逝世,他领导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四十多年,以自己的事业成为他们共同的最伟大的历史人物。

1980年5月8日,127个国家的209个代表团参加了铁托的葬礼(其中有123个国家代表团,由35个国家元首、8个共和国副总统、24个政府总理、46个外交部长率领;有100多个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进步党派、解放运动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团)。这个事实本身证明了铁托享有特殊的国家威望,同时也肯定了铁托奠定的南斯拉夫国际政策的丰硕成果。

1981年底,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有2117083名盟员,占全国总人口的9.5%。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盟有391244名盟员(占该共和国人口的9.5%),黑山共盟有73139名盟员(占12.5%),克罗地亚共盟有348054名盟员(占7.6%),马其顿共盟有149620名盟员(占7.8%),斯洛文尼亚共盟有125206名盟员(占6.6%),塞尔维亚共盟有907672名盟员(占9.8%),塞尔维亚本土有592741名盟员(占人口的10.5%),科索沃有91381名盟员(占5.8%),伏伊伏丁那有203350名盟员(占11%)。最近十年是共盟盟员人数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长时期,共增加了一倍多:从1973年到1982年年中,盟员人数增加1144500名即增加113.3%,达到2154448名,而新吸收的盟员则更多,达1520355名;仅仅1980年(当时,由于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患病和逝世,国家处于非常时期),就吸收了约20万名新盟员,这是1948年(当时吸收了21.6万名新党员)以后吸收盟员最多的年份。1972年共盟盟员占南斯拉夫成年人的1/14,而1981年占1/7;1982年年中,盟员在总人口中占9.6%,在18岁以上人口中占13.9%,在积极人口中占15.6%,而在就业人口中甚至占到28.6%。

从1973年到1981年,在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员中农民的比重下降了,从6%降到3.9%,在1/3以上的农村居民点中甚至没有共盟的基层组织;行政工作者的比重从12.3%降到11.7%;领导人和干部的比重从7.4%降到5.9%。

1982年年中,工人(包括传统范畴的工人和所有虽然有其他技术职称,但仍从事工人劳动的人)占盟员总数的31%(1946年占28%)。从1973年到1982年年中,共盟中工人人数增加了382911名(即134.1%),从1970年的310555名增加到1980年的601509名,1982年年中增加到668463名,从而使工人成为共盟中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但还不是绝对多数。在全体就业的南共联盟盟员中,工人的比重从1977年的38%增加到1981年的41.1%,与物质生产部门和生产服务部门的技术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一起,占就业盟员的48%,占全体南共联盟盟员的35.8%。在南共联盟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有9.7%是工人,而十二大选出的,占10.5%;在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和自治省委员会的委员中,工人占31.4%,在区委委员中,工人占32.5%。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全体盟员中,有1578050名盟员或74.5%在社会所有制成分中就业,其中在物质生产和生产服务部门就业的盟员占66.6%,在非经济部门就业的占33.4%;在全体盟员中有83567名农民或占3.9%。1981年在全体就业人员中,共盟盟员占25.9%,但在非经济部门就业人员中,共盟盟员占的比重大得多(37.7%),而经济部门为22.4%,同时,在经济较不发达和就业人数较少的共和国和自治省中,盟员在就业人员中的比例较高。27岁以下的青年占盟员总数的33%以上,1980年新吸收的盟员中青年占73%,而在1981年占72.7%;从1974年到1980年,共吸收40万名男女青年加入共产主义者联盟,其中有320562名是中学生和大学生。在全体盟员中,妇女占26%,这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以来妇女在全体党员中的比例最大的时期。从1973年到1982年年中,由于各种原因,有375854名盟员离开了共产主义者联盟。

3. 差别中的统一和不结盟代替 磐石般的团结和集团

非殖民化和国际力量布局的变化,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和新的“冷战”。不结盟政策的阶级性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国际关系的发展。南共联盟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的国际活动。

60年代中期,当世界上国际力量的布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开始了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生产力非常迅猛的发展(被称为科技革命),使世界上的距十分遥远的地区接近和建立更多的联系。但是世界上的冲突不仅在政治分歧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基础上继续存在,而且在不时发生的新分化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出现。国际关系的总趋势加强了世界上既联合又分化的矛盾过程。

本世纪70年代人类进步的基本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时期的社会发展中有其特色。资本主义机体的结构性危机更加深化和尖锐化了。同时,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他形式的统治和霸权主义的愿望相反,遍及世界各地的全面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过程加强了。为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而斗争是时代的根本特征,它现在已变得更加蓬勃高涨、更加错综复杂和更加分化独立,并远远超出了军事政治集团之间冲突的范围和内容。社会经济改革和意识形态活跃现在已席卷全世界,它们标志着人们为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而斗争。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矛盾,是全球基本社会矛盾之一;在这一矛盾中开始以特殊方式反映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深刻的社会内容和阶级内容;这一矛盾在七十年代的中期,就已经上升到国际关系的第一位,并成为国际关系的直接因素。

亚洲和非洲国家非殖民化的过程在60年代就已基本上接近尾

声,这个过程对国际力量的布局产生了重大的后果。新解放的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成了新的重要的国际力量;仅仅在非洲1967年就有40个独立国家,而在1950年只有3个。这些国家所处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地位、加速本国经济发展的利益、保卫世界和平和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的要求、而首先是保卫本国独立的愿望,把它们联合起来,同时,它们都赞成不结盟政策。随着这些国家的出现,大大扩大了联合国的成员,1964年联合国有115个成员国,而在成立时只有51个成员国。

世界分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日益清楚地和尖锐地影响着国际关系。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差距日益扩大了。由于不发达国家人口的高速度增长常常超过食品生产的增长,这些国家的地位绝对地恶化了。1961~1965年,这些国家按人口平均的社会总产值只增加10美元,或平均每年增加2美元,即1.5%,1965年为142美元(在一些国家里甚至没有超过70美元),而在同一个时期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按人口平均的社会总产值从1400美元增加到1700美元,平均每年增长60美元,即增加4%。工业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4%,其社会总产值占世界社会总产值的87.5%,而不发达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66%,其社会总产值只占世界社会总产值的12.5%。建立在集团基础上的封闭型国际经济营垒,使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七十年代还发生了国际经济关系危机。它首先表现为所谓石油危机即能源危机(从1973年开始),以后又变为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它对发展中国家的打击最为严重。这场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些国家的债务不断增加:它们的债务每年增加约1000亿美元,以致70年代末达到5000亿美元以上的巨大数额;同时全世界的军费开支也超过了这个数目,其中绝大部分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首先是希望进行控制、实行霸权主义和扩大势力范围。

不发达国家由于发展水平低和经济贫困,也由于外来干涉,国

内的政治和社会冲突加剧,政治上也不稳定,因此它们更易于受到经济、政治和军事干涉(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或它们之间的争端)。所以在60年代和以后时期,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关系的特点是,不发达国家或多或少受到公开压力和军事干涉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越南、刚果、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柬埔寨等)。这些关系中最激烈的形式是越南战争,这场战争美国是在1964年开始卷入的,几年内大大增加了参战部队,而没有能使这场战争“越南化”(1968/69年度,美军参战部队达到约55万人)。集团间冲突的重点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地区。

但是,随着非殖民化过程的发展和绝大多数新解放国家奉行不结盟政策,参加集团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明显少数的地位。不结盟政策的出现使世界不能在总体上分为军事政治集团。

“冷战”和大国(首先是苏联和美国)的集团对峙是战后头十年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其后果特别表现为进行核军备的激烈竞赛,现在这种局面已逐步让位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还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军事政治集团的主导国家之间的关系已不那么紧张了,尽管在世界某些地区出现的许多政治动荡和战争冲突中,大国仍直接或间接地纠缠在一起。直到70年代中期,上述这个过程都没有停止;即使是最激烈和最危险的冲突,例如1964年开始的越南战争和1967年的近东战争都没有变为全面冲突。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和限制战略核武器的谈判已顺利结束。1967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开始了“向东方开放”的最初尝试,1968年初它与南斯拉夫恢复了外交关系,从而放弃了所谓哈尔斯坦主义(根据这个主义十年前它中断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社会民主党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执政和维利·勃兰特当选为总理后,1969年开始表示要进行谈判,1970年与苏联签订了条约并开始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谈判。西欧和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急剧发展。许多影响东西方之间经济关系更积极地发展的政治障碍被扫除了,经济、科学和文化合作发展了。在1969和1970年特别是在苏联和西欧国

家之间签订了一批重大的经济协议，从投资数额、协议性质和涉及的工业部门来看，这些协议都是长期的。在这种气氛下，除双边合作外，还开始出现许多全欧性质的倡议；经过三年准备后，在1975年终于在赫尔辛基召开了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讨论欧洲联合问题的国际会议和欧洲大陆这一地区与另一地区代表之间的会晤日益经常。

但是，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过程局限在集团之间的关系上，也就是集团主导国家之间的关系上。70年代中期，这一过程在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军事关系、甚至在体育和文化领域中）都停止了。紧张局势的加剧导致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出现新“冷战”：继续奉行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在世界某些地区加剧和扩大危机关系和战争策源地，大国之间和集团之间进行角逐并在它们对峙的范围内经常运用军事力量和进行军事干涉。美国通过近东的以色列和非洲大陆的南非共和国，继续以新的和老的形式奉行帝国主义政策，使一些国家的国内政局不稳定。1979年底苏联军队侵入阿富汗，1980年底越南军事干涉柬埔寨，波兰的内部政治危机（1980年年中开始），都是东西方之间的关系重新尖锐化的缘由：苏美限制战略核武器的谈判中断了，苏美接触的范围大大缩小了，对苏联实行了“经济制裁”，欧洲地区的关系尖锐化了。美国对苏联进行了全球对抗，认为苏联在这一期间在扩大自己的势力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同时，美国加强了军备竞赛，力图在经济上拖垮对手，从而使力量的均势变得对己有利。

南斯拉夫在世界上的作用及其国际地位实质上是与它内部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果相联系的。南斯拉夫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进程大大地加强了它的国际地位，促进了国家的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增进了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加强了共产主义者联盟在社会中的作用。保证南斯拉夫的安全和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是它的防御能力，这种防御能力建立在全体公民决心抵御一切侵略的战备基础上。

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国际威望和影响特别来自它的独立的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以及它在发展不结盟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外交政策民主化和社会化的过程又促使它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外交政策民主化和社会化过程的发展，特别在最近十年里，是政治体制和整个政治生活民主化的组成部分。

南斯拉夫奉行不结盟政策是一种持久的方针，其出发点是，该政策的力量和前景在于它向全人类、而不仅向执行不结盟政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符合各国人民（不管其发展水平和意识形态方针如何）的长远利益；它对最迫切的、意义深远的、决定命运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发达国家和地区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日益扩大的差别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不结盟并不意味着中立，它是反帝国主义和反霸权主义的政策，因此，它不是任何其他政策的工具和补充，不结盟政策的执行者对大国和其他国家的态度取决于它们在国际关系中的具体行动。不结盟政策从其促使国际关系进步的基本方针和为世界关系带来的历史特性来看，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从而也是社会主义这一世界进程的重要因素。

因此，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属于不结盟运动和它在不结盟运动中起积极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它的外交政策是“阶级中立的政策”，这个政治评价同时也是理论命题。这个世界性的不结盟运动争取平等的国际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反对帝国主义压力和霸权主义压力，反对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反对以超额利润手段或以超经济强制手段使新解放国家处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不结盟政策的阶级实质正在于此），南斯拉夫正是以参加这个运动来表明它在国际关系中的阶级立场。70年代初在南共联盟内出现民族主义和伪自由主义时对不结盟政策也产生了一些动摇，这种动摇已经被坚决克服了。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肯定，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在当代社会政治过程中的国际主义立场反映在它执行不结盟政策的方针中。因此，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不结盟同样适用于世

界各个地区和国际关系的一切领域。

南斯拉夫对不结盟国家的一切重要的会议和行动都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并在国内和自己的国际活动中为贯彻这些会议的方针和决议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发展不结盟运动的思想政治纲领和在组织上使不结盟运动成为争取国际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民主化的世界运动方面,南斯拉夫也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南斯拉夫认为不结盟是国际关系中长期的进步趋势,即使在60年代后半期,在不结盟国家中围绕着不结盟政策的性质以及在“冷战”逐步平息的条件下是否还需要执行不结盟政策的问题出现某种疑虑的时候,南斯拉夫也看到了不结盟政策的深远意义。1968年,南斯拉夫倡议召开新的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这次会议于1970年9月在卢萨卡举行,有63个国家的代表参加。1973年9月初在阿尔及尔举行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会议是在大国协商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的时候召开的,它证实了不结盟政策的目标、原则和实践的生命力和持久价值。六十年代后半期出现的某些疑虑被克服了。会上占主要地位的是,广泛地探讨整个世界中的问题并提出有深思熟虑的具体内容的政治行动纲领。会议认为,在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条件下,不结盟政策的历史职能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为真正的民族独立和各民族自主发展建立经济基础而斗争的纲领,扩大和加深了为争取政治独立而斗争的行动纲领。不结盟具有国际运动的某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带有独立自主的性质。1976年8月在科伦坡和1979年9月初在哈瓦那举行第五次和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会议表明,尽管对某些不结盟国家和整个运动的外部压力加强了,但不结盟运动的基本目标、原则和准则是统一的,在反对各种形式的依附和奴役方面是团结的。设立协调局作为在两次首脑会议之间协调不结盟国家在贯彻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通过的决议方面的活动的机构,会议对协调局的组成和任期作了规定。南斯拉夫当选为协调局25个成员国之一。这些会议的决议鼓舞了

不结盟国家为争取和平、政治独立和经济彻底非殖民化而斗争的一系列国际行动,并成为联合国大会第六次和第七次特别会议(1974和1975年)的基础,这两次会议的宗旨是探索解决国际经济关系的迫切问题的办法,也就是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根据不结盟国家的倡议(这些国家接受了南斯拉夫在科伦坡会议上提出的有关建议),1978年举行了联合国大会关于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南斯拉夫积极活动的方向首先是维护不结盟运动行动一致。南共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78年)本着这种精神强调,不结盟国家需要通过和平的途径解决相互之间的一切问题、争端和冲突,从而防止使它们的冲突变为集团间的政治对抗。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强调,不结盟国家应当这样组织起来:在不结盟运动的某些成员国之间一旦爆发战争冲突,不结盟国家能够提供各种服务以便限制和消除冲突。在维护不结盟政策的原则和加强不结盟运动行动一致方面,铁托总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79年9月在哈瓦那会议上,特别表彰铁托总统是不结盟政策的奠基人和最积极的捍卫者之一。

不结盟政策原则是南斯拉夫在联合国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中进行国际活动的统一基础,是与一些国家进行双边合作所遵循的统一原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都没有把共处与国际主义互相支援分割开,尽管两者适用于不同的国际关系领域(这要看它涉及的是不同的还是相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原则。南斯拉夫的不结盟对外政策是要与所有愿意进行平等合作的国家在积极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平等合作,与某些国家和现有的经济集团发展全面的和互利的经济合作。在70年代,铁托总统会见了许多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以及美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总统和首相。1971年9月,以后又在1976年11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访问了南斯拉夫;1972和1973年铁托访问了苏联;1977年8月铁托又访问了苏联,并第一次访问

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而1978年8月中国政府总理华国锋访问了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对于世界上的危机策源地、对于一切威胁世界和平和威胁各民族和国家独立发展的事件和问题都采取非常积极的和原则性的态度。它谴责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对古巴的独立和自主的内部发展的威胁，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帝国主义暴力行动和干涉。

与社会主义国家在共同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也包括保卫世界和平的统一行动。例如，1967年6月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是南斯拉夫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共同的国际行动的原因。但是，即使与这些国家的合作的发展也没有损害不结盟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正象其他许多共产党和工人党一样，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也谴责了华沙条约五国在1968年8月21日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涉，认为这破坏了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其严重的后果是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以保卫社会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这种行动。南共联盟还指责了把小民族当作“实力地位政策的筹码”的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特别抨击了为军事干涉辩护的“有限主权论”，南斯拉夫认为“有限主权论”也威胁了自己的独立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68年8月23日南共联盟中央第十次会议；1969年3月南共联盟第九次代表大会）。由于这些情况，在一段时期里南斯拉夫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和党的关系的发展停顿了，这些党甚至不愿接受邀请派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第九次代表大会，理由是社会党的代表也参加了代表大会。南斯拉夫反对苏联军队在1979年底侵入阿富汗并谴责越南在1980年底军事干涉柬埔寨，这同样表明了南斯拉夫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地位和原则性的政策。

南斯拉夫遵循不结盟政策的原则，非常积极地筹备和参加1975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工作，这次会议是国际紧张局势缓和过程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南斯拉夫主张完整

地和积极地实施赫尔辛基会议的最后文件；主张把欧洲安全问题与地中海安全问题联系起来；主张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过程扩大到世界的各个地区和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以便包括解决世界面临的所有主要问题。从1977年10月到1978年1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

根据不结盟政策原则的精神，南斯拉夫特别重视与邻国的关系。对南斯拉夫来说，睦邻政策具有首要意义，它代表着南斯拉夫的持久的外交政策方针。还在1958年南共联盟纲领中就已强调，南共联盟以后的历次代表大会也都肯定，睦邻政策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张根据实际的可能发展各个领域的合作，开放边界，与某些邻国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根据这种政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力求尊重作为少数民族生活在邻国的南斯拉夫各民族的民族权利，认为少数民族是联系、相互了解和睦邻合作的因素。在这个基础上，南斯拉夫几乎与所有邻国都全面地发展了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的合作。1975年11月10日与意大利签订的奥西姆协议最终划定了两国之间的边界并解决了一些其他问题（全面保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少数民族的权利，确定了新的边境合作形式），该协议是按照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精神顺利解决邻国之间悬而未决问题的例子。

南斯拉夫努力推动与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合作，特别发展了经济合作。为此，1976年9月在索非亚在南保混合工作组的范围内举行了会谈。但是，在解决两国关系中基本争端方面没有取得进展，这些争端是：马其顿少数民族在保加利亚的地位问题，恢复马其顿少数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所享有的民族权利问题，也就是保加利亚方面尊重马其顿民族独立存在的问题。

与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仅仅发展了在经济、教育和文化领域里的合作。1948年以后阿尔巴尼亚领导政策的特点

是，在意识形态上对南斯拉夫的政治体制和不结盟对外政策表示不能容忍，对南斯拉夫的部分领土抱有野心。这使得上述合作不能具有加深睦邻关系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尔巴尼亚方面还从民族统一主义立场出发滥用南阿合作，以致到80年代初这种合作实际上难以进行。

南共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强调，今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仍将与其他国家发展全面的建设性合作，而不问它们的社会经济制度如何；主张“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特别是在与大国的合作中，考虑到它们在维护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方面的重大责任，要努力达成如下协议：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不应成为全面发展双边合作和民主友好相互关系的障碍”。

南共联盟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的国际活动大大提高了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威望和加强了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主张与世界上一切进步政党和运动进行最广泛合作的纲领性方针，在1958年以后南共联盟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都得到了肯定，二十年来，这个方针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60年代，共产主义者联盟努力了解和更深入地研究世界进步力量、解放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加强的各种新现象，同时直接地或通过南斯拉夫其他社会政治组织与世界上一切工人运动、其他进步运动和民主运动建立和扩大平等合作，而不管它们在政治观点和思想观点上有什么差别。南共联盟支持一切能够真正加强世界和平力量和进步力量间交流思想、交流经验和共同行动的形式。南共联盟认为，它作为工人运动的一部分，参加解决工人运动的问题和矛盾是自己的义不容辞的职责。南共联盟的这种国际合作促进了工人运动中平等关系的发展，证明了能够逐步克服工人运动中历史上形成的分裂和分歧，从而也加强了作为世界进程的社会主义。

随着集团间紧张局势的缓和，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磐石般统一的过程也加强了，它在60年代和70年代表现为关于共产党

国际联系的不同观点的对峙(有的主张在世界各个地区或在全世界共同确定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上建立国际联系,有的主张通过各种“差别中的统一”来建立国际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把可能召开的共产党国际会议变为交流各国经验的形式之一的倾向加强了,这里没有了过去的那种磐石般统一的因素,因为许多事实证明,不可能不是这样。

政治上分裂的欧洲在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的同时,却产生了重大的内部冲突和危机:1968年学生运动的浪潮几乎遍及欧洲各国,对现存社会及其政治机构采取了非常尖锐的批评态度(要求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要求实行自治),而在某些地方这些运动与工人阶级广泛的自发运动建立了联系(法国)。在东欧也发生了内部动荡和尖锐的局面: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企图使“社会主义人道化”;1970年底,波兰北部发生工人骚动,导致了党的最高领导更换。1968年8月,华沙条约五个成员国军事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重大分化,许多党不赞成这一行动。70年代,在西欧工人运动中出现了更勇敢地探索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的斗争战略,在其中表现出了某些党的自主性和政治创造性(“欧洲共产主义”,某些社会党重新确认社会主义基本目标);出现了某些共产党与社会党进行政治合作的初步尝试,它唤起了人们的希望:为克服工人运动传统地分为共产党一翼和社会党一翼开辟了前景。

针对筹备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工作(这次会议后来在卡罗维发利举行)和关于需要召开新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想法(特别牵涉到美国侵略越南,中国发生的事件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活动),1967年1月在南共联盟八届六中全会上具体地阐明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对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形式合作的态度。南共联盟没有参加1967年在卡罗维发利召开的欧洲共产党会议,因为它不同意这次会议的筹备以及会议文件起草的方式和方法,也不同意文件中对欧洲形势的估

计,但对会议提出的问题采取积极的态度,并为此与一些党举行了一系列会晤。南共联盟没有接受关于参加1969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会议的邀请,因为在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中表现出它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与1957年和1960年会议(南共联盟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两次会议的文件)是一脉相承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者必须与所有其他反帝国主义力量建立平等联系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次会议结束后,南共联盟主席团执行局认为,会议对共产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缺乏分析,对不结盟政策的作用估计不足,会议反映出大多数参加者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是不能令人接受的。执行局认为这次会议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公开指出需要探索开展平等合作的新途径,在筹备工作中采取民主的程序和更公开地面向公众,在基本文件中表明一些党不参加世界共产党会议不会影响它们与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合作,没有直接指责任何党,认为观点上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和合法的。

1976年6月29~30日举行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柏林会议,讨论了欧洲的和平、安全、合作和社会进步的问题,会议有力地反映出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过程。会上,虚构的磐石般的统一让位于分歧的合法性和协商一致作决定的原则。按照这个精神,放弃并消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概念,在会议的最后文件中,把当代条件下的国际主义合作和互相支援规定为“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伟大理想基础上的国际主义的同志式的自愿合作和互相支援,并严格尊重平等、每个党的独立自主、不干涉内部事务、尊重在争取进步的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有选择不同道路的自由”。国际主义合作意味着一切国家的劳动人民、所有进步运动和各国人民在争取自由和巩固独立的斗争中,在争取民主、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互相支援。柏林会议的工作是公开进行的,这是会议取得政治成就的重要前提,运用协商一致原则通过的最后文件不包含具有约束力的指示。会议还肯

定了某些共产党采取的与所有对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有影响的
政治力量进行联系的方针；第一次在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上明确地
强调了不结盟运动对争取和平、国际合作和社会进步的意义、作
用和贡献。

铁托率领的南共联盟代表团参加了柏林会议及会议的筹备工
作，代表团主张在工人运动中建立新的关系：即“差别中的统一”
——没有领导中心，没有国际“政治总路线”。南斯拉夫共产主义
者认为，社会主义的力量在于尊重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社会主义实
践和进程中由于不同的条件和丰富的民族道路而产生的不同的和
矛盾的利益，并在这些利益之间建立民主的联系；革命力量越是能
够有效地联合一切民主的、进步的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去为争取和
平、自由、独立、平等和各民族自主发展而斗争，就越能促使社会
主义（作为世界进程）更迅速地发展。

根据南共联盟的倡议，1975年4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主题为
“欧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关系而斗争”的
圆桌会议，有40个欧洲的共产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以及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参加。圆桌会议证明，工人运动
的代表有可能进行广泛的会晤。“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国际论坛也
为当代工人运动和整个进步运动中各种思潮的代表建立这种关系
作出了贡献。从1976年开始，这个论坛每年都在南斯拉夫组织专
题讨论，商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某些迫切问题。会上聚集了世
界各地几乎所有社会主义派别的理论家。

因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反对建立一切形式的地区性和世
界性党和运动的机构，正如南共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所强
调的，主张“在自愿、独立、尊重各参加者利益的基础上，与所有的
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以及民主的和民族解放的政党和运动
在地区范围内和世界范围内建立各种形式的民主合作”。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与世界各地100多个共产党、工人党
以及其他进步的和民主的政党和运动进行多种多样富有成果的合

作(互派政治性和考察性代表团,举行讨论某个专题的“圆桌会议”,以及交换意见的其他形式)。与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共产党建立了特别亲密的合作。1977年,根据与所有其他共产党开展合作的相同的原则,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那时,中国共产党开始向其他国家共产党“开放”。在世界上只剩下很少的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没有合作关系,其原因也不在南共联盟方面,它们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越南共产党。双边合作是南共联盟国际合作的基本形式。1969年,来自47个国家的66个党和运动的代表(18个共产党和工人党、25个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及23个人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出席了南共联盟第九次代表大会,而在1978年南共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有118个党和运动的代表团出席:51个共产党、40个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27个其他进步政党和民族运动,还有16个党向代表大会发了贺电、贺信。这些都说明南共联盟的双边国际合作在扩大。

参加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各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特别是社会主义联盟,也本着这种精神进行广泛的国际活动。社会主义联盟与100多个党、民族解放运动和其他进步的和民主的运动保持着接触和合作;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与200多个工会组织和国际工会中心保持接触和合作;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与400多个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青年组织保持接触和合作,而人民解放战争战士联合会则与90多个战士组织和联合会保持接触和合作。

4. 自治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实行中的问题和前景

70年代末实施和发展自治民主制度,在日常社会实践中贯彻宪法规范和法律规范,遇到了许多客观困难,遇到了保守意识的惰性和官僚技术统治主义势力的强大反抗。确立联合劳动作为社会

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过程,进行得比预期的要慢,人们常常把这一工作归结为组织形式方面的事,而没有根本改变社会经济关系,以致社会经济关系仍受到国家所有制思想和行动因素的压力。尽管宪法规范和法律规范以物质和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为依据,并规定了南斯拉夫社会继续朝着联合劳动全面统治的方向顺利发展的潜在的和现实的可能性,但它们没有能够变为劳动者所生活的和作出实质性决定的社会现实。

国家主义和自治之间的冲突仍然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是70年代和80年代南斯拉夫社会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困难、问题和矛盾的社会基础。这种冲突特别表现在扩大再生产领域里。在这个领域里,实质上远远没有实现1964年南共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原则和结论:即直接生产者应当管理社会再生产的整个过程。社会积累的积聚者和使用者通常仍然首先是社会政治共同体的机关,然后是银行、利益共同体和联合劳动组织的较小的业务机构。

许多自治利益共同体从组织方式、工作方式和决策方式来看,从它内部建立的行政机构来看,已成了准国家机构;经济联合会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国家机关的延伸;代表团制度没有克服代议机构的工作方法和内容。约有一半联合劳动组织几乎没有扩大再生产资金,从而越来越多地要求国家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提高价格、过量投资、弥补亏损)。社会资金所有者的职能并没有转交给联合劳动,而是越过联合劳动,在社会政治共同体之间重新划分行使这种职能的权限,即把这种权限分给共和国、自治省和区的国家机关。克服社会主义自治与国家所有制垄断和技术统治主义垄断之间的基本社会冲突的过程没有取得进展,这一冲突日益尖锐化了,并损害着自治的发展。

尽管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原则上主张克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自给自足状态,但在共和国和自治省以至更小的地区内,这种倾向在继续加强,并日益影响到共产主义者联盟本身的关系。共和国和

自治省在对自身发展负责方面承担了宪法义务,但忽略了自己对南斯拉夫整体发展所负的直接责任。对国家的全局发展有重要意义的项目的协商工作,进展缓慢,成绩不大。1977年规定的共和国和自治省“外汇收支平衡地位”日益成为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外汇收支平衡表,并越来越难于同南斯拉夫统一的外汇收支平衡表相一致。为了使经济体制能顺利地运行,需要通过自治协议把局部利益与最佳地实现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但在实践中却不是如此,局部利益已经“政治化了”,从国家所有制关系出发来对待本国的剩余劳动,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协商,于是这种态度变成了民族利益,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别人发生冲突。在实现宪法规定的社会政治共同体的概念方面,主要突出了它们的国家的因素,而损害了自治的因素。宪法关于共和国和自治省在联邦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的规定总的来说得到了贯彻,但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社会地位和基本生产关系的相应变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的一切关系都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却没有实现。因此,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国家主义加强了,并具有了使联邦关系成为联邦机关中共和国与自治省之间的关系的倾向。

在局部利益的影响下,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的行动准备和行动能力都削弱了,它没有能更顽强地和更有力地根据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和已制定的社会发展革命战略来推行新的经济体制,没有能改变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营销规律并且超过实际的物质可能性的国家经济政策。在局部利益的影响下,南共联盟联邦化倾向加强了,这违反了党章关于南共联盟是统一的组织的基本规定。在某些社会政治共同体(首先是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矛盾的利益的压力下,通过了非常庞大的互不协调的计划发展任务;1976~1980年的五年经济计划就是建立在无法实现的目标的基础上,同时忽视了世界已进入新的工艺技术时期(它使社会生产率能够急剧增长)和国际经济关系主要由于1973~1974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没有考虑到要重新研究能

源政策、整个发展政策和出口政策。

十多年来,发展政策和社会产品的总分配政策导致投资拨款的数额特别巨大,同时其他各种消费也急剧膨胀,这就是说,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的发展规模超过了国家的物力。在1971~1980年期间,全部最终消费比社会产值大8%左右。经济部门低下的积累能力和大量投资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这个矛盾是靠增加货币总发行量、进行没有偿还能力的投资和向国外借债的方法来解决的。1978年和1979年的投资费用大大超过了现有的财力和物力(固定资产的总投资平均占整个经济部门社会产值的25.5%,加上非经济部门的投资和流动资金的投资约占社会产值的40.5%)。多年来,经济部门经营中的一切风险都由社会来承担(靠发行货币来弥补亏损),这种做法只能助长投资不考虑经济效果。经济部门实现了数量上的急剧增长,同时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经济发展中的物资比例失调也越来越尖锐;这导致了大型工艺技术系统被分割和经济被封闭在狭窄的地域范围内(区、共和国、自治省),难以实现跨地区的联合;这同时也削弱了经济部门对跨地区联合的兴趣。经济迅速发展和由此造成的个人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产生了这样的总的社会气氛:似乎不必采取行动来改变现状,可以继续忽视经济规律,即忽视对经营成果的责任。由于缺乏市场竞争和有效的总体计划指导,由于缺乏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统一战略,由于统一的南斯拉夫市场被分割和存在强大的自给自足倾向(它降低了南斯拉夫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南斯拉夫的能源发展落后了,但仍坚持日益增加越来越昂贵的石油进口的方针(1979~1981年期间,为进口石油而支付了70多亿美元,即每年平均支付23.55亿美元,而在1976~1978的三年时间里共支付28.01亿美元);食品以及某些基本原料和再生产材料的生产落后了,由于日益采取依靠进口原料和再生产材料进行生产的方针,生产对进口的依赖增加了,而出口却日益减少。1976年全国的外债为65.84亿美元,当时决定在今后五年里,南斯拉夫再借外债115亿

美元,以为通过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措施,可以保证必要的增长率,增加出口,减少各种消费,从而使经济有能力偿还债务。结果在1979年出现了战后时期最高的国际收支赤字——36亿美元(1980年减到23亿美元,1981年减到7.5亿美元)。1981年底全国的外债达201亿美元,1981年仅仅利息就支付了约20亿美元,占社会所有制经济部门国民收入的4%。70年代,出口在实现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和南斯拉夫出口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都下降了。国家外贸的地区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81年发展中国家在南斯拉夫商品进口中占14.7%,在商品出口中占17.4%;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南斯拉夫的进口中占53.9%,在出口中占32.7%;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南斯拉夫的进口中占32.4%,在出口中占49.9%。经济中的结构比例失调、国际收支平衡的赤字和全国的巨额债务成了限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威胁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自治基础本身。发展速度开始降低,经济不稳定性开始增加,商品货币关系发生巨大波动,商品缺乏,越来越多地采用行政手段调节经济过程和市场状况,失业增加;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方针是:封闭南斯拉夫市场,使之不受世界生产率的影响,结果1978~1981年社会所有制经济成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大大低于计划规定的指标,平均每年降低1.2%。直到1980年和1981年把出口置于优先地位才开始大大改变这种状况。

社会结构迅速地发生了变化,这不仅是由于农业人口越来越多地流入城市,而且由于教育的迅速发展(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结构的迅速变化使就业发生了严重问题,尽管在1952~1981年期间,社会所有制成分中劳动者人数增加了2.5倍,即从168.4万人增加到584.6万人,而在科索沃和马其顿就业人数增加最为迅速(增加3.9倍,分别从约3.7万人增加到约18.3万人和从约8.9万人增加到约43.5万人),黑山的就业人数增加3.4倍(即从约3万人增加到约13.3万人)。但寻求职业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从1952年的约4.5万人增加到1981年的80.9万人(其

中46%是专业人员,首先是青年)。在就业方面问题最严重的是马其顿,在那里,寻求职业的人数占有劳动能力的人数的11.3%,在科索沃为9.0%,在塞尔维亚本土为7.2%,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包括两个自治省)为8.2%,在黑山和伏伊伏丁那为6.3%,失业率最低的是克罗地亚(3%)和斯洛文尼亚(1.3%,也是世界上最低的失业率)。由于就业困难,大量工人到国外临时工作(特别是在1970年以前)。但是,尽管存在巨大的经济困难,从1978到1981年,约有130万工人就业(社会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就业增长率为3.6%)——约50万人接替退休工人,约76万人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此外,从国外回来的人数大大增加,到国外临时工作的人数显著减少(1974~1976年约回国22万人,这一趋势还在继续,而出去了约2.5万人);1981年留在国外临时工作的约有62.5万人,包括家属共约87万人。

区、自治省和共和国都根据自己狭隘的利益来解释和运用经济政策,尽管它们的狭隘利益往往与共同利益和目标是矛盾的。经济政策执行的各自为政,使得经济唯意志论滋长。经济唯意志论的基础实质上是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下列观点:协商和协议为取消市场提供了直接的可能性,而违反这种社会契约和自治协议又不承担任何经济后果。于是统一的南斯拉夫市场运行的问题变得极其尖锐——开始了建立六个或八个自给自足的经济的过程,这已成为滋生民族主义和重新产生共和国、自治省、区的官僚势力和技术统治主义势力及影响的重要根源之一。

在这样的基础上,而在很多方面也是由于科索沃的建立在国家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失策,1981年3月底和4月初在普里什蒂纳和科索沃的某些其他地方,发生了反革命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统一主义的示威游行,目的是要强行改变宪法制度和破坏国家的领土完整(要求建立“纯”阿尔巴尼亚族的科索沃,要求南斯拉夫境内的所有阿尔巴尼亚族人聚集在一起并宣布成立“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本着这种意图驱逐塞尔维亚族人和黑

山族人——作为强行改变边界,使科索沃和生活着阿尔巴尼亚族的其他南斯拉夫领土并入阿尔巴尼亚的前提)。在这以前的十几年中,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和民族统一主义势力,依靠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对南斯拉夫实行的大阿尔巴尼亚政策和反动的阿尔巴尼亚政治流亡者,进行着肆无忌惮的活动,特别是对阿尔巴尼亚族的大学生和中学生进行着民族主义的宣传。南斯拉夫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力量,尤其是阿尔巴尼亚族中的社会主义力量,坚决反对民族主义暴力,开始进行长期的政治工作,毫不妥协地与民族主义划清界线,为在社会主义自治的基础上恢复兄弟情谊和团结而斗争。1981年11月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然后是南共联盟十二大通过了采取这种行动的政治纲领。

这样,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南斯拉夫社会在实现社会主义自治社会关系发展的长期战略中,遇到了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克服粗放经营和使南斯拉夫经济更顺利地参加国际分工的需要和雄心,首先是与下列事实相联系的:这是社会主义自治的物质基础稳固的前提,同时,如果联合劳动不能在管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经济发展过程就不能实现长期稳定。同样,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所必须解决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也是由物质发展的高得多的水平所产生的(尽管存在许多比例失调的情况,但仅仅在几十年内就达到了这种高水平)。1980年,南斯拉夫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为2620美元,属于中等发达的工业国之列(1975年约为1350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南斯拉夫是欧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1939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约112美元,三十多年后,南斯拉夫根本改变了自己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按战后时期的发展速度来看,南斯拉夫属于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列:从1947年到1980年,总产量(社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9%,共增长了6倍,按人口平均增长了4倍。这特别是由于为建设新的生产能力投入了大量资金;在1953~1980年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每年增长7.6%。1952~1980年期间,整个经济社会产值

的相当大部分(23%)用于投资(这个时期的最后十年,投资数额特别多,占总投资的56%),最初几年,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60%,1973年减少到31%,而1980年达38%;在整个这个时期里,国内不发达地区的投资资金在社会产值中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在黑山占52%、在科索沃占53%、在马其顿占40%、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占37%)。1953~1964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特别高,年平均增长率为8.6%,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国家之一。1965年以后,生产发展速度减慢,但在改变结构和提高经济的经营效益方面作出巨大努力后,1965~1981年期间的增长速度仍达5.2%。从而有可能大大缩小南斯拉夫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之间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南斯拉夫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在人均社会产值方面的差距1960年是4.2倍,1979年降为2.6倍。

经济部门的生产结构也实现了重大改革。在整个战后时期,社会所有制经济成分每年平均增长7%,它在社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47年为62%,1981年增加到86%,而私有经济成分(首先是农业)的发展速度要慢得多,年平均增长2.8%,私有成分在社会产值中占的比重从1947年的38%降到1981年的14%。工业在社会产值中的比重从1947年的18.2%增长到1981年的40.1%,而农业生产所占的比重则从39.2%降为13.6%。1947年工业生产的产值相当于农业的47.6%,而1981年则比农业大2倍。黑山的工业生产在社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最小(31.4%),克罗地亚是35.8%,比重最大的是斯洛文尼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45.7%。农业在社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最小的是斯洛文尼亚(6.6%),而最大的是伏伊伏丁那(24.6%)。

从1947年到1981年,工业生产增长了17倍(平均每年增长8.9%)。生产资料的生产(机床、设备)增长38倍,能满足本国需要的3/4。用于个人消费和家庭需要的商品生产约增长5倍。1979年工业生产能力比1952年高9倍。

尽管全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政策都忽视了农业的发展,以致农

业的发展速度慢得多,从1947年到1980年,平均每年增长3.1%,而且有很大的波动,但在农业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建立了大型农工联合企业,这些企业掌握了第一流的专业技术成就,有20多万工人就业,尽管它们拥有的土地仅占总耕地面积的17%(160万公顷),但提供了农业中全部商品产量的将近一半。个体农户与社会所有制成分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1980年有100多万个体农业生产者参加了这种合作。农业的技术设备情况大大地改变了:1980年机械牵引力占整个牵引力的84%(而1947年,牵引力几乎全部是牲畜),全国约有41.6万台拖拉机,平均24公顷耕地有一台拖拉机(而1949年1485公顷耕地才有一台拖拉机)。1981年农业生产比1947年高1.6倍。在1981年生产了430万吨小麦(1974年是战后小麦产量最高的一年,共生产630万吨)和980万吨玉米(1979年是战后玉米产量最高的一年,共生产1010万吨)。

南斯拉夫各地的经济都迅速发展,尽管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和人口状况各不相同,从而产生了许多困难。1948年到1980年,全国社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6.1%,增长速度高于这个平均数的有斯洛文尼亚(6.5%)、马其顿(6.4%)、克罗地亚(6.2%)。增长速度等于平均数的有塞尔维亚本土(尽管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特征来说,塞尔维亚本土低于全国发达地区的平均数)和伏伊伏丁那;而低于这个平均数的有黑山(5.9%)、科索沃(5.7%)、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5.6%)。在所有共和国和自治省,工业的迅速发展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在1948~1981年期间,斯洛文尼亚工业平均每年增长8.1%,在马其顿平均每年增长11%,在黑山平均每年增长12.9%。

为了克服一些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过去遗留下来的经济不发达状态,南斯拉夫大家庭采取了许多经济政策措施。从1965年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联邦的专项基金(从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经济成分的社会产值中提取1.97%形成),来推动不发达地区加速发展的。近几年来,这些资金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比例进行分配

的：科索沃37.1%，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30.6%，马其顿21.7%，黑山10.6%。1967~1980年，南斯拉夫用于发展不发达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的资金总额约占同一时期里社会所有制经济所实现的社会产值的3.1%左右，这说明了南斯拉夫工人阶级表现出的特别崇高的相互支援精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获得的资金占其社会产值的7.1%，黑山占其社会产值的20.7%，马其顿占其社会产值的10%，科索沃占其社会产值的66.5%。

南斯拉夫全国人口从1948年的15772098人增加到1981年的22427585人，人口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非常迅速的城市化过程、即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使农业人口减少了650~700万；农业人口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从1948年的67.2%减少到1981年的19.9%，其中，农业人口比重最大的是塞尔维亚本土（约28%）和科索沃（约25%）。城市人口比重最大的是马其顿（占共和国人口的55%），然后是伏伊伏丁那（54.5%），黑山（51.5%）和克罗地亚（51.4%），城市人口比重最小的是科索沃（32.8%）、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37%），然后是塞尔维亚本土（48.3%）和斯洛文尼亚（49%）。

社会结构中最重大的变化是社会所有制经济成分中的工人在全部积极人口中的比重有很大增长——从1953年占23%到1981年几乎占62%（塞尔维亚为55%，塞尔维亚本土为53%，科索沃为52%，斯洛文尼亚为85%），其中产业工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38%。工人阶级已成为物质发展的基本社会力量。在1947~1981年期间，全国人口增加约700万，而工人人数增加约500万（就业人数从120万增加到600万；1947年每1000人中只有74人就业，而1981年有266人就业）。就业人员的技术熟练程度也有了变化：全部就业人员中专业工人的比例从1966年的46%增加到1978年的63%。特别在最近十年里，居民的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不发达地区提高得最多。受过中学、大专和大学教育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在全国都增加很多，尽管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人口在各共和国和自

治省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有很大差别——从斯洛文尼亚的1.4%到科索沃的25%，而文盲的比例从0.8%（斯洛文尼亚）到17.6%（科索沃）和9.4%（黑山），全南斯拉夫平均为9.5%（1981年）。

近几年来，发展教育事业的经费占国民收入的5%，有280万学生在八年制学校中学习，几乎包括了全部学龄儿童（1953年只有71%）；约98.5万学生在中学学习；从1947年到1981年高级学校^①从9所增加到124所，在校学生从约3000人增加到约10.1万人。高等学校（大学、学院）从1947年的39所增加到1980年的231所（除共和国和自治省的首府外，在68个城市中也有高等学校），注册的学生数从约4.6万人增加到约31万人。在1945～1980年期间，在高等和高级学校里，有81.6万多名学生毕业，有1.13万名获得博士学位。与1952年相比，1980年医生人数增加5倍，平均每675人有1名医生（而1952年是6500人有1名医生）。1980年，全国人口中有83%享受公费医疗（1952年只有25%左右）。

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饮食、衣着、居住条件、教育、文化和保健需要的满足，劳动条件的改善等方面都有了重大变化。1952～1980年，实际个人消费增加4倍多（平均每年约增加6%）；1965年以后，增长尤其迅速，占社会产值的54～55%，而加上共同消费，占社会产值的67～69%。

80年代初，南斯拉夫社会在这样的总水平上（在自给自足和粗放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主要依靠通货膨胀和借外债来推动经济的发展），着手制定和贯彻经济稳定政策，以便解决已产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首先是克服联合劳动组织的积累和再生产能力低和投资消费高之间的矛盾，使它们能够进行现代化的和合理的生产，参加国际分工，以出口弥补进口，偿还外债。1981年10月成立了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谢尔盖·克拉伊盖尔为首的联邦经济稳定问题特别委员会，与大量科学工作者和政治工

^① 一般为两年制，相当于大专水平。——译者

作者合作,拟定了一整套经济稳定长期纲领(南共联盟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该纲领的“基本原则”),并决定本着同样的精神着手分析政治体制的运行情况。1983年7月,完成了这个纲领的全部工作。纲领规定了经济体制和法律体制方面进行必要改革的内容和基本方向,确定了基本发展战略,努力使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彻底起作用,并把国家的作用限制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监督法律的实施和保卫自治的职能),把联合劳动组织在相互关系中不能直接解决的一切问题转交给代表团制解决。

为了在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方面采取有力的行动并继承铁托时代奠定的政治战略方针——社会主义自治、民族平等、不结盟的对外政策,1982年6月19~23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南共联盟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会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批判地对待代表大会前这几年的社会实践,一致认为,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团结是国家统一和顺利地解决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及将要遇到的挑战的重要前提之一。共产主义者联盟面临的任务是:重新研究产生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阶级条件,开辟继续革命的现实前景——使自治有可能在本阶级的基础上进行再生产;而共产主义者联盟作为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团结力量和根本因素(其引导作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条件),其首要任务是:重新确立自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先锋作用,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实现工人阶级革命组织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统一,防止联邦化倾向——这种倾向已经威胁到这个组织的行动能力和活动。

封面设计:尹凤阁

Istorija Saveza Komunista

Jugoslavije

Prvo izdanje

Izdavački Centar Komuni sta/Naro dna

Knjiga/Rad

Beograd, 1985.

据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出版中心、人民书籍出版社、劳动出版社
贝尔格莱德1985年版译出,个别地方照原出版者的。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历史

NANSILAFU GONGCHANZHUYIZHE LIANMENG LISHI

(南)斯·斯托扬诺维奇主编

杨元恪等译 李嘉恩校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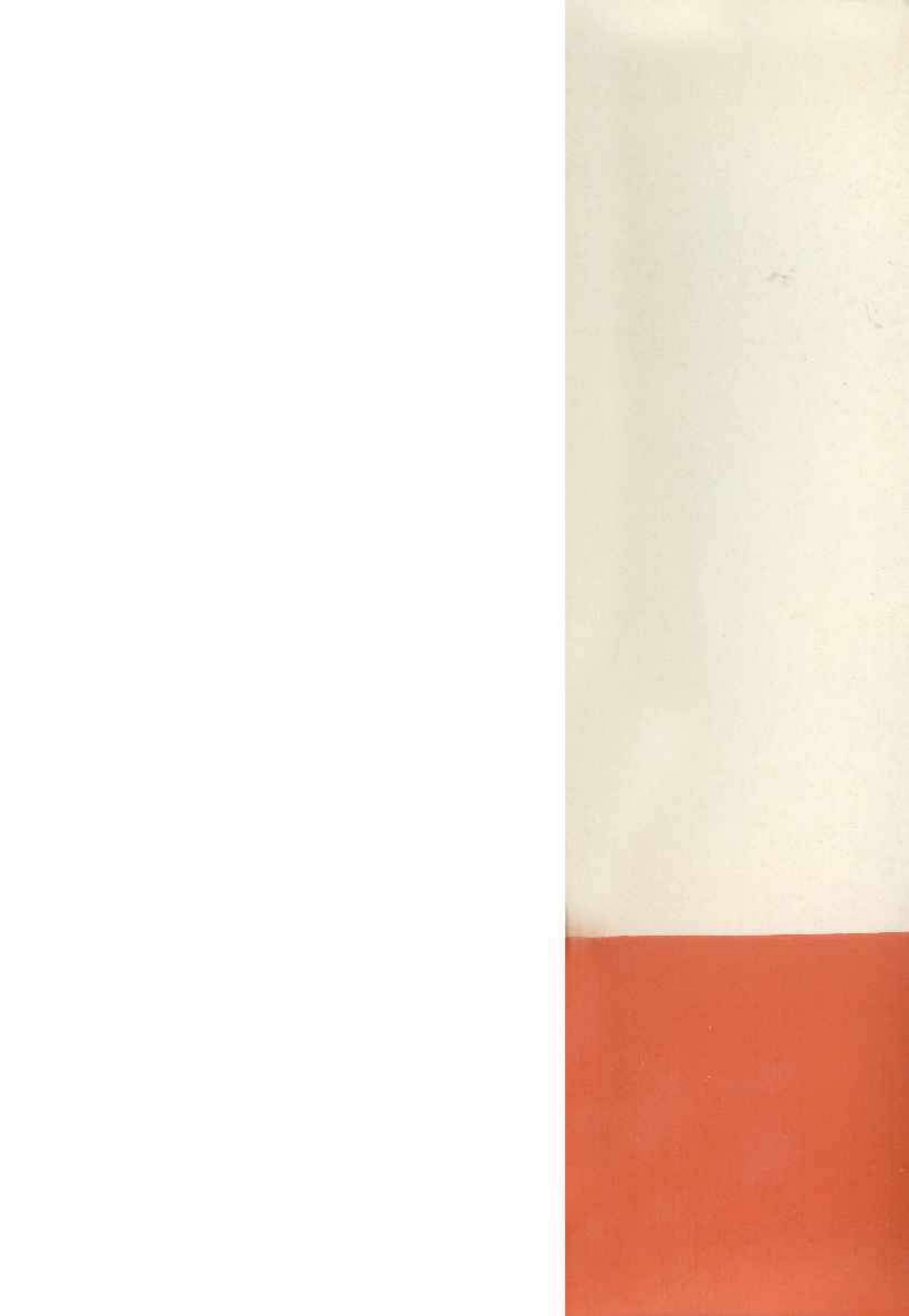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0.75印张 528,000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1—700

ISBN 7-01-000499-4/K·165 定价13.00元





ISBN 7-701-006199-4 · X · 125 定价 13.00元